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井上清是日本著名史学家，现任京都大学教授，战后长期参加民主运动，多次来我国访问。除本书外，他还著有《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日本近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战后日本史》、《日本军国主义》、《部落问题研究》、《日本妇女史》、《现代日本妇女史》等书，其中大部分已有中译本。

本书是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日本通史。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从原始社会写到1640年；中册从1640年写到1890年；下册从1890年写到1960年。

本书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叙述了日本历史。其中着重叙述了日本天皇制的完成和走向军事帝国主义的过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内残酷压

迫剥削日本人民，对外疯狂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罪行；同时对日本人民要求民主、反对军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作了历史的叙述。

本书《引言》部分，对目前日本史学界仍有争论的日本史分期问题作了简要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系根据岩波书店《岩波新书》所收本，上册是根据1968年第十二次印刷本，中册是根据1967年第七次印刷本，下册是根据1968年第六次印刷本译出的。在翻译时，为了阅读方便，我们把原著上册最后所附整个日本通史的年表移到下册卷尾，将下册卷末所附总目录的小节题目分别移到每册卷首目录的各章之下。原书每章之前有图片一页，在译本中未收入。

日本史时代划分一览表

公元前三百年以前和公元1900年以后，在表示年数的间隔上，是前者短、后者长。希参照本书《引言》。

时代	根据社会经济体制划分	按照三分法划分	按照政权所在地划分	外 国				
				朝鲜	中 国	其他国家		
15~25 万年前	原 始 社 会	旧石器时代 绳文陶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弥生式陶器时代 (金石器并用时代)	史 前 时 代			公元前5千 ~4千年美 索布达米 亚文化。公 元前3400 年左右，埃 及第一王 朝 公元前6~ 5世纪，印 度和希腊 古代文化 全盛时期		
公元前 7千~ 8千?					殷 朝 (BC 13世 纪左右)			
公元前 300~					周 朝 (BC 9世纪左右)			
200~					秦 朝			
100~				汉	前汉			
0				(?)	(新)→			
公元 100~	会 社 会	(民族的模拟制奴隶制)	古 代			罗 马 帝 国		
200~							朝	后汉
300~							三 国	
400~					大和时代		晋 朝	西晋 东晋
500~				奴隶社会			南北朝	
600~					飞鸟时代		隋 朝 唐 朝	
			新罗朝		东罗马帝国 (拜占廷)	西罗马帝国 西欧封建制 度成立时期		

700-	奴隶社会	(国家奴隶制) (家长制农奴制)	古代	奈良时代	新罗朝	唐	东罗马帝国 (拜占廷)	西欧封建制度发展时期		
800-				平安时代		五代				
900-				(摄关政治时代)		宋				
1000-	封建社会	成立时期 发展时期 完成时期 解体时期	中世	镰仓时代	高丽朝	(南宋)	金朝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100-				(政院时代)		元朝				
1200-			南北朝时代	李朝 (朝鲜)	明朝	明朝	明朝	明朝	西欧封建制度解体时期	
1300-			室町时代							战国时代
1400-			安土桃山时代							
1500-			近世	完成时期	江户时代	日本统治时期	清朝	清朝	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	
1600-					(明治时代)					日本统治时期
1700-			近代	解体时期	(大正时代)	日本统治时期	清朝	清朝	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	
1800-					(昭和时代)					日本统治时期
1900-			资本主义社会	垄断资本主义	(被占领时代)	日本统治时期	清朝	清朝	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	
1945-	现代	(现代)			大韩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书体例

一、人名，凡一个人有过多种姓名，或有别名及其他等等，主要只使用一个最为熟悉的名字、别名或通称。

二、地名的写法，一律使用现在通用的写法（如大坂一律写为大阪）。

三、遇有人名、地名、事件名称及其他等等，只就著者认为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事例，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标音文字。

四、年代，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元年数；年号，只有特别必要时，如一事件的历史名称与当时的年号有关时，才在公元下面用（ ）号加以注明。

五、引用史料原文，或将假名改写为汉字，或将汉字改为假名，或者译读汉文，或把历史假名改写为现代假名，不一定拘泥于原文。总之，以力求不失原意，便于读者理解其意义为原则。

序

任何人都为历史所孕育，在历史中生活，并用某种方式创造历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此都能够认识。我们只有认识了孕育自己并在其中生活的历史的时候，才能够自觉地、合乎目的地参加创造历史。

在现代日本，国民对于历史非常关心，这是生活在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的人们想要自觉地参加创造历史的表现吧。历史学家对于国民的这种关心必须有所反映。于是，出版了叙述方法和历史观点各不相同的大量的日本历史书籍，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所以勇于把这部书公诸于世，也是有我个人的雄心和目的的。

第一，我要阐明从原始蒙昧时代到现代文明时代，创造和推动日本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并想对日本历史起过影响的一些条件（如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地理和自然条件、偶发的各种事件等

等) 进行具体的探索;

第二, 要明确指出日本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 以便各个时代的形态和后一时代继前一时代而发展的整个历史演变的概况, 一目了然;

第三, 要统一地掌握日本历史同其他一切民族历史所共有的人类历史的共同性, 和确为日本历史所独有的特殊性;

第四, 在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 要进而综合统一地说明我们历史上有关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各个侧面, 并在历史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现代社会; 同时对于我们的将来, 即为规划出具有科学根据的远景有所贡献。

以上各点, 是我企图在这部书中要实现的。这就是我在学术上所具有的抱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历了政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急剧变化, 现在表面上天下太平, 但在深处仍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这样, 在国民之间, 对于日本历史形态的看法便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甚至是对立。在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 在统治阶级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之间, 对历史形态的看法是不同的。不用说, 我是站在新一代

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所具有的对崭新历史形态的看法这一边的。

但是，最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陈腐的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历史形态，经过一番修补和乔装打扮，又很快地出现在历史舞台。文部省（文教部——译者）通过历史课本的编审工作，在这方面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例如：在讲授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时，只许说这是“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对于陈腐的历史形态一概否定，或者说“这种东西可以置之不理”，那是不能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新的历史形态的。陈腐的帝国主义的历史形态在人民大众头脑中仍有其残余，所以只有用新的历史观点，把形成历史形态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人物给予科学的、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令人心悦诚服地认为“怪不得，这件事原来是这样的”的时候，旧的历史形态才能从内部予以克服，新的形态才能作为国民的历史发展起来。

我希望这部书，成为接近于国民的历史，哪怕是接近一步也好。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任务，靠你这样的人

完成得了吗？”我虽然是一个历史界的无名小卒，但勇于向着这个目标倾注全力前进，这不也是愉快的事情吗？

我参考了很多书籍和论文，不外是学习了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把其中已经阐明的史实，用我的全局观点加以解释和编写而已。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里，受到岩波书店《新书》编辑部各位的大力帮助。特别对于堀江铃子先生、田村义也先生是感谢不尽的，在此特致谢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井上 清

引 言

——日本历史的发展和时代划分

从可以追溯的历史最古的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我们日本人都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在同一个地区，即现在的日本列岛上生活的。其间，虽然也和一些其他种族有过混血关系，但是，既没有因征服和被征服所引起的种族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同化。从原始的蒙昧时代直到现代文明的第一流水平为止，日本人的社会和文化是没有间断地连续发展下来的。这是日本历史最大的特点之一。

直到公元三世纪，当时日本社会几乎还是完全孤立列岛上。从那以后，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的文明，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四至五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这种情况如果和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人类文明发祥时代比较，落后了二千年到四千年以上。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文明时期相比，

也落后了一千年左右。

在进入文明时期以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速度，虽然有时急剧前进，有时停滞不前，但从整体来看，还不是缓慢的。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日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明国家。这种发展的推动力量，在于人民坚持不懈的勤劳生产和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通过阅读这部书将可以明了。由于当时日本人贪婪地学到了朝鲜、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欧洲的先进文明，就使得日本历史的发展异常迅速，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日本人到目前为止，并未作出什么巨大的系统的超越世界文明的成就，而经常是模仿先进的文明。这件事似乎应以自卑的口气加以叙述。但是，在交通工具不象现在这样发达的时代，日本是经常孤立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区的。处于这种状态下，日本人能够摆脱极为落后的野蛮阶段，这当然只能是经常吸收先进文明的结果，而吸收先进文明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日本人的生活能力。

但是，从阶级社会的出现直到近代，先进文

化的传入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传入的文化是由上层渗透到下层的。统治阶级吸收外国文化作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在日本，人民直接地经常地和外国往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许多外国人到日本来和日本人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也是不许可的。这是由于日本是岛国这一地理条件，所以使得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利用政府的权力，易于禁止人民同国外来往的缘故。

只有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即封建统治阶级还未能建立名副其实的统治全国的坚强权力的时期，部分人民才有时以所谓倭寇身分、有时以和平的殖民者以及商人身分，往来于朝鲜、中国、东南亚各地；到十六世纪，日本人又和来到日本的欧洲人进行一些交往。在这时产生了日本文化新发展的萌芽。但是，随着严密的封建统治的建立，统治者又立即采取了锁国主义。这样一来，对于外国文化，并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整个生活、既用头脑又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学习，而是由知识分子通过书本来学习的。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是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到近代发生自由民权运动，才同当时的统治制度相对抗，从下层、从人民方面向欧美的民主主义革命学习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和理论。但是，这时候，在欧美各国进行过民主革命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保守的统治阶级。他们已经不是日本民主革命的支持者，相反地，他们已经和迅速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了。日本执政者、官僚、资本家以及他们御用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受到欧美统治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习了近代的统治技术和生产方法。直到后来，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时候，日本人民吸取外国文化，才不仅通过书本，并有了和外国工人阶级进行直接联系的开端。然而直到现代，日本人民同世界工人阶级的文化交流仍然不是那样容易的。

日本吸收先进文化的工作，几乎完全为统治阶级所垄断，这使日本社会的新旧文化始终交错并存，产生了文化的多元化；并使日本社会的变革不能是一举来自下层的革命，而是来自上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的积累。这是形成日本历史发展特点的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后进社会吸收先进文化的时候，在其社会里，因吸收先进文明而更为前进的文化和旧有的落后的文化，在某一期间同时并存是难免的。公元前三世纪末叶，还不知道正式农耕的新石器时代的日本社会，已从外部传来了水田农业和拥有铁器的文化，从这时起，新旧文化开始并存，产生了文化的多元化。在先进社会里，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已有了较清楚的区别；金属器时代也从青铜器阶段过渡到铁器阶段。但日本社会，在以石器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铁器和青铜器却突然同时进入日本。在那以后的几个世纪，石器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到公元四世纪前后，已经是阶级社会了，铁器成为极端重要的财富，它和生产技术人员一道，被王族和贵族所独占，并成为他们把人民作为一种奴隶（部民）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劳动人民常用的主要工具，仍是石镐、石镰、木镐、木臼和木杵等等。这一阶段，很难断定它是石器时代，还是铁器时代。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如上述铁器例子所示，统治阶级走在人民之前，抢先用先进文化武装了

自己。不仅在物质方面，就是文字、佛教、儒教、法律制度也莫不如此。而统治者不论在物质方面或者精神方面，却经常使人民停留在落后状态。不仅古代和中世纪如此，就是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明治政府本身向西洋学习了各种最先进的统治技术和生产方法，而对人民吸取西方的自由和民权思想——近代文明的基础，却进行了坚决镇压。这种吸收文化的方法，造成了日本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多元性并能够长期持续和扩大下去的根本条件。但是，如果让从事生产的群众停留在落后状态，那么，统治阶级本身不管怎样洋气十足，他们本身也是不能彻底转变为先进的。他们为了有效地统治群众，他们自身就必须保护和维持落后的思想、信仰以及旧的血缘关系那样的落后关系。例如走向现代科学文化尖端的原子能研究所，在举行奠基仪式时，却进行了近似原始万物有灵论的信仰神社的祓除不祥的仪式。又如使天皇相信自己是“现人神”^①并使人民也相信的这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被打破以后，天皇却滑稽地

① 现人神：意为临凡的神。——译者

凄惨地宣布自己不是神，这仅仅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上面叙述的文化多元化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尽管统治阶级使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但从事生产的是人民群众。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然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推动历史前进。但这并不是自然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从事生产的勤劳大众同依靠旧的生产关系来维持权力和财富的统治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我国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这种变革的推动力量在于群众（群众的具体含义，因历史时代而不同。例如在古代，地主也是群众，在封建社会，资本家也是群众）。但来自下层的变革却未能一下子开展起来。为了对付来自下层群众的这种斗争，由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由中间阶层所进行的社会改良占据了主导地位（此事将在以后各章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问题和上述日本文化的发展情况，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是这样，在日本社会，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原始公社并未彻底瓦解，而且利用

了公社的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

古代天皇制（奴隶制社会）瓦解的时候，也不是象欧洲日耳曼人消灭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而建立了封建制社会那样，即由外族入侵，消灭了日本奴隶制社会，而主要是在日本社会内部，旧的统治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在对付奴隶性质的劳动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其基础是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地转化为农奴主的。因此，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几个世纪中难于区别地混杂、并存和结合在一起。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虽然条件同上述有所不同，但也同样不是一下子就进行了革命的变革。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之所以不断地有所争论，其原因就在于此。此外，在日本，产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究竟是什么时候确立的？这个问题也有各种说法。就是这样，有的部分资本主义已深入发展，而其他部分还广泛地存在着封建的经济制度和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

由于日本历史是如此发展的，所以对日本历史进行科学的时代划分是很困难的。

在近代的历史书中，最通用的时代划分方法是采取政权所在地或者当权者的家名，用这些来称呼每个时代。这乃是否定日本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共通性，强调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也就是由夸耀“国体的精华”的历史观而来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便把古代天皇政权尚未定都，而一代一代在大和平原^①流动的时代叫做大和时代（约为公元四至七世纪）。以此为开端，以后划分了奈良时代（公元710—789年）、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室町时代（公元1336—1573年）、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68—1598年）和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

如果采用这种划分方法，那么，江户时代以后，就只好叫做东京时代了。但并不如此，而是根据年号，称为明治时代（公元1868—1911年）、大正时代（1912—1925年）和昭和时代（1926—
）。又因江户时代是德川氏掌握政权，所以也叫德川时代；同样地，室町时代也叫足利时

① 大和平原：今奈良县一带地方。——译者

代。这么一来，镰仓时代又可以分为源（赖朝）时代和北条时代了。但又不如此，而室町时代的末期也称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采取织田和丰臣的姓氏，也叫织丰时代。这些并没有什么原则根据，不过是以统治者转移而叫做某某时代罢了。虽说天皇的都城已经由奈良迁到京都，但社会状态和政治结构以及文化并未发生什么划时代的变化。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可以说是在迁都到平安京^①以后，经过一个世纪以上的十世纪之初，即所谓平安时代中期开始时发生的。

不过，这种划分也有些便利之处。由于镰仓、室町、江户等三个幕府都分别具有封建制的独特的结构，所以可以把它们各自看做一个时代。平安朝为武士阶级尚未取得统治的时代，从这种意义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概念。但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在叙述日本历史时，这种时代的称呼被广泛地使用着，所以在本书的《时代划分一览表》里，也写进了各种时代的名称。

① 平安京：今京都。——译者

如果采用世界历史通用的划分方法来划分日本历史的时期，也可以现代为起点，回溯过去，采用划为近代、中世、古代的三分法。按这种划分方法，近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中世起于何时，止于何时？这些事情又要由学者任意决定（说好听一点，就是单凭直感）。因为，如果把历史只作为时间的连续的概念来看，那么很难断定什么时候距离现在“很远”，什么时候“比较远”。因此，如以这种三分法为依据，不同的学者又把“古代”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而在“中世”和“近代”之间又插入一个“近世”，而把近代又称为“最近世”。这当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而是基于著者的方便。用三分法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这也不是说，要让日本历史适合外国历史的各个时代。

三分法是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基础来划分时代的，即依据每个社会结构的存在时期距离现在的远近而加以古代、中世等名称的时候，才具有科学的意义。根据这种方法，就可称原始公社的时代为原始时代或称史前时代（无文献记载的时代）；称奴隶制时代为古代；称封建制时代为中

世；称资本主义时代为近代；在世界史上，称呼社会主义体制在地球上出现的1917年以后为现代，这是通例。但在日本，通常是把封建时代后期，即从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成立（十六世纪后期）以后直到幕府政治消亡为止称为“近世”。这等于是称之为“中世后期”。我在本书中称呼古代、中世、近世、近代时，都是和上述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本书所说的现代，在世界史方面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日本则指1945年8月以后。关于“现代”，也有各种说法；但严格地从科学角度来说，如把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和以前的日本划归一个时代，我认为就是犯了一种把前后的政治结构及其在世界史中的条件有所不同的两个时期混淆起来的错误。

对于时代划分，不单纯为了方便，而要把这一个时代做为应该具有独自结构和特点的特殊时代而与其他时代相区别，从而使它具有科学的必然性，这就只有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既能正确表达各时代的基本内容，同时还能表达从一个时代过渡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从而对日本历史与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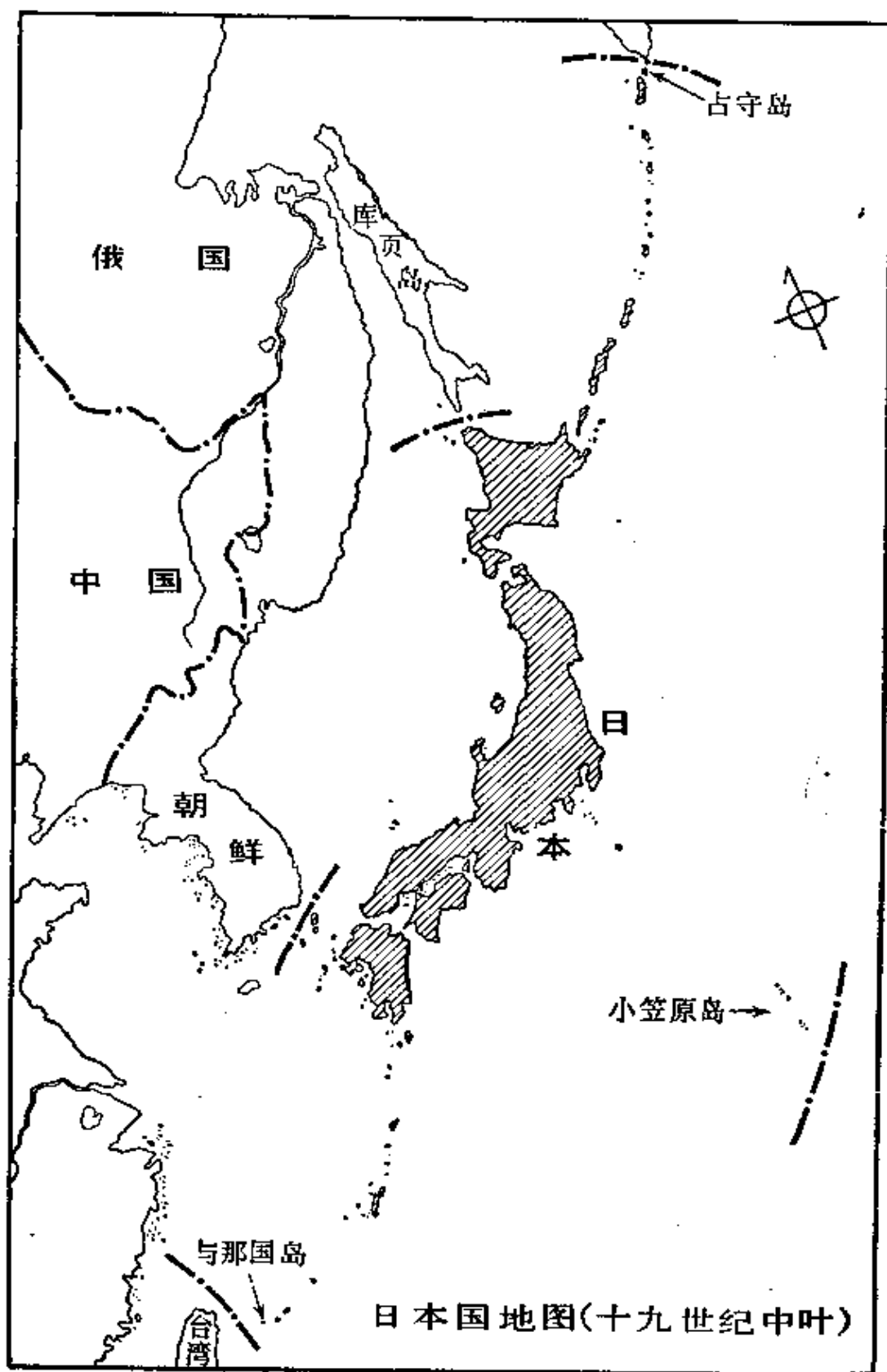
民族历史即人类史的共通性也能表达出来。

然而，由于日本历史具有上述那样发展的特点，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来划分日本历史时代，就相当困难，因此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不能把论争的情况加以介绍和说明。我是采取下述方法的。

在划分时代的时候，第一，我认为，与其注意一个社会的陈腐的、落后的东西还残留得如何，倒不如更多地注意新的、进步的东西是否已经成为不能挫败的力量而出现。第二，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来划分时代，并不等于只是根据经济制度，还应该观察政治，也就是必须观察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认为，一般说来，对经济结构的变化，不能肯定说它究竟在哪一年发生变化，变化的幅度要留下几年、甚至必须留下几十年的时间。在确定这种变化的时期时，应该确定在这样的年代，即建立在没落的、旧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权力已经垮台，推行新的、正在发展着的（虽然还弱小，但已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经济制度的阶级的权力已经确立的年代，以此来划分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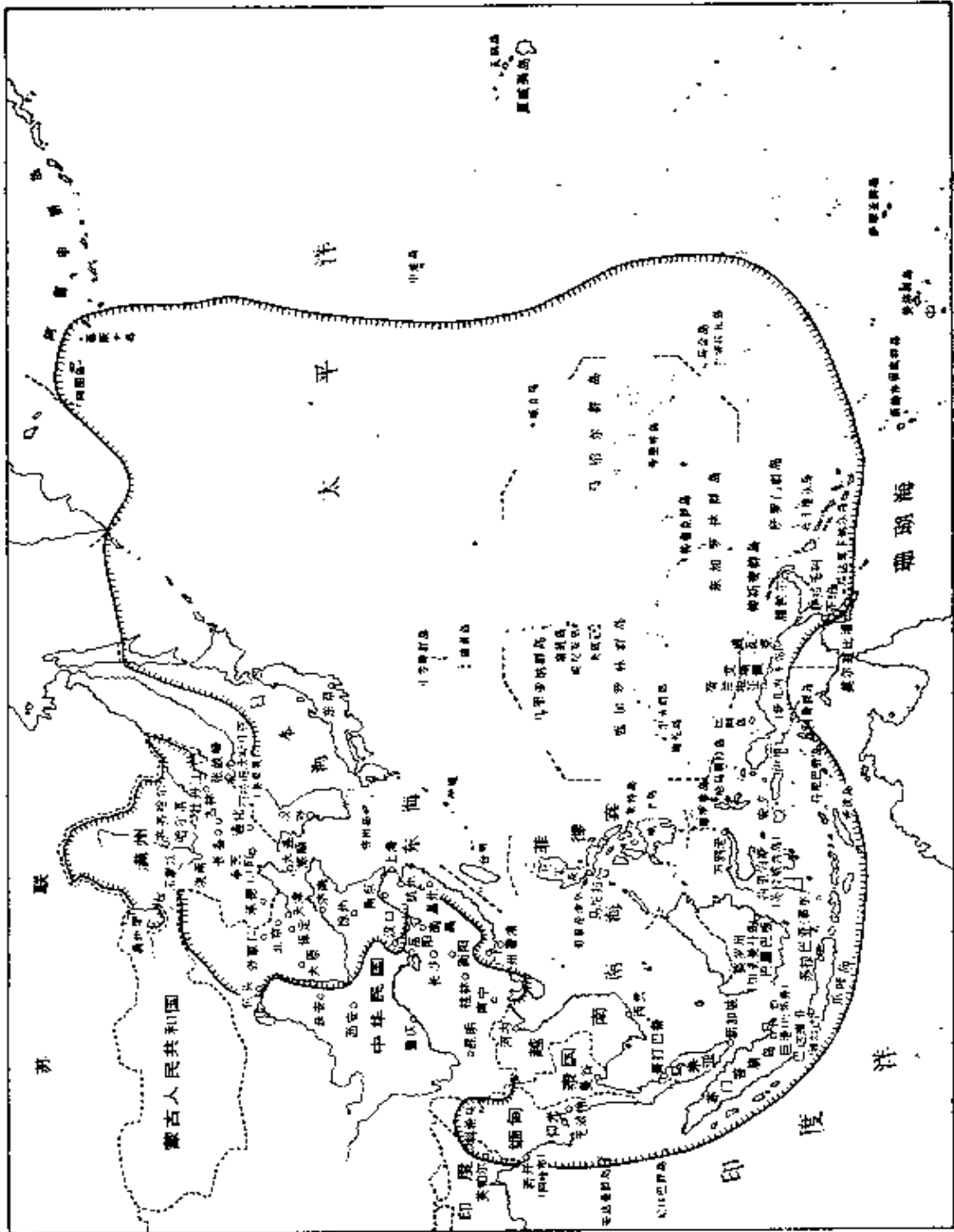
按照这种方法，我把公元四世纪初叶，即以大和地方为中心的阶级社会和国家成立时期，作为日本历史的原始公社时代的结束，即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一时期是不是奴隶制社会，各种说法还有争论，这个问题现在从略。我个人的见解将于本书第二章叙述。奴隶制时代是在武士阶级独占的国家成立时期，即十二世纪末叶结束的，封建时代从此开始。然后，再以公元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成立近代天皇制，作为封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划分。

资本主义时代也象过去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总有一天是要完结的。在世界史上，资本主义已经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是全世界的体系了，它的裂痕几乎可以说是逐年在迅速扩大下去。在这一过程中，今后日本的历史难道不要和近代以前那样地由统治者和中间阶层用自上而下的改良的累积来逐年地进行变革吗？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为时过早。这在通过本书把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的日本历史发展过程加以认真地正确的阐述以后，再行议论吧。



日本国地图(十九世纪中叶)

(按原图译制)



照原图译制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活动最大范围图

目 录

序	1
引 言	
——日本历史的发展和时代划分	1
一 原始社会的日本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1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1)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5) 原始公社和母系氏族制(8) 日本人种原型与日语原型的形成(10) 弥生式文化、农耕和金属器生产技术的传来(13) 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17) 阶级分化的萌芽(18)	
二 大王国家与部民	
——奴隶制和国家形成的特征	21
个体劳动的发达和氏族制度性质的改变(21) 邪马台国和日本国家形成的特征(25) 倭国的五王和大王国家(29) 大王政权的结构和氏族制度(34) 屯田、田庄和部民制(37)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40)	
三 大化革新	
——由模拟的氏族制到“法制完备的国家”	44

远征朝鲜的失败和磐井之乱（44） 苏我氏的上台和统治人民方式的变化（46）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执政（49） 社会不稳的加剧和大化的政变（54） 大化革新与壬申之乱（58）

四 古代天皇制

——模仿唐朝和“现人神”62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62） 帝都、日本的领域和国号（66）
 没有市民的城市（69） 身分、家族和班田制（72）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是等外户（74） 公民的阶级性质和《律令》制的历史意义（77） 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81） 奈良文化的世界性和日本性（84）

五 庄园与农民

——《律令》体制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成立89
 群众的斗争和公地公民制与征兵制的瓦解（89） 奈良政府的动荡和迁都平安（93） 班田制的崩溃和庄园制的发展（97） 公领、庄园和名主（100） 农奴制的萌芽（103） 武士阶级的成立（105）

六 贵族政治及其文化

——从国家主义到贵族主义109
 将门和纯友之乱（109） 藤原氏的专制和丧失政权（110）
 源氏和平氏的登台与僧兵（114） 院政和保元、平治之乱（116） 平安文化的特征（一）——从国家主义走向贵族主义（120） 平安文化的特征（二）——由唐式转向国风（123） “国风”文化和“国民”文化（127） 平安文化的特征（三）——群众文化的萌芽（130）

七 武家的“草创天下”

- 六波罗政权和镰仓幕府……………135
平氏政权的今昔（135） 源平的战乱（137） 源赖朝创立幕府和与朝廷的关系（140） 北条氏取代源氏（144） 承久之乱（146） 镰仓幕府的独裁和《贞永式目》（149） 封建国家的成立（152）

八 封建社会初期的特征

- 农奴制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形成……………155
村庄的情景和各阶级（155） 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生产力的提高（158） 市、町、座（162） 日宋贸易和倭寇（165） 衰败的公家和繁荣的武家文化的对照（166） 民族的新佛教和神社信仰（170） 美术和工艺上的创造（175）

九 镰仓幕府的灭亡

- 在乡武士和农民的抬头、蒙古的来犯……………177
不稳定的镰仓幕府（177） 击退蒙古的来犯（179） 胜利的条件和战争的影响（182） 农奴制的发展和惣领制的瓦解（184） 在乡领主和“恶党”（187） 镰仓幕府的灭亡（189）

十 古代奴隶制遗制的清算

- “惣”的发展和室町幕府的矛盾……………194
后醍醐天皇的亲政及其失败（194） 足利尊氏开设幕府和南北朝的对抗（197） 急进武士的天皇观和足利尊氏的态度（199） 在乡武士、守护大名和幕府（202） 幕府机

构的调整和南朝的灭亡(205) 足利义满想当太上天皇,
却成为日本国王(207) 幕府对人民的掠夺(209)
“惣”的发展和土一揆(211)

十一 下剋上和战国的战乱

——土一揆、国一揆和战国大名……………216
应仁、文明之乱和下剋上(216) 山城的国一揆和加贺的
一向一揆(220) 庄园制的肃清和皇室的衰落(224)
战国大名的割据(227) 战国大名的特征(231)

十二 自由城市的萌芽

——生产、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城市……………234
自耕农的成长和农、渔业的发达(234) 采矿冶金和手工
业的发达(237) 商业城市的形成(240) 勘合贸易和
倭寇(243) 日本本土和琉球王国有着唇齿的关系(245)
自由城市的萌芽(248) 堺市的盛衰(250)

十三 国民的生活力与文化

——文化的大众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253
公家完全失掉创造力(253) 大众化的室町时代文化
(256) 大众文艺的兴起(259) 在地方上产生了文化创
造力(261) 奠定了近代以前日本生活方式的基础(264)
枪支的传入和日本人出现在东南亚(266) 基督教的传入
和封建领主(269)

十四 秩序和权力的重新确立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全国……………274
织田信长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274) 织田信长的三大

敌人(276) 建设安土城和织田信长的复灭(279) 丰臣秀吉统治全国(282) 封建秩序的重新确立和天皇权威的恢复(286) 太阁检地,村落制,没收武器,身分制(289) 商业和贸易的统制(292) 镇压“不受不施派”和天主教(293) 侵略朝鲜的失败(296) 德川家康推翻丰臣政权而成立幕府(298)

十五 士、农、工、商、秽多、非人

——严密的封建统治网……………300
德川家康消灭了丰臣氏(300) 统治大名、朝廷、寺社,建设江户,德川家康的神格化(302) 幕府的经济和军事力量(305) 大名和幕府的关系(307) 幕藩体制(310) “让其不死不活地进行征收”(314) 身分制和父权家长制统治着整个社会(318)

十六 锁国和封建制度

——对国民生命力的严密封锁……………322
贸易的繁盛(322) 海外殖民一万人,日本船横渡太平洋(325) 天主教和群众生活(328) 从禁教到锁国(330) 岛原、天草之乱(333) 锁国政策的完成(336) 锁国的巨害(339)

目 录

十七 百姓和町人势力的成长

——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343

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343)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45)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成长(348) 城下町的扩大和商业的发达(352) 全国性交通的发展(356) 市民的经济力量的成长及其社会觉悟(359) 农民阶层的新分化(362) 农民斗争的成长(365) 商人、商业和封建剥削的结合(367) 没有自治的城市和商人的生活方式(370)

十八 市民文化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独创374

市民成为创造文化的主力军(374) 戏剧、音乐、美术也转向市民方面(376) 文化脱离宗教而独立和儒教的渗透(379) 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的萌芽(382) 批判的精神和历史、古典的研究(387) 日本博物学、农学、历学、数学、医学的出现(390) 民族文化的出现(394) 文化的两个方向(396)

十九 封建制度矛盾的激化

- 享保、天明时期的政治和社会399
- “文治政治”——官僚制的萌芽（399） 矛盾的深刻化（402） 享保的改革（一）——官僚制的扩充和思想统制（405） 享保的改革（二）——剥削和统治农民的新方法（408） 统制町人和商业，享保改革的意义（413） 严重饥馑、溺婴和全藩性的农民斗争（415） 町人的捣毁活动和农民起义的结合（418） 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420） 变革体制的运动的征兆——宝历·明和事件（422）

二十 变革幕藩体制的诸因素的发展

- 革命和改革的预言、近代的前兆424
- 田沼意次的政治和宽政的改革（424） 工场手工业的发生（427） 国民市场的萌芽和走私贸易（429） 艺术和学术停滞和新的风气（432） 国学和兰学（435） “西力东渐”和勘探千岛、库页岛（439） 林子平、本田利明、佐藤信渊的绝对主义的变革思想（441） 坚决驱逐令（444） 大盐的暴动和改造社会的起义（446） 蛮社之狱和兰学的衰萎（450） 天保的改革（452）

二十一 开国

- 封建制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456
-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对立（456） 资本主义征服世界和日本的地位（458） 用大炮强制签订的亲善条约（460） 幕府独裁的破产（463） 签订通商条约和安政大狱（466）

开港、贸易的影响(468) 封建制的危机和民族危机(470)
尊王攘夷(474) 从攘夷到倒幕(478)

二十二 打倒幕府

——脱离危机482

“禁门之变”和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482) 倒幕
派和民众(486) 打倒幕府的势力的统一和英、法两
国(489) 庆应的大起义、捣毁暴动和打倒幕府(492)
王政复古的政变(495) 开放江户和幕府的灭亡(498)
席卷全国的内战(501) 内战和群众挽救了民族危
机(502) 亚洲民族团结斗争的萌芽(505)

二十三 明治维新(一)

——革命和反革命507

五条誓文和五张告示(507) 对人民的利用和压迫(509)
奉还版籍——大名脱离领地(510) 中央集权的经济
基础的成长(512) 民众的反封建斗争和士族的反
抗(514) 废藩置县(517) 中央集权官僚制和
“四民平等”(518) 近代天皇制和绝对君主制(520)
明治政权的目标(522) 征兵制度和常备军的建立(525)
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和义务教育制度(528) “一新”、
明治维新(530)

二十四 明治维新(二)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533

收回民族的权利(533) 小笠原、千岛、库页岛的归

属问题 (535)	琉球的归属问题 (538)	征韩论
和日清关系 (540)	征韩论争的意义 (541)	侵
略台湾和设置冲绳县 (544)	强迫签订日韩友好条	
规 (545)	从属欧美和军国主义 (546)	官僚独
裁和整理俸禄 (547)	改革地税 (550)	扶植资本
主义工业 (555)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557)	

二十五 自由民权的斗争

——民主革命和东亚团结的联合561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和社会各阶级 (561)	民选议院
论 (563)	从儒教的“革命”理论到新的民权理论 (565)
政治性报纸和革命权的思想 (567)	伊势暴动和西南
战争 (569)	近卫炮兵的叛乱 (572)
国会促成	同盟 (574)
自由党与改进党的成立 (576)	民权
运动的革命化 (579)	革命思想和有关主权问题的论
战 (582)	亚洲联合的思想和世界和平主义 (584)

二十六 民权运动的挫折

——起义·统一战线·失败 589

自由、改进两党的对立 (589)	通货紧缩政策和中小
农民的没落 (592)	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和自由党解
散 (594)	秩父事件和饭田事件 (597)
各起义事	件的性质和意义 (600)
民权运动的衰退和朝鲜“改	革”运动 (601)
皇室、华族、内阁、教育的革新 (605)	
反对井上外相修改条约的斗争 (609)	民权运动的最后
后光辉 (612)	

二十七 天皇制的完成

——古代和近代的结合及其矛盾617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公布（617） 军队、警察、地方
制度（621） 教育敕语和学术、信仰的自由（624）
家长制家族制度（627） 天皇制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629） 天皇制和资本主义（632） 劳动者的惨状
（634） 天皇制的完成（636）

目 录

二十八 初期的议会和政党

- 从民权到国权…………… (643)
- 颁布宪法和各民权派 (643) 国权主义的抬头 (646)
- 大隈外相的修改条约案 (649) 国权主义的胜利 (651)
- 第一次大选和《集会及政治结社法》 (654) 首届议会
与“民党”联合 (657) “冷血动物的陈列馆”和极力干涉
选举 (660) 贫民和农民问题的产生 (661) “社会
党”的幻影 (664) 第四届议会和政党的屈服 (666)

二十九 修改条约和日清甲午战争

- 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别国的国家发展…………… (668)
- “主权线”和“利益线” (668) “东洋危机”论和“人
口过剩”论 (671) 对华战争的准备和“硬六派”(674)
- 国民运动威胁政府 (676) 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和日英条
约的谈判 (678) 明治政府的危机和朝鲜的农民战
争 (680) 日清开战 (683) 对中国开战和对英修
改条约 (685) 战争的发展和下关议和 (688) 从被
压迫国向压迫别国的国家发展 (692)

三十 资本主义的发展

- 官僚、资本家、地主、群众…………… (697)
-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697) 此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的特
征 (701)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 (706) 资本主

- 义和寄生地主制的结合 (708) 工人运动的兴起(711)
 农民斗争和佃农协会 (713) 社会民主党的意义(715)
 资产阶级介入政治活动(718) 官僚独裁的加强和军部大
 臣现役武官制(720) 天皇制与地主、资本家的同盟(722)

三十一 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

- 日俄战争和吞并朝鲜…………… (725)

- 日本在朝鲜的暴行和日俄对立 (725) 列强瓜分中国的
 竞争 (728) 日本资本主义与朝鲜和中国 (730)
 出兵镇压义和团与日英同盟 (732) 日俄开战 (735)
 日俄战争的性质(737) 战局的发展和政府、国民(739)
 日俄媾和与解放亚洲问题 (743) 焚烧捣毁全东京的警
 察机构 (745) 吞并朝鲜 (748) 日本帝国主义的
 形成及其特征 (751)

三十二 日俄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

- 帝国主义日本的政治基本形态…………… (756)

- 围绕中国问题，日本与美英的对立 (756) 军部的形
 成 (759) 军部、统治阶级和中国的辛亥革命 (762)
 工潮发展为暴动，农民的状况与斗争 (765) 社会主义
 的成长与溃灭 (767) 友爱会 (770) 中产阶级的
 成长和民主改良主义(771) 陆军扼杀西园寺内阁(775)
 大正政变 (777) 从西门子事件到大隈内阁 (791)

三十三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日本…………… (784)

- “大正新时代的天祐”、“与牛比赛的青蛙” (784) 日本
 帝国主义的困窘 (787) 参加世界大战和对华二十一条
 的要求 (789) 第二次策谋“满蒙独立” (791) 从

大隈内阁到寺内内阁 (792) 空前的经济繁荣、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794) 寄生地主制的顶点和农业以及农村的变化 (797) 俄国革命、大战结束、凡尔赛条约 (799) 列强干涉俄国革命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802)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806)

三十四 民本主义、米骚动、原内阁

——趋向拿破仑主义…………… (808)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市民文化 (808) 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811) 米骚动的爆发 (816) 米骚动的性质 (819) 白虹贯日 (821) 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建立共产党 (823) 普选运动和原内阁 (828) 趋向拿破仑主义 (830)

三十五 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四大矛盾的展开…………… (835)

帝国主义的四大矛盾 (835) 三·一起义和五·四运动 (836) 华盛顿会议和两种正面战略 (839) 民本主义的苦闷 (840) 关东大震灾时残杀朝鲜人 (843) 护宪三派内阁和民本主义 (845) 改革贵族院的问题 (847) 裁减陆军和军部的企图 (849) 无产政党的结成和战线的分裂 (852) 中国革命和币原外交 (854) 金融危机和田中内阁 (858) 干涉中国革命、炸死张作霖 (859) 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862) 滨口内阁和经济危机 (865) 军部的反击 (868)

三十六 侵略中国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一)…………… (870)

制造出来的“满蒙危机” (870) “九·一八事变”和

- 政府、政党 (873) 国民的动向 (876) 从五·一五
到二·二六 (879) 太平洋战争的最初设想 (882)
日、德、意轴心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884) 对军部的
最大限度的抵抗 (887)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90)
日中的全面战争 (892)

三十七 太平洋战争

-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二) (896)
- 欧洲大战和日、德、意军事同盟 (896) 铺建太平洋战
争的轨道 (899) 日美开战 (903) 太平洋战争的
性质 (906) 日德意轴心的失败 (908) 大日本帝
国的崩溃 (912)

三十八 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和世界

- 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917)
- 占领的结构和美国的占领政策 (917) 改革的指令和国
民的政治觉悟 (920) 民主势力未能统一 (923) 民主
力量冲破占领军的限制 (926) 改革期的结束 (929)
消灭古代的、封建的因素 (933) 制定新宪法的力量 (935)
农民是农地改革的主力 (939) 垄断资本的称霸和附庸
美国 (940) 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942) 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基本潮流 (945)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
变 (948) 片面媾和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950)
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 (953)

结束语

- 日本历史的总结和展望 (956)
- 年 表 (966)

一 原始社会的日本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在的日本列岛这个地方生活的呢？这大概可能和亚洲人类的历史一样，是从古老的时代就开始的。

目前已证实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是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人头骨，学名为南方古猿（*Zinianthropus boisei* 亦称东非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据推测可能是在一百七十五万年前。迄今为止，在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遗骨，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通称北京人）和在爪哇东部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又称直立猿人），他们都生活在地质学上洪积

世^①初期，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

现在，我们日本的国土，是在亚洲大陆东岸的海里，从东北至西南，由细长的连接为弓形的群岛所组成。这个国土在洪积世，一部分和大陆连接，现在的日本海恰如内海一样。已经证实，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这些人类所生活的地区上的动物，在现在的日本列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伙也许到过日本这个地方，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举出确实的证据。后来经过二十多万年，就是从距今约为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前这样长的地质学上第三冰河期^②的地层里，在日本列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造和使用这些石器，就说明这里确有人类生活过。

① 洪积世：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即从新生代的后半期直到现在，也就是从四十万、五十万年前直到现在）分为洪积世和冲积世两个时期。洪积世也叫大冰河期，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冰河所覆没的寒冷时期，人类发生后，有过四次。最后一次以后，进入冲积世。——译者

② 第三冰河期：从有人类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冰河期，距今约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间发生的冰河期称为第三冰河期，处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前半时期，已有猿人。——译者

南方古猿不用说，就连中国猿人和在它之后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在骨骼上都和现在的人类有显著的不同。现在人类的直接祖先——真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开始生活于地球的各地，是在洪积世的末期、距今三万到五万年前的事。在日本列岛上，从洪积世末期的地层里，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各地，都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旧石器）。当时北海道和本州已经由现在的津轻海峡所割开，但本州和四国，本州和九州，仍是互相连接的陆地，而且估计它又和现在的朝鲜海峡，或中国南海的什么地方，通过路桥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这些地方从大陆来到现在的日本的。

在日本能够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这是1949年在群馬县岩宿地方发现打制石器以后的事。这种文化和欧洲、亚洲大陆各地同样地质年代的文化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人类文化原本是一体的。这种原始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乃是由人类从一般动物的自然状态仅仅向前迈出了半步或一步，也就是由生产力还完全未发达的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经过多少万年以

后，到现在，人类已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并以这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方面使整个地球的每个民族都发展了高度的民族文化，同时，已经具备了对这种文化加以综合，作为统一的人类文化的前景。我们日本的历史不过也是这种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人们，还没有进入定居生活，他们辗转各地，寻求食物。我们还未发现当时已有弓箭的证据。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使用陶器。

当地球的历史从洪积世进入冲积世^①的时候，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结束，出现了表面磨制石器这样更前进的工具——新石器的文化，同时开始制造陶器。不用说，陶器是烘烤粘土制成的。人们到这时已开始能使自然物发生化学变化，制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物品。这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力量的一大进步。人们能够用陶器存放水和食物，也

^① 冲积世：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后半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称为冲积世。气候、水陆的分布以及动植物的情况，大体上已和现在相同。——译者

可用它烧水煮东西，或者使它成为祭器和美丽的艺术品。由于这一发明，原始人的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得多了。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

日本列岛上，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在冲积世初期已开始制造、使用新石器和陶器了。与此同时，在新石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特点。当时日本这地方已经和大陆割离开来，而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与大陆往来，这对当时的日本列岛和它周围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一万多年，几乎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在距今约八千年前，四国和九州成了离开本州的海岛。后来，日本面向太平洋方面的海岸线向海移动，从五千到六千年前开始，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动植物的状态就基本上和现在相同了。

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社会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由于陶器上具有绳纹或者类似绳纹的花

纹，而称之为绳纹式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为绳纹文化。这一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文化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遗迹遗物遍及日本各地（从北海道直到冲绳岛）。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人们虽然未能脱离渔猎采集经济生活，也未能发明金属器具，但在这期间，由于人们不懈地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文化也逐步地提高了。

根据陶器的形状和花纹的变化以及出土情况来看，绳纹时代大体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等五个时期。

早期，人们已有了弓箭，可以看出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前期的末期，已能够乘独木船出海捕鱼。他们居住在竖穴，这种竖穴是从地面向下挖掘六至七平方米的方形或者圆形、中间立柱、四面和房顶用草木围葺的。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小，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短。但进入前期，居住的竖穴就大量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成为小部落。由于发现了长期使用过的火炉的遗迹等等，可以看出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在中期，部落也发展到距离海岸相当远的腹地。例如在长野县八岳山麓也发现了很多中期的居住遗址。当时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有名的例证是石镞（以长野县和田峠附近出产的黑曜石为原料制成的）的分布。这种石镞，不仅在关东^①和信越^②等地，而且东至福岛县，西至爱知县和福井县，甚至越过大海而分布到佐渡岛。

从后期到晚期，人们从高地进入平原地带，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居住遗址和贝冢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等劳动工具来看，品种繁多，数量也增加了。这表示劳动生产的发达和多种多样了。同时，东日本与西日本，在文化的形态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

绳纹文化在陶器的形状和花纹等方面，东日本和西日本原来就有差异，尽管如此，直到后期

① 关东：日本古代指缝坂关（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之地。后指箱根关（神奈川县足柄下郡）以东之地，包括今东京东京都以及神奈川、埼玉、群马、栃木、茨城、千叶等六县。

——译者

② 信越：信指信浓，今长野县；越为越前、越中、越后的总称，今福井、富山、新潟等县。——译者

仍无本质上的不同，各方面都是向同一方向前进的。但到晚期，东日本仍按过去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钓具之类的骨角器极为精巧，陶器的花纹，以青森县龟冈出土的龟冈式陶器为典型，发展得极为复杂。与此相反，西日本方面从绳纹文化遗迹出土的文物却极少变化，陶器甚至比以前更为简素；但另一方面，却发现了好象用以掘土的大型打制石斧等具有新性质的强力的劳动工具。从这些石器看来，在西日本，人们似乎已在探索新的生产方法，即走向农业的道路了。

原始公社和母系氏族制

绳纹文化虽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但终于未能实现农耕和畜牧。绳纹时代人们饲养的唯一的家畜是狗。狗这种动物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人类最早的伙伴和助手。在绳纹文化中期以后的遗迹中，发现了可以磨碎谷物的石臼和上述大型的打制石斧等物，有人据此推断，当时已开始有了种植稗子或者芋头之类的原始农业，但这个问题还不能确定。当时即使有了这样的农业，也不是

主要的，人们的生活主要仍然是依靠渔猎和采集。

在这种生产力的阶段，能够劳动的人们全都参加劳动，才能够勉强地维持着社会生活。所以在这里，不存在产生自己不劳动而剥削别人劳动的富者和被人剥削的贫者的差别的条件。看一下绳纹时代各个时期的居住遗址，它们都是同样的简陋，没有什么大小优劣的区别。人们死了，都葬在共同墓地。没有一个人的坟墓会比别人的更美观。也没有同其他死者不同的特殊随葬品。这就表明，在这个社会里没有贵贱贫富的分别。在这种社会里，对于狩猎、捕鱼、建造住处这样主要的劳动，由个人单独进行，是搞不了的，大概都要依靠社会全体成员进行集体劳动。因此弓箭、船只、鱼网等主要劳动工具一定是整个社会所共有。这是因为如果这些工具属于个人私有，那就会产生占有劳动工具的富者和不占有工具只靠劳动的贫者的差别，但是现在还没有表示这种贫富差别的任何证据。

生产劳动是集体进行，生产工具是共同所有，换句话说，原始公社制这种集体，大概是由

母系血缘联系的母系制氏族公社。这一点虽然还没有可资直接证明的遗物，但从当时的生产力和原始群居的规模以及后来母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可以这样断定的。而且在中期和后期绳纹陶器中，用以表现人类的陶土人形——陶俑，塑造的多半是女性形象。陶俑大概是和相信万物有灵魂（这种灵魂可以左右人类命运）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相联系的。塑造女性的形象，是因为认为女性生男育女，是生命的本源，所以感觉她有神妙的力量，或者可能表示对母祖的崇拜。

日本人种原型与日语原型的形成

由于下述两点，可以说绳纹时代是日本历史的开端。第一，我认为日本人种的原型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继绳纹文化之后，从朝鲜方面输入了崭新的高度文化，即后文叙述的弥生式陶器的文化。这种文化立即占居统治地位。当时虽然渡来了若干新的人种，但这种人并不是消灭日本绳纹时代的人，也未因混血而消灭绳纹时代人种的

特点，相反地，而是外来的人种被绳纹时代的人所同化，这是人类学家的共同说法。如果是这样，就应该说绳纹时代的人就成为直到现在的日本人种的原型了。

那么，绳纹时代人和旧石器时代人在人种上是否是一脉相传的？或者，旧石器时代人由于什么缘故而消灭，以后，具有绳纹文化的人种进来，而成为日本列岛的主人了呢？或者，是否是旧石器时代人和外来的人共存、混血，而成为新的人种了呢？对此，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尚未作出任何结论。（但是，使我们可以推断旧新两种石器文化存在着连续性的这种考古学资料，现在发现得逐渐多起来了。）文化的连续性虽然不能说就是人种的连续性，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文化的连续性能够肯定，那么就有可能说，创造这种在发展上具有连续性的文化的人种也是同一的。

不管旧石器时代人和绳纹时代人是同一人种，还是各不相同的人种，但由于绳纹时代人自从日本列岛和大陆分离以后的几千年中几乎不得不进行孤立的生活，所以他们在这中间适应了日本列岛的各种自然条件，因而产生了人种上的和

文化上具有独特的特征。因此，尽管我们很难断定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住在大陆方面，还是东南亚方面，但可以认为，由于绳纹时代的人在几千年直到一万年期间都在同大陆或东南亚迥然不同的自然的和文化的条件下进行生活，在这中间，就形成了与其祖先不同的人种，而成为现代日本人的原型。

第二，我认为日语的核心，形成于绳纹时代。根据语言年代学估计，现在日本本州等地的语言和冲绳的语言出于共同的祖语，到公元前后分离开来，分别有了独自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两种语言共同的核心部分的日本祖语，必须说已存在于绳纹时代。至于这种日本祖语属于哪种语言系统，则有种种的假设，还不能得出定论。在日本周围的各民族语言中，能够找出可能和日语有亲族关系的，只有朝鲜语。因此，假定日、朝两种语言是亲族，那么用言语年代学来推断，两种语言从其共通的祖语分离开来的时期，从现在起至少是三千五百年乃至五千年以前，即绳纹时代中期以前。

在绳纹时代，日本列岛，就是这样形成了现

在日本人固有的生活地区，并在这里成长了不同于周围各种族的独自的人种和语言，即日本人和日语的原型，这种人通过野蛮阶段，开辟了走向文明阶段的道路。日本人的历史正是从此开始的。

弥生式文化、农耕和金属器 生产技术的传来

孤立的日本列岛社会，它的进步当然是十分缓慢的。在这期间，世界先进地区已经进入农耕、畜牧和生产金属器具的阶段，也发明了文字。在一个社会开始使用文字，这是该社会完全摆脱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决定性的标志。

农业，在世界史上以西南亚在地质学上的冲积世初叶能够栽培小麦和大麦为最早。接着，在埃及尼罗河下中游流域也开始了农业。在这些地方进行了人类最早的青铜器的制造和文字的发明。公元前三千年乃至二千年的时候，印度的印度河和中国黄河流域也开始了农业生产和家畜饲

养。公元前十五世纪兴起的中国商朝时代，青铜器已非常发达，文字也创造出来了。而到后来的周朝末叶，即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已经开始生产铁器。这时候在南欧的爱琴海周围古代文明之花也盛开了。中国孔子、印度释迦牟尼都在这一时期进行活动。

从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更加迅速发展，这给予周围各地区以有力的影响。公元前三世纪末叶，汉帝国兴起时，拥有农耕和铁器的中国文明传到了朝鲜半岛，再从那里过海进入日本。几千年来朝鲜海峡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同大陆文明隔离开来，并难以航行，但到这个时期正相反，这个海峡成为联结两国文明的通路。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前后，北九州沿海地区，从南朝鲜引进了在系统上不同于绳纹陶器而具有高于绳纹的技术，以制造陶器，水田农业和金属器的文化，这时也传到了日本。以最早发现这种陶器的地点弥生（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的名称称呼这种文化为弥生式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弥生文化）。弥生文化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已经通过山

阴^① 和山阳^②，传布到近畿地方；又从这里发展到伊势湾沿岸；到公元一世纪的后半叶，普及到关东地方；到公元三世纪，又过渡到更高的文化阶段，即考古学上的古坟时代前期。弥生文化并不是绳纹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的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如以前所述，并不是拥有这种文化的新种族大举渡来日本而取代绳纹文化的。

弥生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了水田农业。在其前期的农业，是用木镐或石镐耕种向阳的湿地，撒上种子，让其自然成长。在收获时，用石镰割下稻穗，再用木制的杵臼来脱粒。到中期，即公元前后，在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和大和平原，农业生产已占居主要地位，这些地方已开始了灌溉。

在中期之末和后期开始时的静冈县登吕遗址，把耕地整齐地划分成四百坪^③到六百坪，水

① 山阴：全称为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等八国，今属日本的中国地方日本海沿岸地区，包括京都府和兵库、鸟取、岛根等县。——译者

② 山阳：全称为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等八国，今属兵库、冈山、广岛、山口等县。——译者

③ 坪：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为3.305平方公尺。——译者

渠围绕畦地，让所有田地都能灌溉。水渠分为干渠和分渠，纵横贯通，还有用杂草作为肥料的痕迹。灌溉一开始，就增加了与靠天然雨水耕种无法比拟的大面积可耕地，收获量也增加并稳定了。人们的生活提高很快，人口增加了，村落也发展了。如奈良县的唐古遗迹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户，东京久我原遗迹已经成为集住到二百户这样大的村落。居住仍为竖穴，但有了在地面上垫得很高地基的用以储存粮食的仓库。

种田的工具是石镐、石镰、木镐和木制杵臼之类的石器与木器，但从弥生文化的初期似乎已有了为制造木器所用的刃器，如铁制的刀、斧、枪刨^①等。而这些工具到弥生文化中期就相当多起来。但是，铁制农具似乎不多。这些铁器，不能认为是在日本列岛生产的，但最迟到弥生文化的后期大概已开始制造了。

① 枪刨：刨的一种，无木框，如长矛的尖端，用以削木。

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

弥生文化有铁器，也有青铜器。一般说来，在先进社会，金属器是按阶段地从铜器向青铜器，然后再向铁器发展的。到使用铁器阶段，石器就变为次要的工具。但日本却是青铜器与铁器并用，而石器仍占居重要地位。日本这种新的和旧的文化，未按阶段发展，而同时并存的多元性的特点，在这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后进社会在吸收先进社会已发展的先进文化时，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必然的吧。

最早的青铜器都是输入的剑、戟之类。这些东西并不是用作武器，而大部分是作为祭祀和典礼的用具。到弥生文化中期，人们销毁了这些输入的青铜器，而铸造成其他青铜器。从这种所谓日本国产的再生青铜器的品种分布状况来看，以现在的广岛和冈山二县为界，从此向西的北九州文化圈和向东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①文化圈，

^① 近畿：日本古代称皇城一带地方为近畿，后指京都一带地方，也称畿内。这里的“近畿”是京都、大阪、滋贺、兵库、奈良、和歌山、三重等二府五县的总称。——译者

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把输入的剑戟等销毁以后，改制成大型的同类器物；后者把剑戟之类销毁之后，制造成一种叫做铜铎的器具，它的形状象压扁了的后代寺院的梵钟。这似乎也用为祭器。这种文化也传布到关东地方，在铸造技术方面，铜铎是很高级的，在它表面上，有的也用幼稚的线条雕刻着狩猎、农业和缫丝等生产劳动的场面。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近畿地方不仅在青铜器技术方面，在农耕方面也是比北九州先进的。

阶级分化的萌芽

绳纹文化的进展是以千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但弥生时代文化进步之快，就是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也感到不妥当了。这样，列岛社会前进步伐快起来了。以前储存果品用陶器，现在粮谷储存在比人们住房还要大的漂亮的粮仓里。铁器或用铁制工具制造的木器逐渐代替了石器。陶器仍然是重要的生活用具，但已经能够按照不同用途大批地制造出瓮、钵、碗、碟、高脚盘子、甑以及储存

东西用的大缸等多种多样的陶器了。而且在制造时不是用手,而是使用陶轮制坯。在氏族公社中,有了专门生产陶器的人。铁器和木器的生产也专门化了。这样,氏族内部的分工发达了,这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力发达的同时,在这个社会里开始有了贫富阶级和贵贱身分的分化。在原始氏族公社里出现了族长,这就开始了人统治人,人剥削人,即开始有了由统治剥削阶级和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组成的政治社会——国家。这种国家怎样进行活动的,将在下章叙述。公元一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书《汉书》写道:“夫乐浪^①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对日本列岛社会最早的文献记载。这里所说的“百余国”,大约是指北九州族长们统治的社会集团。他们派使者同汉朝设在朝鲜乐浪郡的官衙进行往来,力求输入新文化。到公元57年,倭“奴国”的使者不仅到乐浪,甚至到达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中国首都洛阳(后文叙述),这种长途旅行的困难

① 乐浪:北朝鲜。——译者

是出乎想象之外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地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

二 大王国家与部民

——奴隶制和国家形成的特征

个体劳动的发达和 氏族制度性质的改变

当农业发展成为主要社会生产形态时，土地不论作为人们定居的场所，还是作为农耕条件，就成了具有完全不同于渔猎采集经济阶段意义的“财产”了。土地原来也是属于氏族公社共有，这是因为人们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叫私有，而且对于水田农业具有决定作用的最关重要的灌溉排水事业，只有依靠氏族全体成员或者具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的联合——部族的共同劳动才能完成，所以还不会想到个人占有耕地，独自经营，收获的稻谷也储存在氏族公共有的仓库里。

但是，划分成一块一块的水田，耕种可以不

依靠整个氏族成员，而用较少的人力来进行，这样耕种效率反而更高。生产状况发展到这样的时侯，在氏族中就开始出现了家族集团。这种集团并不象后来的家族那样是以一对夫妻及其子女为基础的对偶家庭，而是在家长统率下，包括家长的妻子和家长的弟兄（早期还包括姊妹）、伯叔父母以及他们子女在内的联合大家族。氏族的公有土地，就适当地分配给每个这样的家族集团耕种。而每一家族集团的分别耕种，加强了家族的结合和在氏族内部独立的倾向。另外有的家族则主要从事陶器、木器和铁器的手工业生产。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公共事务，例如制订整个氏族的生产计划、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各种业务适当地分配给氏族的每个成员、组织劳动生产、管理和分配产品等等事务，就日渐增多，日趋复杂，从而逐渐地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开始了氏族内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氏族的对外关系也趋向复杂。在此以前，很少有氏族之间的战争，现在氏族之间为了追求适于农耕的土地，不断地发生激烈争夺，这种争夺后来必然扩大为部族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战争指挥人员

的权威随之提高了。然而不论是为了农业，还是为了战争，都需要经常祭神求佑，这成了氏族公社和部族联盟最为重要最为神圣的事情，因此，司祭者的权威也提高了。这些管理业务的人、指挥军事的人和司祭者，最早是按照公社的习惯由选举产生的，但不久就几乎成为终身职业。这样一来，公社的指挥者就开始带有半族长即统治者的性质了。司祭者一般是由氏族的核心——母亲及其直系的女儿来担当；管理生产、分配和指挥军事的，一般是选举男性——因为不仅在战斗方面，就是在农耕灌溉的生产事业方面，当时男性已经起了主要的作用。

这种原始公社的首脑，产生在弥生文化的中期，这可以从《汉书》中的倭奴国中心地点的遗址福冈县须玖遗迹中加以证实。这里是公共墓地的遗迹，尸体是装在大瓮里埋葬的。其中还有特殊的坟墓，在大瓮埋葬后，还盖上大石块。随葬品有来自中国的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①一类物品，这是当时极为贵重的宝器。这和既不盖有

① 勾玉：日本古代用于装饰的月牙形玉器。——译者

大石块，也无随葬宝器的普通坟墓相比，可以断定埋葬的一定是生前在公社里也占有特殊地位的人。他（男尸体）之所以葬于公共墓地，是表示他还没有成为脱离集体的统治者。

氏族内部有了分工、家族独立和地位的不平等及各氏族为了追求土地而进行频繁的战争的结果，就产生了氏族之间的不平等，强大的氏族和部族开始对弱小的氏族、部族进行征服、统治和掠夺。一般说来，征服者让被征服者仍旧居住在原处，过着原来的氏族集团生活，而征收一定的贡物。有时候也把壮劳动力和美女作为奴隶带回到自己的氏族内部。这一类奴隶，原则上是氏族的公有财产，但也有的交给了立战功的指挥人员。这种奴隶就成为领取者的私有财产了。这样，就出现了人剥削人、人统治人的现象和私有财产。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前，即在生产力仍然处在凡是能够劳动的都得参加劳动，才能勉强维持氏族生活和再生产的阶段，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氏族只有把战败者杀掉或者流放远方，而不能使他们贡纳物品或把他们作为奴隶使用；因为当时想要剥削，也没有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可

以剥削的。但到后来农业已经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于是就产生了剥削。

氏族相互之间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发展，必然促进氏族内部的不平等。氏族的首脑变成了拥有私有奴隶、统治氏族的族长，其他负责集体事务的人员和军事指挥者也成了在族长之下统治阶级的成员，普通的氏族成员和奴隶就成了被统治阶级。不过这种集体还未完全分化为家族，仍然维持着氏族的形式，族长就被称为“氏上”，在他统治下的人们是“氏人”。而这个由族长统治的集团对其它氏族的集团则进行了征服和剥削。

邪马台国和日本国家形成的特征

随着族长对氏人的权力、权威的增长和各氏族、各部族集团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发展及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加深和扩大了统治者、剥削者的少数人和被统治者、被剥削者的多数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对立。而且开始把族长们用以统治氏族成员和被征服集团的权力机构组成国家。北九州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已如前述《汉书》所

记载的倭奴百余国那样形成了许多的部落国家。其中强大的“倭奴”的“国王”已经具有向遥远的后汉王朝首都洛阳派出使臣的力量，接受了后汉皇帝交给的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这金印于江户时代，在现在的福冈县志贺岛发见）。这时国王的希望大概是想借助于臣属强大的中国皇帝，取得对自己权力的保障，而使自己的权力更加强吧。这些“国王”们出于扩张自己统治地盘的强烈要求，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在公元二世纪，发展到如中国史书所记“倭国大乱”那样的地步。经过这次战乱，到三世纪的前半叶，演变为中国史书《魏志》中记载的有名的邪马台国。

据《魏志倭人传》所记，邪马台国是统治二十八个倭国的大国，起先由男王统治，经过几年战乱之后，统治者协商，推举名叫卑弥呼的妇女为王。女王系独身，不抛头露面，常用“鬼道”来收笼人心。政务由其弟管理。女王死后，又要拥立男王，国内又陷于大乱。统治者们于是又进行商议，立卑弥呼的继承人，十三岁的姑娘壹与为王，内乱才平息下来。可见邪马台国是由各部

族长组成的联合政权，还没有确立男子世袭王权的制度，王位经常是由部族长协商决定的。在部族长们进行激烈争斗的时候，象卑弥呼以宗教的权威成为国家的统一者，这比起政治的军事的实力就更为有效。卑弥呼和壹与恐怕是出于组成这个国家各部族中的、担任司祭者的直系氏族本族的。女王可能既有司祭者的权威，同时还有母系氏族制时代母祖的权威。

但是，象母系氏族制社会那样，仅仅依靠母祖、司祭者的权威，已经不能稳定这个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民主平等的社会，而是由叫作王和“大人”（贵族）的人们对“下户”（平民）和奴隶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阶级社会了。为了进行剥削和统治，就必须建立和使用维护王权的军队和惩办反抗者的机构，就必须建立为维持这些非生产机构而设立的征税机关和市场的监督官等国家权力机构。因此，女王卑弥呼就必须任用其弟掌握权力机关，充当摄政。

公元239年，女王卑弥呼也向当时占有朝鲜的中国王朝——魏国的首都洛阳派遣使臣，并向魏

皇帝贡献奴隶和斑布（带有斑纹的麻布）。皇帝赐给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黄金、大刀、铜镜等物。而当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在今何处不明）交战时，邪马台国得到了魏国的政治援助。利用中国大帝国的势力保证自己的王权，以加强其对周围各族长的权势，这种思想在以后的倭王的统治中也有反映。这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

邪马台国究竟在日本什么地方？是北九州，还是近畿的大和？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有争论。我认为大和说最能合理地说明一世纪到四世纪日本列岛社会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即使认为邪马台国曾在北九州，但到三世纪中叶，大和地方已经成立了邪马台国那样的部族联合国家，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一政权，从三世纪后半叶起，到四世纪的前半期，不仅统治了北九州，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关东地方。在八世纪初的文献《古事记》^①

^① 《古事记》：三卷，稗田阿礼奉天武天皇命口述，太安万侶奉元明天皇诏编写，成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本书目的在于阐明天皇世系，也包括大量神话故事，是日本最早的历史书，也是最早的文学书。——译者

和《日本书纪》^①里面，记有倭健命（日本武尊）西征北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的虾夷的说法，这恐怕是用个人的英雄行为来说明大和政权发展过程的。到三世纪末叶，大和及其附近已经有了宏大的古坟，这说明当地的王——族长们的权威和权力是强大的。

大和政权征服各地氏族、部族时，曾把这些氏族、部族部分成员当做奴隶而带回大和。但一般是不破坏被征服的集团，使旧有的氏族组织原封不动，形成一个由该族长和征服者用血缘关系结成的一种制度，以统治他们，从他们身上征收贡物，并令其成员参加必要的劳役，或充当士兵。

倭国的五王和大王国家

公元四世纪中叶，大和政权势力伸张到南朝

^① 《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当时执笔者多半留学长安、洛阳，并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全书是用汉文写的，并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译者

鲜，使任那^①地方成为殖民地。大和政权以此为根据地，与朝鲜西南部新兴的百济国结成同盟，以对抗统治东侧的新罗国和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国。当时中国汉族因受北方匈奴族的压迫，整个国土陷于混乱，所以他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丧失了。大和政权乃乘机向南朝鲜伸张势力。到公元399年，大和政权的军队到达现在的平壤附近，但为高句丽军所击败。

在此以后，大和政权在朝鲜的势力虽有时前进，有时衰退，但历代的日本国王，仍按照公元一世纪中叶倭国王历来的传统，都和中国皇帝建立君臣关系，企图取得中国皇帝的保证，许其作为南朝鲜国王，行使统治权。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421年，倭王“赞”遣使赴中国南朝的宋国^②，接受皇帝给予某种称号（具体称号不明）。继之于430年，倭王“珍”自己用“使持节^③都

① 任那：今朝鲜南部。——译者

② 南朝的宋国：南北朝时刘裕在今南京所建的朝代，公元420—479年。——译者

③ 使持节：六朝宋国守边军政官名。这样长的称号，意思是倭王乃是作为宋国的使持节，掌有倭及其他五国军事权，负有稳定宋国东部任务的大将军。

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①、慕韩^②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名字，请宋帝承认这个称号。但宋帝只许称“安东将军倭国王”，不许可具有对百济等六国军事都督的称号，也不承认“大将军”这一称呼。下一代的王“济”和再下一代的王“兴”，也希望得到和王“珍”同样的称号（都督的国名略有变动），也未能如愿。到再下一代的王“武”才由宋帝许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③、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宋国因和新罗对立，遂承认他把新罗国包括在倭王所辖之内，但对五代倭王，都未允许他们将实际已完全被倭王视为属国的百济包括进去。

五代倭王，据估计相当于《日本书纪》的仁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从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五王的时代是大和政权势力在朝鲜半岛达到全盛的时期。在此期

① 秦韩：朝鲜东南部部族国家的总称。——译者

② 慕韩：即马韩，古代朝鲜三韩之一，又是种族名。今京畿道南部到忠清南北道和全罗南北道大片土地。——译者

③ 加罗：今朝鲜庆尚道南部洛东江口一带。——译者

间，曾把大批的技术者和劳动者作为奴隶从朝鲜带回日本，并对南朝鲜的铁矿也进行了大规模地开采。因此，日本的冶铁、铁器、丝绸以及采矿、工业、养蚕、饲养家畜、农耕的技术与工具，都有了飞跃的进步。当然，与这些技术关系密切的算术知识也传到日本，而在倭王宫廷也一定有人（大概是渡来人）专为倭王草拟致中国皇帝的表文的。

公元五世纪中叶，在大和以外的族长阶层中也开始使用文字。例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有造于瑞齿别大王（反正天皇、倭王珍）时代的铭文。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可能是倭王赞）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向来日本的百济学者王仁学习过《论语》。这一记载是否确实，姑且不论，总之公元五世纪前半期日本贵族已经接受了百济出身的学者的汉字和儒学启蒙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公元五世纪，处在中国文化圈东端的日本社会，的确已经进到文明的阶段。而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国家，统治了日本列岛的主要部分，甚至发展到在国外具有殖民地的程度。而这种国王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所示，已被地

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如把这样发展的国家仍称为大和政权是不合适的，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国家有所区别，我们把倭国的五王以后的国家称为大王国家。这个国家象公元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那样，是大和各部族长的联合政权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而发展起来的，这时候的王位确立了男子世袭制度。大王已经不只是卑弥呼那样的宗教权威，而是掌握一切政治、军事、祭祀的最高权力者。

大王及其身边的诸王——大族长们的权势之盛，可以从五世纪最为盛行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前面是矩形，后面是圆形的古坟）清楚地看出。在此以前的古坟，是把棺材埋葬在自然丘陵的顶上的；这时则在平野，用人工积土造成小山，作为王者的坟墓。在现在堺市附近的一座据说是应仁或仁德天皇的古坟，长四百七十五米，高二十七米，前方宽达三百米，围有三道濠沟，从遥远的海上可以望见。前方后圆坟不仅在近畿地方，还分布在九州到奥羽地方^①的南部各地，

^① 奥羽地方：即东北地区，包括出羽和陆奥二地，今青森、岩手、山形、宫城、福岛、秋田等县。——译者

排列在古坟周围的埴轮（排成环状的陶器），有的是仿照武士和农民各种姿式的男女、动物、房屋、船舶、各种生活用具的形状所制的朴素的艺术品。而在古坟的随葬品中，除大量的铁制农业、手工业用具外，还有青铜镜、硬玉的勾玉、铁剑，即后世用作天皇皇位的标记的所谓“三种神器”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来自中国的；为了答谢进口品而向中国出口了“生口”，即做为奴隶的人民。三种神器也就是把日本人民做为奴隶卖给外国皇帝的代价。其中铜镜，有的可能是由大王分给地方的王——豪族，用为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标记。

大王政权的结构和氏族制度

大王（后来的天皇）完全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他的地位和权力并不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压倒大和的其他族长，使之臣服而取得的，他们和上述邪马台国王一样，因为是属于特定的血统的人（形成大和国家的各族长的本支人并为各部族的司祭者），而当了大王。大王的世

袭，是固定不变的，其他任何有力的族长，都不能取而代之。大王世袭这种制度对于沿用氏族和部族扩大联合来实现国家的形成和扩大的社会来说，大概是必然要采取的。但是，族长们对于在大王一家的同族中，立谁为大王，却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都希望拥立对自家有利的大王。因此，在《日本书纪》里充满了为了继承皇位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事件。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例是公元五世纪中叶允恭天皇（倭王济）死后的皇位争夺^①。

大王的政府——朝廷，最初是由势力比得上天皇的葛城、平群、三轮等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天皇亲信的最高执政者组成的，在他们的下面，

^① 当时穴穗皇子推翻皇太子轻而当上了天皇，（安康天皇，倭王兴）。安康天皇不久杀了叔父大草香皇子，夺了大草香的妻子中带姬做了自己的老婆。当时大草香的儿子眉轮王年仅七岁。三年后，眉轮王刺死了枕在中带姬大腿上睡觉的安康天皇。暗中指使少年这样干的，有和天皇一家同时强大起来的豪族葛城丹。安康之弟雄泊瀨皇子立即杀死了眉轮王和葛城丹及其同伙的皇族，还以出猎为名诱杀了与此事件毫无牵连的市边押磐皇子，又因御马皇子和与葛城丹势力不相上下的三轮君关系很近，于是也将其杀掉。就是这样，皇族里的男子无一活命，而他本人当了天皇。这就是雄略天皇（倭王武）。

由有势力的族长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奴隶和后文的部民）分担政务，他们在朝廷的地位和职务都是世袭的。大伴氏和物部氏分担军事，中臣氏和忌部氏分担祭祀，苏我氏分担财政。他们的职务都成为世袭的。这些职务，由于国事日趋复杂繁多，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结果是：到公元五世纪中叶，世袭地分担军事、祭祀、财政等的各氏，就比没有这样特定世袭职务的葛城氏等那样旧有的大豪族更为有势力了。势力较小的族长也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分任朝廷必需的各种物资的生产、管理以及其他业务，也成为世袭的职务。

这样，组成大王国家的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族长们，就由大王授予荣誉称号——臣、连、公、别、首、直等姓^①，分封他们为臣属大王的贵族。到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在这些姓的上面又出现了大臣、大连等姓。而在地方族长中，有的人也有了表示他是该地区统治者之意的国

^① 姓：也写作尸、骨等字。臣、连、宿弥、造等姓表示中央贵族；直、君、首等姓表示地方豪族；使主、忌寸、吉寸等姓表示渡来人的贵族。——译者

造、县主、稻置^①等称号，他们编入大王国家统治之下，同时，这些称号也具有类似上述姓氏职权的性质。这些中央和地方的贵族们，除姓以外，还有“氏”名，所以本书中称他们为氏姓贵族，称他们所统率的具有氏族制形态的集团为氏姓集团。

屯田、田庄和部民制

大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大王的直辖领地（屯田和屯仓）和部民制。

从朝鲜带回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迅速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平地突起的、壮观的前方后圆坟，显示了当时土木技术已空前提高。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朝廷驱使这些技术人员和氏人在摄津^②、河内^③与和泉^④进行了大规模的

① 国造、县主、稻置：都是日本古代地方官职名称。国造和县主是一郡或一国的统治者，国造的地位高于县主。稻置所辖的地区更小，地位也低于前二者。——译者

② 摄津：今大阪府和兵库县的一部分。——译者

③ 河内：今大阪府的一部分。——译者。

④ 和泉：今大阪府南部的一部分。——译者。

开垦，这就出现了屯田和屯仓。屯田和屯仓并不是大王个人或者王室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大王这一政权的土地。用现代的概念说，这些财产不是皇室所有，而是接近国家所有。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国家及其首脑——大王，是相互割离的（是混为一体的），我们只能认为国家是同王权一起而存在。这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特点。

屯田，一般是把当地居民——氏族集团编成田部，由朝廷发放农具和种子口粮等，使之耕种。有时也从远地移来人民，组成田部，有时也征集氏姓集团的氏人——平民，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屯田。

不仅在耕种屯田，而且在朝廷和氏姓贵族必需的手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也都建立了“部”的制度。这种“部”也就是朝廷把渡来人或者普通的日本技术人员编为专业的集团，给予土地，使之定居；他们一方面粮食自给，一方面世袭地从事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一切产品都归朝廷征用。这种集团都按照他们的专业给予名称，如制陶器的叫土师部，制铁器的叫锻冶部，作弓的叫弓削部，织锦的叫锦织部。这种部民之中，有的象土

师部那样由于原料产地的原故，而分散在各地。此外，凡属朝廷必需的各种生产业务，都编成部民制。如厨师的膳部，看守山林的山部，养猪的豚养部等等。

冠有这些业务名称的部，它的统率者名曰“伴造”。在渡来人的部民里，多半让其集团的长辈充任伴造，其他部民的伴造则由下级的氏姓贵族来充任，其职位也规定为世袭的。伴造和部民之间，同一部的部民相互之间，即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同样把他们看作是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集团，把伴造当做氏上，把部民做为氏人。

氏姓贵族们也保有叫做“田庄”的领地，把这种从事耕种的人们作为部民而隶属于贵族。这些部民，如大伴氏的部民和苏我氏的部民都冠以主家的氏名，而称为大伴部和苏我部。而大王及其一族把地方（特别是东国）^①的氏族集团作为自家的部民，冠以自家的名字，特地称之为名代和子代。名代是把大王及其一族的名字传之后世，子代是继承没有后嗣的大王的名字，以设立

^① 东国：指从京都以东的镰仓、江户等地方而言。——译者

这些名义为借口，实际是大王及王族在屯田和屯仓之外，还建立了自家的私有土地和部民。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虽然是复杂的，但我认为本质是一种奴隶制度。

第一，在田部之中，也有脱离原住地氏族集团，住进屯田的茅屋，由官家供给粮食和农具进行劳动的，这显然是奴隶。

第二，冠有专门业务名称的部民，用朝廷占有的原料和工具进行生产，产品一律归于朝廷，部民的劳动力和人身都为他们的主人——朝廷所占有，从这点来看，也和奴隶相同。只是他们由朝廷分给土地，进行耕种，以维持家族生活这点和典型的奴隶制有所不同。但分给他们的土地恰如分给牛马的饲料一样，目的不过是让他们粮食自给，让他们直到子孙后代一直把手工业生产延续下去而已。他们的手工劳动并不是对于分给土地的补偿——劳动地租。因此，这类部民在本质上也是奴隶。

第三种部民，也就象子代和名代那样，氏族集团在其原来居住的地方，整个集团变成部民，进行劳动。全部剩余劳动都被剥夺（这种人占部民人口的大多数，屯田的田部大部分也是这种部民），他们还在自己旧有的耕地上用自己的农具进行生产，维持家族生活。如果分析他们每个人和他们的主人——朝廷大王以及氏姓贵族的关系，是和农奴与主人的关系一模一样的。不过他们由于下列两点而迥然不同于农奴：第一，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氏族集团而独立生存，他们的整个生存仍受集团的约束；与此相反，农奴却分别成为独立的家族。第二，这种氏族集团作为整体而为主人所占有。他们不象奴婢那样单独地为主人所占有。他们这个集团并不是作为由主人分给土地以地租形式剥削其剩余劳动，而是他们的人身集体地为主人所有。所以他们原有的土地也变为主人所有，他们不过是单纯的占用者和耕种者而已。因此，这也是集体地被奴隶化了的。

如上所述，我认为从部民的任何情况看，也不能把他们看做是农奴，所以部民制是一种奴隶制度。到五至六世纪，估计这样的部民已占生产

人口的30%左右；主要作为家庭奴隶而被役使的奴（男奴隶）和婢（女奴隶）占生产人口的10%左右。其余60%，既不是部民，也不是奴婢，是氏姓集团和氏族集团的氏人。许多书中都称这种人为“自由民”；但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也不是自由民。他们受着叫做“氏上”的氏姓贵族的统治和剥削，或者通过国造等人而受朝廷的统治和剥削，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而且受国造等人统治的集团可由朝廷任意驱使为子代、名代或者屯田的田部等等，所以他们具有部民后备军或者部民的潜在力量的性质。

加之，在部民制度下，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只是由朝廷把各种生产，分配给所属的各各部民集团来进行，他们的剩余产品完全归朝廷所有，阻挠了生产群众之间自由的社会分工和产品的自由交换。因此，不仅部民集团，就连非部民的氏族集团也不能割断同朝廷的隶属，而其集团的成员完全分化为一个个的家族，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这样，既非部民也非奴婢的人口虽然占有生产群众的60%，但是决定（包括他们在内的）整

个社会面貌的，乃是集团奴隶化了的部民和身为奴隶的奴婢。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模拟氏族集团的奴隶制，以此为经济基础的大王国家在其本质上应该说是一种奴隶主的国家。最低限度，它不是农奴制的国家。在生产力处于连奴隶制都不能充分发展的阶段，是不可能从原始公社飞跃到比奴隶制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农奴制的。

三 大化革新

——由模拟的氏族制到“法制完备的国家”

远征朝鲜的失败和磐井之乱

死后还用壮观的前方后圆的坟墓威吓人民的大王国家，在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已经确立，同时也开始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局面。第一是在朝鲜的势力的衰退，第二是与此相关，国内各阶级和各种势力的矛盾加深了。

公元 476 年，高句丽占领了百济的首都，而把百济作为属国的大王政府不能挽救百济的危急。新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倭国不难对付，乃侵入倭国的根据地任那。任那的一些豪族也起来反抗倭国。百济也有百济的想法，企图用任那补偿它在北方因高句丽侵入而丢失的领土，向倭国（大王朝廷）提出割让任那的要求。大王朝廷最

后不得不把四个县割给百济（公元512年）。在六世纪，大王朝廷为了挽回势力，曾几次远征朝鲜，但均未成功。到公元562年，设在任那的日本府终于垮台。

从朝鲜的撤退，对大王国家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物质方面，大王以及中央贵族势力一贯是把从朝鲜获得先进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奴隶）作为有力的支柱，现在变得困难了。在政治方面，朝廷威望一落千丈。由于运过时衰，朝廷里对于朝鲜的对策也出现了积极派和消极派的对立。割让任那的四县给百济是大伴^①大连金村的政策，物部大连麿鹿火反对此事，把金村赶下台去，到公元527年，派出六万大军征伐新罗。

这种侵略战争有利于大王以及中央贵族，民众和地方豪族则只是苦于拉夫和负担军粮以及其他军需。他们对此不能长期忍受下去。《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死时（公元479年），恰好有一队远征新罗的军队路经吉备（冈山县西部），

^① 大伴：日本古代中央豪族之一，也拥有“大连”的称号。——译者

其中有五百名虾夷人^①士兵听到天皇死去，认为中央权力动摇，机不可失，乃进行叛乱。他们一面和镇压的军队作战；一面向东逃到丹波国浦挂港（今京都府与谢郡之地？），遭到覆灭。他们虽然覆没了，但由于他们受到仇恨远征的民众以及地方族长的支持，才能这样地顽强战斗吧。

在士兵叛乱事件发生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如前所述，曾经策谋进行过527年的大远征，但对中央抱有不满意的筑紫^②的国造磐井，取得北九州各豪族和民众的支持而发动了叛乱，阻挡了远征军。他们的势力很大，物部麁鹿火不得不亲自出马讨伐。磐井等对抗了一年三个月之久，终于失败。

苏我氏的上台和统治 人民方式的变化

朝廷平定磐井之乱，加强了对地方豪族的统

① 虾夷人：一说是挨奴人种，一说是日本人种，住于东国边境，由于社会情况比较落后，才被大和人看做是异族人。后一种说法有力，我也同意这后一种说法。

② 筑紫：日本上古指九州全境，后指北九州一带。——译者

治。后来在九州、山阳、近畿、东海^①等地建立了大量的屯田。在此影响下，以王族为首的中央大贵族在设立田庄和部民方面进行了更加剧烈的竞争。随着朝廷直辖领地的扩大，掌握财政机构的苏我氏势力有所增长。苏我氏在渡来人出身的行政事务官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中，颇为得势；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他就打算废除模拟的氏族制度，而转向采取新的官僚制作为统治人民的方式，这就引起了和保守派大伴氏以及物部氏的摩擦。

从五世纪末叶开始，近畿地方的先进地区，氏族公社中的家庭公社，即家长制家庭公社脱离氏族公社的趋势逐渐显著了。因此，对于朝廷以及贵族来说，继续沿用模拟氏族的办法来统治人民的陈旧体制，就有困难了，于是必须过渡到一种能够把每个大家族直接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的新的统治方式了。

由于刚刚脱离氏族公社的人民的反抗与斗争，这种过渡就更加成为必要了。例如公元555年，虽然在吉备的白猪（现在何处不详）设置了

^① 东海：即东海道，日本沿太平洋的中部地方和关东地方的总称。——译者

屯仓，但因许多人不负担田部的课役，所以朝廷于569年指派一个名叫胆津的渡来人调查田部，建立人口户籍，并派胆津充当“田令”（农场长）。所谓不负担田部课役的人多起来，就是指他们的独立性加强了，再不能用模拟氏族的方法来统治他们了。为了对付这种人民的新动向，就出现了不再把人民作为集团、通过伴造来统治，而要采取把人民作为单独的个人进行直接掌握的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萌芽。这不仅是改变经管屯仓的方式，如果发展下去，还将对于模拟氏族关系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即旧有的整个体系有所影响。苏我氏积极地主张这一方向。与此相反，物部氏代表了保守派。

两派对立的爆发是在六世纪中叶——当时就朝廷是否承认和信仰佛教问题，开始了苏我稻目和物部尾與两派的对立。接受佛教就是接受一种神，这种神是超越氏姓制度的原有的各种神的。虽然说接受这种神并非立即否定固有的神，但物部尾與等人只把旧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奉为最高存在，猛烈地反对接受佛教。他们举出当时严重流行的疫病、饥馑等社会不安，认为这是由于礼拜蛮

神（外国的神）才发生的灾祸。苏我氏则认为：如果拜信新的神，可以借助这种神的威力消除社会的不安。总之，就是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引起了对人民统治的新旧方式之间的对立。

苏我氏成为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公元585年，稻目的外孙继承皇位（用明天皇），谋求佛教的兴盛。用明天皇死后，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围绕着皇位问题发生了对立，终于发展为战争。苏我马子同用明之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一道消灭了守屋及其一族，并拥立自己的外甥作了天皇（崇峻天皇）。

到这时，在宫廷里，已无人敢于反对马子。崇峻天皇憎恨马子的跋扈，马子一怒，竟让渡来人的官员杀死天皇，然后立本族的皇女为天皇（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充任摄政（公元593年）。此后马子和圣德太子施行了独裁政治。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执政

苏我马子和圣德太子执政达三十年。在这期间，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朝廷在东国等地的屯田，

而他们也不忘记扩充他们自己的田庄。在经营方面，把上述白猪屯田那种方式更加发展了。同时，近畿的国造等人也开始带有地方行政官员的性质。在朝廷的组织里也出现了把以财政机构为中心的、旧的伴造部民制改组为官衙的长官和在那里从事劳动的群众这种形式的趋势。

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就是这样地改组和加强了权力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官僚制的机构。他们提倡佛教，制订官位十二品，颁布宪法十七条和编纂《天皇记》^①及《国记》等历史书，就是在着手创立以天皇为至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

提倡佛教的政治意义是：一方面为了用这种超越“氏”的新信仰来统一贵族的的思想，一方面使中央和地方的氏姓贵族和群众对朝廷的威力产生强烈的印象。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朝廷，耗用大量的国家经费，建筑了远较当时日本建筑文化水平为高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结构复杂、极为壮丽宏大的大型寺院，从朝鲜招用了大批僧侣、佛画、佛像以及建筑寺院的专家。由

^① 这时候开始称大王为“天皇”，将在下文加以叙述。

于这些人的指导，也出现了出身于渡来人的日本佛教美术家。现藏于法隆寺的释迦三尊的铜像，它的作者名叫鞍作鸟，就是中国渡来人的子孙。这样，日本才创造出了高度的造型艺术，并产生了象样子的学术。圣德太子还亲自向高丽僧侣学习佛经，后来他甚至能向天皇进行讲解。

尽管提倡佛教，但并不是否定做为天皇以及氏姓贵族祖先的各种神的信仰，朝廷对于这种信仰也曾加以强调。而且这种佛教并不干涉群众的信仰，朝廷所建的寺院——官寺，只有天皇和朝廷的贵族去参拜，群众是不允许到寺院听经拜佛的。由于仍处在连皇宫都是用木板房顶或茅草房顶这种粗陋的房屋、群众都是蹲踞在连地板都没有的土穴的时代，所以群众单单眺望一下出乎自己想象之外的大建筑，或者参加这种建筑劳动，便会对于建造这些建筑物的统治者的权势和祭祀在这里的新的“神灵”感到诚惶诚恐了。

官制品位也不同于过去的姓和氏的结合，而是授予个人。看来，这是为了建立不带有血缘模拟的官僚性质的贵族秩序所做的努力。但这还不是代替“姓”，而是与姓并存的。有名的十七条

宪法，第一条说：“和为贵”，是告诫王族以及各氏姓贵族不要争权夺势，实际上不过是使之承认现在的执政者——圣德太子和苏我氏等人的地位而已。第三条的“承诏必谨”和第十二条的“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条所指的就更明显了。

此外，《天皇记》和《国记》对于“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以及公民的本纪”等历史的编纂，恐怕是记载天皇家世、各氏姓贵族的谱系以及简单的年代。六世纪，天皇以及各氏姓贵族的谱系，以天皇家的祖神——天照大神为中心、在天皇下面做官的各氏姓贵族的祖神进行活动的传说故事，也似乎开始出现，所以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曾企图把这些改编为对于各氏姓贵族、特别是对苏我氏有利的传说，以借此从历史上和宗教上来神化当时的天皇和各氏姓贵族的统治势力。

到了这个时代，开始努力同中国王朝建立对等的国交。公元600年，朝廷为了恢复在（朝鲜）任那的势力，派出征伐新罗的大军。这种征伐好象一时可以取得成功，但终于失败了。他们

为了弥补这种军事力量的不足，便谋求和中国的王朝开展平等的国交，从而使新罗尊敬日本。于是在公元607年派小野妹子前往中国隋朝。据中国的《隋书》说，小野妹子在携带的国书中记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第二年，隋朝向日本派出了答礼使节，小野妹子伴同他们一起回国。该使节回国之际，小野妹子又一次伴随他们前往中国。这次国书开头使用了“东天皇^①敬白西皇帝”的文句。在文献上称大王为天皇，似乎以此为最早。随着这两次遣隋使，有大批的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有的象高向汉人玄理和南渊汉人请安那样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和隋朝的使节往来，并不象日本想象的那样，是实现平等国交，隋朝送给日本的国书仍把日本看做朝贡的属国。因此，日本虽未能实现用这种国交来提高自己对新罗威望的目的，但和倭国五王曾以同样企图接近南朝宋国相比，这种国

① 天皇：在中国道教是指“统治上天的皇帝”的意思。圣德太子大概为了要和中国的“皇帝”对等，而对日本的大王使用了这一称呼。但日语读为 $sumeramikoto$ （意为天皇——译者）。

交却表现了日本朝廷独立自主的思想。

社会不稳的加剧和大化的政变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政治，虽然存在着新国家形态的因素，但他们驱使人民从事营造大的寺院和无益的战争，却倾尽了国力。所以在六世纪末以崇佛和排佛为背景，进行了政争，因而社会不安，生产荒废，人民贫困，反抗就愈益激烈起来了。圣德太子本人虽也见到路边饿死的人，但他只是以佛教的心情感到悲哀而已。圣德太子在晚年对政治失掉兴趣，更加沉迷于佛教。他曾对妃子表示：“人世（现实世界）是虚无的。只有佛陀才是真实的。”他死于公元622年。四年之后，苏我马子也死去了。

苏我马子死去的公元626年，从春到秋，阴雨连绵，发生了大灾荒、大饥馑，老年人口衔草根倒于路旁，婴儿含着母亲的奶头一同死去，强盗偷窃，到处发生。社会几乎已经丧失恢复生产的力量。公元644年，出现了蛊惑民心的人散布说：到东国富士河畔礼拜名叫“万世虫”的虫子

就可获得财富和长寿。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抢先敬奉财物，祭祀该神虫，酗酒歌舞，引起大混乱^①。社会矛盾加深，人民生活无着落，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部民利用逃亡等形式进行反抗也频繁起来了。

这种生产荒废和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五世纪以来天皇和贵族利用屯仓、田庄、部民

① 《日本书纪》卷廿二，推古天皇条：

“三十四年春正月，桃李花开。三月天寒霜降。夏五月戊子朔，丁未，大臣（苏我马子）薨。（中略）六月下雪。是岁三月至七月霖雨不止。天下大饥，老年人嗽草根，死于道边，幼者含乳，母子共死。而强盗窃盗纷起不已。（中略）

三十六年夏四月辛午朔、辛卯，降雹大如桃。壬辰降雹大如李。春至夏旱。”

《日本书纪》卷二十四，皇极天皇三年条：

“秋七月，东国不尽河边之人大生部多，劝村里之人祭虫，曰：‘此乃万世之神，祭此神者致富与寿。’巫覡等遂诈託神语曰：‘祭万世之神者，贫人致富，老人还童。’于是进而诱劝民家施舍财宝、陈酒、肴、六畜于路侧，而使之呼曰：‘新富即来。’城乡人们将万世虫供于座上，歌舞求福，施舍财宝，毫无所获，耗费极大。葛野秦造河胜，恶民受惑，乃攻打大生部多。巫覡等人惶恐，停止劝祭。世人便作歌曰：‘太秦之神要听取，万世之神要打倒！’此虫常生于橘树，或生于曼椒。长四寸余，大如拇指许，色绿有黑斑，其貌颇似家蚕。”

（据黑板胜美编《训读日本书纪》）

制等统治人民的体制本身。天皇、皇族和贵族在这种体制下不仅互相争着扩大和增加他们的领地和部民，而且他们把掠夺来的财富又都用于征伐外国和营建寺院；不顾生产，只求加强掠夺，这就难免出现这种局面。社会的不安和人民的怨声载道，必然促使统治势力内部的对立更加尖锐。而且继承苏我马子的苏我虾夷及其子入鹿更加图谋扩张领地，甚至冒充天皇，征用天皇以及贵族的部民。而反对苏我氏的各种势力则集中到中兄皇子（公元614—671年）和中臣镰子（后来的藤原镰足，公元614—669年）的周围，策划推翻苏我氏。

这种对立，不能用过去那样宫廷势力之争（宫廷政变）予以结束，这是因为它的根源具有整个社会体制危机的缘故。在推翻苏我氏的时候，如果不废除旧有的天皇、皇族和贵族们占有部民的制度，那就不容易掌握民心，而且占有部民的人们如果争夺不止，整个统治阶级就要同归于尽。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呢？高向玄理和南渊请安等人在这方面的构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中国亲自看到唐朝

灭了隋朝，制定律令，用法令和官僚制度统治大帝国，也看到了新罗仿效唐朝而统一了朝鲜，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把“法制完备的大唐国”做为新国家的模范；而且官僚制度也罢，或把人民编为户籍，进行地区性统治也罢，这种新体制的萌芽在日本也已部分地出现了。

公元645年6月发生政变。中大兄皇子等人在大极殿（朝廷的议事厅）杀死苏我入鹿。苏我虾夷烧了自己的官邸，同时焚烧了《天皇记》和《国记》等书，本人也焚身自尽。中大兄等立即迫使苏我氏所拥立的皇极天皇退位（天皇退位的开端），拥立了孝德天皇，中大兄成了皇太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子当上了新设的同左大臣、右大臣相等的内臣，两个人掌握了全权。后来又仿效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开始制定年号为大化元年。年号一词正式称为元号，规定年号称为建元。“元”字是元始的元，意思是“开始”。在新的君主治世的开始，同时建立其治世的名号，来显示君主的权威。人们使用元号就是表示服从制定这一元号的君主。日本之所以在这时才正式规定年号，是表示建元者的天皇是整个

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意思。

大化革新与壬申之乱

此后大化革新就逐步顺利进行。最根本的革新就是：第一，废除皇族以及中央、地方的贵族豪族等人的一切领地与部民，把全部国土和全体人民都做为天皇的公地和公民（不撤销朝廷的手工业部民）；第二，为了统治这些土地和人民而成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并将全部国土划为首都及其周围的地区以及国、郡、里等行政区域；第三，规定全国统一的税制，即征收定额的租、庸、调、杂徭等；为了驱使人民具有能够负担这些税赋的能力，而规定了《班田受授法》；为了实行这项法令而建立户籍和计帐^①。以上可以说是革新的三大纲领（其内容将在下文说明）。

大化革新并不是废除作为一个阶级一贯占有领地和部民的皇族以及氏姓贵族等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而是进行改组和调整；但对他们个

^① 计帐：登记每户劳动力和每年负担赋役数目的册子。
——译者

人来说，以前“伴造”和“氏上”的稳定地位崩溃了，可以自由地无限制地加以驱使的奴隶被征调走了，因此在他们之中出现了反对革新的一派；也有的原则上赞成革新，但对进行的方式持有不同见解。这是必然的。于是革新的工作就出现时进时退的现象。

公元649年发生了苏我仓山田石川麁因叛变嫌疑而被灭族的事件。苏我仓山田石川麁曾是革新政变的有力战士，并任新政权的首任右大臣。在社会和政治上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在变革初期立过功劳的人物中，几年之后有的成为反动派，这在古今内外都有过类似的情况（明治维新时，建立天皇政权的第一功臣西乡隆盛，十年之后，却成为对新国家的最大的叛乱者）。

在国内发生这样动荡的同时，唐朝和新罗联合，在朝鲜国内，加强了对日本的同盟者——百济的攻击：日本的势力连续后退。这有损于天皇制对于国内反对革新派的威信。于是天皇朝廷决定派出大军到朝鲜，以求一举解决国内外的困难，确立天皇的威信。但于公元663年在白村江的海战中，遭到致命的失败。百济也因此而灭

亡，朝廷在朝鲜的势力终于垮台。

这件事也影响到内政，产生了革新政治局部的倒退以及向旧势力的妥协。此后，天皇政府改变了侵略朝鲜的思想，而致力于巩固国内的统治体制。但是，由于粉饰新政的土木工程以及对外征战的负担，增加了群众对于朝廷的不满，而保守贵族利用这种不满反对新政，同时和皇室内部分争权夺势的斗争纠集一起，更加深了政局的不稳。

公元671年底，天智天皇（原先的中大兄皇子）死去，大友皇子继承皇位（弘文天皇）。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对此不满，六个月后举行叛乱，成为波及大和、伊贺^①、伊势、美浓、^②尾张^③、近江^④等国的大内乱。弘文天皇战败，自缢身死。因这次战乱发生在壬申年，遂命名为壬申之乱。获得胜利的大海人皇子继位为天武天皇。

① 伊贺：今三重县西北部，也称伊州、贺州。——译者

② 美浓：今岐阜县南部，也称浓州。——译者

③ 尾张：今爱知县西北部，也称尾州。——译者

④ 近江：今滋贺县，也称江州。——译者

用自己的实力掌握了政权的天武天皇，在位十四年间未曾用过一个大臣，万事独裁，确立了天皇的权力和权威，使得大化革新的各项措施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位时发布了名叫《飞鸟净御原朝廷律令》的成文法，这些条文未能传于后世。但以此为基础，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之后的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制订了所谓《大宝律令》，并付诸实施。所谓律，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所谓令，相当于国家组织和行政各法以及现在的民法和诉讼法等法律和其他规定。后来（公元718年即养老二年），对《大宝律令》进行了部分修改，成为《养老律令》。但它在主要方面并无变动，所以这一律令的制订和实施，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要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这种大化革新的理想。

四 古代天皇制

——模仿唐朝和“现人神”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

由于大化革新和后来法制的完备，日本社会也就不是模拟氏族的统治，而建立了在行政上把全部居民按照地区加以组织和统治的完整的国家形态。在这个国家，天皇是创造国土的神的子孙，叫做akikumikami（明御神、现人神），意思是“以凡人身分降世之神”的神的权威；同时天皇又成为整个国土和人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的专制权力者。对于天皇的权限，在《律令》的条文中虽然没有任何规定，但天皇是超越法令而存在的。写作“国家”，读做mikado（日文“天皇”的读音一译者）。即认为天皇就是国家的化身。

而实际统治人民，是由天皇任命官僚通过法

令和机构来实现的。从这一点来看，《律令》国家是取消了前代氏姓贵族分别统治所属氏人和部民的办法，而以天皇为中心，实现统一、结成一体来统治全体人民的权力机构。

中央政府分为神祇官（祭祀天皇祖神和其他各种神以及管理神社）和掌管一般政务的太政官两个机构。太政官设有太政大臣（必要时临时设置）、左大臣和右大臣，统辖政务，下设八省办理行政。另外还有监察官吏的弹正台等机构。

行政区域除首都（京城）外，全国分为六十多个“国”，国由中央派任任期四年的守（长官）以下四级的国司（地方官），掌握管辖区内的行政、审判、军事、警察的全权。各国中，在首都周围的五个国，作为“畿内”，给予特殊待遇。

国又分为郡，其首长以下官员（郡司）从以前“国造”级豪族中加以任命。郡内的居民每五十户编为里（后称乡），以其中有势力的户主为里长。里既不是自然村落，也不是以前模拟的氏族集团，而是作为行政上最低单位而设立的，里长是国家权力最基层的爪牙，担任征税、警察和

编造户籍等工作。

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军事机构，有中央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和设在每个国的军团以及设在筑前^①的大宰府的防人。二十一岁至六十岁的男公民（正丁）负有兵役的义务，各国的正丁每三分之一（后四分之一）轮流服兵役，充当军团的士兵或充首都的卫士，特地从东国的士兵中编成大宰府的防人。兵卫只征用郡司的子弟，兵卫府和卫士府（从公民出身的士兵中征调）互保均衡。中央的五个卫府归政府直辖，地方的军团由国司指挥，军团首脑以下的士官，由和郡司等同级的人员中选任。

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对天皇制的反抗者。本来是为对外防卫而设立的大宰府的防人，由于该府不仅是对外交涉的首要的机关，而且是天皇政府的九州总督府，为适应这种情况，实际上作为镇压九州地方的武力作用要比对外防御为大。防人，不由九州和中国地方^②的士兵充

① 筑前：今福冈县大部分地区。——译者

② 中国地方：日本行政区划之一，指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译者

任，而特意从距离九州最远的东国士兵中选调，这大概是由于其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所以不得不选用不通当地人的方言，又为皇室一向信赖的东国士兵了。

大化革新前的中央贵族，由于他们分有作为神的权威和绝对权力的天皇的权威和权力，于是就独占了统治人民的太政大臣等中央官员和国司的官位，而郡司官位也同样由前代的地方豪族所独占。他们按官职接受位阶，按官位、功劳获得田地、封户^①和禄品（丝绸布匹、铁制农具等）。因为官位由于荫袭制及其他原因，实际上可以成为世袭的组织^②，所以按官位授给的田地和封户实际上也是世袭的。这样，对于中央

① 封户：官吏按位阶功劳等领取一定户数应交纳政府的租税的半额和调、庸的全额以及丁口，这叫做食封。交付食封的人家是封户。

② 荫袭指五品以上人员的儿子依靠老子的品阶功劳而接受一定的品位的制度。他们的进级也快。这样，实际上，品位就是世袭。培养中央官员的机关有大学，培养郡司的机关有国学，前者限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和特定家系的子弟，后者限于郡司的子弟才能入学，并不是任何人都可进入。而且即使从大学和国学毕业，也只能充任低级事务官员，升进要有一定的限度。

贵族和地方豪族的个人来说，即使也有荣枯盛衰，但从整个阶级来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仍旧继续保持了做为统治阶级身分的地位和财产。

律令制虽全面模仿唐朝的体制，但完全没有采用象唐朝制度那种依靠考试从全体国民中铨选官员的办法，而允许由上一代的统治阶级和贵族身分者垄断官员的位置，这一点和唐朝的制度有重大的分歧。这是因为大化革新并不象唐朝那样用实力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是只由旧国家的君主和统治阶级本身改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形态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帝都、日本的领域和国号

在官僚机构完备的同时，就出现了必需建立政治中心地的首都的问题。在这以前，凡有天皇宫殿之处就是京城（叫作宫所）。这种京城随天皇的变换而变迁。但如果没有永久的中心地点，中央集权官僚制就难以统治全国。因此，从大化革新以后不久，就有仿效唐朝的首都长安建立首

都的计划，到公元694年，在飞鸟^①建立了模仿长安的藤原京。但是，不知为什么，仅仅经过十四年，天皇对于这一京城感到不惬意，又用大量的物资和人民的劳力，在奈良地方建造了平城京，公元710年（和铜三年），元明天皇率百官贵族迁到这里。此后直到桓武天皇初年，共七十四年间，平城京就成为七代天皇的首都（其间虽多次迁都他处，但都又迁回此地）。

平城京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②，南北三十六町。在这个矩形的城内，不论东西南北，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的棋盘街，城北边的正中，有向南占地八町正方的大内里（平城宫）。平城宫既是天皇的寝宫，也是议政厅。四周有绿丘围绕的京城，并列着红柱、白墙、瓦屋顶的唐式官衙和贵族的邸第，飞鸟地方的大寺院也纷纷迁到这个新都。

在这里建立的古代天皇制所统治的领域，在大化革新时期，西南达九州南部和壹岐、对马；东北方面，东达现在的福岛县中部，西达新潟县

① 飞鸟：今奈良县橿原市和高市郡一带。——译者

② 町：日本长度单位，约合109.0公尺。——译者

中部一带，后来又征服了东北的“虾夷”^①。到平城京建成时，东到仙台附近，西到秋田一带都归属在天皇统治之下。接着不断地向东北发展。到八世纪初叶，西南地区九州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等岛屿也列入天皇的版图。再往南面的冲绳群岛，虽然住有日本人种的一个分支，但和天皇国家尚无往来。

发展到把国号写做“日本”这样的天皇国家，是在制定《律令》的时候。这一国号最早见于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的历史书《日本书纪》这一文献里。我国的国号本来是用最早的大王国家根据Yamato（日文“大和”之读音。——译者）这一地名普及全国的，通常写成“倭”、“大倭”和“大和”等汉字。大王变成天皇，天皇国家已经不再是大和政权，而成了Yamato全境的唯一的国家，这一国号就有必要明确地区别于大和地方的地名。另一方面，在对外方面，曾对中国朝贡的倭王现在要成为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天皇，那么，国号如再使用中国人对日本用的“倭”

① 虾夷：今北海道一带。——译者

字就不妥当了。因此，在推古天皇致隋朝的国书中，认为Yamato在中国的东方，是日出之处，于是称为“东天皇”或“日出处天子”。大概从“日出处”这一联想，就用“日本”这两个汉字来代替国号Yamato，而和大和地方“大和”加以区别了。而一旦使用“日本”这两个汉字后，不久就把这两个字读为Nippon^①和Nihon，后来，Nippon和Nihon就成为通用的国号了。

没有市民的城市

律令已完备，帝都亦建成，版图扩至南北，对繁荣起来的天皇制，有个官员感而歌曰：“欣逢天下昌荣，众民安生！”那么，民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平城京可以说是万事都仿效长安，是长安的翻版。但只有一项和长安大不相同，就是平城京

^① 读“日本”为Nippon还是Nihon，哪种正确？这种争论，对历史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本来的读法是Yamato。不管本来读做什么，都是根据一千多年的习惯才读做Nippon，也该做Nihon的，所以不论采用哪种读法，都应该由日本国的主人翁——现代日本国民的全体意愿来决定。

没有长安那样的城墙。后来的平安京也没有城墙。中世和近世的各城市也没有。但中世城市中，只有市民自治最为发达的堺市虽无城墙，却有具有类似城墙效能的水渠围于四周，这是唯一的例外。城墙是一个城市的防敌设施，同时也使城市和周围的农村明显区别，即具有确立市民生活地区的功效，中国的城市和西洋古代中世的城市都有城墙。然而平城京以至一般的日本城市都没有城墙，这是为什么呢？

其理由要从不同时代的城市分别加以分析，就平城京来说，第一，当时没有必要建筑城墙以防外敌。因为日本并不存在外族入侵之忧，而且各豪族都已划入天皇制机构之内，即使发生叛乱，也是内部的人，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因此城墙对此并无意义。第二，平城京或后来的平安京都是贵族和官员居住的政治城市，是没有市民生活的城市，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建筑城墙，用以和周围的农村区别开来。不仅如此，甚至为了供应贵族和官员的粮食，城市还不能不笼络农村和农民。

据推测，平城京在全盛时期约有人口二十

万，住户都是皇族、贵族、官员、僧侣之辈和供他们驱使的大批奴婢、手工业者、农民、从地方征用来的壮丁（后文叙述）、卫士以及服徭役的人们，而没有一个自由的市民。在平城京市内，有东、西两个集市，集市上不仅出卖各种衣料、铁制等农具、陶器、纸、墨、笔以至扫帚、鞋履等当时的一般物资，甚至还可买卖奴婢：集市是官办，所卖的物资并不是独立的商人从手工业者和农民手里自由收买来的，而是国家作为赋税从人民手里征收的，还有朝廷和寺院从其隶属的手工业者所取得的产品进行消费以后的剩余产品。购买这些物资的也是贵族、官员和僧侣们。

各地的特产，大致都作为“调”而被征收，就连农具也不例外。金、银、铜等矿产，从七世纪中叶已开始在各地进行开采，这也一律被官方征用。因此，对于生产这些手工业品和从事矿业的人民来说，就没有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必需品的可能，因此，使社会分工日趋发达、根据分工而进行各地物资的自由交换和商业的发展，都是十分困难的。政府照例仿效中国铸造了“和铜

开珎”^①等铜币和银币，以求流通，但在人民手里没有可供自由交换的物资的社会里，货币当然不会流通。

身分、家族和班田制

首都的繁荣即意味着地方人民的衰败。在人民之中，形成了“良”和“贱”两级的身分。大化革新时，法律上首次规定了良贱之别，在《律令》中也规定了这种差别。朝廷和私人的奴婢，私人的“家人”以及配属于朝廷各官衙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杂户”等，被定为贱民或者相当于贱民的身分。奴婢是明显的奴隶，家人也是奴隶性质的家内奴隶，但与奴婢不同，可以过着自己的家族生活。杂户是原来朝廷的手工业部民。这些奴隶人口据推测占奈良时代全国人口约五百万至六百万人中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前的普通民人以及属于朝廷、皇族和贵族

^① 和铜开珎：公元708年因武藏地区献天然铜，改元和铜。珎字是“宝”字的简体，也有的说是“珍”字的异体，因此在日语中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译者

的部民被国家指定为“公民”的叫作良民。在《律令》制中，完全不承认具有从前氏族公社外形的集团，而把组成这种集团的每个家族公社做为“户”，直接置于国家权力统治之下。户有户主，统治全部家族成员，对于国家来说，他代表整个家族。户是由户主及其妻子等直系血统家族集团和户主的兄弟姊妹、伯叔父母等旁系血统及其妻子娘家等家族集团所组成的联合组织，历史学上称这种整体为“乡户”，乡户内各家族集团称为房户。有势力的乡户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奴隶。

政府每六年编造一次全体人民的户籍册，凡六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按二反^①（现在的二反四亩），女子每人按男子的三分之二折算，按“口分田”分给各乡户使之耕种（班田制）。奴婢和家人也分给公民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拥有奴婢，做为奴婢最低生活费用的来源，而交给户主的，并不是由奴婢领取。领到土地的人死亡时，口分田由国家收回，但宅地和其周围的田地，许可由户永远占有。

^① 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18公亩，即991.8平方米。——译者

口分田既不许拒绝，也严禁放弃耕种、弃村逃亡。因此，耕种口分田与其说是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公民的义务。公民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束缚在耕地上，又受着以租、庸、调以及各种徭役劳动形式的剥削。所有口分田都要收税，每反为稻谷二束二把^①（以后减为一束五把，一束约为现在的稻米二升）。当时田地收获量估计平均每反约为八斗，所以租税率占收获量的3%左右。庸，原来是规定每年到京城为朝廷服劳役十天的一种徭役，但京城以外各地人民须交纳一定数量的布匹代替徭役。调，是交纳丝绸等地方特产手工业品。庸和调都是加于男子的人口税，按照正丁（二十一岁至六十岁）、次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和中男（十七岁至二十岁）等年龄区分，规定每人为若干。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是等外户

把庸、调折合成米，再加上租米，三种租税合计起来，估计平均为每户口分田总收获量的20%

^① 束、把：日本古代计算粮食的单位，一束十把，一把是用手抓满三次的稻谷。——译者

左右。这种比率和德川时代农民年贡率达到收获量的40%到60%相比,看起来是不重的,但是,对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由于口分田的收获只能维持一家的口粮,所以这种租税虽然只占20%,也是相当重的。加以公民还要负担极为繁重的徭役劳动。

徭役,首先是兵役。在长达四十年的期间每个公民每三年或四年被征发一次,须自带武器和粮食,充当军团的士兵六十天(在这一年,其他徭役一律免除);或者充当防人(守卫边境的士兵——译者),派往九州三年;或者充当卫士,在京城服役一年。被征当兵是群众最痛苦的事,他们甚至都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

徭役,其次是杂徭。国司和郡司每年可以使役正丁六十日,次丁三十日,中男十五日。而且任何地方对于这种日数的限定,都不能保证。

此外,还须按每五十户的比率出二名“仕丁”(民工——译者)到京城服三年的朝廷劳役。而且作为租赋交纳的稻谷要送交到郡的仓库,京城和近国^①须将部分稻谷碾制成米和调、庸来的物

^① 近国:京都附近的十七国。今中国和关东一带。——译者

品全部运往京城。为了运送这些物品，在来往途中用的粮食和运载这种货物的牛马用费都须由公民自身负担。这是一种极为繁重的徭役，担当运送的人去路总算完成了任务，但在归途上，或因粮食断绝，或因过度劳累以及患病而出现倒毙的情景。

还有一种名叫雇役。驱使人民从事京城的营造以及耕种官田等，虽然不是无偿劳役，但只发给少量粮食和工资。这也是强制劳动，人民是不得抗拒的。

把租、庸、调和各种强制劳役加起来，人民的负担繁重到什么地步是可以想象的。把人民的生活程度分为上上户到下下户和等外户十级。据公元730年越前^①的纪录，90%以上为等外户；据750年安房^②的纪录，80%左右是等外户，下下户占15%以上。所谓等外户是立即需要救济的。所以有名的山上忆良（公元660？——733年？）在《贫穷问答歌》里所反映的情

① 越前：今福井县一带。——译者

② 安房：今千叶县一带。——译者

景^①，不能说成是由于诗人的心弦受到一时的冲动而偶发出来的。

这样的贫穷，致使人民在春季经常是连稻种都吃得精光。于是，政府把稻谷贷给人民，在秋收后加上利息偿还。这叫做“公出举”（官方出借——译者）。利率高达50%。民间的“私出举”（私人出借——译者），实际收利100%。公出举好象为了维持公民的生活和维持再生产而采取的办法，但实际是国家做为一个大高利贷者来榨取人民的，也是国司（地方长官——译者）填满腰包的手段，不久，这种公出举就成为对于不愿借贷者也强行借给、取得利息，成为朝廷财源的一种税制了。

公民的阶级性质和 《律令》制的历史意义

公民由于被口分田所束缚，遭受国家残酷剥

① 歌的一节：“简陋倾圮屋，地上铺茅草，父母枕边愁，妻子脚下忧。灶里无炊烟，釜中结蛛网，忘却炊饭事，只闻呻吟语。咆哮如劈物，手持刑笞具，‘五十户长’声，呼哨到寝处。似此人世间，欲呼亦无术。”——译者

削，所以不论从什么意义来说，也不是自由民，这是很明显的。在学术上有的说他们是国家的农奴，有的人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奴隶。我象多数人所说那样，认为公民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奴隶，因此《律令》制的社会是一种奴隶制社会。

公民的主要负担是各种徭役，即国家征用体力劳动的徭役，这种徭役，不管每户口分田的多少，凡属户内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一概不免。公民不象农奴那样领有和耕种领主（国家）的土地，因而服劳役和交纳实物年贡做为地租。他们并不以土地为媒介，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家。这种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大化革新前的部民在其部民集团内部，好象是农奴，但他们是做为集团而被奴隶化了的，而在《律令》制下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不过是仍把以前的部民集团及其所有者的关系按照国家的编制重新加以编组和调整而已。如后文所述，明显的奴隶制是从公元八世纪末开始，发生在代替公地公民制而成长起来的私人土地所有、即庄园的经营方面。如果把公地公民制说成是国家的农奴制，那么，在公地公民制瓦解之后，反而出

现了从农奴制倒退到奴隶制这种历史阶段；但是，这种倒退在当时日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与以前相比，对社会是不是没有起到什么巨大的进步作用呢？决不是的。

第一，破坏了利用模拟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乡户脱离模拟氏族集团（家庭公社）而自立，这在大化革新前虽然就已开始，但大化革新和《律令》制对此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奴隶，使他们开始受国家权力直接的压制和掠夺——而从前公社对人民的束缚，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一种保护，现在人民却失去了这种保护。尽管如此，但由于半原始性质的模拟血缘关系的框框被打破，因而便产生了人民可以作为阶级而结合起来的历史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根据恩格斯就古典的古代奴隶制成立的论述，可以说没有《律令》制也就没有近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了。

第二，上述问题如果从经济方面来说，它是打破了土地的公社占有，从而出现了私人占有。

口分田由领受田地的人终身占有，他们对宅地和旱田的永远占有、即实际上的所有权被承认了，关于山林原野则保证了人民的自由使用权。这种私人占有，存在着产生实际上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因素。

而且法定了人民负担的限度，即使这种限度不断遭受统治者的忽视，但与毫无任何法定限制的部民制相比，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由于规定了负担额，就使得富裕的或者条件好的公民既可提高生产力，同时也可把缴纳国家赋税之后的剩余部分积蓄起来，然后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办法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扩大私有土地（占有地）。其结果便创造了这样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即促进公民的阶级分化；摧毁公地公民制即国家的奴隶制，使之发展为私人大土地所有者的奴隶制经营；产生了农奴制的萌芽。

第三，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一方面虽顽固地保留了氏姓制的残余，但同时却形成了进步的国家形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这就为促使日本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

《律令》体制的成立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灿烂发展的集中表现。因为这意味着中央贵族从中国学到了在原则上不同于旧有模拟血缘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体制的思想和实际运用这些思想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在地方的上层阶级中已经相当普及了能够为编造户籍和“计帐”、进行班田制和征税而使用的文字或计算等知识。

古代贵族对日本文化重大贡献之一，是从五世纪开始运用汉字的音和义，发展了书写日语的方法。使用这种书写法，写成了《万叶集》。因此称之为“万叶假名”。这是后来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产生的母胎。

《万叶集》是以八世纪前后的诗歌为中心，包括大化以前的作品，集中日本古代诗歌约四千五百首的一部大诗集。它的编者和写作年代虽然还不明确，但大伴家持（公元718——785年）确实是编辑此书的最大功劳者之一。诗集的作者大部分是天皇、皇族、贵族和官员，但也有农民、兵

士和娼妇等各个阶层的男女。他们的出身地点也不限于京城和畿内，而是遍及全国。诗歌的题材多半是恋爱和自然风物，但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徭役以及农耕劳动，也有以人生观和社会观为主题的。农民以及士兵的诗歌并非他们的原作，似乎由采录者和编辑者进行了加工。柿本人麿（？——709年？）、山部赤人和额田女王等人作为《万叶》的代表诗人，受到后世歌者的尊重。

象《万叶集》这样，把国民中的一切阶层生动地抒发他们的情感、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诗歌集中起来，这件事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时尽管统治者和人民的隔离和对立已日益加深、扩大，但这却只有在历史上首次把整个国民统一在同一的法制和机构之内的古代统一国家确立时期，才能实现的。

八世纪的前期，天皇政府才编写成自己国家的历史。大化革新后，天武朝筹划编修历史，这一事业由历代朝廷继续下去。公元712年（和铜五年）《古事记》脱稿。这部书是以日文体为基调，杂有汉文，而歌谣以及固有名词等是用万叶

假名书写的。这既是现存的日本最古的历史书，又是最古的日文的文学书。继于720年（养老四年）写成了仿效中国正史体裁的《日本书纪》。这部书是用正规的汉文书写的，但读法却按日语读。《古事记》、《日本书纪》都是为当时的天皇制国家提供历史的、思想的根据而编修的，所以对于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并未加以区别，而对神话传说，也不是把古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是按照编修的政治目的加以选择、改变，并加以创作，自成系统。

大约和《古事记》、《日本书纪》同一时期，写出了各地的地方志《风土记》。这类书也是按照政府规定的编修标准写出的，和前两书同样是为了认识古代天皇制本身而写的，虽然没有有关地方群众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描述，但却局部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这是在前两部书里见不到的。常陆^①、播磨^②、出云^③、丰后^④、肥

① 常陆：今茨城县。——译者

② 播磨：今兵库县。——译者

③ 出云：今岛根县。——译者

④ 丰后：今大分县。——译者

前^①的《风土记》，现在还存有全部或者一部分。

奈良文化的世界性和日本性

古代贵族就是如此的极端自我陶醉，同时又热衷于吸取中国文化。公元702年（大宝二年）到777年（宝龟八年），曾派使节（遣唐使）到唐朝达六次之多。使节的船队大体为四艘，每次都有大批留学生随行，大使以下留学生和水手多达四、五百人。航海完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每次往返说不定哪次要遭遇漂流和沉没的危险。留学生回不了国、在唐朝终其一生的有著名的阿倍仲饗（公元701——770年）等多人。

奈良的贵族把这种困难置于不顾，举凡学术、技术、文艺、音乐以及佛教和佛教庙宇的建筑、雕刻、绘画，以及有关服饰、器皿、生活方式等都在学习唐朝。唐朝的文化是印度、阿拉伯（saracens）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

① 肥前：今佐贺、长崎地方。——译者

有交流的世界性的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是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化。在唐招提寺传授戒律的鉴真（公元688——763年）等唐朝僧侣也来到日本。印度人和波斯人也有来日本的。

但是，当时的贵族并未把儒学和汉文学^①作为学术和文学而加以深刻地理解。代表当时水平最高的汉文学者所作的诗歌《怀风藻》（公元751年），也不过是作者们熟悉汉字，能够很好地模仿汉诗而已。

佛教，在圣德太子之后，历代的朝廷都更加致力于保护。用国费陆续建筑了一个个大寺院，并拨给这些寺院以大片的土地和数以百计的奴婢。朝廷提倡佛教的政策到圣武天皇时代达到顶点。天皇于741年（天平十三年）下令每国建筑“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寺）和“法华灭罪寺”（国分尼庵），继而在京城建立东大寺，铸造五丈三尺高的金铜卢舍那佛^②作为该寺的主佛

① 汉文学：指用中国汉文写成的文章、文学作品的总称，和日文对比而言。——译者

② 卢舍那佛：也作毘卢舍那佛，佛教天台宗认为他仅次于释迦牟尼。梵文作Vairocana，汉语译“徧一切处”、“净满”、“光明遍照”或“遍照”，通称大日如来。——译者

(公元743年动工，752年完成)。为了这些，天皇花尽了国家财富，并强制人民“出举”（服役——译者）。东大寺和该寺的大佛不仅有美术的价值，而且表明了古代日本人可以建筑这样的寺院和掌握了金属铸造的技术，这点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这一时期，是古代日本佛教文化的最盛时期，文化史上称之为天平时代。

受到朝廷如此保护的佛教，其使命是专门“镇护国家”，即祈求天皇制的安祥的，完全脱离了个人守戒律、得正道、开妙悟、灵魂得救这种佛教的根本精神。而且这种佛教和群众的信仰无关，和从前一样，僧侣是不许到民间讲传佛教，也不允许群众参拜寺院的。

举凡飞鸟奈良时代大型寺院的宏壮建筑，安置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佛象雕塑，画在墙壁和棚顶上的佛画以及使用的各种工艺品，都是卓越的艺术品。这些无名的制作者巧妙地吸收中国技术的能力是惊人的。但他们把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中国的形式一个个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袭过来，因此异国情调颇为浓厚。这种佛教艺术的境界和《万叶集》的境界，是难以想象出它们竟是

同一时代和同一社会的产物。这种艺术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流派。

而且当时的奈良已经有了后来称作“南都六宗”的六个宗派^①，这并不是根据信仰而产生的宗派教团，而是佛教哲学的学派。学僧们把在中国兴起的学说一个个地传入日本，以完全和中国僧侣同样的心情坐在僧院的斋堂里进行研究。当时传入和抄写的佛教经典的数量，可以说和唐朝的中国不相上下。

就是这样，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由此可见，反而可以这样说，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的头脑一刻也不忘记“大唐国”。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这是企图让人们看到，日本也是不亚于唐朝的文明国家。佛教艺术和哲学的传入，就是这种

^① 佛教的六个宗派：在日本分为“南都六宗”和“大乘六宗”。南都六宗为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大乘六宗为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真言宗，此处指后者。——译者

努力的表现。

佛教艺术品尽管是卓越的，但佛教信仰在当时的日本却只是一种低级的维护国家的咒术，这是因为美术的形式以及教义的经典是可以传入的，但是真正的思想信仰的本质内容却是无法传入的，所以这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以传统的“日本式”加以采纳。这种所谓“日本式”，就象把《律令》体制和唐朝的律令不同的地方（天皇加以神格化，没有采用科举制等），说成为“日本式”，是一样的。如果炫耀这是“日本精神”或者“国体原义”的发扬等等，那就不是炫耀日本社会的进步面，而是炫耀停滞面了。其实，还不如说，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而敢于进行冒其生命危险的海上航行，学习上的积极进取的气魄，倒是奈良时代贵族值得夸耀的东西。

五 庄园与农民

——《律令》体制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成立

群众的斗争和公地公民制 与征兵制的瓦解

迫使90%以上的人民处于立即需要救济的生活状态的社会体制，即使其上层的贵族们如何歌颂繁荣，也是不久就要崩溃的。忍耐不了班田制掠夺的公民和奴婢不断放弃口分田而流亡。被征为京城仕丁或卫士后从京城逃走的也陆续出现。逃走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到其他国，也就是到外乡的豪族和富农那里去劳动。

充任郡司和里（乡）长的，身分虽然是公民，但多为血缘家族，并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家庭奴隶，因而分得的口分田也多。而且他们具有旧的族长的权威，是当地实行班田制的掌权人，所

以依靠把良田归为私有和开垦荒地等办法来增加土地和财富。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能够收用逃亡者。《大宝律令》刚发表八年之后的公元709年（和铜二年），政府就禁止畿内以及近江国^①的“百姓”（豪族和富农）违背法律，隐藏和任意使用流浪和逃亡的仕丁。由此可见，当时逃亡成风，还可看出逃亡者和豪族以及富农的关系。

当然，这种禁令无人遵守。规定国司可以到处追查逃亡者，并带回原处，但当逃亡成风时，就不能一一追查带回。政府乃于公元715年改为：从京城逃亡外地者令其加入寄居地方的户籍，课以调、庸和徭役。收用逃亡者的人家当然要尽可能加以隐藏。逃亡者实际上就成了收用者的奴隶。尚未逃亡的贫农也向附近有势力的人家借贷高利的稻谷，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他们。

贵族、高官和大的寺社也抢占林野进行开垦。镐、镰等铁制农具一律为政府和贵族、大的寺社以及地方豪族所占有，这就成为他们能够利

^① 近江国：今滋贺县。——译者

用原有的奴婢和逃亡农民或者当地贫农的劳动力来扩大垦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法律本来规定垦田归公，但没有人把自费开垦的土地完全交给国家。国家如果要严格执行收归公有的规定，已经开垦的土地就要荒废。政府无计可施，于公元723年承认根据垦地的条件许可开垦者一代或者三代占为私有（《三世一分法》），公元743年（天平十五年）终于承认按照品级许可永远私有有限度的垦田（《永世私财法》）。号称《律令》国家全盛的这一时期，

《律令》规定的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这个大的原则被打破了。贵族、寺社、地方豪族和富农们的开垦热情更加高涨，有权势的人们圈占了广阔的原始林野，而使一般农民难于利用。这种贵族们的大规模私有地叫做庄园。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随着这种剧烈的阶级分化，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乡户逐渐分化为小家族的“房户”。有势力的家族（房户）经过种种过程使没落的家族成员奴隶般地从属于自己，这么一来，他们就更有势力了。

贫穷的人民增加了，社会就要更加不稳。在

这种社会情况下，僧侣冒犯禁令到群众中宣讲佛教从而取得了困苦群众的信赖的现象，在各地出现了。其中出自和泉国的行基（公元668—749年），不仅宣讲佛教的因果报应，还和追随他的群众一道修整道路、沟渠、架桥、治病，大家象救世主那样信仰他。公元717年，政府以“小僧行基乱说祸福，迷惑百姓”为名，迫害行基。但他得到群众的保护继续传教。公元730年（天平二年）秋，出现了在平城京若草山每天有几千人到上万人的群众以信奉行基所宣讲的佛教为中心举行集会的情况。第二年（731年），政府可能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正式许可行基传教。此后行基逐渐被政府所拉拢，但群众的困苦和社会不安并未获得解决。

同年，政府停止在各国征召防人。公元739年（天平十一年），还停止了征召除奥羽、九州和长门国^①以外其他各国的士兵。几年之后，又要恢复征兵，但天皇制权力的军事机构的基础由于遭受包括士兵和民众的逃亡在内的抵抗而开始

^① 长门国：今山口县，也称长州。——译者

动摇了。通过公元774年开始进行的征讨虾夷的事例明显看出不断窥伺逃亡机会、出身贫民的士兵是靠不住的。公元780年士兵改由“精于弓马者”选充，实际上废止了义务兵役制。到公元792年，除陆奥、出羽^①佐渡和九州外，其他各国的军团不再存在；826年，大宰府管内的军团也撤消了。从郡司、有官级的和富农的子弟中成立叫做“健儿”或其他名称的军队，用以代替公民的征调。这样，《律令》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不得不从征调公民改变为依靠豪族和富农了。

奈良政府的动荡和迁都平安

不论是破坏公地制而庄园制得到发展，还是士兵军团制的崩溃，都说明《律令》体制在制定《律令》成为成文法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它的性质就开始改变了。这些改变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和群众的动摇与反抗；而这些情况又成了朝廷权势之间不断进行暗斗、策划

① 出羽：今山形、秋田二县，也称羽州。——译者

阴谋和公然叛乱的条件。而后世称赞为天下太平、灿烂的古代文化黄金时代的天平时期（公元729—749年），就是从藤原氏用阴谋消灭了左大臣长屋王这一事件开始的。

大化革新的功臣中臣镰足接受藤原姓，这是藤原氏的始祖。镰足之子不比等是草拟《大宝律令》的负责人，官至右大臣，成为《律令》制官僚贵族势力的代表。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公元701—760年），曾是圣武天皇的夫人^①。不比等死后，其子武智麿等人策谋光明子登皇后位。对于此事，长屋王认为，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充任皇后的不成文法仍须遵守，于是武智麿诬陷长屋王策谋叛乱而加以消灭，此后光明子立即成为皇后。

十二年后的740年（天平十二年），大宰府的

^① 天皇的妻妾分有后（一人）、妃（二人，也称中宫）、夫人（三人，也称女御）、嫔（四人，也称更衣）等四级身分，臣下的女儿不能充当后、妃，这是一贯的不成文法。光明子从夫人成为皇后，这在当时来说，是比现代不是出身旧华族的富豪女儿成了皇太子妃还要使人更为吃惊的事件。这件事意味着皇室向藤原氏等由于《律令》官僚制而成为有力的新贵族低头。——译者

高官藤原广嗣举行叛乱。当时橘诸兄掌握政权，藤原广嗣把天灾地变、人民受苦指为橘诸兄等人的责任，以清除这些人作为口实而举行叛变。朝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镇压下去。但此后政局却更加不稳，京城迁来迁去。朝廷为了用佛陀的威力平靖这种社会的不安和政局的动荡而建造大佛，但无效果。

公元756年，女帝孝谦天皇宠信的藤原仲饔搞垮橘诸兄，第二年又改立居于王爵的本族人为皇太子。橘诸兄的儿子奈良饔以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不满造成社会不安为可乘良机，策划了大规模的叛乱，企图搞垮仲饔一派，并撤换天皇，但事未果即遭逮捕，被处死刑。朝廷深感此际有争取民心的必要，乃召集畿内各国的郡司和里长，揭发奈良饔的阴谋，取得他们的忠诚。朝廷召集郡司和里长，这是一向没有过的。而且把杂徭减半为三十天以内，免除当年的调、庸，完全免除旧有的公私出举（出举是贷粮、贷款——译者）的利息。这就是说，人民的反抗，乘有权势者争权夺势的机会，赢得了负担的大幅度减轻。

不久，女帝的宠爱由仲饔转移到连出身也不

明的河内国僧人道镜。遭遇冷落的仲饬于公元764年举行叛乱，但立即被镇压。在这以前根据仲饬的希望、受孝谦天皇禅让的淳仁天皇（仲饬的亲戚）也被废黜，流放到淡路岛，孝谦再次登上皇位（称德天皇）。在他的下面，道镜当上了太政大臣，当上了“法王”，而且还自称受到宇佐神宫^①的神谕，策划从女帝手中夺取皇位。把皇位转让给不是皇族的人，就是动摇以天皇为轴心而形成的贵族秩序的基础。贵族们当然一致反对，乃派和气清饬为正式使者前往宇佐，制造神谕说，皇位不能让与皇族以外的人，而使道镜下台（公元770年）。

不久称德天皇死去，藤原百川取得政权，拥立了有利于自己一派的天皇（光仁天皇），并把道镜流放到下野国^②。道镜专权时期遭到禁止的开垦，又可自由进行，以满足贵族以及地方豪族的要求，并停办上文所述的公民征兵制，改为募

① 宇佐神宫：也叫宇佐八幡宫，在大分县宇佐郡宇佐町。内祀应神天皇和神功皇后。在奈良时代最受朝廷尊重。平安时代以后，地位下降，次于伊势神宫。——译者

② 下野国：今栃木县。——译者

兵制。此后，贵族的争权夺势和与此关联的皇族之间围绕皇位的互相撕杀的争斗不断发生，在这中间，藤原氏的势力占有绝对优势。

藤原氏为了削弱自古以来的名门贵族大伴氏等人和寺院的力量，于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延历三年）从奈良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西郊），接着在现在京都筹建一个形式和平城京相同、而规模却大于平城京的新京城，名叫平安京。在尚未竣工的公元794年（延历十三年）就迁都于此。从此约四百年间，平安京是贵族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叫这一时期为平安时代。虽然京城有了变迁，但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并无变化。从所谓奈良时代即八世纪后期，到所谓平安时代前期即十世纪中叶为止的一百八十年间，是一个《律令》的公地公民制瓦解，政治结构改变面貌的过渡时期。

班田制的崩溃和庄园制的发展

中央贵族和寺院的庄园以及地方豪族和有力人物的私有土地，在九世纪以后更为剧增。这类

土地不仅是开垦田，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周围公民的口分田也收归私有。天皇从他所处的地位来说，固然没有独自的私有土地——这是因为天皇被认为是整个国土和全部人民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切私有阶级的综合的象征，是国家的“整体”，所以不能成为“部分”的所有者——但不仅皇后和皇族拥有领地，而且当天皇退位成为上皇^①（日本称太上天皇）时，也就有了自己的领地。

这种皇室领地，由天皇的命令而设立的称为“敕旨田”。从九世纪初开始设立了大量敕旨田，利用公民的徭役劳动进行耕种，作为不向政府交纳田地租税的无税地。后来到九世纪末叶，贵族和寺院的庄园领主也效仿敕旨田，取得了不交租税的特权。由于政府是由贵族所组成的，所以其中有势力的人当然可以随意让自己的庄园成为不交租税的土地。

^① 天皇以疾病或年老等等不胜政务为理由而退位，称为太上天皇，以现任天皇的保护人的形式参与政治，这是由持统天皇退位成为上皇，成为文武天皇保护人的时候开始的。这样的君主制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是日本独特的制度。——译者

早期，开垦与经营庄园需要有当地郡司以及豪族的协助。庄园的劳动力只靠领主由中央带来的奴婢是不够的，所以要借郡司和豪族的势力动员附近的农民或者收用逃亡的农民。这些郡司和豪族往往成为庄园的“庄长”，负责经营。寄居在庄园的逃亡农民之所以能够免除政府的课役，是由于有权追捕逃亡者的郡司们当了庄长的缘故。

庄园的一部分，由领主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叫做“佃”，让一向归领主所有的奴婢和寄居者（这也被奴隶化了）进行耕种。其余部分交由附近的农民租种。

公地公民制的原则不复存在，出现了私有庄园，那么，高官的位田、职田和功田就等于是他们的私有地，封户就成为他们的私民了。他们有时把良田作为位田、职田和功田，有时却称良田为荒地，而使之成为敕旨田。因此，作为口分田分给公民的就多半是贫瘠的土地。公民不是怠工就是放弃。因而口分田的荒废成为普遍现象。而公民不缴庸、调，或者只缴粗劣的物品。郡司等人对于公民这样的反抗不一定进行取缔，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驱使公民为他们开垦私有土地

的缘故。

这么一来，实行班田制的土地就不足了，而征课庸、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政府于是从九世纪中叶开始，把一部分仿效庄园的“佃”的直营田地一类的土地，强制征用公民进行耕种，给予食粮和少量的工资，免除庸、调（公民仍须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并须交纳税赋）。并于公元864年将全国的杂役减为每年二十天，但提高了田地租税的比率。这些情况表明，政府把掠夺公民的重点从庸、调劳役转向租税，从和土地占有多少无关的掠夺人身劳动力的方式开始转向以耕种土地为媒介的剥削方式。

这样，班田制就逐渐难于实行。到九世纪，班田就已经很少实行，十世纪初叶902年（延喜二年），政府尽其全力策划全国实行班田制，但未成功，班田制到此最后绝迹。

公领、庄园和名主

国家不再象以前那样编制公民的户籍，按人掠夺，而是编造土地册，登记土地课役负担人的

名字，向这些人征收租税和其他物品税以及徭役。从公民方面来说，这是加强了他们对于用其名字登记的土地占有权。这种权力叫作“名”，拥有这种名的是“名主”，这种土地是“名田”。当然，这不是根据法律一下子办理的，而是按照国，按照地区，既有时间的不同，也有方式的不同，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逐渐向这个方向转变的。把名田作为课税的依据一事，开始见于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史料。

公家领地的名主在和国家的关系上，已经不象公地公民制度下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他们已经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近似封建领主和农奴性质的农民。但是，在名主中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有的是兼并垦田以及没落公民的土地，因而拥有面积几町步^①或者十几町步以上的耕地，使用称作“下人”的家庭奴隶进行经营的奴隶主；也有的几乎仅仅依靠夫妻子女少数的家族成员耕种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处于中间的人们；这样，不能一概称他们为领主（即国家）的农奴。

^① 町步：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18公亩，9918平方米。——译者

到班田制消灭的时候，庄园的结构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领主的奴隶制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佃），在其初期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二成，十世纪以后，急剧减少，几乎全部都成为出租的土地。这种租种者叫tato（写作田堵和田刀等字），tato的耕作权限很大，在这里也出现了“名”、“名主”和“名田”。不能适应这种新生产方式的旧有的庄园衰落了。典型的例子是东大寺（在奈良市——译者）的庄园。东大寺于九世纪初在全国各地拥有三千四百六十町步的庄园，到十世纪只剩有二百一十二町步。庄园的名主既有和公家领地的名主一样拥有广大名田和下人（奴隶）的大名主，也有不满一町步耕地的小自耕名主。

名主阶层通过公家领地和庄园而广泛成立，这是和十至十一世纪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互为因果的。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在播种之前，先浸泡种子，从插秧、摘稻穗发展到刈割根茎、制作稻架、把收割的稻子挂在架上晒干等，改进了种稻过程各个阶段的技术；铁镐、畜力耙、镰刀、犁等铁制农具到十一世纪已普及到一般农民

(大、小名主阶层)；用牛马耕田也普及了：增加了作物的种类，茄子和瓜类的园艺作物也多起来了：插秧时的“结”(日语读作yui)^①以及其他劳动组织也发展起来了。为鼓舞插秧劳动，合拍的音乐《田乐》也好像是在这时期出现的。

农奴制的萌芽

采用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农民对生产就须更加注意，更加热心，特别是象插秧那样的劳动，就须格外精心对待。这在用征役劳动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的。耕种者的独立自主性多了，他们才采取铁制农具和改良技术，以提高生产力；而这种精细的劳动反过来又加强了土地和耕种者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奴婢也和土地不可分离，因而从主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独立性，而开始过着家族的生活。在这里就存在着从奴隶制转向农奴制的萌芽。

中央大贵族的庄园取得了不纳税赋的特权，

^① 结：多半是在插秧和收获时或葺盖房屋时的一种互助合作组织。——译者

开始出现了名主。与此同时，从九世纪末开始，地方豪族们不断把自己的领地形式上进献为中央贵族的庄园（属于进献土地系统的庄园），以取得不纳租税的权力，而自己却当上了当地的管理人（叫做下司、公文、地头等名称的庄官）。这种接受进献的人称为“领家”。地方豪族为了免交租税仅仅依靠领家还不能保证时，就进一步做为更高一级的有势力人的领地，称这种有势力的人为“本所”。本所和领家向国司征收年贡米和庄民的徭役劳动，作为保护庄园的当地领主的代价。于是在同一土地上，就出现了名主、庄官、领家和本所等许多等级的权利者。名主方面，如前所述，既有自耕小农，也有拥有下人，经营大片土地的奴隶主，还有将其土地的一部分交给其他自耕小农的名主进行租种的。

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具有这种发展趋势的庄园经济应该叫做什么呢？本所、领家、庄官（在地方的领主）和名主的关系看来象是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但有势力的名主却如前所述乃是奴隶主，而且他们多半充当庄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从事生产的下人和他的直接剥削者名主的关系

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了。但是，名主既有自耕的，也有佃种者，在身分上不是下人，这样，奴隶制的因素和农奴制的因素就在各种程度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混合起来，因而造成庄园之间几乎各不相同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农奴制稳步地成长起来了。

武士阶级的成立

庄园虽有不缴租税的特权，但其庄民在身分上仍旧是受朝廷统治的，所以在法律上不能逃避国司的徭役。另一方面，庄园领主则用种种形式蚕食公家的领地。于是国司便不仅调查庄园的土地和庄民，收回原属公家领地的土地，而且还以各种理由把庄园土地划为公家领土，并向庄民征课劳役。身为庄官的当地领主和庄民对此进行反抗。两方面的对立，从十世纪中叶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当时郡司（地方领主阶层的代表）指挥“百姓”（名主），率领他们袭击国司的衙署和馆邸的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反抗中最为有名的是，从公元987年开始，经过三年，尾张的郡司

和百姓列举国守藤原元命的压迫与剥削的罪状，向朝廷控诉，最后取得了胜利的事件。

通过国司和当地领主、名主的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当地领主依靠具有任免国司权力的中央领家或者本所，而获得了国司权力不得进入庄园、即国司不向庄民课役的所谓“不入”的特权。这么一来，这种庄园也就变成在政治上也脱离中央政府统治的半独立的形式。但这种分化独立，却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大员的保障，这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庄园的实际生产组织和管理者、农民的实际统治者——庄官和名主阶层的独立性有所发展，贵族阶级衰落下去的时候，才能获得解决。

强大的庄官和名主为了反抗国衙（国司的官衙）或为了互相争夺权势和领地，都把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让其统治下的农民（自耕名主和下人等）武装起来，组成叫做“郎党”（也写作郎等）的部下。他们开始成为一个地区，不久就成为一个地方的领主。

武士不仅在庄园出现，而且在公家领地（国衙领地）也出现了。民间的庄园，成为对国司不

纳税、不准权力进入的土地，脱离政府统治而独立；同时，剩下的公家领地也变成了把中央政府作为本所，把国衙作为当地的征税机构，而进行剥夺领内名主的一种庄园。国司已经不是整个该国的行政官，而实际是称为国衙领地的庄园的当地庄官。而国守等大员则叫做“遥任”，他们不到当地，身在京城，成为掠夺他们所属国收入的人。国衙的实际业务是由当地豪族出身的官员，以及虽然是京城的贵族，但因门第低下而失掉发展的希望，所以当上了中、下级的国司而留在任地的官员所担任。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的作用，在本质上变得和民间的庄官一样，他们也走向了庄官领主化和武士化同样的道路。而且他们的领地比民间庄官领主为大，并拥有国司的权威，所以在武士团中最为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平氏和源氏都是这种人物。

平氏是从桓武天皇的后裔高望王，于公元889年接受平姓（桓武平氏），充任上总^①介（介是国司的二等官）开始留在任地之后，他的

① 上总：今千叶县。——译者

子孙一族才在关东地方作为武士而得势。源这个姓，虽然授给过几个天皇的后代，但从清和天皇的后裔源满仲于十世纪后期充任摄津守以后，他的子孙一族在近畿作为武士团才有了势力。到十一世纪的前期，源氏势力达到关东，连平氏都受他们的统辖；但在当时，以伊势为据点的平氏（伊势平氏）却在近畿及其以西地方成为有力的一族（后文叙述）。

六 贵族政治及其文化

——从国家主义到贵族主义

将门和纯友之乱

随着公地公民制瓦解、庄园制发展，古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迁都平安时，朝廷的军事力量已开始下降，到九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地方群盗横行，到十世纪中叶，西海^①发生了藤原纯友之乱，东国发生了平将门之乱。

藤原纯友是伊预国^②的椽（三等官），居住在地方，成了当地土豪的首领。公元936年（承平六年）以船只千余艘举行叛乱；袭击国衙，夺取公物和私财，甚至一度闯入大宰府。公元941

① 西海：有十二国，包括今九州等地区。——译者

② 伊预国：今爱媛县。——译者

年（天庆四年）被朝廷的追捕使所捕杀。

平将门属于桓武平氏一族，由于领地和其他问题长期和同族以及其他豪族发生武装争斗，因为中央政府介入争斗，所以于公元939年（天庆二年）11月公然举行叛乱，一时曾占领了常陆的中心城市，在下总^①建立了根据地，自称新皇，在邻近地区颇为得势，但三个月后，为宿敌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等人的军队所灭。

藤原纯友和平将门都是以后进地区、落后社会为基础的，并不是新兴的名主阶层的势力，所以有他们的弱点。但因东西两方同时发生大规模叛乱，使得中央政府不易平定。尤其是将门之乱，并不是依靠朝廷的力量，而是由同将门一样的地方豪族的武力来镇压的，这就充分表示了古代天皇制的衰退。

藤原氏的专制和丧失政权

在这时候，京城贵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权势之

^① 下总：今千叶县北部和茨城县南部。——译者

争，他们不象奈良朝贵族那样自己拥有策谋叛乱的武力或同地方豪族的联合，而是专门在宫廷内部反复策划阴谋。在这一过程中，藤原氏一门四个家系中的北家牢固地伸张了实力。藤原良房在公元858年（天安二年）因他的外孙清和天皇九岁登基而由他摄政。不是皇族而摄政，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后，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充任阳成天皇的摄政，等到天皇年长成人，便新设实际上具有摄政一样权力的称为“关白”的官位，并由基经自己充任。

但是，藤原氏北家的专制政权并不是稳定的。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不再设置关白，重用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以抵制藤原氏。下代的醍醐天皇也不设置关白，力求恢复和依靠《律令》政治。而此后的朱雀和村上两代天皇也继续努力恢复《律令》制。因此，宫廷御用的历史家采取醍醐天皇时期的年号“延喜”（公元901—922年）和村上天皇时期的年号“天历”（公元947—956年），称颂这一时期的政治为“延喜天历之治”，然而纯友和将门之乱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最好地说明了古代天皇制是不能

恢复的了。公元894年（宽平六年）。根据菅原道真的意见，以航海牺牲过多和唐朝动乱为理由，永久停止了过去往来不绝的遣唐使。这表示不论藤原氏和反藤原氏——凡是贵族，都已失掉了象他们祖先在八世纪那样惊人的冒险和摄取海外文化的魄力。

藤原氏北家虽说一时未就任摄政、关白的职务，但依然占据着朝廷最高的官位。醍醐天皇的左大臣藤原时平实现了把右大臣菅原道真排挤到大宰府的阴谋，然后藤原氏把政敌一一搞垮。公元969年（安和二年），冷泉天皇的摄政藤原实赖迫使左大臣源高明失势，从此，藤原氏北家的专制已经非常稳固。后来大约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藤原氏一族的族长，大半都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天皇的后妃，天皇年幼时，自己充任摄政，天皇长大就改任关白，掌握国政的实权——藤原氏管理家政的办公厅，成了国家的实际的政府，朝廷成为礼仪的场所。这样，摄政、关白家把持了朝廷的最高官位，同时也就有了莫大的收入，加以接受全国地方领主捐献的广大庄园，因而得到了极高的荣华。十一世纪藤原道长(966—1027年)

及其子藤原赖通（公元992—1074年）时代，是藤原氏的全盛时期。

但是，这种摄政、关白“政治”，不过是照例举办宫廷每个节令的仪式（年节行事）和不断地策划宫廷的阴谋以及暗斗之类的事情。他们权势之争主要是为了更多接受庄园的捐献、更多分得公家领地的收入，以满足自己更多的富贵荣华而已。至于国家大事乃至公共事业，天皇、摄政和关白，以及其他贵族，都是完全不关心的。例如藤原道长时代，1019年（宽仁三年），在西伯利亚滨海州地方的女真族的一个支派刀伊人来袭北九州时，是由该地武士们击退的，而藤原道长等人却没有关心此事，也未感到有什么责任。

和中央政府完全丧失政权一样，地方也不存在贵族的政权。国司的“遥任”已如前所述。到摄政关白政权时代出现了叫作“知行国”的制度，即皇族和高级贵族按一定年限由特定国取得收入。取得知行国的贵族都派自己的心腹部下充任该国的国司，以剥削该国管内的人民。有时甚至有委任伪造的什么“和歌浦波”，什么“敷岛大和”之类愚弄人们的虚构人物为国司的例子。

就是这样，国司已经不是称呼表示本来任务的官职名称，而是单纯称呼“受领”，即领取该国收入者的名称了。

以摄政关白家为首的贵族们成为地道的社会寄生虫，用其吮吸的财富营建豪华的邸宅和兼作别墅的壮丽的寺院，朝夕迷恋于游宴和行乐。他们并不亲自推动新的生产关系，也不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和武力，所以他们的荣华基础是不稳定的。而领主和名主阶级虽然在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实际上直接统治着群众，但他们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广泛地坚强地结合起来，而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域、孤立分散地存在着的情况下，维持着天皇和贵族们的财富和权势。

源氏和平氏的登台与僧兵

但历史是前进不已的。在藤源氏全盛的十一世纪前半期，尾张、近江、丹波^①、但马^②、河内等地的“百姓”（即名主）们并不象以前那样

① 丹波：今京都府和兵库县的一部。——译者

② 但马：今兵库县北部。——译者

受郡司的统率，而是依靠本身的力量团结起来和国司进行斗争，向中央政府“强诉”^①、反抗庄园领主增收年贡。这样的事有许多被流传下来。这意味着他们已开始认识到本身具有的力量。这样，源氏和平氏这样的首领们就把这些百姓组织成武士团，用以伸张其势力，他们本人就成为“武家的台柱”。

平将门之乱以后，平氏在东国的势力削弱了，源氏得到了扩展。尤其是从公元1051年到1062年，源赖义镇压了奥羽豪族安倍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继于1083年到1087年，源赖义之子义家（八幡太郎）又灭了奥羽的清原氏（后三年之役）。他们的兵力是由所辖领地以及依赖他们的名主出身的武士组成的。在这两次战役之后，源氏在东国的权威提高，各国的名主和领主将土地献给源义家受其保护的多了起来。另一方面，以伊贺和伊势地方为据点的平氏一派也逐步把近畿直到西国^②的武士纳入其势力范围。

① 强诉：也写嗷诉，指佛教信徒利用神威向朝廷、幕府申诉主张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始于平安中期，到江户幕府也把一般农民起义称为“强诉”。——译者

② 西国：指现在日本中部和四国一带地方。——译者

各阶级和个人的实力开始发挥作用。由于社会最下层依靠武力的倾向，逐渐波及到上层，以奈良（南都）的兴福寺和俯瞰京都的比睿山（北岭）延历寺为首，这些南都北岭的大寺院，为了压制它的庄园的百姓们的反抗，或者为了对抗国衙，从十世纪的后半叶起也开始成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僧兵”。京都的贵族们也不能仅仅依靠门阀或官职的权威而高枕无忧了。因为他们派去接受领地而遭到地方领主和名主阶级反抗的受领（即国司的别名——译者）阶层，对坐享庄园的本所的利益而游手好闲却又勒索他们的那些专心追求荣华的摄政关白，变得不驯顺了。

院政和保元、平治之乱

对摄政关白家不幸的，是特地把本家的女儿送当后妃，但却连续不生男孩。于是公元1068年，和藤原氏全无外戚关系的皇子却继承了皇位（后三条天皇）。乘此机会，以接受领地的国司阶层为核心的反对摄关家的势力就集结到天皇身边，策谋整顿摄关家的经济基础——庄园。但处

于天皇的地位，办事必须经过关白以及大臣（即摄关家）的讨论，所以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下一代白河天皇（公元1053—1129年）在位十三年多，让位而成为上皇（让位后的天皇——译者）后，就在其宫殿（院）设立“院厅”（院的办公机构），派心腹贵族（主要是来自接受领地的贵族阶层）充任官员，开始了所谓院政。这种院政达四十四年之久。

白河院政虽然压制了摄关家，但其“政治”的实际情况却和摄关“政治”毫无差别。他们以整顿文卷不齐的庄园为借口，夺取了自己一派以外的庄园；滥设知行国，由白河院及近臣占有这项收入；营建豪华的离宫，一味骄奢淫逸。尤其是白河院迷恋于佛教迷信，陆续营建壮丽的寺院，塑造大佛，多次参拜纪州的高野山（金刚峰寺）和熊野神宫，而且还禁止杀伤一切生物，犯者无赦，判处死刑。渔夫和猎户因此被剥夺了生活之路，人们吃不到鱼，国内怨声载道。

白河院之后，在鸟羽、崇德、后白河三代上皇时期，院政已成惯例。其间皇室、摄关家、贵族以及南都北岭大寺院之间复杂的势力之争愈益

严重。摄关家从其全盛时期开始，就把源氏的武士团作为“侍”（意为身边用人）而加以利用。而白河院政把平氏的武士团放在该院的御所（宫殿——译者）朝北的地方，将其作为自己的武力（称为北面的武士）。大寺社的僧兵到院政时期也更为强大了，他们不断向白河院强诉，要求国司不要侵占自己的庄园。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团起初甘心受摄关家和白河院的利用，但等到武力有了相当发展时，他们就谋求适合自己实力的地位了。

公元1156年（保元一年），鸟羽上皇及其次男后白河天皇一派和崇德上皇（鸟羽的长男）的对立，这同关白藤原忠通及其弟左大臣藤原赖长的对立相互纠缠在一起，以鸟羽上皇之死为机会，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一派用源为义、源为朝父子及平忠正等人的兵力袭击了天皇和关白。天皇动员了源义朝（源为义之子）和平清盛（平忠正之甥；公元1118—1181年）的兵力。战斗仅仅经过一天，天皇取得了胜利，崇德上皇被流放于赞岐，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和平忠正都被他们的儿子与外甥所杀死（保元之乱）。

在皇室、摄关家和武将父子弟兄互相杀害的权势之争中，天皇方面虽然获胜，但与其说是天皇和关白的胜利，不如说是武士阶级对于皇族贵族阶级胜利的第一步。此后，平清盛受后白河院重用，急剧扩大了势力。源义朝对此屡表不满，公元1159年（平治一年），乘平清盛朝拜熊野神宫的机会而举兵，囚禁了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政变眼看就要成功时，平清盛闻讯回京，立即扭转了局势，源义朝方面彻底崩溃（平治之乱）。义朝本人逃往东国，中途在尾张国被谋杀，其子源赖朝（十三岁）也同时险遭杀害，由于平清盛继母的说情才救了他一命，被流放到伊豆。而源赖朝的异母弟牛若（后来的源义经）也在京城和母亲常盘一起被捕，由于是未满周岁的乳婴，免遭处死，而被安置在鞍马寺。

源氏的势力这时遭到了很大挫折，出现了平氏的全盛时期。在平治之乱后仅仅经过八年，即从公元1167年起，平清盛当上了太政大臣，他们一族都作了高官，平氏取代藤原氏而掌握了京都朝廷的大权。古代天皇制的没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平安文化的特征(一)

——从国家主义走向贵族主义

古代天皇制衰败、中国文化不再传入、在地方的武士和地主阶级发展起来的四个世纪期间，文化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从天皇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向贵族主义的变化。第二是从唐式舶来的文化向所谓“国风”文化的演变。第三是地方武士和地主文化的萌芽。

最能说明从天皇主义向贵族主义这一变化的是佛教。佛教从平安朝初期即九世纪初，由到唐朝留学的最澄（传教大师，公元767—822年）和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74—835年），开创了天台宗和真言宗两个宗派。他们都受朝廷多方保护，最大的使命是镇卫国家。这与奈良的佛教相同，但却不象奈良佛教那样直接和政治有关。奈良朝以前的寺院都是建筑在宫廷或各地方首府附近，而以最澄建立的比睿山延历寺和空海所建的高野山金刚峰寺为首的两派的大寺院，大部分都

是建立在远离乡间的深山，这也表示了他们和政治不是直接有关的。

真言宗从一开始就是以奇异的咒术和祷告为特点的“密教”，天台宗起初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不久也有了密教的性质。它的咒术和祷告虽然也为了镇卫国家，但不如说多半是为了贵族个人治病和免灾而受到贵族们的信仰。这里可以看出从以前的国家佛教向贵族佛教的转变。而且这两个宗派开始成立了作为教团的小宗派，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所属的寺院。也就是佛教文化向地方的普及。

由《律令》规定的公地公民制瓦解了，地方的豪族和群众开始公然反抗国司的十世纪中叶，发生了劝人厌弃污浊的现世（厌离秽土）、一心念佛、求得阿弥陀如来的保佑、死后登极乐净土（欣求净土）的净土信仰。这是由称为沙弥^①以及圣人^②等与国家无关的民间传教者所进行的，

① 沙弥：梵语意为息恶行慈，指男子出家受戒的人；日本指剃发修行，但娶有妻子者。——译者

② 圣人：梵语阿离野，凡夫的对称；日本指道行很高的人，意思和汉语的“上人”一样。——译者

所以他们的活动随着国家对佛教统制和管理的削弱而大为兴盛。空也（公元903—972年）在京都的街头宣讲他们的信仰，吸引了大批的人们。延历寺惠心（公元942—1017年）的著作《往生要集》（公元985年），系统地叙述了这种教义。于是在日本社会，开始产生了宣讲超越阶级和身分、并和国家毫无关系的依靠个人信仰而得到保佑的佛教。

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受到逐步没落的中、下级贵族的欢迎。从摄关政治到院政时代，这种信仰虽然也流行在最上层的贵族之中，但他们却把这种思想做为手段：既能安于现世，又能享受极乐净土的好处。如同藤原道长的法成寺以及藤原赖通的平等院（凤凰堂）那样，他们建立华丽的阿弥陀堂，并用以为别墅，在堂内安置金光闪闪的阿弥陀如来佛象，在周围的墙壁和门户上描绘极乐世界的风光，在这里燃起香火，坐着美貌柔音的僧人，在钟磬和木鱼的伴奏下，象唱歌一样地合念经文。这与其说是信仰的法会，不如说是盛大的快活的演出。但是，在这种盛大场面的背后，不分上层与下层，整个贵族

阶级没落的命运却悄悄地来临了。在意识到没落命运的贵族之间传播了这种的末世思想：佛陀死后，经过一定年代就是“末法”之世（末世），世道混乱，人心险恶，世界的末日将要来临。

平安文化的特征（二）

——由唐式转向国风

净土信仰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佛教，而是产生于日本社会的，所以这是表示了从唐式舶来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见于本地垂迹说（神佛融合）。日本的神，据说是称作万物的根本（绝对者、本质）的佛身，临凡日本（临时现形）的现象。奈良时代就有这种思想和信仰，认为神是接受佛的功德而获得威力的。这种思想和信仰到平安初期，演变为这样的说法，即神依靠佛法而开悟，而成为菩萨（成佛以前的阶段）；也发生了把八幡神称为八幡大菩萨等等情况。到平安中期则认为神是佛的化身，神佛原本一体云云。在这方面，外来的佛教把日本固有的神的信仰包括进去，一方面降低佛教本身，一方面日本

化了。

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在文学方面表现得也最为明显。在九世纪中叶以前，汉诗和汉文继前代之后大量问世。在此以后，贵族社会把汉文学知识的丰富程度作为测量他们教养的尺度。但是，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就整个日本历史来说，平安贵族社会（也包括僧侣）完成的最大的贡献是让万叶假名更加飞跃地发展，创造了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和采取楷书汉字笔划的“片假名”。到九世纪中叶，片假名已经完成，这是明显的。当时平假名大概也已完成，但因原来依据的汉字不同，而出现几种不同的字体。

在向日本传布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当过老师的朝鲜人，十五世纪创造了该民族的标音文字“谚文”。满洲契丹族和古代日本一样，受到唐帝国的巨大影响，后来乘唐代衰败而成立了强大的辽王朝，他们创造文字是在十世纪的前期。日本假名文字的创造，比他们都早。在中国周围各民族中，西北方的维吾尔族虽然很早就有了民族文字（最迟也在八世纪），但其文化不属于古代中国文化

范围。所以在古代中国文化范围中，可以说日本是首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未被其他民族侵略的地理条件，因而有可能连续继承和积累文化。

假名文字在平安朝并未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必须使用的文字。他们不仅在公文中，就是私人日记也是用汉文或者以汉文文体为基础，只用汉字来写作。但对日本人来说，最为宝贵的是能够把日本语原原本本地用文字写出，这是非常明显的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写日本诗歌，供人阅读，就没有胜过假名的了。而且当时贵族的恋爱，少不了诗歌的应酬，这样，假名文字就逐渐盛行，和歌推广了，日本文体发达了。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和歌博得了贵族的爱好，这种爱好胜过了汉诗和汉文。结果是，公元905年纪贯之（公元？—946年）奉醍醐天皇之命编辑了《古今和歌集》。

在散文方面，日本文体也从这时开始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以在原业平（公元825—880年）的诗歌为核心，把在这些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以及情节的故事加以系统化的《伊势物

语》^①和以民间故事为基础的传奇文学《竹取物语》，都是在《古今集》出版前后由无名作家写出来的。这是叫作“物语”的一种文学体裁(genre)的开始。身为国守的纪贯之在从任所土佐国^②回京城时，以女作者的名义，用假名文字和日本文体写作了《土佐日记》(公元935年)。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日本文体的优美和丰富的表达能力。

标志贵族文学发展到全盛时期，是以十一世纪中叶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时代紫式部(公元978—1016年?)所写的《源氏物语》为高峰的女性文学家们的作品。在《源氏物语》五十四帖(卷一——译者)的长篇著作中，用富有余情的独擅的优美文章，描绘了以贵族各阶层男女恋爱为中心的各种生活和心里状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类的敏锐的观察。与紫式部同时代的清少纳言(生卒年月不详)的随笔《枕草子》就其文学和思想的高度来说，比不上《源氏物语》，但却简洁地表现了对于有关宫廷内外生活和自然的

① 物语：本意为谈话、讲话，引伸为故事、传说、传奇的意思，进一步成为散文作品、小说的一种体裁。——译者

② 土佐国：今高知县。——译者

富有才华的观察，所以是日本文学上随笔体裁的开端。

和歌方面，在《古今集》问世以后，还继续选辑了敕选歌集。在《古今集》中已经明确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这些诗歌追求理智的技巧以及留意词藻的越来越多，而缺乏诗的感兴。其中，大体上和紫式部、清少纳言同时期的女官和泉式部充满奔放情欲的自白的歌集和日记，大放异彩。

在紫式部的日记中，有些地方鲜明地描绘了宫廷女官的个性。藤原兼家之妻的《蜻蛉日记》（公元974年前后写成）描述了一夫多妻贵族社会妇女的痛苦。在这时期开始了对于个性和个人的内心进行文学的探索。

“国风”文化和“国民”文化

全盛期的贵族文学，不论其地点或人物，都是描绘京城及其周围的贵族。在《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主人公幽居在须磨的场面，但也不是具体描述该地自然之美，至于对当地的群众，连仅

仅作为配角的描述都没有。他们的文学不论在地域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封闭在狭隘的世界里，这使得《源氏物语》五十四帖的长篇著作也很少变化，也相当无味。《古今集》以下的诗歌作家只是局限于皇族和贵族，诗歌不过是按照一定框框而加以分类。而且在这些文学里，天皇已不再是现人神，也不再是绝对的权力者，而只是贵族中的一个魁首。这是在前述文学作品中反映了按《律令》规定的神权的天皇制已经变为摄关政治，而这种“政治”也如前所述，实际上意味着完全丧失了政治作用，而贵族在京城最为关心的是享乐，这是他们唯一的生活。

这种文学的顶峰之所以是由妇女们所创造的，乃是由于在上述的贵族社会里，完全接受优美生活的教育的妇女，比起男性更具有很好反映时代文学要求的条件而已。紫氏部等人赋有丰富的才能，但由于身为妇女，既无社会地位，又无荣升的条件，而且出身于中级和下级的门第，也根本不可能当上后妃。她们是一夫多妻制的牺牲者，是贵族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于是他们在对社会和人类的观察中开展了眼界，而把才能和热情集中

到文学方面。当时，一般认为男子不应该使用假名文字，而妇女们却没有必要拘泥于这种故弄玄虚，所以能够用假名文字自由自在地写出所思所感，这也是妇女能够达到贵族文学顶峰的重要条件。

随着神权的天皇制向摄关政治和院政的演变，在《日本书纪》以后，朝廷对所谓正史的编纂，于十世纪初叶，以《三代实录》为最后一部书而停止下来，历史著作就成为个人关心的工作。而到摄关家全盛期即将结束的十一世纪中叶，据推测身为女官的著者，初次写出了假名文字日本文体的历史《荣华物语》。她用编年体书写了《三代实录》所载以后的、从宇多天皇开始到堀川天皇共十五代约二百年的历史，主要部分是用来歌颂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的荣华。此后，在院政时期出现了《大镜》。它企图叙述藤原道长的一代，从藤原氏开始繁盛的文德天皇时代写起，止于藤原道长的全盛时期。它创造了用四个人物对话来进行叙述的独特的优美的形式，从各种角度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全面的探索。不仅对藤原道长有所赞颂，而且多少也有批判，所以做为历史著

作或文学著作，都比《荣华物语》更为优秀。不过这部书对于平安宫廷及其贵族以外的社会也全未涉及。对地方的骚乱和勃兴起来的武士阶级只字未提。平安贵族的文化不是来自外国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确是“国风”的文化；但这种国风，除了使用的文字以外，却是完全脱离国民大众的贵族社会的文化，并不是国民文化。

平安文化的特征(三)

——群众文化的萌芽

地方的领主以及名主和武士阶级，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这种生活也反映到贵族文化作品中。在十世纪中叶将门之乱刚刚发生之后，用日本风格的汉文写出了叙述其原委的《将门记》。著者可能是东国的无名僧人。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前九年之役”，似由一个京城的受领阶层的官员仿效《将门记》的体裁，根据来自国衙的报告以及“众人的传说”，写了《陆奥话记》。较此稍晚一些，在院政初期写成的《今昔物语集》里，搜集了大

批同末世思想完全相反的生动地描绘地方领主、自耕农民以及下人的男女充满朝气的生活的传说故事。由于已经是摄关家和院政都必须依赖武士阶级实力的时代，所以在京城的贵族不管愿意与否，都对这样的传说故事寄予了关心。

美术也同佛教和文学一样，表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的三大特征。平安初期的美术，继承前代，专门是佛教美术，反映佛教的日本风格化，在密教的不动明王像及其它绘画和雕刻中，表现了不同于模仿唐式的独创的要素。平安中期以后，根据贵族的净土信仰，大量摹画了极乐世界的绘画和塑造了阿弥陀像。安置这种绘画和佛像的寺院都采取贵族邸宅的样式，与其说是追求庄严与威武，不如说是追求温柔美观。塑造平等院阿弥陀像的定朝（公元？—1057年），是当时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雕刻家。

从十世纪后半叶开始，贵族的邸宅都用长廊把主屋的寝殿（正殿——译者）和东西的对屋（厢房——译者）、钓殿（水阁——译者）连接起来，在这些房屋的院中建造水池。这种完全脱离唐式的“寝殿造”（寝殿式建筑——译者）也发达了。这

种建筑物的内部没有间壁，如有需要，用纸糊的拉门（障子）或屏风（几帐）作为间壁。冬天大概是很冷的。根据美化这种拉门或屏风的需要，出现了贵族把常见的景物作为画材的、用朴素的笔法描绘得色彩鲜艳的装饰画。与中国式的画题和笔法的“唐画”相区别，称这种画为大和绘（日本画——译者）。而把使用这种画法将一场一场故事情节画在手卷纸上的绘画称为“绘卷物”（犹中国的画册——译者）。

现存绘卷画的最高杰作有《信贵山缘起绘卷》（十二世纪中叶的作品？）。故事情节讲的是：信浓国^①出身的贫苦高僧名叫命连，他用巨大的佛法力量惩治了贪婪的“长者”（大名主），又治好了帝王的疾病，帝王要给他高官和大庄园，都未接受，却和从故乡来看他的尼姑姐姐一道，仍旧以连更换衣服都没有的贫苦高僧身分继续修行。这个《绘卷》生动地表现了大名主、普通百姓、贵族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物和生活、生产的场面。这种洋溢着人民大众气息的主题（motif）

① 信浓国：今长野县。——译者

和力量的画法，反映了从贵族时代开始向新兴地主阶级时代过渡的社会。

这种过渡，在音乐和表演艺术方面，表现得更为清楚。平安贵族的音乐主要是把由中国传来的乐器和乐曲的管弦乐，按照他们的爱好加以修改而成的（现在宫廷的《雅乐》）。到十一世纪，民间的歌谣《催马乐》大为流行；不久又有了称为《今样》的、由白拍子（妓女）等在客席中歌唱的歌曲；而农村的《田乐》在京都大为流行，最上层的贵族甚至也有头戴《田乐》用的竹笠、行走在市街之中的。

这种现象与自由商业（虽说是局部的）的开始出现是有关联的。由于公地公民制租、庸、调的制度瓦解，地方群众的手工业产品，不是大部分归于朝廷征用（当然一部分要被国衙或者庄园的本所和领家所征用），这就产生了促进自由的社会分工的一个条件。于是十一到十二世纪，在富裕的名主阶层里面，农业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商品化部分就逐年多起来。以这种买卖为专业的行商把京城和地方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了不同于京城的统治者和地方被统治者关系的新性质的城

市和农村的来往。这又成为双方交流文化的途径。不过在十二世纪，这种交流还几乎是处于萌芽状态。

此外，天台和真言两宗的下院，本来是为中央收取地方的物质财富的，但也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和这些相比，信仰净土的沙弥以及圣人对于地方文化的贡献更为巨大。到十二世纪，在地方也建造了华丽壮大的寺院，象陆奥^①的藤原氏所建造的中尊寺，是不亚于京城的寺院的。

^① 陆奥：今青森、岩手二县地方。——译者

七 武家的“草创天下”

——六波罗政权和镰仓幕府

平氏政权的今昔

平清盛当上太政大臣取得政权，三个月后，拥立其妻妹和后白河院所生的儿子为天皇（高仓天皇），然后又让自己的女儿做了中宫。平清盛也象摄关家一样，目的要当天皇的外祖父。平清盛的经济基础，主要也是在近畿、西国的五百多个庄园和由于他作了朝廷高官而取得的三十多个知行国的收入。平清盛的官邸在京都的六波罗，所以称他的政权为六波罗政权。这个政权不论从政治的形式，或者从经济的基础来看都和摄关家以及院政的政权并无根本不同。

武士的首领，在半个世纪以前，还被贵族们看作是卑贱的乡下人，而不被当人看待，但是，

现在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这一事实本身表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平氏政权是从古代天皇制国家到中世封建国家(幕府制)过渡时期的政权。而平清盛的统治方法则是：任命当地豪族充任知行国的国司；或对一部分贵族的庄园也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地头”，让其管理。这种以武士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方向，已经有了萌芽：尤其是，平氏原来在九州地方和中国宋朝进行过贸易，而平清盛则更加积极地进行这种贸易。为了这一目的，他策划开辟音户的濑户（现在吴市和对岸音户町之间的海峡），修建摄津福原的轮田泊（现在神户港附近），想把宋朝的船只引到该处。这和朝夕从事宫廷阴谋的王朝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和积极的限度，不过如此而已。平氏一门吹嘘：“凡不属平氏一门的人，则非人”，他同在全盛期摄关家一样，沉迷于骄奢淫逸。由于平清盛已经掌握了腐败透顶的朝廷的古老机构，自己也腐败了，已经不能组成新的国家机构，所以他的没落和他的兴起是一样的迅速。以被平氏夺取了权势的后白河院为首的皇

族、贵族和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都加深了对平氏的反感。公元1177年，院政的近臣藤原成亲等人，因在京都郊外鹿谷（现在的市中）僧俊宽的山庄密谋推翻平氏而被捕，1179年后白河院因反抗平清盛而被幽禁。平清盛派三百少年为密探分布于京都市内，令他们搜捕对平氏怀有不满的人。这样反而使反对平氏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

源平的战乱

公元1180年（治承四年）4月，源赖政立后白河院的皇子以仁王，让以仁王下令各国源氏讨伐平氏，源赖政并亲自联合南都北岭的寺院共同举兵。他被平清盛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但平清盛感到地位不稳，乃于6月携年仅三岁的的外孙安德天皇迁都福原^①。因平治之乱被流放到伊豆的源氏嫡系首脑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看到这种情况，取得其妻政子之父北条时政的支援，8月在伊豆为打倒平氏而举兵。

^① 福原：今神户市兵库区、长田区一带。——译者

源赖朝虽一度在相模^①的石桥山败于平氏的大庭景亲的军队，但不久关东地方的大小武士团都纷纷投靠源赖朝，到10月富士川之战，却打败了平维盛的大军。这时候，源赖朝已经被称为“镰仓殿”^②，在镰仓成立政厅（办公处——译者），形成了以关东一带大小领主和武士做为“御家人”（家臣——译者）的地方政权，11月，为了统辖御家人而成立了“侍所”^③。

所谓御家人是指和源赖朝（以及后来的镰仓幕府）结有主从关系的武士，他们本身又拥有一族以及称为“家之子”、“郎党”、“所从”等所属武士。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很早就支持源赖朝的、下总的千叶氏和相模的三浦氏那样旧日的土豪出身、拥有广大领地和大批部下的豪族，小的有几町步的名主。他们成为御家人，侍奉镰仓殿，负有从军的义务。因此作为恩赏由镰仓殿保

① 相模：今神奈川县。——译者

② 镰仓殿：殿字意为阁下，是贵族或大官的尊称。——译者

③ 侍所：侍，意为武士、卫士；日本中古规定天皇、亲王、摄关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均得派驻武士守卫，名为侍所。这里指引用到地方的管理武士的机构名称。——译者

证他们领地的领有权，也有的根据功绩给予领地或者充任庄官而给予收入权。

听到在富士川战败的平清盛，为了挽回局势，乃回京都，首先焚毁兴福寺和东大寺，以示武威。当时在信浓的源赖朝的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已经打出北陆道^①，尾张的伯父源行家也举兵指向京都。各地与源氏无关的武士也纷纷起来，战乱波及全国。这不能只说是源氏和平氏权力之争。各国的武士乘机侵夺公领和庄园。这里带有新兴武士领主们对抗由平氏政权所代表的古代政治的即革命战争的因素。第二年，即1181年2月，平清盛病死，平氏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1183年（寿永二年），木曾义仲首先进入京都，平氏带领安德天皇逃避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出现了东西两个天皇。进入京都的木曾义仲由于从朝廷那里未能获得预想中的恩赏而不满。加以战乱和灾荒，京都食粮也不充足，所以木曾义仲的军队任意奸淫抢劫，遭到贵族和群众的憎恨。后白河院策谋木曾义仲和源赖

^① 北陆道：日本八道之一，本州中部面向日本海的地方，今福井、石川、富山、新潟四县。——译者

朝互相争斗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催促源赖朝西征。源赖朝用其弟源范赖和源义经为将领兵西上，本人却在镰仓致力于政权的巩固。公元1184年，设立了管理有关领地和年贡以及其他文件、掌管财政和庶务等等的公文所（后来的政所）和审判有关御家人领地诉讼的问注所。

另一方面，源义经等人的军队于1184年正月在近江的栗津击灭木曾义仲。源义经立即让后白河院下达追讨平氏的院令（院政的命令），经过摄津一谷和赞岐屋岛^①的会战，于1185年（文治元年）3月在长门的坛浦（下关海峡）的海战中，全歼了平氏的军队。虚岁八岁的安德天皇也携带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之中的玉器和标记皇位的宝剑（仿造“神器”的宝剑^②）而投海自杀。

源赖朝创立幕府和与朝廷的关系

木曾义仲和平氏刚刚灭亡，后白河院就想噉

① 赞岐屋岛：今香川县北部海上岛屿。——译者

② 宝剑未被发现。盛有玉器的盒子后来被发现，但尚不能确定其真伪。

使源义经和源赖朝进行争斗。本来因源义经独自接受朝廷官位而同源赖朝发生不和，后白河院就积极地利用了这点，在平家灭亡六个月后，发下院令让源义经讨伐源赖朝。后白河院是一个正象后来源赖朝评论的，是“日本最大的大天狗”那样的权术家。但这一院令使后白河院本身遭到严重失败。源义经没有支持自己的武士，他不得不立即带着武藏坊弁庆等少数追随者潜逃到奥州的大豪族藤原氏的门下。源赖朝立即派北条时政前往京都，指责后白河院，并让他发下院令追捕源义经。不仅如此，当时源赖朝还以捕捉源义经等叛逆者为借口，迫使后白河院承认源赖朝在各国设置总追捕使（后来的守护）和地头的权限。后白河院利用有势力的武家之间进行斗争、从中维持自己势力，这种谋略反而促使源赖朝的权势飞跃发展，招致了公家（和武家的称号相对的、天皇和贵族等人的总称）势力大大削弱。

每个国都都设守护，担任镇压反叛和杀人凶手，守护负有指挥御家人警备京都、守卫京城义务。由源赖朝信任的武将担任此职。地头本来是庄官的一种，但这时期的地头是设置在每个国

里，他有权向公家领地和庄园一律征集每反稻谷五升做为粮秣。在战乱已平、不再征调粮秣之后，地头在管内仍有警察权、征税权和土地管理权，并领受相当的土地做为俸禄。

设置守护和地头，虽然在法制上并不排除国司和庄园的本所、领家的权利，但镰仓殿任命的御家人却掌握了军事、警察、征税和土地管理等最重要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镰仓殿统治了全国。

继此之后，源赖朝推举亲镰仓派的公卿（三品以上的大臣等高官贵族的通称）九条兼实为摄政来改革朝廷。当时他向九条兼实说：“这次乃是草创天下”。正是在这里创立了武士阶级的国家。但它的基础仍相当不稳定，原在各国设置的地头，到第二年就已经不得不减少到只能设置在从平家没收来的领地和出现反叛的庄园里。旧有的天皇制国家仍有相当势力。权力虽由公（皇族、贵族、寺院等——译者）武（武家——译者）两者所分占，但却草创了武家独自の政权，这和平清盛只是遵循旧有的天皇制机构，有着明显的本质上的不同，这个政权就是镰仓幕

府^①。

幕府逐步统治了全国。在打倒平氏那年的年底，源赖朝以搜捕其余党为借口，设置了九州诸国总追捕使（后来的镇西奉行），到公元1189年，令奥羽的藤原泰衡杀掉他窝藏的源义经，然后又消灭了藤原泰衡本人。经过十年的战乱到此结束。公元1192年，后白河院死去，源赖朝当上了渴望已久的征夷大将军。

但是，镰仓幕府的基础仍然是薄弱的。幕府的经济基础只是：没收平家的庄园、“关东御领地”和源赖朝已经取得的叫做“关东御分国”的知行国，还有称为“关东御口入地”^②的幕府可

① 幕府，出自汉语，意为将军出征时的营幕。日本原本指近卫大将的住处和他本人。后来源赖朝被任为右近卫大将（后接任征夷大将军），称其镰仓的住处为幕府。由此又转为称呼以武将资格所成立的政权或政厅为幕府。但源赖朝的政权实际是成立于本书上述设置守护和地头的时候，所以镰仓幕府可以看作是这时成立的。

② 关东御口入地：“口入”是出头干涉或斡旋的意思。奈良时代已经使用这一词汇。到平安时期，多半用于领地问题上。镰仓幕府在朝廷所领庄园内设立“地头职”或“地头请所”时，称这种“口入权”为“关东御口入”，称这种土地为“关东御口入地”。——译者

以任命地头的庄园。在这一点，源赖朝的幕府也和平氏政权及其以前的贵族政权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源赖朝本人也由于他的祖先是出自天皇的源氏的嫡系“贵种”，才当上了武家的首领，所以他本身并不是领地的经营者，这一点也和平清盛没有不同之处。

由于这种弱点，连骂后白河上皇为大天狗的源赖朝也不敢忽视天皇（上皇）的地位和权威。他在讨伐木曾义仲、平氏和源义经时，也都曾请求下达院令，连设置守护和地头，也是请示朝廷取得允许的，他就是这样，利用天皇制的权威使得自己的行动有了权威并合法化。由于源赖朝处于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能彻底推翻皇室、贵族和大社寺的庄园统治，因而这些人的政权的物质基础就残存下来了。

北条氏取代源氏

源赖朝政权不同于平氏等政权，它的长处在于把实际组织生产、统治人民、拥有军事力量的领主和名主阶级组成为御家人。这个组织又在源

赖朝以非凡的统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的统治下，在长达十年的征战中，得到了锻炼。源赖朝对讨伐平氏立有大功的同胞兄弟（都是异母兄弟）源义经和源范赖，制造口实，一一加以消灭，这一方面是为了清除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抗者，另一方面，是企图以此表示即使是立有大功的骨肉、若不顺从源赖朝也是不可饶恕的，从而确立御家人在道义上对于镰仓殿的忠诚。

御家人服从了源赖朝的统制。但他一死（公元1199年），各豪族就自夸功劳而互争权势和领地。而北条时政及其子义时等人却以第二代将军源赖家之母北条政子（源赖朝之妻，北条时政之女）为靠山来压制源赖家，决定经过北条时政等十三人的共同商议来裁决御家人的诉讼。源赖家对此进行了反击，策谋削减各豪族的领地，将其分配给近臣。

从此之后，不断发生将军家族内部之争以及北条氏和其他武将的流血冲突。在这些争斗中，源赖朝兴兵以来的功臣、名将和各豪族梶原景时、比企能员、畠山重忠、和田义盛等族陆续被消灭，将军源赖家的长子一幡和源赖家本人都被

杀害，公元1203年源赖家之弟源实朝当上了第三代将军。他为了压制北条氏而接近京都朝廷，并憧憬公家文化。这件事引起了树立他的北条政子等人的不满。北条义时灭了和田氏，兼任政所别当（后来的执权）和侍所别当，掌握了幕府的全权之后，又唆使源赖家的遗子源公晓为报父仇而将源实朝杀死于鹤冈八幡宫。然后北条义时又以杀害将军的罪名而将源公晓杀死（公元1219年）。源赖朝的子孫到此完全灭亡，被敬畏为尼将军的北条政子及其生家北条氏夺取了幕府。

承久之乱

在源赖朝死后长达二十年间，幕府内部不断的对抗斗争，经常引起地方武士大大小小的叛乱，但这些叛乱比较容易地被镇压下去了。当时公家方面是后鸟羽上皇执掌院政，见到幕府的内讧和各国武士的叛乱，认为这是推翻幕府的最好机会。后鸟羽院动员南都北岭的僧兵，并把希望寄托在公家领地和庄园中不属于御家人的武士身上，进行了举兵的准备。这时源实朝已死，幕府

请求上皇之子充任将军，上皇加以拒绝，而且要求幕府不要在自己爱妾龟菊的庄园中设置幕府的地头。执权北条义时坚决地驳回了这一要求，迎接源赖朝血统的两岁的贵族之子充当了将军（公元1219年）。

后鸟羽上皇由于对其爱妾的希望未能如愿而愈益憎恨幕府，更加尽力筹备举兵，到公元1221年（承久三年），终于向各国武士下达讨伐北条义时的院令。后鸟羽当时估计院令一下，各国武士就会望风来集，在镰仓也一定会陆续出现有力的内应人物。但这不过是肤浅的对于天皇制过去权威的幻想而已。

这一时期幕府的不断内讧，并不是武家政权的削弱，而是真正使它作为领主和武士阶级的政权而得到发展的过程的表现。北条氏不象平清盛和源赖朝那样出自可以夸耀的名门，他不过是伊豆的一个小领主。他只是依靠自己的政治洞察能力和手腕，抢先参加一个流放罪人源赖朝的举兵，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现在的地位。他和关东大豪族的对立斗争，乃是封建领主的新类型和旧类型的斗争，是新类型不断获得胜利的集中表

现。因此，虽在后鸟羽院下达讨伐北条义时的院令时，北条氏方面仍然是充满着自信和勇气的。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坚决要把敌人消灭在他们的老巢。御家人们坚强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另一方面，后鸟羽院所指望的南都北岭的僧兵和不属御家人的武士，只有少量的人参加。幕府的军队，以北条义时的儿子泰时为大将，从镰仓出兵，仅仅两三天，就占领了京都，谈不到什么交战。这叫作“承久之乱”。

乱后的处理是残酷的。幕府把后鸟羽上皇流放到隐岐岛，把对举兵态度消极的顺德和土御门两个上皇，也分别流放到佐渡和土佐（后为阿波）。年仅虚岁四岁、还不懂事的仲恭天皇，也因是顺德上皇之子而被废黜，在九条殿被幽囚了一生。幕府又设立了六波罗探题，以监视皇室，同时作为三河以西的总督而由北条泰时亲自担任首任的探题。后来历代探题也都由北条氏一族担任。此后皇位的继承也要取得幕府的许可，连制定年号也必须取得幕府的同意。幕府还在全国没收了三千多处院政及其一派贵族、武士、僧侣的领地，用御家人们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这叫作新

补地头。为了区别于源赖朝以来的地头（叫作本补地头），按照庄园土地每十一町步分给一町水田，免交年贡和其他全部负担。这种“免田”，就成为地头蚕食庄园的据点。

镰仓幕府的独裁和《贞永式目》

以承久之乱为良机，幕府对一向未能染指的皇族和贵族的庄园也进行了统治。幕府压抑朝廷，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武士阶级的独裁。乱后的1224年，北条义时死去，北条泰时充任“执权”^①。在其当政十八年间，设置名叫“连署”的官员，官位仅次于执权，设置由北条氏一族以及三善和大江等实际负责政务的官僚构成的十一名“评定众”，会同执权和连署共同协商决定重要政务。镰仓幕府就是这样成为以执权为首脑，以北条氏一族为中心的封建领主的一种独裁政权。将军虽然仍由京都派任，但京都朝廷的存在，比以前，更加成为一种单纯的点缀形式。

^① 执权：犹中国的执政。——译者

在这里确立的武士阶级的国家，不久有了独自の宪法。这就是公元1232年（贞永元年）的《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五十一条。这是按照武家的“道理”、把“武家的习惯和民间的法统”成文化和系统起来的。第一条规定修缮神社，设置专管祭祀的。规定说：“神由人的虔敬而增威，人由神的恩德而走运。”说神和人（武士）处于相互有利的关系，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大概是重视以一族的氏神为中心而结合起来的“武家的习惯”吧。第二条是修缮寺塔，必须崇敬佛教和禁止贪图寺院的财物。规定说：“寺社虽异，崇敬斯同”。第三条以下，规定有关以守护和地头等御家人的身分、任务、权限、所有领地的继承、转让和其他事宜等为中心的行政和民事、刑事诉讼等。

在《式目》中，有严格地告诫近年来守护、地头侵犯国司和本所、领家的权限，并与之对抗或扣留年贡等情况的条款。这说明承久乱后，守护和地头侵吞公家领地和庄园的事情增多了，而幕府采取了维护公家利益的方针。幕府在承久乱后的处理上虽然那样毫不宽恕地惩治了天皇等，

但仍不能否定公家存在这一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其理由是：第一，由于幕府本身在经济方面和公家一样，仍然依靠庄园制，所以御家人侵犯本所和领家的利益，对于幕府也是不利的。第二，为了统一拥有独自的领地以割据分散为本性的领主阶级，恰如《式目》第一条规定的崇敬神社一事所示，认为必需有加强统一者权力的精神权威；而作为这种权威，必须利用皇室这样的权威——因为武家也信仰皇室是各种神中的大神即天照大神的子孙，皇室在这一国家中有史以来就占据世袭的最高君主的地位。第三，为了巩固北条氏的地位，必须确立上下级的身分秩序。守护和地头对抗上级身分的本所和领家的这种思想，恐怕也将会成为反抗执权的东西。这是不能许可的。正是由于上述理由，在承久乱后，北条氏虽说是把将军作为点缀，但仍迎接皇族（或摄关家）为将军；而他本身却不充当将军。

此外，《式目》还承认了曾在《律令》中完全不予承认的权利，如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有继承和接受领地成为御家人的权利，夫死后母亲对于子女有亲长权等，这也是《式目》的特征。不过这

是对《律令》而言的。在武家政权成立以前，名主和武士的女性权利是更多的，所以在《式目》中女子的权利，实际是开始受到了限制（此后愈益受到限制，在十五世纪的武家社会，女子变为完全没有权利的了）。

《式目》虽然是限制幕府御家人的法律，但是因为它来自武家的生活和思想的，所以普遍地把它看做是武家法律的根本。又因为朝廷完全没有审判能力，庄园领主贵族也多半向幕府进行诉讼，所以《式目》实际上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法律了。这正是镰仓幕府权力已经确立的一个主要标志。

封建国家的成立

这样成立起来的镰仓幕府，是从十世纪以来在古代天皇制逐渐削弱和瓦解的过程中而发展起来的大小领主阶级最早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同于由唯一最高的君主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全体国民的天皇制，而是各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领主独自统治和剥削他们各自的领民，这种

统治和剥削的方式并不受幕府或者任何人的干涉。幕府只设有统辖御家人的机构（侍所）、审判他们纠纷的机构（问注所）和管理财政、庶务的机构（政所），而没有太政官制那样的各行政省（相当于现在我国中央的部——译者）。统治人民都是由各领主对其领民来进行的，所以幕府内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直接设置关于人民方面的各行政省。镰仓幕府就是以各地独立的领主中最大最强的领主（如源氏或者北条氏）作为首领而集结起来、所建立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的使命，是从领内人民的反抗和别的领主的侵略中保护各领主对领民的统治以及和平解决领主之间的相互纷争的。

领主们相互的关系，有的是君臣主从，有的是上级领主（本所、领家、知行国国主等）和下级领主（庄官、地头等）之间的利害关系，时而一致，时而对立。而在乡村中同直接生产者并存的地头等当地的领主们，大部分都是使役着大批下人和奴婢的奴隶主。可是当时主要生产者是叫作百姓名主的农民，而用武力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掠夺实物年贡和各种各样劳役的，即把农民

当作农奴来剥削、统治的权力机构是武家政权，也就是幕府。十世纪以来进行的农奴制，到十三世纪发展得愈加迅速。以这种演变为基础，组织了新的生产方式即农奴制，以管理社会生产的地主和领主阶级取代了仅仅寄生在生产上的贵族阶级的统治，自行武装和联合起来，建立了独自的国家^①。换言之，镰仓幕府的确立是日本历史上从古代向中世、从奴隶制统治的社会向农奴制（封建制）统治的社会开始发展的政治表现。

^① 但并不是一切农奴主的领主都集结到幕府。有许多不是幕府御家人的领主。皇室和贵族在承久乱后仍旧拥有相当多的国衙领地和庄园。这种当地领主不一定是朝廷的臣下，也不是幕府的御家人。大的寺庙神社也和朝廷一样脱离幕府而独立，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僧兵。

八 封建社会初期的特征

——农奴制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村庄的情景和各阶级

在镰仓幕府的政治统治下，群众作为武家和公家的庄园或者实际上庄园化了的公家领地的属民，受到压在头上的本所、领家、地头、庄官和二重、三重领主的掠夺。庄园地区的形式也不一致。有的领主庄园是一个村或由更多的村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也有的沿着同一个河流的邻近村庄分别属于不同的庄园的；有的甚至是一个村庄分为几个人领有的。因领主不同就容易引起村民利害关系不一致或者对立。

尽管有这种情况，但是自然村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些人们居住的场所，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村”。这和《律令》规定乡里制以前就

已形成的自然村庄的共同体传统也是有联系的。随着水田农业的发达，为了水利灌溉，一个村或者几个村的合作就愈益重要，而且农忙季节的“结”和其它互助劳动也成为不可少的，由于人们这种生产和生活的必要，就要求同一地区的人们互助合作。到镰仓时代，群众的结婚不是新娘到新郎家，而是夫妇结婚后暂时（大概是到丈夫成为家长时为止）别居，婚后丈夫到妻子家里相见——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母系社会制度的残余。由于这种残余的存在，而通婚范围就必须限于男方前往女家比较邻近的地方。村庄的人们就是这样通过结婚来扩大血缘关系。这也是村民和邻近村庄之间互相结合的重大因素。

村庄里除土地外，还有很多未经开垦的山林原野，不在沿河的村庄也有用水的池沼。人们从林野采伐薪柴和盖房木料，还可采集栗、柯等干果，采集蘑菇、薯蕷和可食野菜。这些地方又是领主的狩猎场所。

在可以望见全村的高岗地区或中心地区，建有幕府的御家人——地头或其代官以及公文（文书——译者），下司的庄官宅院。地头和庄官多

半是当地原来的领主（根本领主），他们多数兼任了幕府的地头和领家的庄官。但也有东国的御家人当上了西国地头的例子。典型的是地头、御家人和庄官三位一体的根本领主。他们拥有面积多达一町步至数町步的广阔的宅院，院中有木顶的本人住房和下人的配房、牛马棚、农具棚以及库房，还有织布、打铁和其他手工业的作坊，甚至院里还有水旱田。宅院的周围围着坚固的土墙、篱笆或濠沟。有些地名称做“土居”、“垣内”、“堀内”等等，原来就是出自这种当地领主的宅院的。耕种院内田地的是下人。领主除此之外还有耕地，一部分作为直营地由下人耕种，大部分交给在他统治下的村民租种。不是“根本领主”的地头以及庄官等，仅仅占有有一些作为他的职务俸禄的田地。

村庄一般是几十户。村民的最高身分是拥有一至二町步或数町步田地和少量下人的名主，即百姓名主。其次有“间人”和“胁在家”^①等贫农，他们只有在领主的直营地劳动，或租种地头

^① 间人和胁在家：都是身分很低的农民，实际等于农奴。

以及大的百姓名主的田地，或耕种自己开垦的少量的土地。他们是独立的下人、没落的百姓名主和从其他地方逃亡来的寄居者等等。村庄最底层的阶级——下人，有的是住在主家茅棚的典型奴隶，有的是住在主家附近自己的茅棚里，过着家族生活的准奴隶。他们象牛马一样由主家驱使而从事一切劳动，也可由主家买卖。

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百姓名主占有村中的大部分耕地，把持着村里祭神、管理和使用水利以及参与其他村中公共事业的权力。从这一阶层中选出该村的长老（族长——译者）。百姓名主是在家长统帅下，由家长的直系血族以及旁系家族联合起来的类似《律令》制规定的乡户的大家族。但旁系家族的独立性却较乡户中的“房户”大得多。在有势力的百姓名主中，有的同族联合起来成立了小武士团。而在百姓名主中，也有兼营工商业的。百姓的住房都是草葺的，其中分有两三间铺有木板、苇席的房

间。大的房屋也有三十坪的。“间人”和“胁在家”等没有村民权，在四到五坪的小棚里的地面上铺着稻草过生活。

村庄有镇守该地的神社，也有小佛寺。这些地方既是村民的集会场所，也是演出的舞台。神主和僧侣具有相当于地头和庄官的地位。而在祭神拜佛时，有手弹琵琶讲述征战和哀恋故事的盲人琵琶法师、操弄木偶戏的傀儡师等流浪艺人来到这里，行商和到处奔波的工匠也赶到这里来。

在这些村庄的成员中，地头和庄官当然是当地的领主，代表统治和剥削阶级，百姓名主以下是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大名主里面，有的也是几乎和地头、庄官不相上下的剥削者，但一般的百姓名主，即使拥有二、三名下人，其生产和生活也是以他们本人和家族的劳动为基础，下人不过是起辅助作用，所以百姓名主是属于被领主剥削的农民，即农奴阶级。在和武士阶级对称，当时把百姓名主称为“凡下”等等，在刑罚方面，对凡下也比武士为重，凡下受着残酷的刑罚。

农民被迫耕种领主的直营地，田地收量的

30%左右的稻米被征为“所当”和“年贡”，他们还要负担称为“万杂公事”的、名副其实的种类繁多农业、手工业的产品税和徭役劳动。此外，农民还要被当地的地头和庄官征调去，从事他们必要的农耕劳动、运送年贡、修建灌溉水利工程等各种各样的徭役劳动。地头所征收的实物年贡不多。佃农的地租为实物，多达收获量的50—60%，而且还必须从事地主（名主和地头）所要求的劳役。

尽管如此，但是随着农奴化的发展，生产力却相当地提高了。名主大部分都有牛马，用牛马耕地发展了。与此同时，可能也使用了圈肥。这样一反(三百六十步)田地的米产量到十二至十三世纪，在近畿的上等田地已经是一石二斗至一石三斗左右。这和八至九世纪比较，增产了三成到六成。又因为灌溉排水的技术进步了，在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先进地区，已经有了把收割后的水田的水排出而成为旱地，第二茬再种大麦的。

园艺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从前栽种的主要蔬菜是瓜类、茄子、青芋、萝卜、葱、姜等等，到镰仓时代又大量栽种了胡萝卜、牛蒡、莴苣等

蔬菜。漆、桑这样的经济作物也发展了，各地都开始了养蚕。据说茶树是九世纪初，最早由僧人最澄从唐朝带回来的，但当时并未普遍栽种。到十二世纪后期，僧人荣西（公元1141—1215年）从宋朝带回的茶种却得到推广，山城、大和和其他各地都开始栽培。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名田所课年贡和劳役的数量也增加了。十一世纪前后，每反的年贡，近畿地方的上等水田一般是三斗左右，到十三世纪，变为五斗到六斗。地头庄官等当地领主不仅经常冒领送给本所和领家的年贡和劳役，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来直接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牛马，征收不当的课役，是常有的事。农民即使向本所和领家控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虽说是“爱哭的孩子和地头都是难于对付的”，但实在忍耐不下去，也就只有“逃散”

（即逃亡）。这样，地头就捣毁他们的住房，扣留他们的妻子，奴隶般地酷使他们。《贞永式目》称此为“逃毁”，并严加禁止；换句话说，由于这种农民的逃散和地头的逃毁的频繁出现，使这个仅有五十一条的法令也不得不规定一条来

加以禁止了。

整个村庄的百姓经过商议即集体逃散的情况也不断发生。公元1275年，高野山^①领地的纪州^②有田郡阿豆河庄的农民在集体逃散时，地头把落在后面的人抓了回来，便强迫他们在逃散的原来地方种植大麦，并恫吓说：“如果种不好大麦，就要责及妻子，割耳挖鼻，削发为尼，捆以绳索，严加惩处！”百姓们把此事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好呈状，控诉于高野山。地头，这些当地的领主阶级就是这样把提高生产力的成果攫为私有，来养活同伙，培植实力。

市、町、座

有的地头把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物资作为商品出售。有财势的名主百姓也积存财富而经商。除米、盐、酒、丝织品、丝绵、灯油、农具、手

① 高野山：指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寺社之一。——译者

② 纪州：日本古代纪伊国的简称，今和歌山县的大部分和三重县的一部分。——译者

工业生产用具、铁制品、纸张、家具、水产等之外，各地还买卖各式各样的土产品。因此，在寺社的门前和交通要道出现了市场。这种市场不久就从临时的集市发展为每月三次左右的定期集市。这种集市的卖主和买主是领主和百姓名主，但专业的商人也逐渐出现。有时地头和庄官在集市出售征自农民的实物年贡，而把得来的货币送交本所和领家。随着，一手经办保管、出售、运输年贡物资的“问丸”^①，开始出现在交通的要地。当时日本不铸造货币，所以从中国传入的铜钱便大量流通了。

各国庄园的本所和领家（即贵族）及其仆从所住的京都，已经不是古代那样的政治城市了。在京都集聚了庄园的年贡物资，以进行买卖，并出现了专业的商人；也出现了商店街——“町”；手工业的专业者——职工也多起来了。在幕府的所在地镰仓也集聚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到十三世纪中叶，镰仓市内有七个町指定为商业地区。到该世纪的末期，据说镰仓人口约为三万户，也说

^① 问丸：日本中世纪居住在港湾和重要城市从事物资管理和中间介绍买卖的业者。——译者

有二十万人，但不准确。京都的人口据说也和镰仓大致相同。大寺院最多的奈良，也开始变为商业的町。大津和坂本等琵琶湖岸，鸟羽、山崎、木津、堺、尼崎、西宫、兵庫等由京都连接到西国的河川沿岸或港口及街道，由北陆连接到京都的小滨、敦贺、纪州的纪伊湊和新宫等港以及濑户内海航线的要地，也大量出现集市和问丸。

随着商业的发达，叫做“借上”和“土仓”的高利贷商人也开始活动。

在畿内城市首先出现的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如果追溯其身家，多少都是和古代的朝廷、大寺社以及贵族所隶属的奴隶性质的贱民身分有联系的。在地方的港口和交通要地，办理物资的运送、参加工商业的，也都是隶属于庄园领主的贱民身分，他们聚居的场所是“散所”。寺社门前之所以成为工商业的市镇，不仅因为那里朝拜者集中、年贡物资集中和寺社的需要量大，也因为那里存在着寺社的隶属民，他们是不受农耕束缚的贱民，所以能够很快转为商人。因此，他们即使变为富有者，也仍被贵族和武士视为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卑下的。他们成立叫做“座”的

同业行会，把他们所隶属的寺社和贵族作为本所，向他们缴纳一定的贡物，或者从事劳役，以取得本所活动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免税通过当时领主在各地所设的关卡的权利，并保证在一定的地区内有收购原料和贩卖商品的垄断权。以兴福寺、东大寺、石清水八幡宫和祇园社为本所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座”，业务种类繁多，活动范围也扩大了。

日宋贸易和倭寇

不仅日本各地的商业发展了，和中国（当时是宋朝）的民间贸易也更加发达了。十三世纪，每年有四十到五十只日本船只开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输出的商品是黄金、砂金、硫磺、珍珠、桧木等木材、刀剑、蒔绘^①、扇子等，进口除锦、绫、丝绸、茶碗、香料、草药外，还有大量的铜钱。和宋朝的交通来往中，如前所述，还进口茶树和陶器技术等，这样又成为在日本开始

^① 蒔绘：用金、银、锡粉和色粉在漆器上描画花卉等，中国叫做泥金画，在日本有很长的历史。——译者

出现新产业的开端。陶瓷器，传说是由尾张的加藤藤四郎(公元1168?—1249年)随僧人道元(公元1200—1253年)到宋朝求学，回国后开始在濑户烧制的。而加藤藤四郎的子孙也名匠辈出。因在濑户出产，后世遂把陶瓷器称为“濑户物”。

和中国的往来，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 and 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倭寇和北欧古代的海盗船，以及和英国中世纪末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倭寇的出现乃是从束缚过多而活动范围狭隘的封建日本的矛盾中，日本人对生活要求的一种表现。

衰败的公家和繁荣的 武家文化的对照

在战乱相继和各阶级、个人的盛衰兴亡激剧变化之中，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不论城市的人或

农村的人，不论是物资交流还是交通往来，都呈现出有朝气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贵族、武士和以农民为主的群众都从各自的阶级生活中产生了各自的文化。特别是衰败下去的公家阶级和兴盛起来的武家阶级，在思想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成为鲜明的对照。

例如，九条兼实之弟，天台座主（天台宗的总管长）的慈圆（慈镇，公元1155—1225年），写了《愚管抄》，注视了支配历史的“道理”——这种道理一方面洞察了公家阶级没落的趋势，但不懂得对付的办法，而是用末世思想对此加以说明，所以他的“道理”不外是宿命论。与此相反，同一时代武家的代表源赖朝，却具有了“草创天下”即由自己创造历史的觉悟。京都鸭神社神官之子、在后鸟羽院当过歌人的鸭长明（公元1153—1216年）的随笔《方丈记》（公元1212年），从人生如漂浮于流水上的水泡的这种无常观来凝视世道的演变。鸭长明本人隐遁山中。同时代的执政者北条泰时说，作为《贞永式目》基础的“道理”，乃是“武家习惯”的理性化，是要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和活动的伦理，并认为神佛都

是依靠人对它的信仰而增加其威信，因而充满了对于人生的自信。镰仓幕府自我表白的书《吾妻镜》五十二卷，其前半部写于十三世纪中叶，它把依靠武家的“道理”、草创天下的历史，作为他们子孙的镜鉴。而推断为十三世纪前期出于公家之手的史书《水镜》，用模仿前代《大镜》的格式叙述今昔——多半都是无聊之事，这种向后看的悲观的书和上述的《吾妻镜》是成为对照的。

在和歌方面，后鸟羽院、藤原俊成（公元1114—1204年）及其子藤原定家（公元1162—1241年）所选的《新古今集》（公元1205年初稿写成），好象是志在复兴和歌史上《古今集》的时代，但全部都是纤弱的伤感。与此相比，源实朝尽管憧憬公家文化，并颇受其影响，但在其《金槐和歌集》中，却可以看到反映雄伟的或者凛然可畏的东国武士充满力量的作品。

公家阶级的怀古的情绪，产生了卜部兼方的《日本书纪》的注解书《释日本纪》（写于十三世纪后期？）、僧仙觉（公元1203—？年）的《万叶集注释》（公元1269年）及其他古典的注

解书。这些书籍在后世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在思想方面却无创造性。武家虽然本身并未产生什么学术的著作，但北条泰时的下一代执权北条时赖，却打算从中国的政治书籍中吸取独自的政治方法，执权北条义时之孙北条实时（公元1224—1276年）却在武藏金泽^①的称名寺建立了金泽文库，收藏了和汉（日本和中国——译者）书籍。

在古代末期的文化中开始出现的群众，在十二到十三世纪以后的文化中不仅更多登场，而且在文化的创造上起到了直接积极的作用。

例如描写从平氏全盛时代到其没落的全国性战乱历史的《战记》文学最高峰的《平家物语》，就有贵族、武士、群众等一切阶层登场。据说这部书的蓝本是贵族出身的信浓前司行长（十三世纪初？）所写、让生于东国名叫生佛的盲人琵琶法师所讲的。但现在存留下来的《平家物语》，是原来的故事由武士和群众（主要是名主阶级）

^① 武藏金泽：武藏，包括现在的东京都的大部分和埼玉县、神奈川县的一部分；金泽，今横滨市金泽区金泽町。
——译者

在弹琵琶讲说的过程里，经过种种修改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群众对于《平家物语》的产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部书并非个人的读物，而是给集聚在一个地方的许多人说唱的故事，因而它就具有从未有过的参杂着许多出自汉籍和佛典的汉语；强而有力、格调优美的日语和日文的形式。形成故事基调的思想，是称作“盛者必衰的道理”的、佛教的和贵族的无常观；尽管如此，它却正确地描绘了革命战乱中的各阶级和个人，因此，不止是单纯的末世思想的悲伤。这是因为它是在充满生气的群众社会当中被创作、被讲述、被接受的缘故吧。

民族的新佛教和神社信仰

在宗教方面，贵族的佛教衰落下去，而发生了以武士和群众为基础的新的佛教和神道。平安贵族的净土信仰，虽然其初期是要在现世追求极乐气氛的，但十二至十三世纪以后的贵族就已经不再希望这些了。于是，如上所述，只有净土信仰一个侧面的末世思想转为严重。与此相反，出

身于美作^①土豪之家的法然（公元1133—1212年），起初在延历寺修行，但是由于戒律和教义过于烦琐，没有力量解决民众对于现实的痛苦而感到失望。后来法然倡导只要念佛、即使不作其他修行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专修念佛”的教义，而开辟了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出身不明，公元1173—1262年），更使之发展和加深。他们的教义，在不断的战乱之中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的武士和苦恼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所信仰，在宫廷也不断出现了信仰讲说女人成佛^②的这种宗教的女官。但法然和亲鸾受到宫廷和旧佛教的迫害，公元1207年法然被流放于赞岐^③，亲鸾被流放于越后^④。后来，法然获得准许回到京都，亲鸾到达常陆，在东国的农村生

① 美作：今冈山县东北部。——译者

② 奈良朝以前的国家佛教，个人对宗教的施教，并无任何关心；后来天台和真言二宗认为妇女原来罪孽深重，所以不能成佛（施教成佛）。在平安末期的净土信仰中，虽然出现了女人成佛的教义，但却在女人成佛上带有极为困难的条件。又由于认为女人罪孽深重，所以任何宗派都不许僧侣娶妻。

③ 赞岐：今香川县，也称赞州。——译者

④ 越后：今新潟县（佐渡岛除外）。——译者

活了二十年之久。

在东国期间，亲鸾亲眼看到了由于群众陷于贫困和无知的深渊、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狩猎和捕鱼等在佛教中认为是最为严重罪恶的杀生职业。作为佛教徒面对这种现实时，亲鸾成就了不依靠自己的修行和知识，而是只有绝对依靠佛陀的力量（他力），人才能够得救的绝对他力的教义，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在这种信仰中，所谓僧侣不肉食、不结婚的戒律，就成为无意义的了。他就亲自娶妻纳妾。他的弟子记录他的讲话的《叹异抄》有句名言是：“与其让善人往生，不如让恶人（往生——译者）。”这里说的“恶人”，可以作各种解释，有的是不得不杀生的贱民身分者或是反抗贵族和统治者，因而被他们看作是恶人的群众，这种现实成为亲鸾抱有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

在净土信仰的一派里，有由和亲鸾同时期的一遍（公元1239—1282年）所开创的“时宗”。他历游各国，在街头宣讲念佛的教义，在农民中进行传教。

此外，自称“安房国旃陀罗（贱民）之子”

的日莲（公元1222—1282年，实际是安房土豪之子），由天台宗转而热情倡导：只有信仰《法华经》才是唯一正确的，除了口念法华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以外，是没有得救之道的，并向其他所有宗派进行猛烈的攻击。日莲不仅对于来世得救，而且对于现世得救抱有强烈的热情，因此，认为必须按照他所宣讲的《法华经》的教义（正法）来施政，而严厉攻击不按照正法的幕府。由于这种缘故，他曾被流放到伊豆和佐渡，但毫不屈服。日莲宗（法华宗）在工商业者中间取得广泛的信仰，在关东地方的地头之间也拥有信徒。

在这一时代，由留学宋朝的僧人荣西创立了临济宗，由道元创立了曹洞宗。这两个宗派都是禅宗，认为不用佛经的字句（不立文字），依靠自己内心的锻炼，可以得到精神的解放（得悟）。荣西接近幕府，受其保护；临济宗普及在武士中间。道元不接近权势，对天皇和幕府等尘世的权威一概加以否定，闭居在越前的永平寺，深思苦索，培养弟子。他所著《正法眼藏》，被认为是开展了独创的深奥的哲学的思索，在日本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曹洞宗不久却吸收了

密教和民间传统信仰的要求（这相对地远离了宗祖的意旨），而普及到民间中去。

新佛教各派积极的活动，虽使得东大寺的高弁（明惠，公元1173—1232年）和兴福寺的贞庆（解脱，公元1155—1213年）等原来是旧佛教界的优秀僧人也有了改革教坛的热情，但旧教坛的势力并未动摇。

武士和农民信仰佛教，同时对神社也深为崇拜。他们最重视一个宗族的团结，把一个宗族的祖神或者守护该村的神作为团结的精神支柱。

《贞永式目》，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强调崇敬神社。当武士出征和凯旋或遇到其他大事，或在他们的生日、加冠之际，都向神社祈祷，在重大的誓愿中都把崇敬的神作为履行誓约的保证。在农民中间，神社也是村民互相协作的精神支柱。为了举行神社仪式，只由名主百姓中的有力人物作为成员，结成称为“宫座”的组织（后来，宫座向整个村民开放）。

这种神社信仰，并无多少教义，它和村民自古以来生活紧密结合着。到镰仓时代，根据本地临凡（垂迹）的说法，兴起了和天台宗结合的山

王神道；和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另外，伊势外宫的神官为了抵制内宫、伸张势力而成立了伊势神道。伊势神道说，神为本地，佛为临凡。三种神道都是在古来的神社信仰上结合了密教的咒术。

美术和工艺上的创造

美术仍然以佛教美术为中心。被平民焚毁的东大寺，依靠源赖朝的支持而重建，大佛也由宋朝来的佛像师所塑建。这成为新的寺院建筑和佛像塑造的开端。雕刻东大寺南大门金刚力士像的运庆（公元？—1223年）、其子湛庆（公元1173—1256年）及其弟子快庆（生卒年不详），是称为该寺的“堂众”的，几乎是奴隶性质的家庭奴隶出身的佛像塑造者，但在巨大的木像上却充分表现了武士兴起、奴隶走向自立这一时代的新兴阶级的力量强大。这种艺术手法，乃是研究了奈良时代的雕刻和宋朝新的形式，并进行了独自创造的结晶。

在运庆一家所雕刻的僧侣肖像中，有的是写实的杰作，这和绘画中的“似绘”（肖像画）的发达有着同一的倾向。这不是自由的人类个性的

描写，而是要严格模仿对象，来描绘完全酷似其对象的形象的精神的。

绘卷画到这时代更为盛行。高山寺的《鸟兽人物戏画》是从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曾分几次进行描绘的。它构思的群众性，笔法的优美恐怕是当时最高的杰作。在绘卷画上精细描绘武士和群众生活的题材也比前代多起来了。

在工艺方面，蒔绘的漆器出口到宋朝；相反地，陶瓷艺术却从宋朝学习而日本化了。根据武士的需要，在锻冶刀剑方面也出现了住在京都粟田口的镰仓初期的国友和中期的吉光，备前长船村的光忠、光长父亲和镰仓的正宗等有名工匠。而当时日本的实用刀剑大量出口宋朝，刀的生产达到能够出口的程度，这和犁、镐、镰等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结合起来考虑，说明这一时代炼铁和冶金的技术已经进步而且普及了。

通过上述各个文化领域，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已经提高到具有日本独创的价值，并已开始普及到各地区和各社会阶层，在这里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平安贵族的“国风文化”，而具有真正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的东西。

九 镰仓幕府的灭亡

——在乡武士和农民的抬头、蒙古的来犯

不稳定的镰仓幕府

《贞永式目》的制订，虽然表示了镰仓幕府的确立，但镰仓幕府并未因而稳定。只是京都的公家，还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支持幕府的有势力的御家人并不容易统治，而且他们经常可能和公家勾结在一起，另外，特别是不属于御家人的武士的发展和百姓名主等群众各式各样的反抗，更加威胁着幕府的基础。

承久乱后不久，源赖朝以来幕府的骨干三浦氏、千叶氏等豪族和北条氏一族的名越氏勾结在一起，拥立来自公家的将军九条赖经，开始集结反对北条的势力。执权北条时赖巧妙地挑拨三浦氏，于公元1247年消灭了他的一族。此后，有时

将军策谋反抗执权家，有时六波罗探题策谋叛乱，幕政得不到稳定。其间北条氏的嫡系家属（产生执权的一族，名叫得宗）加强独裁，评定众也为得宗一族所占据，各国的守护职也逐渐被这一族所垄断。这样，一般御家人对此的反抗势必高涨起来。

幕府全盛时期，连在北条泰时和北条时赖那样名声高的执权统治之下，社会的下层也以公元1231年（宽喜三年）春的“宽喜大饥馑”为序幕，不断遭到大灾荒，出现几万饿殍，大地震和台风的灾害也不断出现。到处都是饥饿的群众，因而买卖人口做为奴婢的事情也多起来，幕府屡次发出禁令也未收效。盗贼横行各地。如公元1240年禁止买卖人口；1244年制订了有关奴婢养子、救济饥馑、人口买卖等法令。1250年禁止卑贱者佩带刀械。1253年告诫地头不许进行非法行为、统制物价。1258年各国盗贼蜂起、发生饥馑、流行病，饿死很多人。1263年各国发生风灾。这类记载在年表里随处可见。

这里可以看出，在公家和幕府、在乡领主、大名主等人二重、三重掠夺之下，群众的生活遭

到怎样的破坏，他们的抵抗怎样的普遍。而另一方面是蓄积巨富的商人的成长。公元1252年，禁止全国造酒，在镰仓捣毁酒瓮三万七千余口。公元1262年幕府对物价和贷款利息进行了统制。1270年禁止御家人典当和转让所领土地。这样统制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法令越来越多。这是为了防止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受到越来越重的高利贷盘剥而采取的措施。

镰仓幕府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样的不稳定，社会的动荡也是这样的激烈，这是镰仓幕府封建武士国家的落后形态的不稳定和动摇，并不是当时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表现，而是社会充满朝气、正在克服奴隶制残余的历史前进过程的反映。有关人口买卖的问题虽然在史料上大量出现，但却不是奴隶制的复活和再次加强的表现，而是不再容易取得奴婢和下人的反映。

击退蒙古的来犯

这时候发生了空前的外患，即蒙古的两次来犯。十二世纪末叶，蒙古族的铁木真（Temüjin）

统一各部族，成立了蒙古国家，把现在的内外蒙古和满洲地方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公元1206年，铁木真改称成吉思汗，逐步压迫宋朝，将宋朝赶到中国南部。后来，蒙古族在西方从俄国和小亚细亚侵入东欧；公元1259年，在东方完全征服了高丽（朝鲜的统一国家）。第二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国王（大汗），不久迁都北京，1271年称国号为元。在这期间，由于高丽向他控诉了倭寇的威胁，为此，忽必烈策划以朝鲜为根据地征服日本。

公元1268年（文永五年），忽必烈的使者初次到达大宰府，要求建立国交。幕府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朝廷，同时拒绝这一要求，并令使者回国。此后忽必烈几次要求建立国交。公元1270年（文永七年）第五次的使者传达了皇帝的旨意：日本如不向蒙古朝贡即将出兵云云。当时十八岁的青年执权北条时宗（公元1251—1284年），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蒙古方面也强迫高丽建造兵船，征调士兵，于公元1274年（文永十一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

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两岛荒废。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同月18日，深入到博多湾内。

以肥前松浦党的武士为首，九州的御家人在守护少貳经资等人指挥之下，大力奋战，但由于元军步兵的集团战法对付日本骑马武士的个人战法以及使用了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枪炮，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但元兵有其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受到元朝驱使的高丽人毫无战意，而强制他们建造的船只也是不坚固的。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之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而日本才免于难（文永之役）。

幕府防备元朝再次来侵，让在西国拥有领地的御家人一律返回领地，不论公领或庄园，连不属御家人的武士也加以动员。在这期间，元朝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到公元1279年（弘安二年）再次催促日本朝贡。北条时宗拒绝该要求，不仅在镰仓杀害了来使，同时还积极策划远征高丽。正在准备中的1281年（弘安四年），元军东路军四万人和江南军十万人，兵分两路再次来袭。

日军正在阻挡先到的东路军登陆时，江南军也已开来。闰7月1日，元军举其全力进攻博多。当夜又遇暴风雨，四千余只元军船舰，仅二百余只未遭沉没，兵员损失五分之四以上，因而败退（弘安之役）。

胜利的条件和战争的影响

当时元军甚至准备了农具，持有长期占领的意图，但其内部存在着和上次同样的弱点：强制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方面无敌的元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有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与此相反，日本方面志在保卫自己领土的西国武士们却意志坚强，北条时宗的统率能力，不论在公领或庄园，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功地动员兵船、粮食和武士，能够很好地挡住元军登陆，使得偶然的暴风雨成为复没元军的条件。这种来犯，如果是在平安朝的院政和摄关政治之下，能否坚持到暴风雨使得元船沉没，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如果日本和中国大陆衔接，那么元军就会不产生依赖高丽人和汉人渡海这种弱

点，恐怕日本就难免被征服了。日本依靠自己是一个当时元军海上运输力量无法克服的岛国这一地理条件，依靠当时日本社会摆脱了无为无能的天皇和贵族的统治、新兴武士阶级已经建立了有朝气的社会这种历史条件，才能克服空前的外患。

但是，当时武士的奋战不能和现代所说的爱国心等同起来。由于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地而奋战，所以在西国没有领地的御家人对于幕府的动员并不一定是愉快地踊跃响应的。西国武士们在战后为了争夺恩赏而互相争吵起来。由于这种防御外国来袭的战争，不象在国内杀敌可以取得该人的领地，幕府没有土地可以发放作为恩赏，所以对于因争恩赏而产生的争吵感到难于处理。但幕府本身却利用这次外患以扩张北条氏一族的势力，在文永之役前后，以防备蒙古来袭为名，把中国和北九州各国的守护职都集中到北条得宗一族之手。

到后来，论功行赏也变得马马虎虎了。由“奉公”（侍奉）而取得“恩赏”，这是幕府和御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但由于幕府的这种态度而破坏了这个基础。御家人或非御家人，凡因

战争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武士们，势必加深对幕府的不满和抱有反感。于是他们就依靠各自的实力，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侵入公家领地和庄园，而武士之间也互相争夺领地，掠夺农民以谋求从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自己的势力。而这种势力的恢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实现：即能够排除本所、领家以及幕府的势力，成长为独立的封建领主，能成功地把土地和劳动群众纳入新的体制。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到十三世纪中叶，即使没有蒙古军的侵袭，但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的缘故。

农奴制的发展和惣领制的瓦解

从这时开始，百姓名主的阶级分化逐渐加快。上层的一部分，几乎转为武士，另一部分依靠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积累财富，集中了土地。到十四世纪称这一阶层为国人、国众或地侍。另一方面，出现了普通的百姓名主依靠家族劳动经营一町步左右耕地而成为小农的趋势。而隶属于地头们的下人和所从，用自己的农具，占有三

段^①、五段的田地，作为农民总算开始独立了。

转化为地侍的名主阶层，在不受庄园限制的情况下，及时把这种广泛出现的小自耕农群众在每个村庄里集中起来。这种情况发展到十四世纪，就结合成为叫作“惣”的坚强的村庄自治组织。他们利用这种组织的团结来对抗领主和地头，逐渐迫使他们减轻赋役劳动，或使其变为定额实物年贡制。这样就从奴隶或者无限制地被掠夺劳役地租的隶农转变为交纳定额实物地租的农奴。随着农民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村庄就摆脱了庄园和公家领地等的领有关系而形成了依靠村民自主团结的村落。

社会最基层发生了这种（基层自治）重大变化，领主要适应这种变化，只有把村庄的统治阶层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才能存在下去，否则便只有没落。而领主为了掌握开始自主地团结起来的、新的村落的领导阶层，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扎根到村落。但是，御家人阶级靠原来的父权家长制的统制而成立的宗族联合的组织，由于

^① 段：也写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名称，一町步的十分之一，约合9.917公亩。——译者

下列理由就无法很好地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了。

按照他们的继承制度，所有男子都有平分继承领地和财产的权利，但以长子为继承家业的人，称之为总领，他继承该家领地最重要的部分，并统制其他各子和同族，对幕府的义务也由总领代表同族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分给其余各子的“领地”，并非实有的土地，多半是属于庄官和地头职务的收入权，但村落和村民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地头和庄官如不实际在村里扎根，就不能确保这种收入了。因此，领地也并不是收入权，而不得不变为是对于土地和农民的实际的领有和支配权。就是这样，其余各子如把实有的土地作为领地而占有，就势必加强对于长子（家长）的独立性。从反面来说，家长（总领）的统制力就要削弱。于是家长尽力避免平分继承，而策谋单独继承。整个十三到十四世纪，这种趋势加深了。丧失了继承权的其余各子如不是当长子的家臣，就只好反抗而独立。这么一来，其余各子和同族之间围绕继承权问题的对立和斗争势必激烈化。总领制家族的牧歌式的团结，就被以血还血的争斗所代替。

在乡领主和“恶党”

幕府对于前述那种族内之争不能作出使得当事者满意的判决。因为它的性质本来只能依靠当事者的实力作出最后的决定。北条得宗加强了独裁以及由于这种独裁而和同族内的对立，集中地表现在总领制(家长制——译者)的瓦解过程中。由于不能果断地审判同族内的领地之争，那么幕府对御家人的统治力量就不得不日趋削弱。

地头 and 庄官等在乡领主，替本所和领家征收的管下群众的年贡，征收之后并不上缴，而是据为私有。于是地头和庄园领主之争不断发生。结果是控制着当地的地头等人获胜：地头承包定额的年贡，上缴本所和领家；上缴之后，地头是否再从管内群众额外索取年贡，本所和领家一概不管，这叫“地头请”，这是开始于十三世纪中叶。此外，还进行了叫作“下地中分”的办法，即在土地上划分界限，将其中的一半的年贡缴给庄园领主，其余一半允许由地头完全领有支配。就是这样，地头们连应当缴给领主的年贡也以种

种借口而不缴纳。在乡领主就是这样蚕食庄园，逐渐成长为既脱离本所和领家又脱离幕府的独立领主。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头、庄官和御家人都发展成了这样的领主；毋宁说大多数人未能赶上这种时势的潮流。从十三世纪中叶开始，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御家人的穷困、领地的典当和转让。虽然许多历史书说这是由于货币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御家人的生活转为奢侈所致；但是与其说是奢侈，不如说是由于只满足于旧式领地的收入权，不能实际地掌握村落，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才是他们穷困的真正原因。

由于和元朝进行大战而使武士疲惫和不能处理恩赏问题，幕府失掉了威信，这就使得部分地头和庄官转为封建领主的趋势更加强烈，也加快了大批未能转化为领主的御家人的没落。不论是转化为领主的，还是贫困下去的，都加强了对百姓名主的掠夺，这加快了百姓名主阶层向国人、地侍和小自耕农的分化，促进了他们组织成“惣”，加强了向掠夺者的反抗。到十四世纪，地侍和农民们（不管是否属于同一领主的）组织了地域性

的联合，结成同党，反抗领主，领主方面称他们为“恶党”。不仅不属御家人的有力武士组织恶党，甚至奉命消灭恶党的御家人也有成为“恶党的罪魁”的。守护本应取缔恶党，但也有的反而加以保护使之成为自己的部下的。此外，守护在镇压恶党和叛乱者的时候，也有剥夺了恶党和叛乱者的土地而作为自家领地的。这样，本来是幕府官员的守护，他们把领主化了的地头和恶党在身分阶层上隶属于自己，而他们就有了成为地头、恶党的上一级的封建领主的趋势。

镰仓幕府的灭亡

把武士作为总领制的一个家族集团、使之臣属于幕府、借此统治全体人民的镰仓幕府的统治体制，在一切方面都开始崩溃。幕府为了挽救御家人的穷困，于公元1297年（永仁五年）决定：让御家人卖给非御家人的领地无偿收回，今后禁止领地的典当和买卖，对御家人有关金钱借贷的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等等。这种所谓德政，看起来象是有利于挽救御家人，但因债权人不再把钱借

给御家人，所以他们反而更加困难，不出一年，幕府就不得不收回德政令。通过这件事，幕府已经自我暴露了几乎丧失施政的能力。

幕府内部实力派之间的对立也激烈化了。公元1284年，六波罗探题因和执权对立而被杀；第二年的1285年，安达氏曾经维护执权北条时赖，在消灭三浦氏时立有战功，但因他举行叛乱而被消灭。这么一来，在执权的身边发生了权势之争，公元1293年，以打倒安达氏而夸功的平赖纲父子也被执权所杀。

通过不断的内部之争，北条得宗家的专制更为加强，幕府中的各种机构成为有名无实。结果是北条得宗家族成了一切矛盾的焦点，上自公家、社寺，下至国人、地侍和一般农民，一切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反对，都集中指向执权。而成为这些反对北条氏势力的核心的，是后来出现的后醍醐天皇（公元1288—1339年）。

在此之前，皇室内部也在争夺逐渐减少了的领地，因而发生了深刻的对立和分裂。公元1259年，后嵯峨上皇排除长子后深草天皇，而让次子龟山天皇继承皇位，发生了后深草和龟山的对

立。住在持明院的后深草的系统（持明院系统）和隐居在大觉寺的龟山系统（大觉寺系统）围绕着皇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幕府干预了此事，在公元1308年决定两个系统轮流继承皇位。但幕府的干预不利于大觉寺系统，这一派就成了反对幕府的势力。大觉寺系统的后醍醐天皇于1318年即位，策划推翻幕府，乃任用北畠亲房（公元1293—1354年）等人为亲信。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非常昏庸，一向不过问政治，日夜沉迷于游宴，专门斗犬，人们称他为狗将军，这给后醍醐天皇等人讨伐幕府以良好的机会。

天皇的计划，在公元1324年（正中元年）被幕府发觉，天皇的心腹日野资朝等人被捕，一度遭到挫折（正中之变）。这时，天皇以此事与己无关为遁辞，重新制订计划，暗中对皇室和贵族领有的庄园的武士以及延历寺和兴福寺等进行活动。但是，在公元1331年（元弘元年），又被叛变者告密，计划被幕府发觉。于是天皇逃往奈良，继而进入笠置山。以河内的金刚山麓为根据地，从上一代就以该地的地侍首领而驰名的楠木正成（公元1294—1336年），首先支持天皇而举

兵。天皇不久被幕府逮捕，流放到隐岐岛。幕府拥立了持明院系统的光严天皇继承皇位。

后醍醐天皇等人一旦公然举起倒幕旗帜，以近畿和中国地方的武士为首的反对北条氏的势力，便陆续纷纷而起。战乱日益扩大。地侍引率的群众也到处蜂起，同地头和庄官作战，或者联合起来反抗上级的领主。这些战乱，并不限于后醍醐天皇等人及其一派的武士们对于幕府的斗争，实际上开始具有民众对于包括皇室在内的一切旧有统治者的起义的因素。

在战乱发展为全国性的时候，公元1333年（元弘三年）闰2月，后醍醐天皇就由伯耆^①的有力武士名和长年等人营救而逃出隐岐。反幕势力日益强大。鉴于这种形势，幕府乃下令讨伐近畿的叛乱者，率领大军奔赴京都途中的下野豪族足利高氏（尊氏，公元1305—1358年）举行叛变，5月7日，消灭了幕府的六波罗探题。与此同时，上野的新田义贞（公元1302—1338年），率领东国的武士团进攻镰仓，5月22日消灭了北

① 伯耆：今鸟取县西部。——译者

条氏一族。即使在北条氏已经伸张势力的九州，在那里的九州探题也由岛津、大友、少貳等有力守护毫不费力地打倒。镰仓幕府就彻底地灭亡了。

十 古代奴隶制遗制的清算

——“惣”^①的发展和室町幕府的矛盾

后醍醐天皇的亲政及其失败

镰仓陷落后，后醍醐天皇立即回到京都掌握政权。十月，在天皇亲自主持下，很快成立了作为政权机构、商讨国政的“记录所”，审判有关所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和警卫京都的“武者所”。在地方则保存旧有的国司和守护制度，由天皇任命自己信任的贵族和武士充任。第二年的1334年，改年号为建武，在学校课本里，称这次天皇政治的复辟为“建武中兴”。

但是，所谓中兴不过是皇室史上短暂的现象。天皇政治是和封建制度的发展这一历史趋势

① “惣”：农村的自治组织。——译者

背道而驰的。论功行赏极不公平，不当地没收武士的领地，谋求复活皇族和贵族的庄园统治等，这些不仅使武士们失望，而且在天皇掌握政权不到一年就着手建筑内裏（皇宫），为此而征收重税，发行纸币强制通用，对群众的掠夺比以前更加残酷了。失望的群众对朝廷不满比对幕府更甚。皇室中兴的政治不到一年就暴露了难于掩饰的破绽。当时京都二条河原讽刺当时社会的传单说：“目前京城流行的是：夜间抓人、盗窃、假传圣旨、囚犯、快马和无事惊扰。”

抱有雄心的是利尊氏，注视了这种形势。他是以下野国的足利为据点、身兼两个国的守护职、地跨十三个国、辖有许多地头职（地头的权利）的大领主。他奉命从镰仓幕府出兵去京都镇压叛变时，已经怀有取代北条氏而统治天下的野心，在赴京之前就曾暗中联络各国武士。足利尊氏在占领了京都六波罗^①之后，立即成立“奉行

^① 六波罗：今京都市东山区一带地方。平安时代末期，平清盛建宅院于此，后来源赖朝也在此修建住宅。承久乱后，镰仓幕府在这里设立了六波罗探题，监管京都皇室朝廷和关西御家人的行动。——译者

所”（相当于镰仓幕府的侍所），拉拢陆续来京的武士，不久就和朝廷新设的以新田义贞为长官的武者所暗中对立。

不久，足利尊氏有了起兵的机会。公元1335年（建武二年）7月，北条氏的余党攻入镰仓，守卫该地的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战败逃走，8月，足利尊氏任征东将军，收复镰仓，据守不动，对京都朝廷举起叛旗。足利直义也返回镰仓，弟兄二人为了征讨掌握朝廷军权的新田义贞而进攻京都，第二年的1336年1月占领了京都。但足利尊氏弟兄不久被北畠显家，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人逐出京都。于是他们逃往九州，受到该地少貳、大友、岛津等人的支援，再次率领大军进攻京都，而成为波及全国的大乱。

这次支持天皇的武士就不多了。新田义贞虽然是忠于天皇的豪族，但实力不大，楠木正成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招集畿内的地侍展开不屈不挠的流动作战。这也是由于地侍们对天皇政治的失望。

5月，足利尊氏破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的军队于兵庫的湊川，战死楠木正成而进入京都。后醍醐天皇意图再次上台而投降足利尊氏。连天皇心腹

的第一个理论家北畠亲房在其阐述皇位的神圣和大觉寺系统的正统性的《神皇正统记》里都说：“君主要尊重，但一人欢乐，万民痛苦则天亦不许，神也不佑，须知政治良否关乎皇运之兴衰。”这样建武的反动政治，必然的不到三年就遭到了失败。

足利尊氏开设幕府 和南北朝的对抗

足利尊氏立即拥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11月，仿效镰仓幕府的《贞永式目》，制订了《建武式目》十七条，在京都开设了幕府。这一幕府，由元弘之乱（公元1331年）以来就追随足利尊氏立过很多战功的高师直（公元？——1351年）充任“执事”，以逞其权势。

一个月后，后醍醐天皇又逃出京都，潜伏于大和的吉野^①，自称为正统的天皇，虽说是形式，却成立了朝廷。从此开始了所谓南朝（吉野朝）和北朝（京都朝）的对立战争。南朝取得各国反

^① 吉野：奈良县南部山岳地带。——译者

对足利派武士的支持，一时得势，但到1338年，新田义贞，北畠显家等可以信赖的有力武将相继战死。这一年，足利尊氏取得了北朝天皇给予的渴望已久的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南朝所依靠的有以贵族和寺社为“本所”（领家——译者）的商人的“座”的经济力量；但是因南朝军队连续失败，商人阶层的支持也逐渐薄弱了。后醍醐天皇本人也于1339年（南朝廷元四年，北朝历应二年）8月，在吉野山中病死。

屡遭失败也不死心的后醍醐天皇，虽被流放于小岛或遭受软禁，但仍然逃出，坚持斗争，这是皇室史上独一无二的刚毅不屈的天皇。但他却没有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眼光。他的目标在于恢复古代天皇制的全盛时期，一切思想都是倒退的，是以贵族阶级为中心的，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所以只有失败。

南北朝的战争，在后醍醐天皇死后仍然继续。但是对立的主要内容已不是号称正统王朝的少数公家势力同以天皇为点缀的北朝的武家幕府的对抗，而是武士阶级内部的对立。在他们之中，有急进派和渐进派以及其他各派之间的对

立，又由于其中的一派不断和南朝相联络（连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有时也和南朝进行联系），因此南朝才能暂时延续下来。

急进武士的天皇观 和足利尊氏的态度

足利尊氏是渐进派。希望尽早取得全国统治权的足利尊氏，并不建立直接组织在乡武士的新体制，而是任命同族的和可靠的武士为各国的守护，给他们对于领国内武士的军事行赏和与行赏有关的分发土地的权限，以担负武士的统治和治安的维持。并在镰仓设置关东管领、在奥羽和九州分别设置探题，任命同族充当此任，使其指挥和统治管内守护以下的武士。足利尊氏就是这样企图依靠同族的联合，用镰仓幕府已经用过的方式来巩固幕府的权力。

掌权者经常希望维持其统治“秩序”。站在南朝立场写出的南北朝战乱的历史《太平记》中说过：“将军弟兄（尊氏和直义）对应该敬奉的唯一君主不予尊重，执事及家人之辈也轻视将

军，这乃是因果报应的道理。”足利尊氏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破坏皇室居于最高地位的这一传统，那么封建秩序的原则就要遭到破坏，从而武士们对于幕府的忠诚也遭破坏，足利尊氏对于这种情况是惧怕的。因此足利尊氏虽然不象源赖朝那样是“贵族”出身，对皇室也不那么尊重，但他不仅成立了北朝，而且不得不对公家的庄园作出某种程度的保护。

与此相反，执事高师直却把近畿地方的在乡武士们作为自己势力的基础，这些武士们既不乞求守护的地位，也不正面拒绝庄园领主权，而自己却想成为地道的封建领主。因此，《太平记》载有高师直的豪语：“在京都有叫做王的，拥有大批的领地，还有叫做内囊和院的御所（皇宫），让他下台是困难的。如果没有王也是可以的话，那么可以用木来雕，用铁来铸，就可把活着的院和国王抛弃到任何地方去了！”据说高师直之弟高师泰，因所属武士接受恩赏不多，曾指示所属说：“为什么嫌少！身边如有寺社和本所的领地，可以越境占用嘛！”《太平记》里还载有一些武士不把天皇以及公家的权威放在眼里的事

例，如一个叫做土岐赖远的有势力的武士，在京都市内和光严院上皇的乘车相遇，光严院叫他下马，他说：“什么！是院，还是狗？是狗，给你一箭！”竟对上皇的车放了一箭。还有伊势的仁木义长侵占了神宫领地，天皇和将军下令禁止，仁木反而捕五十铃川之鱼，在神路山^①狩猎，对于神宫毫无畏敬之意。

象高师直这样对于公家势力毫不妥协的态度，对足利尊氏是不利的。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策划征讨高师直，高师直反而要消灭足利直义。足利直义见风头不利，乃联合南朝扭转了形势，最后消灭了高师直一族（公元1351年）。这一争斗和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弟兄之争相互纠合在一起，足利尊氏的目的只在于铲除足利直义，遂支持了高师直；高师直死后，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遂形成正面对立。足利直义消灭高师直之后又和北朝取得联系，而足利尊氏为了对抗而又暂时联络南朝，废黜了北朝的崇光天皇，第二年（公元1352年）2月，杀足利直义于镰仓。

^① 五十铃川，神路山：都是伊势神宫的所谓神地，认为不得侵犯。——译者

南朝方面，认为足利氏的内讧如此剧烈是好机会，乃以宗良亲王（？——公元1385年）为征夷大将军，依靠新田氏和楠木氏及其他反对足利的武士进攻足利尊氏，足利尊氏又和北朝联合，拥立后光严天皇登上了前些年废黜崇光天皇之后空下来的皇位，经过二年半的时进时退的战争，到公元1355年（北朝文和四年，南朝正平十年）3月，足利尊氏最后胜利。此后的南朝不过是吉野山中的公家集团而已。

在乡武士、守护大名和幕府

在战乱期间，在乡的领主、国人（有力地主——译者）和地侍等，对庄园的侵占更加剧烈。他们结成的“恶党”以畿内为中心，蔓延全国各地，规模大的有数百人组成的队伍，横行在每个村庄。他们侵吞庄园年贡，夜间抓人、抢夺、山中盗窃、海上抢劫等等，都肆意而行，他们对北朝和南朝，都是根据自身利害或者拉为一伙，或者成为敌对。

为了战争胜利，不得不把在乡的小领主和国

人以及地侍阶层做为同伙。渐进派的足利尊氏，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在乡的小领主和国人以及地侍阶层对于庄园的侵占行为。公元1352年，足利尊氏在刚刚消灭了其弟足利直义之后，就把对于近江、美浓、尾张、伊势^①、志摩^②、伊贺、河内、和泉等八国的庄园以名叫“半济”——将当年年贡的一半用军粮名目进行征收的权限，交给了守护。这对庄园领主是一大打击，但这是根据在乡小领主和武士的强烈要求，半济年贡的一部分由守护自身取用，大部分分配给在乡的小领主。这种办法后来成为经常化，并逐步普及到各国的庄园。

守护由于取得了设置和支配半济地的权限，加强了对该国武士的统治力量，也开始有了脱离幕府的倾向。他们还包揽庄园的年贡（守护请）或者征收叫作守护段钱（土地税——译者）即按照庄园土地面积数以货币征收的特别税。镰仓幕府的守护虽然是幕府的地方官，但到十四世纪后半叶以后，守护在领国扎了根，和在乡的小领主

① 伊势：今三重县中央部。——译者

② 志摩：今三重县志摩半岛。——译者

以及武士结成主从关系，使小领主和武士承担统治领国基层的官员那样的作用。这样，守护一方面镇压农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农民斗争来蚕食领主庄园，他本身就开始成长为封建大领主。这叫做守护大名。

室町幕府想依靠守护大名制度，一方面压制公家和寺社的势力，另一方面用以统治在乡的武士和农民。但是，由于守护大名的强大，遂成了独立的地方的封建权力，并有了将要超越幕府统治的必然趋势。幕府为了压抑其发展，于1357年颁发了一个法令：禁止武士和守护侵占庄园，以保护公家和寺社财产。但这个法令是和封建领主发展趋势相矛盾的。后来又反复颁发了同样的法令。这必然引起守护和在乡武士的反抗——守护大名一强大，做为中央权力的幕府就被削弱了；要想压抑它的成长，其结果就势必保存公家势力，因而遭到守护们的反抗。所以，不论怎样，室町幕府一直是不稳定的。

幕府机构的调整和南朝的灭亡

尽管在这样不稳定的基础上，足利尊氏运用了他出色的政治手腕，有时和公家妥协，有时加以压制，使反对他的各种势力互相争斗，巧妙地加强了自己的权势。公元1358年，足利尊氏病死，其子足利义詮当上了第二代将军。他也是利用守护们的势力互相吞并，提高了将军家的地位。继于公元1368年，足利义满（公元1358—1408年）充任第三代将军，出现了足利氏的全盛时代。他在执事细川赖之的辅佐下，对九州的菊池氏和纪伊、河内等地属于南朝的武士，不是消灭他们，就是使之归顺，然后又使守护大名互相吞噬，从中增强了幕府的权力。

幕府机构得到充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就是把一向在形式上是足利一家的管家人的“执事”的执务机构作为幕府的政务机构，称为“管领”，由细川、斯波、畠山三个家族世袭此职，下设政所（财政）、侍所（警备）、问注所（管理文卷）和评定众、引付众（审理诉讼）。侍所

长官(所司)拥有次于管领的实权，后归赤松、山名、一色和京极四家所独占。三个管领家和四个所司家(称为三管四职)，都是有势力的守护大名，所司通常都把自家的有力武将作为所司代，派在京都执勤。

这种官职制度是为了让足利将军家高踞于有势力的守护们的势力均衡之上，用以稳定其地位的，结果是三管四职互争势力，足利将军家虽延续下去，但却不能防止本来就不稳定的幕府体制的动摇。甚至在这种体制的首任管领细川赖之就任后，以斯波氏为首的有力守护们就要出兵讨伐，致使细川赖之不得不逃往领国赞岐(公元1379年)。在这前一年，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①建造了称为“花御所”的公家式壮丽的住宅兼办公的厅舍。称足利氏的政权为室町幕府，就是因为这种缘故。

在此期间，南朝的势力衰退到了极点。继后醍醐天皇的下一代后村上天皇之后，据后世历史家的考证，1368年长庆天皇登上了皇位，但他

^① 室町：今京都市上京区一带。——译者

的即位年月不详，生母和后妃以及他的坟墓也都不清楚。下一代后龟天皇于1392年终于被足利义满逼迫退位，北朝的后小松天皇成为唯一的天皇。此后，后小松天皇的子孙继承历代的皇位，直到现在为止。北朝称此为“南方投降”，但在北朝，后小松天皇也无任何实权，只是仰赖幕府的保护。

足利义满想当太上天皇， 却成为日本国王

足利义满的权威在此前后确立起来。南朝降服前的公元1391年（明德二年），足利义满挑拨山名氏清发生叛乱，山名氏清拥有山阴等地十一个国，即日本六十六个国的六分之一的守护职，人们称之为“六分之一殿”，这一大豪族就因叛乱，为足利义满所杀害（明德之乱）。足利义满继此之后，如前所述，使南朝瓦解，后来1399年（应永六年）平定了以周防^①为根据地、拥有六

① 周防：今山口县东部。——译者

国守护职的大内义弘的叛变，使之战死（应永之乱）。此后，其余的有势力的守护，也暂时销声匿迹了。

足利义满当时实际上成为日本国王。他在此之前（公元1394年），把将军职务让给年仅九岁的足利义持，他本人当上了太政大臣。不久他又希望取得太上天皇的称号，而称足利义持的异母弟为“幼君”，打算让幼君先做后崇光院（贞成亲王）的养子，然后再迫使后小松天皇让位于幼君。正在这种让位即将实现时，足利义满急病而死（公元1408年5月）。

将军足利义持因足利义满偏爱其异母弟而抱有反感，所以他不仅阻止了后小松天皇让位给幼君，而且拒绝朝廷赠给已死的足利义满以太上天皇的称号。就是这样，因为偶然发生的事故，才没有实现足利义满想当上皇和足利系统想当天皇的愿望。但是足利义满在和中国明朝开始建立正式国交时（公元1401年），却高兴地接受了明朝皇帝赠给他的“日本国王”的称号，他本人写给明帝的信中，也曾署名“日本国王 臣 源”

幕府对人民的掠夺

足利义满希望成为太上天皇，或者喜欢明朝皇帝称他为国王，这恐怕是由于他认为有必要取得由外部给予的权威的缘故吧。但是即使多少有了古代王朝和外国王朝给予的权威，但室町幕府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反而因足利义满的这种态度，加深了幕府的不稳定。

追求王朝权威的足利义满，不得不成为已被历史所淘汰而必然衰退下去的王朝势力的保护人。例如，足利义满曾把庄园施舍给寺社，并在京都的北山建立豪华的叫做“金阁”的别墅，在这里招待天皇和公卿，沉迷于游宴。这意味着违背庄园日渐瓦解的历史趋势，增加了在乡领主、国人和百姓的负担，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如公元1391年，足利义满为了朝拜奈良的春日神社而向大和地区三个乡的农民征收临时税，农民用武力对此进行了反抗。从这前后开始，在畿内和近国，由国人率领的村庄“惣”组织的群众对领主的称为“强诉”和“一揆”（团结一致的意思）的武

装起义与集体逃亡大为盛行。

此外，足利义满成为明朝皇帝的“臣”，以求对于明朝贸易的发展，这虽使担当这种贸易的实际事务的京都、堺、博多的大商人致富，补充了幕府的财政，但同时也助长了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在乡领主、武士以及农民的掠夺。结果，社会的不安激化了。大规模要求借款一笔勾销的群众运动，动摇了幕府和守护大名，这是足利义满死后不久的事情。

从足利义满时代开始的幕府的财政，是用其直辖领地（御料所）的收入和对京都市内及其附近的酒坊以及称为土仓^①的大高利贷者的课税，并在通向京都的道口及在交通要地设立关卡征收通行税（关钱），充当幕府日常经费。御料所在全国各地约有六百处，但具体数目和收入总额不详。公元1371年，对酒坊和土仓首次征收了临时税，到1393年改为经常税。这和足利义满的对明贸易有关，大概是因为让酒坊和土仓从贸易中取

^① 所谓土仓，指保存典当押品的仓库。转而称持有这种仓库的典当业和大高利贷者为土仓。他们多半兼营酒坊或其他商业。

得利益，同时将临时税改为经常的吧。但酒坊和土仓却把课税的负担转嫁给群众。幕府依靠这些收入，财政仍有困难，所以对不论寺社和本所的领地，还是武士的领地，一律按其面积课以段钱（地税——译者），并对当地的每户农民征收栋别钱（房捐——译者），而且让守护也缴纳特别的捐献。这些税款，归根到底仍是从一般群众索取的。而且群众还要遭受守护、在乡领主、残余的庄园领主的各种掠夺。

“惣”的发展和土一揆

各村的“惣”组织为了反抗这种重重掠夺的运动，在国人和百姓名主等上层领导之下，从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以近畿地方商业发达的地区为先导，愈益发展起来。到十五世纪，不仅是一个村，甚至出现了几个村或者超过郡的界限的“惣”的联合组织。“惣”里有叫做长（大人或乙名）、年寄、沙汰人、刀祢等的执行部，由全体百姓（下人等除外）参加的名为“寄合”的会议，来审查决定村里的公共事务，制订村庄的法

规，并规定处罚违犯者的法令。集体管理公有的山林原野和水利、神社的祭祀等等，也是“惣”的重要工作。而有力量的“惣”把对领主的年贡课役，称为“百姓请”、“地下请”，即将定额的年贡课役由村民自治机关征收后，缴付领主，这样就争得了不在村内设置领主的官员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劳役地租完全废止，徭役折算为实物或者金钱进行缴纳。劳役地租一般是用缴纳实物或金钱来代替，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惣”在非常时期也是武装起来和领导战斗的群众起义的组织。在小农阶级不如畿内那样发达、而村庄自治组织的“惣”还未能发展的地区，上层的百姓名主也转为地侍，不分属于哪个领主，而都在地区内联合起来，形成了“党”和“一揆”。庄园的代官在“惣”和“一揆”面前无计可施。在村民的坚强反抗面前，连守护都经常畏避退缩。例如若狭国^①在1351年至1361年之间，遭受国人一揆的反抗，竟换了十五个守护。1366年，一色范国当上守护进入这一地区之后，

^① 若狭国：今福井县西南部。——译者

国人的反抗才算平息。

在山城^①、大和、近江等农民的阶级分化有了发展、商业发达的地方，出现了称为“马借”和“车借”的交通运输业者以及在他们下面的劳动群众。他们反对新设关卡，或者反对勾结幕府的酒坊和土仓的掠夺而进行了勇敢的大规模的斗争。足利义满死后十年的1418年，京都附近的马借要求德政（借债一笔勾销）而闯入京都。以此为开端，要求德政的群众起义不断出现。

从公元1428年（正长元年）夏天到初秋，在青黄不接时期，饥馑蔓延，社会不安加深，近江的马借要求德政而起义。继此之后，京都市民及其周围的农民和马借也同样为了要求德政而袭击了社寺、酒坊和土仓，破坏了房屋和仓库，撕毁借据，随意取走了典押物品。起义立即波及到畿内一带。当时大和神户乡的百姓要求取消从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以后的债务，他们把这一要求刻之于石，称为德政宣言。甚至被称为“日本

① 山城：今京都府东南部。——译者

国到处要求德政”的这种暴动，在奈良大乘院身为庄园领主的僧正的日记中写道：“凡亡国之基无过于此，日本开国以来，乡间土民暴动以此为开始。”这叫做土一揆（日语读doikki，土民一揆的略语）。

第二年1429年正月，播磨国的土一揆，和“国人”的一揆联合起来，同守护大军进行战斗，口号是：“在国中不准有武士”。同一年，在丹波、伊势和大和也发生了土一揆。以后直到1434年，每年照例在畿内和近国的某些地区发生土一揆。后来的七、八年里，虽然比较平稳，但以嘉吉之乱（后文叙述）为开端，再次出现了土一揆的波涛。

土一揆并不象从前以一地区的领主和代官为对象的强诉，而是整个农村和城市群众对于幕府、守护大名、庄园领主和与其勾结的商业、高利贷者的全面的暴动。这是在日本历史上勤劳民众的团结和斗争，是首次向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展开的进攻。

在日本历史上，在《律令》制度下的人民斗争形式，一是做为个人放弃口分田而逃亡；二是

伪造户籍，即尽可能少报正丁及次丁^①等徭役负担过重的家族成员人数等；三是在庸、调物品上只缴粗制劣质品，以此来瓦解公地公民制——国家的奴隶制，而形成了庄园、名田和在这里的私人奴隶制以及农奴制。这些庄园、名田里的百姓和下人的斗争形态，发展为武装集团，以对抗国司们。这种力量的发展，使得古代贵族阶级不得不走向衰退。而把这些百姓作为农奴、组织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即农奴制的大名主和当地领主们，形成了武士团，不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权——镰仓幕府。镰仓时代农奴的民众不论属于哪个领主，都逐渐发展为一个村落内的集体，不断用集体逃散的办法来对抗领主，也采取了土一揆的实力行动进行斗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发生和发展，推动了商业和交通相应的发达，这种发达就成为推动农奴群众开展地区性团结的条件。到十五世纪，土一揆的群众暴动终于把庄园制和奴隶制的残余一扫而光。

^① 正丁及次丁：二十一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健康的男子称为正丁；年在六十一岁以上和正丁中年老病弱，不能从事劳动的人称为次丁；十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能从事劳动的男子称为少丁。——译者

十一 下剋上和 战国的战乱

——土一揆、国一揆和战国大名

应仁、文明之乱和下剋上

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动荡，加速了社会最上层的守护大名（成了领主的大名）以及足利氏一族内部旧有的分化和冲突。公元1416年，将军足利义持之弟足利义嗣，联合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的部下上杉氏宪举行叛变，关东的大名和有势力的武士都参加进去，发展成为关东一带的大乱。幕府好不容易把它平定之后，足利持氏又企图谋取将军的地位。公元1423年，足利义持号令关东大名讨伐足利持氏，双方虽暂时取得妥协，但足利义持两代以后的将军足利义教，终于在1439年（永享十一年）消灭了足利持氏（永享之乱）。

足利义教从此之后不重视幕府的职权，策谋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这是因为在反幕府派利用各地发生的土一揆的情况下，幕府必然要设法集中权力。但这又推动了有势力的守护对幕府的背叛。所以足利氏的关东管领一灭亡，关东守护大名们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了。在西国，九州的大友、菊池、少貳等反幕府派守护大名举行了叛乱。他们也被怀疑为：“在暗地里和土一揆互相串通”。幕府指令大内氏加以平定，于是大内氏的势力就强大到幕府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独立性很强的南九州大守护岛津氏，也愈益不受幕府的调遣。甚至连将军足利义教于1441年（嘉吉元年）打算撤销播磨守护赤松满祐的领国时，反而遭受赤松满祐的出其不意的反击（嘉吉之乱）。赤松满祐后被继足利义教之后的将军足利义政（公元1436—1490年）所派遣的所司山名持丰等人的军队所灭。

当时以近江马借的暴动为开端的京都附近一带的土一揆，乘幕府动荡之机，在各村组织队伍，占据有名的大寺社，作为驻屯的据点。他们严禁放火和掠夺，秩序井然，并要求“新将军登

台之始，以施行德政为先例”，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成长到懂得利用幕府危机的地步。从此开始，土一揆再次在各地蔓延。近畿地方的每个村庄，守护和领主的威信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公元1454年和1457年，山城土一揆打败了从事镇压的幕府军和土仓的雇佣兵。甚至在镇压军的兵士中，有的也参加了一揆。

而且在占据幕府机构中枢的三管四职家的领国里，家臣身分的武士也不断利用土一揆的力量举行叛乱，以介入主家继承家督（族长——译者）的争执，使这种争夺更为激烈。因此，在三管领之中，斯波和畠山两氏由于家族之争，几乎同归于尽，只有细川氏独自转为强大。当时在四职家中，山名氏强大了，以致和细川氏发生争夺。他们在斯波氏与畠山氏的内讧中，有的同斯波氏勾结，有的同畠山氏勾结，并和将军足利义政之弟义视及其子义尚的互争将军职位纠缠在一起。细川胜元拥立足利义视，山名持丰（公元1404—1473年）拥立足利义尚，到公元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了不仅是幕府重臣的各家，就连以大内氏为首的各国有势力守护大名也都卷

入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战乱——应仁、文明之乱。

战争主要在京都进行。双方都雇佣了弃村逃亡的百姓，把城市的下层人民组成武装队伍，编为足轻（步兵），让他们任意放火，抢夺居民财物作为兵饷，致使大半个京都变为废墟。市民悲叹：“在你所熟悉的京都，看见黄昏的荒野飞起云雀，也会引人落泪……。”战争延续了十一年之久，双方首领真心作战只是最初的二、三年，此后则是欲罢不能地对峙着，武士和足轻们与其说是在互相争战，不如说是热衷于抢夺市内的财物。后来，引人注目的值得抢夺的财物已经没有了，武士们便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感觉厌烦，都纷纷返回了家乡。其中也有联合土一揆举行叛乱的。这样，在京都已没有战斗的武士，公元1477年（文明九年），战争就结束了。

应仁、文明大乱，搞得将军家和幕府重臣各家四分五裂，几乎陷于同归于尽的地步。在战乱结束的四年前，将军足利义政让位于足利义尚，在战乱后，他建筑别墅（银阁）于东山^①，朝廷

^① 东山：京都市内。——译者

和幕府都沉迷于夜以继日的酒宴，为了这种游乐而将明日上朝的服装也典当给酒家了。将军的权威扫地，细川和山名等三管四职家也无法挽回昔日的权势了。

大名和武士们争夺领地的战乱从此波及到全国，名副其实的战国乱世延续了一百多年。家臣背叛主子，巧妙地攻占了主家，却又立即被他的部下所攻占的事例，也不稀奇。大名不把将军放在眼里，天皇的印象也淡薄了。当时的统治者称这种旧有秩序和权威阶层的基础的变动为“下剋上”（下层克服上层）。这一名词已经见于镰仓时代，即十三世纪中叶，在应仁、文明乱后这种情况已经泛滥到整个社会。

山城的国一揆和加 贺的一向一揆^①

“下剋上”的根本内容，就是指各地百姓和国人们反抗领主、争取自立的斗争，公元1480年

^① 山城：今京都府东南部；国一揆：有力武士的暴动；加贺：今石川县南部；一向一揆：佛教一向宗信徒的暴动。——译者

（文明十二年），前任将军足利义政的夫人日野富子（公元1440——1496年），在通往京都的七个道口设立了新关卡。民众为反对这些关卡进行了大规模的一揆。群众捣毁关卡，进行了有领导的“民间德政”（依靠人民实力的德政），连幕府也没放在眼里。与此相呼应，在北大和^①地区也发生了土一揆，焚毁了有名建筑物兴福寺十三层塔等。而到1485年（文明十七年），近江、山城、大和一带的土一揆和细川、山名等幕府重臣的部下武士、恶党等人结成一体，要求德政，在大和地方，用“大和国惣百姓等”的名义，要求兴福寺、东大寺、法隆寺及其他全体庄园领主减免年贡，不再缴纳过去的欠债，并从四面包围了奈良。虽不知结果如何，但在大寺社领主权即使巩固的直辖领地，领主们的统治力量也早已支离破碎，这里的民众都不把领主放在眼里，而普遍地把各村庄都组织起来了。

这一年底，在南山城出现了有名的山城的“国一揆”（国人的一揆）。也就是：畠山氏同

^① 北大和：今奈良县一带。——译者

族之间的战争波及此地，国人为反对双方武士的进入，联合起一般农民，实现了关于两军撤出、寺社和本所领地归还旧主^①、撤销新关卡等三项要求。住民此后决定由有势力的国人三十六名（一说三十八名）组织的会议作为最高决议机关，并规定了每月值班的执行机关，称为“月行事”，进行自治。国人之间不久发生分裂，加深了国人和一般农民的对立，部分国人成了以守护身分进入此地的伊势贞宗的部下，其他则成了别的大名的部下，所以山城国一揆的自治经过八年就瓦解了。但是，国人统治的每个村庄却存在下来。

近畿地方的一揆，从山城国一揆消灭的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衰退，但从这时起，在农村的阶级分化较近畿地方为迟的北陆、东海、中国等地，在国人们指挥之下，强有力的一揆不断兴起。典型的例子，是北陆地方以加贺为中心、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一向宗（佛教净土真宗）信徒的一揆（一向一揆）。

^① 这种要求乍看起来，象似要求恢复庄园制，但主要目的在于排除武士的统治。因为寺社和本所的领主权已经被群众所削弱，所以群众认为这样一来，比起武士的统治更为好些。

亲鸾的净土真宗。后来分为高田专修寺派、佛光寺派和奉有开山祖师遗骨的“大谷庙所”即本愿寺派。一向一揆是本愿寺派信徒的一揆。这一派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在近江到北陆方面拥有大批的信徒。十五世纪中叶，开山祖师直系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1499年）出世，依靠他的势力，他们在北陆地方的教团迅速发展。莲如实行了教祖的关于法主和信徒在佛陀面前一律平等的“御同朋和御同行”（即朋友和同伴——译者）的教导，他和农民信徒促膝交谈，把用通俗易懂的假名文字讲解教义的书信，大量寄给信徒，吸引他们。为了使信徒相互加深信仰，并组织了“讲”。这种“讲”不问领主是否相同，而是根据地区来组织的，这一点很象近畿村庄的“惣”。而有了自己组织的农民们则指责其他佛教宗派，甚至常常违抗领主的命令。“讲”也成为群众的反抗组织。“讲”的指导者是国人和地侍们，在他们之中也有的是占据全郡的大地主。

应仁、文明之乱时，加贺的信徒支持守护富樫政亲，消灭了反对派（公元1474年），富樫政亲

占有了加贺全境的领地。但是，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佛教一向宗信徒对于武士斗争的胜利。信徒对领主总是不履行缴纳年贡课役的义务。莲如经常指示信徒不要毁谤别的佛教宗派，要服从守护和地头，但无效果。信徒和富樫政亲的对立日益严重，公元1488年（长享二年），二者终于正面冲突。信徒方面拥立富樫政亲的同族富樫泰高，以十三万余人的大军消灭了政亲。后来富樫泰高当上了守护，但不过徒有其名，实权则由信徒的有势力的国人所掌握。此后约一百年间，加贺一国成为“百姓所有”。换言之，实现了百姓的领导者即有势力的国人阶级的统治，而“讲”却成为国人统治一般农民的机构。这和山城国一揆是由国人统治农民的组织是一样的。

庄园制的肃清和皇室的衰落

土一揆最后成为国人和地侍用以扩张势力的工具。利用土一揆群众力量的国一揆、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向一揆，虽不久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村庄都处于新的封建领主统治之下，但土一

揆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却起了巨大的作用。席卷了如此广大地区的一揆，是当时群众斗争的顶峰，而规模较小的，虽然称不起是一揆，但不缴年贡、逃散、有时规模不大的强诉等各种形式的国人和百姓群众的反抗，却到处发生。而通过这种不断的斗争，就使得由公家、寺社等庄园的本所和领家以及武士对群众所进行的重重统治和掠夺的体制愈益迅速崩溃。

与此同时，从十三世纪以来发生的下人们上升为小自耕农和百姓名主向地主和小农的分化，更加快了发展，先进地区到十六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在这些地方，形成了以小自耕农为主要成员的村庄。在稍为落后的地方，国人阶层统治村庄的力量也强大起来。在这些农村和农民的历史性的变动中，能够控制村庄统治阶级的是充当新的封建大领主即战国大名；没有当上战国大名的守护大名们和凌驾在他们上面的室町幕府就在不断的内讧中很快地衰落下去。因此，仰赖幕府保护和有限的庄园收入的皇室和公家也衰败到了极点。

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六世纪中叶止，各地不用朝廷所定的年号，而用当地人们任意规定的年

号（非公家的年号）的例子，就有不少。这表示在地方的领主和群众眼里已经完全没有朝廷了。

另外的例子是：公元1502年（文龟二年），后柏原天皇打算举办即位大典（二年前已经即位），因经费困难，乃下令管领细川政元捐献，细川政元说：“对于宫内来说，举行即位大典也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举行这种大典，没有教养的人也不会把天皇看作是国王。而不举行大典，我也会认为天皇是国王。因此一切大典都是与末世不相适应的。”他以此为托词而拒绝捐献。朝廷对此竟无法反驳，却决定：“诸家和公武说得很对，因此不再举行即位大典。”这充分表现了朝廷的穷困和权威丧失的情况。

下一代的后奈良天皇也很难举行即位仪式。当时的朝廷每当冬季初雪之日，照例举办赏雪的宴会，但到后奈良天皇天文元年（公元1532年）首次下雪的日子，据说因为没有酒，只是观赏一番雪景就完事了。连天皇都是这样，那么一般贵族的穷困就更加严重，身为中纳言（副三品官——译者）的公卿沦为乞丐，关白家连聊以防寒的衣服都没有，这些都是事实。

战国大名的割据

在这期间，新的战国大名是和中央幕府权力无关的地方领主或武士们，他们是在“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习性”，即在对领地的生死争夺中成长起来的。在东国、骏河^①守护今川义忠的食客、连私人固有领地都没有的武士伊势长氏（后来的北条早云，公元1432——1519年），成为有势力的人物。今川义忠在镇压领国远江^②的国一揆时阵亡（1476年），今川氏一族因而发生内讧，伊势长氏当时因调停有功，领得了富士郡作为领地。他以此为起点，乘关东管领家争权夺势的机会，逐步扩张领地，1495年攻占小田原城，并迁到这里作为根据地，再把势力伸张到关东的南部，子孙相承，势力强大。

在甲、信、越^③地方，越后守护上杉氏的家

① 骏河：今静冈县东部。——译者

② 远江：今静冈县西部。——译者

③ 甲、信、越：甲指甲斐，信指信浓，越指越后与越中，现山梨、长野、新潟、富山等县。——译者

臣长尾为景逐步凌驾主家之上，1507年杀死了主人。其子长尾景虎于1561年迫使主家让出家督，改名上杉政虎（后名辉虎、谦信，公元1530—1578年），自称关东管领，辖有越后和关东北部之地。在甲斐地区，守护大名武田氏在武田信虎及其子武田晴信（武田信玄，公元1521—1573年）两代之间，巩固了整个甲斐国，还领有了南信州和骏河、远江的一部分。

在东海地区，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今川氏身为骏河、远江二国守护，很有势力。三河国^①松平乡小领主出身的松平广忠及其子松平家康、（德川家康，公元1542—1616年）稍迟于今川氏而登上政治舞台。在尾张地区，越前织田庄小领主出身、在斯波氏下面做官、当上了尾张守护代（副守护——译者）的织田氏一族之中，出现了织田信秀，他拥有最大的势力。他的儿子是织田信长（公元1534—1582年）。在美浓，山城商人出身的斋藤道三（1494—1556年）取代了守护土岐氏。

^① 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译者

在近畿地方，守护家的争斗和“下剋上”也和别国相同。在这里，小领主的势力都不相上下，而土一揆和国一揆的暴动虽然平定，但作为一揆基础的国人和农民在每个村庄的力量都很强，而且商业发达，建立了住有富庶町人（商人和手工业者——译者）的町镇，进行自治（后文叙述），哪一个小领主也制服不了这些村庄和町镇，因而没有出现象东海、关东和西国那样大的大名。只有近江的浅井氏伸张了势力。

在北陆方面，一向一揆强大，在越前的朝仓氏之外，没有产生有势力的大名。但是，加贺的一向一揆从十五世纪中叶把该国搞成“百姓所有”，到十六世纪，在一揆内部，国人阶层和一般百姓的矛盾有所发展，1531年本愿寺派来的武士组织农民，建立了“大一揆”，来对抗国人和国内寺院有力僧侣联盟的“小一揆”，大一揆终于搞垮了小一揆。这件事与其说是农民的胜利，不如说实际上可以称为大名的本愿寺的胜利，加贺国实际上已经变为他们的领地。

在中国地方的东部，播磨、备前^①、美作的

^① 备前：今冈山县东南部。——译者

守护赤松氏被守护代浦上氏所篡夺，浦上氏又被家臣宇喜多氏所灭。在中国地方的西半部，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大内氏既为周防、长门、丰前^①的守护，也进行对外贸易，夸耀为有财有势，但到大内义隆时，家臣陶隆房（后改名晴贤）于1551年举行叛乱，大内义隆父子和从京都逃来依靠他的几名公卿都被迫自杀。就是这个陶氏又为大内氏的家臣、安艺国^②小领主出身的毛利元就（公元1497—1571年）所灭（1555年）。毛利元就此后逐步将山阳和山阴的大部土地收归己有。

四国方面，以阿波^③和赞岐为据点，拥有巨大势力的幕府管领家细川氏被家臣三好氏夺取了实权，这实权又转移到他的家臣松永氏，在这样反复进行的“下剋上”争夺之中，势力都削弱了；土佐的地侍性质的小领主长曾我部元亲（公元1539—1599年）陆续击灭了该国内同样的小领主七十余家，到1581年又把守护一条氏赶出国界，而

① 丰前：今福冈县东部和大分县北部。——译者

② 安艺国：今广岛县西部。——译者

③ 阿波：今德岛县。——译者

征服了四国的大半部土地。

九州方面，丰后的大友氏和萨摩^①的岛津氏从旧有的守护大名成长为新的战国大名，与此同时，守护少貳氏的部下龙造寺氏也凌驾于主家之上而强大起来。

在当时最为后进地区的奥羽地方，奴隶主性质的小领主散居各地，其中伊达、南部、最上、苇名诸氏管辖着附近的小领主，到十六世纪中叶，伊达氏逐步压服了其他各氏。

战国大名的特征

这些战国大名们正如俗语所说的“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那样，他们互相攻占别人的领地，昨天联合甲来倒乙，今天又和丙一起来倒甲，夺取主家，推翻一族，或用奇袭，或用暗算来扩大其势力，但不知何时又被别人用同样手段打倒，因此不能麻痹大意。“男子出门，有敌三人。”不，说不定敌人就在自家里。长曾我

^① 萨摩：今鹿儿岛县。——译者

部元亲的《一百条》里规定：男方如不在家、只有女方时，座头^①商人、歌舞艺人等男子汉，虽为其亲属也一律不许进入她的家门。如果在家的女方患病时，经过亲属商议，只许派代表一人去探望。在武田信玄的家法中规定：即使夫妇同在一处，也不要片刻忘却刀剑，云云。

战国大名统治领国的机构，因年代不同或领国的阶级关系不同而有所不同。起初（落后的地方直到后期）和以前的守护大名无大差别，大名只是直辖领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归由当地的小领主领有，大名统辖这些小领主，只让他们担负军役等义务。但是，大名却致力于直辖整个领国，一有机会就剥夺领内小领主们的独立权，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家臣，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名本人的直辖领地。即使把这些土地作为“知行”（封地——译者），重新赏给旧有的领主，也要尽量缩小以前那样统治居民的权限，换言之，也就是企图贯彻纯粹的封建领主的统治。这时候如大名北条氏所进行的，不断唆使农民对付小领主。本愿寺

^① 座头：日本中世纪商工业和演艺等方面都有统一的组织，名叫座。座的首脑叫座头。——译者

在越前唆使“大一揆”对付“小一揆”，也是用同样的手段。

发展起来的战国大名就是这样实现了整个领国的直接统治，把家臣编成了叫作奉行、组头、寄亲、寄子这样的阶层的军事组织而加以统治。这种阶层的名称因大名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这种组织，同时也是统治领民的机构。这是因为到十六世纪中叶，大名家臣的武士不分上级与下级、平时都住在他的知行地点、武士的上层兼任管辖郡和村的行政官的缘故。最低层的“组子”是农民。在中级武士之中，兵和农也还未能截然分开。

随着不断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常备军。而在战术上，除了骑马武士的单骑战，还组织了足轻即步兵的枪枝队和弓箭队，后来还进行了炮队的集体战。炮队的重要性越来越增加了，并须长期训练，因而也提高了常备军的必要性。于是如后文所述，把武士和兵士从农村和农业脱离开来，编成专门进行统治和战斗的集团，使之集中居住在大名城下，即进行兵农分离，这种办法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了。

十二 自由城市的萌芽

——生产、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城市

自耕农的成长和农、渔业的发达

从镰仓幕府灭亡到战国大名割据长达两个世纪的不间断战乱之中，如前所述，奴隶制的遗迹遭到彻底地清除，在社会基层，农民中发展了小自耕农并进行了地区的联合；在上面则成长了大土地领有，这些都是促使生产和商品流通迅速发展基本条件的提高，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矿山的开发，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海外贸易的发展都给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带来新特点。

农民的赋役减少了，年贡和课役的主要形式转变为缴纳税米谷等实物和货币，尽管他们仍然是隶属于领主的农奴，但却扩大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自由地进行劳动和经营农业的余

地。这些事发挥了农民提高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业技术前进一步。

水稻方面出现了早稻、中稻、晚稻这样收获期不同的品种，而在每个品种中又培育了适合于不同地区、气候、地力、水利等条件的许多品种。在小农中用牛、马耕种也普遍了，灌溉技术方面，把水车安置在河流上、用水力带动进行灌溉也颇为普及。公元1406年，来到幕府的朝鲜使节，在摄津的尼崎附近看到优秀的日本水车和甚至可种三季稻的情况甚为赞赏。

在土地被许多领主分割占有的地方，河川的管理和水渠的修建比较迟缓，但在集中领有一个地方的战国大名之下，水利得到迅速发展。战国大名为战争而促进了建筑坚固城池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也应用到灌溉和排水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能够动员广大领国的人民，这样就有可能建设大型土木工程。武田信玄在釜无川和笛吹川上建筑了迄今仍称为信玄堤的有名堤坝，开垦了甲府盆地^①，这是战国大名管理河川和开垦耕

^① 甲府盆地：今山梨县一带。——译者

地的典型事例。

到十五世纪开始割草积肥，即把嫩草和嫩叶大量铺于田地里作为肥料。为此，林野就有了和耕地不可分割的重要性，从而对林野的所有和使用，便不断成为村与村、领主与领主争斗的目标。由于精耕细作集约农业^①的发达，下层农民才有可能对水田进行米麦两季耕种。这种耕种在以前只限于近畿和山阳等地，这时已经普及到关东地方。大豆、小豆等杂粮的复种也在进行，旱田两季、三季耕种，也成为普通的事。在京都这样大的消费城市的郊区也发展了专为出售而栽培的蔬菜业。

经济作物方面，在濑户内海沿岸大量种植了可榨灯油的白苏和芝麻。这些产品统统由大山崎油座(油业行会——译者)的商人收购，用船运于山崎，榨取油类。在经济作物中除茶、漆、桑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在十五世纪的末期已经开始种

^① 集约农业：也称集约农法。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用大量资金和劳动力，以求获取更多农产品的农业办法。相对的是“粗放农业”，即在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小量劳动力和资金进行耕种的办法。——译者

植棉花。在十四世纪末开始输入了朝鲜的棉布，后来输入年年增加，到十五世纪中叶，作为衣料用的棉布更显得重要了。这样，到这一世纪的末叶，便开始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经过十六世纪，逐渐得到了推广。三河棉花很早就是有名的。为了提取染料，也是在这一时期推广种植蓝靛草的。

捕捞海鱼的渔业，在十五世纪也取得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也有了适应沙丁鱼、家鲫鱼、鲷鱼等鱼类专用的渔网，也制造了曳网，为封建时代的捕鱼业打下了基础。海鱼腌咸后推销到内陆各地。

采矿冶金和手工业的发达

矿业方面：铁仍和以前一样只能生产铁砂；铜从十四世纪起生产激增，到十五世纪已能向中国大量出口。以但马的明延铜山和备中^①的吉冈铜山为首的但马、美作、备中、备后^②等地，不是露天开采，而是挖掘坑道开采矿石，然后进行冶

① 备中：今冈山县西部。——译者

② 备后：今广岛县。——译者

炼。银矿则于十六世纪初，发现了石见^①的大森矿山；博多^②的贸易商让两名冶炼工学习朝鲜和中国先进的灰吹法^③冶炼技术（公元1533年），从此银矿的开采飞跃发展。黄金也不象以前那样只靠砂金，而是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了。战国大名为了取得军费而积极开采金矿，最早的有甲斐的武田信玄所开采的黑川金矿和本来是骏河的今川氏所有、后来为武田氏所有的富士金矿等。开采金、银、铜矿的发展为后来铸造货币提供了前提条件。

经济作物和采矿冶金的发达，是同各种手工业的发达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各地有了各自的名产品，也进行了地区的分工。京都的西阵用中国进口的生丝织出高级的绸缎，这种技术推广到周防的山口和和泉的堺市，此外，在丹后^④、美浓、尾张、越前、加贺^⑤等地也织出了绸缎。

① 石见：今岛根县西部。——译者

② 博多：福冈市东半部。——译者

③ 灰吹法：银矿含有铅，用灰吸收铅质，使银纯净的方法。——译者

④ 丹后：今京都府北部。——译者

⑤ 加贺：今石川县南部。——译者

而用木楮和雁皮（瑞香科植物——译者）等为原料，按照用途造出特殊质量的纸张，成为备中、美浓、播磨、大和等地的特产，在全国寺院、武家和商人之间有大量的需要。尾张濑户^①的磁器推销到全国；河内的金刚山、筑前的博多、大和的奈良的酒，以天下美酒而驰名远方，这当然是武将和富豪们的饮料。

在手工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生产农具、手工业工具、锅釜等生活用品和刀剑的锻冶、铸造工业。到十四、十五世纪为止，地头和庄官一级的在乡领主在其宅院内开设作坊，由其隶属的锻冶工、铸造工生产自家用用品外，将其剩余产品推销到市场；此外，当时还有了流动各地的工匠，在京都、堺市、镰仓已经集聚了许多自营手工业的工匠。到战国大名出现时，根据农民对农具和刃器的迫切需要，锻冶工和铸造工普遍地脱离了领主而独立。只有一部分人，作为生产武器者而隶属于大名。町镇村庄的自营工匠也增多了。在河内、大和、播磨、能登^②、下野、筑前

① 尾张濑户：今爱知县濑户市。——译者

② 能登：今石川县能登半岛。——译者

等地出现了铁器的有名产地，也有了筑前芦屋的釜、播磨的锅等特定器具的有名产地。

手工业品种的增多和各地区特产品的出现，这是以与年俱增的需求为前提的，但这些工匠并不是作为农业业余的副业，而是作为专业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当时有了象锻冶工那样的典型，即由隶属于主人的半奴隶的生产而发展为工匠的，他们有作坊和工具，他们是按需要者的定货、并用定货人交来的原材料、收取加工费进行独立加工生产的；也有的工匠是以自备原料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的。木工、瓦工、石工、家具工匠等在把公家、寺社、武家作为他们的主要需要者的时候，就不得不隶属于他们，但因城市发达了，市民建造住宅和店铺的需要增多了，于是他们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也就多起来。就是这样，社会的分工便很快地发展起来。

商业城市的形成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生，当然是要和商业的发展相联系的。第八章所述的地方市场

由不定期转为定期，而且次数增加，每隔八日或者六日、四日即有集市。现在地名仍有四日市和八日市等，就是从中世纪的定期市集而来的。后来变为常设的集市，商人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町镇。琵琶湖沿岸和淀川一带的町镇，以及自古以来同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如堺市、兵庫、尾道、博多等），更加繁盛了。北陆除敦贺、小滨之外，还有新兴的越前的三国凑和越后的柏崎。柏崎是联系出羽方面的交通要港，据说到十五世纪后期仅在集市地区就有商家三千户。此外，伊势湾的桑名和安浓津（码头），也兴盛起来了。

在寺社的门前，奈良的町镇继续前代而发展。大阪天王寺前和伊势神宫前的山田等地，都作为新兴城市而繁荣起来，到十五世纪中叶两者都成为几千户的町镇。

在室町、战国时代，出现了大名的城下町。大内氏的城下町山口，是附近一带的商业中心，而和明朝贸易的豪商以繁荣自豪。为避应仁、文明之乱，公家迁移到京都者也很多，京都具有了可以称为西国的文化的气派。到十五世纪中叶，在太田道灌居住的城堡发展起来的江

户，^①集中了关东各国的物资，在城池的前面连日出现了大的集市。京都在应仁、文明之乱时烧毁了，而且作为这里的商业繁荣的一个基础的庄园领主——公家没落了，幕府衰败了，因而暂时变为萧条。但在近畿等地的商业得到了发展，从十六世纪初，以京都为中心地而恢复得比以前更为繁华了，而且公家和幕府的没落反而加强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即町民的势力。

在大的集市和町镇出现了象京都室町的稻米市场和淀市的水产市场那样的特定商品的专门市场，也有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区别。问屋（批发商——译者）和仓元^②本来是庄园领主储存和保管物资的货栈，现在却成为独立的大商人和运输业者，并包揽庄园的年贡和从事高利贷盘剥。等到遥远城市之间的贸易一发达，也开始了利用汇票寄款的办法。

大规模的行商也出现了，商人们用大批脚夫搬运商品，编成几十人的队伍，为防盗贼，武装

① 江户：今东京都地方。——译者

② 仓元：亦写仓本，镰仓室町时代的金融業者，多为寺院和富裕商人等经营的，也有庄园的庄官经营的。——译者

起来，到达远方。近江的商人集团，在这一点上的发展是极为显著的。

勘合^① 贸易和倭寇

如此发达的国内商业，在十六世纪初，仍受和领主有密切关系的“座”所垄断。

到室町时代初期，对外贸易完全由民间自由交易，除平氏之外，其他有权势的都不重视，但等到利益多起来，从足利义满时期就由幕府加以统制了。在足利义满以前，足利尊氏为了取得营建天龙寺的费用曾向中国派出名叫天龙寺船的贸易船，但这还不是幕府为了垄断或者统制对外贸易。足利义满乘朝鲜和明朝^② 要求取缔倭寇的机会，如前所述，他一面对于明朝皇帝自称“日本国王臣源”，发誓禁止倭寇，同时用日本国王向明朝皇帝朝贡的形式开始贸易，并对这种贸易进

① 勘合：指特别许可的。——译者

② 中国于1368年，元灭明兴；朝鲜李氏于1392年灭高丽王朝，建立朝鲜国。从这时开始，倭寇侵袭朝鲜和中国沿海频繁起来。

行了统制。

足利义满根据博多豪商的献计，幕府和明朝朝廷双方决定从公元1404年起，发行叫作“勘合符”的特许证，只有得到这种证件的船只方可贸易。勘合贸易船是载重一千石（一百吨）左右的船只。这种对外贸易采取附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形式，所以明朝不仅减免关税，而且连“日本国王”的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实际是商人）的食宿费用及“朝贡”品的运费，都由明朝负担。对于“朝贡”物品，还要赐给价格更高的回赠品。贸易是作为朝贡的附带的形式进行的；每次交易，包括上述回赠品在内，可获得原本的五至六倍的利益。

这时日本进出口的品种，和同宋朝贸易时代无大差别，但刀剑和硫黄的出口多起来了。取得许可证组成贸易船的虽然是幕府、大内氏、细川氏、天龙寺、相国寺以及其他有势力的守护和受幕府保护的大寺社，但采购出口品，出售进口物资，实际上都是京都、堺市、博多等地的大商人，其利益大部分进入了他们的腰包。

既是自由贸易的商人、又是海盗的倭寇，仍旧使用挂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子，叫作八幡船的小

船，不怕狂涛巨浪，不顾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缔而在活动。由于明朝的许多商人也希望自由贸易，所以即使没有许可证也能进行贸易，而明朝船只也常到日本。等到幕府衰败，细川氏和大内氏等也软弱无力时，以公元1549年的遣明船为最后一次，这种特许贸易就自然消灭了。从这时起，由于明朝也加强了对自由贸易的限制，所以明朝人中也陆续出现海盗，他们和倭寇联合起来，从1540年到1556年，在华中和华南的沿海一带进行了大的骚扰。明朝利用镇压的机会，禁止了对于日本的一切贸易。此后，到中国方面去的倭寇不多了，但冒险的日本人在新开辟的和葡萄牙、西班牙的交通的刺激下，向东南亚发展。

日本本土和琉球王国 有着唇齿的关系

室町、战国时代，日本和琉球王国的自由贸易兴盛起来。琉球本身没有出口物资，依靠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转口贸易而得到繁荣。

琉球列岛的居民，不论其人种或语言都是日

本本土的一个分支，在冲绳岛上发现过日本本土绳纹陶器系统的陶器。琉球人和九州南部人的来往，大概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冲绳社会和日本本土社会保持经常的接触是十三世纪。当时冲绳岛是由许多独立的按司（即族长）统治着的部族国家。十二世纪末，在首里附近浦添的按司有名叫舜天的，是冲绳岛中部地区一带的统治者。传说舜天是源为朝住在此地时和当地姑娘所生的儿子，这种传说到十六世纪末已经出现，但这纯属传说，说源为朝来过此地也并非事实。然而，从这时起，冲绳人和九州人的来往已是频繁的了。

十三世纪中叶，舜天系统的王朝灭亡，1260年英祖成立了新王朝。这时候，在冲绳岛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立了统一该地区各部族国家的国家，后世称北部的国家为北山或者山北；中部的国家为中山；南部的国家为南山或者山南。三者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权势之争，中山（即英祖创立的王朝）的势力最为强大。中山王于公元1312年开始向中国的明朝朝贡。南山王和北山王也相继仿效。

公元1349年，在中山出现了名叫察度的浦添按司，推翻了英祖王朝而成为中山王。据说他从

日本的商船上买进大批铁块，制造农具分给人民，颇得人望云云。这也是一种不知确否的传说，但关于冲绳社会开始使用铁器的说法，都认为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铁器及其生产技术恐怕是从日本本土传到那里的。

到十五世纪的前期，中山王尚巴志灭了南山和北山，建立了冲绳全岛的统一王朝，并逐渐将其势力扩张到琉球列岛各地。在这个统一王朝的基础上，琉球的文化很快地得到发展，经济方面也依靠东亚各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获得空前的繁荣。同日本本土的平等互惠的来往和贸易颇为发达，这也是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纪的事情。琉球首里城正殿所挂(公元1458年)的大钟的铭文记有日本和琉球是唇齿关系一语^①。琉球不

① 公元1458年，琉球王尚泰久五年挂在首里城正殿钟上的铭文。原文每行九字，现将二行并作一行书写如下：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	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	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	方刹(中略)	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	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	津梁异产至宝充彻十	铭曰
须弥南畔	世界洪宏	吾王出现	济苦众生	截流王象	吼月华鲸	泛溢四海	震梵音处
觉长夜梦	输感天诚	尧风永扇	舜日益明	戊寅六月十九辛亥	大工藤原国善	住相国溪隐叟志	

仅从日本运进物资，而且采用假名文字，在日常生活方面使用了日本式的汉字夹杂假名的文件。在佛教和寺院的建筑式样上也采取了日本的传统。日本和琉球之间的文化关系在此之后也更加密切了。但在贸易方面，在日本船直接开往东南亚，在东南亚和中国船进行交易之后，日本和琉球之间的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衰退了。

自由城市的萌芽

幕府没有力量利用特许证来统制贸易时，在国内商业方面，幕府守护大名及其所属小领主对“座”的垄断商人的控制，也就没有什么力量了。一方面，保护“座”的旧有领主的势力和威信扫地；另一方面，町、村纷纷出现了新的小商人；手工业“座”的工匠也要求独立自由营业。这就是工商业界的“下剋上”，他们不把“座”的独占权放在眼里了。而且新兴的战国大名为了巩固领国统治权，便采用剥夺小领主们的支配土地和统治人民权力的同样手段，剥夺了其对市场的统治权，许可商人自由活动，发展国内的手工

业，以求领国经济的繁荣。战国大名否定集市和“座”的独占特权、承认自由营业的政策，以公元1549年（天文十八年）近江的佐佐木氏在其领国内所搞的称为“乐市”和“乐座”为最早。依靠这样“市”和“座”，用商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网，从小的地区扩大到大名的整个领国，进而开始形成了联系着这些大名势力圈的广大地域的商业。

商人经济力量增长的同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町镇开始具有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自由城市的特征。这是和农村的自治的“惣”相对而言的。在堺市、平野、博多、桑名、大凑、宇治山田等地，町镇的豪商形成了象“惣”的“大人”、“年寄”那样的叫做“会合众”的领导机构来进行自治。在京都虽然没有整个城市的自治机构，但祇园、清水、北野等社寺门前町和室町等市场町都分别拥有了町民的自治机构。成为祇园社氏子（居民——译者）的町民所办的祇园祭（节日活动——译者），是他们加强团结、夸耀富有的场所。

堺市的盛衰

在各城市中，堺市是典型的自由城市。堺市作为联系濑户内海沿岸和畿内的要港，从很早就已繁荣。起初是相国寺的庄园，由其代官（地方民政官——译者）进行统治，到十四世纪末叶取得了“地下请”（承包赋税——译者）的权利，后来也不缴纳年贡了，市政通过叫作“纳屋贷”的大批发商三十六人的“会合众”的商议来进行。堺市不仅进行国内商业，而且发展和明朝、朝鲜、琉球的贸易，后来还和葡萄牙、西班牙的船只以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十六世纪中叶发展为日本首富的城市。而在铸造业和刀剑的生产方面也具有“堺锻冶”的盛名。堺市也是生产纺织品、酿造和漆器的有名的工业城市。

应仁乱以后，堺市成为各大名不断争夺的地方，所以市民从十六世纪初用濠沟将市区的三面围起（另一面是海），雇用闲散武士以防外部侵入。从此以后，谁也扰乱不了堺市的秩序和安宁了。来过这里的葡萄牙传教士写道：“日本国里

虽有战争，但到此地，即使是敌人也象朋友一样地谈话和交际，在这地方是不许斗争的。”当时堺市的人口超过五万人，虽然比不上十五世纪欧洲最大的自由城市威尼斯、米兰、巴黎的十万人人口，但却能和伦敦、热那亚（意大利——译者）巴塞罗那（西班牙——译者）等相媲美，外国传教士也把堺市看做和威尼斯一样的富裕的自由城市。

但是，以堺市为典型的城市的自由发展和新的封建大领主——大名的力量强大了一样，也象先前被压制的农村自治的“惣”一样，又遭受了压抑。战国大名的“乐市”、“乐座”和培植工商业城市的政策不过是谋求自己富强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在巩固领国统治的过程中，把工商业者都集中到城下町。城下町是大名及其家臣集团所统治的军事和政治的城市，他们利用和控制工商业，为他们生产或供应军需或生活享用的物资，还为他们贩卖从领民那里掠夺的年贡。在这样的町镇里，市民是得不到自由和自治的。堺市虽然用它的财富的力量一直坚持维护了自由，但到公元1569年终于被织田信长所压制（后文叙述）。

堺市的统治阶级“会合众”等大商人同劳动市民的关系并不象在农村中“惣”的“大人”、“年寄”等同一般农民之间那样亲密的结合，不能组织市民大众。而堺市财富的主要基础的贸易，虽然在进口方面有大名和少数富豪所用的军需品和奢侈品，出口也有手工艺品，但主要却是银和铜。由于这些进出口品都不和日本农村经济相联系，没有促使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堺市同周围的农村很少联系，甚至常常与农村发生摩擦，以及在堺市周围没有发展和能够互相联合组织起来对抗大名的那样城市（堺市为了反抗织田信长，只和平野市暂时联合过）。这些都是象堺市这样的城市终于未能战胜强大的大名的原因。

日本的自由城市在尚未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就被压制下去了。但是，能够产生自由城市的这种经济和生产力，是任何封建统治者也不能抑止的，而封建统治者只能在进行封建统治时对他们加以利用和统制而已。他们能够利用它，就使得他们能够统治领国。事实说明这种经济和生产力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织田信长直到丰臣秀吉统一天下的重要经济条件之一。

十三 国民的生活力与文化

——文化的大众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

公家完全失掉创造力

商人和手工业者曾经是朝廷和社寺的所属贱民，但是他们居住的町镇却富冠日本，而曾经统治他们、并由人们公认为神的子孙的皇室和贵族在这时已名存实亡地衰落下去。由于社会从最下层到最上层产生了这样的大动荡，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享受者也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其形式和内容也随着有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基本的倾向是：古代贵族的因素的没落和农村、城市的大众的因素的上升，于是文化普及到各地域和各阶层，从而加深了文化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在上一时代已经萌芽了的统一的民族文化更加前进了一步。

在南北朝内乱时期，作为公家阶级所创造的文化，有南朝北畠亲房所写的可以称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的书籍《神皇正统记》。这部书开头写道：“大日本乃神国也”，认为日本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永远统治国家，“三种神器”的继承者乃是正统的皇室。北畠亲房在书中还十分热情地主张南朝的正统性，而否认在贵族阶级之间的顽固的末世思想。北畠亲房学习儒教的政治思想，认为君主的品德和政治的良否是决定其命运的，率直地评论了历代天皇的品德和政治（本书第十章第五节曾引用过该书的一段），他甚至认为只要武家政治能够获得人心，那么就有其存在的理由。这是日趋没落的公家阶级的思想最后的死灰复燃的表现。

京都神官出身、站在接近公家阶级立场的吉田兼好（公元1283—1350年）的随笔《徒然草》，一方面以对衰败下去的贵族文化的憧憬为基调，一方面对追求金钱加以肯定等等，这是他正视社会的现实，并肯定这才是人的本来面貌。吉田兼好很好地观察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他和武士阶级似乎也有相当的接触。

虽非公家贵族的作品，但充满了对于南朝的深刻同情的、以南北朝内乱为主题的历史文学，则有似乎在南朝灭亡后不久所写的《太平记》。相传此书著者是叫做小岛法师的僧侣，它相当客观地描述了进行生死斗争的各阶级的动向和思想。这部书以后通过叫作《〈太平记〉读解》的讲故事的僧人的讲解而在武士中间普遍流传。

此外，在此以后，公家阶级或接近这一阶级立场的文化创造是没有值得提出的。他们虽然写下了《和歌》，但不过只是追求“秘传”的形式。他们由于喜爱复古，对当时只在他们的阶级中间流传着的《日本书纪》和《源氏物语》等古典著作，进行了抄写和注解，这是具有保存古典的意义的。他们喜爱复古，所最关心的，不过是精细入微地描写“有职”^①的公家礼仪方面的雕虫小技而已。

没落时期的贵族思想，在据说是在应仁、文明之乱时，由当时的关白一条兼良所著的妇女修养书《修身》中的下述一节充分表现出来。他写

^① 有职：原意为有识之士，博学之人。后来有职专指朝廷的礼仪和活动等事项；故实专指武家的有关事项。——译者

道：“在和男人相处之中，听到告诉我们昨天已逝、今天已暮的傍晚钟声，也要有万事无常之想！”“何况女人是大六天魔王^①的眷属，为了妨碍男子成佛才化为女人而降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要创造文化当然是办不到的。

大众化的室町时代文化

关于室町时代的文化，是以建有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别墅“金阁”的北山和建有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别墅“银阁”的东山的名称，而称之为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的。一般说这种文化是武家（幕府——译者）文化和公家（朝廷——译者）文化的综合或者混合等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一时代，如前所述，公家没有任何文化的创造力，甚至连保持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了。当然一个时代的文化不能说是和前代文化完全没有联系，象室町时代文化代表之一的《谣曲》的题材中就有古典文学的因素，它

^① 大六天魔王：佛教说欲界有六天，第六为他化自在天，拥有许多眷属，障碍佛道，称为第六天魔王。——译者

的唱法又采用了《今样》和《朗咏》等的唱法；如果指这种关系为公家文化和武家文化的混合和综合，那么所有时代的文化也同样都是前代文化的混合和综合，所以这种关系并不限于室町时代的文化。不过金阁的第一层和中层的建筑是采用公家式的“寝殿造”，而上层是用在武士阶级中拥有基础的禅宗寺院式的，这虽然是公家式和武家式的混合，但这是足利义满的个人爱好，不能用这种个人爱好来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室町和战国时代文化的根本特征并不是什么贵族文化和武家文化的混合和综合，而是群众（这时候是指农村的国人阶层和城市中的会合众以下的整个阶层）的文化在所有领域里的发展，而其中有的只是在武士阶级中得到提炼而已。

例如在室町幕府全盛时期的文化中，拥有最高价值的是前文已经讲过的《猿乐能》（现在简称为《能》），这是从十一世纪在农村发展起来的《田乐》和用学声音、学动作以及曲艺博得观众一笑的《猿乐》融合而成的，具有戏剧的因素。以此为源流，到十三至十四世纪，出现了若干以神社为据点的能乐师的“座”（剧团一译

者)。其中属于大和春日神社(在奈良市——译者)的观世、金春、宝生、金刚等四座特别兴盛，观世座出现了观阿弥(公元1333—1384年)及其子世阿弥(公元1363—1443年)父子两代的天才，使《能乐》作为艺术而集其大成。他们受到足利义满的保护，《能》便由群众的演艺转变为幕府的《式乐》(御用戏剧——译者)。与此同时，本来是学声音、学动作、从写实出发的《能乐》，到世阿弥一代则变为象征的演出和演技，变成主要目标在于引导观众向往所谓玄妙的世界。尽管如此，但在世阿弥所写的论《能乐》的著作、又是日本人最早的演剧艺术论的《花传书》一书中却强调了能乐在任何乡村演出时，都要把符合当地情况作为头等大事，也就是要保持群众性。

在《能乐》剧歇幕中穿插演出的《狂言》，也是从《猿乐》分化出来的，是以当时群众对武士和领主的不满，领主阶级的愚蠢以及民众社会中的矛盾和滑稽的内容为主题，台词是用日常语言来讲，这是日本最初的道白剧。在《狂言》里出场的庶民妇女多半是善于思考，具有明显的权利意识、积极的行动，而且有着深厚的爱情。在这里

可以看出当时群众理想的妇女形象。

现代已与群众无缘的“茶汤”，它的源流之一也是出自畿内栽种茶树的农民进行茶叶评赛会的“茶集会”。这种集会发展为许多人以品尝茶叶为娱乐，而形成了它的礼法。另外，武士和贵族都迷恋于以品尝各地茶叶的形式，进行赌博的“斗茶”的娱乐，从这里也发展了品尝茶叶的集会。以上述两种饮茶的礼法为基础，奈良人村田珠光（公元1422—1502年）受足利义政之召，发展了“佗茶”（意为幽静的茶会—译者）。到战国时代末期，堺市商人出身的千利休（公元1521—1591年）集中了“茶道”的大成。

大众文艺的兴起

这一时代新兴的文艺有《连歌》。这种《连歌》本来是贵族之间，两人联合歌咏《和歌》的上下两句、合为一首的娱乐游戏，后来推广到武士和群众之间，发展成为五十句、一百句的联句。此后便脱离《和歌》而独立了。几个人，十几人

坐在一起，在相互联咏的微妙的呼吸继续中，不断地创作了联句，这种集体的创作方法，和《能乐》、《狂言》极为重视主角、配角、歌唱者、伴奏者之间要互相的谐调是一样的重要，这是和民众的集会、祭神的“座”的活动等群众性的集体生活的发达分不开的。

《连歌》在初期也推广到贵族社会，但只是一时的流行。来自群众的宗祇（公元1421—1502年），在他走遍全国各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之中，使《连歌》作为文艺而发展起来了。他编有《连歌》选集名叫《新撰菟玖波集》。不久又经上层阶级的手，把《连歌》变为同《和歌》一样重视烦琐的、公式化了的格律的东西，而失掉了当初自由的大众性。所以到战国时代，山崎宗鉴（公元1465—1553年）出来革新了《连歌》，尊重自由的用语和独创的格式，编辑了《犬筑波集》。从此为走向下一时代的《俳谐》开辟了道路。

群众文艺方面，在《闲吟集》中还有民间的歌谣，叫作《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也为群众所爱读。在《闲吟集》的诗歌中有充满着朴实

明朗的人性的作品。《御伽草子》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如现在儿童画册所常画的“一寸法师”（意思是矮子——译者）那样，叙述着身分虽然极低，但依靠才能和勇气也能成为贵族，成为大名的立身发迹的故事，还有以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滑稽故事以及恋爱故事等。这些作品作为小说来看还是很幼稚的，也谈不上艺术，但却表达了下剋上时代的群众的愿望和明朗的风格。

在地方上产生了文化创造力

文化的群众化，就是文化向地方的普及。不，毋宁说地方是文化的发祥地。足利氏自从足利尊氏以后，皈依佛教临济宗，建造了天龙寺，而足利义满也建筑了相国寺。足利义满按照中国办法指定京都和镰仓的五个大寺院为“五山”，进行了大力的保护。五山的禅僧充任了幕府的政治和外交顾问，和中国进行来往，从中国学习了朱子学，大量地写作了汉诗和汉文。人们称他们的文章为“五山”文学。但是无论在文艺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没有独创之处。这件事表明，到

了这个时代如不和群众相联系，就不能创造出价值很高的文化。

五山的僧侣，有人从中国学习了水墨画，用这种画装饰寺院。雪舟（公元1420—1506年）把这种画从单纯的模仿中国发展为独创的伟大的美术。雪舟的天才并不是在五山的温室里培育的。相反地，他坚决拒绝将军足利义政对他的召用，他生活在周防的山口、丰后的大分等地方，并旅游日本各地，又留学中国，用以锻炼其才能。继雪舟之后的大画家雪村（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十六世纪中叶），也是同样地在地方完成了他的艺术创作。与此相反，和贵族阶级生活密切相联系的“大和绘”（日本画——译者），在土佐光信稍为挽回了颓势之后就衰退下去。而“大和绘”的色彩感觉，由于学习了水墨画强有力的线条和宏伟精密的构图，被狩野正信（公元1454—1490年）吸收在他创造的装饰画中。还有可以称做佛教界的公家（统治者——译者）的南都北岭的大寺院，这时候在经济方面也削弱了，作为宗教也失掉了吸引民众的生命力，同时已经无法继承从前他们具有的佛画和佛像雕塑的传统了。

京都作为唯一的文化中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应仁、文明乱后，商人城市的堺市和商业也已发达了的大内氏的城下町山口，都学习京都而成为超过京都的文化中心。在堺市名叫“道裕居士”的人，印刷出版了在卷尾记有南朝正平十九年（公元1364年）的《论语集解》（魏何晏著），这是日本出版儒家书的开端。而《论语》和《医书大全》也于公元1530年由堺市的人出版。在山口则搜集了大批古典的抄本，并在这里出版了佛教和儒教的典籍。关东管领的执事上杉宪实（公元1410—1466年），在下野的足利地方开办了足利学校，成为全国研究儒学和其他学术的中心。小田原的北条氏也以保护学术而知名。萨摩的岛津氏也招聘五山的僧侣把朱子学向家臣传授。朱子学严格主张君臣之间的大义名分，是非常符合封建领主要求的一种思想。土佐的小领主吉良氏，也招聘了继承周防大内氏的城下的儒家系统的僧侣，学习朱子学。为了满足地方统治阶层对于学问和知识的迫切要求，还出版了叫作《节用集》的辞书。

在十四、十五世纪，对地方的小领主和地侍

以及上层百姓名主等人的子弟开始进行文字、社会常识和道德等教育。以《庭训往来》和其他来往书信的形式作为教科书，教授日常交际的应酬语、地方的土产和民间节令活动等知识，还有《童子教》等儒教伦理的教科书。

奠定了近代以前 日本生活方式的基础

十四、十五世纪输入棉布，不久日本国内就开始了生产，这在前文已经有所叙述，这样，麻布、丝绸、棉布，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后出现了人造丝、化学纤维为止，日本人的衣服材料就全部齐备了。

此外，在这时候大体上已经有了加工食品如豆腐、豆酱、酱油等，这些迄今仍是日本人日常必备的食品。豆腐等的制法，似乎是在奈良时代赴唐朝僧人从中国学来的，从深耕细作的农业的发达、大豆生产量增多的十五世纪起，普遍地可以制作了。也有了食用的砂糖和油类。酒很早以来就成为商品，到室町时代更加商品化了。烟草较

晚，十六世纪后期从西洋传来。

住宅方面，出现了公家贵族的“寝殿造”和禅宗寺院样式结合起来的“书院造”，也出现与此相适应的庭园。这是高级武士的住宅，这也和砂糖、油类一样，群众是享受不到的。这种住宅有正门，客厅里有壁龕^①、古玩架等，室内铺有席子，屋顶为木制天花板。用拉门和格子门间隔房间的“书院造”，是现代传统的日本式房屋的基础。而“书院造”的构造又促进了壁龕的悬挂字画的艺术（书法和绘画）、插花（供花）等的发展。总之，在衣、食、住三方面，日本人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十五至十六世纪都已具备了。这种东西推广到群众中去，还要晚两个世纪。

而夫妇结婚立即同居，也就是娶新娘到家的办法，十五至十六世纪在近畿地方先进地区的民间已经普遍。后进地区更晚一些。这恐怕和单婚家族的小农独立有关吧。

^① 壁龕：日本式客厅里面，靠墙处以柱隔开一小间，地板高出，用以陈设花瓶等装饰品，墙上挂有画轴等物，日语叫“床之间”。——译者

最后，关于宗教问题，佛教真言和天台二宗与贵族阶级同时衰败下去，禅宗如前所述，寺院的繁荣和寺院生活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但作为宗教吸引人心的力量却薄弱了。唯有一向宗和日莲宗深深抓住了群众的心理。在日本佛教史上，这一时期再没有象一向宗这样取得了广大群众内心深刻信仰的了。这种情况，看一下前文讲过的一向一揆和十六世纪在京都及其附近得势的法华一揆就清楚了。能和一向宗的莲如相比的、法华宗的指导人是日亲（公元1407—1488年）。

枪支的传入和日本人 出现在东南亚

就在这样的群众社会中，不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充满朝气的时候，日本人接触了和他旧有的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洋文明，其视野立即扩大到了全世界，使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具有了更加充沛的朝气。

公元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南

蛮人^①)乘船到种子岛,传来了枪支弹药及其制法。这是日本和西洋直接接触的开端;即使没有这件事,日本人迟早也会在中国南部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与西洋人接触,进一步把他们迎到日本来的。这是因为倭寇的日本人从东方逐步向中国沿岸的南方前进,而葡萄牙人也从西方向同样的目标前进的缘故。葡萄牙人于1510年以印度的果阿为殖民地,到公元1516年占领了中国西南部的海港澳门,企图从这里再侵入远东地区。

枪支一旦传来,立即推广到全国;不仅继续大量进口,而且在日本国内也能生产了。以前就成为贸易中心、同时拥有铁工业的堺市,也成了制造枪支的一个中心地。而近江的国友村的锻冶工由于对足利将军交下的枪支进行了研究,因而也能够自己制造,于是这个村庄也成了枪支生产的一个中心。公元1563年(永禄六年),毛利氏攻打出云的尼子氏的白鹿城时,在毛利方面死伤四十五人中,就已有三十三人之多是被枪支打死

^① 南蛮意为来自南方的外国人,指葡萄牙人和早些时候来的西班牙人。此外,称呼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后开始到达日本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为红毛人。

打伤的。这样，枪支已经成了重要的武器。不久，由于枪支的出现，使得战术和兵制为之一新，这点将于下章叙述。

南蛮船的来舶与年俱增，九州的大名，为追求贸易利益，都争先把这些人迎到自己领国去。公元1578年（天正六年）南蛮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

同时，日本船也纷纷航行到东南亚各地，日本人也开始了向该方面的殖民。公元1570年（元龟元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在那里已经住有四十名中国人和二十名日本人。据说在1582年，西班牙军曾和在马尼拉北方的嘉牙鄢河河口筑有城寨的几百名日本人以及十二艘乘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日本船只，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日本人进入到这里的情况。日本人在台湾、在澳门、在交趾支那（越南）、在暹罗（泰国），都进行了贸易或在那里定居。

这是日本民族在没有政权的保护下，完全依靠自己力量集体向海外殖民的最早的尝试。从这里可以想象当时日本人旺盛的进取心。与此同

时，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达情况，将于十五章加以叙述。

基督教的传入和封建领主

葡萄牙船渡来之后不久，公元1549年（天文十八年），天主教的一派耶稣会的传教士法郎士·方济格(Fran cisco de Xavier)，在马六甲遇到日本人弥次郎(yazirô)①，由弥次郎为向导，到日本来传教。继此之后，来了大批的神甫和修士。他们在本国曾和国王勾结，同样，在日本传教也首先勾结大名，打算如果可能，先以大名为信徒，然后在大名的保护和援助下，让其领民一同都成为教徒。大名们为了确保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也高兴地欢迎传教士，许可他们在领内传教并予以援助。当时称天主教及其教徒为“吉利支丹”。

① 弥次郎：(Yazirô) 本为萨摩的武士，公元1546年杀了人，逃跑到正在山川港停泊的葡萄牙船上，在船中接受耶稣教的洗礼，到达了马六甲。1547年在这里遇见了方济格，被送到果阿，学习了耶稣会的教义和葡萄牙语。

在大名之中也有象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摄津的高山右近这些人成为天主教徒的。大村纯忠于1580年(天正八年),将其领地长崎港及其附近的茂木地区,献给耶稣会作为领地。而大友、大村,有马三个诸侯为了向罗马教皇表示敬意,于1582年派出少年使节远赴罗马。据耶稣会的报告书说,当时日本全国信徒数目已经约有十五万人,在东自美浓、西至萨摩等地已经有了二百多个教堂。在信徒中有相当比重的武士以及贸易港口的商人等。这些人中,除高山右近等人之外,其余是否有深刻的信仰,是值得怀疑的。大村纯忠之所以把长崎献给教会,并不是由于信仰,而是由于当时龙造寺氏要侵占该地,因此大村纯忠认为让长崎成为教会领有比起被敌方占据,更有利于确保该地的贸易利益。

当时来到日本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也并非基于纯粹的宗教使命而进行活动。方济格在给本国耶稣会的信件中,不仅说:“从异教的恶魔手里拯救日本人的灵魂,使其成为罗马教皇所有”,还说:“使之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这是他自己的使命;而且他还对从本国开

往日本的船只的载货问题，作出详细地指示，要载什么、载多少为最有利等。这表明方济格在有意完成葡萄牙取得殖民地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方面，确实起了尖兵作用。

根据上述情况，联系起来考虑，长崎成为教会领地，不仅是教会为确保其财源和活动的根据地，才接受了大村氏的捐献，还必须认为这里有变长崎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可能性。这样，如果教会和日本的一部分封建领主勾结起来，教会本身也就转化为小的殖民地领主，那么教会和日本的其他封建领主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后文所述，实际上就和丰臣秀吉发生了冲突）。

耶稣会就是这样，作为葡萄牙国王尖兵而具有和日本领主发生冲突的因素，同时天主教的教义本身也有和当时日本封建统治严重对立的因素。天主教主张天主（Deus）创造和主宰天地万物，除天主之外再没有神，“对唯一的上帝，要高于一切，要保持虔诚。”在当时日本出版的教义问答书《基督教要理》^①（《Doctrina Chri

^① 现存有公元1592年在天草出版的罗马字本和日文本，以及1600年在长崎出版的罗马字本和日文本。

-stan») 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君、亲及其他世上一切人，都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信仰上帝要超越对这些人的权力和权威的忠诚和服从。而在神的面前，一切人不论君、父、男、女、财主、乞丐都是平等的，作为平等的人都要互相敬爱，“要象对待自己一样对待邻人。”爱邻人是天主教实践道德的第一个原则。这种人类平等的观点不过是宗教上的装饰，而毫不否定现实社会的封建身分秩序，反而说它是出于万物的主宰者——神的意思，而加以神化；对忠孝之类的道德也加以强调，但这也是只限于在和上帝的意旨不相矛盾的情况下。

在君、民、父、子都是天主教徒的 西欧 社会，这种教义和封建秩序不会发生矛盾，但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信仰有所不同的日本社会，如果这种教义只要掌握了人心，这就埋伏着引起两者之间严重对立的导火线。而天主教的信仰，在能和大名的物质利益勾结起来，或者象织田信长那样能够利用天主教来对付他的当前之敌一向宗的时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这种宗教普遍地深入地吸引住群众，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物质的、

政治的利益已经无需利用天主教的时候，即在天主教传入四十年后，在日本宗教史上就开始了天主教的信徒和封建统治者前所未有的深刻激烈的对立。

十四 秩序和权力的重新确立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全国

织田信长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

应仁、文明之乱以后，日本社会在政治上的统一，已名实俱亡，大小封建领主在地方上的分散和割据达到了极点；但如前两章所述，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逐渐走向了新的政治统一。

战国的任何大的大名没有不梦想统治全国的，其中尾张的织田信长逐步压倒了其他大名。十九岁的织田信长于1551年（天文二十年），继其父织田信秀之后，采取种种手段掌握了领国的国人阶层，蓄积了力量。1560年（永禄三年），

在桶狭间^①奇袭了东海首屈一指的大的大名今川义元，并取得胜利。从此以后，他怀有统治全国的野心，使用了刻有“天下布武”字样的印章。

织田信长陆续打败近邻的大名，公元1568年（永禄十一年），拥护前将军之弟足利义昭进入京都，废除将军足利义荣，立足利义昭为将军，并亲自掌握实权，立即征服了畿内的各领主。他把被征服了的地方小领主和国人阶层划为直属，扩张了直辖领土，加强了常备军。就在这一年，织田信长下令堺市捐钱二万贯^②，堺市予以拒绝。第二年的1569年，织田信长以将烧毁全市相威胁，终于迫使堺市屈服。

织田信长虽然不承认自由城市，但却十分懂得利用商业和商人的必要。他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而撤销各国的关卡，剥夺“座”的特权，推行乐市乐座（自由交易—译者）政策，修建道路，发展商业，以争取新兴商人拥护自己。

① 桶狭间：在今爱知县碧海郡，距名古屋市很近。

——译者

② 贯：中国古代货币单位，一贯为1000文。日本与此相同。——译者

织田信长的三大敌人

已经掌握了近畿地方和堺市这样富裕都市的织田信长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名。当时织田信长面前有三大敌人。一个是南都北岭的大寺社和高野山。他们从古以来就在近畿地方拥有广大的庄园领地，养有大批的僧兵。还具有传统圣地的很高权威。如果不铲除这些自古以来的巨大势力，那么不论是织田信长，还是任何人，就不能统一天下。另一个大敌是和织田一样的大名们，特别是近江的浅井、越前的朝仓、甲斐的武田、越后的上杉、中国的毛利氏等，是首当其冲的敌人。最后的一个敌人是北陆、东海、近畿各地的一向一揆。这种一向一揆掌握了每个村庄，是妨碍大名直接统治村民的一种力量。而这三种势力，在反对织田信长这一点上结成同盟，并被织田信长剥夺了实权而心怀不满的将军足利义昭联合起来。织田信长对此进行了各个击破。

首先，1571年（元龟二年）织田信长毫不犹

豫地烧毁了延历寺，夺取了该寺领地，并把站在延历寺一边的坂本等琵琶湖畔的一些町镇全部烧光，于是一举摧毁了古代势力最大的据点。继此之后，织田信长做了充分的准备，于1573年（天正元年）4月，包围将军足利义昭于其馆邸，迫其降服，支持足利义昭的京都上京地区的商户六千至七千户全遭焚毁。7月，足利义昭在京都市外的宇治地方举兵，织田信长轻而易举地将其打败，废除了将军职位。足利氏的幕府至此灭亡。织田信长立即指挥人马几乎同时消灭了朝仓氏和浅井氏。

此后，织田信长一方面讨伐一向一揆，另一方面却作好和武田氏决战的准备，他和三河的德川家康联合起来，1575年在三河的长篠决定性地打败了继武田信玄之后的武田胜赖的军队。当时织田信长为了防备武田方面的马队，设立了防马鹿砦，在鹿砦的背后配备了三千五百人的步枪队，拥来的武田军队被阻于鹿砦之前，这时候步枪队同时射击，几乎全歼了敌人。

长篠会战证明了精锐的骑马武士的大军，敌不过以步枪队为主力的步兵集团，这就迫使大名

改变战术和兵制。这种变革就是要以拥有象织田信长那样经济的、社会的条件作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就是要拥有能够配备大批枪支和弹药的经济力量，还要有领国的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的阶级分化，这样能够有大批的领民离开农村而成为常备的步兵队。而武田胜赖是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的，所以在公元1582年被以德川家康为先锋的织田信长的势力所消灭。

织田信长在周密准备和集结了在质和量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之后，就对延历寺和大名们进行决战，并打倒了他们；但对分散在广大地区的男女群众团结起来的一向一揆，就连织田信长也是不能轻易平定的。织田信长从1571年攻打伊势长岛的一向一揆时，屡遭大败；1574年，伪装讲和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好不容易地才将这种起义平定下来。并将数万人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斩首”、“杀光”、“烧死”。

织田信长于1573年击灭朝仓氏之后，在越前设置了守护代，农民们对于这件事认为：“与其让武家充当地头作威作福，倒不如把一向僧人作为领主，畅所欲言，相待以诚，对当地人民来说

反而是更好的国守。”农民们不是为了本愿寺，乃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推举本愿寺所派去的寺侍（寺院派在领地的官员——译者）为首领，于1574年发动起义，打败了织田氏的守护代。本愿寺任命寺侍为守护代，但农民对于企图取代织田氏而领有越前的本愿寺也失望了。于是加深了农民对僧侣、寺侍的对立，终于发展为混战。趁这种分裂之机，织田信长于1575年，勉强平定了一向一揆。据说当时被斩首的男女不下四万人。

建设安土城和织田信长的覆灭

织田信长虽然打倒了妨碍他取得霸权的三大敌人的代表者。但大阪的本愿寺依然统治着畿内的门徒，还有加贺的一向一揆，在古代的势力方面还存在着高野山和南都的大寺院，关东、奥羽、中国、四国、九州的大名还不受织田信长的管制。不过统治全国的中枢部分却统统被征服了。剩下的就是把这种统一的事业推广到各地，并具体地渗透到基层。

因此织田信长首先企图巩固立足点。在长篠

会战和平定越前一向一揆的第二年，他在地当东海、东山、北陆三道要地、濒临琵琶湖的近江的安土，建筑了具有七层的天守阁^①。这座建筑是前所未有的宏壮华丽、坚固无比的城池。这是织田信长的大本营，是政厅，也是宫殿。织田信长把安土作为中心，兴修军事、商业的交通道路，把商人和手工业者集中于此，并把安土发展成为文化的中心。他为了在宗教上对抗一向宗而援助了天主教，并在安土拨给房基地以建筑教堂。

织田信长以安土为根据地来巩固近畿地方，同时还于1577年派遣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公元1536——1598年）征服中国地方，1580年亲自攻下大阪本愿寺，平其余党，还派柴田胜家平定了加贺的一向一揆。同一年，举办了大和国内的“检地”（土地丈量——译者），全部登记了东大寺、兴福寺和其他大寺社的领地，铲除了庄园

^① 天守阁的“天守”二字也写作天主、殿守、殿主，是占有城池中枢的望楼，是司令塔、是警戒四方的哨所，兼充城主的住所，是为了夸耀威力的建筑。这一名称的来源，有各种说法，没有定论。说和天主教有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天守”二字在天主教传来之前已经使用过。

统治的遗制，而对残存到最后的古代势力的堡垒高野山，也派兵进行了讨伐。如前所述，公元1582年，德川家康奉命击灭了武田氏。织田信长的大业就是这样稳步地前进，但在这里却意外地停止下来。该年的6月2日，织田信长为了支持羽柴秀吉加速征服中国地方而离开安土住到京都的本能寺时，深夜遭到家臣明智光秀（公元1528——1582年）的袭击而被迫自杀身死。

关于明智光秀叛乱的动机，有各种说法；他是野心勃勃的战国时代的武将，乘机杀死织田信长，企图取而代之，这恐怕是真实的情况吧。战国武将之间既没有君臣之义，也没有骨肉之情。家臣杀死主家，是当时常有的事情。

听到本能寺之变的羽柴秀吉，当时正在包围备中的高松城^①，于是立即和毛利氏讲和，赶回京都，6月13日，很快地在山城的山崎附近打败了明智光秀。明智光秀在返回他的守城——近江的坂本城的途中，在宇治旁边的小栗栖村遭农民袭击，身负重伤，自杀身死。这真是战国的乱世。

^① 高松城：距冈山市很近。——译者

丰臣秀吉统治全国

羽柴秀吉自称是织田氏的足轻木下弥右卫门之子。弥右卫门不知原来是否有过木下这个姓，恐怕是个连姓都没有的青年农民，为了追求名利离开乡村而当上步兵的吧。其子藤吉郎（秀吉），也在幼年离家到处流浪，最后侍奉织田信长，逐渐显露头角，织田信长击灭浅井氏的时候，将浅井氏的领地赏给了他。似乎从这时起才叫羽柴筑前守羽柴秀吉的名字了。

织田信长的将领之中，最早打败叛变者的羽柴秀吉在决定织田信长后嗣的会议上，也排斥了前辈柴田胜家等人的意见，而成功地拥立了织田信长之孙、年仅二岁的幼儿三法师。这在他是有深谋远虑的。第二年的1583年，柴田胜家和打算拥立柴田胜家为织田信长的后嗣的织田信孝（信长的三男）等人，有意排斥羽柴秀吉，羽柴秀吉反而视为良机，而击灭了他们。把竞争者压制下去的羽柴秀吉，立即取代了幼主及其地位，自己变成了主君。

另一方面，羽柴秀吉动员各大名在大阪本愿寺的遗址上，建筑了胜过安土城的壮观华丽的大阪城，强制京都和堺市的大商人迁居到这里。

公元1584年，羽柴秀吉同德川家康战于尾张的小牧，因形势不利，见机进行了讲和。德川家康从长远来看，认为不利于和羽柴秀吉作战，因而甘心当羽柴秀吉的属将。羽柴秀吉因此已无后顾之忧，乃于1585年，征服了织田信长尚未征服的古代势力的最后堡垒——高野山和根来寺，继而打败了四国的长曾我部氏，三年之后平定了整个九州地方。当时长崎地方，也从耶稣会手里没收回来。再三年之后，于1590年（天正十八年），把北条氏的老巢小田原整整包围了四个月，而终于攻陷，消灭了北条氏。继此之后，到第二年又征服了奥羽的各大名。本能寺之变以后，仅经八年，羽柴秀吉就完成了平定全国的大业。

继于1593年（文禄二年），羽柴秀吉又把虾夷地（北海道）的松前氏划为属下。在列入日本中央政权统治下这个意义上来说，北海道成为日本领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北海道地方从八世纪前后就已被日本人作为

虾夷地看待,八至九世纪,整个奥羽地方基本上划入天皇政权版图时,渡岛^①的虾夷(挨奴人)曾把毛皮送给朝廷,但这只能视为偶然的来往,后来日本的政权和虾夷地,长期没有联系。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日本人进入虾夷地方,在江差^②方面开辟渔场,在渡岛半岛开采砂金,和挨奴人交易,这样,来往也就逐渐多起来。公元1452年,若狭的武士武田信广坐船到达渡岛的松前,做了该地蛎崎氏的女婿,使附近地方的虾夷人归属自己,他的子孙起姓名叫松前氏。不久,在上述1593年,松田庆广向羽柴秀吉誓效忠诚,羽柴秀吉就承认他为虾夷地的领主^③。

羽柴秀吉还打算征服地接日本南端的琉球王国,公元1591远征朝鲜(后文叙述)之际,派令萨摩的大名岛津义久向琉球王征收军粮,但在羽柴秀吉时代,琉球却未接受羽柴秀吉和岛津氏的

① 渡岛:今北海道渡岛半岛。——译者

② 江差,渡岛半岛的一个海港。——译者

③ 丰臣秀吉死后的1599年(庆长四年),德川家康下令松前庆广交出所领的地图,承认松前庆广为该地领主。于是松前氏也列入德川氏的统制之下,成了和本土各大名同样地位的一个大名。

统治，而完全独立。

羽柴秀吉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根据领主对他的抵抗、归顺、合作的状况，有的进行消灭，有的剥减一部分领地，有的让其仍然领有旧领地，把没收的领地一部分作为羽柴秀吉的直辖领地，而其余大部分赏给了合作有功的部下。加藤清正，福島正则、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人，都是出身于地侍和商人的，一直在羽柴秀吉身边当官有功，而成为大的大名。羽柴秀吉把这些心腹大名和亲属配置于全国的要地，让他们管制新任的大名；而且遇有机会或其他借口便对大名领地进行调换，对不放心的大名总要调到远方的地区。调换领地又是让大名们晓得羽柴秀吉权力的一种手段。羽柴秀吉最不放心的是德川家康，已经领有三河、远江、骏河、甲斐和信浓的一部分，等到羽柴秀吉灭了北条氏之后的第二个月，秀吉立即以奖赏德川家康之功为名，将北条氏所遗领地关东八个国交给他，和他的旧领地五个国对换，并让他移居江户，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羽柴秀吉到这时，已经成了封建诸侯的君王。他的直辖领地以石数计算约二百万石，独占

了除壹岐、对马以外整个日本当时总石数一千八百五十万石的十分之一以上。他的领地集中在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方——近畿和浓尾^①，而且还独占了以佐渡、生野、石见的金银矿山等为首的当时最好的金银矿山，并直辖京都、大阪、堺市、博多、长崎等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城市。堺市的小西隆佐、博多的神谷宗湛、长崎的村山等安等财富超过大名的大商人，是羽柴秀吉的御用商人和经济顾问。尤其是小西隆佐，实际上是羽柴秀吉的财务长官（其子小西行长）。由于拥有这样的经济基础，所以羽柴秀吉才拥有足以压倒其他大名的直辖军队。

封建秩序的重新确立 和天皇权威的恢复

羽柴秀吉还同天皇接近，公元1585年从内大臣当上了关白，第二年的1586年又兼任了太政大臣，乃改姓丰臣。这些官衔虽然不过是单纯的

^① 浓尾：信浓和尾张，今岐阜、长野县地方。——译者

称号，但对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农家出身的丰臣秀吉来说，这样装璜自己的称号却是必要的。第二年的1587年(天正十五年)在京都建筑了规模大过皇城的豪华的宫殿——聚乐第。下一年丰臣秀吉在这里接待了后阳成天皇，并召集了各大名，他在这里首先把七千余石的土地献给天皇作为御料地(皇室领地)，并让各大名宣誓不夺占皇室领地，并使之宣誓效忠丰臣秀吉本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丰臣秀吉的意图是让天皇有了权威，然后利用它作为自己的后盾。江户时代商人出身的学者中井竹山(公元1730—1804年)对丰臣秀吉的评论是：表面上尊重天子，骨子里却是利用天子以令诸侯。

只靠赤裸裸的实力决定一切的下剋上的大变时期，在朝廷赏雪宴会上连酒都没有，这种朝廷的权威扫地的情况已于前文写过。但等封建领主由分散割据开始转向新的统一的第一个阶段，即统一一个地方的大的大名出现的阶段，大内义隆、今川义元、毛利元就、上杉谦信、织田信秀等人都贡献一些钱款作为天皇即位费用，修理皇城的城墙，以接近天皇，增加自己的权威。

到了织田信长的统一更加巩固的阶段，织田

信长于1568年进京时曾将皇宫大事修缮，并保证每年贡米一百五十六石做为天皇的生活费。办法是：对京都市内的田地每段（9.915公亩——译者）课收一升的特别税，然后把收入的五百二十石，以年利百分之三十的高利强制贷与上京和下京^①的市民，天皇就征取这种利息。这种制度由于后来织田信长烧毁了上京而未能实现。于是织田信长重新把三百石年贡的土地做为天皇料地。这件事受到天皇的极端感谢，织田信长得到了右大臣的称号。

与此相比，直辖二百万石的关白和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把七千石做为天皇领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中国的封建皇帝说是受“天命”而获得权力，从而增加自己的权威，西洋的封建国王，是由罗马教皇以上帝的名义来增添权威。在没有这种思想信仰的日本，依靠实力取得天下的丰臣秀吉，也只有依靠恢复创造国土的神的子孙、即天皇的权威（但完全不让他保有政治、经济的实力）来增加自己威望。皇室本身的权威已和足利

^① 上京和下京：京都市以御所（皇城）为中心，往北为上京区，往南为中京区，再往南为下京区。——译者

尊氏时代完全不同，而是一落千丈，但随着封建秩序的重新建立，皇室的权威又得到了恢复。

太阁检地，村落制， 没收武器，身分制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巩固了统治和剥削群众的新的体制。其最根本的事业是检地。战国的大名和织田信长虽然都进行过土地丈量，但以丰臣秀吉于1582年川崎会战刚刚结束之后，丈量山城国为最早，到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为止，不问直辖领地还是大名领地，全国每个角落都丈量过了。丰臣秀吉后来把关白的官位让给其侄丰臣秀次，而自称“太阁”（隐退的关白），所以称这种土地丈量为太阁检地。这种检地是丈量每一块耕地的面积，以曲尺^①六尺三寸的平方为一步，三百步为一段（从前是三百六十步），十段为一町。并划分耕地为上、中、下、下下四个等级，把作为各级耕地年贡课赋标准的收获量一律折成稻米，

^① 曲尺：因用铁制，亦称金尺，也有用竹制的。因形状作直角形，便于木工使用，故称曲尺。每曲尺约合30.3公分。——译者

规定石数，量石数的升斗是全国统一的。年贡一律以石数的三分之二交纳实物为原则，许可旱田年贡交纳现款。上等水田每段平年标准贡额为稻谷一石六斗（稻米为八斗），以下各级递减二斗。

在规定土地石数的同时，并规定一人为该土地的年贡担负人（作人），一地一个作人，把该人的名字登记在丈量土地册上。原则是登录实际耕种者的名字，即采取了该人和领主直接发生关系、排除中间剥削者的方针。即禁止了地主把土地交给租种人而索取地租，及以前的庄官和“大人百姓”（村庄统治者）奴役和剥削“平百姓”

（普通自耕农民）。还规定“农民父子和亲属，每户不得居住两个家族，应分别立户。”让父权家长制大家族分立为单婚小家族，而成立了领主直接统治和掠夺这些小家族的原则。也就是要自上而下地建立象在近畿的先进地区已经在逐步出现的那样典型的封建性的小自耕农。

划定这些小自耕农部落的区域，把它作为行政上的村庄，从村民中选定村吏（名为庄屋、名主、乙名等等，各地有不同的称呼。），归由大名的地方行政官管辖。并规定农民“如有放弃田

地或出外经商或靠工钱谋生的人，本人不用说，还应处分其全体村民。”

正是这样，凡被定为丈量土地册上的年贡担负人都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许放弃耕种，也不许离开村庄，职业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而土地的买卖典当也是不许可的。为了维持这种体制，还禁止群众保有武器，而实行“刀狩”（没收武器——译者）。这种没收武器以织田信长消灭越前的一向一揆之后，领有该国的柴田胜家所进行的为最早，丰臣秀吉在征服高野山时，也没收了山里的武器，然后把它推及到全国。从寺院、农民、商人手里没收了刀、枪矛、弓箭、枪支等一切武器。另一方面，凡属武士直到中间、小者等奉公人（下级武士——译者）都禁止转为农民和工商业者，让他们离开村庄居住城下。这就规定了士、农、工、商的身分、职业和住处的区别，使之固定下来，并建立了兵农分离的原则。

上述的石数制以及兵农分离和身分制等原则，在仍存在土豪和地侍的后进地区，当然不能立即完全实行。地侍之类的大地主拥有大批的下人，来维持父权家长制的大家族。还有许多地

方，用种种形式统制小农，进行剥削。突出的例子是有在一个大的村庄的丈量土地册上，只记有一个人作为担负年贡者（作人）的。而在丈量土地册上认为正式农民（本百姓）的，只限于不仅是交纳实物年贡，也被领主征课劳役的“役家”百姓（农民，他们经常是大家族，拥有奴役），所以一切实际耕种者并不一定登记到丈量土地册上。身为实际耕种者也有的“册外”的租种人和隶属于别人的农民。但是太阁检地的各项原则是以当时农村阶级关系的发展方向为基础的，所以到十七世纪的后期（德川幕府时代的初期）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实现了。

商业和贸易的统制

在下剋上的斗争中，人民虽取得了各种自由，但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天下而在制度上都一一被剥夺了（实际上制度也有漏洞）。工商业者也不例外。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取销了“座”和关卡，积极推行对外贸易，丰臣秀吉设立了金座和银座，铸造了名叫“天正大判”和“天正小

判”^①等货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这只限于使得他们致富、有利于他们对全国的统治，并不是真正谋求自由工商业的发展。士农工商的身分制束缚了人们没有职业的自由，这也就没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在堺市和京都的部分市民被丰臣秀吉强制移居大阪一事中，典型地可以看出：没有城市的自治，城市都成了大名统治下的城下町或者是类似京都那样的地方。贸易港口也由丰臣秀吉的代官（副长官——译者）所统治。对外贸易方面，外国船带来的物资也是首先由丰臣秀吉优先购买，然后才许可大名和商人购买。日本船开往海外时，丰臣秀吉虽然没有明文限制，但在他的晚年，却开始了以发给出国船只盖有丰臣秀吉朱红印章的特许证进行统制的制度。

镇压“不受不施派”和天主教

信仰自由也被剥夺了。丰臣秀吉把延历寺、高野山和本愿寺加以封建领主化而完全进行了控

^① 天正大判和天正小判：均为椭圆形金币，大判重40匁（约合150克）左右；小判重4匁（约合15克）左右。——译者

制之后，就不再加大压迫，反而予以保护，延历寺也恢复起来，丰臣秀吉还把领地施给寺院。这也是为了使各派佛教为他的权力服务，而对于不为他服务的宗派却进行了镇压。这就是1595年，丰臣秀吉在他自己修建的京都方广寺举办他死去的父母的大法事时，下令所有佛教宗派的僧人都须参加，但法华宗的“不受不施派”（不受其他宗派信徒的施舍，也不施舍别人的一派）的僧人日奥拒绝参加。丰臣秀吉认为“虽说是祖师的法度，但有公家（丰臣秀吉）之命即可破例。”即认为公家的命令重于佛法，乃将不服从命令的日奥逐出京都。

把宗教完全看做是自己的工具的丰臣秀吉对于把天主的旨意奉为至上的天主教进行迫害，是必然的。他在1587年远征九州时，看到外国传教士对九州的一部分大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长崎成了教会的领地而大为吃惊。他在博多坐阵时曾打算在天主教大名有马氏的领地找个美女陪他睡觉，但所选的女人都是天主教徒，她们按照贞操重于一切的教义，坚决拒绝了丰臣秀吉的要求。为了信仰，连妇女都敢违抗全国最高的统治者，

这对丰臣秀吉来说是从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他怕起天主教来。在不久的6月，丰臣秀吉下令称：

“日本乃是神国，接受天主教国的邪道是极为不妥当的。”因而禁止传教，并下令将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同时没收了长崎地方的教会领地。

特别讲明这项禁令与贸易无关，葡萄牙船仍然继续开来，所以传教士也偷偷地乘这种船只来到日本。不仅耶稣会，连圣方济格会（Francisco）和圣多明我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也乘西班牙船来到了日本。公元1596年（庆长元年）西班牙船漂流到土佐的浦户，在丰臣秀吉的官员审讯船员时，他们傲慢地说，西班牙国王首先用天主教吸引人心，然后再征服该国云云。早已对此抱有疑心的丰臣秀吉，于是对天主教加强了镇压，对外国传教士和隐藏外国传教士的日本人教徒也进行了彻底地搜索，并一一处刑。

由于加强了迫害，信仰天主教的大名和武士就不断出现转变教门的。但当时天主教确已普及到群众中间，大批的日本传教士成长起来。日文的传教书也用铅字印刷流传。他们不同于初期的外国传教士依靠贸易之利来引诱大名，而是抵抗

迫害，在群众中进行信仰的说教。天主教利用人们互相平等而爱邻人，组织了各种民主的集会。在日常生活上也进行互助，并使他们认识到当时日本人之间丝毫也未意识到是犯罪行为的“间苗”（杀婴）是不人道的，而收养弃婴、进行各种慈善事业。在教会及其他集会上，妇女和儿童坐在椅子或铺有草席的座位上，男子站在后面。天主教特别强调了一夫一妻制和男女的贞操。

旧有的一切日本宗教都没有这样宣讲过。后来德川幕府的教学顾问、强烈憎恶天主教的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攻击天主教没有上下之别，骂天主教宣讲一夫一妻是欺骗愚妇。他所责难咒骂的正是天主教深入民心的东西。于是坚信上帝是天地的主宰者的天主教越是遭受尘世间的君主迫害，就越加深和加强了民众对它的信仰。

侵略朝鲜的失败

丰臣秀吉的领土野心是无止境的。他随着平定全国的事业有所发展，便梦想征服琉球、台湾、菲律宾，并使朝鲜和明朝也服从自己。远征

南方虽然仅以空想而告终，但征服明朝的计划却从刚刚统一全国之后就具体化了。丰臣秀吉首先要求通往明朝的道路的朝鲜臣服于他，但遭拒绝。所以在公元1592年（文禄元年）4月派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为先锋，开始远征朝鲜。起初是连战连胜，先锋在釜山登陆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首府汉城，继而攻占了平壤，加藤清正的军队更加北上。不久，丰臣秀吉的海军被朝鲜海军提督李舜臣所歼灭，而且由于朝鲜的群众到处反抗侵略，所以日本军队不能就地抢夺粮食，又不断出现病死者，眼看着将士的士气日落千丈。第二年，公元1593年4月开始讲和，不久实际上停止了战争。

但在公元1596年（庆长元年），由于明朝的讲和使节带给丰臣秀吉的明朝皇帝的书信里把丰臣秀吉看做是属国的国王，丰臣秀吉大怒，于第二年的1月，再次派出了远征朝鲜的军队。这次远征军的士气从一开始就一蹶不振，战争也未能按照预期进展。正在这时候，丰臣秀吉于第二年，即1598年（庆长三年）8月患病，一心想着年幼的独生子丰臣秀赖（虚岁六岁）的前途而死

去。远征军认为这是好机会而撤回本国。

德川家康推翻丰臣政权 而成立幕府

丰臣秀吉由于致力于轻率的侵略战争，未能充分巩固统制大名的体制，所以丰臣家在他死后立即没落下来。丰臣秀吉在临死时，反复托付德川家康等“五大老”（五名最高顾问）要拥立丰臣秀赖，但正象丰臣秀吉本人未能拥立主君织田信长所遗的幼主一样，德川家康也不打算拥立丰臣秀赖。德川家康立即策划夺取丰臣家的权势。他煽动丰臣秀吉所豢养的大名们，让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官僚型的中央集权派和加藤清正、福島正则等武将型的大名独立派发生对立，欺骗了加藤清正等人，把他们拉在自己的一边。然后再挑拨石田三成，终于在公元1600年（庆长五年）使他们战斗起来，在美浓的关原^①的决战中石田三成一派遭到了全歼。

^① 关原：今岐阜县不破郡。——译者

这次战争，丰臣家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德川家康却不容分说地削减了丰臣秀赖的领地，将他降低为在摄津、河内、和泉拥有六十五万石的一个大名，并没收了丰臣秀吉时代直辖的城市和矿山（大阪除外）。当时被德川家康消灭的石田一派的大名有九十一家，总计没收六百四十万石，然后把这些分配给自己一派的各大名，还把一部分做为他自己直辖领地。德川家康在这次战争之前，已经是二百四十万石的最大的大名，他的直辖领地到战争之后已经是三百万石，占当时全国总石数的六分之一。德川家康到这时实力已经超过了丰臣秀吉，而成了全国的统治者。到公元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取得了源赖朝以来武将最为憧憬的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德川家康的江户执政厅成为名副其实的幕府。

十五 士、农、工、商、 秽多、非人^①

——严密的封建统治网

德川家康消灭了丰臣氏

德川家康虽然宿愿已偿，当上了将军，但在当时大名中间，“轮流执掌天下”的思想是很强烈的。这种思想固然使得德川家康夺取丰臣的天下也合法化了，但德川家康到这时却不能不打破这种思想。仅仅经过二年，他便把将军职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秀忠，企图借此向各大名们表示将军的地位由德川氏世袭，决不能让给其他人家。而

① 秽多、非人：秽多原意为“卑贱”，认为是生来的“贱民”，不得上升为“良民”，从事屠宰鞣皮、刽子手等行业。非人有一部分原为“贱民”，也有罪犯、情死未遂等人，社会地位比秽多更低；但能转为“良民”。1871年虽明令“解放”，但迄今仍受歧视。——译者

实权仍由家康掌握。

年逾七十的德川家康，不能不想到自己的残年不久，当他知道青年的丰臣秀赖不是凡庸之辈，便感觉不安起来。德川家康认为如果在自己死亡以前不消灭丰臣家，那么丰臣家就将成为反对德川势力的核心。于是，一方面使用各种权术让各大名们脱离丰臣秀赖；另一方面为了削弱秀赖的财力而以替其亡父（丰臣秀吉）作法事为名，恢复了大批大的寺社。而德川家康的亲信僧人崇传等人，却对这批寺院之一的方广寺的钟铭进行挑剔，德川家康趁机利用它来责难丰臣家。借口说，铭文中所写“国家安康”是诅咒如果斩断家康才能安国；所写“君臣丰乐子孙殷昌”实际含有“以丰臣为君、乐子孙的殷昌”的意思。德川家康就是这样一再挑剔丰臣家。公元1614年（庆长十九年）11月，终于迫使丰臣一派先开战端。

德川家康亲自指挥各军攻打大阪城，但对集中丰臣秀吉的财富和权势、举世无双的坚固城池是不容易攻占的。德川家康乃假作讲和（大阪冬战）。讲和的条件，有填平大阪城的外濠一项，

德川家康乃派出大批人员突然连内濠也填平了，而且还破坏了第二个中心建筑物，遂使中央城堡裸露出来。丰臣一派因受骗而恼火，乃将胜败置之度外，再次开战，裸露的城池立即被攻占，丰臣秀赖和生母淀君自杀，丰臣家遂灭亡（公元1615年，元和元年5月，大阪夏战）。

统治大名、朝廷、寺社，建设 江户，德川家康的神格化

德川家康在消灭丰臣家后的第二个月，乘势命令各大名：一国只准留下一个城池，其余均须毁掉。7月公布了《武家诸法度》（《有关武家的各种法令》——译者）和《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有关朝廷和朝臣的各种法令》——译者）。前者告诫各大名励行文官武将的职务及其他规章；同时还规定取缔徒党^①、不得幕府许可者禁止结婚、一律不许新建城堡——即使进行修缮也须幕府批准以及对幕府负担参观义务等。《武家

^① 徒党：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农民抵抗幕府，团结起来，谓之徒党，意思是结党。——译者

诸法度》后来屡加修改，对于大名的义务规定得更加详细了。

《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认为“天子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目标是让天皇完全脱离政治，此外对与朝廷有关的皇族、公家的名次、制定年号的办法，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而德川家康决定皇室的领地（料地）为一万石，对一般的宫廷贵族发给少量的领地。到这一年止，还制订了对于仍具有封建领主因素的佛教各派寺院的统治法规。这些法规规定了寺院须以学问为主，禁止总寺院统制下属寺院和新建寺院。在此前后，利用高野山僧人两派的对立，把寺领分给两派；又利用本愿寺的内部矛盾，让它分裂为东西两个本愿寺并固定下来，这样巧妙地分化和削弱了大寺院的势力。

在这期间，幕府的首都江户的建设，也大体上完成了。德川家康进入江户时没有一条象样的街道，连现在的日比谷一带都有波涛冲激，在浅草一带可以采到海苔。德川家康在江户的低洼地区纵横挖渠以求排水，然后填平低湿地段，建设净水道。并把他在东海大名时代的御用商人们移

居到江户，让他们管理和统制城下町的工商业。从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当上将军的第二个月开始，就着手大力扩张江户市街，新建了三百个町。到1606至1607年建成了拥有五层的天守阁的壮大的江户城。这种空前的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动员了全国大名的力量。奉幕府之命从事工程工作的“助役”和担负战时军事任务的军役^①一样，要把建筑工程作为各大名的首要义务来完成。

这样在各方面巩固幕府基础的德川家康，在消灭了丰臣家、制订了统制大名、天皇、寺社的纲要的第二年（1616年），因病死去。天皇按照德川家康的遗志，赠给死了的家康以“东照大权现”的神号。人死之后立即奉其为神，在历史上以丰臣秀吉死后成为丰国大明神为最早，丰臣秀吉企图用自封为神的办法来保佑其子孙，但他的希望成了泡影。德川家康灭了丰臣家，就立即让朝廷取消了丰臣秀吉的神号。而他本人死后却成了神，二百五十余年间作为“东照神君”、“权现样”（意思是神仙老爷——译者），“神祖”，

① 军役：武士对主君所负的军事上的义务。——译者

借以增加幕府权威。

幕府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德川家康死后，德川家作为将军的势力并未动摇。德川幕府到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初年，即整个十七世纪，以有叛乱之意或以行为不端为口实搞垮了许多大名，然后把他们的领地分给其他大名，并将其一部分充作幕府的直辖领地（天领）。没收的总数，仅以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以来的这一部分计算，就超过了一千万石，到十七世纪末叶，天领约为七百万石，占有当时全国总石数二千八百万石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大名前田家也不过一百零二万石。天领以幕府周围的关东地方、重要的大米产地北陆地方和工商业的中心近畿地方为多，其次较多的地方是连接关东和近畿的东海地方。东海道的骏府和东山道的甲府等军事要地，大阪、京都、长崎、堺市等重要工商业城市，佐渡、生野、伊豆等重要矿山，也都划归幕府直辖。

德川家康还禁止各大名铸造货币，而由幕府

独占这种权利。为了铸造货币，于1601年成立了金座、银座，铸造了大判（十两）、小判（一两）、一分判（一两的四分之一）的庆长判金和丁银、豆板银二种银币。这样迅速发达起来的货币流通，也被当作为确立幕府统治全国权力的一种手段。德川家康又把京都、长崎等地的豪商作为御用商人或者顾问，积极推行了商业贸易，使幕府获得巨利，而不让大名在这方面取得利益，另外，还积极开采了矿山。德川家康所积累的金银，远远超过了丰臣秀吉。

以这种广阔富饶的直辖领地（天领）为物质基础，幕府有了强大无比的巨大兵力。幕府直属（直参）武士之中，有资格谒见将军的称为旗本，没有资格的称为御家人。在十七世纪末叶，旗本有五千余人，御家人有一万七千余人。旗本本来是作为“知行所”领有土地的小领主，但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起，幕府尽量撤销知行所，采取了以米谷代替由领地收入作为俸禄的政策，因此，在幕臣中仍旧拥有知行所的不过是占总人数十分之一左右的上层旗本。而且这种领主的旗本对知行所人民的统治权受到限制，大多数

的旗本都只是从知行所征收幕府规定数目的实物年贡，并令拥有知行所的旗本脱离领地而居住在江户。御家人的俸禄从一开始就是领取米谷。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是世袭的，所以又称为家禄或世禄。他们按照俸禄的数目，有负担一定人数的军役义务。十七世纪中叶规定的幕臣军役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再加上前述旗本和御家人，幕府直属的总兵力就超过八万人，具有了能够压制三十家到四十家大名联合的军事力量。

大名和幕府的关系

从德川家康成立幕府以来，通过搞垮大批大名，特别是通过调换领地和重新分配领地，使得一切大名的领地（包括曾经和德川家康并驾齐驱的大名用实力领有的领地在内）都被看作是由幕府交给管理的，大名的人员一有变动，继承者就须向幕府提出封地清册，必须重新取得将军许可才能继承。而大名取得封地权的代价是必须效忠于将军，服觐见、军役、施工等义务和服从《武家诸法度》等幕府的法令。关于觐见，自从1635

年（宽永十二年）德川家光时代修改《武家诸法度》以后，对觐见问题，实行了大名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年（一年住在领国）、其妻子类似人质必须经常住在江户的“参勤交代”（轮流觐见——译者）制度。根据这些法令制度，幕府对大名的统治更为加强，但大名和他们的家臣们就必然痛苦于在江户和在领国的两地生活，并按照战时编制、带有大批家臣的行军队伍往返^①于江户和领国之间的重大的负担。这种负担势必转嫁于人民。

另外，从这时起，所谓大名是指拥有一万石以上领地的封建领主，不满一万石、按大名待遇的领主称之为交代寄合。

在大名之中，称呼关原之战^②以前德川家的臣属为“谱代”，在此以后的臣属为“外样”。幕府多次用调换领地办法，搞垮了加藤、福島等大批有力的外样大名，剩下的也尽量置于边境或

① 这种大名的队伍（大名行列）完全采取战时行军的形式。称大名所住的旅馆为“本阵”。

② 关原之战：公元1600年（庆长五年）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等人的战争。战争之后，德川氏掌握了全国大权。关原在今岐阜县不破郡。——译者

者置于军事上、经济上无关重要的地方，谱代则配备于关东、近畿和东海、东山地方，并在全国的险要地点配备德川一族的大名（亲藩），特别是在尾张国、纪伊国^①和常陆国的水户的三地都安置了德川家康直系子孙，作为“御三家”，给予特殊的待遇。幕府就是这样巧妙地部署了亲疏大小的大名，使他们互相牵制。

大名领有土地、统治居民的小国家称为“藩”。这不是幕府法制上的名称，而是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仿效中国封建王朝称呼领有皇帝分发的领地的领主为护卫皇帝的藩镇（围墙，藩篱）而称大名统治的国家为“藩”的。幕府关于大名统治藩内的问题，在任何时代的《武家诸法度》中都只作一般的指示，什么朴素节约了，什么选任人材或者“万事都按江户的法度”来进行统治等等，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藩主的独裁。但在藩政显著紊乱的地方，幕府就进行干涉，有时甚至搞垮该藩的藩主。

① 纪伊国，今和歌山县。——译者

幕藩体制

幕府在统治全体大名、朝廷、寺社以及直属家臣集团的组织制度上，在德川家康时代尚不完备，而是由称“家老”“年寄”（长久侍奉主家，经验丰富者的意思）的重臣们辅佐德川家康，此外只有德川家康随时录用的僧侣、学者、商人和外国顾问以及执行具体工作的人员，一切政务都由德川家康独裁专断。但在家康死后，一方面虽以将军为最高绝对的统治者，而其统治是利用法令和机构来进行的，这种制度逐步得到充实，到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这种机构组织制度便大体上完备了。

执政的重要职位有“大老”（一人）、老中（四人）、若年寄（四人）等三级。大老是遇有必要临时任命的幕府的统率者。在一般情况下，老中完全负责全部政务和对天皇、大名的统制；决定政策由老中协商，执行政策则由每月轮流值班的老中担任。若年寄受老中指挥，统制幕臣。

老中直辖大目付^①（四至五人），若年寄直辖目付（十六人），用以监察各大名和幕臣。老中之下设有寺社奉行（长官）掌管对于寺社和神官僧侣的统治，兼管审判关东八国以外天领（幕府领地——译者）的人民的诉讼；设江户町奉行担任江户的市政、警察和司法；设勘定奉行掌管幕府财政和关东地方天领人民的诉讼。这三个奉行自己所管辖的诉讼审判的事件，如果是涉及到别人所管辖或者难于独自决定的重大事件，则在老中主宰之下，由三个奉行或根据需要吸收有关高级官员进行协商。这种协商组织称为评定所，是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

为了对地方人民的统治和警备，幕府在京都设置所司代^②（由大名担任），负责监视天皇和近畿以西的大名；在骏府和大阪设置“城代”，在甲府城设置“勤番”，担任军事和警备；在京都大阪等直辖城市设置“奉行”，其它天领则设

① 目付：亦称横目。幕府官名，原来在作战时设置此官，用以监视官兵。到江户时代，大目付监察各大名，目付监察旗本和御家人。各藩也设此官，用以监察藩内官员。——译者

② 代：原来是代理主君管辖一个地区的官长，后来成为专管一个地区的副长官。——译者

置“郡代”或“代官”，以掌管所辖地域内的行政和司法。

在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各项职守之中，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所司代和城代由谱代大名充任，其余由旗本充任，完全不让外样大名参与幕政。而且这种施政机构一到战时可以立即转为军事机构。由上层旗本编成的大番、书院番、小姓组番^①等三个番役，在平时也就作为将军的卫队。此外，枪支、弓箭、枪矛等陆军各部队和船手（海军）等常备军，则由旗本和御家人所编成。

各藩的机构，是幕府机构缩小了的那样的机构，在藩主大名之下，谱代的一族占有“家老”“年寄”等执政和参政的要职，还有统制家臣集团、管理财政、藩主直辖领地和军事等部门的各种职位。各藩士的俸禄也和幕臣的俸禄一样，有的是接受管理知行所的高薪者，也有接受米禄

^① 大番、书院番、小姓组番：大番，江户幕府官名，负责警备江户城；书院番负责门卫；小姓组番负责警卫幕府各种会议、仪式、将军出巡，有时到骏府城负责警备。大番地位高于其他二者。——译者

的。十七世纪中叶，辖有知行所的只限于极少数的谱代阀族，而且他们统治知行所人民的权力也几乎等于没有了。他们也集中居住在藩主的城下。

幕府和各藩^①用上述这种统治机构，形成了分别领有从北海道南部到九州的各岛等地以统治人民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称为幕藩体制。这种体制和以前任何封建国家不同的地方：第一是德川将军不单是日本最大的封建领主，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而统治着各大名、天皇、寺社及其他一切封建领主；第二是将军和大名把处于他们和人民中间的小领主，原来的国人阶层（有力武士——译者）几乎完全撤销，并使他们脱离土地而住于城下，编成家臣集团，幕府和藩衙则直接统治和剥削小自耕农和工商业者；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如下文所述，幕府和各藩统治人民的极为严密的体制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的。

^① 藩国的数目，十七世纪末叶为二百四十；江户时代后期1813年（文化十年）为二百五十五；而1869年（明治二年）任命藩主为藩知事时，则为二百八十四藩。年代越晚，藩国的数目之所以有了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藩分家而成为独立小藩的缘故。

“让其不死不活地进行征收”

得到德川家康的信任、建立了剥削天领农民体系的基础的本多正信，曾就幕藩体制的主要内容即统治和剥削农民的问题，这样写过：“百姓（农民）是天下的根本。治理他们的方法，首先是把每人田地的地界丈量清楚，然后让他们保有一年的用费和粮食，将其所余征为年贡。让百姓无所余、又无不足，这样进行征收，才是治民之道。”他一语道破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则。所谓“百姓是天下的根本”，是说幕藩体制是以将军和大名对从事生产的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为根本。太阁检地（指公元1582——1598年对全国规定的丈量土地——译者）的目的就是取消直接生产者和领主之间的中间剥削者（土豪大地主们），而让他们的隶属农民形成为自立小农的本百姓，由领主直接掠夺的体制。这种政策在整个十七世纪由幕府和各藩进行了积极的贯彻。本多正信的说法是：明确量清百姓一块块的土地，规定石数，然后从中减去百姓的粮食和种子

等每年最低的必需用费，而将所余全部征收为年贡，这是治民的好办法。年贡的比率是公五民五乃至公六民四，看来好象低于太阁检地规定的公二民一，但由于丈量的办法，农民的实际负担已经成了公七民三。幕府各藩不论表面的比率如何，却是按照“百姓无所余，无不足”来规定的，或者据说是德川家康所说的更为露骨的话：“对百姓可以让其不死不活地进行征收”。

不仅要掠夺百姓的全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甚至连百姓的必需部分也要侵占，为了这种残酷的掠夺，在丰臣秀吉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的村落制、五人连坐制，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完成了。当时的村庄通常是以五十到六十户的本百姓（自耕农——译者）的部落作为一个行政村。村长在关东方面叫作名主，关西叫作庄屋，在其他地方又称为“乙名”等。村长和组头（村内小部落的头目）以及代表本百姓的“百姓代”三者，作为地方（村方）的“三役”。这些是由村庄的几户最上层百姓轮流或者世袭担任。他们是领主统治村庄的基层官吏，同时他们也受领主的统治

和剥夺，所以有时候^①他们也成为村民的利害的代表者以对付领主。

年贡按村征课，村内如有不交年贡的，领主就追问村吏。当然实际担负年贡的是每个百姓。他们以近邻五、六户组成“五人组”，不仅对组员不缴年贡负责，就连逃亡或犯其他罪行也由全体组员负连坐责任，这样近邻就负有互相监视的义务。而且，对每个村民都登记了详细的户籍，这和后文所述的取缔天主教有关。村民没有居住和职业的自由，也没有买卖土地的自由，并限制因为继承而分割土地，甚至也不许在耕地上自由种植有利的作物。

村庄里除本百姓外，还有称为“水吞”、“小前”等等的农民。他们是富农和地主的佃农或仆役。而在后进地区还存在称为“名子”、“被管（官）”等等前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半奴隶性质的家庭奴隶。这些农民既没有参与村中公共事业的权利，也没有使用村中公共林野的权利。但

^① 所说有时候，是指村内百姓的阶级分化尚未发展，村吏阶层和一般百姓的阶级对立仍还不尖锐的时候，或者村吏是由村民群众所推举的时候等等。

是，在领主看来，这些在丈量土地册上不列名的人是等于不存在的，所以他们能够摆脱直接的主人、雇主和地主的束缚，而迁居任何地方，就任何职业，对此，领主是不管的。

表示这种统治农民体制已经确立的是公元1649年（庆安二年）幕府丈量土地的条例和叫作《对各国乡村的告示》（《庆安触书》）的法令。前者是将太阁检地规定的一步面积为六尺三寸平方改为六尺另一分的平方，并详细地规定了丈量的办法。后者琐碎地指明了农民生活应有的方式，这里充分表现了幕府各藩完全不把农民的人格放在眼里，只把他们看做是单纯的生产年贡的工具。例如下面这样的说法：

“农民是不懂利害、也没有长远打算的人，所以一到秋季就让妻子随意吃掉稻米和杂粮。假如整年不忘记正月二月三月，就该珍惜粮食，专吃杂谷了。（中略）如果想一下饥馑的时候，那么，随便把大豆叶、小豆叶、豇豆叶、薯芋的落叶胡乱丢掉就会觉得太可惜了。”“男子耕地，女子织布和做晚饭，夫妇都应劳动。即使是美貌的妻子，如不把丈夫放在心上，喜欢喝茶聊天、

游山玩水，就得和她离婚。”“有田不多，难于度日的人，如果孩子多，就要送人，要给人使唤，要多考虑常年糊口的问题。”

身分制和父权家长制 统治着整个社会

为了维护如此不人道的封建剥削制度，而在整个社会实行了严格的身分制。将军、大名和武士是叫作“士”的贵族身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平民身分，但其中也有农、工、商的顺序。在这些的下面还规定了叫作“秽多”“非人”之类的贱民身分。在武士身分中，还有上自将军，下至各藩的足轻（步兵——译者）、小者（仆役——译者）等超过二十个等级的身分，每个大名也有门第的高低。而连足轻在认为百姓、町人（工与商——译者）有无礼举动时，也有斩杀的权力。在百姓和町人之间也各有若干等级的高低身分。同样身分的人还因年龄不同而有差别。由于身分不同，住所、职业、服装也受限制，身分不同的也不能结婚。

把一部分人民当作贱民，这在古代天皇制成立以来任何时代都是有过的，但从《律令》制崩溃以后，不再对一些特定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永久固定为贱民身分了。特别是个人的实力起作用的十五、十六世纪，贵族和贱民的社会差别虽严重存在，但个人身分的变动是很大的。不久，等到封建秩序确立了，将军、天皇、大名、武士等贵族的身分和门第固定下来了，另一方面贱民身分也被固定下来了。

被定为贱民的，直到子子孙孙都是贱民，住的地方也限定在指定的场所，职业也限定为皮革业等特定手工业、曲艺和劳役。有的大名也有许可贱民兼务农业的，但一般是不许贱民从事农业的，或者对此加以很大的限制。从太阁检地时起，这样的贱民制就开始出现。当时在土佐长曾我部氏的丈量土地册上，就把特定的场所规定为固定的贱民从事特定职业的部落，把他们束缚在这里。十七世纪中，这种制度已经普及到近畿地方以及关东以西的各藩，不久也波及到奥羽地方的各藩。

和身分制并列为幕藩体制支柱的是父权家长

制的家族制度。不论士农工商哪种身分，凡是身为父和夫的家长，不论在法律上、道德上，对其子其妻都是专制君主，妇女完全成了男子的附属品。特别是在将军以下的武士阶级门第，实行了固定由长男单独继承父禄的“家督（长男、嫡子——译者）继承制”，所以家族成员的生活绝对地依赖家长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并由主君予以保障的家禄，这就成为父权家长权力的基础，成为“祖先”约束子孙的力量。在武士阶级中，女子绝对不能成为家督继承人，所以她们的地位是特别悲惨的。女子未婚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成为家督继承人的儿子），这种三从，完全适用于武家的妇女。

这种武家的家族制度也影响到百姓和町人之中，看一下《庆安告示》（公元1649年幕府发布的统制农民生活的法令——译者）中所写的劳动不好的妻子要离婚，孩子多了要送人的规定就可以明白了。但是，在夫妇父子同甘共苦、一道劳动的百姓町人的实际生活中，家长的统治并不象依靠家长俸禄生活的武士家族那样严格。

武士阶级对人民的统治网发展得如此严密的

过程，同时也是铲除天主教和完成锁国的过程。这二者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这里完成了幕府的封建体制。

十六 锁国^①和封建制度

——对国民生命力的严密封锁

贸易的繁盛

德川家康时代为了充实幕府的财力而积极奖励了海外贸易。德川家康甚至把1600年漂流到丰后臼杵地方^②的荷兰船高级船员扬·尤斯坦（Jan Joosten，荷兰人）和航海长威廉·亚丹（William Adams，英国人）聘为西欧事务的顾问。亚丹在日本久住下来，德川家康在三浦半岛^③上拨给他领地，改名为三浦按针（按针是海员的意思）。以此为开端，荷兰船和英国船就开始到日本来。德川家康许可两国船只开进日本任何港

① 锁国：闭关自守。——译者

② 丰后臼杵地方：今大分县臼杵。——译者

③ 三浦半岛：在神奈川县。——译者

口，继而许可在平户地方设立两国的商馆。在此前后，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厅有了往来，也开始了和东南亚各国进行朱印船的贸易。所谓朱印船是指幕府发给盖有红色印章的一种航行海外的证明，开到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的船只。从公元1604年（庆长九年）起，到全面禁止日本船只开往国外的1635年止，朱印证明发给了三百五十五艘以上的船只。德川家康又恢复了和朝鲜的由于丰臣秀吉的侵略而中断了的交往（不过朝鲜贸易是由对马的宗氏按照朝鲜政府许可的数目派出船只前往朝鲜的釜山，并在该处进行贸易。朝鲜船只并不开到日本）。而且他还要求恢复和明朝的国交，但未成功。可是明朝的贸易船却不断地到达日本。

从这些进行贸易的西欧船和中国船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是中国生产的蚕丝和丝织品，其次是黄金、铅、草药、香料，还有钟表、玻璃器皿、毛织品等西欧工业产品也作为奢侈品而进口一些。而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白银。朱印船的进口商品主要是在东南亚各地从中国船收购的蚕丝，其次是东南亚当地所产的鹿皮及其他兽皮、

铅、黄金和香料，用来购买这些东西的白银占出口商品的最大部分。此外，铜、铁、硫磺、樟脑等产品，锅、水壶等铁器，扇、伞等纸制品以及大麦和面粉等也运销海外。

德川家康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这些贸易的利益，把京都、堺市、长崎等地的豪商作为御用商人，也和丰臣秀吉一样，幕府对外国船只运来的商品优先收购，剩下的再让一般商人和大名们购买。幕府一遇到日本国内蚕丝市价上涨，就抛售手头存货而大发其财。公元1604年，德川家康让京都、堺市、长崎的指定商人们成立叫做“丝割符仲间^①”的行会，行会对进港的外国船只，在商定丝价之后，才许可进行其他商品的交易。后来江户和大阪的指定商人也参加了行会。幕府保护行会的垄断，并从他们征收大量的税款。

“蚕丝分配行会”制度，本来是幕府为了最大限度占有贸易利益的措施，起先并非限制贸易。而将朱印证明发给日本开往海外的航船，最初也是以日本统治者身分证明这类船不是海盗

^① 割符，意为分割和分配。因将进口的蚕丝按一定比率分配给行会成员，所以才有这一名称。（蚕丝分配行会——译者）

船，并不是为了对于航海的限制和统制。但在德川家康死后，为了取缔天主教和控制大名不搞海外贸易，而幕府只把朱印证明发给角仓、末吉、茶屋等幕府御用商人和与幕府有特殊关系的人，于是这种办法就变成统制和限制贸易的手段了。

海外殖民一万人， 日本船横渡太平洋

乘朱印船出国的人估计共有七万人次以上，此外还有许多人乘葡萄牙船和荷兰船出国的，其中有的就定居在到达的地点。十六世纪中叶，自从和葡萄牙开始来往以后，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为止，不到一个世纪的期间，约有一万名日本人移住到台湾、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马来、爪哇以及其他等地。他们在一些地区形成“日本街”，其中多半由当地的统治者给予某些自治权。吕宋马尼拉郊外的迭拉欧和圣·米格尔，安南的会安，暹罗的帕栖等地的日本街相当大，在圣·米格尔一时曾达三千人之多，帕栖有过一千五百人。公元1621年（元和七年）当

了帕栖日本街头目的山田长政为暹罗王国建立了军功，被封为万伦府的太守，后于1630年因受国王嫉妒而遭杀害。象山田长政这样进行过政治、军事活动的人，是例外中的例外，整个侨居在外的日本人，几乎都是为朱印贸易船收购物资以及从事种种勤杂劳动的，其中也有在荷兰人的隶属下从事奴隶性劳动的。

海外交通的发展推动了日本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飞跃发展。室町时代和明朝进行凭证（勘合）贸易的船只只是一百吨（装货一千石）左右，朱印船一般是二百至三百吨，其中也有八百吨的大船。肥后^①的池田与右卫门，把乘坐在葡萄牙船上实地学习到的航海技术和天体观测技术等，著书为《元和航海记》（公元1616年）。这时期也大量使用了罗盘、航海图和各种观测天体、航海的仪器。最能表达当时日本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是伊达政宗的家臣支仓常长（六右卫门，公元1571—1622年）等人的横渡太平洋。

支仓常长是奉藩主（藩主受德川家康的秘密

① 肥后：今熊本县。——译者

意旨)之命，为和西班牙领地墨西哥开辟贸易，被派出朝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他乘坐幕府海军造船工人所建造的西欧式帆船（长十八间^①，宽五间半，能乘一百八十余人），于公元1613年（庆长十八年）10月28日（阴历9月15日），从陆奥的月浦出发，经过九十天横渡了太平洋，于第二年1月25日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登陆。这比胜海舟^②等人所乘的军舰咸临号有名的横渡太平洋早了二百二十五年，而且咸临号是荷兰所造的轮船，支仓常长的船却是日本造的。支仓常长上陆后，船员又横渡太平洋而回国。这只船后来赠送给菲律宾政厅了。

这次航行虽说有同行的西班牙人维斯开诺(Viscaino, Sebastian)的指导，但却是不亚于胜海舟的伟大事业的。这使人可以想象当时日本人的雄壮气概、航海与造船技术发达的情况。支仓常长登陆之后，陆路到达墨西哥的东岸，又

① 间：也写作寻，日尺六尺，等于1.818公尺。——译者

② 胜海舟：（公元1823—1899年）明治维新后改名胜安芳。在德川幕府晚期任军舰奉行、陆军总裁等职，明治维新后任参议兼海军卿、元老院议官、枢密顾问官等要职。——译者

渡过大西洋到达西班牙，然后前往罗马，归途也是横渡太平洋，经过长达七年的大规模旅行之后回到了日本。这是日本人最早的往返于亚、美、欧三大大陆的壮举。不幸的是日本国内形势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已经变为仇视西班牙，因此贸易的目的没有达到。

如果日本人的这种气概和航海、造船技术不受压抑，那么后来的日本文明会有更迅速更丰富的发展吧。

天主教和群众生活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外国传教士来到日本的也多起来了。天主教在德川家康时代甚为盛行，从奥羽到虾夷地（北海道）都广泛地有所传布。在关原战后，全国天主教信徒多达七十万到七十五万人，也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的神甫和修士。天主教就是这样在日本人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天草岛^①的耶稣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不仅印

^① 天草岛：九州熊本县海中小岛。——译者

刷出版了日语的传教书，还出版了《伊曾保物语》（《伊索寓言》的译本）和《平家物语》等日文文学书。也编纂了日语和葡萄牙语对照的辞典（这是现在研究日语最为贵重的资料之一）。装饰教会的油画和铜版画的技术以及《弥撒经》^①音乐也传来了。天主教就是这样在日本人的宗教上和哲学思想上给予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未曾有过的影响。在文学、音乐、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艺术和学术领域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德川家康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的思想，是对他的专制统治的一种障碍。但为贸易的利益所吸引，起初对天主教还是宽大的。但新教徒的荷兰人企图垄断对日贸易，屡次向幕府挑拨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传教以后就有征服日本的意图。于是德川家康对天主教增强了戒备。特别是在荷兰船、中国船开始到达日本之后，在贸易上也不一定需要葡萄牙和西班牙了，所以对天主教就没有必要为了贸易而予以宽大了。

公元1612年（庆长十七年），发现骏府

^① 《弥撒经》音乐：天主教在做米撒祭祀时选唱《圣经》中一些章节的音乐。——译者

城^①内德川家康的亲信中也有了天主教徒，德川家康大为震惊，非常恐惧，乃严禁天主教在骏府、京都等直辖领地的活动。第二年，即1613年底，下令全国禁止天主教。在禁令中，除了认为天主教宣传邪道，企图夺取日本，责难天主教排斥神道和佛法外，还指出受到限制的天主教徒进行悲壮的殉教，这就是邪道的证据；但德川家康等人对天主教掌握群众的力量之强大，抱有无法形容的不安和恐怖，这恐怕是禁教的真实的最大理由。如果确信葡萄牙和西班牙将要夺取日本国，那么在发布这一禁令仅仅两个半月前，就不会派出支仓常长去朝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了吧。

从禁教到锁国

从此时起，从驱逐伴天连^②和破坏教堂开始，对天主教的迫害日益残酷。特别是从德川家康刚死（公元1616年）之后，对天主教残酷迫害

① 骏府城：今静冈市。——译者

② 伴天连：是葡萄牙语Padze一语的日本外来语，原意为天主教神甫中担任司祭职务的人。汉语译为祭司。——译者

是无法形容的。在大阪夏战（公元1615年）中，丰臣一派有许多天主教徒，这件事由于德川家康死亡而感到不安的幕府更加深了对天主教的恐怖。这一年幕府重新下令禁止天主教，同时外国船只（中国船除外）只许开进平户^①和长崎以外，其他港口一律禁止。其目的恐怕是想要一箭双雕地切断传教士的秘密潜入，也断绝大名取得贸易利益的机会。接着，幕府在1623年（元和九年），禁止日本船开往菲律宾以及西班牙船从菲律宾开到日本来。

锁国政策的步伐加速了。1631年（宽永八年）规定，日本船出国除朱印证明外，还要有老中的奉书（奉将军之命发出的文件）。两年后的1633年，不仅禁止奉书船以外的一切日本船出国，而且禁止在外国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国。因为这些人可能是天主教徒。又过两年后的1635年（宽永十二年），幕府终于严禁一切日本船和日本人出国，同时一律不许日本人从海外回国，并规定违犯此禁令回国者处以死刑。

① 平户：长崎县平户岛北端。——译者

幕府尽管是全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们对在外日侨作为民族同胞加以保护的责任心，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封建领主来说，凡是不交纳年贡的人，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他们思想中，完全没有把国外日侨看作是本国人民这种观念。因此，当时幕府为了断绝日本人和天主教进行接触的任何可能性，竟悍然干出连外日侨回到他们所怀念的故乡都要加以禁止的这种反民族的事情来。

从锁国政策来看，与其说是禁止或者限制外国人前来日本，不如说是国禁止日本人一切海外往来，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岛原之乱以前的1635年，锁国政策在其最为重要的本质方面的作用已经完成了。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从平户被迁到长崎港内人造的小岛——出岛，只能住在这里，除指定的商人和妓女外，严禁接触其他日本人。

对天主教的迫害，到处都是凶暴残忍的。用残酷的拷打手段强迫信徒改变宗教信仰。但是，尽管用装进草袋、火烤、吊在深穴、踩毁圣像以及其他任何拷打手段，多数的信徒仍不放弃其信仰。公元1614年到1635年，据说有二十八万天主

教徒因拒绝改变宗教而遭杀害。群众拥有如此的坚强信仰，就使统治者更加恐怖了。

这一时期进行了所谓“寺请证文”的办法，即不论百姓町人（工商业者——译者）和武士，连刚生下来的婴儿也包括在内，即所有人都必须成为佛教的某一个寺院的施主，并由该寺院证明该人是寺院的施主，不是天主教徒。在长崎，从1628年至1629年，当地的奉行（地方行政官——译者）还开始施行了命令居民脚踩基督或玛利亚的圣像来证明是否天主教徒的“踏绘”办法。这种办法从公元1635年推广到全国。

岛原、天草之乱

九州地方天主教徒最多，对他们的迫害也最残酷。肥前岛原^①本来是天主教大名有马氏的领地，领民中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在即将开始采取锁国政策时，当地领主松仓重政用竹锯锯掉不放弃宗教的信徒的脑袋，挖空心思地采取残酷的方

^① 肥前岛原：在长崎县岛原半岛。——译者

法处刑。1634年以来，这里又连续遭到灾荒，农民陷于饿死的状态，而松仓重政却毫不放松地掠夺年贡，交不上年贡的，即使不是天主教徒，也进行同样地拷打而杀害。同岛原隔海不远的天草岛，本来是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领地，现在划归唐津藩^①主寺泽广高领有，这里对天主教徒和灾荒饥馑的农民也进行了和岛原一样的迫害。

公元1637年（宽永十四年）10月，忍无可忍的岛原民众首先发起了武装暴动。天草的人民也相继而起。小西氏的遗臣益田好次之子，虚岁十六岁的青年时贞（天草四郎）被两地的群众选为首领，益田好次等信仰天主教的浪人武士^②们当了参谋。群众一度占据了天草岛和岛原的大部分，不久幕府派出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两地的人民，连妇女和儿童共计三万七千人在临近岛原南端的旧城即原城进行了防御。在原城城内的高处立有木制的十字架，城墙上挂上了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但是，守在城内的不仅是天主教徒，还有许多佛教徒。一切反抗松仓和寺泽苛政

① 唐津藩：今佐贺县北部。——译者

② 浪人武士：失掉封禄、离脱主家的武士。——译者

的人民不受宗教信仰的限制而共同团结起来了。

讨伐军最初以板仓重昌为大将，用板仓的家兵和九州各大名的军队攻打原城，没有攻下，板仓重昌于第二年的1638年元旦战死。幕府第一个智囊老中松平信纲伊豆^①守(官名——译者)立即以总指挥官身分到达该地，用十二万四千人的大军包围了原城，攻夺军粮。暴动的群众并不因此而降服。围攻没能取胜的松平信纲求助于荷兰军舰从海上炮击原城。从正月11日连续轰击到25日。原城的人民用弓箭把檄文射向松平信纲的阵中，痛斥他的反民族行动说：“徒事攻城丧失多数人命，岂非真正无用之事？如欲急攻，日本国中武士大有人在，又何必乞求荷兰人的支持！”并在另一檄文中说：“堂堂官兵不敌天主，受援外人。谁能称松平信纲为智囊乎！”

人民军不论如何英勇，但因完全被围于小城，总会有一天要弹尽粮绝、失掉战斗力的。当他们弹尽粮绝的时候，幕府就乘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2月28日，天草四郎以下主要人员全部战死，原

① 伊豆：今静冈县伊豆半岛等地。——译者

城陷落了。仅仅活着的初生的乳婴和其母亲都遭幕府军残酷杀害。这就是武士道！

幕府后来到处搜索天主教徒处以刑罚。并规定所有日本人除须领“寺请证文”外，还要把教派及出生、结婚、变更住址、死亡等情况呈报寺院，而且必须登记在《宗派信徒簿》（《宗旨人别帐》）上。寺院已经成了管理户籍和兼管思想的警察。这件事使得僧侣彻底堕落下去，佛教完全失掉宗教的生命力，当时最大思想家之一的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对这件事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判，他说：“由于采取了证明不是天主教徒的办法，已经使得不义无道的佛教僧侣充满人世，而佛法之实已亡。”

锁国政策的完成

岛原之乱的第二年公元1639年（宽永十六年），禁止葡萄牙人前来日本。此后在西欧人中，只有荷兰人继续和日本进行贸易（英国人在这以前已经在商业的竞争中败于荷兰人而退出日本）。二年后，这些荷兰人也从平户被迁到出岛

的葡萄牙人的旧址。虽然允许中国人暂时和日本人进行自由接触，但到1688年（元禄元年）也被封锁在长崎市外所建的“唐人住宅”（唐人屋敷），和一般日本人的社会隔绝了。这是由于中国人之中也许有天主教徒的缘故。而在这前后，除了医药和航海技术的外文书籍外，其他书籍也都被禁止进口。垄断对日贸易的荷兰船和中国船的贸易额在其后的数年中虽曾飞跃增长，但来航船数和贸易额不久就都受幕府的限制了。

到这时候，和日本有来往的国家除荷兰和中国之外，只有朝鲜和琉球。朝鲜王和琉球王，每当新的德川将军上台都照例向幕府派出祝贺使节，幕府都予以郑重接待，但除此以外，却没有别的日常的或者通商的关系。后来幕府称这两个国家为“通信之国”（互通友好信义之国），而称荷兰和中国为“通商之国”（朝鲜和对马藩的贸易与幕府无关）。

琉球和幕府的关系，虽如上述，幕府也和对待朝鲜一样，把琉球看作是外国，但实际上从1609年（庆长十四年）以来已经是萨摩藩的属国。该年岛津家久（藩主——译者）派遣大军远征了琉

球。远征军很快地打破了琉球人的抵抗，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作，带回鹿儿岛。第二年的1610年，岛津家久伴同尚宁谒见了德川家康和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幕府承认琉球划为岛津氏统治的属国。公元1613年，萨摩藩制定了琉球的“法度”，监督了该国的内政外交，建立了征收巨额贡品的体制，并将奄美(大岛——译者)以北也作为萨摩藩领有。

但琉球王另一方面又向中国的明朝(后向清朝)朝贡，用明朝年号，向其称臣。德川家康打算利用这种情况，通过琉球和明朝进行贸易，但未能成功。后来随着实行锁国政策，幕府担心琉球成为萨摩藩乃至日本人对外走私贸易的基地而加以警惕。

锁国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铲除天主教，而幕藩封建体制获得确立，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德川家康时代，为了增加幕府的财力，容忍天主教的传播以追求贸易利益。但等到幕府统治全国的机构得到巩固，天领(幕府领地——译者)也飞速增长的时候，对天主教的恐怖比起贸易的吸引力更为增大了。所以在公元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往

来外国和由于修改《武家诸法度》（《有关武家的各项法令》——译者）而制订了轮流参觐制度，这些都在同一年里进行，是并非偶然的。

贸易情况也有了变化。幕府可以从同天主教无关的荷兰船和中国船购入蚕丝和其他过去进口过的商品。朱印船从东南亚带回的鹿皮、铅等军需品到幕府统治体制得到巩固的当时，对幕府来说已经不象以前那样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许可外国船只自由往来日本和日本船以及日本人往来海外，那么既有导致天主教潜入的危险，又要妨碍幕府和御用商人对贸易的独占，也可能促使普通商人和大名获得利益变为强大。为了铲除这种危险和可能性，幕府就彻底禁止日本人往来海外，限制来日的外国船只，采取了严峻地锁国政策。

锁国的巨害

在日本历史上锁国的利害如何，常常成为史学争论的问题，如果从人民或民族的利害来说，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非常明显的。有的

说，由于锁国政策而维护了国内的长期和平，但这是把幕藩体制下封建专制的延续，即日本社会的政治停滞，错误地看成是社会的稳定。自从丰臣秀吉没收长崎的教会领地以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仅不在日本追求领土，也没有日本人的天主教徒充当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爪牙的危险性。特别是在遭受丰臣秀吉镇压以后的天主教，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士和日本封建领主的勾结，而是天主教本身传布到人民中间，单纯地作为一种宗教了。所以天主教徒就不可能充当外国的走狗，毋宁说他们正是一些爱国者了。这在岛原的群众责难幕府向荷兰求援的檄文中也可以看出来。还有人说，由于锁国政策而促进了国内商业的发达，这是连经济发展法则的起码常识都没有。还有人说，民族独特的文化是由于锁国而形成的。但这种“独特”性是孤立于世界的闭关自守的社会所独具的畸形性。只有日本人同海外各国往来，外国人也大批来日，外国的文化和旧有的日本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这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既有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化才能发展起来。

锁国政策是迫使日本社会停滞，造成称为“岛国本性”的排外的、眼光短浅的日本人的一大原因，把当时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雄壮的气概严密地封锁起来了。

正象一些文化史书籍所写的那样，从战国时代的末叶开始，在锁国以前的日本文化界表现了空前绝后的可以称为明朗、阔达、雄伟的精神。这样的特点经常被说成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个性和爱好，这是错误的估计。所谓“安土、桃山文化”的特点，是人们在能和万里的海外自由往来的时代，在不受身分制的束缚的社会里所创造出来的。而在幕藩体制巩固、进行锁国的同时，就失掉了明朗的、雄伟的、自由的、欣欣向荣的气象。

锁国政策的最大害处与其说是断绝了来日本的西欧人和一般日本人的接触，不如说在彻底禁止日本人前往国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危害是更为严重的。前文已略有所述，这种禁止，不仅使日本人精神萎靡不振，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也大大阻碍了日本的进步发展。尽管当时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贸易，不论出口或进口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但在出口商品中却有各种手工业产品，这在促进日本工业生产发展上是一定会起作用的。此外从支仓常长一行横渡太平洋那样的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能够继续自由往来海外，那么日本人不仅到东南亚，还会到墨西哥和欧洲去吧。如果这样，那么就能和国内群众生活紧密结合，从而取得贸易的开展，而这种贸易是可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然而锁国政策却完全堵塞了这样的道路。

幕藩封建体制的确立，使锁国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的，而锁国政策又完成了幕藩封建体制，并使之更加巩固了。幕府利用严格的锁国政策来谋求根除天主教，与此同时，依靠“寺请证文”和“宗旨人别帐”的制度，把寺院变成思想警察。这些都是为了贯彻对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封建统治。由于这些，日本人在哲学和思想上的成长，尤其是超越将军和天皇的这种高度的思想认识和人类平等思想的成长，遭受了显著的阻碍。而天主教刚刚打开日本走向这种思想的道路，就遭到了封锁。

十七 百姓^①和町人^② 势力的成长

——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

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

十七世纪中期，由于幕藩体制的确立，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和最后的阶段。这是因为：第一，正如本书上卷第十五章所详述的那样，幕藩体制是封建领主阶级，即由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武士团，也就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身分而形成的单一的统治阶级，和以小农为主的农、工、商的人民，即被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体制，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的统治者。这

① 百姓：泛指农民。——译者

② 町人：商人和手工业者。——译者

两者对立的阶级结构，已经不能从封建制度内部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除了对封建制度本身逐步地或急剧地加以瓦解和变革以外，是无法解决的。第二，在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里包含着瓦解封建制度、与封建制度相矛盾的因素。虽然幕府各藩声称：“百姓为天下之根本”，并把直接生产者作为本百姓^①，把领主直接剥削这些孤立而分散的小农经营作为其固有的经济基础——这种剥削制度要求把农民束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然而，在另一方面，将军却居于统制封建诸侯的最高的王位，并采取“轮流参觐”制度，使各大名^②轮流居住在江户（今东京——译者）和大名自己的领国，将军和封建各大名使自己的家臣——武士团，脱离农业和农村，把他们集居于城市加以控制。这种体制的成立和存在，是以全国性的、各藩内的一定的商品货币经济和交通的发达作为前提的。因为，如果领主不能把

① 本百姓：自耕农。——译者

② 大名：一个藩国的国主、城主，象中国古代的诸侯一样，可以统治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译者

从人民手里剥削来的年贡物资换为货币，并以货币购买必要的物资，那么，使大名到江户居住，使一般武士团到城市居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幕藩体制存在着这样矛盾，即它虽然是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作为其固有基础的封建社会；但它又存在着同它本身互不相容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而且正象后述那样，这种商品经济尽管处于锁国，即和海外市场严密隔绝的条件下也仍不得不使它不断成长。这种矛盾只有依靠商品经济的全面胜利，向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化，才能最后获得解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

从十七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基础的这种矛盾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在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由于对本百姓的扶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就使生产力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迅速地提高了。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幕府各藩都采取了促使“名子”、“被

官”^①等旧的家庭奴隶转化为独立的本百姓的政策，其目的尽管是在于保证领主的年贡收入，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却得到了保障，因此，也促使了农民勤勤恳恳地开垦土地，并想尽办法使农业技术得到了发展。他们发明了没有耕畜的小农单靠人力也能深翻土地的“备中锹”^②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镐头，发明了脱粒用的“千齿脱粒机”、“扇车”和“簸米箱”。“千齿脱粒机”又称为“赶跑寡妇”，因为过去脱粒时使用的是叫“脱粒筷子”的两根竹劈子，把谷穗夹在竹劈子中间将谷粒捋下来的办法，而这种劳动通常是雇用贫农人家的寡妇们来做，她们借此勉强糊口。但当时由于普及了生产率比“脱粒筷子”高几十倍的“千齿脱粒机”，就剥夺了寡妇们的饭碗。这些农具不仅在当时，甚至到公元1920年前后，还是日本农业的主要工具。

粪肥开始成为主要肥料，这同需要使用大量

^① 名子、被官：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农奴或家庭奴隶的称呼，也叫家抱、分附、谱代、子方、作子、高下等。这种农奴制度的主从关系，有的地方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他们的丧葬嫁娶以至衣食等事都须接受主家监管，身份低于一般农民。——译者

^② 备中锹：镐的一种，有二至四个齿。——译者

劳动力的“刈敷”^①相比，劳动力稍微减少了一些。上层农民在经营中开始使用从商人手里买来的榨油剩下的渣滓、鲱鱼、干鳎等肥料（用钱买的肥料）。后来，从十九世纪末期起大量使用从中国东北地区进口的豆饼，接着，使用化学肥料。在这二百年间，日本农业就形成了一个使用肥料的体系。

由于上述原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观察说，在先进地区，每一反（九百九十一一点八平方公尺——译者）稻田所需要的劳动力，十六世纪为五十人，到十七世纪末减少到四十人。每一反土地的稻米产量，据太阁检地^②来看，上等水田以一石五斗（一石等于五斗五升——译者）为标准，但经一个世纪后，十七世纪末期，却以一石七斗到二石为标准了。

在这时期，耕地面积也显著增加。每一个农

① 刈敷：将杂草、稻秸、麦秸、树叶放在作物的间隙，用以保持土地的温度和湿度，预防生长杂草。腐烂之后，又可成为肥料。——译者

② 太阁检地：丰臣秀吉执政时期，在全国实行的土地丈量。——译者

民所开垦的土地面积尽管是微小的，但全国统计起来却是很大的。而且幕府各藩还把战国战乱时期得到发展的修城和土木工程的技术运用到水利灌溉方面，更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由于开始能够管理上、中游的大河流，而使下游广阔的冲积平原成为水田。根据一些资料，全国耕地面积，十七世纪初约为一百六十四万町步（一町步等于九十九点一八公亩——译者），到十八世纪初增加到二百九十七万町步，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80%以上。这虽不是精确的数字，但可以证明，耕地面积在十七世纪有了显著增加，但后来江户时代一百五十年间，其增加率仍是低的。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成长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部分地区除了为交纳年贡和自己消费而生产米麦以及其他粮食外，开始发展了作为商品贩卖的经济作物和蔬菜等的生产，即商业性的农业。

十七世纪，迅速发展了棉花、蓝（植物染料——译者）、红花以及油菜籽等经济作物的生

产，而且茶叶、野漆树（蜡烛原料）、楮树、三桠（造纸原料）等作为地方特产也有了广大的市场。在进行南蛮^①贸易时引进的烟叶种植，起初遭到领主的严禁，但由于需要量日益增加而一直保持了发展。因此，到十七世纪末期，领主也不得不允许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烟叶。随后，实际上连旧有的耕地（“本田”^②）也种植了烟叶。另外，在关东^③、奥羽^④、东海^⑤、北陆^⑥的山村也发展了养蚕业，在十七世纪期间，蚕丝的产量增加一倍。在此前，国内需要的大部分蚕丝是由中国进口，到十八世纪初，几乎完全可以自给，后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另外，农民在交

① 南蛮：原文如此，指泰国，爪哇、马尼拉等地。——译者

② 本田：指江户时代初期所勘定并列入土地登记册的水旱田地，以后开垦的为新田。——译者

③ 关东：包括现在的东京都、神奈川、千叶、埼玉、群马、栃木、茨城等县。——译者

④ 奥羽：日本本州最北部，包括现在的青森、秋田、山形、岩手、宫城、福岛等县。——译者

⑤ 东海：东京到京都的沿海地区，包括东京都和神奈川、千叶、茨城、埼玉、山梨、静冈、爱知、三重等八县。——译者

⑥ 北陆：包括现在的福井、石川、富山、新潟等县。——译者

纳年贡以后，把剩余的大米作为商品，直接拿到市场出售的也逐渐多起来了。

北海的海带、鲱鱼、大马哈鱼；关东以南、太平洋沿岸的沙丁鱼；南海的鲸鱼等水产也越来越多地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水产业有了发展。

商业性的农业是与棉纱、棉织品、蚕丝、丝织品以及染料、油、纸、蜡烛等农村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互为因果的，这使农村手工业的中心地区几乎城镇化了。这种乡村中的集镇叫作“在乡町”。和泉^①、河内^②的棉纺业地区出现了若干“在乡町”。丝织品方面，象京都西阵这样的地区，原来就是生产高级工艺丝织品的中心，现在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技术传播到各地，逐渐形成了象上野^③的桐生那样新的纺织品工业城镇。

除农村手工业外，全国性的主要商品生产有酿酒业和陶瓷业。酿酒业的发展，是以能够生产优质大米，这种大米作为商品还容易买到为前提

① 和泉：今大阪府南部的一部分。——译者

② 河内：今大阪府西部的一部分。——译者

③ 上野：今群馬县一带地方。——译者

的。伊丹^①和滩^②两个地区因便于购买优质大米，又接近大消费城市大阪，而且水质良好，就发展成为大量生产高级酒的酿酒业中心地区。陶瓷生产除旧有的尾张濑户^③的陶瓷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外，肥前有田^④地方的领主锅岛，在跟随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带回来的技术人员开始从事陶瓷生产。这种技术普遍推广到该地区，这种陶瓷叫作有田陶瓷（或者以该陶瓷的出口港取名为伊万里陶瓷），闻名全国。同样，在肥前的唐津港附近原来就有从朝鲜传来的陶瓷生产，自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把朝鲜技术人员带到这里以后，这里的陶瓷生产就和东部的濑户陶瓷同样有名了。此外，还出现了京都的清水陶瓷等，这些地区就成了具有艺术性的著名的陶瓷产地。

① 伊丹：今兵库县伊丹市。——译者

② 滩：地跨兵库县神户、芦屋、西宫三个市，濑户内海沿岸的地区。——译者

③ 尾张濑户：尾张，今爱知县西北部；濑户今为濑户市。——译者

④ 肥前有田：肥前，今佐贺县地方；有田在今佐贺县西松浦郡。——译者

城下町^①的扩大和商业的发达

商品生产的发达，当然是和商品需要的增长相适应，并以此为前提的。商品需要的增长是由两种因素所造成：一是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本身使社会分工更细，从而扩大了对商品的需要。这就是农业、水产业、林业、手工业发生分化，而各种产业内部（特别是手工业）的工种出现专业化，就形成了各行业工种相互间的供求关系。它又促使了在供求过程中充当媒介的商业和运输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发展，这又造成这一部门的生产者对农工业产品的需要。

另一个因素，也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分工，这就是估计占全人口十分之一的武士以及僧侣、神官^②等相当于武士身分的阶级，由于这些庞大的消费人口集居在城镇的缘故。这势必要把满足

① 城下町：町是市街的意思，“城下町”指以日本封建时期诸侯所居住的城堡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镇。——译者

② 神官：也称神职，是掌管神社的人员。——译者

他们所需要的佣人和从事建筑、制造家具、日用品、奢侈品以及冶铁业等工匠们和商人也集居到城镇。这也造成了商人和工匠之间的相互供求关系，于是城镇就成为一个大消费城市。武士集居的城镇以及“城下町”的形成和扩大，是以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作为其历史前提的。但在“城下町”形成以后的一段时间，它又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最大的“城下町”江户，是一个异常巨大的消费城市。十七世纪末期，估计在江户居住的武士以及为其使役的人员，至少达五十万人。而以这些人的消费作为谋生基础的商人、工匠、各种劳动者等一般市民（町方）的人口，据说在公元1693年约达三十五万四千人，但这数字并不准确。根据公元1721年实行最早而较准确的市民人口调查，江户人口达五十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口总数达一百万左右的城市。就连十八至十九世纪世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伦敦的人口，在十八世纪初估计为五十余万人，到十九世纪初也不过是九十万人左右。但江户没有值得一提的产业，而是依靠直接间接的封建剥

削，维持了这样大量的人口。

各藩的“城下町”就小得多了。最大的大名、前田氏居住的城市金泽，尾张的德川氏居住的城市名古屋，在十八世纪初，估计武士约四万人，一般市民约五、六万人。其次的较大城市，仙台和广岛约有武士二万人、一般市民三万人左右。其他“城下町”的平均人口为一至二万人，而武士均占人口的半数。在一般市民中，工匠常常多于商人。象江户促进了全国商品经济一样，各藩的“城下町”也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阪作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地区而繁荣起来。在大阪盖起了储存各藩年贡物资的仓库（原名：藏屋敷——译者）约一百所。这里除年贡物资外，还集中了畿内^①的棉花和油类，甚至连松前^②的海带以及由萨摩藩^③经手上市的琉球砂糖，即全国的主要商品都从这里运到江户和其他

① 畿内：指京都周围的一些藩国。——译者

② 松前：今北海道渡岛半岛南部地区。——译者

③ 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一带。——译者

各地。在十七世纪末，大阪人口达三十四万五千人。同一时期，京都包括市郊的一些市街在内，一般市民的人口达三十五万左右，成为仅次于大阪的大商业城市。京都又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生产丝织品和美术工艺品的中心地区。此外，唯一的对外贸易港长崎的人口约为六万，堺市的人口也约六万。在这些城市里，武士为数不多。

江户、京都、大阪，称为“三都”（三大城市——译者）。三都以及各城市的一般市民称为“町人”，他们成为和“百姓”并列的一个阶级。“町人”最上层的大商人，他们在货币财富方面超过了大名。但“町人”中大部分是工匠、徒工、自营商人及其佣人等，在他们下边还有称为叫卖的行商和临时搬运工人等。

随着全国性的商业的出现，建立了全国性信贷制度。当时通用的货币中有金、银和铜钱等三种。由于币值发生变动，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的买卖，这叫“两替”（兑换之意——译者。）占有大量资金的钱庄以全国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和今天银行相同的业务。这些业务叫做“本两替”。在公元1660

年代拥有实力的钱庄，组织了称为“十人两替”的同业公会，为维持该行业的信用，进行了严格的相互监督。

在这些钱庄中，以大阪的鸿池家为最富。此外，在伊势^①松阪，以棉布商人起家的三井八郎兵卫（1622—1692年）在江户开设了“越后屋”绸缎庄，“越后屋”开始采用售货不还价、明码标价的办法而发了大财。他接着在大阪开设了绸缎庄，还在大阪、江户、京都开设钱庄，成了江户幕府的货币汇款代理人（原文称“金银为替御用达”），也就是成为以幕府为对象的高利贷者。从此，子孙相承，都是以日本最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三井财阀的身分，进行着全国性的金融交易。

全国性交通的发展

全国性的商业贸易是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分不开的。幕府早已修建了江户至京都之间即太平

① 伊势：今三重县中部地区。——译者

洋沿岸的东海道，贯通于本州中部山区的中山道，江户至日光之间的日光街道，从日光街道的宇都宫到白河的奥州街道，从江户到甲府^①之间的甲州街道，作为五条街道（称为本街道，即交通干线之意——译者）。幕府又对五条街道沿途的村落征用赋役，即各村根据该村收入的高低，派出一定数量的人马到驿站搬运幕府和各藩使用的公用物品，这些人叫做“助乡役”。

由于五条街道是幕府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的交通要道，因此，在各重要地点都设有关卡。牛马车不准通行这五条街道，在大的江河上还故意不架桥梁，所以作为商品运输道路的意义就不大了。但是，五条街道的整顿对促进人民的全国性往来、便于经济活动方面却起了很大作用。公元1663年，在江户、京都、大阪三个城市成立了叫“町飞脚”的民间邮递行业的同业公会，实现了每月三次定期邮递。这些邮递人员一般用九十小时，紧急时用六十小时就可以把江户与京都之间的信件送交收信人。

① 甲府：即甲斐，亦称甲州，今山梨县。——译者

除五条街道外，地方的街道叫做“胁街道”或“胁往还”。这里成立了使用牛马驮运货物的收费驮运业，有利于繁荣地方的市场。

但是，大量货物的搬运主要仍靠海运。大阪至江户之间的太平洋海岸航路——南海路最为发达，在这里有叫菱垣航船和樽航船^①两个系统的船行，操纵数达四百艘以上、载重量四百石（二十至四十吨）的船只。从大阪，经过濑户内海，绕九州北岸到达长崎的西岸海路也早已发达。另外，公元1671年，江户的大商人河村瑞轩受幕府委托，开辟了从陆奥沿岸经过太平洋到达江户的东部航路。第二年，又开辟了从松前和出羽^②的各港，经过日本海，到达下关的西部航路。这两条航路是为了把在奥羽的幕府领地的粮米和其他年贡物资安全地运到江户而开辟的，但一旦开辟

① 菱垣航船是为防止运货掉在海内，在船舷上装备菱形的竹篱笆的船，即指使用这类附有菱形竹篱笆的船，亦即从事航海的海运业者。在十七世纪前期，它最初垄断着大阪、江户之间的海运，到十七世纪末期，出现了樽（指木桶——译者）航船。樽航船是由于装运的货物是伊丹、滩地区的酒等主要用木桶盛装的酿造物资而得名的。

② 出羽：今山形县、秋田县地区。——译者

后也被用于运输民间的货物。

到这时候，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以江户和大阪为中心的、连结整个日本沿岸的海上交通路线。它与畅通的五条街道为干线的陆上交通路线相衔接，为全国的日本人从经济上、文化上、心理上，最终也从政治上创造了成为统一的民族、或者国民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民的经济力量的成长 及其社会觉悟

生产力的迅速成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工商市民阶级的经济力量。大阪商人出身、近代最大的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年）在公元1692年出版的小说集《世间胸算用》^①中说：“世上有的是金钱。近三十年来，各地都见到了世面的繁荣。”连经济发展迟缓的会津^②地方，据该藩的官员观察，“自庆安元年（1648

① 《世间胸算用》：意为人世的心计，原书副题为《除夕的一日千金》。——译者

② 会津：今福島县会津地方。——译者

年)到元禄元年(1688年)的四十一年间,民势之盛有如来潮。”

井原西鹤所著《日本永代藏》^①中有叫《河旁的九助》的故事,描写了曾经隶属于大和^②的大地主的一个贫农叫九助,由于他比别人加倍勤奋,并且有创造力,逐渐扩充土地而成了富农,然后又雇用更多的人,当上了一天能加工三贯(一贯等于3.759公斤——译者)皮棉的农村手工业资本家,不久,又成为批发棉布的大商人。但当作者把“千齿脱粒机”和“扇车”,又把叫“唐弓”的弹棉花机都说成九助的发明时,就可以看出这是编造的故事。尽管如此,这时期在大阪附近,象九助这样有才能的人,借着生产力提高的机会,靠技术的改良和创造以及出色的经营能力,从贫农发展为富农,进一步成为大批发商人的机会恐怕也是不会太少的。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时代的特权大商人多数没落了,而善于适应新兴的商品生产和市民要求

① 《日本永代藏》:1688年,意为日本商人致富术。

——译者

② 大和:今奈良县一带地方。——译者

的人获得了成功。如三井、鸿池和住友（别子铜矿的开采者）都是如此。

市民随着经济力量的成长，尽管仍处于严格的等级身分制度之下，但也认识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力量。长崎富商西川如见（1648—1724年）的《町人袋》^①描述了町人的夸耀：“金银流通于天下，町人掌管了天下的金银财富。”不仅如此，还说：“儒家、医生、诗人、茶道等风雅人士，多数出于町人”，町人成为文化的推动者。这样，尽管商人的身分是低下的，但事实上社会地位提高了。又说：“水位于万物之下，而滋润天下万物，町人虽位于四民（士农工商）之下，而对上五等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是有作用的。充任幕府顾问的学者荻生徂徠在西川如见的《町人袋》出版前后所著的《政谈》中，站在领主的立场上说：“由于商人势力的兴盛，日本全国商人互通声气；地方和江户的物价保持平衡，又使百万商人结成整体，其势力就连将军、大名也无法战胜”，他感叹天下“财权”

^① 《町人袋》：1692年著，1719出版；意思是町人的锦囊妙计。——译者

被商人所掌握。这虽有些夸大，但却充分表现了这种状态：由于全国性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全国范围内的商人阶级，必然超出了分散割据的封建领主而成长起来了。

在这时期，尚未见到农民自己写的反映农民社会觉悟的文章，但描述商人阶级成长的《政谈》一书中，却从各种角度论证了领主对农民统治力量的削弱。可以称为日本社会科学的先驱者、富于创造精神的学者熊泽蕃山（1619—1691年）的《集义和书》谈道：“人类初期从事农业”，还说，那时既无阶级，也无统治者。这和只把农民视为领主剥削的对象，说：“百姓为天下之根本”，是不同的。到了后代，在农民起义的记录中，农民自己曾说过，农民是抚养全人类的，是最为宝贵的人类。熊泽蕃山早在十七世纪末期已经替农民叙述了这种农民的思想觉悟。

农民阶层的新分化

市民经济力量的成长和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意味着封建领主阶级的相

对削弱。在这里反映了幕藩体制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这种矛盾的最后的局面。这种矛盾也加深了自耕农的阶级分化，因而削弱了幕藩体制的基础，使幕府各藩的财政陷于窘境。

在十七世纪后期，虽说：“民势之盛有如来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农民生活的提高。他们大部分仍然一家七、八口人住在一个小窝棚里，吃的以杂粮和蔬菜为主，除元旦、盂兰盆会（旧历七月七日——译者）和祭神的节日，或者病危以外就吃不到大米。民力的提高，乃是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富农阶层，他们除年贡和自己消费的部分以外，还可以生产属于自己收益的，称为“作德”^①的部分。他们购买土地，扩大经营，或者把土地租给佃农而成为寄生地主。与此同时，自耕农，即本百姓失去土地而变为佃农，即变为“水吞”（参见上卷第十五章倒数第二节）。农民本来就受着“不死不活”的剥削，一旦遇到家中有劳动力的人得了重病和荒年

^① 作德：也叫作米、作得。指农地产物中，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实得部分。后来指地租。——译者

以及许多偶然发生的事故，马上陷于困境，就得向比较富裕的人借高利贷的钱款和粮米，如果偿还不了，就得放弃土地。一般来说，商业性的农业，其经营面积越小，在生产费用和产品出售方面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小农没落的可能性就大。近畿的种棉地区，在十七世纪末，佃农就已经占自耕农的半数。他们或者被富农和农村手工业所雇佣，或者一部分成为商店的店员以及各种体力劳动者而流入城市。象关东地方，这种商业性农业不发达的地域，阶级分化虽然比近畿迟缓，但到十八世纪前期，失掉土地而变为佃户或者逃亡的也增加了。

这样，农村开始了新的阶级分化。它使幕藩体制基础的大部分自耕农走向没落，而促使了领主以外的新的剥削者，即地主、富农、农村手工业经营者、批发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他们往往一身兼其全部）的成长。他们阻碍了领主剥削农民的全部剩余价值，领主的收入已经无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了。而且，领主、武士阶级本身也被卷入商品经济之中，他们无论在贩卖年贡物资，或者购买生活必需品方面，其利益都被御

用商人所夺取。因此，他们的收入只有减少，并无增加，而开支却恰好相反，这使他们的财政不得不陷于困境。

农民斗争的成长

各大名由于“轮流参观”以及负担幕府土木工程等费用，财政就更加困难。公元1646年，长州^①等藩早已因财政困难，而以“征借”为名，减少了藩士^②俸禄十分之二。到十八世纪，各藩减发藩士俸禄就已成为常见的事情。

幕府到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1680年在职）时，已把德川家康的大量积蓄全部耗光。公元1695年，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改铸庆长货币，降低质量，并以与旧币相同价格强制流通，从而从新旧币的差额中攫取厚利，称为“出目”。此后，为解决财政困难而频繁地进行了货币“改革”。在没有铸造权的各藩发行了各种名

① 长州：全称为长门，今山口县西北部。——译者

② 藩士：大名的家臣。——译者

称的不兑换纸币——“藩札”。这是适应货币经济发达而剥削人民的新方法。幕府各藩又采取直接提高年贡额、丈量土地、增加定产额和加紧催征等办法，加重了剥削。

农民对于这些的反抗也必然更加激烈。从公元1640年起十二年内，若狭^①的青年庄屋松木长操代表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的农民群众，向藩厅进行了请愿斗争，他虽被判处死刑，但他的要求却得到了贯彻。在这时期，各地都发生了这种庄屋、名主^②代表村民直接向该藩中央部门进行的请愿——“越诉”，这是这一时期农民斗争的主要形式。不久，开始爆发了公元1654年信州^③高远藩数千农民“逃散”^④，1668年磐城^⑤相马

① 若狭：今福井县西南部。——译者

② 庄屋、名主：江户时代，日本关西地区称村长为庄屋，关东地区称此为“名主”，都是由村民推选地主担任。——译者

③ 信州：今长野县一带地方。——译者

④ 逃散：农民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而离开农村和领地，到其他领地或城市去。——译者

⑤ 磐城：现在分属宫城、福岛二县。——译者

藩民的“强诉”^①，1686年信州松本藩农民多田嘉助领导的，称为“嘉助暴动”的强诉，1698年美作^②津山藩农民的全藩性强诉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明智而知名的备前^③冈山藩主池田光政等人早在1668年向幕府上书说，现已无反抗将军的大名，即使有人反抗也不值得害怕，“值得担心的是农民起义风行，由于全国到处爆发起义，恐怕在大名当中也会出现叛逆之徒”。这样，农民起义的威胁，已经大于大名的反叛。

商人、商业和封建剥削的结合

这样，尽管与幕藩体制相对抗的农工商人民的力量显著发展起来，但它的发展仍要经过极为困难的道路。幕府各藩把从事基本生产的大众——农民束缚在年贡生产上的控制力量当时还是

① 强诉：也作噉诉，指佛教信徒利用神威向朝廷、幕府申诉主张的集体活动。开始于平安中期。到江户幕府时代，也把一般农民起义称为强诉。——译者

② 美作：今冈山县东北部。——译者

③ 备前：今九州西北的半岛部分，分属佐贺和长崎两县。——译者

很强的。正如庆安告示（上卷第十五章倒数第二节）所说的：“无论是因为年贡而出卖杂粮，还是买粮，商人都不怀好心，因此不要疏忽大意。”这样，领主只允许农民在完成交纳年贡的范围内，才能进行商品生产，如果农民超出这个范围，就要继续加以限制。

另外，有能力的统治者，如土佐^①藩的家老^②野中兼山（1615——1663年）积极地参与商品经营，企图由领主来垄断。野中兼山开垦了大面积的新田，修建港湾，以便大阪和藩地之间的交易。他还奖励生产纸、漆等，该藩把这些产品全部收买过来，实行专卖。这种所谓“殖产兴业”，乍一看好象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其实是大规模地酷使人民的赋役劳动，剥夺人民的生产和商业自由，从长远的观点和本质上来看，反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土佐特产的纸的生产，在实行专卖时期并未发展，而野中兼山在1663年遭到全体藩民的反抗失去地位以后，停止

① 土佐：今四国高知县地方。——译者

② 家老：也称“年寄”、“宿老”和“老”，是大名的最高属僚。——译者

专卖，纸的生产才得到发展（此后，1714年又进行藩营专卖，生产又停滞了。经过两次农民起义反对这种办法，在1786年完全制止了专卖制度，生产才得到正常的发展）。

由于封建权力不断压制生产的自由，因此商人即便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但使它转化为产业资本，是极为有限的。再加上锁国政策，海外贸易也无法进行，所以他们的营业，主要是依靠领主出卖年贡物资的交易以及领主和其家臣们的消费上。因此在大阪出现了专门经管各藩年贡库存物资的“挂屋”、“藏元”^①，在江户也出现了推销旗本和御家人^②俸禄粮米的“札差”^③等这种与封建领主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他们把大名、旗本的年贡、俸禄作为抵押，进行高利贷而攫取利润，也就成为领主的剥削的寄生者。还

① 挂屋、藏元：挂屋是大名的财政代理人，后来逐渐变成大银行家和钱庄商人。“藏元”是大名委托卖米的商人，后来变成大米批发商。——译者

② 旗本和御家人：在江户时代，领地一万石以下的幕臣中，能面谒将军的称为“旗本”，以下的身分称为“御家人”。——译者

③ 札差：从武士手中收购禄米票的高利贷者。——译者

有象鸿池家这样大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包新田，进行开垦，但这只是和领主分赃，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而不是成为农业资本家。

没有自治的城市 和商人的生活方式

寄生于封建剥削的大商人，把大批金钱借给幕府和各藩，他们好象具有操纵财政的威力，但对统治者横行霸道的抵制却是软弱无力的。自从公元1681年幕府搞垮江户的大商人石川六兵卫起，常常只以超出商人身分的言行为理由加以取缔，并没收其财产。公元1705年遭到取缔的大阪的淀屋，它对西国^①、九州的各藩几乎都有巨额贷款，贷给幕府的款额也达数万贯银两。在此前后，和淀屋一样，因被幕府取缔，或者由于大名赖债不还而倒闭的大商人就达几十家。假定这些人的财富是以和全国范围的批发商、生产者进行

^① 西国：有时指九州地区，此处指京都以西的中国、四国地区。——译者

交易，以及靠他们本身的生产事业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么如果强制取缔他们，则其影响势必扩大，而引起经济方面的混乱和社会不安，所以任何专制权力也是不能这样做的。但他们的财富是寄生于封建剥削而形成的，即使剥夺了它，也不会影响其他，反而只会使大名得到好处。

不能使工商业获得自由发展的町人的政治势力是微小的。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不仅在江户和其他城市，甚至连商人城市的大阪和京都，市民也都没有自治权。在幕府的直辖市里，立法、行政、司法、警察的全权均由有势力的旗本任命的“奉行”所掌握，而市民对市政没有任何发言权。特别是“店借”“地借”（租房、租地者）和农村的“水吞”一样没有公民权，这些人不能组织五人组^①，他们既不负担消防、节令活动等市政公共事业的费用，也没有参加这些活动的权利。从领主来看，只有拥有地产和房产的人才算是“町人”（相当于农村的本百姓），他们只管

^① 五人组：是由五户人家组成一个行政的税收的单位。
——译者

理自己居住地区内的公共事业。在他们当中最有势力的人担任“町名主”（江户），或者“年寄”（大阪）等职。江户的名主为世袭，在他们上面还有三名“町年寄”，他们在“奉行”和“名主”之间进行联系。

町人社会，即使有钱也无自由，活动范围也受限制，所以这就难怪连那样地描写了生气勃勃的新兴市民的井原西鹤也再三兴叹道：反正“人生如梦”，世道“沧桑”了。“沧桑”指喜气洋洋的快乐的社会的同时，又意味着好象浮在水面上一样变动无常的社会。井原西鹤的理想中的市民的一生，乃是二十四、五岁前受父母的教养，此后不靠父母的财产而独立谋生，四十五岁前成家立业，而后就不靠忙忙碌碌地奔走，过着享乐的生活。靠自力积累财富，在这里看到了新兴市民的精神面貌。但一旦有了可以一生享用的财产以后，就要过享乐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向不断扩大再生产前进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精神是有何等的差距呀！

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町，以及全国的城市、驿站，在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地

大批出现了卖淫的欢乐街——“游廓”，它成为町人娱乐的场所。因为，只有这里才是金钱比任何社会地位、身分更起作用的世界，是市民们能够充分享受财力的“自由”和“解放”的场所。除此以外就再无财力的“自由”和“解放”，这也表现了幕藩体制和生产力发达之间的矛盾。

十八 市民文化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独创

市民成为创造文化的主力军

百姓町人——市民，随着在经济、社会方面势力的成长，同时成了创造和普及文化的主力。十五至十六世纪，文化的创造，从僧侣和武士阶级逐渐转移到民众方面（上卷第十三章），到十七世纪末期完成了这种转移。文化的主力军，在日本历史上，开始基本上从统治阶级转移到被统治阶级。

创造文化的主力军在于平民；这在艺术的各领域特别明显。小说方面井原西鹤、俳句^①方面

^① 俳句是以连歌（日本诗歌的一种体裁，由二人以上轮流歌咏上下句，通常以一百句为一首）的滑稽趣味为主的体裁，也是俳谐（一种带滑稽趣味的日本诗歌）的首句，即“发句”的单

松尾芭蕉（1644—1694年）、戏曲方面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他们不但在近世文学上，而且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优秀的大作家。井原西鹤虽出身于大阪的商人，松尾芭蕉虽出身于下级武士阶层，但较早地放弃了这种身分，而生活于各地的町人、农民中间。近松好象也是出身于京都公家（朝廷——译者）的下级武士，但他在年青时代就放弃了原来身分，参加了贱民职业，进入受人鄙视的戏剧界，并以“决心把演戏作为终生事业”而自豪。

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有描写现实町人社会的和取材于现实与过去武家社会的，不管哪方面，西鹤都批判了武士道德，歌颂了被执政者伪善地加以排斥的男女爱情，并对资本营利积极地予以肯定（《好色一代男》《日本永代藏》等）。近松从人情的立场，描写了封建的仁义道德（义理），以及金钱和男女之间的爱情，

独使用。它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受到群众的欢迎，西鹤也是其中的能手。但在芭蕉前，还是自由使用日常语言，用轻妙的笔调表现民众生活的智慧性的娱乐，芭蕉同样使用日常词句，但却把它写成高雅的诗歌。

“人情”之间发生冲突的悲剧（《心中天网岛》等）。这两人描写了人类社会，而松尾芭蕉却面向自然，在自己的感情和大自然的接触中，创造了独特的诗歌的境界。

戏剧、音乐、美术也转向市民方面

日本独特的歌舞伎戏剧和人形净瑠璃戏剧在这时期有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戏剧也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歌舞伎是来源于十七世纪初生于出云的歌女阿国在京都、大阪一带开始演出的，以舞蹈为主，还包括简短故事的艺术作品《游女歌舞伎》。但因它带有黄色而被幕府禁止，乃由美少年演出的《若众歌舞伎》来代替，但又因紊乱风纪而被禁止，于是就成为只由成年男子扮演的《野郎歌舞伎》。这样，从表现美女、美少年姿色的舞蹈剧，改为主要是用动作和道白的技巧表达有趣情节的戏剧。因为禁止女人上舞台，所以由男人的“女形”（旦角——译者）扮演女角，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歌舞伎中。日本的舞蹈也来源于歌舞伎的舞蹈。在十七世纪末，江户、大阪、

京都三个城市已有很好的常设剧场。江户的初代市川团十郎（1660—1704年），通过名为《荒事》（武戏——译者）的、以历史故事为主题的、勇猛的“时代物”的演出；京都的坂田藤十郎（1645——1709年），通过名叫《和事》的，当时主要以町人社会为主题的，以爱情为主的“世話物”的演出，都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名演员。

人形净琉璃戏剧是木偶戏和净琉璃的乐曲相结合的戏剧。在十五世纪，琵琶法师创始的说唱故事中的一种乐曲称为净琉璃。到十六世纪下半期，伴奏的乐器琵琶改为新从琉球传来的“三味线”（类似中国的三弦——译者），它和原来的木偶戏相结合，十七世纪初出现了人形净琉璃。十八世纪初，大阪郊外农民出身的竹本义太夫（1651—1714年）创造了富于表现力的净琉璃的新乐谱（义太夫节），近松又为它编写了出色的脚本，于是，义太夫节就立即占居了这方面的王座。由于净琉璃能和木偶戏分开，可作为独立的故事来欣赏，所以尤其受到町人的喜爱。它又被逐渐推广到农村，在其剧本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在民众的生活中起了深刻的影响。

和这些市民的舞台艺术、音乐相比较，作为武士社会的礼仪式艺术，即作为“式乐”的谣曲、能乐^①，却只是保持了旧有的传统，没有任何新发展。

在美术方面，狩野派和土佐派都成了幕府各藩和天皇宫廷的御用画家，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相反，不肯和有权势者相勾结的京都商人出身的俵屋宗达（？—1634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1658—1716年）创造了色彩华丽的装饰画，受到上层町人的喜爱。在这时期，江户的菱川师宣（？—1694年）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出过去谁也没有领会的绘画美，开创了新画风，并用木板印刷，创造了浮世绘版画。菱川师宣生于安房^②刺绣工人的家庭，一辈子生活在民众之中，具备了民众画家的觉悟和自尊心。他是日本最早的、把优秀的美术大众化的画家。在美术工艺方面，肥前有田地地方的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1596—1666年）在瓷器上成功地制成了象中国瓷器那样的红色瓷

① “能乐”：伴有合唱和乐队的抒情剧。——译者

② 安房：今千叶县。——译者

釉；京都的野野村仁清也制成了施有红釉兼有黄、绿、紫、青等色的陶器。

文化脱离宗教而独立和儒教的渗透

文化艺术的各部门都是非宗教的、讲究现实的。这种历史，典型地表现在小说的变化中。以井原西鹤的作品为代表的小说，称为《浮世草子》，它的体裁乃是继承十五世纪《御伽草子》和后来《假名草子》的传统。《御伽草子》是以佛教的，超现实的东西作为基调；《假名草子》把现实的人类生活作为故事中心，而在《浮世草子》中却积极地肯定了为佛教所排斥的性欲和物欲，并把它作为主题。松尾芭蕉的俳句，虽然是背离人类社会的，但他也是从现实的各种自然美中去充实对生存的体验的，所以，他也不是想在头脑中虚构出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同过去相比，无论在演剧方面或美术方面，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表现的非宗教的现实性格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能乐和歌舞伎的差别）。这是以现实中的活生生的群众社会作为基础的文化所必然具有的特

征。

到了这样的时代，学问也才从寺院中得到了解放。

在任何时代，统治者不但要以权力压制人民，还要在思想上统治人民。但是，在近世以前的日本，这种思想统治中最重要的，或者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是宗教（即信仰佛教和神社等），而学问只不过是佛教的附属品而已。但是，这个时期人民却有了非宗教的现实主义思想，因此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只靠宗教也就不够了，就必须采取带有现实主义的思想。能够满足统治者这种需要的就是儒教。

儒教是在古代天皇制成立时期传到日本的，在各个时代都很受上层统治者的尊重。但在近世以前，上层统治者还不是直接和劳动人民相对立，因此作为君主统治人民的理论的儒教，只作为上层统治者的教养工具，似乎没有利用为直接统治人民的理论。因此，儒学的学习也为天皇宫廷中担任讲授儒学的人和僧侣所垄断。儒学开始从宫廷和寺院推广到其他方面，乃是出现了近世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萌芽的十五世纪以后的事

情（见上卷第十三章第四节）。到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僧侣出身的儒学者藤原惺窝（1561—1619年），首先把儒教研究从宫廷和寺院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儒教和幕府相结合的开端。他的门徒林罗山（1583—1657年）受到德川家康的重用。林罗山的子孙代代充任幕府的“大学头”（教学长官），培养了许多子弟，这些儒学者受到各藩的聘任。于是，儒教就迅速占居了封建教学中的统治地位。

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所推广，成为幕府各藩御用的学术和近代日本儒学主流的，是在中国宋朝末期（十二世纪后期）由朱熹所创立的学说——朱子学。这种学说认为“理”是作为宇宙的根源而存在，而理的静和动，形成阴和阳，根据阴阳二气的作用，形成天地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以及其秩序。理贯串于自然、社会和人类。在人类社会的秩序（封建的秩序和道德），例如君臣上下的秩序，就是和天在上、地在下一样，完全贯串着同一的理，理是永恒不变的。于是，要明确和严守君臣上下的“大义”，臣或子要尽忠孝的“名分”（大义名分），以及明确维护中

华（内）、排除夷狄（外）的华夷内外的区别，那就成为社会的最高法则。

这种世界观和实践道德当然完全适合于封建领主固守自己的领国，并以等级身分制和家长制作为统治人民的最重要制度。将军和大名恐怕无法理解朱子学的思辨的世界观，但根据他们阶级的本能来说，是容易信奉那种大义名分论的。另外，对“理”和“气”的学说，在儒学者当中虽然也有各种分歧和批判，但强调大义名分和家长制道德的教义，却是所有儒教学派的共同点。于是对“儒教”的学习，就成为近代日本钻研任何学问（无论是自然科学或者数学以及日本古典学，即国学）的人所必经之路。因为无论搞什么学问都必须懂得汉字，会念汉文，为此就必须学习《论语》等儒教的原著和朱熹的初学入门书《小学》等。这样，儒教道德就成为统治社会的道德。

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的 思想方法的萌芽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人的学问虽然是武断

的，概念也不严密，但总是想从根源上用理论解释宇宙。这种思想方法开始推广到寺院之外，有才能和雄心壮志的青年，就立志靠儒学闻名于世，而把研究儒学作为职业。于是，不久又出现了对于朱子学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如中江藤树（1608—1648年）那样，认为朱子学的道德修养方法是规范的强制，对提高各人来自内心的自发的德性方面不起作用。这样，出现了有人根据这种观点，转移到主张规范的知识 and 经过内省修养的实践统一起来，即王阳明（十六世纪初中国的学者）知行合一的学说——阳明学；但从学问方面来说，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要从现实中概括出理论的学者，最早的是熊泽蕃山。

熊泽蕃山是京都浪人^①的儿子，曾在备前藩主池田光政手下当官。不久成为浪人，投入中江藤树门下，后来又回到池田侯下面当官，由于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有所贡献，而受到幕府的嫉妒，1656年又成为浪人。此后，他一直受幕府的迫

^① 浪人：幕府时代，没有主子、到处流浪的武士。

害，最后被监禁于下总^①的古河，死于该地。在苦难的生活中，他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而离开了阳明学和朱子学的思辨，认为政治的理论应随时、所、位（状况）的三个条件来变化。他批判了朱子学把“圣人”（具备超人德智的、儒教的、理想的君主们和被认为完成这一学说的孔子）根据时、所、位来制订的法和礼（社会秩序）看作是普遍适用的教条而予以遵守，这是“死学”。这里存在着力图客观地掌握正在变化的社会、超出儒教的社会科学的萌芽（《集义和书》《集义外书》、《大学或问》等）。

与熊泽蕃山几乎同时代的山鹿素行（1622—1685年）也是浪人出身，原是林罗山的门徒，后来对朱子学抱有怀疑，在《圣教要录》中批判了林家的学说，受到幕府的镇压而被驱逐出江户。他认为“理”不是宇宙的根源，也不是本体，而是把天地自然和社会作为一贯的条理。但重要的不是这些经院式的议论，而是他所说的“直接用圣人作证”，他认为要把圣人所说的事情按圣人

^① 下总：今千叶县的北部和茨城县的南部。——译者

的意图进行理解，这样开辟了客观地研究学问的方法，这是重要的。他认为要知道圣人的意图，必须很好地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法制、风俗、人情，强调了历史主义的方法。他的著作《山鹿语类》说：“天地开始时，无君臣之别，盖人皆获天地之气而生也”，“君主之建立朝廷，乃为天下万民，并非君主个人所私有”，这和熊泽蕃山所说“人类初期，从事农业”（见前文）相同，是产生用历史观点观察问题的一种卓越见解。

山鹿素行的学问，是通过研究圣人的书及其时代，来直接学习圣人的。这种学问在日本儒学史上称为“古学”。而京都町人出身的学者伊藤仁斋也有同样的主张，他站在这种立场上，开辟了对儒学经典进行文献学的研究的道路。他一辈子没有在武家当过官，而在自己家里开办“古义塾”教授门徒，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据说他的门徒不分武士或町人，前后共达三千人。

具有熊泽蕃山的见识和伊藤仁斋的博学的获生徂徠（1666—1728年）是古学派造诣最深的。他也是因其父是失业的武士，而在青少年时期是

在贫穷中进行苦学的。他成名之后，受幕府要人柳泽吉保的重用，对幕府的政治经常出谋献策。他最初属于朱子学派，但由于当时幕藩体制的矛盾已经全面发展，因而朱子学的“理”的调和的世界，显然是无法实现了。他面临着这种现实，为了探求作为统治者有效地治世的理论，在他四十岁左右时脱离了朱子学。荻生徂徠明确区分：不但在朱子学中，而且在一般儒学中也认为不可分割自然的理和人类社会的理（在这一点上，和素行、仁斋有所不同）。他认为自然的理是人们不可知的，而人类社会的理——秩序，只不过是圣人所制订的规范而已，任何睿智的圣人所制定的理，也不是绝对的，再过几百年，社会变化了，规范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样，荻生徂徠采取了和熊泽蕃山的时、所、位的学说完全相同的立场。

从这点出发，荻生徂徠的学说向着两方面发展。一种是作为学习圣人之道的方法，也就是要彻底地研究圣人时代的历史和人情。为此，他强调了特别要正确深刻地理解诗、文和对历史进行实证的研究。他说：“治学之道，始于诗文，终

于历史。”因为他强调研究古诗文，因此人们称他的学派为古文辞学派。徂徠学说的另一方向是对于圣人制订的东西，要根据同圣人时代不同的今天现实加以具体化和改造。这是区别于旧来儒学的“道德即政治”，而成为统治技术的政治学的第一步。为此，对现实社会需要进行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前面引用过的《政谈》，就是他的这一方向的代表作。

熊泽蕃山、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徠是日本思想史上值得大写特写的独创的思想家。他们当中三个人出身于浪人，一个人是町人，这和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在处境上，面临着违背朱子学说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并又具备了分析社会的能力，才形成了这样的创见。到了这个时代，即使是作为统治者的学问的儒学，如果对民众的现实生活没有深刻的接触，也是无法发展的。

批判的精神和历史、古典的研究

在日本学术史上，最初明确地把“怀疑”作

为治学方法，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也是这个时代。福冈藩的儒者贝原益轩（1630—1714年）是顽固的朱子学者，但到晚年怀疑朱子学不是孔子、孟子的原来教义，于是写了《大疑录》。他在该书中说：“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无疑则无进。”

这样出现了批判地研究学问的精神，对日本的历史和古典也进行了这种学术的研究。在这个时代，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表现在新井白石（1657—1725年）的业绩上。新井白石出身于浪人，在甲府的德川家宣（后来的六代将军）那里作官，并参与幕府的机要。因德川家宣死亡而丧失地位，乃以余生钻研学问。他的历史著作有在甲府时代向德川家宣讲的《读史余论》和晚年的《古史通》等有关古代史的研究。前者有这种看法，即把历史看作是“天下大势”的变化，力图掌握其符合发展的规律。这里和通过历史来说明大义名分、华夷区别的林家的《本朝通鉴》及水户藩的《大日本史》存在着不同的科学方向。而且《古史通》是根据中国、朝鲜的古书，批判地分析了《日本书纪》、《古事记》所记载的事

实，甚至把其中的神话也解释为现实人类社会的缩影。以现代的学术观点来看，这些解释虽有错误，但在当时由于打破了神秘主义，所以具有高度的积极意义。

新井白石又是用比较语言学来研究日语的先驱者。在参与幕府政治时期，他还通过审讯企图潜入日本而被捕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G. B. Sidotti），探索了西洋国情和文化。《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就是他探索的成果，这些书成为锁国时期研究西洋的基石。他对西多蒂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予以理解和同情，表示了人道主义精神。他还有一部称为《砍柴记》的书，在日本人自传中也属于早期杰作。而且新井白石的许多主要著作，词句都很美丽，他是真正的日本学术界的先驱者。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近江^①村医的儿子北村季吟（1624—1705年），以由于俳句的流行而提高了对古典知识的要求作为基础，完成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集注，成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先驱。在同一时期，放弃武士身分而到

① 近江：今滋贺县地方。——译者

大阪町人社会中居住的下河边长流（1624—1686年），反对在“和歌”^①界里仍以门第权威为重，神秘地鼓吹秘密口传等无聊的做法，而提倡自由地写作诗歌。在他强烈的影响下出现了契冲（1640—1701年）。他虽生于武士家，但少年时代当过僧侣，在高野山学习佛教的学问，中年得到和泉富豪的援助，埋头研究日本古典，除著有注释《万叶集》的《万叶代匠记》外，他还写有许多古典文学的注解书。这些书都不受佛教和儒教解释的束缚，而想弄清古典本身的意思，就须深入地研究古代日语假名的用法，开创了科学的文献学和日本语学。他奠定了所谓“国学”的基础。他的研究方法与儒学的古文学派有共同之处。

日本博物学、农学、历学、 数学、医学的出现

在我国，不是从中国引进、而是日本本身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等的萌芽也是在这个时代出现

^① 和歌：以五、七、五、七、七共五句三十一个字母写成的日本古体诗。——译者

的。贝原益轩明确提出了对“学术怀疑”的意义，他又是我国本草学（他是从用为药材和其他方面出发来研究植物、动物、矿物的博物学的先驱）的创始人。以往的本草学只是中国本草学书籍的解说，贝原益轩却初次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产品，并对照中国本草书的记述而写出《大和本草》。接着，生于江户市内一个医生的家庭、在伊藤仁斋门下学习的稻生若水（1655—1715年）得到加贺^①前田侯的援助，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进行了广泛调查，写出了称为《庶物类纂》的巨著（他一生完成三百六十二卷），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

农学方面，在十七世纪中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业书《清良记》（著者不详），本书是用向领主讲授经营农业的形式写成的。接着，原来是福冈^②藩士，后来成为农民的宫崎安贞（1623—1697年）为农民写了《农业全书》（十卷）。这部书参考了中国的农书和本草书，并把作者本身

① 加贺：今石川县南部。——译者

② 福冈：今福冈县一带地方。——译者

长期农民生活的体验和游历全国各地的见闻加以系统化，刊行时又加上很多插图，在农民中广为传播。

农业与季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不误农时，就需要正确的历书。日本的历书是早在公元861年平安朝时期采用唐朝的宣明历，一直没有改变而延用到近世的。这种历书很不符合实际情况，不仅对农业，就对生产和交通发达时代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也都带来了重大的障碍。当时以幕术仕于幕府的保井算哲（泷川春海，1639—1715年）精通天文学，他以中国元朝时所作的授时历为基础，根据他自己长期对天体的观察，制造了适合于日本实际情况的新历，1684年（贞享元年）幕府正式采用（贞享历）。这样，日本人首次制作了日本历书。

农民和领主直接的紧张的对立关系，提高了双方对土地丈量 and 有关年贡的数学知识的要求。商业的发达也提高了对计算知识的要求。这种要求，在生产、交通运输的技术、天文历学的发达配合之下，使得日本本身的数学迅速发达起来。1627年，京都的大商人，也以水利技术家闻名的角

仓了以的同族吉田光由（1598—1672年）出版了《尘劫记》，这部书改编了中国明朝末年算术书的一部分，以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这部书作为讲授日用数学的书籍颇为流行。另外，还出版了很多类似的书籍。

此后，出现了在甲府德川家担任“勘定吟味役”^①的关孝和（？——1708年），用使用独创的记号笔算，发现了计算多元方程式的方法，创造了比以往中国传来的使用算术的数学更为高级的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以此为起点，他在现代高等数学的几个领域中都有了许多新发现。关孝和拥有惊人的数学天才，据说在他的发现中有当时世界任何国家的数学家也不知道的公式和算法。继承他的学术的门徒，同关孝和一样也是甲府德川家家臣的建部贤弘（1664—1739年）发现了由关孝和所开端的“圆理”的公式。据说“圆理”具有相当于微分学的因素。

医学方面，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名

^① 勘定吟味役：勘定所（监察机关）的官员，地位仅次于勘定奉行，职务是监察行政。——译者

古屋玄医（1628—1696年）、后藤艮山（1659—1733年）等人提倡“古医法”。他们所依据的全都是中国的医书，但重要的是尊重实际医疗经验和实际观察，对推崇的中国医书也批判地阅读。这里存在着和儒学的古学派对待“圣人之道”相同的方法论的精神。

民族文化的出现

以上在学术方面作了详细叙述，而学术的社会基础也已明显地转移到平民社会。平民出身的学者显著增加。平安朝的“国风文化”是贵族文化，而不是国民文化。与此相反，这时代的文化无论是学术或者艺术，正因为它都是平民的，遂成为真正国民的文化。这是以三都（江户、大阪、京都——译者）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的经济、交通、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作为基础的。

群众中的民族意识的萌芽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例如根据近松门左卫门的剧本编排的木偶净琉璃剧《国姓爷合战》就受到连续上演十七个月的热烈欢迎。戏的梗概是：中国明朝的遗臣亡

命到九州平户，他和日本渔妇生了叫“和藤内”

（和指日本；藤即唐，指中国；即在日本和中国都没有之意）的豪杰，他率领日籍的部下到达中国，为了恢复明朝而大卖力气，发挥了“日本式”的优良品格和“日本人”的坚强勇敢。这是没有沾染封建领主的侵略主义、排外主义，而是具有日本人的自豪感的。

民族文化的传播是与印刷出版的发达相互作用的。十六世纪，从朝鲜和欧洲传来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但在日本国内尚未发展，就遭受锁国的限制，从此盛行的是木版印刷。据公元1671年资料，当时发行的书籍达三千八百七十四部（二万二千一百六十四册），但据二十一年后的资料，则有七千二百零四部（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四册）。起初出版的书籍，以佛教书为最多，占40%，其次是用假名写作的文艺、娱乐书籍，儒、医等学术书籍占20%强。后来，假名书籍占首位，佛教书籍逐渐减少。这些书籍几乎全由民间书店发行，书籍遂成为商品。这是与学者、艺术家成为独立的职业者相关联着的。初期，京都是出版的最大中心，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江户就和京都不

相上下了。

另外，根据群众本身的要求，在这时期也成立了教育子弟的机构——寺子屋（寺小屋）。从中世纪末起，武士和上层农民的子弟在寺院接受以文字为主的初级教育。到了近世，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不限于寺院，就在城市的民间房舍里也有了由浪人、僧侣、神职等人征收学费，教授少年读书写字和计算的情况。京都、大阪地方称呼在这里学习的少年为“寺子”。后来，以教寺子作为职业的人和进行教育的地方，均称为“寺子屋”。这种关西商人社会的用语，首先在大阪通过发达的文学和演剧逐渐推广到全国，压倒了江户的“手迹指南”、“幼儿笔算所”等故弄玄虚的武士式的名称。

文化的两个方向

这样，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从年号来说是以元禄年间为中心，平民的、民族的文化表现出百花争妍的局面，但由于严格的锁国主义，幕藩体制的严重压迫，这种文化的继续全面

发展遭到了阻碍。

这是同这种情况互相联系着的，即作为这种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的町人社会，由于幕藩体制的束缚，作为这种社会基础的工农业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营业、要自由地继续发展是有困难的。

例如，在文学上，井原西鹤对性爱的肯定，发展到通过对于性爱的封建压迫的斗争，来争取人性的全面解放，但只停留在对于性爱的本能的享乐——“好色”上。从这里就容易堕落到颓废。这是和只把这种生活观，即在四十五岁前积累财产，而后以享乐渡其余生作为理想的町人的局限性是一致的。以学术为例，不久，“和算”就只成为用直观的方法解答计算和几何图形的难题的高度用脑的一种娱乐了。这样，在教学与再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产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科学各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之间，不具备相互促进条件的社会里，即使具备有很好的数学才能也不得不堕落到这种地步。

作为封建领主统治人民的理论的儒学，随着领主阶级和人民之间矛盾的激化，只用儒教伦理教化人民方面虽然有所加强，但作为学术的发展

却停顿下来了。

但是，在近代前期形成的知识阶层（无论是出身武士、浪人，还是农民、工商业者）的人数随着时代前进而增加，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或者以改革的，或者以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幕藩体制的各种矛盾的人，于是，在艺术文化方面也多少可以见到一些新的表现出人民性的东西。

十九 封建制度矛盾的激化

——享保、天明时期的政治和社会

“文治政治”——官僚制的萌芽

十七世纪末，幕藩体制的各种矛盾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当时幕府由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即位（1680年）。他撤掉了前代将军家纲时期掌握全权的大老酒井忠清，压制了夸耀谱代^①之功的老中们，重用了在幕府编制中不属执政机关的“侧用人”（将军的侍从）柳泽吉保等。另外，又把原来具有承包管内税款性质的代官改为只征收幕府年贡的官吏，即地方行政官。这里存在着以将军为专制君主的官僚制统治的萌芽，同时，削弱了原来幕府所具有的谱代大名联合政权的性质。

^① 谱代：也写谱第。本来指继承家业的人，平安时期以后，指世代相传，侍奉主家的人。江户时代，指关原之战以前仕于德川氏的大名。——译者

德川纲吉又极力用儒教统治群众思想。公元1682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布告牌，鼓励忠孝，惩罚不忠不孝者。直到现在尚在推行着的、以刑罚的威胁而加以强制的“道德”，这种日本式的“道德教育”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而且，强制的“道德”势必伴随着对思想、言论的压制。公元1684年幕府禁止散布“讽刺当局的小调”和“把形势的变化情况刻成瓦版（印成单页的快报）”。这种新的群众性的宣传工具的印刷品在群众中刚刚出现就遭到了压制。

德川纲吉的“道德”和“仁政”的本质，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在公元1687年施行的《怜愍生类令》^①中。这个法令禁止杀伤动物，尤其要爱护狗，因为德川纲吉是属狗的。即使是杀了野狗，也要被处死刑，把狗赶走的也要坐牢。这是可以和十二世纪白河上皇《禁止杀生令》（上卷第六章第四节）相提并论的暴政的典型。人民骂德川纲吉为“狗将军”。在他死后（1709年）才废除了这项法令，违反这项法令入狱的人才得到释

^① “怜愍生类令”：即爱护生物的法令。——译者

放，人数多达八千八百三十一人。

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利于幕府鼓励“忠义”的事件。公元1701年，赤穗藩^①主浅野长矩因受幕府的高家（掌管仪礼的职务）吉良义央的侮辱，愤怒之下在江户城内用刀刺伤吉良，浅野家就被消灭了^②。第二年（元禄十五年）浅野长矩的家老大石良雄等四十六名旧臣^③，为了洗雪亡主的遗恨，打进吉良邸宅，杀掉吉良义央。幕府嘉奖大石等人为“忠臣”的模范；同时，又以维护幕府法令为名，迫令四十六名武士剖腹自尽。此事既表明鼓励“忠义”，又表明幕府法令的严厉，在这一点上给人们以强烈的印象，从而收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效果。

公元1709年，德川纲吉死去，由甲府德川家的家宣继位。德川家宣宠信的学者新井白石参与机要工作，整顿了幕府的仪礼，采取了“仁政”的措施。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的幕政称为从强

① 赤穗藩：今兵库县赤穗郡一带。——译者

② 德川幕府严禁在江户城内动干戈，浅野长矩违反禁令，幕府乃命浅野剖腹自尽。——译者

③ 一般称为四十七士，但打进吉良家时跑掉了一个。——译者

权政治转化到文治政治的时期。但在整个幕府时代，武士阶级对人民的武力压服的专制本质是丝毫也没有改变的。就在德川家宣和新井白石统治时期，公元1711年，在江户市中的布告牌上宣布：“不准贩卖新刊不法的书籍”、“不准无故结盟、结党”，就这样加强了对学术、思想、出版的新限制和禁止人民结社。

但这些强权专制的统治体制只是逐渐地作为法令和制度而完备起来。以将军为专制君主，在他的下边出现了某种程度不过问门第、门阀的官僚制统治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象新井白石那样浪人出身的学者才能够参加政权中枢。这种倾向出现于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而到称为“强权政治”的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代又得到了进一步地加强。这是在全国性的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发达、百姓町人势力的上升的情况下，封建统治权力相应集中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矛盾的深刻化

德川吉宗是在1716年（享保元年）从纪州德

川家人继德川本家而当将军的^①。当时农民斗争已经强大到可以经常进行全藩范围的起义的程度。1712年加贺大圣寺藩爆发起义时，农民群众逮捕了该藩的巡检使，迫使他承认减免年贡，还捣毁了茶叶批发商、纸张批发商等以及同藩主相勾结、统治农民商品生产的村吏的房屋。在德川吉宗即位的第二年（1717年），广岛藩农民因反对丈量土地进行起义，捣毁村吏的房屋，实现了停止丈量土地，永远降低年贡率的要求。

这类大规模的起义在当时整个日本一年也不过发生一、二起，但这些起义却意味着农民们通过参加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摆脱了孤立分散的生活，作为一个阶级，开始更广泛更强大地联合起来了。在尚未发生起义和暴动的地区也或多或少地经过同样的社会发展的过程。

象关东地方，连这种农民的小商品生产尚未发达的地方也已经渗透了货币经济，高利贷地主同小农及佃户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有

^① 继承将军职位的德川家族，除直系外，还有几支旁系（纪伊、水户等大名）。将军无后嗣，则由旁系家族中最近的亲属继位。——译者

不少人放弃土地，到处流浪。公元1721年，浪人山下幸内向幕府提出的意见书中说，近年来，关东和东北各农村的花名册上销掉的农民就达一百四十万人。据公元1746年的文献，西南的熊本藩，以前有三十户人家的村子减少到十五户，十户的减少到五户，饿殍遍野。

随着放弃土地的农民的增加，集中土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也多起来了。熟悉关东农村情况，又被关东郡代^①重用过的武藏川崎的地主田中邱隅曾在《民间省要》（1721年）一书中写道：“全国土地的95%为出租土地，而地主不直接从事耕种。”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后进地区也以不同于先进地区的途径和形式进行着剧烈的阶级分化，农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这样，就加速了幕藩体制固有的经济基础的瓦解。

如获生徂徠在《政谈》中指出的“全国商人成为一体”，这种商人行会也形成了。自从公元1657年以来，幕府经常禁止商人、手艺人结成

^① 郡代：设在幕府直辖领地，代表领主统治农村的机构。

“仲间”（行会——译者），协商商品的价格和工资，以及任何的“同行的集会”，但毫无效果。公元1694年，幕府承认了从大阪用船运送商品到江户的收货批发商按行业结成的十个“仲间”（十个批发行会组织），并决定从这种行会征收名为冥加金（向幕府表示谢意的税款）的税金。接着，大阪的收货批发商响应十个批发商的呼吁，也按行业结成了二十四“仲间”，向幕府交纳冥加金后，得到了许可。从此，批发商的“仲间”，实际上陆续得到了承认。

享保的改革（一）

——官僚制的扩充和思想统制

在这个时期，三十三岁、正在壮年的纪州^①德川光贞的第三子德川吉宗继任了将军。他原为越前^②鯖江三万石的藩主，接着当上了财政一向极为困难的纪州藩的藩主，有着十几年煞费苦心

① 纪州：全称纪伊，大部分属和歌山县，一部分属三重县。——译者

② 越前：今福井县东北部。——译者

的体验。当时谱代大名的老中等对于从德川纲吉三代以来使用侧用人及浪人出身的学者等门第不高的新参政者行使权力，抱有不满意，德川吉宗就是依靠这派势力推倒了同上一代将军血缘最近的尾张的德川氏而拥立为将军的。所以他重视幕府的组织制度，即重视原来的执政机构中的老中、若年寄^①、三奉行^②，而没有采取依靠亲信的政治。但这也绝不是德川纲吉以前谱代大名联合执行幕政的再版。

德川吉宗把老中等作为辅佐官僚，而自己独揽一切。根据原来的职务分工，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平时政务由老中每月轮流担任。德川吉宗却指定一名老中为“胜手挂^③”，授予财政大权。另外，又把勘定奉行分为公事方（掌管司法）和胜手方（掌管财政），把重点放在胜手方，而且普查全国的代官，予以大批调换和大力整顿各代

① 若年寄：德川时代较老中低一级的执政官。——译者

② 三奉行：寺社奉行（掌管宗教事务）、勘定奉行（管理财政）、町奉行（掌管重要城市的行政和司法）。

③ 胜手挂：也叫“胜手方”，幕府掌管财务和行政的官名。——译者

官所的官员。进一步发展了德川纲吉的改革的方向。此外，还对勘定奉行所的官员和代官等，主要是对实际承担民政方面的官员，规定了适应职务的俸禄，采用人材不问门第，对家禄低于职务的俸禄者，开始实行了任职期补贴其不足部分的“足高”制。在德川吉宗执政末期，还编纂了《公事方御定书》。该书把有关司法、警察事务的法规和刑事、民事的诉讼法、以及刑事案例加以系统化。该书虽是只供司法部门内部参考用的非公开的法典，但从书里也可以看出根据成文法和制度进行审判的官僚制度化的方向（这个法典的诉讼法及刑法部分就是《御定书一百条》）。

幕府在对内部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还对人民的统治和掠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第一是思想统制。

德川吉宗上任不久就下令厉行节约。其中虽包括节约幕府的仪礼费用及其他冗杂的费用，但主要是禁止百姓町人的“奢侈”，把农民用少量金钱购买日用品作为“奢侈”而加以禁止，这是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要把农民关禁在旧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中的政策。接着，公元1721年下令“今后

不仅对服装、各种用具、书籍等，即对各种商品、点心之类，也严格禁止作出新品种到市上出售”。

第二年，幕府又发出五条出版统制令，在出版儒书、佛书、神道书、医书、诗歌书及其他书籍时均禁止“荒谬之言和奇谈怪论等”，并下令禁止出版“色情书刊”及有关“权现样”（指德川家康）、“御当家”（将军家）的书籍等。和第二项有关的，还下令禁止把市井传说和男女情死的内容作为印刷品在街头贩卖，并下令处罚违反者。这对市民文学是一个很大打击。

禁止学术上的创新和解放人性的文学，同时，幕府还致力于民众的“教化”，管理私塾，用幕府的法令等作为教科书，甚至由幕府编订私塾教科书分发各地。

享保的改革（二）

——剥削和统治农民的新方法

只靠节约仪礼费用是不能改善幕府财政的。公元1722年，德川吉宗令各大名每产米一万石要

献一百石（作为补偿，是缩短大名在轮流参觐中居留江户的日期，这个命令一直实行到公元1730年），以此来解救幕府财政危机，同时制订了剥削农民的新制度。即根据土地生产量的情况，以“定免法”、“有毛见法”来代替原来的“检见取”^①。另外，象关西那样商品农业发达的地方，用货币缴纳年贡，为了提高其金额，而改变了换算率。公元1736年，德川吉宗任命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曾宣扬：“农民和芝麻，越压榨越出油”，而德川吉宗的改革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在提高现有耕地的年贡的同时，幕府大力提倡开垦荒地。为此要求城市商人进行投资，并承认开垦田地的所有权，还规定该地的年贡率在一

^① “检见取”是每年由官员检查年景丰歉，以决定增减基本租税额的办法（又称检见法）。“定免法”是以过去几年的平均产量为标准，决定租税额，隔几年再进行修改的办法。这种办法省得每年进行检查，而且不问丰歉，每年均可确保稳定的贡租收入。“有毛见法”是与丈量簿的产额无关，根据每年产量调查，征收一定比率的贡租。这种办法在大量播种早稻、中稻、晚稻等成熟期不同的水稻的地方，由于手续繁杂，无法实行。

定期限内低于已耕的田地。奖励代官^①开垦新田地。幕府允许代官开垦连接在天领^②的大名领地的未开垦地。为此，幕府就牵强附会地说大名领地是规定有年贡额的土地，而未定年贡额的未开垦的土地是幕府领地。

定免法，对于在普通年成也吃不饱的小农来说，由于歉收年头也不能减免年贡，所以是不利的；但对占有大量良田的地主和富农却是有利的，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因为：第一，在规定期间提高了产量，那么按产量规定的年贡率就相对降低。第二，定免法还能保证该土地有一定的余粮，这一点也对地主有利。町人承包开垦新田，也促使町人成为寄生地主。总之，幕府为了适应农村的阶级分化，改变了仅仅维持小自耕农的政策，而开始扶植地主阶级。

这个政策同“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有关。以前幕府的基础是把小农束缚在年贡物资的生产中，限制作物的品种，从而压制商品性农业。但

① 代官：德川时代，将军派往封建领地的官员。——译者

② 天领：又称“御料所”，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译者

享保改革却积极鼓励了种植新的商品作物。尤其有名的是采纳江户町人出身的学者青木昆阳（1698—1769年）的建议，普遍种植了甘薯。在关东地方种植油菜籽和蓖麻也是由此开始的。但种子要由幕府指定的批发商贷给，产品也要由该商人包购，所以，这种办法并不是鼓励生产和营业的自由。另外，在讚岐^①地方开始栽培甘蔗，并有了制糖业，这最初也是由于幕府的奖励发展起来的。

商业性农业促进农民的阶级分化和地主的土地集中。而且，利用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剥削和统治农民的新支柱的政策，实际上是解除了不准买卖土地永为私产^②的禁令。

公元1718年，幕府规定了典当过期十年的土地，无权赎回。1721年还发布了促使典当的土地更容易变为死当（实际是永为私产）的法令。但第二年幕府却突然否认土地的死当，并规定只要交付原价就可以赎回抵押期五年之内的土地。这

① 讚岐：今香川县。——译者

② 江户时代买卖土地，只许有期限的，不准永为私产。
——译者

种法令一公布，在越后^①和出羽^②的幕府直辖领地内，农民不仅起诉要求赎回过期的土地，还以武力要求债权人退还典当的土地。幕府见到这种情况，惊惶失措，就在1723年撤销了禁止土地死当的法令。由于越后和出羽的农民斗争趋向激烈，幕府进行了空前的大镇压，在判处越后几十人和出羽四人死刑之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围绕典当土地的问题上，幕府政策的转变，表现了幕府已经最后地决定了为了压制激化的农民斗争，维持封建秩序，除了必须把地主和高利贷者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再无其他办法。后来，1740年幕府把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和对幕府交纳年贡看成是同等的义务。公元1744年，把处罚买卖土地永为私有的规定变为有名无实，事实上承认了田地买卖。在《民间省要》一书中记载：

“田地不进行自由买卖，才能保证全国的天领和私领的年贡米款不致拖欠”，然而，为了维持封建剥削，社会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土地需要自由买

① 越后：今新潟县（佐渡岛除外）。——译者

② 出羽：现在的山形县和秋田县。——译者

卖的时候了。

在加强剥削的同时，又加强了对农民斗争的镇压。公元1721年2月，幕府首次作为单项的法令，公布了：“所有百姓严禁无故聚众，饮服神水，誓结同党。”接着1734年，幕府吸取上述典当土地引起纠纷的经验，允许在幕府领地如果爆发农民起义时，附近的大名如受代官的求援，就可以不经幕府许可，立即出兵。原来，大名不经幕府许可而出兵，乃是最大的犯罪，但这时幕府已经不得不发出这样法令了。

统制町人和商业，享保改革的意义

享保改革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町人和商业的统制。上述公元1721年公布的禁止制造新式独创的商品，这既是思想政策，同时又是统制商业的政策。闰七月公布该法令后，为了实行这个法令，在同年11月令所有商人、工匠按不同行业组织“仲间”（行会——译者），行会成员互相监督，不许制造新商品，并命令如有从京都和大阪等地向江户运送新商品者，就必须追查其来

源。接着，公元1724年又命令经营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棉织品、皮棉、丝棉、米、酒、酱油、盐、豆酱、木炭、劈柴、生蜡、纸张、油类等的批发商组织行会，制订行会账簿、提交町奉行所（町政府——译者）。幕府通过这种办法统制生活必需品的购销和价格。

强制组织“行会”，并不是允许行会进行排他性的营业垄断，但事实上行会却变为营业垄断。公开得到许可垄断的行会，其成员权叫作“株”^①，这种行会叫“株仲間”。十户批发商、二十四户批发商、十户钱庄等是早就有的代表性的“株仲間”，但后来株仲間一一得到承认，成为幕府统制商业和町人的基本组织。这办法对城市的商业和町人的自由发展起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

从幕府机构的改革，直到这里所讲的统治政策，按年号来说，主要是享保年间进行的，因此称为享保改革。幕府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

^① 株：政府（将军）颁发的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执照。

——译者

阶级分化和农民斗争激烈化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地主阶级和最上层的特权町人，重新组织了剥削和统治一般百姓、町人的体系，并加强了将军的最高君主的地位，如认为尚未规定年贡额的大名领地也是幕府领地等，而向官僚制度方向发展。

严重饥馑、溺嬰和 全藩性的农民斗争

享保改革虽然一时解决了幕府的财政困难，但也是短暂的。到了公元1755年，幕府财政又出现了赤字。农民生产极度疲弊。气候稍有不顺就立即造成歉收。在德川吉宗统治时期的1732年（享保十七年）夏，由于霪雨和蝗虫为灾，以中国^①地方为中心，形成了空前的大灾荒，灾民达二百六十万人。此后，经常发生歉收和饥馑。其中尤以公元1783年（天明三年）浅间山^②的火山

① 中国：指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译者

② 浅间山：跨长野、群马二县，以活火山闻名世界。1783年爆发，和泥石流等一起喷出的熔岩约长五公里，人们称之为“鬼喷火”。——译者

大爆发为起点，连续发生了灾害和歉收。公元1783年奥羽地方出现大荒年，在仙台藩饿死的和染时疫而死的达三十万人；盛冈藩饿死和病死的达七万人，占全人口的20%。甚至出现活人吃死人肉等可怕景象。五十年后的1833—1836年（天保四——七年），奥羽和全国各地发生了比天明年间更为悲惨的大饥馑。在享保、天明、天保三次大饥馑的中间也发生了几次中小饥馑。江户时代二百七十年中，严重歉收一百三十次，而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这已经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在极为严重的封建剥削下农民生活遭受破坏的表现。

农民和下层町人已经无法扶养子女。不用说堕胎，就在生下第二个或第三个以上的孩子时，也要立刻在产床上将其杀死，这叫“间引”（意犹间苗——译者）。这种悲惨的现象，从东北到九州，一直扩大到全国。日本的人口，十七世纪初约为二千万人，估计这时到享保时期的一个半世纪中，增加到三千万人以上，但此后，在幕府体制下的人口并没有很大的增长。

十八世纪中期到天明时期，全藩性的大规模

农民起义和暴动，每年大约发生十起左右。公元1738年奥州^①浅川的农民八万四千人 and 领主的讨伐军进行交战；第二年，但马^②生野的农民和银矿工人的联合队伍与近邻十二个藩的大军作战；公元1754年筑后^③的久留米，二十万农民事先以狩猎野猪为名，借用城内步枪，发动了起义。公元1756年有十六处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

这时期在全国流传着有名的佐仓宗吾的传说。这是在十七世纪中期，下总^④佐仓藩领地公津村的名主宗吾，代表全体农民向将军控诉领主的虐政，要求拯救农民。结果，宗吾夫妇不用说，连其幼儿也被处死刑。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公津村的名主惣五郎是确有其人的。恐怕是以他为主要角色的某些农民斗争的事实，在民间流传时穿插了各地起义的体验，而成为农民英雄壮烈牺牲的故事。

① 奥州：即奥羽，今本州北部地区。——译者

② 但马：今兵库县北部。——译者

③ 筑后：今福冈县南部。——译者

④ 下总：今千叶县北部和茨城县南部。——译者

町人的捣毁活动和农民起义的结合

不仅是农民，城市市民的起义也开始爆发了。在享保大饥馑、米价暴涨时，江户市民要求幕府撤销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并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但未被采纳。公元1733年正月，租房户等下层市民为主的二千人发动起义，捣毁了拥有特权的粮米批发商。这就是近代最早的大规模的市民起义——捣毁活动。公元1768年正月，在大阪爆发了全体市民反对典质房屋必须经由幕府的御用商人所组织的房产转移所登记，交纳手续费，取得其许可的制度的斗争。

在这一年，长冈藩的领地新潟，因町镇的官员在一般市民中执行该藩强制献金（御用金）的命令，而引起了反对，当时正因米价上涨而陷于困境的装运工人等下层市民成为主力，在商人涌井藤四郎带领下爆发了群众起义。奉行所^①甚至使用洋枪进行镇压，但市民们击溃了这场镇压。

^① 奉行所：德川时代幕府设在各处的官厅，处理租税、户籍、诉讼等事宜。——译者

在官员们逃跑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由市民掌握市政的全部政权。尽管时间短，但由市民掌握政权，这是近世城市前所未有的唯一的实例。

町人的斗争所以采取这样激烈的形式，乃是由于临时工、下层工匠、职员、在包销商（问屋制）家庭手工业下的劳动者等，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前身的无产劳动人民，即前期的无产者阶层扩大了，他们成为起义的主力的缘故。在农村也同样广泛地出现了无产者的前身，水吞（雇农——译者），一方面也是无产者的前身。由于他们的极端贫困，反而在土地的束缚中有一定的自由，而具备了移动性；又由于一般农民日益广泛地参加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从而增加了地方利害关系的共同性，于是，一个地方起义立即扩大到其他地区，不分哪个领地的农民都波浪式地扩大起来。

这样，町人的捣毁活动和农民起义就开始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其最初的苗头出现在公元1768到1769年，东从新潟到大阪，经过伊势龟山，西到备中^①、濑户内海的盐饱岛的各地波浪式的起

① 备中：今冈山县西部。——译者

义中。天明大饥馑之后，公元1787年（天明七年）米价暴涨时，以五月的大阪和江户的捣毁活动为最高潮，近畿和东海十几个城市、东北的石卷、九州的熊本和长崎等地连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捣毁起义。特别是在江户，对特权商人、高利贷者的捣毁继续了五天，人们说：“确实和乱世一样”。而且同时在全国农村，不管是幕府领地还是藩国领地，都爆发了大小的起义。

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

到这个时候，整个封建制度体制的危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根本否定幕藩体制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个人就是安藤昌益。

安藤昌益也称确龙堂良中，公元1707年（宝永四年）生于江户武士的人家，虚岁十三岁时到八户藩留居江户的藩医户田作庵家为养子，不久（十七岁以前）又回到原来的武士家里。此后有许多的经历不甚清楚，但从公元1744年到1750年确在八户当过町医，而且曾一度住在秋田。通过

他的著作可以知道他对北海道挨奴人的原始社会有所了解，还去过长崎，因而也熟悉荷兰的社会和政治。他的歿年不详。他的不朽的主要著作《自然真营道》（稿本一百卷、九十二册，另有大序一册）是在1755年或在此后不久的时期写作的，后来又写了上述著作的概要《统道真传》五卷。

安藤昌益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说就是主张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他认为，在人类的“自然世界”里，所有的人原本都是亲手耕织，解决衣食，在那里没有任何剥削，也没有争夺领土的战争，也没有身分的高低贵贱和男女不平等。但是“圣人”“君子”一出现，就盗窃了“自然的天下”，任意圈划地界据为领国，充任君主，统率朝臣，自己不劳动，形成为剥削“众人耕种”的“王法之世”。从此制造了士农工商等身分和男女的不平等。佛教、儒教、神道也是为维护君主剥削和统治、欺骗人民而制造出来的。社会上也发生了争夺领地的战争，也有了盗贼和杀人的罪犯。因此，现在必须废除王法之世，回到自然世界。这样就不会由天皇、将军和

大名分割占领日本国土，实现“万众同一”的平等的人民的统一的日本，永无饥馑和战乱，而成为“安居乐业之国土”。

变革体制的运动的征兆—— 宝历·明和事件

这种思想不外是表现了革命农民对彻底的土地革命和共和制的革命愿望。当时的日本，农民和町人的斗争虽然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封建体制，但是，能够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使这些斗争飞跃到政治革命的这样的阶级，以及为发展这样的阶级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只是在萌芽状态。因此，安藤昌益的彻底革命的思想不得不变为对理想社会的空想。而且，由于他的思想是彻底革命的，所以，这部书无法公开出版，他的思想只为少数门生所了解。

在这时代，虽然不能要求出现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和运动，但群众奋不顾身的斗争的发展，产生了知识阶层反对幕府的运动。“宝历·明和事件”就是这种表现。

生在越后医生家里的神道家竹内式部，站在反幕府的立场，向天皇的朝臣们讲授天皇的政治任务，公元1758年（宝历八年）受到幕府的惩罚（宝历事件）。接着，和竹内式部有交往的甲府医生出身的山县大貳和志同道合的浪人藤井右门等，希望建立以天皇为首的统一的日本，实现限制封建领主的掠夺和特权商人、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的政治。山县大貳在他的公开书籍《柳子新论》中写道，在民众的反抗高涨的现在，如果英雄呼吁正义，发动群众，那么打倒幕府就象暴风雨刮倒大树一样地容易。他是否有这种行动计划是不清楚的。公元1767年（明和四年）山县大貳和藤井右门被处死刑，竹内式部也被认为与此事件有关而流放到八丈岛，途中死去（明和事件）。后来，有关勤王倒幕运动的、变革体制的思想，开始出现在历史的水平线上。

二十 变革幕藩体制的 诸因素的发展

——革命和改革的预言、近代的前兆

田沼意次的政治和宽政的改革

在德川吉宗死后(1751年)，幕府连续出现了两代生理上有缺陷的昏庸的将军。在此期间，侧用人^①田沼意次逐渐掌握实权，公元1772年当上了老中。田沼依靠江户和大阪豪商的出资，在下总的手贺沼和印旛沼着手排水，开垦土地（失败），还陆续批准新的特权行会，向其征收税款，

^① 侧用人：江户幕府的官名，平时在将军身旁，向老中传达将军的命令，地位仅次于老中。后来侧用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并组织御用商人的“座”和“会所”^①，让他们垄断铜、铁、明矾、石灰、硫黄等矿产以及人参等药材的开采和买卖，从中征收税款等。田沼意次专和商业资本勾结，以增加幕府的收入。他还企图由幕府垄断向清朝出口海带、干鲍鱼等的捕捞和输出权，并在北海道和沙俄进行贸易，企图用这种收益开发北海道。

这些政策必然引起不能成为御用商人的一般商人及生产者的激烈的反对。而且，这期间幕府官员公开接受商人贿赂。对此，田沼却虚伪地说，赠送仅次于生命的贵重的金银，乃是深厚的“忠义”标志。为此，田沼意次遭到幕府内外的责难。不久发生了天明的大饥馑，爆发了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起义，群众的怨恨集中到田沼身上。公元1786年，在包庇他的将军德川家治濒死时，田沼就被赶下台了。

此后，在年青的新将军德川家齐时代，以松平定信为中心，实行了老中的协议政治。根据

^① 会所：江户时代行会的办事处，米谷和金银等的交易所。——译者

当时的年号，把这种新制度称为“宽政改革”。这种改革和田沼意次的政策恰恰相反，尽量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具体来说，就是整顿特权行会，限制种植商品作物，禁止农民离开乡村等。宽政改革的另一方面则和以往相同，提倡节约、整顿风纪，以及加强文化、学术、思想的统制。当时朱子学成为“正学”，而视其他儒学派为异端，禁止在幕府学问所里讲授。

宽政时期，在幕府史上开始出现了针对早期的无产者的对策。其一，是在江户设立“人足寄场”^①，把轻罪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集中到一处，进行木工、泥瓦工等职业训练（1790年）。其二，如上所述，禁止农民离村的同时，还企图让已经来到江户的农民返回农村（公元1790—1793年）。其三，下令取缔各种工匠、搬运工人、商店店员等向雇主提出工资和待遇的要求、

^① 人足寄场：1790年江户幕府实行宽政改革时，在江户石川岛设立的流浪者收容所。主要收容流浪者和刑满无家可归的，让他们从事木工等劳动，并给予工资。——译者

任意停工和另谋职业（1797年在大阪，1799年在京都实行）。用现代的观点来说，就是早期的无产者已经成长到需要制订禁止劳资纠纷的法令的地步了。

在天明、宽政时期，有几个藩也实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和幕府的享保改革以及田沼政策是大同小异的，即各藩直接或通过御用商人对该藩的土特产的交易进行垄断，从中牟利；利用豪商、豪农来开垦土地；实际上是承认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加强这一阶层和该藩权力的结合，从而重新安排对农民的掠夺和统治；还强制执行目的在于统制财政和统制思想的“节约”。任何藩的藩政改革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工场手工业的发生

到了这个时代，无论幕府、还是各藩企图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徒劳的。关于江户和大阪城下町的商人，则将他们的上层，组成为特权行会进行统治，这样，领主和商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利益。但到了田沼时代，在这种统治范围

以外的在乡商人和农村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例如：公元1781年，田沼政权在武藏^①和上野两国设立丝织品和丝棉的“贯目改所”^②，对此，两国的“百姓制造者”都一致反对，终于废止了这种机构。如前所述，在十八世纪后期反对土佐藩统制纸张的生产和贩卖，曾发生过两次起义，都取得了胜利（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对于土特产规定专卖或者类似专卖的商业统制的藩，超过五十个。但都因生产者和在乡商人的强烈反对而不能继续统制下去。此外，又如公元1823年，摄津^③和河内两个藩一千零七个村的棉农和在乡商人团结起来，反对大阪棉业批发行会垄断棉花的收购，取得了买卖的自由。

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出现从单纯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新萌芽。第一就是在丝织品、

① 武藏：今东京的大部分和埼玉、神奈川两县的一部分。——译者

② 贯目改所：江户幕府为了检查物资的流动量，在批发商地区设立的机构。——译者

③ 摄津：今大阪府西北部和兵库县东南部。——译者

棉织品、蓝染料、纸张、蜡烛、酒类、砂糖、铁制器具、陶器等基本产业部门出现了不是以往那样手工工匠独立自营、或者从批发商那里先领回原料，使用个人的工具，在自己家内生产，而是许多劳动者集中到资本家的作坊里，工具和原料都是资本家的，生产之后领得工资的方式。十九世纪，到处出现一种产品的操作过程划分几部分，用分工进行生产的形式——工场手工业制。

国民市场的萌芽和走私贸易

第二是全国各地的生产出现了相互连接和依赖的关系，即国民市场的萌芽。例如，在丝织业方面，由于有了养蚕、缫丝和纺织三项工序的地域分工，于是不仅出现了相互依存，而且在关东^①地方连桑叶也大量商品化了。在丝织品方

^① 关东：日本古代指逢坂关（今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的地方；后来指箱根关（今神奈川县足柄下郡箱根町地方）以东的地方，即现在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群马县、栃木县、茨城县、千叶县等地。——译者

面，奥羽的仙台、米泽、川俣、福岛，关东的桐生、足利、伊势崎、结城、八王子、郡内（甲斐），越后北部的各地，近畿的丹后等地以及近江的长滨，九州的筑前、博多等地都出产了著名的丝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周围，不仅发展了缫丝工业，而且陆奥的伊达、信夫两郡已成为全国向西阵等地供应蚕丝的中心地。接着，上州^①和信州^②的蚕丝业发展起来。国民日常最需要的衣料棉布是以近畿地方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进行生产的。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半个世纪之间，在大阪市场出现了上市的皮棉增加四十一倍，白棉布增加七倍，子棉增加五倍这样发展的情况。这些生产广泛出现了种植棉花、轧棉花、弹棉花、纺纱、织布各工序的地域分工，即成为相互连接、依存的关系。另外，丝绸业、棉布业与染色业结合起来，从而和蓝靛、红花等染料生产之间的相互连接、依存的关系也发展了。商品经济的主要动力已经

① 上州：全称为上野，今群馬县地方。——译者

② 信州：全称为信浓，也称科野、信乃、信农，今長野县。——译者

不在于年贡的商品化和领主、武士的消费，而在于农、工、商人民的全国性分工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即国民市场的萌芽。

第三，出现了海外贸易的要求。田沼政权企图和沙俄船只在北海道进行官办贸易（前已叙述），但民间商人已经和沙俄船只进行了走私贸易。生于淡路^①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1769—1827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和南千岛的渔场，还把本州的产品运到北海道，发了大财。他可能也是走私商人。比高田屋嘉兵卫稍晚些，加贺的钱号五兵卫（1773—1852年）也依靠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商业和海运而发了财，他也在北海道和库页岛进行了走私贸易。尽管走私贸易数额不大，又要在寒风凛冽的北海，在怒涛浓雾的海上冒犯着幕府的禁令和外国船进行交易。但这种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重新出现在日本商人之中，乃是锁国政策从内部遭受破坏的征兆。另外，在九州南部的海上，好像也和中国船只进行了走私贸易。

^① 淡路：今兵库县的一部分。——译者

工场手工业、国民市场的萌芽、走私贸易，这些都是有内在联系的反封建的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这里开始形成了瓦解将军和大名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艺术和学术停滞和新的风气

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同经济基础一样，不同于以武士和城市特权町人为基础的文化的停滞和颓废，主要在地方成长了与幕藩体制不相容的新因素。从十八世纪后期起，京都和大阪町人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同时，文化艺术的中心也转移到江户。大众读物的印刷出版日益增多，已有出租书籍的店铺开始营业。小说和有趣味的作品的大众化，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作品。于是也有了象小说家泷泽马琴（1767—1848年）那样能够专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人。不过从艺术价值来说，没有值得一提的。戏剧方面，在十八世纪末创造出转台和花道^①等日本独特的优秀的剧场构造，有了

^① 花道：日本旧剧由舞台旁侧通向观众席的道路，演员上、下场都须经过，构成舞台的一部分。——译者

能够建成复杂的舞台之类的进步技术，但却没有出现能够赶上前代近松门左卫门那样的戏曲家。在关西^①方面，继近松之后出现了竹田出云（1691—1756年），他写出了《假名手本忠臣藏》等剧本，这些剧本至今还经常演出。江户剧坛的代表作家第四代鹤屋南北（1775—1829年）把町人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在舞台上。竹田出云的作品以武士道德为基调，而第四代鹤屋南北却带有浓厚的颓废色彩。

在近世后期的文学界，艺术性较高的可以举出京都上田秋成（1734—1809年）的传奇小说集《雨月物语》、大阪近郊与谢芜村（1716—1783年）的富有绘画性描述的优秀俳句、信州农民小林一茶（1763—1827年）的充满人类爱的俳句等。

美术界不同于文艺界，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浮世绘版画已经可以随意画出各种颜色的作

^① 关西：日本古代指逢坂关以西的地方；后来指足柄、碓冰两关（均在今神奈川县）以东的地方；现在为京都、大阪一带地方的总称。——译者

品，出现了不少的名人，如美人画的喜多川歌麿（1753—1806年）、风景画的葛饰北斋（1760—1849年）和安藤广重（1797—1858年）等人达到了版画美术的高峰。和江户的庶民风格的版画相对照，在关西方面，池大雅（1723—1776年）创造了富有理性的“文人画”，而圆山应举（1733—1795年）开始了写生画。十九世纪前期在江户生活的渡边华山（1793—1841年）继承了以上几派的画风，创造了独特的绘画。他特别专长于肖像画。

在学术领域里，停滞颓废的一派和革新创造的一派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享保以后，儒教毫无进步，儒学家变成“道学先生”，经常成为町人文艺的笑料。十八世纪中期，京都的商人石田梅岩（1685—1744年）以儒教伦理为基础，提倡讲解町人修养的“心学”，虽一度行时，但进入十九世纪后，就衰落下去了。

但在另一方面，彻底站在商人资本立场上的海保青陵（1755—1817年）却主张，在不依靠商业就无法生活的现实社会里，儒学只不过是空论，君臣关系也只是“忠义”的买卖契约而已。

大阪的町人山片蟠桃（1748—1821年）全面否定不合理的、超自然的东西，主张唯物世界观，出现了这类町人式的新思想。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生在丰后^①农村，在那里渡过一生的三浦梅园（1723—1789年）创造了近代以前的日本最高的唯物论哲学。三浦梅园追求“道（学问）以安民为重”的、为人民的学问，他的主要著作《玄语》、《赘语》和儒教、佛教完全不同，追求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的法则（条理）。

国学和兰学

在这个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学术的两大潮流即国学和兰学得到了发展。国学以契冲（1640—1701年，僧侣，日本古典研究家。——译者）为开端，经过远江^②农村的神官贺茂真渊（1697—1769年），到伊势松阪棉布批发商的儿子、町镇医生的本居宣长（1730—1801年）时才集其大成。本居宣

① 丰后：今大分县的大部分。——译者

② 远江：今静冈县西部地方。——译者

长的《古事记传》是对《古事记》的古今无比的、具有创造性的、周密的文献的研究。本居宣长通过古典文献的研究，想探求儒教和佛教传来以前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里，儒教和佛教就意味着代表封建的道德和人生观。总之，他排斥儒教和佛教，目的在于从封建的压迫中解放人性。

在国学中，甚至连本居宣长也把他们所讲解的古代日本文化作为“古道”而加以固定化，从而具有排斥外国文化的倾向。这到本居宣长的后一代平田笃胤（1776—1843年）时到达了极点，已经不是学术，而成了彻底的天皇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半宗教性质的政治思想。平田派的国学，后来成为攘夷倒幕运动的思想支柱之一。

据可查的本居宣长的四百六十四名门徒中，有町人一百六十六人，农民一百一十四人，妇女二十二人，其他为神官、武士、医师。从这里可以知道本居宣长的学术的社会基础是町人和上层农民。而平田笃胤的门徒，上层农民和神官却占绝对的多数。

兰学是荷兰语和通过荷兰语来研究西方的自然科学、医学、军事学、世界地理、历史以及其

他各门科学的学问。兰学，在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出身于江户的商人青木昆阳再三请求幕府，并最早得到许可学习荷兰语。他的门徒，丰前^①中津的藩医前野良泽和若狭^②小滨的藩医杉田玄白两人亲眼看到死刑犯的尸体解剖后，惊叹荷兰解剖学书刊上所载图片的正确，于是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翻译这本书。后来，幕府的专职医师桂川甫周等有志之士也参加了，经过四年的辛勤努力，在公元1774年完成译稿，命名为《解体新书》。后来，杉田玄白所著的《兰学事始》一书中以激动的心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苦心和对学术研究的积极态度。

后来荷兰语的文法书和辞典逐渐出现，于是兰学迅速得到了推广。这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市民社会已从中国学习了医学、博物学、数学、天文学等，开始要主动地从事自己的创造。而在哲学上，明确区别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认识在逐渐加深，已经形成了接受近代科

① 丰前：今福冈县东部和大分县北部地方。——译者

② 若狭：今福井县西南部。——译者

学方法的基础。例如，医学方面，后藤艮山的门徒山胁东洋以实际观察为基础，在公元1759年写出日本最初的解剖学《脏志》。这表明日本人已经独立地从思辨医学走向实践医学的道路。山胁东洋的友人吉益东洞也提倡“亲自尝试，实际体验”。其门徒，纪州的华冈青洲（1760—1835年）提倡西医和传统医学相结合，他从传统医学在骨折治疗中用祖传秘方使用麻醉药剂，得到启发，创造了全身麻醉，这一创造先于欧美医学界，在公元1805年，使用这种麻醉，成功地进行了乳腺癌手术。

在日本形成近代科学成长的过程中，居住在长崎荷兰商馆^①的医师瑞典人图恩贝格（C·P·Thunberg）和德国人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等优秀学者，他们指导日本人，在推广兰学上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西博尔德在公元1823年到长崎上任后，得到了设在长崎郊外鸣泷

^① 荷兰商馆：荷兰东印度公司设在日本平户和长崎的分支机构，一手包办日本和西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成立于1609年，到1858年商馆结束，改设总领事馆。——译者

的、面向市民的医疗所的特别许可，以此处为据点，向来自日本各地的优秀青年讲授医学和化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各门科学。

“西力东渐”和勘探千岛、库页岛

十七世纪中期，在西欧英国，市民革命成功，到十八世纪后期，在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同一时期，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而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76年）。公元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接着出现拿破仑一世的帝制，席卷了欧洲，拿破仑后来没落，但法国作为近代国家的地位却没有动摇，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接着，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得到发展。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大量吸收西欧文明。而且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把势力扩张到亚洲了的英国和法国，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强大，把整个印度变为其殖民地，进而从缅甸扩张到中国。北方俄国人不停步地从西伯利亚向东扩张，十八世纪末，到达白令海峡，从此南下，进出到北库页岛和北千岛，并侵犯了中国

的西北边境。不久，这些国家向东向南扩张势力，即所谓西力东渐，也逐渐地逼近锁国主义的日本。

处在锁国状态下的日本人民无法充分了解世界的这种动态。但尽管如此，有些知识分子通过兰学逐渐加深了对世界问题的关心。尤其是俄国人开始从库页岛和千岛出没在北海道沿岸一事，不仅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连幕府也不得不考虑其对策。公元1791年，出羽农民出身的最上德内奉幕府命令，首次勘探千岛，到达得抚岛；1792年幕府官员近藤重藏到千岛进行勘探，在择捉岛拔掉俄国树立的十字架，建立了“大日本惠土吕府”的柱标，表示此地是日本领土。另外，当时日本渔民已经到过南库页岛开辟渔场。公元1809年，幕府官员间宫林藏勘探了北库页岛对岸，发现库页岛并不象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与西伯利亚大陆相连接，而是由海峡隔开的岛屿。他所发现的海峡在西博尔德关于日本的自然和社会的巨著《日本》一书中，以“间宫海峡”^①的名称介绍到世界。

^① 间宫海峡：我国地图写作鞆鞆海峡。——译者

勘探、地理测量方面的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下总佐原造酒手工业资本家伊能忠敬在江户开设商店，进行全国性交易，晚年努力研究地理测量学。公元1821年，他根据正确的实际测量，完成了从北海道南部到九州的全日本的地形图。日本人首次对于日本的国土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林子平、本田利明、佐藤信渊 的绝对主义的变革思想

人们加深对日本国土的关心，同时也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仙台藩的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在最上德内勘探千岛的同一年，自费出版了《海国兵谈》。他极力主张要超出幕府和各藩的范围，而进行日本整体的防御，他特别提出首都江户的所在地江户湾的防御和建设海军为当务之急。

他在这本书里表现出深刻的历史预见性，说：“天地之间，人世之事必有变革，此乃一定之道理也，决不能认为万世永恒如今日。”又说：西洋各国“因有妙法，治理国家，和睦亲善，

决无内战，此乃日本和中国企望莫及之事也。”他已经理解到由于西欧各国成为国民国家，而得到统一，从而没有封建领主的分裂割据和国家统一的优越性。从这种预见和理解出发，他在概述日本周围的“三国”（朝鲜、虾夷、琉球）一书《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中，向全国人民提出民族问题，他呼吁说：“要不分贵贱，不分文武”，所有“国民”都不要从幕府和各藩的立场出发，而要真正作为日本人整体来进行日本防御。

和林子平同时期，有越后村上的本田利明（1744—1821年），他熟悉数学、天文学、航海学，又参加过北海道通商。他在《经世秘策》、《西域物语》（1789年）等著作中描述过天明大饥馑和扼杀婴儿等群众的疾苦，批判了幕府的压榨。他主张停止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要在一个君主之下统一日本，不按等级身分制起用人材，担任国事。由国家管理全国的商业，进行海外贸易，开垦北海道、千岛、库页岛，并向堪察加进行扩张和从事开发矿山，这是当务之急。钱屋五兵卫可能受到本田利明或其门徒的影响。

最彻底地发展了本田利明这样主张的是下一代的佐藤信渊（1769—1850年）。佐藤信渊生于秋田，从少年时期就走遍各藩，其间，依靠独立的见解掌握了农学、矿山学、地理学、历史学、军事学等各种科学，完成了包括兰学者在内的当时一流学者的业绩。在他晚年的《垂统秘录》、《复古法》等著作中，幻想：完全废除诸侯的割据和士农工商、贱民的等级身分制，把全日本统一在一个君主之下，把一切土地和生产运输手段收为国有，生产和商业归为国营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除君主外，所有的日本人，都要平等同权地、从事八种产业的一种。这个社会有幼儿保育园直到大学的各级学校，有才能的均可入学受免费教育，一切官吏都从大学毕业生中录取。这是“凡人皆为天地之子”这种人类平等的思想。

林子平、本田利明、佐藤信渊等人的主张不同于安藤昌益的农民式彻底民主平等的统一日本的思想，而是有绝对主义国家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们都表现出：要求变革幕藩体制、建立统一国家、撤销锁国主义的明确的思潮。在国学中也有要把幕藩体制改革成为统一国家的思想，山

县大貳所向往的也是这个方向。他们多数出身于上层农民或町人，即使出身于武士，也生活在农工商民众之中。虽有时以技术顾问的形式仕于领主，但他们本来只依靠封建俸禄过生活，而是处在领主和劳动群众中间阶层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者。他们理解群众疾苦，同情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他们是群众的朋友。

坚决驱逐令

不论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改革幕藩体制的各种因素也都成长了。世界的形势也不许日本维持锁国状态。然而封建统治者恰如掩耳盗铃一样，一味地压迫群众和先觉者。松平定信虽对荷兰文的日译书也有一定的认识，又具有能够写出“将来威胁日本（幕府）的是蛮夷和百姓起义”的见解，而且又能考虑江户湾对外设防。然而连这样的人一旦听到林子平不对幕府，而对国民大众呼吁日本的国防时，却把林子平判处无期徒刑，并于公元1792年没收了《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的已刊部分和刻版。松平定信等人极端害

怕人民热爱祖国、关心国事。而受处罚的林子平却泰然自若，他说，我“无父母，无妻子，无儿女，无木刻版也无金钱，也无想死之念”，因而自称为六无斋。

这一年，俄国政府使节拉克斯曼（A·Laxmann）把在前年（1782年）漂流到堪察加的伊势的船夫幸太夫（光太夫）等人送到北海道的根室，并要求幕府通商。幕府官员声称外交交涉只在长崎办理，而把他们驱逐回去。接着，公元1804年，俄国再一次派出使节列查诺夫（Rezanov）到达长崎，要求通商，幕府以锁国主义的“祖法”（祖先累代的大法）为理由，冷淡地斥退了他们^①。

公元1808年，在欧洲发生的英国和荷兰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意外的影响。这就是英国军舰芙顿号到长崎袭击了出岛的荷兰商馆。此后，在

^① 当时列查诺夫又送回日本漂流者津太夫（石卷的渔民）。津太夫等人是在1793年漂流到堪察加，由俄国人救助后，在西伯利亚逗留了七年，1803年被带到彼得格勒，第二年由列查诺夫带领航行波罗的海、大西洋、印度洋而后回到日本。仙台藩的兰学者大槻磐把他们的经验和见闻，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写成《环海异闻》（1807年）。这对提高日本人对世界的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近海出没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船及捕鲸船逐渐增多，有时为寻找燃料淡水而登陆，就在那里引起大的混乱。

幕府面临这种情况，他们只想如何巩固锁国主义。公元1825年，下令全体大名，如果发现外国船，即使是要要求补给燃料淡水的，也要毫不犹豫地予以驱逐（坚决驱逐令）。四年后的1829年，在西博尔德回国之际，幕府掌管天文的官员高桥景保为得到西博尔德所持有的《拿破仑战记》而用伊能忠敬绘制的日本地图和间宫林藏的《库页岛勘探记》的抄本，同他交换。这件事被幕府发觉了。幕府认为高桥景保是卖国贼，判处死刑，并逮捕其全家和门徒等许多兰学者。这事件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而是幕府借此机会企图搞垮除幕府御用的特定学者外的兰学者而进行的政治性镇压。

大盐的暴动和改造社会的起义

松平定信认为，和蛮夷一样，作为幕藩体制的两大敌人而可怕的另一支力量，是以农民起义

为代表的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这种斗争自从天明时期的高潮以后，起义次数虽一度减少，但它对统治者的压力却进一步有所增加。幕臣植崎九八郎在对幕府的上书（1802年）中说：“近年来，在南部家（陆奥）、藤堂家（伊势）、仙台继续发生群众起义，后又发生榭原家（越后）的暴动。都不在小家发生，在大家往往到处发生暴动。而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一定是多半想搞暴动的。在一处发生的暴动，不仅在当地，而且互相呼应。因此是极应注意的事情。”还有幕府的儒官柴野栗山引用古典说：“君是船，民是水，水能浮船，也能翻船”，群众推翻君主的斗争已到了蔚然成风的阶段。

而将军德川家齐沉迷奢侈淫荡，在其一生中，有四十个妻妾，生下五十五个孩子。各大名也仿效他，萎靡颓废笼罩着统治阶级，其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公元1833年（天保四年），奥羽地方又发生了大歉收、大饥馑，第二年（1834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灾荒。人民遭受这次灾荒的袭击，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在1836年，奥羽地方又发生了比

天明时期更加悲惨的大饥馑。在这期间，各地的农民起义超过天明时期，公元1836年发生的起义，在全国就达二十六起，其中如甲州和三河^①等地的大暴动，使得幕府的重要军事据点地区的秩序一度陷于瘫痪。第二年（1837年）二月，原来大阪町奉行所的与力（仅次于奉行的警察指挥官）大盐平八郎为了拯救由于米价暴涨和官吏无能，痛苦于官吏和特权商人互相勾结压榨之下的无产市民而发动了武装起义。大盐与其门徒和近郊的农民以及下层群众大约三百人捣毁了鸿池家和其他特权商人的住宅，并和奉行指挥的军队展开了战斗。这次战火烧掉了十分之四的大阪市街。

大盐丝毫也没有想要打倒幕府，他追求“一切遵照神武天皇的政道，实行宽宏大量”的政治改革，并向市内外的群众呼吁“直到村落的‘小前’^②均为天赐的”。把贫农也视为“天赐的”人，这超越了封建等级制的思想。首先参加这一

① 三河：今爱知县东部。——译者

② 小前：也称小前百姓，泛指自耕农，有时也指贫农。
——译者

起义的是当时被视为贱民的近郊皮革劳动者。进行改革的领导者和群众斗争相结合，要以武力实现变革，这开始初步进入了在性质上比以往的起义、捣毁活动更高的阶段。

起义部队，经过几个小时被镇压下去了。逃往河内农村的大盐平八郎潜伏了一个月后也被发现而自杀。但这次暴动鼓舞了民众，而对幕府各藩的威胁是极大的。大阪的民众，甚至连被战火烧掉住房的也不憎恨大盐，反而把他当作神仙看待。另一方面，水户藩主、居于副将军地位的德川齐昭等人甚至到了第二年，还担心大盐是否仍在何处活着，并在组织叛乱。

大阪是天下的厨房，四通八达，暴动事件立刻波及全国。在大盐暴动的直接影响下，四月，备后^①的三原发生了以盐田劳动者为主力的暴动；接着长州藩的濑户内海沿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起义；6月，越后柏崎地方，上州出身的国学者生田万自称是大盐的门徒，袭击了幕府的“阵屋”^②。

① 备后：今广岛县地方。——译者

② 阵屋：日本古代指军营；这时指当地官员的住宅。

尤其重要的是7月摄津能势郡的山田屋大助领导的起义。他散发传单，呼吁民众说：“要求天皇命令领主，把一国一郡的米谷均分给万民，实行德政。”并同几个村的百姓一起袭击了富豪。民众是这样地理解了大盐的号召：“遵照神武天皇的政道”来办事。在这里开始出现了和以往许多次农民起义不同的、要求减轻年贡以及其他负担的、称为“治世”、“均世”（改革幕藩体制——译者）的土地革命斗争的萌芽。

蛮社之狱和兰学的衰萎

到了此时，幕府当局以极大的决心着手改革体制。第一步是称为“蛮社(蛮学社之略)之狱”、即对民间进步兰学者的大镇压。当时奥州水泽町町医出身、西博尔德的优秀门徒高野长英同三河的田原藩的家老、以画家而著名的渡边崋山一起，为寻求挽救群众苦于饥馑的科学技术，为了研究世界形势，组织了“尚齿会”（敬老会），但公元1839年，幕府诬陷高野长英和渡边崋山企图渡航无人岛（小笠原岛），进行走私贸易。以此为

借口，将他们逮捕，并搜查其家宅，没收了批判幕府捣毁外国船只的高野长英的《梦物语》和渡边崋山的《慎机论》。以非难幕府的罪名进行陷害，判处崋山禁闭和长英的无期徒刑。渡边崋山一面期待着形势发生变化，却又自杀身死；长英趁监狱失火之机而逃走，潜伏各处，为日本人民的幸福，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公元1850年在江户的青山被刑警包围，也自杀死去。

蛮社之狱严重地打击了兰学。兰学只有在医学、博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对保护生命和提高生产力方面直接有用的技术或者成为其基础科学的范围内，能够得到统治者的容许。但是，当兰学发展到探究世界地理、西洋的历史和社会，从而对封建日本的批判的认识和变革的思想产生萌芽时，就立即遭受了蛮社之狱的摧残。此后兰学主要是集中用为统治者吸取西洋军事技术，连医学也停滞了（开国后的情况有所变化，开国后，兰学消失了，发展为以英、法语为中心的洋学，也开始学习社会科学）。

天保的改革

蛮社之狱的第二年（1840年），在东亚历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事件。即英国在中国的广东违反清朝禁止鸦片贸易的法令，以“保护通商自由”为借口，向清朝挑起了战争（鸦片战争）。战胜的英国在公元1842年强制清朝签订了《南京条约》，割据香港，迫使开放广州和上海等五港为通商口岸，获取了治外法权、关税议定权，享受单方面最惠国待遇的权利。西欧列强从此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社会。

鸦片战争，对幕府来说，也是使它感到唇亡齿寒的冲击。狼狈不堪的幕府下令撤销了“坚决驱逐令”，并命令对于要求补给燃料淡水的外国船只要给予解决。然而幕府并没有从邻国的重大事件中吸取应以进步的改革来加强国力的教训，他们反而一味地致力于镇压人民和加强幕府的权力。于是由老中水野忠邦进行了公元1841—1843年（天保十二——十四年）的“天保改革”。改革要点：第一是加强对兰学的镇压，和以往一

样进行强制“节约”，严禁结党等，重新加强一系列对人民的镇压。第二是压制商业和农村手工业，加强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对“主人”的隶属，迫使流入城市谋职的农民回乡等一系列地加强自然经济和压迫早期无产者的措施。第三，解散行会，并从町人攫取巨额款项。第四，减免大名和旗本对幕府的负债。第五，把江户和大阪周围十日里^①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从而巩固幕府权力的领地性的基础。

在以上各项改革中，解散行会，看起来好像是进步的，从结果来看，它具有促进在乡商人和农村工业发展的效果，但幕府的企图不在于扩大自由营业，而在于剥夺大町人的特权，削弱其力量。在这里丝毫也没有企图适应新时代，而向前看的因素。这当然可能取得成功。但它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在江户和大阪周围有大批收入的大名和旗本的领地被剥夺了，他们也强烈反抗，因此这项改革完全失败。

在各藩的改革中，基本上同幕府一样，如只

① 日里：一日里为3.924公里。

知加强封建的反动政策的水户藩等失败了，而在长州、肥前、萨摩等藩却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功。

长州藩由于公元1831年（天保二年）全藩性的大起义和捣毁活动以及公元1837年在大盐暴动影响下所发生的起义和捣毁等压力下，在藩士之间出现了对掌握着藩国权力的腐败无能的门阀进行了攻击，和农村地主、商人勾结起来的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得到了发展。从公元1838年开始的改革，是牺牲城下的特权商人，保护下级武士，把农乡地主、商人划为藩国权力的支柱，并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加强了以下关为据点的藩营商业和海运活动。在改善农村秩序和藩国财政方面，大体上得到成功。

在萨摩藩，撕毁了向大阪商人借债的证据，并打倒他们，还假惺惺地迫使负责此事的家老进行剖腹，来作掩饰。同时彻底地掠夺琉球和萨南诸岛生产砂糖的农民，并在琉球，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来改善藩国财政，基本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军事技术方面，特别是海军方面，采取了近代技术。萨摩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上交通的，所以不得不重视海军。

在肥前藩，由于受大盐暴动和自己领地以及邻藩唐津藩^①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开始着手改革，制止了寄生地主和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了藩国直接剥削小农的体制。另一方面与长崎和兵库的商人相勾结，加强了藩国的商业活动。在承担长崎警备责任的藩国制造洋枪，并在海军方面首先采纳了近代技术。

以上三个藩的共同点是，中级、下级的武士以及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掌握财政和军事的实际业务能力，作为官僚，参与藩政，他们尽量使得藩国在财政适应经济的情况下，重新策划了对农民的统治和掠夺。他们的改革理论，同林子平、本田利明以及佐藤信渊等人的理论或多或少具有共同的倾向。

① 唐津藩：今佐贺县东、西松浦郡一带地方。

二十一 开 国

——封建制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对立

天保改革失败后，幕府的危机日益加深。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在性质上和过去的派阀势力斗争不同的分裂和对立。在德川三家中居首位的水户藩德川齐昭认为欧美人都是夷狄（野蛮人），如同禽兽，他主张如果他们靠近日本，就要立即赶走，这就是攘夷。他经常向幕府建议：为了攘夷，要加强军备，特别是主张解除幕府锁国以来坚持实行的禁止建造载重五百石以上军用船只的法令。对此，幕府却以如果许可建造大船，那么西国和其他地区的大名说不定将会干出什么事来为理由，没有采纳德川齐昭的意见。尽管如此，德川齐昭仍坚持己见，而着手加强该藩

的军备，因此幕府怀疑他有野心，令其自重隐退（1844年）。如上所述，幕府对西国及其他大名，具体说就是对萨摩、肥前、加贺等藩有势力的外样大名^①的走私贸易也有了怀疑。

不论在水户、萨摩、长州、肥前，或在土佐以及其他各藩也都存在着与旧式派阀斗争纠缠在一起的、程度不同的门阀的上士和下士，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对立。

长崎的町年寄^②高岛秋帆根据鸦片战争的教训，建议采用西洋式炮术（1841年），而幕府已看到高岛秋帆的演习，并承认他的炮术是优秀的，但却不肯推广。不久，以高岛秋帆身为町年寄，行为不端为借口，把他关进监狱（1846年）。这是幕府害怕推广新武器的表现。幕府因害怕普及新知识，进而对兰学的压迫也越来越厉害。1849年，除眼科、外科之外，禁止幕府医师使用荷兰医

① 外样大名：江户时代领有一万石以上的藩主称为大名。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亲藩指德川本家的大名；谱代指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以前即仕于德川家的大名；外样指幕府成立以后当了藩侯的大名，和幕府的关系较比亲藩、谱代为疏远。——译者

② 町年寄：江户时代城镇官吏，相当于后来的町长。

术。1850年，禁止任意翻译荷兰书籍，并搜查、没收流行于世的原著。

随着对外问题的严重化，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天皇开始发言了。即1846年4月英国船到达琉球，接着法国军舰也来了，闰五月由比德尔（J·Biddle）提督率领的二艘美国军舰来到浦贺，要求通商。这些情况传到宫廷后，8月，天皇命令幕府加强海防。

资本主义征服世界和日本的地位

幕藩体制的危机在各方面都加深的时候，英、法从西，美国从东，俄国从北，都逼近前来，要求日本开国。这时欧美各国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于十五、六世纪时到过日本的西洋人的社会了。

十五、六世纪，西欧还处在资本主义确立以前，它们进行东洋贸易是从东洋寻求金银、香料以及珍奇物品，主要是进行东洋各地特产品的中间贸易，个别的也有贩卖西洋工艺品的，所以这种贸易既没有侵蚀到东洋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力量，而且它们的殖民政策仍是扩大领土

并掠夺那里的金银特产品，所以殖民地虽遭荒废，但还不是要改变原来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

十九世纪涌进东洋的欧美国家乃是倾销本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掠夺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或者粮食，而且不把那里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成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是不罢休的。例如印度封建社会的纺织手工业就被英国资本主义机械工业的产品所压倒。印度变为英国资本的原料——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资本主义就是靠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延续其生命的。而且资产阶级受到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为了获得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向地球各处开辟航路，设立据点，在它们所到之处就强迫缔结通商条约，而且如有可能，还进而掠夺其领土作为殖民地。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牵联的民族和种族，如其本身不迅速进行资本主义化，就要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

总之，资产阶级要把全世界都攫为己有。到十九世纪中叶，亚洲的西部、中部、东南部，非洲大陆的北部和南部，南美洲和大洋洲已经变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剩下的只有

东亚和非洲中部以及太平洋中部各岛，而且在东亚，中国自从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已经迅速地半殖民地化了。正在这个时期，列强涌进日本，这是世界史的必然趋势了。

用大炮强制签订的亲善条约

如前所述，在欧美列强中最早要求日本开国通商的是俄国。俄国遭受幕府拒绝后，对开国谈判曾一度断念，而开始致力于谋取库页岛和千岛。英国和法国一只眼钉住琉球和日本，而把主力放在对中国的侵略。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就成为打破日本锁国的先遣队，即为侵入东洋打开缺口。

如上所述，1846年美国政府曾派出比德尔提督到达浦贺，要求通商，而遭到日本拒绝。但美国在进一步作好准备之后，到1853年（嘉永六年），派柏利（M·C·Perry）提督的舰队到达日本。柏利率领四艘蒸气军舰，六月三日（旧历）耀武扬威地进入浦贺，严厉要求幕府就地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幕府官员和民众从来没有在

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四艘“黑船”（外壳涂抹黑漆的船），而且看到如此威风凛凛的外国也还是第一次。这并不是夷狄禽兽。柏利打开舰队的全部炮门，威吓说，如果不就地接受国书，就将进入江户和将军直接谈判，如还不行，就“立即交战，决定胜负”。幕府对此不得不屈服，而只是要求拖延到第二年再予答复。

柏利舰队的来航对幕府的老中来说，并非意外。在前一年，荷兰的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雅加达的旧称）总督已经忠告幕府，明年美国将派遣大的舰队到日本要求通商，锁国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在这以前的1850年，长崎的荷兰商馆长曾经警告说，美国最近正在准备派遣舰队前来日本。早在1844年，荷兰国王曾致幕府将军亲笔信，说明蒸气船发明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并忠告日本开国。但是，长期镇压先进人物的幕府，甚至无法理解这些忠告和情报的重要性，而这些情况都被老中搁置起来，连担任外交的官员都无法见到。现在终于面临这一现实，只有惊惶失措而已。

美国柏利一度离开浦贺，航行到小笠原

島^①。为防备同日本之间发生万一，在这里设置了贮煤场，并树立了美国领土的标石。他在首次来到浦贺以前，已经威胁琉球王强行缔结了修好条约，并设置了贮煤场。从太平洋方面控制日本本土时，琉球（冲绳）和小笠原在军事地理上是必要的据点，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如此。

美国在作好如此准备之后，第二年1854年，柏利的舰队再次来到日本，3月，不容分说地就在神奈川强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亲善、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作为美国船只的停泊港口，卖给美国船只所需物品和在两港驻有领事的权利等。在这条约第九条已经规定，日本今

① 传说小笠原群岛是十六世纪末由伊豆的领主小笠原贞赖所发现，并把本人的姓作为岛名，但这并不可靠。1670年，纪州的船舶漂流到这里，倒是有确实的记录。1675年，幕府试图开发此岛，但立即又停止了。此后，日本人都知道该岛是无人岛。1827年，英国军舰曾到此地，宣布为英国领土。后来不久有几个美国人从夏威夷移住此地，接着，就是柏利的来航。但英语称此岛为Bonin Islands，这乃是日语“无人”岛的讹音，从这里也可以理解此岛的发现者是日本人，这里是日本的领土。1861年，幕府在开港后也曾向世界宣布日本领有此岛，并从八丈岛派送移民，从事开发。

后给予外国权益时，均须无条件地给予美国，这种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继而被迫和英国、俄国、波兰也缔结了同样的条约。

幕府独裁的破产

幕府对于外交事务一向不和大名、天皇联系，完全独断独行。但受到柏利舰队威胁之后，完全失去信心，开始向各大名和幕府官员咨询对策，也报告天皇。不仅如此，还广泛地让一般群众发表意见。向人民征求有关国家基本方针的意见，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反映了人民地位的提高。

幕府的独裁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德川齐昭以及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容堂）、宇和岛藩^①主伊达宗城等原来完全被排斥在幕政之外的外样的有权有能的大名开始有了对幕政的发言权。幕府的亲藩，越前的松平庆永（春嶽）也开始参与幕政。他们对开国或锁国的意见

^① 宇和岛藩：今爱媛县宇和岛一带地方。——译者

并不一致，而且德川齐昭又是人所周知的极右的攘夷主义者，岛津齐彬和松平庆永倾向开国论，如果把他们作为左派的话，那么山内丰信和伊达宗城就是稍微偏左的中间派。他们在要求改革幕府的独裁和他们参与幕政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天皇和公卿们也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这就是由于幕府为了迅速加强军备，要把各地寺院的梵钟改铸大炮，让对寺院有权威的天皇采取“太政官符”这种古代天皇制政府（太政官）的法令形式发出了命令（1854年底）。这样，给予天皇的半宗教的权威增添了政治色彩，“朝廷”

（天皇政府）开始恢复了。大名中的改革派也和幕府一样，为了使天皇发出改革幕政的命令，对宫廷展开了频繁的工作。

当时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尊重各大名的意见，雇用荷兰人教官，开始讲授近代海军学。这不仅幕臣，还让各藩士也参加学习，并设立藩书调所^①，录用各藩的新知识分子，推行了和各藩

^① 藩书调所：也称藩书取调所，是幕府研究西学和翻译外交文件的机构。——译者

一致合作的政策。因此，在阿部正弘任职期间，改革派的大名对幕府也都抱有希望。但在1857年阿部正弘病死后，彦根藩主井伊直弼等保守派的谱代大名的势力强大起来，同改革派之间的对立激烈了。

就在这一时期，美国总领事哈里斯 (Townsend Harris) 到达下田 (1856年)，迫使幕府缔结通商航海条约。哈里斯在说明世界形势难于违抗的同时，又威胁日本说，如果不接受要求，那么“按照原通知进行战争，即可决定胜负”。于是，在1858年1月和幕府官员之间商定了《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幕府对缔结条约负担全部责任，签字，是没有信心的，因此，企图咨询各大名的意见，并想取得勅许（天皇的许可）。但是天皇和朝臣对于政治和世界情况是完全无知的，他们单凭本能的对欧美人的恐怖心理和厌恶情绪，也是不愿许可签订条约的。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由改革派大名插手，因此只回答缔结条约一事要由各大名详加讨论。而改革派大名方面却主张签订条约必须得到勅许。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对条约的赞成与否，而

是要争取保证他们参与幕政。

与此相关联，又发生了将军的继承问题。当时将军德川家定身体素弱，智力发育不全，甚至不能生育。在国内处于非常时期，就有决定继承人选的必要了。改革派以年龄和才智都适合非常时期为理由，推荐了德川齐昭的儿子一桥家的德川庆喜；而井伊直弼等谱代大名和幕府官员的主流派主张按照“皇国的习惯”选出与将军家血缘最近的人，推荐了纪州德川家的德川庆福（后称家茂）。不管双方的理由如何，都是企图拥立对于自己一派有利的将军。

签订通商条约和安政大狱

由于哈利斯几乎每天都在逼迫幕府签订通商条约，又因将军的继承问题而使保守派逐渐陷于不利。于是他们立即让井伊直弼担任大老（1858年4月），开始罢免幕府官员中的一桥派。

这时英法联合向清朝挑起新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朝政府接受极为屈辱的讲和条件。哈利斯利用这种形势，巧妙地威胁说，将有四十余艘英法

联合舰队前来日本，强硬地提出侮辱性条约，如果能在这一以前签订日美条约，日本以此为先例，可以避免英法的压迫。井伊大老信以为真，6月19日未得勅许就签订了条约。25日又乘势发表纪州德川庆福继嗣将军。接着勒令水户、尾张、越前三个藩主自重隐退，并陆续处罚改革派，即一桥派的大名和官员。

敢于擅自同外国签订通商条约的井伊直弼看起来似乎是进步派，实际上他是不亚于德川齐昭的攘夷排外主义者，顽固而反动。他之所以决定签订条约，一是出于企图恢复幕府独裁权力的反动目的，另一个是由于他凭着反动专制，把各大名和人民都搞成对立面，因此完全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来对抗美国的压迫，所以不得已而签了字。井伊任职期间，阿部正弘着手的进步事业不是被废除，就是被压抑。在他被刺死（后述）时，蕃书调所的西学者和幕府官员的进步派极为高兴。

井伊大老为了彻底肃清反对派和批判派，从1858年（安政五年）直到第二年强制推行了空前的恐怖政治（安政大狱）。松平庆永的智囊、见识高明、提出统一日本的设想并进行过活动的、

医生出身的桥本左内以及若狭小滨藩的浪人梅田云滨、越前三国凑商人出身的学者三国大学、文人赖三树三郎、长州藩出身不屈不挠的斗士、具有渊博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温暖的人类爱的天生的指导者吉田松阴等当时第一流的人材相继被处死刑。帮助岛津齐彬进行活动的，能和越前的桥本左内比美的萨摩的西乡隆盛不但被幕府驱逐，又遇到岛津齐彬之死，因而遭受藩厅的压迫，乃和志同道合的僧侣月照一起跳进鹿儿岛湾，被救后又被流放到大岛。

开港、贸易的影响

在推行安政大狱时期，幕府也陆续和俄国、荷兰、英国、法国缔结了通商条约(安政条约)^①。根据这些条约，各国公使驻在江户，从1859年6月起，神奈川(后来移到横滨)、长崎、函馆等三

^① 1860年1月，为了把将军的日美条约批准书送往美国而派遣了幕府的使节。胜海舟等人随行，作为日本人首次独立地驾驶蒸气军舰咸临丸(号)往返横渡了太平洋。这是胜海舟等人向荷兰海军官员学习轮船驾驶后仅仅经过四年半的事情。

港开放为贸易港。还决定了开放新潟、兵庫（神户）两港和江户、大阪两市的时间。而且，这和以往的验证贸易，朱印船贸易那种由当局特许的贸易以及象倭寇贸易那种与国家无关的、在外地进行的贸易，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在日本港口，开始由日本人和外国人进行自由的合法的贸易。

贸易开始之后，蚕丝、蚕卵纸^①、茶叶、灯油、水产品（称此为“五品”）等的输出逐年急剧增加。同时，输出品尤其是蚕丝和茶叶的生产迅速发展。上州、信州、甲州以及各地的养蚕、缫丝盛行，缫丝的工场手工业正规地开始成长起来。一般来说，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新的在乡商人的活动也频繁起来。

相反地，不用说是输出品，就连大米等物价都在猛涨，加深了一般民众，尤其是贫农、城市居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困难。再加上由于和国际市场相比，日本的黄金价格很低，而银价很高，这就立即引起了黄金的大量外流和白银的进

① 蚕卵纸：让蚕在上面产卵用的厚纸。——译者

口，促使了物价高涨和经济混乱。另外，由于蚕丝的迅速涨价，西阵、桐生等全国丝绸业遭到很大的影响。仅桐生一处就有一千五百名劳动者无法生活，甚至三十五个村庄的总代表再三向幕府请愿禁止输出蚕丝。总之，出口虽然促进了部分新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但从整体来说，却打乱了封建经济，给予原来的手工业者和批发商的打击是严重的。

进口方面，有了英国的机械工业纺织的优质廉价的棉布以及其他日用品，但这尚未达到破坏日本国内手工业的程度。但是，幕府和各藩增加了武器、舰船的进口，这就加深了他们的财政危机，从而增加了对人民的剥削，破坏了人民生活。

封建制的危机和民族危机

依赖锁国勉强维持下来的日本的封建社会，随着开国，“正象密封在棺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空气”一样，不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迅速地开始瓦解了。幕藩体制已在天保改革失败的1840年代，就面临着全面的危机，而开国又给予

了决定性的打击。幕府在开国之后仅仅八年就被推翻了。

不论幕府或各大名虽因屈服于列强的威胁而不得不开国，但他们却出自本能地懂得开国将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危机。因此，幕府下令不许把五品直接运往横滨，一定要经过江户的批发商。这样控制贸易，还为重新封锁横滨而煞费苦心。但却遭到列国强硬抗议和出口商品的生产者和货主的抵抗而全归失败，反而加深了幕府的危机。

开国，不仅是封建制度的危机，而且实际也是日本民族的危机。在炮舰的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安政条约，并不是把日本作为和欧美各国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而拉进资本主义世界。它是一、承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二、日本不能独立地决定进口关税率，必须与对方国家缔结协定；三、给予外国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四、在开港地点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借权和自治权，这种制度与治外法权结合起来，居留地实际上就等于是外国的领土；五、不规定这些条约的有效期限，要修改，须经对方国家的同意。安政条约就是这样侵犯和限制日本的主

权，就是企图把日本变为象缔结《南京条约》以后的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的市场，从属于欧美资本主义。

欧美各国不仅在条约上压迫日本，而且企图使日本在军事上、政治上从属于它们。公元1861年从春到秋，俄国军舰占领了隔开日本海和东中国海、连接日本和朝鲜的要地对马岛的一部分，向对马藩主要求永久租借，而且就在此地着手建设海军基地。对此，幕府没有认真地进行抵抗，主要依赖英国，连对马藩主等人也认为如果能在九州本土得到新领地，那么就可以放弃对马。只有渔民、农民、乡村青年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而奋不顾身地进行了抵抗。农民安五郎为抗击俄军登陆而战死。人民的抵抗制止了藩主们的允许租借土地。嗣后英国出面干涉俄国，俄国军舰才撤离日本。就是这样，由于依靠人民的力量，日本避免了一次危机。

不但是俄国，英国和法国也都觊觎对马。他们企图把此地作为“远东的丕林岛”（衔接红海和印度洋的小岛，是英国控制中东和印度洋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美国企图把对马作为欧美列

强共同管理的自由港。由于列强互相争夺一个目标，又互相牵制，所以如果人民能够坚决地进行守卫，那么就可以保得住的。

英国虽然在口头上说，对日本只希望发展自由的和平的贸易，实际上却企图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对抗俄国的政治上的前哨基地。而且，英、法两国以防止攘夷主义的武士迫害外侨为借口，从1863年以后，在没有条约上的任何正当的权利的情况下，竟派陆军和海军进驻横滨。1865年英国强迫幕府使用幕府经费替英军建设横滨驻军的兵营、弹药库和军医院等，建筑面积竟达四千六百坪^①之多。英国兵力最多达到陆军一千二百名，海军八百名。横滨港就变得和英国军港一样了。

列强各国对日本民族的压迫、不正当的军事进攻和掠夺“赔款”、篡改条约等，使日本殖民地化的危机还表现在几个事件上，这将在后文叙述。

日本民族也和其它亚洲各国人民一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即要么打倒本国的封建制度、集

^① 坪：一坪为3.305平方公尺。——译者

中民族的力量，迅速资本主义化，进而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自己；要么就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尊 王 攘 夷

安政大狱之后，幕府自己完全堵塞了改革派大名想要改革幕府、以幕府为中心来实现举国一体的道路。与此同时，结束了有才能的大名领导进行改革幕府的阶段。原来是作为大名的辅佐，在他们下面工作的藩士、浪人、地主、商人出身的进步派，用形容词的意义来说，也可称他们为革命派，就是这些人开始不问是否属于同一主君，只要志同道合就集结起来，越过大名而走上了政治的第一线。这样，就把立志改革政治的人们称为“志士”。

公元1860年3月3日（旧历），落着不合季节的雪，在江户城樱田门外，水户和萨摩两藩的浪人集团刺死了井伊大老，这是他们越过大名为登上政治舞台的最初的戏剧性的事件。此后，在各种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展了以萨摩、长州、土佐

三藩出身的人为中心的全国志士越过藩国范围的合作。

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尊王攘夷”。这个口号曾出现于水户藩的热衷于尊王攘夷论的会泽安的《新论》（1825年）一书中，这是来源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华夷内外”论的维护幕府体制的主张，丝毫不带有反对幕府的意思。而且，正如上述，在柏利来航以后，签订通商条约和安政大狱以前，开国还是攘夷，实际上还没有成为划分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而改革幕政，还是坚持保守才是争论的真正焦点。然而，在幕府已经自行决定开国的今天，从现实政治上来说，开国论必然成为维护幕府（佐幕），而攘夷就成为反对幕府的主张。反过来说，只要是佐幕派就无论赞成与否，都必须肯定开国的现实；而反幕派，即使只是策略上的，也必然成为攘夷派。而且，“尊王”就成为斥责幕府不经天皇批准而签订条约的武器。尊王与攘夷相结合，构成了反对幕府性质的“尊王攘夷”论。

如果这些志士们是反对一切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人民群众革命的领导者，那么，他们就能

够以人民革命的思想对幕府压迫人民、危害民族独立的事实展开斗争，然而，幕府末期的志士不是这样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属于武士阶级，或者是地主、富农、批发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以及和这些阶层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反对领主的权力和门阀的压制，是追求进步改革的人民的朋友，但他们本身又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同路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人民革命的思想，因此他们想要加强反对幕府和藩国的门阀的斗争，只能依靠对于最高的封建权威天皇的忠义，即尊王的理论了。

反对幕府也不是立即会发展到打倒幕府论，而是要在天皇之下实现幕府各藩的举国统一的体制，这是这一阶段志士的“尊王”思想，也是十八世纪后期山县大貳和竹内式部所主张的延续。倒幕论不是尊王论的直接产物，而是攘夷论的产物，为了实行攘夷，才主张打倒幕府，建立新的中央政权。

攘夷论是从将军、天皇直到各藩下级武士，即一切武士本能地具备的封建的排外主义，是用朱子学的华夷内外论装璜起来，使之合理化，又

由于日本是神国这一国学的学说，而进一步加深了排外思想。而且，开始开国和贸易，武士的生活日趋困难，这就使武士阶级的攘外主义从思想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生活的问题，更进一步激烈化了。这就必然对于把夷狄引进日本的幕府加深憎恨。

另外，有些攘夷论的指导者一开始就具有保卫民族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因素。例如吉田松阴的门徒高杉晋作在1861年旅行到中国上海，因看到上海已成为英、法的殖民地而痛心，加强了要为日本的独立而斗争的决心，同时认为清朝的“守旧”将招致“自灭”，从而痛感有接受“外国日新之学”的必要。高杉晋作回国后，就成为长州攘夷派的急先锋。他在1862年底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根据他们的首领桂五郎（木户孝允）在事件发生后的说法，这次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屈服外国的幕府陷于困境。高杉的同志久坂玄瑞也充分理解开国贸易的必要，但由于反对在屈从外国的幕府把持下的海外交通贸易而提倡攘夷。在这一点，他们和为了维护幕藩体制而要求攘夷，是完全不同的。

从攘夷到倒幕

开港后的二、三年间，因物价高涨和经济混乱，不断发生攘夷派对外国公使馆人员以及日本商人的袭击事件。在这期间，尊攘派的领导者为了坚决攘夷而开始策划倒幕。幕府迎娶当时天皇（孝明）的皇妹和宫作为将军德川家茂的夫人，想借此实现“公武^①结合”，尊王攘夷派认为这是把皇妹作为人质而甚为愤怒。大桥讷庵等关东地方的志士集团计划举兵倒幕。1862年正月，因准备不充分，几个人就在江户城坂下门外袭击首席老中安藤信正而失败。同一时期，以萨摩的有马新七等人为中心的九州各藩的志士把希望寄托在萨摩藩主的生父岛津久光，岛津久光是一个强烈的攘夷主义者，因此打算推举他出兵倒幕。但是，由于岛津久光的攘夷主义是为了维持封建秩序的，所以他对藩士们的破坏等级秩序极为恼火，1862年4月，派家臣刺死了正在京都郊外伏

① 公武：公指朝廷，武指幕府。——译者

见的“寺田屋”旅店集会的有马新七等人（寺田屋之变）。

寺田屋之变教育了志士们：诸侯是不可信赖的。于是，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各地的志士陆续聚集到京都。其中有信州伊那谷的豪农、蚕丝批发商兼酒店的女主人松尾多势子。她把蚕丝交易所作为联络地点，在志士之间起到秘密通讯员的作用。长州的久坂玄瑞、土佐地主兼乡绅的武市瑞山等人作为全国志士的领导人受到了尊重。至此，政治中心从江户转移到京都。尊王攘夷派终于通过公卿三条实美等人促使宫廷下令幕府定期封港攘夷。另一方面志士们利用大量的招贴和传单告诉民众：今天的生活困难完全是由于夷狄，是幕府把夷狄引进来的罪过，以争取民众给予支持。他们又对幕府官员和贸易商人进行恐怖活动，这是对敌人的示威，也是向民众进行攘夷主义的教育。

幕府终于答复朝廷于1863年（文久三年）5月10日开始攘夷。在当日，尊王攘夷派的据点长州突然炮击了毫无所知、正在航行下关海峡的美国船只，此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士气

大振。但在6月5日，法国舰队前来报复时，长州却支持不住而失败。但是尊王攘夷派的斗志越来越高涨，高杉晋作占据藩厅要职，从下级藩士和百姓町人的志愿者中精选人材，组织了叫“奇兵队”的新军队，并允许全体人民自由武装（后文叙述），准备用以迎击外敌。

7月，萨摩藩在鹿儿岛湾击退了英国舰队的进攻。前一年8月，英国派遣拥有七艘舰艇的大舰队要求解决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返回鹿儿岛的途中在横滨郊外生麦村（现为市区）杀伤骑马散步的三名英国商人的生麦事件。这时萨摩藩和英舰进行了交战，大半个鹿儿岛市街被烧毁，敌方也遭受很大损失而撤走。

尊王攘夷派的士气一直高涨，他们为了建立一个举国一致推行攘夷政策的中央政府，想拥立天皇举兵倒幕。但是，天皇的强烈的攘夷主义也和岛津久光一样，他厌恶扰乱封建秩序的志士，因此，暗中和幕府进行勾结。8月1日，幕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把尊王攘夷派一律赶出京都。三条实美等七名公卿也不得不逃亡长州。不久，土佐的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中，筑

前^①的平野国臣等在但马的生野，都集合少数志同道合的人举兵倒幕，但未能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而立即遭受了镇压。

① 筑前：今福岡县西北部。——译者

二十二 打倒幕府

——脱离危机

“禁门之变”和四国联合 舰队占领下关

8月18日政变^①以后，岛津久光、山内容堂、松平春嶽等公武合体派的大名重新掌握了权势，幕府和孝明天皇也松了一口气。尊王攘夷派陷入困境。

在土佐藩，坚决信赖前藩主山内容堂的武市瑞山等人却意外地被山内容堂下令入狱。他们在狱中为坚决保守同志的秘密而展开了斗争。武市瑞山看到胞弟田内卫吉因体弱难于忍受拷问时，

^① 8月18日政变：指上一章最后一节1863年将尊皇攘夷派驱逐出京都的政变。——译者

克制内心的痛苦，让其弟服毒自杀。同志久坂玄瑞曾忠告武市瑞山不要轻信诸侯，但他却一直摆脱不了对藩主誓尽忠义的束缚，他在狱中，才说出了山内容堂“只不过是二十四万石的退隐者”

（土佐藩是二十四万石），他开始觉悟到依靠民众的必要性。他在狱中还述怀说：“埋在野外雪地里的嫩叶，虽被人践踏，但也感到春天已经到来”，他在被镇压当中，预感到胜利的春天将要到来，而坚持了进步的乐观主义。他在1865年闰5月被处死刑。

在尊王攘夷派的据点长州藩，保守派也开始得势。8月政变以前，长州充满着革命的民主气氛。当时除奇兵队外，还陆续组织了群众队伍。猎人的狙击队、力士的力士队、僧侣队，被视为贱民的人们还组织了“屠勇队”，总称这些队伍为“诸队”。在乡村和市镇里，由富农和商人出钱组织了民兵队，还允许民间的小铁炉自由制造武器。由于“肉食之士皆经不起考验”，所以在高杉晋作的不论身分和门第，“专以力量为贵”的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为防御外敌而允许全体人民自由武装的革命的政策。这种事在日本历史上

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藩国的门阀对此深感不安。然而在外敌尚未出现之前却发生了京都政变，这鼓起了门阀的勇气。在同年末，藩主下令要限制“诸队”的人数，在“诸队”内还要确立“诸士和匹夫之差别”。町镇和乡村的民兵训练也遭到禁止。

集合在长州的该藩内外的尊王攘夷派指导者出现了焦急情绪。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职出身的真木和泉以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竟带兵赴京，7月19日进攻宫廷，但毫不费力地，被幕府的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所属会津藩兵和西乡隆盛所指挥的萨摩藩兵所击败，真木和久坂都自杀而死（禁门之变）。从此，长州藩和尊王攘夷派在封建的大义名分上被视为天皇的叛逆。天皇下令幕府征讨长州。

不久，8月5日，由英国提督担任总司令官，率领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十七艘军舰和五千零十四名士兵的大军来攻下关。长州藩企图保障外国舰船安全通航下关，避免冲突；但联合舰队却开始进攻，并迅速占领了海峡一带。藩国索性投降了。讲和条件有三条：1. 优待通航海峡的外国船

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由于“本打算烧毁下关市街，但未烧毁，其报酬”（!）须向联军交付战费。第三条的金额竟多达三百万美元的不合理的数目。并以长州的攘夷是由于执行幕府的命令为理由，竟迫使幕府负担这项赔款。

联军的真正企图是已经看清幕府无力支付这项巨款，企图以答应减少赔款来夺取更大的永久性的利益。果然，幕府在1866年4月交完150万美元后就提出要求延缓交付其余款的日期。这恰恰是联军所期待的。同年5月，以答应缓期交付为条件，要求保证按照安政条约规定的日期（1868年1月1日）开放兵库和大阪，并强硬提出“改税约书”，规定关税一律改为以从价税5%为标准的从量税，横滨海关还要从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分别聘用一名“助手”。为了强迫签订此约，四国公使又将联合舰队集结于兵库海面，威吓朝廷和幕府。

“改税约书”是欧美列强对日本半殖民地化条约的最后一手。丧失关税自主权的日本，此后长期不能改变这种超低率的关税，失去保护民族产业的手段，在财政上理应可以提高的关税收入

也无法提高，这就使海关变得同欧美列强共管一样。

倒幕派和民众

尊王攘夷派和它的据点长州藩被视为“叛逆”，这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幸，而恰好相反。因为就在这时才使他们最后懂得了不应依赖天皇的权威和大名的力量，而应当依靠自己本身的武力和群众。寺田屋之变、八月十八日政变、大和及生野举兵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逐渐懂得了这一点，而现在基本上明确了这一点。在这同时，他们明确地掌握了不是为攘夷而倒幕，而要以倒幕本身作为战略目标。在幕府企图拥戴天皇来消灭尊王攘夷派的今天，不和幕府斗争，还和谁斗争呢？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摆脱了锁国攘夷主义。当然这不是武士阶级丧失了固有的排外主义，但作为现实的政治目标，攘夷已经失去了意义。理由是他们在实行攘夷的体验中痛感到这一点。另外，由于他们的据点的藩国不得和四国联

军进行讲和，所以要通过攘夷来对抗幕府的战术就已经不能成立了。但是摆脱锁国攘夷的基本理由是作为尊王攘夷派社会基础的富农和在乡商人阶层已从开港时所受的冲击中觉察到，不应反对贸易，而应利用贸易，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在1864年1月的朝廷会议上，连岛津久光也因反对幕府垄断贸易利益，而主张开港了。而且，在下关战争讲和时，攘夷的长州藩已向英国公使提出了下关开港的问题。

到这一时期，在统治者最上层中仍然顽固主张锁港攘夷的，也只有孝明天皇等人了。从各方面来说，孝明天皇乃是封建主义的顽固透顶的人物。

这样，尊王攘夷派既不是尊王派，也不是攘夷派，而转化为倒幕派了。那些未能转化，抱住尊王攘夷思想不放的人就没落下去。典型的例子是1864年春，水户的天狗党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在筑波山发动了战事。他们不懂得号召民众，反而遭到民众的攻击，当被幕府及水户藩厅的军队追击时，又想去京都向禁里（朝廷）守卫总督德川庆喜申诉自己的意愿。他们由夏到冬，从中山

道到达美浓^①，再从那里越过积雪的山峰，千辛万苦到达越前时，等待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寄托希望的德川庆喜下令派的讨伐军。于是他们不得不投降了。

长州尊王攘夷派也由于受到禁门之变和下关战争的连续的重大打击，不得不暂时采取大规模的撤退。反动派掌握该藩的全权，把禁门之变的负责人判处死刑，又向幕府和朝廷请罪。10月，又发下命令，解散奇兵队以下的“诸队”。

但是，诸队并没有把这项命令放在眼里，反而增进了内部团结和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当时诸队所制订的纪律是“毫不妨碍农务，不准到农家乱串，在小路上遇到牛马要躲到路边，使它们能够迅速通行，未下种的田地也不可随意践踏。”

“不仅山林的竹木栎椿等，就是路边的一草一木也不准砍伐，偷窃人家的果品鸡犬等物则更毫无道理。”“不怕百万强军，却怕一个弱民，这乃是武士道的本旨。”为加强和群众的结合，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纪律的第一条说：“礼让为

① 美浓：今岐阜县南部。——译者

本，不背人心为重。礼让乃指不乱等级尊卑，严守其分，凡事不任性，须真诚有礼，不骄不躁”，这看来好象封建等级制的纪律，但“尊卑等级”应该理解为部队的上、下级的纪律。

在同年12月，得到群众支持的诸队发动了战斗。第二年1865年2月重新掌握了长州藩的权力。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担任政务，录用村医出身、精通西洋军事学的大村益次郎，进行了军制大改革，加强了对抗幕府的体制。高杉晋作等“诸队”干部掌握权力之后，立即开始防范群众，为了压制群众的革命化，一方面组织了保守的上士阶层的干城队，另一方面禁止了自由的民兵制。这里表现了诸队究竟不能成为革命党人的局限性。

打倒幕府的势力的统一 和英、法两国

这时期，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开始插手藩政。西乡隆盛在禁门之变时指挥藩军击退了长州势力，但这乃是由于不得不服从藩

主岛津久光之命的缘故。西乡隆盛力求扩大萨摩藩的势力，并没有拥护幕府的意思。因此，他反对幕府将要严惩已经请罪的长州藩，这样便把萨摩藩的舆论逐渐引向反对幕府。

土佐的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人乘此机会策划长州、萨摩两藩的联合。坂本龙马出身商人、乡绅，是土佐尊王攘夷派的发起人之一，他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敏锐的历史的洞察力，早已从大义名分、华夷内外、本藩他藩、武士平民等封建意识中摆脱出来，这时他又得到萨摩藩的援助，以长崎作为据点，和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组织了叫作“社中”（团体之意，后来的海援队）的军事的、政治的、又是商业的组织，并负责指导。中冈慎太郎是地主乡绅，自从8月18日政变以后，以长州为据点进行活动。中冈慎太郎为人诚实，有组织能力，在思想上深受高杉晋作的影响。1866年，他在评论中把“攘夷”的含义明确地改变为民族独立斗争。由于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努力，1866年正月成立了萨摩和长州两藩互相援助的同盟。这个同盟是掌握藩国机构的倒幕派志士的同盟，而不是藩主或者藩国政府之间

的同盟。倒幕派不象以前的尊王攘夷派那样借助于藩主的权威和权力来行动，而是打算由他们自己掌握两大藩国的权力，利用民众来行事。但在萨摩，岛津久光等人的势力也相当强大，而且没有象长州倒幕派那样有自己的“诸队”军事组织。西乡隆盛等人主要是依靠本藩的下级武士。

倒幕派已不谈什么攘夷，反而积极接近英国。英国公使和萨摩、长州两藩当局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可以看作政治同盟的关系。首任英国公使阿礼国 (R·Alcock) 在1863年出版的著作《大君之都——日本逗留三年记》中已经看到日本存在和成长着群众革命的幼芽，他认为变革现有体制是大势所趋。但是他由于看到本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威胁着欧美资本主义，就不希望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群众革命。阿礼国确定了压制民众革命，让日本的变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方针。下一任英国公使巴夏礼 (H.S.Parkes) 继承了这项方针。巴夏礼为了实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企图帮助萨摩和长州两藩，让两藩建立新的统一的日本政权，然后把它置于英国的影响之下。

与此相对抗，法国公使罗什 (L·Roches)

则企图让幕府消灭反对派，从而成为统一的政权。幕府也把他当作靠山。在法国的援助下，1865年开始在横须贺建立了大型的钢厂和造船厂。这里的总工程师、工程师和工头全是法国人，罗什在政治上也指挥着幕府。

庆应的大起义、捣毁暴动和打倒幕府

从公元1866年初开始，幕府进行了大规模讨伐长州的准备，还命令各大名进行动员。他们企图从山阳、山阴^①两道和九州调动幕府及全国大名的大军，彻底围攻长州。但是，有势力的大名们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从1864年，各地农民起义正在出现新的高潮，所以各藩无法为支持幕府的战争而消耗自己的力量。

1866年5月，在兵库爆发了激烈的捣毁暴动，由西宫扩大到将军正在逗留的大阪，全市延续了几天的大暴动。暴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物价暴涨，

^① 山阳、山阴：日本本州地区，从北到南的一些山脉把它划成两部分：一部分面向太平洋，称为山阳道；一部分面向日本海，称为山阴道。——译者

特别是米价的暴涨和反对幕府向市民征收巨额军费。群众的反幕情绪激昂。在大阪被捕的市民向官吏怒吼道，这次暴动的罪魁就是将军。捣毁暴动的浪潮席卷近畿、东海各城市。到月底，在江户爆发了比大阪的规模更大的群众起义。

与此同时，在农村也到处发生农民起义。特别是继江户暴动以后，在武藏、上野一带发生了以贫农、手工业工人、工匠为主力的大规模的起义。一部分起义者捣毁了幕府的代官所^①和高利贷者的住宅，烧毁了土地清册和借债字据，实行了“社会改革”。在这里很明显地成长着土地革命的幼芽。这一年，大规模的起义多达几十起。其中有的是反对由于长期战争征兵及增加其他负担的起义。

萨摩藩主和其他有势力的大名主张现在已经不是讨伐长州的时候，必须立即停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重新建立和统一统治人民的体制。原为公武合体派公卿的首领，被尊王攘夷派视为最大奸细而遭受攻击的岩仓具视也看到民众的这一

① 代官所：德川幕府直辖地方的官署。——译者

动向，认为必须建立以天皇为首的统一政权，于是就开始和倒幕派取得联系。

幕府不顾这种形势，在6月，从三方面开始进攻长州藩，由于长州藩士和全体人民一起奋战以及讨伐军根据地人民的反抗，幕府军在所有的战线都遭失败。7月，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征讨长州藩的各军乘德川庆喜继位的机会而撤回原地。

此后，幕府在罗什的指挥下，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第一是改革军制。从1863年以来，幕府征集农民，组织西式步兵部队，由下级武士组织了骑兵队、炮兵队，并大力加强。炮兵队也由农民和其他的雇佣兵所代替，而且还从法国聘请军事教官团，着手建设近代常备军。这样废除了原来的旗本等人的兵役，并命令上缴俸禄的一半作为“军役金”。还交涉，拟将北海道的矿山权利作为抵押，从法国借款六百万美元购买舰船和武器。第二是改革老中制度。把政务分为陆军、海军、外国事务、会计、全国部内等五个局，让各老中担任一个局，并由首席老中统一全局，企图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第三是成立法国

和日本合办公司，使其垄断蚕丝贸易，还想让它从事铁路建设。如果幕府实现这些计划，日本将毫无疑问地沦为法国的半殖民地属国。但日本国民要在这一卖国计划尚未实现以前打倒幕府。

王政复古^①的政变

至此，幕府完全丧失了民心。甚至在京都市内发生自杀或火灾，人们也都说这“是因为将军不好所导致的结果”。大阪受歧视的部落民也上书幕府要求废除歧视。幕府根据地的关东地方，从1866年夏的大起义以来，慢性的半动荡状态一直在延续着。有的地方由下层群众自发地组织武装。为了对抗这些武装，有的地方由地主和村吏阶层的青年组织了部队。还有的地方，几个村联合反对幕府征募步兵。在隐岐那样的孤岛，神主^②和地主以反抗统治者来吸引群众，组织了独

① 王政复古：日本从镰仓幕府以后，政治实权由将军掌握，天皇受将军的控制。所谓王政复古，不是在政治上恢复古代制度，而只是将政治实权交还天皇。——译者

② 神主：日本神社内主管祭祀的人。——译者

立的文武练习所(后来发展为岛民的自治机关)。在九州的长崎、岛原地方，在幕府和藩国的极为残酷的迫害下潜伏达二百几十年的“隐蔽的天主教徒”，现在也公开了他们的信仰。

封建秩序到处开始瓦解。虽然如此，由于人民还没有自己的革命领导核心，所以无法实现全国性的联合。因而他们的革命力量不能不由倒幕派志士所掌握。而且，由于当时已进入了打倒封建体制的最上层、又是封建体制诸矛盾的焦点——幕府的历史阶段，因此，倒幕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握民心的。在这时期不管在哪个藩，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追随倒幕派的势力。倒幕思想在富农和商人中间也逐渐有所发展。在1868年的倒幕战争中，他们中间有的组织了部队，参加了倒幕派军队。

1866年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死去，由不懂事的少年（十四岁半）明治天皇继位。许多人怀疑孝明天皇是由倒幕派，即“勤王”派毒害的。总之，孝明天皇之死，使宫廷的形势变得非常有利于倒幕派。他们用“玉”这一隐语称呼天皇。鉴于1863年8月失败的经验，他

们想把“玉”确实掌握在自己一派手中，并使自己一派的公卿作好了让天皇向长州、萨摩两藩主发出讨伐幕府的密令（讨幕密令）的准备。

将军德川庆喜察觉有人正在准备武装讨幕，乃根据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劝告，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自己在天皇之下掌握实权。于是在1867年10月14日请求把政权“奉还”给天皇（大政奉还）。第二天，朝廷允许了这种请求。实现“大政奉还”，消除了倒幕的借口；但西乡、木户、大久保等人却坚信如果不以武力推翻幕府，就无法建立稳定的新政权，所以，14日清晨，即在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的同一天，便令自己一派的公卿发出并非天皇意志的“讨幕的密旨”。15日以后，为了重新制造举兵的借口，在京阪地方和江户也采取了各种方法，向幕府挑衅，还散布流言说，如果实现王政复古，那么年贡就可以减轻一半，企图以此笼络民心。

10月下旬，从京阪地方到东海道、江户一带，以至甲府和阿波的德岛都发生了说是从天上降落的写有伊势神宫等神社名称的神符，谁要拾到了它，谁就得福，因此民众跑到街头狂欢乱

舞，十分混乱。而且，民众唱着结尾是叠句“还不好吗、还不好吗”的、粗俗的、不象歌也叫不出名字的唱词，不分昼夜，好象发狂一样又跳又舞。这虽不能确认为由倒幕派所煽动的，但至少他们是最大限度地助长了这种活动，从而在二个多月中，使幕府在京都、大阪、江户、横滨、名古屋以及其他当时政治上最重要地区的军事、警察机能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倒幕派在这期间，有计划地作好了政变的准备。在此期间，幕府对人民的统治，连在江户都无能为力了。幕府从农民中招募来的步兵部队也大量地开始逃跑，甚至出现农民捕捉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而保护外国人的特别警察反而恳求农民释放他们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1868年1月3日）倒幕派政变成功，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王政复古，并告诉人民“百事一新”，“拯万民于苦难”。

开放江户和幕府的灭亡

当天立即组织了由总裁（从皇族中任命）、

议定（从公卿、诸侯中任命）、参与（从廷臣、藩士、庶民中任命）三个官职构成的天皇政府（太政官）^①。废除旧朝廷的摄政、关白等官职，而由西乡隆盛等参与掌握了新天皇政府的实权。当晚，三个官职的会议压制了议定山内容堂等人的反对，决定下令德川庆喜将其领地移交给新政府。

幕府当然不肯服。德川庆喜想以武力维护其领地和权力。新政府也向幕府挑衅。1868年（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月3日（旧历），在京都郊外的鸟羽和伏见，幕府军和以萨摩、长州两藩藩军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发生冲突。幕府军的兵力比新政府军多三倍以上，但其主力的农民步兵部队毫无斗志，一般群众又都坚决拥护新政府军，因此，幕府军终遭惨败，德川庆喜乘军舰逃回江户，近畿以西各藩立即向新政府宣誓效忠。

接着，新政府宣布，为拯救多年来呻吟在幕府苛政下的人民而讨伐德川庆喜，并由各藩军组

^① 太政官：明治初年最高行政机构，统辖八省（部）和各厅的政务，1873年改为内阁制。——译者

织的大军指向江户。以解放旧统治者压迫下的人民作为发动战争的名堂，这虽然不过是煽动人心的宣传，但这在日本历史上却是第一次。

德川庆喜起初打算接受法国的援助，和新政府军决一死战。但军事总裁胜海舟说明幕府陆军已经陷于土崩瓦解，江户民心也完全脱离幕府的形势，劝说德川庆喜取消了反抗的意图。

新政府以及对新政府具有极大影响的英国公使巴夏礼都害怕人民自觉地爆发革命起义。实际上，在内乱开始的同时，从东山道^①到关东地方一带，人民已在各地发动了“社会改革”（世直）起义，赶走幕府官吏，开始攻打地主和高利贷者。人民的反幕情绪不仅已经超越新政府军所需要的程度，而且变得更为革命化了。由于朝廷、幕府以及英国都同样害怕人民的革命，因而达成妥协，1868年4月，江户城和平地交给了新政府军。新政府没收了大部分幕府领地，使德川家降为领有八十万石的一个静冈地方的大名。这

^① 东山道：日本古代八道之一，从京都经中部山地至北部的陆奥地区。——译者

样，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彻底地被打倒了。

席卷全国的內战

部分旧幕臣仍继续反抗。幕府海军的主力由榎本武扬率领，和一部分陆军部队及一部分法国军事教官团一起逃到北海道，盘踞在函馆。另外，奥羽和越后各藩以会津、庄内两藩为中心，联合起来用武力抵抗新政府。但处在战地的人民，无论在关东、在越后、在奥羽还是在北海道都支持新政府军而反抗自己的藩主。新政府军常从当地的人民中，能够了解到正确的敌情，还常受到粮食等等的支援。而反政府军虽想增援苦战中的友军，却常遭受人民武装部队的阻挠。

在新政府军中，担任东山道军，又担任从正面进攻奥羽、越州各藩同盟的据点会津，就是在这种最艰苦的战线上作为参谋长的土佐藩的板垣退助认识到，比起坐守在自己据点内的奥羽各藩大军的人数少得很多，又因长途作战而筋疲力尽的新政府军之所以能够容易取胜，乃是由于各地

的群众不支持藩主，反而和新政府军进行合作的缘故。因此，他痛感专制政治是亡国的根源。

本土的内战，到9月末，以新政府军的全胜而告终。同月，改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10月，天皇首次从京都到达江户，改江户城为东京城，继并于1869年（明治二年）3月奠都东京。

在函馆的榎本军建立了以榎本为总裁的虾夷岛共和国，各外国也把它作为事实上的政权而予以承认，就是这样地渡过了了一年。1869年春，新政府军向函馆进行了总攻击，榎本军于5月投降。当时，号称“游军队”的函馆市民的游击部队帮助政府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都说：“明治维新的完成，没有经过流血”，这只不过是将军或大名们没有流血，而在为期一年半，蔓延日本全国的大内战中，洒下几千人的鲜血，才彻底地打倒了幕府势力，建立了天皇政权。

内战和群众挽救了民族危机

正因为能够不怕内战，迅速地、决定性地打倒了幕府，才能使幕府和法国之间所进行的各项

卖国计划全归破产。尽管我国的半殖民地状态尚未消失，但已脱离了最险恶的状态。

如果倒幕不能发展到讨幕，而只停留在宣布“王政复古”的宫廷政变，那么幕府势力势必要死灰复燃。正如甚至在新政府命令德川氏交出领地以后，充当议定的大名或公卿等人还以“公议政体”为名，企图经过大名会议来决定一切国政。这样，这次会议就把原定德川氏交出领地的命令改变为不但不剥夺德川政权的领地基础，反而承认可以占有领地，以便作为大的大名，能够统驭其他大名，德川氏只变为分担朝廷经费而已。如果事态照此方向发展，那么德川氏的实力就可以依然继续存在，他们势必在接受法国军事、财政的援助和政治指导下，而进行反击。

鸟羽伏见的一声炮响，制止了担任议定的大名和公卿喋喋不休的饶舌词。大名会议的打算也付之东流。内战使新政府和旧幕府、各大名分享权力的一切妥协可能性都成了泡影。

正如上述，把历史推进到这里的主要动力乃是人民反封建的斗争。甚至将军的所在地江户的市民也彻底地背离了幕府，这使德川庆喜打消了

最后决战的意图。总之，群众才是剥夺了幕府接受法国援助，卷土重来的一切可能性，和使日本开始踏上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动力。

倒幕派也接受了英国的援助，英国公使也指导了倒幕之后建立新政权的计划。另外，萨摩、长州两藩从英国公使巴夏礼的别动队员的商人格洛弗（Glover）那里，以私人商业贷款的形式接受了武器援助。

但是倒幕派却没有从英国政府那里接受象幕府从法国那里接受的以提供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的军事、财政援助。1867年夏，英国公使馆员佐藤^①（Ernest Mason Satow）向西乡隆盛说，为了对抗法国援助幕府，英国可以援助你们。对此，西乡断然拒绝说：“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这是1861年高杉晋作在上海目睹清朝请求英国镇压太平天国后，引以为戒的精神在实践上的发展。

^① 佐藤：英国人，日本名佐藤爱之助，汉名萨道。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充英国驻华公使，进行过侵略活动。——译者

亚洲民族团结斗争的萌芽

正如上述，日本之所以能够采取摆脱半殖民地化的决定性的力量，在于日本本身。而且十九世纪中期，正处于亚洲各民族对西洋列强的侵略所进行的最初的民族斗争的高潮时期，这也有利于日本。

1850年起十五年间，在中国，太平天国的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反对清朝专制，并点燃了反对欧美列强的最早的全民族的斗争。在这一时期，1856—1857年发生波斯人（伊朗人）的大规模反英起义，在英国进行镇压之后，又在印度立即爆发了印度士兵的大暴动（Sepoy Mutiny），也是民族的起义。

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对这些起义所代表的亚洲各民族的斗争，说：“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的、决然的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在斗争中甚至在了解到完全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战斗的形式而已。”他根据

这一教训判断，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日本人屈服，“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才放松了对日本施加压力。

长州的久坂玄瑞在其著作《解腕痴言》中认为，英法之所以对日本不能使用武力，是由于中国的“长发贼”（指太平天国军）牵制英法的缘故。然而这里含有他所想象不到的深刻的意义。

在欧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结在一起时，同时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亚洲各民族在受欧美压迫之下的共同利害关系，从而各个民族的斗争就相互影响，相互呼应。日本人实际上也是得到这一援助的。

二十三 明治维新(一)

——革命和反革命

五条誓文和五张告示

新政府由于决定进行讨幕战争，不得不放弃同妥协的各藩走联邦的道路，而决定走天皇、官僚独裁政权的方向。同样，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再不能因顾忌攘夷主义的公卿和藩士而采取暧昧的态度了。因为，新政府只要不表明对外友好，那么不用说外国对内战的支持，就连外国中立也是无法保证的。于是，在鸟羽、伏见战后七天的1868年（庆应四年）1月10日（旧历），政府对外通告，天皇政府将承认旧幕府和外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对内则发出诏书表示一定要和外国友好。这件事使信奉尊王攘夷的公卿武士及国学者大吃一惊。不久，从他们当中出现了反对政府的一派。

近畿以西已经归由新政府管辖，3月14日，以天皇名义发出了《五条誓文》，表示了新政治的原则。第一条规定“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这种“会议”和“公论”是对公卿诸侯藩士说的，是想要把他们聚集到新政府里面来。而且《誓文》说：“应打破从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四条）、“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第五条），这就表示了放弃攘夷主义、积极吸收西洋文明的愿望。

在《誓文》中还有一句说：“以至庶民各遂其志”（第三条）。但这与王政复古宣言和讨伐德川庆喜的布告中曾强调过的要从旧的压迫中解放人民的提法相比较，是明显的倒退。这种倒退行为露骨地表现在《誓文》发布的同一天向民众发出的五张告示中。如“正五伦之道”，禁止结党，强诉，逃散，“照旧严禁邪教门天主教”等，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幕府压制人民的主要原则。事实上，新政府对于在幕府末年开港不久才公开其信仰天主教的人继续进行了比幕府更为厉害的迫害，1869年拘捕了数千名信徒，并施加了极为残酷的拷打。

对人民的利用和压迫

天皇政府只有在为打倒旧幕府和各藩反对派势力的必要情况下，才许下废除压迫人民的制度以及年贡减半等诺言，来利用人民，而一旦目的实现，就立即翻脸不认账了。

例如在鸟羽伏见战后，生于江户的相乐总三，在近江立即组织了以农民为主力的“赤报队”，它在政府军之前，进入东山道，并下令各村减免当年年贡的一半，并把民众组织到新政府方面，而且利用这种压力，迫使小的藩国向新政府誓表忠诚。政府起初利用赤报队，但在控制了近畿以西地方后，却散布谣言说赤报队冒充官军，奸淫掠夺，并让信州各藩逮捕赤报队。3月3日，相乐总三等干部被处死刑。政府惧怕农民的部队赤报队组织群众超过政府的需要程度，而发展为独立的势力。

又如旧幕府领有的隐岐岛，在不知该地当局松江藩是否忠于新政府时，新政府就支持了群众反抗松江藩的起义，但松江藩一旦向政府誓表忠

诚，政府就立即使令松江藩镇压了隐岐岛的居民。

不久，越后和奥羽各藩反抗新政府，松江藩的态度又发生动摇时，政府对作为京都和越后、出羽的海上交通要道的隐岐岛交给松江藩管理一事感到不安，因此，5月就责备松江藩任意杀伤岛民，而把隐岐岛移交鸟取藩代管，并允许岛民的自治（6月）。随着内战的结束，政府又夺回岛民的自治。二年之后，政府又以武力反抗松江藩的罪名，判处了岛民斗争的骨干。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例。对威胁天皇政府的领主势力，煽动民众来对付；群众革命化了，又唆使领主来对付，从中削弱领主的力量，压制民众，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就是确立天皇政权的基本路线。

奉还版籍——大名脱离领地

1868年闰4月，开放江户城后，制定了《政体书》，规定太政官掌管国政的全权，太政官下面分为行政、议政、刑法三官。议政官下分二局，上局是由议定、参与所组成的会议体制；下局是

集中各藩优秀的人材作为“贡士”，经过“贡士”会议，把各藩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行政官由辅相统筹全局，而行政事务分为神祇、会计、军务、外国等四官。刑法官负责司法。在政府的直辖领地设置府或县，各藩主在形式上也作为地方官之一。这样，新政权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开始就绪。此后，官制常有改变，每次改变都削弱公卿、大名的力量，加强了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出身为主的官僚的实权。他们是藩主的家臣，而且已经成为处于藩主之上的中央政府的官僚。

1868年底，内战结束，各外国的局外中立也得到解除，天皇政权作为日本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国际的承认。这时不仅在内战中战败的各藩，就连属于政府军的各藩也因战费开支而极端削弱。1869年6月，政府乘机迫使各藩主把其占有领地和统治人民的权力交还天皇，并把旧藩主重新任命为藩知事（奉还版籍）^①。

^① 版即版图，指领地；籍即户籍，指人民。由于这时已经成立了大名受天皇委托代管领地和人民的这种制度，因此，在形式上要把这些交还给天皇。但实际上是被政府没收了。——译者

藩知事的家庭开支和藩国财政区分开来，知事领取全藩收入十分之一的米谷作为俸禄。而且，废除大名和公卿名称，改为华族，划分一般廷臣和武士为“士族”和“卒”两级，俸禄也大量削减。

同时，中央政权仿效古代天皇制的大宝律令制的形式，分为神祇、太政二官。太政官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参议，下设行政六省等机构。地方以府、藩、县三治一致为原则，称长官为知事，辅佐他的大参事以下的官职名称也取得了全国的统一。

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的成长

为了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全国各地在经济上就需要发展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这象在第二十章叙述过的那样，在开港以前就已开始萌芽，开港之后，其成长就比以前更加迅速了。而且，在倒幕、内战的政治战乱一旦结束后，政府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实行了各种政策。确立对外友好，求知于世界的大政方针，

这在经济上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系统地采取了废除关卡、在沿岸设置航行灯塔、禁止商业行会等垄断营业、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了奖励贸易和统一并保护全国汇兑业务而设置通商司（以上各项在1868—1869年内进行）、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以及发展商业、产业的政策。大阪、京都、东京三个城市，横滨、长崎、神户（1868年1月开港）三大贸易港等经济上的要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自从1868年内战时期开始驾驭商品经济界的三井、鸿池等巨大商业资本和政府也紧密勾结起来^①。这也成为政府尚未具备独立武装的情况下所以能够统治各藩力量的源泉之一。而且日本全国成为统一的经济圈，这从另一

^① 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完全没有独立的财源，因此平息内战的军费、政府的开支都很穷困。政府强制地向三井、鸿池等大商业资本借款，而且发行了共计四千九百万两的太政官札和其他不兑换纸币。太政官札尽管是强制的，但它之所以能够流通，乃是由于三井等支持了政府的缘故。对他们来说，德川政权也好，天皇政权也好，希望的只是尽快地实现政治的统一，希望保证他们的营业自由和安全。而且，他们依靠布满全国的金融情报网，在内战之际倾向新政府，从此他们深深打进政府的财政和外贸机关里。

角度来说，就是使各藩失去作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的经济条件。

民众的反封建斗争和士族的反抗

在内战时期，以反对旧幕府各藩的力量而出现的、农民为主的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不断地得到了发展。但现在这种斗争必然带有反对新政府的意义。以贫农、早期无产阶级为主力，还有中农、小商品生产者也广泛参加的群众斗争提出了减轻年贡等项负担、反对藩营专卖、要求以现金兑换不兑换纸币和劣币等，并常常进行“社会改革”，甚至向各藩政权提出了公选各村庄屋、大庄屋等政治要求。1868年10月，在内战中刚刚战败的会津藩领地内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起义，1869年8月，信州上田藩、松代藩^①一带直到伊那^②地方发生的超越藩国范围的十几万人的

① 上田藩、松代藩：上田藩，今长野县上田市一带；松代藩，现长野县松代町一带。——译者

② 伊那：在长野县，处于木曾山和伊那山之间的细长山谷地区。——译者

起义，同年10月，越中新川郡的社会改革起义等就是代表性的实例。另外，1870年1月陆奥登米郡的神职官七郎作主张，所谓复古乃是一切事情的复古，于是呼吁农民人人应当有权正式收回过期未能赎回而落在别人手中的抵押土地。

政府无情地镇压群众斗争，同时又利用它来削弱各藩的势力。例如上述1870年11月，上田藩、松代藩发生空前的大起义时，由于知事接受民众的要求而使事件告一段落之后，政府又着手镇压，群众的指导者三百几十人被处斩首等刑。而且还以未经政府许可，擅自减轻租税为不法，而惩办了知事们。从此开始出现了中央政府统治藩政，人民超越藩国直接和中央政府接触的形势。

在群众反封建斗争的同时，攘夷主义的士族或公卿的反政府斗争也频繁起来。1869年正月初，参与横井小楠被杀害。以此为开端，攘夷派暗杀开明高官的事件和暴乱计划不断出现。

政府并不害怕这些脱离人民的反动派，从政府来说，严重的威胁乃是在奉还版籍以后，将成为整顿士族政策而牺牲的下级士族和民众反封建

斗争的结合。1869年末到1870年，长州藩解散奇兵队等诸队时，士兵们由于藩厅长期酷使他们，最后不给满意的犒赏并一脚踢开，因而进行了暴动。他们和要求减轻负担的农民起义相结合，只靠藩厅无法镇压，而由中央政府派遣原任“诸队”干部的井上馨才镇压下去。但此后暴动的指导者仍与北九州的对现实抱有不满意的士族相结合。从1870年秋到1871年初，在与丰后日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之下，发生了北九州各地士族超出藩国范围的暴动。政府为了防备，下令四国、九州的四十二藩进行动员，但各藩并不服从政府的命令。

镇压了长州诸队内战的井上馨写道，要长州藩士的三分之二从事农工业，剩下的三分之一也逐渐取消世禄，不束缚人民自由的权利，废汉字，兴器械穷理之学（指博物学、理化学等——译者），如不进行此类大改革，就无法统治人民。这样，要隔断士族和民众的联系，吸引民众，提高近代生产力就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但长州藩并未进行这样改革，而板垣退助所指导的土佐藩的改革以及津田出、陆奥宗光等指导的

纪州藩的改革却是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

废藩置县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群众斗争超越藩国范围的成长，各藩的分散割据状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无法维持下去了。自从1870年以来，由于有些小藩已经破产，甚至要求政府废除藩制。从中央政府来说，在能够引起席卷一个地方的大暴动的情况下，要集中权力，废除藩制就成为最高的课题。如果政府不直接统治全国国土和人民，那么就无法获得维持日益膨胀的政府机构的财源。

1871年（明治四年）春天起，政府进行了废藩的准备。为要坚决实行废藩，就必须具备万一发生反抗时可以进行镇压的兵力。这个问题，由于任命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的板垣退助为参议（长州的有力人物已当了政府的高官），萨摩、长州、土佐三藩派遣步、骑、炮三个兵种合计八千人作为天皇的“亲兵”（后来的近卫兵）而获得了解决。

7月14日，政府断然举行政治改革，免除了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废除藩制，设置县制，由中央政府自由任免的官吏成为知事及其以下的地方官（废藩置县）。对此，没有一个藩主有力量进行反抗。岛津久光虽然发牢骚说，不断受家臣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的欺骗，但他也无能为力了。

中央集权官僚制和“四民平等”

1871年8月，政府接着进行了官制改革，废除了神祇官，而将业务移交新设的太政官下面的神祇省。第二年又废除了这一省。祭政一致之类的古式的装饰品已经不必要了。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右院。正院是决定和执行政策的机构，由大臣、纳言、参议等组成，下设行政各省。左院是原属议政官系统的法令审议机关，右院是各省长官（卿）和次官（大辅）的协商机构，两者都是为了表示尊重“公议”形式的，但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左院、右院在三年以后撤销了）。

同月，废除了秽多、非人^①的称呼，改为“身分职业与平民相同”。根据这一事以及在这前后的法令，整顿了等级身分制，改为超人身分的天皇和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等四种身分。取消了按照身分而有服装、住房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上的限制或婚姻及职业、居住的限制，而在法制上承认了不凭身分，均可充当文武官员的权利。

政府将此称为“四民平等”，但皇族和华族依然是特权贵族，而士族在实际上也处于具有特权的地位。旧的贱民身分虽在法律上列为平民，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开始和平民一样负担纳税、兵役、义务教育及其他义务，而且破坏了一向与他们身分相联系的皮革业及其他手工业的独占，他们在实际生活上没有职业的自由、居住的自由，依然被束缚在旧身分所限定的住所和手工业中，继续处于受歧视和受蔑视的状态。由于原来就有天皇、皇族这种超人的身分和华族贵族身

^① 秽多、非人：即“贱民”。秽多指皮革劳动者、从事逮捕犯人、斩杀犯人的刽子手之类的人；非人指流浪者等，可以重新成为所谓良民，但为数极少，限制极严。——译者

分，所以相对地不得不在实际上保留贱民的身分。

近代天皇制和绝对君主制

这样，即以天皇作为唯一最高的绝对统治者，在其下边建立了文武官僚以天皇的名义直接地、统一地统治全国人民的近代天皇制。由于封建领主阶级已经无法维持旧的统治，而且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无法联合全国的革命力量打倒领主阶级的阶段，因而取代幕府而成为最大最高的封建权力的天皇政权，一方面利用群众打倒各领主，另一方面又压制群众革命，这就使自己发展成为唯一的最高的绝对统治者。以这种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专制君主制，在世界上称为绝对主义君主制。这种制度的典型，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前的都铎（Tudor）王朝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前的路易王朝。

但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和西洋各国的绝对主义却存在着几个重要的不同点。

第一，西洋的绝对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史

上尚未处于统治阶段以前就已成立和存在，而日本天皇制是在这以后才成立的。

第二，西洋的绝对主义是成立于这个国家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并加速其资本主义的成长，其结果被强大的资产阶级所推翻，或者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权力（资产阶级君主制）。天皇制也成立于日本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迅速地扶植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日本，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天皇制仍然未被推翻，又没有转化为资产阶级君主制，而继续保持了绝对主义的性质。

第三，西洋的绝对主义是由封建领主中最大的实力者征服了其他领主而成立的。天皇制作为领主的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作为封建权威，却是处于最高地位的世家，这种天皇制世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派对抗西洋的资本主义和国内反封建各种因素的压力，而使之成为绝对君主的。另外，西洋的绝对主义是以政治权力，从宗教权威（罗马教皇）中取得独立为其特征的，而日本天皇制乃是把宗教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力结合起来成立的。

第四，与上述相关，西洋的绝对君主，君主本身就是政治、外交、军事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人，而天皇虽在法制上具有绝对权力，但实际上是由文武官僚用天皇的名义行使其权力，而天皇本人实际上几乎不能行使权力，常常是文武官僚统治阶层的招牌，是文武官僚权力的源泉。一句话，天皇作为神的权威的作用比起作为绝对的权力者的作用是大的。

明治政权的目标

维新政权在依靠废藩置县，成功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公元1871年11月（阳历，下同）决定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长官——译者）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次长——译者）伊藤博文等为全权副使，并有理事官、书记官、随员等人组成共达四十八人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其目的有二：一是与欧美各国进行修改条约的预备谈判，一是考察西洋先进文明，作为建设新日本的参考。

修改条约的谈判刚一一开始就完全遭到失败。美国政府为让使节团感到高兴，虽在礼遇上予以盛大欢迎，但在谈判上却采取了耍弄孩子的手法，丝毫也没有接受日本的要求。岩仓等就在1872年7月停止了对美国的交涉，而把后来的旅行改变为专门进行友好活动和考察。

使节团一行从美国到欧洲，顺序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全面地视察了西洋各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长期旅行，在1873年5月至9月间回国。出国费用总额约达一百万日元，如按现在（1965年）的货币价值换算，至少也超过十亿日元。

一个国家政权最上层的绝大部分官员，直接接触先进文明世界，从中学习，这在古今的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文化大事业。那么，使节团学习了些什么呢？

他们环游欧美各国，认为西洋也并非自由平等，就连法国的“总统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 1797—1877年）那样的人物都顽强地进行压制，实不愧为豪杰。”这样，只对强大的政

府的权威表示了敬佩（大久保利通）。在政府中以最进步派自许的木户孝允在旅途中不断写信反对日本国内“轻率地谈论进步”。他们去英国虽然听到要使国家富强，自由要重于专制，并认为“英美法等国（比日本）先进几倍，（日本想模仿）也是无法赶上的。”“因此，在普鲁士和俄国那里一定会有不少（日本）可作榜样的东西”

（大久保）。尤其刚刚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普鲁士的俾斯麦政权吸引住了使节团，他们相信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标本。

他们又深深懂得了应迅速建立大工业的必要性。“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只有煤和铁。产品皆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运往别国。机器工厂之盛行，超过过去的传说，到处黑烟满天，足见英国之所以富强。”

（大久保）“考察欧美各国的情况，小工厂虽多，利润却很少，如对绢丝不集中力量，则大事亦难办成。”（木户孝允）

于是确定了明治政权的目标。既不是旧式的封建制的顽固不化，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英、美、法，而是“王权昌盛”的，由文武官僚统治的

德国(普鲁士)和俄国,特别是和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工业又发达,如日方升的德国就成了日本的标本。但是,这个路线是在岩仓、木户、大久保回国之后,从政府中清除了在他们出国时期巩固了自己势力的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派以后确立的。

征兵制度和常备军的建立

使节团出国时期,在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留守政府下,由参议西乡隆盛、参议板垣退助、外务卿(后兼参议)副岛种臣等形成了主流派,势力逐渐巩固。他们对新国家的前途虽有笼统的伸长国权国威的理想,却没有具体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建设性的计划。此时,参议大隈重信、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后来升任陆军卿)山县有朋等也参加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的一派,于是在政府内部,以反主流派的开明官僚为中心,推行了巩固天皇制基础的改革和建设。

由于实行了废藩置县,才使天皇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就向往着的完全集中军权和成立强大的常

备军成为可能。

在新政府中，最初建设军队的核心人物是曾经指导长州藩改革军制的大村益次郎。他通过过去的经验已经懂得了靠封建武士是不能建立近代军队的，因此想建立国民征兵制。但在政府内部，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人认为人民的士兵有叛乱的危险，而加以反对，所以未能实现。不久，大村益次郎遭到反动士族的袭击，在1869年11月死去。

此后不久，山县有朋研究欧洲兵制后回国，成为建立军队的中心。他是出身于比长州藩的足轻身分还要低的“仲间”（侍奉武士的勤杂人员——译者）的家庭，在奇兵队显露过头角的人物。

在废藩的同时，政府解散各藩的一切军队，从中挑选精锐部分改编为中央直辖的军队，部署在东京、大阪、东北（仙台）、镇西（小仓）四个镇台^①及其所属的外地兵营。用这种军队和前述的亲兵，预先作好镇压群众的准备，在1872年

^① 镇台：兵团的旧称。1888年撤销镇台，改为师团，一直延用到战败。——译者

11月发布征兵令，强制征集全国人民作为兵士，四个镇台增加为六个。常备军的建设正式走上轨道。此后，对土族叛乱，就派遣征召的常备军；发生民众起义，就派遣镇台的土族军队以及县内的土族，让土族和平民相互对抗，而逐渐扩充了征召的常备军。

海军最初是由接收旧幕府和各藩的舰队所组成。逐渐扩大。到1872年1月，兵部省（部一译者）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在这时期，军备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的反政府势力，因此军备的重点当然放在陆军方面。

在太政官发布的征兵告示中说，征兵制是废除用以压制人民的、由武士独占的武装力量的制度，使国民获得自由，实现人权平等，也就是把它说成像近代民主主义国家的军制那样。但这不过是为了把不愿被征的人民抓来当兵的漂亮词句而已。山县陆军卿就实施征兵一事向天皇的报告中说：“兵制至此方告完备，能够对内镇压蠢贼，对外加强对峙的力量”，这表明了征兵制的真正目的。

根据当时的征兵制，第一，免除官吏的兵役；第二，交纳捐款者，本人可以免除兵役；第

三，户主或者户主的继承人、独生子、独生孙可免除兵役。这种免除兵役的规定明显地表示了征兵是统治者对人民征课的一种赋役劳动。尤其官吏可以免除兵役和以捐代役的规定，更露骨地表现了这一点。正如后述，群众强烈反对这种征兵制度乃是必然的了。

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和 义务教育制度

即使有了多么完备的官僚制度和军队，如果不统治人民的思想，权力还是不会稳定的。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政府极力使天皇神格化，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

在天皇政权成立当时，大部分人民是不了解天皇是何许人的。因此，在1868年3月，新政府的九州镇抚总督^①所发出的告示说：“在日本这个国家有承袭天照大神的天子……。”这样，不得不从使人民懂得天皇的存在作起。1869年2月，

^① 镇抚总督：1868年1月戊辰战争开始之际，为了平定各地而任命的临时征讨官员的长官。——译者

奥羽人民在各地进行起义时，政府也说：“天子乃系天照大神的子孙，……在各藩国之所以有的神人称为正一位等，都是天子所许可的”，这就告诉人们天子比“正一位的稻荷大明神^①”还要伟大。

为把天皇的威信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从国家的固有制度中取消了五个节日^②以及来源于民俗传统的节日。而又重新制定了1月1日为天皇朝拜四方各神的四方拜、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等与天皇以及神道相联系的节日制度。例如，在春秋两季称为彼岸^③的民间节日也被解释为天皇祭祖的国家节日（皇灵祭）。另外，从1873年（明治六年）1月1日起采用了太阳历，还说什么就在这一年已经用太阳历“换算”好了记载在《日本书纪》的神武天皇即位之日（辛酉年1月1日），就把2月11日定为日本开国的节日“纪元节”。由于神武天皇并非实有的人物，所以，他即位的

① 稻荷大明神：被视为各种产业的守护神，日本全国都建有这种神社。——译者。

② 五个节日：原文五节句，节句是节令的意思。日本古时有五个节日，即人日（1月7日）、上巳（3月3日）、端午（5月5日）、七夕（7月7日）、重阳（9月9日）。——译者

③ 彼岸：指春分、秋分前后各三天，共七天的期间。——译者

日期也是虚构的。而且，确定这一天又是没有任何历法根据的，所以能把它换算为太阳历的科学方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偏要把它说成“换算”的结果。

事实上，政府又把神道作为国教，1869年下令神佛分离，从1870年起，大肆宣传“基于神道和天道的大教”。

同时，在1872年，政府制定学制，要在全国的市、町、村建立小学，送男女儿童进小学是家长的义务，不服从的予以惩处。学校的建设、维持和教师的工资等全由市、町、村民负担，并规定每一个儿童每月学费为五角（小学的学费到1900年才完全免除）。据大概的估计，1878年就业人口平均每人一年所得只有二十一元，可是学费一年就达六元，这对民众来说该是多大的负担啊！由于这样，在反对征兵制的同时，在各地爆发反对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大规模起义也是当然的。

“一新”、明治维新

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资本主义产业的成长，逐

步地巩固了天皇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关于这一点，将在另外章节加以叙述。

推翻幕府制，平息全国性大内战，废除藩制，紧接着在行政、军事、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大改革和新建设。这样，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天皇制的执行者们的干劲确是惊人的。他们都很年轻。在废藩那年，政府最高统治机构内部，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四十六岁，西乡隆盛四十三岁、大久保利通四十一岁、木户孝允三十八岁、板垣退助和三条实美都是三十五岁，比他们低一级的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为三十四岁、伊藤博文刚刚三十岁，其他领导人物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岁。

当时人们把在这些充满朝气的人们领导下所进行的，包括废除幕藩体制、建设天皇制国家等项措施，称为“一新”或“王政维新”。后来，和当时年号结合起来，称为“明治维新”。

正如上文具体叙述的那样，明治维新是由群众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和在反抗欧美列强迫使日本发生半殖民地化危机的斗争中，民族觉悟的提高所推动的，并由于日本社会已经向资本主义方向

有了一定的发展作为基础，而得到完成的。天皇政府高级官员们的干劲的源泉，不只是在于他们个人，正如上述那样，而是在于人民和整个社会充满着朝气。他们利用这些条件，达到了他们建设天皇制国家的目的。

而且，由于明治维新的结果，日本终于实现了天皇制专制主义。如前文所述，虽然这时已经开始趋向军国主义，但第一，明治维新却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群众的行动，直接迫使统治势力不得不进行政治的、社会的变革。第二，幕藩体制永远被埋葬，完成了日本人的完整不可分割的国家的统一，建立了有效率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反抗专制天皇制，参加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政治舞台。第三，日本社会彻底地开始了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第四，以这种历史性的进步为基础，从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地位迈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在这里，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胜于以往任何变革的重大的进步意义。

二十四 明治维新(二)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收回民族的权利

明治政府在推进国内建设的同时，努力于收回旧幕府时期被外国夺去的民族权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 旧幕府在宣布王政复古的庆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8年1月17日)通知美国公使馆书记官波德曼(R·C·Portman)，许可在江户、横滨之间修筑铁路。在许可的条件中，就有进口建设器材概予免税，铁路开始营业后也不征收税款等殖民地性质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是由于波德曼和灭亡前夕的幕府作过什么秘密交易，是不是趁火打劫的行动，还不清楚，但是，总而言之，这乃是近代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第一个

权益。1869年正月，美国公使要求新政府承认该项权益。但新政府在英国公使的指挥和援助下断然拒绝了。后来，美国公使威胁说，如果日本政府拒绝，“将有害于日美国交”，但政府终于拒绝到底。

（二）在榎本武扬等人占据北海道时，曾和普鲁士人格特纳（R·Gaertner）订立过合同，租给函馆郊外七重村一带三百万坪土地，为期99年。由于榎本政权的溃灭，这个合同也变为无效。但1869年6月，格特纳又和新政府的函馆府知事订立了和上面相同的租约。中央政府知道之后，立即采取撤销契约的方针，于是，1870年12月向格特纳付出巨额的赔偿费（银元六万二千五百元），收回了这个权益。

（三）1873年政府又收回了旧佐贺藩曾作为外债抵押过期，被英国人格拉伯所占有的高岛煤矿。同时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冶炼等业务的企业主，或者合办的参加者。

（四）政府很早就不断地要求驻横滨的英、法军队撤退，1875年1月获得实现。

(五) 原定横滨外侨居住地区的行政和警察的官长，日本政府要雇用外国公使团所推荐的外国人（日本政府只付工资，实权完全由外国公使团所操纵），但在1877年6月，解雇了外国人负责警察的官长，并使公使团承认了今后不再雇用外国人。

这样，日本在1870年代取消了除不平等条约以外的全部不合理的外国“权益”。如果铁路、土地、矿山的权利、驻扎军队、居留地警察等不是这样早期被取消，而延续到资本主义列强到达帝国主义阶段，那么，这些权利就有可能成为列强迫使日本变为共管的殖民地的依据。

小笠原、千岛、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维新政府虽然获得了上述的成功，但也没能及早实现民族主权的完全独立。

政府对确定日本领土问题甚至是动摇不定的。正如上文所述，小笠原群岛是日本的领土，这在历史上本来是明确的。但是，由于柏林宣布

这是美国领土，所以1873年5月发生了把此地看作外国领土的大藏省（井上馨为事实上的长官）和把它看作是日本领土的外务省（副岛种臣为长官）之间的对立。继而进行了有关该岛领有权的日美交涉。美国政府为了在远东对抗英国和俄国，需要利用日本，所以就未坚持没有经济价值的小笠原的领有权，终于在1875年将该岛确定为日本的领土。

另一个领土问题是库页岛问题。日本人早于俄国人，从十八世纪后期起，已经定居在库页岛南部和中部地区，并开设渔场。不久，俄国人从库页岛北部逐渐南下，这样，南库页岛也成为两国人民杂居的地方。于是，从幕府末期开国以来，曾几次进行了在库页岛划定日俄国界的交涉。明治维新以后，英国公使巴夏礼认为，日本确实无力维持库页岛，因此忠告日本放弃库页岛，而全力以赴地经营北海道（1869年8月）。

由于这种情况，政府乃求助于美国公使，但他的意见和英国公使一样。从此，在政府内部也发生了放弃库页岛的论调。在以国权外交而著

名^①的副岛种臣担任外务卿时，就曾打算把库页岛全岛让给俄国，并就其代价一事进行交涉（1872.4—1873.10）。由于发生了将在后文叙述的，以征韩争论为契机的政变，副岛辞职，这

① 一般说法，副岛种臣从俄国购买整个库页岛的交涉，几乎得到解决，但由于发生政变而落空，后来政府轻易地屈服于俄国，就用库页岛交换了千岛。但事实并非如此。副岛虽曾一度向俄国提议购买库页岛，但立即遭到拒绝。后来日本向俄国提出过让出全岛的交涉，所以副岛下野后的政府对俄交涉，仍是副岛交涉的继续。

还有，1872年副岛任外相时，秘鲁轮船玛利亚·鲁斯号在澳门收买中国人作为劳工，返回秘鲁的途中在横滨停泊时，日本官宪救助了逃跑出来的中国劳工，并审判了船长，终于解放了劳工。这一事件被夸大为副岛种臣和当时神奈川县县令陆奥宗光、神奈川县权令（副知事）大江卓及当时政府里副岛种臣一派的首领西乡隆盛等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精神的表现。

但是，其实最初副岛种臣和陆奥宗光是拒绝插手这一事件的，因此，逃亡的中国劳工曾一度引渡给船长，但因英国公使与外务省进行交涉，美国公使也支持英国公使，因此才审判了船长。当时中国南部把中国人作为劳工买卖成风，最初以英国占领的香港为据点，但由于香港英国当局加以禁止，根据地就转移到葡萄牙占领的澳门。于是，英国千方百计地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止劳工买卖。恰在这时，在横滨港发生了玛利亚·鲁斯号事件，于是向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当时，美国急于防止华工经过秘鲁及古巴，然后送到美国去。

一交涉也随即取消了。总之，1875年5月，订立了日本放弃整个库页岛，归俄国领有，日本领有整个千岛的所谓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在千岛列岛中，择捉岛以南是日本人早于俄国人进行开辟、定居的，并曾公开宣布是日本领土。俄国人有时只出现在中部和北部，即使这个北部和中部千岛划归日本领有，但在面积和在经济价值上都是无法和库页岛南部相比的。

琉球的归属问题

政府在同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国界争端中虽然没有自主权，但和清朝在有关琉球问题的争端上却采取了高压手段。正如上卷第十二章所叙述那样，琉球虽然是萨摩藩的“附庸”，即殖民地从属国，人种是日本人种，语言是日语的方言，使用日本文字，在地理上是日本列岛的延长，不管从那方面来看，琉球也具有迟早要和日本本土在政治上完全合并的历史的必然性，但当时琉球却又是臣属于清朝的一个单一的王国。

由于废藩置县，萨摩藩不再存在，因而琉球

王国也就不能“附庸”于萨摩藩了。在这一年（1871年）11月，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中国领土），其中五十二人被当地土著居民杀害，十二人幸而逃出，得到清朝官宪的保护。1872年4月，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将此事报告日本政府，7月，琉球当局也向鹿儿岛县作了报告。

掌握鹿儿岛县政的士族及出身于该县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等以报仇为名，主张征讨台湾，由旧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士兵组成的近卫部队也出现了激烈的侵略台湾的论调。但近卫部队的都督西乡隆盛和外务卿副岛种臣等为了遏制近卫士兵及士族们的轻举妄动，就说，在开始进行远征之前，先要采取外交措施，以便防止欧美的干涉和台湾的领有者清朝提出抗议，“然后全靠你们的力量，夺取此地，归为我有，以便永镇皇国之南门。”

首先，政府要求各国公使团承认琉球为日本领土，并得到了同意。美国公使德朗（C·E·de Long）极力支持日本侵略台湾。1872年底，政府根据德朗的推荐，聘请美国退伍将军、原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得（Le Gendre）为外务省顾问，开始进行侵略台湾的准备。在这期间政府封

琉球中山王尚泰为琉球藩主，列入华族（1872年9月），以此向内外表示日本政府已决定琉球为日本领土。但当时还承认琉球王和清朝保持旧有的关系。这时发生了将在后文叙述的征讨朝鲜问题，即征韩论，于是，侵略台湾就推迟了。

征韩论和日清关系

1868年12月14日，内乱刚刚结束，参与木户孝允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意见，继而又和军务官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计划。目的是把内乱后政府难于管理的各藩士兵用于对外扩张方面，从而削弱其势力，以加强天皇政府的权威。在一般的书籍中都记载说，由于朝鲜对日本政府就王政复古一事通知朝鲜并争取友好的国书不作答复，并加以侮辱，因此才出现了征韩论。其实，上述的国书到达釜山附近的对日有关官署时，已经是12月19日，而木户孝允等的征韩计划却出现在这以前。

1869年和1870年，木户孝允等人继续讨论拟订征韩计划。1871年，政府和清朝签订了友好通商

条约，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和被朝鲜看作“上国”的清朝之间签订平等条约，从而说明日本也是高于朝鲜的。

在进行这个条约谈判时，清朝提议清、日两国结成同盟来对抗西洋的侵略，但日本政府没有接受。不用说是日清同盟，就在1870年3月，当英国和法国向清朝挑起新的侵略战争时，参议大久保利通就对辅相岩仓具视说，可向英、法军提供食品、燃料以及日本可能的援助，以此作为“对外表示信义的一例”，而政府就照此执行了。

废藩置县后，岩仓大使等前往欧美期间，政府连续进行改革，解散各藩士族士兵，不重视士族，士族甚为不满，这就出现了近卫部队随时可能爆发叛乱的局面。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企图侵略台湾或朝鲜，作为“把内乱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乃是立国的长远策略”（西乡语）。

征韩论争的意义

1873年5月，朝鲜釜山的地方官发布了取缔日本人走私贸易的布告。征韩论就以布告使用了

侮辱日本的字句为借口，突然强烈起来。西乡隆盛在8月3日寄给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信中说，天皇“早在维新时就已开始考虑朝鲜一事，现已过去五、六年。最初虽谋求与朝鲜友好，但未成功，因此应请制订方略”，现在发生了朝鲜“侮日”一事，天皇之所以“忍耐至此，乃为等待今日之到来”。对此，西乡隆盛力劝三条和板垣派遣问罪使臣前往朝鲜，西乡认为如果派出使臣，朝鲜政府一定加以“残杀”，日本就可伺机向朝鲜派遣远征军；自己还要求充任这种使节，那么他就一定能够诱发战争。可见，西乡隆盛的使节派遣论不是为了通过谈判，和平地建立国交，只不过是为了制造开战的借口。阁议采纳了西乡隆盛的意见，决定西乡为赴韩使节，并得到天皇的同意。

1869年到1871年，木户孝允等策划征韩时，西乡隆盛加以反对，他认为应该迅速整顿内政，外征可以从缓。西乡隆盛现在又为什么如此极力主张征韩呢？这是因为西乡反对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官僚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为“利”弃“义”，保护商人，牺牲士族的

政治。他在废藩之后追求的是建立以士族为中心的军事政权。然而，形势变得日益不利于士族。于是，他要在对外远征中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如果要征韩就能给士族们以活动的条件，回过头来也可以断然进行国内改革。而西乡在以前之所以反对木户等的征韩论，目的也是在于削弱士族的力量。而现在西乡又打算通过自己亲手进行的征韩，来为士族寻求唯一活路。

恰在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陆续回国，他们以应该急于改良内政为理由，强烈反对征韩论，推翻了西乡担任赴韩使节一事，终于迫使征韩派全部辞职（1873年10月）。木户孝允及岩仓具视之所以主张征韩，是为了把政府无法管理的士族转移到外征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就不能不绝对反对为了士族们的活路而征韩了。木户、大久保和西乡等对征韩本身，虽在方式、顺序的缓急上稍有区别，但在根本上没有对立，问题的中心乃是权势之争。5月下旬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拒绝政府要他担任参议，而等待着木户、岩仓等全体使节回国的“秋风白云的时节”。在这以前，他让西乡等人任意发表意见，诱使事态发

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导致“在全盘上决定胜败、或死或活”的决战中，迫使西乡等人和征韩论者同归于尽，无法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侵略台湾和设置冲绳县

从此以后出现了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政府，1874年7月，原来主张内治先于外征的大久保等仍然根据1873年以来的计划进行侵略台湾。这当然引起清朝的强烈抗议。大久保等为处理善后而亲自赴北京，迫使清朝政府承认日本的侵略为“保民的义举”。

日本政府认为，根据这点，可以说清朝也承认琉球为日本的领土了。于是，1875年7月，日本政府命令琉球藩王尚泰进京，并严重警告要和清朝断绝关系。但藩王假借其它理由，不服从命令，暗中请求清朝援助。1879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以武力压服藩王，并宣布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5月，强制地把藩王尚泰带到东京。

吞并琉球，引起了日清之间的尖锐对立。1880年，日清两国暂时达成了妥协，签订了把琉

球列岛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两群岛划为中国领土，以其北部为日本领土的条约。但作为附带条件，还订有清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并答应签订允许在中国国内进行通商的条约，但清朝皇帝未予承认，于是，也没有批准分割琉球的条约。后来，日本继续制造领有琉球全岛的既成事实。

强迫签订日韩友好条规

大久保政权对朝鲜也采取高压姿态。大久保为处理侵略台湾善后赴北京时，英国驻北京公使进行挑拨说，日本的矛头不要指向台湾，而应指向朝鲜，那么英国将给予援助。这样，英国企图利用日本来牵制它在远东的最大敌人俄国。

1875年9月，日本军舰非法闯进朝鲜领海，挑动江华岛炮台开炮，然后以问罪为借口，用武力威胁朝鲜。这样，在1876年2月迫使朝鲜接受《日韩友好条规》（《江华条约》）。《江华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是自主国家……，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这里表明朝鲜不是清朝的附属国，含有不久要把朝鲜作为日本的附属国的

企图。这个标榜日朝平等同权的条约本身，实际上规定了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在附件的贸易章程中暂定朝鲜进口日货免缴关税，而且该条约又未规定有效期限，这是使朝鲜变为附属国的条约。

从属欧美和军国主义

就是这样，政府已把从欧美的压迫中实现民族独立这一课题和侵略邻邦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以讲“信义”的名义附属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这是幕府末期长州藩士的首脑吉田松阴的主张。1855年同美国和俄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吉田松阴在狱中作为“同志一致的意见”，寄给他哥哥的《狱是帐》中说：“在同俄国、美国签订和约以后，不要自己弃义，失信夷狄。要严守规章，加深信义，乘机蓄积国力，夺取容易占领的朝鲜、满洲、中国，这样，在交易上输给俄美的东西，将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取得补偿。”木户孝允等是多么忠实于先师的教导啊！

国家的基本方针如此，所以军事首脑在国政

上必然占有重大的势力。在侵略台湾时，政府尚未确定出兵，军司令西乡从道就擅自出兵，然后迫使政府给予追认。江华岛事件也是海军先于政府而行动，政府加以追认，并利用了它。

不久，军部在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合法化了。首先，1874年陆军省官制规定“陆军卿由将官中任命”，这就明确规定了陆军大臣的武官制。这时军政及军队的统帅仍属太政官（政府）的权限之内，但1878年12月设立了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即独立于政府）而掌管军令和统帅，政府对此完全无权过问。而且，参谋本部决定的部分军令事项规定“交陆军卿执行”。这就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来干涉政府，开辟了道路。

官僚独裁和整理俸禄

以征韩论为契机，从政权内部清洗了士族反对派，所以大久保等在欧美视察中学来的，依靠官僚独裁的“富国强兵”的政策才能毫无顾虑地得到推行。

1873年11月，大久保政权成立之后，发令新

设内务省，于第二年一月成立，在内务大臣的统一指挥下，组织了东京警视厅和全国府县警察网。1875年，警察不仅有原来的司法警察权，还有了行政警察权，并成立了政治警察。

当时创立警察的中心人物川路利良认为，加强帝政，必先加强警察，警察是预防国家发生疾病的手段。他说，希望日本被人称为“警察国家”。而且，他认为人民象幼儿，所以政府的束缚人民，正是保护人民。于是，就制订了从禁止披头散发直到禁止街头便溺，即把人民日常生活细节都放在警察的监视和束缚之下的制度。

内务省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殖产兴业”。原大藏省所管辖的劝业、运输通信、土木、地政的业务都划归内务省管辖，内务省举办普及新商品及生产技术的博览会和向民间企业提供赞助费及补助费。

在重视商人和资本家的同时，对士族则以整理俸禄的手段予以严重打击。废藩后，对华族和士族的俸禄照旧发给，但大藏省强烈主张，如果不废除这种俸禄，国家财政将无法维持。但在西乡派掌握政府实权期间是无法触动俸禄的。1873

年12月，西乡派被迫退出政权，政府便下令对家禄收税、并对自动要求停止支付家禄者，发给公债券，一次付清。但由于要求者很少，所以在1875年，家禄及因王政复古之功所给予的勋赏禄中，用米发放的部分也全部改为货币俸禄。在第二年1876年8月，把所有的俸禄强制改发利息五厘至七厘的公债。

封建领主制首先从废除将军制、接着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到最后的整理俸禄，这样一点一点的，虽有代价，但基本上被消灭了。为了整理俸禄而发行的各种公债总额为一亿七千五百七十九万日元，在1880年前后，仅每年利息就达一千一百六十一万日元（当时政府财政的经常岁收为六千乃至七千万日元）。华族和领取高额俸禄的士族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了地主，或者投资工业成了资本家，但大多数士族持有的少量公债便很快卖掉，并集中到资本家的手中。

官僚独裁也波及到教育。在公布学制的时候，曾说教育为个人立身之本，而且在教育内容上曾经承认市、町、村的自主性，但到这时也要逐渐遭到统制。1873年11月，从欧美回来的木户

孝允教育其后辈伊藤博文说：“建国大法不能不采取专制的，尤其教育和兵制不搞专制是不好办的。”于是，1879年，政府通过《教育令》，完全剥夺了町村对教育的自主性，制订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教育制度。而且在二年后制订的《小学教员心得》中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尊君爱国的意志”。

改革地税

在封建领主制一点一点地解体到整理俸禄的同时，政府又对土地制度本身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即进行地税改革。

天皇政权通过废藩置县，把所有封建领主统治和剥削农民的权利集中到自己手里，然而农民仍按照旧领主时代的制度和习惯，主要交纳实物年贡，而政府将年贡米卖出，换得现款维持财政。由于收成不同而财政收入发生变化，这样就无法编制可行的财政预算。而且，旧藩各地的地税法并不一致，这是违反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则的。而且加上检验土地的手续及因围绕检验

土地和农民之间不断发生的斗争，运输和出售年贡物资的时间和费用等，对政府来说，是极为不利和不便的。总之，在全国统一的国家里，货币经济已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当然无法照旧施行在以实物经济为原则的社会经济的阶段分散到将近三百多家领主的领地内所进行的剥削形态的。对政府来说，土地制度和地稅制度的根本改革乃是势在必行的了。

地稅改革的法令是以自由种植农作物、自由买卖、自由处理土地和国家承认土地私有权（1871—1872年）为前提的，这个法令公布于1873年7月。改革的要点是：（1）旧年贡是以土地的收获量为标准，规定几成为年贡，征收实物。而现在改由政府规定地价，由政府征收地价的百分之三作为地稅，再由镇村征收地稅的三分之一以内作为地方稅。不管收成如何，地稅并无增减；（2）旧年贡是根据每村全部的产量而定，村内拖欠者的年贡也要由五人组（连坐——译者）或者由全村负责交纳，而地稅则向土地所有者个人征收。如本人无法交纳，别人也不负连坐责任；（3）地价在改革后五年，再根据时价加以

改定。

地税改革是和士族反对派被赶出政府，和政府坚决推行整理俸禄同时进行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地税改革意味着领主制的最后解体，因此，如果顾虑士族和华族，就不能进行。地税改革大约在1880年结束。

由于改革地税，能够保证政府征收稳定的税款。但是第一，这绝不意味着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政府在进行改革时，以“不能低于旧有的岁收”为目标而规定税率和地价，所以农民的负担也没能少于过去。

第二，承认人民的土地私有权，这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夺取人民的土地。因为，象山林原野等人民无法证明其私有权的土地，即使事实上是人民长期占有和利用的土地，也都作为国有地而被没收。一村或几村共同所有和利用的入会地^①等也找借口改为国有。而且，一旦定为国有地，那么人民就在那里拿走一根树枝也要立即被判为盗伐

^① 入会地：由一定地区居民共同使用的一定的山林、原野、水面等公地，名为入会地。——译者

官林之罪。

第三，改革后的地稅与封建的年貢一样重，而且在其性质上也残存着封建年貢的因素。因为核定地價是以土地的“收益”为基础的，而其“收益”是指从收获金额中减去种籽、肥料费和税金后的余额，而相当于劳动工资的部分也被包括在土地收益中。因此，以收益为基础而规定的地稅便带有对农民的耕种劳动本身的课稅，即封建年貢的性质。而且，地價是由官吏自上而下决定的，并威胁说，不服从的农民，可视为“朝敌”。这样，依靠专制权力的强制来决定地價，从而决定了地稅。这同征收年貢是凭借领主的非经济性强制来进行是一样的。而每隔五年修改法定地價一次，也是和封建年貢的定免法是一样的。

第四，地稅改革对佃农来说，只是使地主和国家加重了对佃农的剥削。佃农仍和幕藩体制下一样，由地主征收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实物作为佃租。而且，国家用权力保障地主征收佃租，而对佃农的租种权却不给予保障。据估计，当时全国耕地约有三分之一是租种地。

在地税改革中也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承认土地私有、保障自由经营、废除连坐交税制、定额现金地租制，这些是地税改革带有近代性质的一面。而且，后来由于农民斗争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地价终于一次也没有进行修改。1884年（明治十七年），连每隔五年修改地价一次的原则也废除了。这样，形成了实际买卖地价和法定地价的分离。当时，由于米价的上涨和每反产量的增加，地税就比收获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二。这样，地税的封建因素就逐渐消除了。相反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得到扩大，租种地的地税带上了国家索取地主对佃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的性质。

总之，地税改革是牺牲贫农和佃农，保证地主和国家利益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又由于这种改革，政府从农民索取的税金和地主掠夺的佃租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主要资本积累来源。由于交纳现金地税，被卷入货币经济而迅速变得没落的贫农中，出现了为资本主义雇用的工资劳动者。换言之，地税改革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最大的支柱。

扶植资本主义工业

在当时，一切改革都在经济上直接和间接地成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由于废藩置县、全国的政治和行政的统一，成为发展全国性市场的基本条件；职业自由和居住自由，便成为人民变成工资劳动者而离开农村的自由；义务教育也就意味着培养近代工业的劳动者；整理俸禄一方面使多数士族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把封建俸禄改发公债，意味着即将转化为资本。于是，正如上述，地税改革就成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最大的支柱。

政府又在明治初年，继续实行了一系列扶植近代工业的政策。例如，1872年制定国立银行条例，同年铺设东京和横滨之间的铁路，为了增产和改良蚕丝，在群馬县富冈和其他地区设立了国营模范工厂。尤其在内务省成立后，以该省为中心，采取了积极的振兴实业政策。

政府特别着重具有军事、警察意义的产业。政府主要是以剥削农民的税款为基础来建设铁路、

电信、电话，即用于军事和警察的目的要优先于其他产业。政府又接收了横须贺制铁所以及旧幕府和各藩制造武器和造船的工厂，把其中较为优秀的工厂加以扩建，还新建了大阪炮兵工厂和赤羽工作局等大军需工厂。而在一般产业中，开始发展机器制造业，乃是以1890年前后在棉纱生产方面进行机械化为开端，但军舰、大炮、步枪、火药及军服用的纺织品早已在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在外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在国营的机械化大工厂中进行了生产。工业技术首先为了军事目的而展开研究。例如军用步枪早在1880年就把西洋进步的步枪改造成适合日本人体格的、具有日本特点的村田步枪，然而，纺织机器直到1910年仍然依赖进口。

与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浓厚的军事性质的特点相联系，又产生另一个特点，即政府以及和政府具有特别勾结关系的大资本家（政治商人）从一开始就拥有绝对优势的势力，而一般民间产业就不容易进行近代化了。

典型的例子是三菱轮船公司。1874年侵略台湾时，政府为了军事运输，进口了十三艘轮船，

把它免费借给岩崎弥太郎的三菱公司，并向它提供各种名义的补助费，让该公司垄断了军事运输。不仅如此，到战后，政府仍和战时一样继续给予三菱同样的保护。于是，三菱立即压倒了日本国内的所有轮船公司，同时把外国轮船赶出日本近海航线。这种保护不是为了满足当时日本商业贸易的需要，而是为了向海外扩张时运输的方便。而为了便于战时动员起见，就把这个商船队交给了这一政治商人。

除军事工厂外，还建立了上述的富冈缫丝厂那样的国营模范工厂，主要的矿山也改为国营。而这些工厂在完全配齐了新式设备，日本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操作时，就在1880年，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三井和其他政治商人。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就是这样，在官僚独裁统治下，在行政、军事、教育、文化、产业的所有方面都迅速地吸收了西洋近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到1870年代，在一

部分士族中，如“洋灯亡国论”那样对于西洋东西一概拒绝的极端攘夷思想仍很强烈，但它并不影响大局。

明治维新以后，吸收西洋文明，是在继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和紧接着的飞鸟，奈良时期贵族吸收隋唐文明以后，在日本历史上第二次进行了全国性的吸收外国的文明。古代吸收隋唐文明，主要法律制度、生活方式、艺术、佛教等方面，只是为充实统治人民的组织机构、技术和丰富贵族的生活。但吸收近代西洋文明的规模就不仅如此，还包括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点和日本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以弥生式文化为起点向朝鲜和中国吸收文明是相同的。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但是，弥生式文化与其说是“吸收”，不如说是对方向日本的“传播”。而后来的“吸收”，主要也是依赖从外国传来的、或者从国外回来的技术人员或学者、僧侣等及其子孙所传来的。可是，明治的文化，不论资本主义生产，还是以一般国民作为兵士的军队、近代的科学和技术，都是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已有了萌芽，所以，这

些文明的传来是在短期内，而且主要是依靠日本人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这是第二个特点。

吸收西洋文明，“文明开化”成为废藩置县后几年间的流行语，这也影响到群众的风俗。人们取笑说：“敲一下披散短发的头部，就会听见文明开化的声音。”但是，依靠政府的强制，即所谓行政警察的压力就连风俗都可以改变，所以，依靠国家的权力把儿童的义务教育强加给父母身上，而对于反对这些的群众起义，就断然地予以武力镇压。在军事改革上也彻底地破坏了民兵制的萌芽，自上而下地实行强制征兵、建立常备军制。所以，在形式上虽然象是国民军队，但实质上只不过是专制天皇制的军队。总之，一切都是来自上面的近代化，压倒了来自下面的近代化。这是第三个特点。

来自上面的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实现统治者（“上”）的要求。特别是以军事的技术和装备的近代化为中心，正如上述，产业也好，科学技术也好，都是军事优先。医学也是具有军事目的的外科医学首先得到了发展。近代音乐也从军乐开始，近代西洋数学的输入也肇始于陆海军学

校。西洋画法以工部省的大学的制图学为开端。这样的浓厚的军事性质，是第四个特点。

但是，明治维新以来吸收的外国文明，不仅是上述那种为了当权者统治人民和进行剥削的东西，而且也开始吸收了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现实统治的理论和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第五个特点。这种理论和思想，在十五、十六世纪吸收天主教和西洋文明之际，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最初的萌芽。但此后一度遭受摧残，到十八世纪末期以后，又在洋学中重新出现了萌芽因素的新发展。而其最早的，就是自由民权的思想。

二十五 自由民权的斗争

——民主革命和东亚团结的联合

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和社会各阶级

专制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由于它是近代化，也是对封建制度和士族阶级特权的进攻，所以不能不引起士族们的反对。而且在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依靠人民大众来铲除封建制的革命，而是采用新的形式保留了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也受到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对。无条件支持政府的，只有社会地位、身分高的和财产得到保障的华族、以政治商人为首的大商人、资本家和寄生大地主。这些人是明治初期政权最忠实的阶级基础。

一般商人和地主，虽然因为营业的自由或保障了土地私有权而非常满足，但他们对仍旧交

纳苛税，对政府用这些税收周到地保护政商大资本家却抱有不满意。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享受任何权利。他们当中出现了进步的政治领导者。

士族由于遭受征兵制和整理俸禄等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他们的反政府运动，分为进步派和反动派。进步派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要求民主的改革；反动派企图只靠自己的武力打倒政府。

1871年到1874年，由于废藩置县引起地方政治的不稳定，接着由于实行征兵制、强制入学、改革地税所需费用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了反对这些加重的负担，而在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在这四年内，全国爆发九十次起义，其中一万人以上的起义有十一次，而六次集中在1873年。在这一年，群众以反对征兵制和强制入学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起义如海啸一般袭击了由于歉收而米价暴涨的中国、四国和九州。1873年6月，福冈县的嘉麻、穗波二郡起义人数达三十万人，继续了九天，捣毁或烧毁粮店、酒店、高利贷者、村吏（户长、区长）的住宅以及四千家富户，袭击了几十处区村公所和学校，最后拥至

县厅，并将其烧毁。

民选议院论

1873年10月，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在政府内部的征韩论战中，反对征韩的理由之一是，当时日本处于上述那种半动乱状态，是谈不到征讨外国的。在下野的参议当中，西乡隆盛同大部分萨摩出身的近卫队军官一起回到鹿儿岛，并由他们一派管理县政，接着建立称为私立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拒绝将该县的税收上缴中央政府，实际上建立了独立的地方军阀政权。

其他下野的参议们，即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恰好听到从伦敦留学回国的小室信夫和古泽滋关于议会政治的主张，于是在1874年1月向政府提出了实行人民选举、召开议会、按照“公论”实施政治，改变官僚专制，组织“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同时把这一建议书在《日新真事志》的报纸上刊登，用以唤起民众，并组织了爱国公党。该党的纲领站在天赋人权论的立场上，认为天对万民都平等地赋予永

恒的“通义权理”^①，人民不是政府的奴隶，政府乃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只有主张人民的“通义权理”，才是“兴国威、富国民”的唯一道路，才是“爱君爱国”。

这不是人民主权论，这个民选议院是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立法机关，还是政府的咨询机关，连这个内容都不明确。但这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主张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为人民的政府，在视人民的结社为徒党而加以禁止的日本却是第一次公然组织了政党，在这一点上就具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在这时第一次形成了人民爱自己的国家——爱国的概念。“爱国”一语，虽在《日本书纪》中已经出现，但那时把它读作“怀念天皇”，只不过是敬慕天皇而已。

从此以后便开始了是否赞成民选议院的大论战。政府的御用学者加藤弘之等认为，现在人民仍是无学无知，实行民选议院为时尚早。极力反对加藤的是学习法国法学的大井宪太郎的论调。

^① “通义权理”：和“天赋人权”的含义大致相同，即人皆具有平等共通的意义（价值）和权利。——译者

通过双方反复论战，大大加深和扩大了民选议院论。板垣退助和从英国回来的旧部下片冈健吉等人一起，在故乡高知创立“立志社”，根据天赋人权论，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小室信夫也在德岛设立“自助社”。类似这样的团体在各地都陆续建立起来了。

从儒教的“革命”理论 到新的民权理论

青年知识分子亲眼看到倒幕、废藩一个跟着一个的改革，而充满着革新的思想。当时知识分子的教养基础——儒教中，有“易姓革命”^①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幕藩体制下几乎被忽视了，但现在却成为有助于领会西洋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将相本无种”、“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种中国古代史上英雄们的语言，为接受人类平等论，或主张国民为国家的主

^① 易姓革命：反动的儒家吹捧奴隶主贵族“有德之人”，受天之命，废暴君，立新国是“易姓革命”。——译者

人这种近代思想打下了基础。

当然也有的人因读洋书而倾向“自由”、“民权”的理论。中村敬宇所译英国人米尔（J. S. Mill）的名著《自由论》（译本名为《自由之理》），在1872年2月出版，吸引了许多青年。福泽谕吉的以“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为开头语的《劝学篇》一书的第一篇出版在1871年底，据说发行量达二十万部以上。该书不是为了对抗专制政府，才主张民权的，基本上是拥护政府的，但在启发个人人权的自觉方面却具有很大的影响。

至此，在日本历史上终于开始了不是为加强现存的统治，而是为反对政府，并争取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吸收外国的文明。这就是来自下面的近代化反对来自上面的近代化的斗争。

1875年2月，爱国公党以立志社为中心，发展成为联合各地的政治结社的爱国社，并以大阪为据点。要求人民的自由和参政权，即要求自由民权的思想，迅速扩大到知识分子之中，甚至出现了共和制的主张。政府为了压制舆论，在5月发表的诏书中说：“逐步召集全国人民的代表，以

公议舆论来制定律法”，自由民权论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成效。

政治性报纸和革命权的思想

报纸是自由民权论者的最大的武器。报纸的创刊乃是“来自下面的近代化”的最重要的事例。在日本以“新闻”命名的定期报纸是以幕府洋学所发行的《官报巴塔维亚新闻》^①（1862年）以及船夫出身的滨田彦藏因漂流而被美国人营救，在美国住了几年回国后所办的《海外新闻》为开端（1864年）。这些都是木版活字小册子的形式。到1870年明治维新时期，横滨的商人第一次发行了日刊铅印一面版的《横滨每日新闻》。铅字是1869年长崎人本木昌造在日本首次铸造成功，而他的门徒排印了《横滨每日新闻》。接着，1872年创刊了《东京日日新闻》和

^① 《官报巴塔维亚新闻》：巴塔维亚原文为Batavia，现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这一报纸因抄辑爪哇荷兰政厅寄赠的机关报《Javasche Courant》登载的世界各国消息，故名。——译者

《日新真事志》两份日报，而且还发行了《朝野新闻》等报纸。

政府立即察觉到报纸的威力，因而在1873年10月19日（在结束征韩论战的前四天）发布《报纸发行章程》，规定发行报纸要取得政府的批准（原来是申报制），并规定禁止在报上批判法律、政治和不准“妨害”“国事”“政事”。由于《日新真事志》是英国人办的，政府不好镇压，所以关于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就是在该报上登载的。后来各报都不把《报纸发行章程》放在眼里，不断地刊登了反政府的言论。

于是，政府在1875年6月又制定了直接违背5月间发布的逐步成立议会的诏勅精神的《报纸条例》，进一步加强对言论的取缔，并规定给予违反者以体罚和罚款。同时发布了《谗谤律》，对于官员，不论在私事和公事上一概严禁批判。福泽谕吉等在1873年（明治六年）创办的明六社，因为在这两个法律下无法活动，所以解散了。

但是，由于对言论的镇压，反政府各派对政府的攻击就更加激烈了。他们发行了激烈地反政府的《评论新闻》（1875年4月创刊）、《采

风新闻》(同年11月发刊)、《近事评论》(1876年6月发刊)等小册子形式的报纸,出现了几种《颠覆专制政府论》(《评论新闻》第62号,1876年1月伊东孝二投稿)、《必须用鲜血换取自由论》(《湖海新报》第11号,1876年6月植木枝盛所写)等具有人民的反抗权和革命权的主张。在这些论点中,也有反动士族企图把反政府起义活动变为合理化的,但到这时,就连他们也不主张清除国君身边的奸贼之类的封建的大义名分论,而变为企图依靠人民的革命权和抵抗权的理论来使其立场转为合理化了。这真是时代思潮惊人的激烈变化。

伊势暴动和西南战争

前参议中的四个人,虽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上签了名,但除板垣退助外,其余三人只不过是想要反对大久保利通才签名的。特别是江藤新平于1874年2月在故乡佐贺受到反动士族的推举,以攘夷和征韩为名,率领四、五千名士族举兵,但被以大阪镇台的士兵为主力的政府军所

镇压（佐贺之乱）。1876年3月，象征着士族特权的带刀被禁止，8月强行整理俸禄，这时士族的激愤达到了极点。10月，名叫“神风连”的攘夷主义者在熊本掀起暴动，而福冈县秋月的士族与此呼应，山口县士族也在萩（地名）举兵。不久，在全国所有不满现实的士族的总根据地鹿儿岛县的士族也开始不稳。政府认为如果西乡隆盛起事，那么全国二十几县的士族就将与西乡相呼应。

在此期间，随着地税改革事务的进行，全国发生了全体农民包括富农、地主在内的反对强制推行不合理地价的顽强的运动。起初各地都再三向知事陈情和请愿，但这如果没有成效，那么不是忍泣吞声，就要进行起义。1876年5月，和歌山县的两个郡农民起义，11月，茨城县的两个郡农民也举行了大暴动。继而在12月，席卷三重县（伊势）全县的农民起义波及到爱知、岐阜、和歌山三个邻县，成为日本农民起义史上空前的大暴动（伊势暴动）。群众捣毁和烧毁了村镇公所、学校、警察机关以及其他所有带有官家名义的地方，各种账本和文件全被搜出，并予以烧

毁。不久，又袭击了县厅和法院，并焚烧监狱，释放了犯人。

于是，政府动员了该地士族两千人，并派遣名古屋镇台的士兵才镇压下去。

福岛县的伊达和信夫两郡也有发生起义的迹象。政府十分担心，认为似此沸腾的群众如果和西乡一派士族联合起来，势将不可收拾。乃在1877年1月4日，把地税改为地价的二分五厘，其附加税率从三分之一降低到五分之一。这使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他们说“用扎枪扎出了二分五厘”。

反动派士族不但不会联合群众，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统一联合战线都搞不成，这种封建的分散性就是他们的阶级本质，连最富于政治、军事经验的鹿儿岛县士族也未能组织全国性暴动，1877年（明治十年）2月，只有他们自己拥立西乡隆盛举行暴动。这次，连举兵的名堂也没有，只说要声讨政府的侦探企图暗杀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之罪。他们共约四万人，而与此对抗的政府军是从国民中征用的新军队为主力，达六万多人。经过半年激战之后，西乡派被消灭，西乡也自杀身

死（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本身不是反动的，他充分认识到进行资产阶级改良的必要性。但当时他绝对不能抛弃多年来同他生死与共，并曾依靠其力量而打倒幕府的士族大众。他可能认为举行暴动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他宁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敬仰他的士族大众。总之，违背历史发展的，即使是凭着西乡隆盛的威望和萨摩士族的勇猛也是无法逃脱灭亡的。

近卫炮兵的叛乱

西南战争证实了征自国民的军队强于任何勇猛的封建士族的军队。这又意味着，士族作为士族这样一个社会阶层而能够存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打算继续反抗政府，那么不能不和自由民权的运动相结合。而民权运动已开始从只为士族知识阶层所搞的运动中摆脱出来，直接和反对过重地税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了。

在西南战争中，土佐的立志社代表片冈健吉想向天皇呈递猛烈弹劾政府的意见书。这是拥护

上一年的征韩派参议的主张，并要求尊重士族，从士族的立场出发，提出专制政治和征兵令的矛盾，反对政府保护特权政治商人，阻碍民间产业的自由发展以及过于繁重的地税等人民群众的要求，还追究天皇任命的，执行这种压迫和掠夺的大臣的责任。这个意见书被政府退回，片冈健吉等人为向人民呼吁，乃把它印出公开发表。乘此机会，一度因资金困难而停顿了的爱国社又重新建立起来，并于1878年11月，在大阪召开了第一次大会。

当时全国各地正在爆发反对官方所规定的地价的农民运动。又在爱国社召开大会前的8月，发生了近卫炮兵第一大队士兵260余名在士兵三添卯之助和小岛万吉等人的指导下举行兵变的大事件。据政府发表，他们是对西南战争的赏赐发不到下士和兵卒而抱不满，但究竟是为了这些吗？8月23日，三添卯之助等在皇宫附近的竹桥的兵营内杀死了大队长和值班军官，并把大炮拉出营门向大藏卿（财政大臣）的官邸发炮，然后开往赤坂的临时皇宫前面。他们计划和近卫步兵队联合焚烧皇宫，逮捕大臣（卿）们。但由于事

先被政府察觉，未能和步兵队取得联系和合作，叛乱立即被镇压了。当时不仅是近卫部队，就是东京和大阪两镇台的炮兵、熊本镇台的步兵、宇都宫兵营的步兵等也都有了不稳之势。

国会促成同盟

1879年4月，政府设立府县会，企图以此代替民权派所要求的“地方民会”。府县会只能对府县知事提出的预算案等陈述意见，而知事可以不受府县会决议的束缚而执行原案，所以这和“民会”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如此，府县会仍旧成了地方富农和商人们参与民权运动的立足点。除了以士族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立志社一类政治思想团体之外，在府县会内部，在和知事的斗争中，开始成长了富农和富商所指导的民权运动，两者汇合发展为要求设立国会的群众斗争。

在民权派中也包括站在扩张国权的立场的反政府派，即过去的征韩派士族。他们在爱国社第三次大会（1879年11月）上，主张首先修改条约，进行扩大国权的大斗争，但大会主流派认

为，即使为了确立对外的国权，也应把确立国内的民权和开设国会作为当前的课题，压制了国权优先论。

1880年3月，有从岩手到熊本的二府二十二县、代表八万七千多人的114名代表参加了爱国社第四次大会，改名为国会促成同盟，决定向天皇请愿开设国会。

政府不承认人民的请愿权，也拒绝了同盟的请愿。还发布了《集会条例》，不仅把批准和解散政治结社和政治集会的权限交给警察专制，而且还决定“不准因谈论有关政治事项而把其宗旨公之于众，或通过委员、发布文件，诱导群众，以及进行通信往来。”这样，就不能合法地进行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了。

设立国会的运动并未屈服于暴力的压制，而得到了迅速地发展。1880年11月，也就是成立大会开过八个月后，在东京召开了国会促成同盟第二次大会。这次参加的同盟代表超过上次一倍以上。大会回顾了过去的建议和请愿未收任何效果的情况，认为在本来就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国土上，要设立国会就无须向政府请愿，于是决议要

以人民的实力来争取。并决定在下届大会召开时，各地代表都要带来自己拟定的宪法草案。这次大会还商定了抚恤民权斗争的牺牲者。

自由党与改进党的成立

趁这次大会的机会，自由主义各派的代表不仅为了设立国会，而是为了在国政的各方面实现自由民权主义而决定成立政党“自由党”，11月制定了“盟约”。在这个盟约里，只字未提皇室，只主张扩大日本人民的自由和发展权利，推进国家的进步和增加人民的幸福，全国人民的平等国权，树立立宪政体。在这盟约里有了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萌芽。假如这一萌芽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地发展，那么革命的胜利也就不是梦幻了吧。

政府首脑部在暴风般的民权运动的发展面前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说不满分子的运动不足为虑，另外一些人则主张日后等待机会，由天皇颁赐宪法。其中只有大隈重信主张立即制定公布宪法，成立国会。他还秘密地向自己一派的报

纸透露政府将把北海道开拓使的公产，以不适当的廉价出售给萨摩派政治商人，制造攻击政府的舆论。出身于旧肥前藩的大隈重信企图利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占居政府主流的萨摩长州藩阀。

政府主流派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最怕大隈一派和自由党筹备派之间建立统一战线。事实上，在1881年秋就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动向。前一年年底，在决定自由党盟约的各派中，也有大隈一派参加，1881年（明治十四年）10月初，全国所有府县的代表集合于东京，开始协商成立统一的自由主义政党。

政府为了分化他们，摊出最后的王牌。这就是10月12日颁布诏勅，其要旨为“将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开设国会，为了此事，将由天皇制定宪法。如有人对此不满，要求提早，从而扰乱国家安宁者，则依国法惩处。”政府企图以此来满足渐进派和改良派，孤立急进派和革命派，并一举压倒他们。此后，大隈重信马上被赶出政府（明治十四年的政变）。这是根据内阁书记官井上毅的献策。

能够迫使天皇和政府表明期限，约定开设国

会，乃是民权运动的一大成果。但是，这一诏勅却收到政府预期的效果。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始分裂。再加上围绕即将成立的政党的领导权问题，使个人之间的对立或地方派阀的对立（土佐派和反土佐派）纠缠在一起，以致不能成立统一的大政党。于是急进派单独结成了“自由党”，并于10月29日推举板垣退助为总理，宣布正式成立。该党由富农，手工业工场资本家及士族出身的急进的知识分子掌握领导权，而以一般农民为主要基础。其盟约是将前一年自由党盟约的字句略为修改而成的，其中也只字未提皇室，而且完全没有有关侵略性的国权的主张。

九州的自由主义者具有浓厚的国权论思想，加上他们不满自由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土佐派手中，为此，在1882年3月，单独成立了九州改进党。大阪的自由主义者在1882年2月成立了“立宪政党”。该党虽然由于干部的私人关系而和自由党合作，但基本上采取了和下述的改进党同一的立场。

1882年4月，渐进派的主流，以大隈重信为党首，建立了立宪改进党。改进党主张“英国式

的立宪君主制”，认为主权存在于君主和人民合为一体之中。该党以当时和政府主流派关系淡薄的三菱之类的大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城市的商工业者为主要地盘，并由富于西洋教养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一部分富农也参加进来。该党重视“自由”超过“民权”，把谋求“皇室的尊荣和国民的幸福”作为纲领的主要内容。

为了对抗上述各党，还成立了政府御用政党“帝政党”，主张主权在于君主。

民权运动的革命化

此后一年多，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自由民权的政治斗争和反对重税以及地区性群众为实现经济的日常的各种要求的斗争之间的结合，表现在1879年杉田定一领导的福井县七郡农民在改革地税中反对强迫接受官定地价的斗争以及1881年5月植木枝盛非法组织反对提高造酒税的全国酒业会议等方面，而这种结合，从成立自由党以后，更加发展了。府县会成为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场所。

1882年，福岛县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该县县令三岛通庸曾发出“在我辖境内不许有一个自由党员和放火强盗”的豪语，对自由党党员进行了种种迫害，同时大兴土木，因而向县民横征暴敛。自由党员以县议会议长河野广中为首，和三岛通庸的暴政展开斗争，宣传推翻专制政府的思想，并动员群众争取废除赋役和重税。12月，警察逮捕了河野等人，陷害为策谋内乱罪。其后不久，最苦于赋役的三个郡的农民数千人起来暴动（福岛事件）。起义虽立即遭到镇压，但青年自由党员通过这次事件就更加急进起来了。

1882年5月，大和出身的樽井藤吉在长崎县的岛原组织了“东洋社会党”，提出“以平等为宗旨”，“以谋求社会大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等纲领，为达到把土地分配给种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目的，从而组织了农民。结党之后，政府立即下令解散，樽井却若无其事地说：“我们不是听从内务卿命令的人”，并继续开展运动。次年1月，终于被判监禁刑。在东京，1882年9月，自由党员奥宫健之等想组织洋车夫成立“车会党”。这虽然没有发展到开展实际活动的地步，

但在这里却出现了自由党员要把城市无产者组织起来的苗头。

自由民权的思想也传播到军队内部。尽管反对征兵的暴动未再出现，但隐瞒户口，不参加征兵检查，故意损伤身体等群众逃避征兵的行动是严重的。据1881年陆军卿的意见书说：“长崎县的长崎地区，无一人响应征兵的。”被征之后，也有许多逃亡。在这些征自国民的士兵中，传播开自由民权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当时的报纸也曾报导过，在近卫队士兵及仙台的连队下级军官的集会上强调民权论的事例。

妇女也参加运动。土佐的楠濑喜多、京都绸缎庄的女儿岸田俊子（后来的中岛湘烟）、受岸田影响的冈山的下级士族的女儿景山英子（后改姓福田）等是代表性的斗士。特别是景山英子坚持革命，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

鉴于如上形势，1882年12月，岩仓右大臣主张取消府县会，当时他说：“今日的形势与法国革命前夕的形势几乎相同。政府所依靠的，只是一手掌握陆海军，而使人民手无寸铁。但如果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不管是士兵、军官都不敢保

证他们不掉转枪口。”这话不只是由于岩仓的神经质的恐怖和为了制造镇压的借口而夸大其词的。

革命思想和有关 主权问题的论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其思想和理论也发展了。当时各党之间在报纸上积极地展开了有关主权问题的论战，自由民权的理论书陆续出版。自由党主张由国民代表制定宪法，即国约宪法和主权在民。它的理论根据主要是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社会平权论》及作为法国革命思想来源的卢梭（J·J·Rousseau）的《民约论》等，并以英国的共和制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革命作为榜样。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是这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

植木枝盛很早就提倡革命权和反抗权，同时极力反对战争和强调和平主义。在组织上述酒业会议时，就显示了他作为实践家的卓越能力。1881年他所起草的宪法草案中规定主权在民、一

院制议会、无条件保障基本人权以及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的权力。他的宪法草案还规定“皇帝”行使行政权，承认现有天皇为初代皇帝，允许世袭。虽未采取共和制，但这种“皇帝”的地位也要被人民所承认，而不是因为已定为“万世一系”的日本统治者才当上皇帝。

在当时没有主张把共和制作为现实的政治纲领的。但在理论上，共和制是理想的政体，这是已经为民权派广泛承认的。绝对地倾向天皇制，乃是自由民权革命失败以后的事情。

中江兆民是留学法国的学者，有很多著作和译书，特别是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①，并加注释，名为《民约译解》，对革命的民权运动有极大的影响。

中江兆民认为，为了革命的胜利，必须掌握精确的理论和具有以此为为基础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只持过激论调，采取粗暴行动则有害于运动。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说，不问有无君主，“共

① 《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或《社约论》。

和”的本义乃在于人民主权；同时，主张把天皇和一切现实政治分隔开来。但是，据说在他所经营并任教的“法学塾”的学生中盛行废帝论。但他由于嫌恶自由党内含有从封建的立场出发的反政府运动的因素，或者意志不是真正坚定，只是一时陶醉于过激论的人，所以他在组织上和自由党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专门从事理论上的活动。

在民选议院的论战中出了名的大井宪太郎在这时期虽没有写出理论著作，但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自由党左派的有力的领导者。后来，他在狱中的著作《时事要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的问题。

亚洲联合的思想 和世界和平主义

反对本国专制统治的革命的民权家，在对外方面，他们是热烈的民族独立的战士，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国权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沉迷于沙文主

义，而是主张日本、朝鲜、中国等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欧美列强侵略的，反对政府的屈从欧美，并对邻邦采取高压的政策。例如植木枝盛在政治生活上开始觉醒的时候，对1875年江华岛事件，写了反对政府煽动征韩论的评论文章《论竞欲》，寄给《邮递报知新闻》。文章说，东亚各国人民理应如“一家”一样联合起来，对抗欧美的压迫，但作为日本人却提倡征伐朝鲜，这实在是不懂得“一家的存亡”、“一身的生死”的混人或者狂人。

还有，在1876年政府强制琉球藩主完全从属日本、要同清朝断绝往来时，民权派的新闻《近事评论》主张，如果琉球人民要求脱离日本而独立，那就应该允许其独立，公正地对待弱小国家，才是使令日本从欧美压迫中取得独立的道路。1881年4月，政府宣传在琉球问题上日中两国有开战的危险时，《近事评论》和中江兆民主编的《东洋自由新闻》都主张，日中两国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共同反抗欧美的压迫，绝对不应交战。《东洋自由新闻》特意使用“东洋”二字，虽然表示要把自由主义推广

到整个东洋，但这和日本要领导东洋的优越意识是完全无关的。

在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尽管政府发动对外事变，来煽动沙文主义，但民众并未受其迷惑。

1882年（明治十五年），政府劝说朝鲜，为了改革军队，雇用了日本军官。当时，日本的商业资本已经侵入朝鲜，并掠夺了和使用欺诈手段“收购”了黄金、稻米和大豆等。但日本人的违法行为因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朝鲜人民甚为痛恨。加上又发生了上述的军队改革，加深了由于改革而失业的朝鲜兵士的不满，这样，终于在首都汉城发生了士兵和市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及朝鲜本国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的暴动（壬午兵变）。日本乘此进行镇压的机会，从朝鲜索取“赔偿”，并以警卫日本公使馆的名义取得了在汉城驻扎若干军队的权利。

以此事件为开端，以朝鲜宗主国自居的清朝加强了对朝鲜的军事和政治的干与。于是，日本政府开始了加速扩充军备的步伐，并煽动以清朝为敌的战争热潮，开始拚命宣传沙文主义。但是，民权派不论是自由党还是改进党，对这种宣

传都丝毫没有采取同一步调，反而强烈地批判了政府。例如改进党的最高干部小野梓在壬午兵变后不久，写了《外交论》，主张不应从朝鲜勒索赔偿，为了摆脱西洋的侵略，保卫东洋，应谋求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团结合作。朝鲜是否从清朝那里完全独立或者维持现状，乃是朝鲜自己的问题，日本不应加以干涉，重要的是谋求三国的团结和东洋的和平（反对西洋的侵略）。

不仅著名的理论家有了上述的觉悟，而且有人向《中外评论》第160号（1876年9月）投稿说：“应在宇宙内设一大的政府”，为了和平地解决列国之间的争端，并为了援助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而提倡设置国际机构。与此相同的主张，后来由植木枝盛和板垣退助发展为《通俗无上政法论》（1883年发行）。这部书主张，不用说亚洲和非洲的被压迫民族，还要完全解放波兰和爱尔兰等欧洲的被压迫民族。为了保障世界永久和平，要确立各国各民族的独立主权，并主张设立这些国家站在平等同权的立场进行协议的“万国共议政府”。

另外，后来（1887年）中江兆民写出了《三

醉人经纶问答》, 当时正处在民权运动衰退期, 那部书采取了为了对抗西欧列强, 而侵略中国, 使日本成为大帝国的“豪杰”和主张理想的民主共和制的“绅士”展开争论, 并由“南海先生”对此加以评论的形式, 探求了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形势来决定现实的民权运动的路线。中江兆民在这里也否定了领土扩张主义, 主张同中国进行文化和经济的友好合作, 并首次向日本介绍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提倡以各国各民族的彻底的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

这并不是说整个自由党都变成这样, 而在该党的干部中, 也有不少是为扩张国权而梦想征服亚洲的“豪杰”。但尽管是少数, 在这里第一次产生了国内的民主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 特别是作为日本的邻邦朝鲜、中国之间的联合和世界和平的思想统一起来的理论及思想, 这乃是日本思想史上最关重要的事情。

二十六 民权运动的挫折

——起义·统一战线·失败

自由、改进两党的对立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使岩仓具视联想到类似法国革命前夜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这时也孕育着运动将遭致失败的各种因素。第一，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和付总理后藤象二郎等最高领导人在党员们的急进化面前慌张起来，开始策划同政府妥协。

板垣退助是一个天真的理想家。他从1868年内乱的经验出发，深信除了依靠公众舆论的政治来谋求国民上下的团结一致以外，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一直为此而奋斗。但是，由于他是出身于土佐藩的上层武士，对政治问题总是只能站在统治人民的立场进行考虑。他的自由民权立

场不能超过尊重民意，服从民意的政治及消除上下的差距。人民主权的革命理论，对他来说，恐怕是不能真正理解的。从他的这种立场来说，如果发布开设国会的诏勅，就基本上可以得到了满足，再进一步提出国约宪法的要求，他也是可以赞成的；但不惜以暴力革命来实现要求的这种党员的革命化，对板垣退助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

后藤象二郎是一个大谋士，又是幕府末期以土佐藩参政身分，策划幕府将军奉还大政的人物。后藤自负，在王政复古方面所立功劳绝不逊于萨摩长州的领导人，但在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由于萨长藩阀得势，他就逐渐与政府疏远，而和板垣的运动进行合作，但他对民主革命的理解却不如板垣。

政府看到后藤象二郎这种情况，就拉拢他，企图让他和板垣两人到欧洲旅行。后藤接受了这一劝说，并说服板垣决定出国。这是1882年夏天的事情，党的总理和付总理在自由民权运动处于最紧急关头时出国外游，等于脱离战线，而且，旅游费用的来路不明，有被政府收买的嫌疑，于是，自由党机关报编辑部长马场辰猪等猛烈反对

板垣退助旅行欧洲。板垣解释说，旅游费用是出自大和的富豪。但实际上他也陷入了后藤的圈套。板垣是什么也不了解的。实际上，外务卿（大臣）井上馨很早就同三井关系密切，为替三井从政府中谋取权利，以让三井负担板垣和后藤的旅游费用作代价。

11月，板垣退助不顾优秀党员们的反对而动身外游。马场辰猪等人愤而脱党。《自由新闻》的名义上的主笔中江兆民也在年底和自由党断绝了关系。继任马场等人的工作，从大阪的立宪政党请来了古泽滋，而古泽当时已和井上馨有了勾结。

第二是，自由、改进两党的对立激化了。政府暗中唆使改进党攻击板垣的欧洲旅行是被政府收买了的。于是，自由党以古泽滋和星亨为首，揭露了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从大藏卿时代就勾结三菱，并把三菱比作传说上的海中的怪物。还说改进党是和政府同谋的假自由主义政党，展开了“打倒海中妖怪”、“扑灭伪党”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植木枝盛也极力与此合作，植木枝盛展开了最尖锐的革命的理论斗争，但在实践上总是作为板垣退助的亲信而活动。

自由、改进两党，虽有急进和渐进，革命的和改良的差别，但在反对藩阀专制政府、提早设立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制等当前的行动方面理应完全一致地合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一致合作，自由民权运动就不能前进。但两党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展开了极为剧烈的、不光彩的对立斗争，这正是政府所期待的。

通货紧缩政策和中小农民的没落

第三是，当时农村进行着激剧的阶级分化，城市中的大资本家和地方手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害对立也尖锐起来。这是由于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转变所引起的。明治政府从其成立以来到1880年，一贯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滥发不兑换纸币攫取民富。但是，地税改革完成后，占居政府经常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税改为缴纳固定现金，因而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币值跌价也对政府不利。而且，连年的通货膨胀促使利率急剧提高，就使处理俸禄的公债跌价，这也不利于大量占有公债的华族、政商、银行，还阻碍了对产业的投资。

于是，政府从大隈重信信任大藏大臣的1880年起，逐渐改变政策。为了节约政府的开支，本来应由中央政府支出的监狱费及工程费改由府县负担，为此，给予府县以征收府县税的权力。而且将军事工厂以外的官办工厂和矿山相继卖给三井及其他政商。目的是为了紧缩政府的财政，节约支出，同时也是为了援助政商转化为产业资本。

大隈重信被排挤出政府后，继任财政大臣的松方正义，比以前更加积极地着手整理不兑换纸币，强行通货紧缩政策，并把间接税及地方税一举提高一倍以上，还大幅度增加了其他税额。1882年下半年开始见到效果，整顿货币，增加现金准备，一般利息降低了。于是公债价值上涨，使它变为稳定财产，而华族和政商能够将其公债作为资本而兴办公司企业。这样，大商业资本开始转变为产业资本。

另一方面，农民和小商工业者却陷入了经济萧条的境地。从1882年到1885年，粮米和蚕茧等农产品价格连年暴落。小规模的手工缫丝业、丝织品、棉织品的工场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农村工业全面衰退。再加上无情地攫取的税额连年不断。

增加。

小农迅速没落，这是无法避免的。1883年因为拖欠税款而受土地被拍卖处分的，达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五人，1884年超过七万人，到1885年竟达十万八千零五十五人。要想免受拍卖处分，除借高利贷外，别无办法。在1884年把耕地作为抵押的全国负债总额，已达二亿日元，这相当于当年政府经常岁收的二倍半。即使以年率百分之五十的高利借款能够交上税金，从而可以避免土地的扣押和拍卖，但由于无法还清债务，多半是最后不得不把土地押死，无力赎回。

小农被迫拍卖或押死的土地都集中到高利贷和大地主的手中。中农和小农的没落，部分人成为佃农、部分人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大地主和高利贷集中土地，成为寄生地主，这样的农民的阶级分化变得剧烈了。

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 和自由党解散

经济体制的变化，在政治上给自由民权运动

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农民及小商品生产者陷入了这种状态，即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除和大地主、高利贷以及政府展开斗争以外就没有活路。自由党中的急进派和正在发动起义的小农大众结合起来，更加变得急进了。特别是以养蚕、缂丝为中心的，在通货膨胀时期繁荣的关东和东北中部的农民，因为通货紧缩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在1883年到1884年，关东各地相继出现了名为借款党、困民党或者佃农党、贫民党等组织。他们以集体力量和大地主、高利贷者进行延期还债、减轻利息、减免地租等谈判，还要求村公所和县厅废除或减轻租税和各种捐税。急进派的自由党员和他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开始计划在关东全境，或者联系关东和东北发动大规模起义。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党中央和地方干部基础的部分地主、富农、小资本家们却把无法生活的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成为寄生地主，而和群众对立；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本身遭受深刻的经济萧条，一筹莫展，而顾不上政治运动。这些人不能不把全部精力用在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营业等，于是失去了同政府、警察日益严重的镇压进

行抵抗，坚持民权运动的力量。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自由党中央。党的领导干部同党员群众的急进化恰好相反，而愈加趋向机会主义。

急进派孤立起来了。他们处于和幕府末期急进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一样的慷慨悲歌的境地，他们没有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只在各地分别举行起义。

最初在1884年5月，群馬县的自由党员动员自耕农、佃农和贫民企图袭击并生俘参加中山道铁路通车典礼而集中在高崎的政府高级官员，实行革命。政府发觉这种情况后，停止举行通车典礼，已集合的三千民众乃捣毁了高利贷公司，占领了松井田警察分署，还想进攻高崎兵营。但本来就没有作好准备，中途因粮尽而分散了。领导人日比逊等被捕，以强盗、放火、杀人、聚众闹事等罪名，判处他们十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接着，同年九月，发生了茨城县下馆的富松正安和福岛县的河野广躰等人的加波山事件。因为福岛事件的镇压者三岛通庸兼任栃木县知事，所以河野广躰等乃计划乘栃木县厅建筑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一举杀死前来参加典礼的三岛与其

他高官，以此为福岛事件报仇。但他们在准备期间，为了筹划资金在东京进行了抢劫行动，遭受官宪的追究，而且富松正安等人制造炸弹也未成功。他们实在无可奈何，仅有十六人固守在茨城县的加波山，称为革命军。他们同群众丝毫没有联系，只靠自己的力量袭击了山下的警察分署，但山上饮水发生困难，第三天就被警察逮捕了。富松正安等七人被处死刑，河野广躰等七人被处无期徒刑，其他七人被处有期徒刑。由于发动民权运动而被处死，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板垣退助总理等自由党领导人已经在考虑解散该党，又因群马、加波山等地相继发生党员起义而惊惶失措，于是，在10月大会时，解散了自由党。理由是因为政府残酷镇压，无法展开自由活动云云。

秩父事件和饭田事件

自由党干部虽然可耻地、背叛地解散了党，但革命的党员和民众的斗争仍然在继续。在党解散不久，11月1日，秩父地方的借款党和困民党

一万人，在自由党员的领导下提出分四十年偿还借款，停办学校，杂税和村费减轻一半，修改征兵令，暂停征收地租等要求，发动了起义。他们以秩父的没落贫民田代荣助为总理，以该地方的自由党员加藤织平为副总理，组织了整齐的部队，制定军纪，捣毁高利贷和大地主的住宅，焚毁借款字据和地契，二日早晨占领了秩父的警察署、区法院和该郡办事处。

他们还计划捣毁前桥监狱，解救群马事件的同志，袭击高崎兵营，攻入东京。但第三天政府的镇压军迫近秩父，第四天群众部队的主力被击溃。部分民众进入群马县，其他进入长野县的佐久地方，与当地民众一道捣毁了钱铺和高利贷业，但到10月，全部遭到镇压。田代荣助和加藤织平被捕处死。

继而在长野县下伊那郡饭田町组织了名为“爱国正理社”的自由主义团体的桜井平吉，名古屋“公道协会”的村松爱藏、八木重治等正在准备大规模起义时遭到逮捕（饭田事件）。他们计划从信州到甲州，带领三千名甲府贫民党一起进入八王子，在那里与全国的同志汇合，然后在

东京上野向全国宣布自由革命，他们准备了写有“爱国义党”、“自由革命”、“天诛”字样的大队旗和写有“减轻租税”、“修改征兵令”、“废除印花税”、“救济贫民”等字样的分队旗。

他们的计划虽然是宏伟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和“全国的同志”，就同“甲府贫民党”也没有建立组织上的联系。由于当时信州、甲州的农民处于将要发动起义的形势之下，而三河、远江正在发生农民起义，特别由于秩父事件的影响，人心跃跃欲试，所以他们的期望是，如果自己一举兵，这些群众就会一呼百应，汇合成为一支力量。

饭田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八木重治在名古屋连队入伍充当卫生兵时，据他说当时已经争取了二百多名的士兵同志。八木没有把军队内的组织活动坚持到底，将后事委托给福住大宣而离开了军队。如果他们坚持到底不遭逮捕，而军队内的组织也得到巩固，那么就可能发展成为比秩父事件更高一级的革命内乱。村松爱藏是在外国语学校学过俄语的知识分子，他似乎是受过俄国民粹派革命思想的影响的。

此外，还有1884年秋，名古屋的奥宫健之等的起义计划。1886年7月，静冈县自由党员中野二郎三郎等的由举兵计划进一步转变为趁箱根离宫落成典礼的机会一举杀光参加集会的各大臣的计划。但这些计划都因事先被警宪察觉而遭流产。

各起义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在上述各事件中，加波山、名古屋、静冈，都是没有与大众相结合的，属于幕府末期志士的“天诛”之类的恐怖主义。这三个事件都犯有为了筹划资金而进行抢劫的严重的错误。

群马、秩父、饭田三个事件是以贫雇农、早期无产者为主力，由中农或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民权革命家进行领导的。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任何农民起义和社会改革活动，而是明确地提出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政治起义的萌芽，秩父事件比群马事件、饭田事件又比秩父事件，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前进了一步。这些事件都在进攻起义地点附近的政府机关以前，具有一定程度的具体计划和准备，但在此以后，却完全停留在幻想一旦举起

义旗，四方同志和民众便会立即响应这种期望之中。这样，在全国性统一指挥部门解散后，以贫雇农为基础的起义就终于无法克服农民的地方主义的局限性。

然而，统治者方面却具备高度中央集权化的统治机构和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它的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可以通过电报通讯立即进行联系，交通、运输路线也完全由政府掌管。相反的，连象样的武器也没有的民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动的地方性的、分散的起义就容易被镇压，甚至在准备阶段遭到破坏，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民权运动的衰退和朝鲜“改革”运动

自由党解散后，改进党内也发生了解党论。党首大隈重信和副党首河野敏镰等最高首脑人物脱离政党，这样，党的活动停止了，只留下个空架子。在自由党解散之前，大阪的立宪政党已经解散了，九州改进党在不久之后也解散了。到1884年底，主张自由和民权的政党几乎一个也不存在了。

正在这时，12月4日，朝鲜首都汉城，国政改革派的金玉均等得到日本公使的“援助”发动了政变，由日本军队保护，占领了王宫，夺取了依靠清朝的王妃闵氏一派的政权。闵氏等依靠清朝军队立即反击，打退了日本军队，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公使竹添进一郎好不容易逃到仁川（甲申之变）。

政府立即派外务大臣井上馨带领两个大队（营级——译者）的兵力急忙赶到汉城，第二年1885年1月，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由朝鲜政府道歉、赔偿损失、提供建设日本公使馆和兵营的土地和资金等的条约。

此后在汉城的日清两军仍处于对峙状态，但由于清军的慎重和日本政府方面也有伊藤博文等人认为日本国内尚未具备能够进行战争的体制，于是压制了军部的开战论，并亲自充任全权代表前往天津，商定了：（1）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退；（2）两国都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3）今后如果出兵朝鲜应互相通知（《天津条约》）。其中第三项也是日清两国忽视朝鲜主权，相互承认可以肆意向朝鲜出兵，所以进一步

强化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这时，旧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也都完全成为政府和军部煽动的沙文主义的俘虏。高知地方，以板垣退助和片冈健吉为先锋，编成了一千人的“义勇军”。政府对此采取放任态度。板垣退助在自由党解散之前已和后藤象二郎一起，策谋从法国借用军舰和资金，“援助”金玉均，在朝鲜发动内乱。那种企图可能是为了转移急进党员的视线。

改进党的尾崎行雄等“好象被开战论弄得神魂颠倒了似的”，连大隈重信也无法对付。而且小野梓在壬午之变的时候是极力主张日、朝、清的团结和平的，而这时他也放弃了国内的民主改革运动，立即主张朝鲜脱离清朝，为此不惜和清朝进行一战。另外，由大隈创立，由小野主持的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在甲申之变时，为征讨清朝举行了激烈的游行。

自由党左派的领导人大井宪太郎也计划“朝鲜改革”。在板垣和后藤进行上述计划时，担任他们和法国公使之间的联系、翻译的小林樟雄，在甲申之变后，建议大井宪太郎不要依靠法国的

援助，只依靠日本人进行“朝鲜改革”，这就产生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进入朝鲜，暗杀保守派的高官，让独立派（亲日派）掌握政权，使朝鲜脱离清朝，进行民主改革，其结果也可成为日本本身“改良”的开端。

但大井宪太郎说：首先是使朝鲜脱离清朝，“受法国的保护，维持独立”，而绝不是让朝鲜脱离所有的外国，获得完全独立；第二是他敌视清朝，幻想利用朝鲜问题，策划使俄国和清朝交战；第三，日本人民毫无“爱国心”，“顽固之极”，因而日本是无法进步的，所以制造“外患”，即日清间的对立，“给社会以活动力量”。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愚弄人民，依靠“外患”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这种“爱国心”除沙文主义以外，再不会是什么其他东西，因而也根本无法进行专制政府的民主化和“改革”。景山英子也因参加这个计划，而被监禁。后来景山英子认为这是犯了帝国主义性质的错误而作了自我批评。大井宪太郎等未去朝鲜，就在长崎和大阪被捕，因此称为大阪事件。

无论是自由党、改进党、急进派和渐进派都

放弃了国内的民主化斗争，而脱离了人民群众，同时也放弃了东亚合作论而陷入沙文主义和国权主义。

皇室、华族、内阁、教育的革新

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谋略、收买、强权和武力镇压等等手段来镇压民主革命，引导人民走向沙文主义，同时，为了在设立议会以后仍能维持天皇制专制起见，而忙于加强统治体制，如法定皇室财产、修改华族制度、建立内阁制度、修改教育制度等。

1882年2月，岩仓具视向政府提议，在成立议会后，即使在议会否决国家预算案的情况下，仍能使政府养活官吏、加强军备的财源不发生困难，就必须把日本国有财富的一半作为天皇所有。这是最早提出有关天皇财产问题。从这一年年年底到1890年成立议会为止，在国有地内，把像木曾等地的经济价值最高的山林以及原野、牧场等约三百六十五万町步作为天皇所有，并将政府在日本银行（1882年10月设立，唯一具有发行兑

换纸币权的中央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外汇汇兑银行)、日本邮船公司以及其他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公司和银行中拥有的八百六十万日元的股票拨为天皇所有。

天皇拥有山林,不仅作为财产有其稳定性,而且根据治山者能治水,治水者能治国的农业社会的观念,有让天皇控制水源的意图。而天皇占有股票,除了作为财产的稳定性以外,还同样地企图把天皇形成控制日本资本主义命脉的超级的、最大的股东。这样,天皇就成为日本最大的超级大地主和超级大资本家了。

新的华族制度制定于1884年。原来的华族乃是对旧公卿、大名和其子孙的身分称号,新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旧华族则根据门第的高低,王政复古以来的“功臣”则根据其功勋而获得爵位的称为华族。其身分是世袭的,并按照爵位的高低领有定额财产作为“华族世袭的财产”,并在法律上规定不准扣押,给予特别照顾。新华族制度的目的是:(1)在成立议会时,为了对抗国民选举的众议院而做好组织贵族院的准备;(2)把最高级的官僚军人作

为贵族，并抬高他们对国民的权威；（3）从而用新旧贵族来组成把天皇从人民那里隔离开、并加以保护的“屏障”。

1885年12月，废除了原来的太政官制，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即由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织直属于天皇的内阁，由大臣分担行政各部门。彻底进行了国家机构的官僚制度化，并把权力集中到内阁。这时，把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省从进行国政的内阁中划分出来（与皇室财产和国有财产的分离相适应）。而且在内阁中设置了不属于宫内省的“内大臣”，掌管国家的印章和天皇的御玺，平时负责辅佐天皇。总之，天皇是在有了内大臣的建议后才盖用御玺，这也是为了一旦政府受议会控制时，仍能维持天皇及其官僚专制机构。

1886年，整套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系统地灌输了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为此，特地在培养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里，把军事教练作为正课，实行全体学生住校制度，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于是，打开了也可以从中产阶级以下的子弟中挑选优秀分子进入师范学校，从而上

升为从精神上统治人民的机构的成员的道路。另外，《大学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和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的机构。官立学校在各方面得到侧重，私立学校受政府的统制，自由的教育受压制，得不到任何特权。

接着，在1887年，制定了《文官任用令》，规定了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制度，特别是规定了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生可以免试任高等官。这是天皇制把民间的人材吸收到统治者方面的巧妙的安排。

在这时期也进行了制定宪法的准备。1881年发出设立国会的诏勅时，政府已经得到内阁顾问德国学者勒斯勒尔（H·Roesler）的指导，定出了天皇主权、防止政党内阁、统帅权的独立以及在后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得到具体化的基本原则。加上从1882年3月起一年半之间，伊藤博文等人赴欧洲，向和勒斯勒尔站在同样立场的德国人格奈斯特（R·von Gneist）和施泰因（L·von Stein）详细地学到了把天皇独裁披上立宪外衣的方法。例如，宪法虽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事实上为了使神道作为国教，乃规定神

道不在宗教范围以内，还说皇室和国家的大典以及国家的节日都宜采取神道的仪式。1886年夏，在上述各种改革完成后，伊藤博文就委任井上毅等人开始草拟宪法草案。

反对井上外相修改条约的斗争

从政府来看，自从镇压民权运动到这时为止，可以认为是天下太平了。但是，由于修改条约的问题，反政府运动再次如海啸一样地高涨起来。在岩仓具视大使等修改条约的交涉遭到失败后，1876年，寺岛宗则担任外相时，为了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各国进行了交涉，但毫无效果。后来虽连续发生了外国人走私进口鸦片以及在霍乱病流行时外国船不遵守日本检疫规则等事件，但由于治外法权，日本方面对这些无权惩处，所以在国民中恢复法权先于恢复税权的呼声高涨起来。1879年，井上馨继寺岛宗则担任外相，他和驻东京的各国公使开始进行了以恢复法权为主要目的的修改条约的交涉。经过几年交涉的结果，1887年春达成协议，只待签字。修改的要点如下：

(1) 在修改条约实现后五年，全部废除治外法权。(2) 代价是承认外国人同日本人一样在日本国内有旅行、居住、营业、占有不动产的权利(国内开放)。(3) 日本司法机关聘任外国法官，有关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法官占居多数的法庭进行审判。(4) 在废除治外法权前，按照欧美的法理，制定日本的法律，并用英文通知外国，经过外国审查再予实行。

这只是在名义上废除治外法权，实际上不仅把日本的司法权置于外国统治之下，而且根据第四项，连立法权也要受外国的干涉。在这种条件下，井上外相开放国内，乃是企图输入外国资本。这是因为井上馨背后的三井等大政治商人企图勾结外国资本，以便牟取巨额利润的缘故。

在这时期，政府为了修改条约，让日本成为欧美式的文明国家，于是在东京建筑了称为鹿鸣馆的西洋式楼房，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政府高级官员、华族、政商以及各国的外交官员和商人等在那里经常举行西洋式的舞会，从上层阶级风俗的欧化到“改良国语”、“改良戏剧”等文化的各个领域都采取了“欧化”政策。这是献媚外国

人的，是对欧洲文明表面上的极为低级的模仿，这不过是日本文化的殖民地化而已。其反作用，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国粹主义者，批判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

这时，上述修改条约的方案已经传到人民中间。1887年5月，政府部门的内阁法律顾问布瓦松纳德^①（G·E·Boissonade，法国人）认为这一方案是比现行条约更严重地侵犯日本主权的亡国条约，本人作为外国人，难以理解日本高级官员如此地没有爱国心，并强烈劝告政府废弃该项方案。这时国权、国粹主义的农商务大臣谷干城从欧洲回国，强烈反对井上方案。他还攻击秘密专制外交，主张废除警察专制和进行内政的根本性的改革，和伊藤博文首相等发生全面冲突，谷干城终于不得不辞职。统治阶级内部的国权主义者立即对谷干城表示同情。这时修改方案也被民间所知，右的国粹主义者和左的自由民权派都开始

^① 布瓦松纳德：（1825—1910），1873年到日本任行政审判所、外务省、内务省等机关的顾问，起草了日本民法和刑法。1876年，发生台湾事件后，曾随大久保利通来我国进行侵略活动。——译者

猛烈攻击政府。伊藤首相和井上外相也无法抗拒这种趋势，7月末终于停止了修改条约的交涉。

民权运动的最后光辉

在粉碎亡国条约案获得巨大胜利的鼓舞下，自由民权派又苏醒过来了。8月12日，板垣退助利用伯爵的特权，向天皇呈递了长篇意见书。其要旨如下：

为了签订真正的平等条约，必须尽快制定“国约宪法”（民定宪法），停止专制政治。现在的陆军不是为了国防，而是镇压国民的反政府运动的工具，所以应减少到二、三万人。国防以海军为主，陆军不设常备军，依靠国民的爱国心，采取民兵制就可以了。停止重税，减轻人民的负担，是最大的紧急任务。另外，政府偏重官立学校，对私立学校加以统制，妨碍人民自由的现象是可怕的值得深思熟虑的事。必须立即确立教育的自由。要废除违反四民平等的华族制度。板垣意见书提出了以上各点和其他革命要求。它具有复兴民权运动的纲领性的意义。

板垣退助和谷干城的意见书，经星亨等人之手秘密出版，传布全国。旧自由党的“壮士”（青年的政治活动家）和“书生”（学生、主要是地方私塾的学生）纷纷集聚于东京，在各地也举行集会，要求国约宪法和平等条约。

9月，政府终于罢免井上外相。同时，伊藤首相召集地方长官会议，训令他们坚决拒绝民定宪法和外交应由人民公议的要求。另外，又召集全国高等法院检察长和镇台司令官，分别由大臣给以同样的训示。这样，政府作好了准备对付内乱的体制。

10月，高知县居民代表片冈健吉等向政府提交了植木枝盛等所起草的要求“言论自由”、“减轻地税”、“挽回外交权力”等三件大事的建议书。所谓“言论自由”，不外是主张民定宪法的自由。而且，“挽回外交权力”只不过是主张雪除对欧美的屈辱，所以对朝鲜和清朝的强硬政策只字未提。当他们想要认真地争取国内的民主改革或者革命时，侵略性的国权主义就隐藏起来了。上述三项要求，实际上成了全国民主势力的共同纲领。据说，12月，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千余

名壮士集会于东京，其中甚至有人准备了炸弹。

中江兆民也是在这个时候以实际的领导者身分出现的。另外，和本国相呼应，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和做工的日本青年中间也发生了民主革命的运动，他们的代表们陆续回到日本，但不久就都被逮捕了。其中有后来和景山英子结婚的福田友作。

12月25日夜，政府突然颁布并施行保安条例^①。从当夜到次日清晨，生于高知县等二十四个府县的数百人被驱逐出远离皇宫三日里之外的地方。片冈健吉不服驱逐出境的命令而被捕入狱。片冈的同志安芸喜代香等要向首相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当场被捕入狱。他们的意见书上写道：“国家面临灭亡之际，不忍袖手旁观，宁愿做法律的罪人，也不退而作亡国之民。”

这是全国性自由民权革命斗争火炬的最后的

^① 保安条例：1887年12月，伊藤博文内阁为了镇压民权运动而发布的反动法令。该条例禁止秘密结社与集会以及携带、搬运和贩卖武器，并规定有阴谋内乱、教唆阴谋内乱或妨碍治安嫌疑的人，禁止在距皇宫或行宫三日里以内的地方活动、寄宿、居住，违者严惩。这一条例于1898年废止。——译者

光辉。此后自由民权运动就未能再起。第二年，后藤象二郎提倡不问旧自由党还是改进党，都要实现自由主义各种势力的“大同团结”，并得到舆论的热烈支持，但这已经不仅不是革命的民主运动，甚至连改良也不是，而只是各地在野政治家为了两年后大选的预备活动而已。而且，后藤象二郎一受到政府的推荐，就满不在乎地当上了政府邮电大臣（1889年3月）。就是这样，理应是反对专制政府的“大同团结”，却被专制政府和野心家的“大同团结”所利用！另外，大隈重信也在一年多以前的1888年2月，继井上馨之后担任外相，改进党就成为政府的准执政党了。

自由民权的革命终于没有成功。但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一斗争在日本的历史上第一次向国民推广了民权和革命的思想，并指明了结成政党争取民权的道路。而且尽管是假的，但却迫使专制政治制定了称为宪法的东西，其中虽然遭受很大范围的限制，但却规定了国民的参政权和基本的人权。在经济方面，民权运动实现了法定地价和买卖地价的完全分开，从而创造了消灭地租的封建性质的条件。对外方面，民权运动粉碎了

井上外相“修改”条约的大事，对民族主权的完全独立，有了重大的前进，而且使日本人第一次产生了同亚洲被压迫民族合作的思想萌芽。民权运动又给革命运动留下了和平的道路，武装起义、统一战线等丰富的经验。在这些方面，直到现代仍然存在着自由民权运动的闪耀光芒的历史意义。

二十七 天皇制的完成

——古代和近代的结合及其矛盾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公布

以保安条例这一手段而扼杀了自由民权派的再次进攻之后，1888年4月，伊藤首相等人基本上结束了起草宪法草案的工作。继而，设置了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伊藤博文亲自担任首任议长，十二名所谓“元勋干练之士”，即资历最老的官僚政治家们担任了顾问官。这些人和内阁大臣们在天皇临席之下，召开了枢密院会议，审查宪法草案。对宪法草案进行若干修改后，确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民定宪法终于未能实现，钦定宪法却以天皇“御赐”而强加于“臣民”。

这一宪法说：“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第一条），又说：“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下略，第四条），这就规定了天皇是唯一的统治者。宪法规定内阁为行政府，帝国议会为立法府，裁判所（法院——译者）为司法府，但这些机构只不过是辅助天皇统治的专业机关。国民是由天皇统治的“臣民”，所以这些机构只是协助天皇的统治而已。

内阁（政府）由天皇帝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在法律上只对天皇负责。天皇的大权除统帅军队外，其他完全由政府的“辅弼”（帮助）来执行，政府实际是用天皇的名义的专制政府。文武官员也由天皇帝任命，根据官员服务纪律，只对天皇以及天皇政府负忠诚的义务。

在统帅军队方面，不准政府和议会进行干涉，辅助天皇统帅权的参谋本部等军令机关，直属天皇，不受政府的管辖。

帝国议会只是审议通过政府提出的国家预算案和政府或议员提出的法律案的机构，它不仅对统帅军队，就连任免大臣和文武官员、同外国缔结条约、宣战、讲和等也都不能进行干预。

预算案的提出权属于政府，议会只有审议权。而且，在宪法上，根据天皇大权的既定经费以及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在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的经费（如文武官员的薪俸等）不经政府同意，议会无权削减。立法权也是如此，议会只是审议通过法案，议会通过的法案，经过天皇批准（实际上是由政府同意）才能成为法律。天皇具有批准和否决的绝对权限。而且，天皇（实际上是政府）可以不以“法律”名义，而以“敕令”的形式，不经议会而制定法律。议会的召开、休会、闭会和解散众议院，只有天皇有权进行。

帝国议会分为皇族议员、华族议员、天皇指派的敕选议员以及交纳一定数额以上的直接国税的富豪（高额纳税者）的互选议员所组成的贵族院和从“臣民”中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所组成的众议院的两院，而两院除了众议院有预算先议权外，其他则是完全对等的。这种议会，在本质上和西方绝对王权下的等级身分制议会是一样的。而且，规定贵族院组成的《贵族院令》的修改和废除，只能由贵族院提议才能进行，众议院却无权过问。与此相反，《众议院议员选举

法》和一般的法律相同，也要通过贵族院，尤其是要通过枢密院的审议（后来，在众议院通过的《普通选举权法案》就曾在贵族院遭到否决）。

臣民虽有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的权限、担任文武官员的权利以及“在法律范围内”的基本人权，但其“范围”却被法律和敕令等等限制得很严。

总之，《大日本帝国宪法》不是废除天皇及其政府、军部的专制，而是给这些披上宪法的外衣。宪法还说，天皇的统治权是从祖先的神位中继承下来的，不是由这一宪法规定下来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天皇的权力依然是古代专制君主式的，不是由宪法规定的。宪法第三条规定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不是表示君主不负国政责任的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而是让天皇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神圣的存在。

但是，规定天皇“要依照此宪法的条文规定”来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并列举了天皇大权和规定行使的方法，从这一点来说，天皇的存在也受宪法约束。这样，这一宪法一方面把天皇置于超宪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具有作为宪法

内在的存在，进一步接近立宪君主制的这种矛盾。这种接近以及多少承认了“臣民”的修改权和基本人权，在这一点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从国民方面来说，国民以议会的立法协赞权以及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在国政方面开辟了在某程度上实现国民要求的道路。

军队、警察、地方制度

在公布宪法之前，作为天皇制最重要的实力支柱的军队，已经被组织为最“近代式”的了。即依靠1888年的军制改革，废除了镇台制，模仿近代德国军团制，改为战略单位的师团。这种兵力，到1890年，包括近卫师团在内，计有七个师团，加上北海道屯垦军约一万人，共拥有五万三千人的现役军人，结束现役的预备役和后备役则超过二十万人。海军方面，1886年划分全国为五个海军区，1890年设置了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拥有二十五艘、五万一千吨的军舰和十艘水雷艇。还设立了陆军大学、海军大学以及培养士官的机关。1881年设立了取缔这种陆海

军士兵，或一般人民对军队的“犯罪”，最主要的是取缔宣传民主主义及反军国主义思想的宪兵队，并命令士兵，对天皇要绝对忠诚，也要象对天皇一样地服从上级。1882年，颁布了规定士兵必须严守的根本道德规范的“军人敕谕”。

《征兵令》从其制定到公布宪法那年的一月，进行了三次修改，取消了除残废患病者外的一切免役规定，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完备，隐瞒户籍或逃避兵役，几乎是不可能的。

天皇制的第二重要实力支柱——警察制度，在宪法公布后的第二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原来的制度是在各地方的行政和交通的中心地点设有警察署，有些地方还设二、三个分署，巡查（该名称出现于1875年，以前称为逻卒、捕亡或police）在总署或分署上班，经常巡逻管界。现在改革了这一制度，减少总署和分署的数量，增加警察的派出所及驻在所，分散配备警察力量，在全国布满了警察网，任何偏僻的深山孤岛，至少也有一名带刀的警察。

这种所谓散兵警察制的技术基础乃是由于电信电话的发达，对分散的警察能够实行统一的指

挥和联系。人民拍发电报需要步行十日里以上的地方，警察总署和驻在所之间，可用电话立即取得联系。在改革警察制度那年，实行了下述的新的市町村制，全国新町村的总数约一万三千，派出所、驻在所的总数约一万一千四百，大致是可以适应的。此后，警察制度没有重大的改革，只是加强其权限，特别是加强行政警察和政治警察。

在公布宪法的同一年，政府制定了市町村制度。把原来的自然村为基础的町村合并组成新的行政单位，并把这种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统一。一方面利用自然村所具有的共同体的因素，同时把它改编为中央政府行政的最基层的机构，这乃是明治初年以来政府一贯采取的政策，在此时基本上完成了。

市町村在内务大臣和府县知事的统辖下，设置市、町、村长，助役，收入役等三职，又作为审议和通过市町村范围内的预算和事业的机构，设置了町村会。该会议员由居民选举产生。选举权只限于交纳直接国税二日元以上（相当于三反左右水田的地税）的男子，而且根据交纳的税额，规定市会为三级选举、町村会为二级选举的制度，

并规定每级选出同样人数的议员，露骨地保证了地主以及有产者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且，町村长是不领薪俸的名誉职，所以只有富户，而且是有闲的人，即除了寄生地主外，是无法充任町村长的。

这种町村制，称为“地方自治制”。建立这种制度的负责人山县有朋（当时内务大臣）说，这种自治制是为了在宪法实施后，众议院的势力大了，万一发生攻击官僚专制内阁的情况，“为了避免中央政局一旦发生变动，而不至于影响地方行政”，即为了从议会政治中维护天皇制而建立这种制度的。总之，它是把地主及地方富豪吸收到天皇制基层机构的一种措施。“自治体”不过是徒有其名，市町村的主要事务，如征兵、征税，为此而编制和管理户籍，设立和办理义务教育学校等，大部分都须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办事。因此，预算的一部分也是中央的强制预算，市町村可以自由编造的部分是不多的。

教育敕语和学术、信仰的自由

最后，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原则，在公布宪

法的第二年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公布了“关于教育的敕语”。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天皇对国民的直接的训谕。“教育敕语”说，天皇的祖先在很早以前立国，并深远地树立了国民的道德，使国家、天皇和道德的根源成为一体，以对天皇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作为道德的根本，罗列了儒教伦理的品德，还命令重视国家宪法，服从国法，勤勉劳动，战时为天皇英勇作战，为了让天皇与天地同样繁荣，而竭尽全力。在这里没有提“爱国”的道德，只字未提国民的权利、自由以及和平。从此，对教育的统制变得无孔不入。1896年，甚至以制度规定在学校举行仪式时必须唱“君之代”一类的歌曲。“君之代”是在1880年编写的天皇赞歌，并非国歌，当初只是在宫内和军队里歌唱的。

“教育敕语”不仅作为一切学校教育的根本原则，而且也作为国民精神生活的最高原则。君主把道德以及精神生活的原则，作为其祖先遗留的传统而规定下来，并强加给国民，这不仅在近代国家中没有前例，就在基督教统治的西方的绝对主义中也是没有的。这是亚洲专制主义的一个侧

面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反映。因此，明治维新以后刚刚开始萌芽的学术、思想、信仰的自由，深受阻碍。宗教方面的基督教，学术方面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日本史学遭受最大的迫害。

幕府末期出现的天主教徒，反抗维新政权的残酷迫害，继续点燃着他们信仰的火焰。还有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新教徒也逐渐增加，政府也感到无力镇压，又为了给修改条约制造条件，乃在1873年撤销了禁止天主教的布告牌，实际上默认了信仰自由。幕府末年，日本人也有了新岛襄这样的伟大的领导者，他秘密乘船到美国，在那里的神学校学习毕业，于1874年回国，在京都设立基督教学校“同志社”。到1880年代，在日本的宗教、思想、文化界中，基督教已经成为鼓吹新风气的一种力量。而且，《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也规定了须“在不妨碍秩序安宁，并在不违反臣民的义务的范围内的条件下，但总算承认了信教的自由。可是，“教育敕语”颁布后不久，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等攻击基督教同“教育敕语”存在矛盾，基督教徒方面，横井时雄等对此进行了辩解，认为并不矛盾。这种争论，从1890年延

续到1894年。这并不是基督教与“教育敕语”原来不矛盾，而是在日本只许有和“教育敕语”不发生矛盾的“基督教”。这不单单是宗教一派的受难，而是日本人民没有从天皇教那里得到自由。

另外，日本史学遭受很大的打击。在“教育敕语”公布后的第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因在论文中说：“神道是祭祀天地的遗风”，而被赶出大学。从此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有关日本国家起源的科学研究和批判国家神道以及对皇室不利的历史上的研究都不能公开发表。在学校教育中，强制规定讲授一种系统的虚构：日本国由天皇祖先的神所创造，并由其子孙的天皇永远统治，日本的历史是以天皇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是阻碍日本人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发展，它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其流毒直到现代仍广泛地、深刻地遗留下来。

家长制家族制度

根据“教育敕语”，把对天皇的忠和对父母的

孝作为“国体的精华”，为了和忠于国家的天皇制相适应，而规定了以孝为主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即家庭的天皇制也用法律固定下来。

在这时期，国民之间，主要的家族关系是与封建时代相同的家长制；但作为倾向来看，从江户时代中期以来，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家长制也逐渐削弱了。在没有什么财产的下层町人（手工业者和商人——译者）、农民之间，不一定存在长子继承制，子女结婚也相当自由了。这种倾向又由于维新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法令承认职业的自由、迁移的自由，而进一步得到推广。在知识分子中间，以福泽谕吉为首，主张以平等的夫妇为中心的家族制度的，也多起来了。政府为了修改条约，也承认有必要接受西方近代的家族法，因此在法国顾问布瓦松纳德的指导下努力于民法法典的编纂，其家族法部分在1890年10月公布，并决定在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实行。

这时的民法在形式上承认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长制，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以夫妇为中心构成的家族制，家庭成员有独自的财产所有权和

结婚、居住的自由等。这一方面考虑到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家长制，另一方面又重视正在变化着的家族关系的趋势，并遵循这一趋势的。但对此又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八束等的“民法出而忠孝亡”的猛烈反对。穗积等也承认在平民中间存在着反对家长制的习惯，但他们认为“平民的习惯不算习惯”，主张可以作为日本家族法的基础的习惯，必须是华族士族的习惯。政府也持同一观点，于是新民法未获施行，重新制定了以封建时代的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严格的家长制家族制度的民法，并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开始施行。这个民法一直使用到第二次大战后根据新宪法而制定了民法为止，中间只有过少量的修改。

天皇制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上述天皇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是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它包括：（1）接收旧幕府各藩的领有地为国有，在地税改革后继续作为国有的广阔的山林原野；（2）从中选择经济价值高的作为

皇室领地；（3）在民有土地方面成为主要土地制度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等三种形态。

1890年国有林野超过一千二百万町步，皇室占有的林野超过三百六十五万町步。而民间所有（包括町村所有）的林野不过约七百万町步。这种大面积的国有以及皇室所有的林野不仅作为政府和天皇的财政基础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维持农业的半封建生产关系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日本，畜牧业到近代也几乎没有有什么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适合畜牧的原野大部分归为国有或者皇室所有，因此民间无法自由利用（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缺乏经营畜牧业的资本）。此外，耕地的总面积，在统计比较正确以后的1887年（明治二十年），约为四百六十一万町步（冲绳县除外），占全国总面积的11.9%。略有增加的1921年（大正十年），为六百一十六万町步（包括冲绳县），占全国总面积的15.8%（此后耕地开始减少）。这是因为缺乏适于民间开垦的土地和资本的缘故。

这样，在1890年，约占生产人口70%的农民拥挤在狭小的民有土地上。自从1880年代的通货

紧缩期以后，在那里，寄生地主所有制迅速成为主要的土地制度。1887年（明治二十年）全国44%的水田、34%的旱田已成为佃种地，全部农家户数的22%为佃农、45%为自耕农兼佃农或者佃农兼自耕农，完全的自耕农只占33%。而且由国家大力保护了用缴纳实物形式掠夺相当于50%收获量的佃租。

当时全国农家每户的耕地面积，平均约为一町步，但40%左右的农户只占有五反以下的耕地，五反以上，不满一町步的农户超过30%。经营五反左右，即使是完全自耕地，也只能勉强为了糊口而生产，难于为了牟取利润而生产。若是佃农，只靠农业是难于生存的。特别在水利、灌溉方面，小农和零星农民就几乎是无权使用的。这种农民被束缚在农村的共同体规章制度里，隶属于地主，当然就难于作为独立自主的人格而自立了。在这里，他们有被束缚在天皇的神的权威的条件。而且，小农经济主要是靠家族劳动，所以在那里不得不存在家长制。而且，地主阶级强烈支持保障他们统治和剥削佃农的天皇制，而天皇制又通过地主来统治全体农民。地主阶级还通

过“地方自治”的制度，被纳入天皇制统治机构的基层，通过众议院和贵族院，把他们的阶级代表派送到天皇制的中央机构。

天皇制和资本主义

天皇制的另一部分经济基础，乃是由国家资本以及政商特权资本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从1882年（明治十五年）到1885年（明治十八年），整顿过去在严重危机时期所发行的纸币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速发展。从1884年到1890年，全国的公司资本从一千三百四十万日元增加为一亿八千九百万日元，迅速增长了十三倍。在这期间，机械纺织工厂和纱锭数从十九个厂、五万纱锭增加到三十个厂、二十七万七千纱锭。使用称为“粗纺”的国产工具的纺织手工业工厂的没落和纺织工业趋向机器大工业化的道路，则成为主要的了。

占民间企业有力地位的蚕丝生产，仍以小规模的手工缫丝手工业工场为主要生产形式，但机器缫丝也确实增加了。

随着各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铁路热潮，成立了官民合办的日本铁路公司（1881年创立），这个公司铺设和经营东京青森之间的铁路。还成立了不少私营铁路公司。国营的东海道干线，东京到神户之间也在1889年7月全部通车。从1886到1891年，铁路营业里程从164英里延长到1611英里，增加了九倍。

这样，民间的资本主义企业尽管也开始迅速发展，但这种资本主义仍受国家资本以及和国家相勾结，拥有特权的三井、三菱、住友、澁泽、古河等政商资本的控制。机械制造几乎完全被军火工厂所垄断。铁路干线不是国有国营，就是象日本铁路公司那样的官民合办，而这个“民”也是华族和政商。海运是由三菱轮船公司和三井系统的共同运输公司于1885年合并而成立的日本邮船公司垄断了远洋航线，三菱和共同运输公司都是得到政府周到的保护而成长的，从日本邮船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天皇一事可想而知，这公司是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典型的国策公司。纺织工业方面，首先机械化的，也是华族和政商的资本。矿业方面，国有的佐渡金矿和生野银矿于1889年划

为皇室占有（1896年拨给三菱），别子铜矿由住友家、足尾铜矿由古河家、三池煤矿由三井家经营，日本最重要的矿山就这样地被享有政府特殊保护的政商所占有，并由他们控制矿业界。而且，具有国有国营性质的日本银行成为唯一发行纸币的银行，同样，带有国有国营性质的横滨正金银行成为唯一的外汇银行，统治了金融界。

劳动者的惨状

资本主义产业中的劳动者，主要来自没落农民，他们的遭遇是极为悲惨的。典型的例子可以在煤矿中看出。三池煤矿起初为国有国营，当时以二千名犯人作为基本劳动力，还同犯人一样酷使着也有二千名左右的没落农民出身的劳动者。1883年（明治十六年），三池的大浦矿井发生火灾时，政府当局明知井下还有二十四名犯人和二十二名普通矿工，但为了灭火，竟关闭了全部坑道口。这样，四十六个人均被烧死。此后二年，用几乎白白赠送的廉价把三池煤矿拨给三井。三井在这个煤矿进行了和政府经营时代相同的极为残

酷的剥削，以此作为出发点，扩张到工矿方面，兼上了产业资本家。

三菱也接受了后藤象二郎任意作价拨给的官营高岛煤矿（1881年），并以此作为向工矿方面发展的第一步。高岛煤矿虐待矿工的事实，在日本资本主义史上是最悲惨的。例如1884年霍乱病流行时，公司竟残酷地将发病一天后，还未确诊是否死亡的工人活活地放在铁板上烧死。这样死掉或被害的占全部矿工的一半，达一千五百名以上。

在工业方面，工人的悲惨遭遇也不亚于矿业。在缫丝或纺织手工业工厂，每天工作十五、十六小时，而男工工资为一角七分至一角九分，女工则为一角二分左右。在当时民营的唯一机器大工业的纺织工厂，1890年女工平均工资一天为八分二厘，男工平均一角七分（当时一升米为八至九分，象纺织公司职工宿舍的不人道的伙食费一天也需六分钱）。这样的低工资，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二班轮换制，深夜也不停工。这和当时外国的纺织工人比较，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也不过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意大

利女工最低工资的五分之一。每个纱锭每年所用的棉花量：英国是三十五磅，连殖民地的印度也才是一百三十四磅，而日本却达二百二十磅。

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政府进行了彻底的取缔。公元1880年，机器化工业的工人除官办军火工厂外，还都不到一万人，但在当时制定的刑法中已经有了对农、工业所雇用的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要进行法办的规定。1883年，政府曾咨询东京商工会“是否可以制定工业方面雇主和被雇者及师徒间的取缔法”，由于政府知道在欧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频繁出现，所以在日本连欧美的工人运动的萌芽也还不存在时，就已经预料到日本迟早也会出现工人运动，于是就开始采取对付的办法了。

天皇制的完成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基础，绝对主义天皇制从统治人民的思想体系直到经济基础，即在所有的微细部门，都得到完成。这乃是把电信、电话、铁路、报纸以及军刀、大炮、步枪、军舰

等最新的文明工具和古代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的权威结合起来，使执政者用天皇的名义，通过高效率的高度中央集权机构对全体国民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无孔不入地直接进行统治的体系。

国民大众对作为统治者和元首的天皇，几乎没有发自政治觉悟的尊敬。但可以称为宗教式的、对“天子”的敬畏，却在颁布宪法时期就已得到普及。1880年，东京大学教师德国人贝尔茨^①看到东京市民未能自觉地悬挂国旗庆祝天皇的生日，而是由警察强迫市民悬挂国旗，就在其日记上写道：“因东京市民不关心君主而感到悲痛。”这种情况继续很久。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人格”漠不关心，但对天皇的“神格”敬畏之深，却是西洋人难于想象的。明治二十年左右，

^① 贝尔茨：Erwin Bälz (1849—1913)，德国医学家。公元1877年(明治十年)受东京医学校(东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之聘，到日本教授生理学、内科学、妇产科、精神病等学科，并研究日本人类学、日本风土病等。对日本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改进温泉疗法等有所研究。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回国，任热带病理学会会长、人类学会东洋部长等职。——译者

担任东京镇台司令官的三浦梧楼后来说过：“当时向士兵们提到‘天皇陛下’时，要作种种解释；但一提‘天子’，倒是马上就明白了。”如上所述，在明治初年，政府竭力让国民懂得“继承天照大神的天子”，这时才开始发生了效果。

大多数的人民，如农渔民、小工商业者、工匠那样分散地从事生产和生活，而且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总是追求可以依靠的权威。这种权威是神，是集体公社的传统，也是领主。但从明治维新以后，领主的权威集中到天皇身上。而且把天皇说成是民众所信仰的神社的各种神中之神的天照大神的子孙，这一点政府是使用一切方法不断地讲给国民听，终于成功地在国民中间迅速地浸透了对于天子这种神的权威的畏服。而且，这种畏服比靠不住的对人格的尊敬，具有更为强烈而深刻的政治意义。

这样，在完成了近代天皇制的国家里，一个人不是因为是人而尊严，而人总是仰望着神圣的天皇，根据同天皇关系的亲疏来规定和认识一个人的价值的排列顺序。在这种排列顺序中，臣民的最高荣誉是“大臣大将”。而且要到达大臣大

将的道路，是敞开着，不分身分的。只要是男子，就能被考取。如能筹出学费，就可受中等高等教育，而且尽管没有学历，但只要通过国家考试，就可成为高级官吏。特别是陆海军学校不要学费，所以除了因维持家庭生活而不得不早日从事劳动的穷人家的孩子外，虽不算有钱人家，但这些学校也还容易考取，也可作未来成为大将的美梦。

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成名成家的社会思想，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此外，还有追求三井、三菱那样大富豪的社会思想，以及什么“当博士、还是大臣”这样追求当“博士”一类脑力方面的领导者的社会思想，但这些道路都只不过是隶属于以当大臣大将为目标的道路。

这样，逐渐形成了把国民中间的优秀人材不断地吸收到统治阶级内部，或者让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巧妙的机关和意识形态，这种机关和意识形态就成了来自国民内部的拥护天皇制的条件。加上依靠最新文明手段的压制从外部强迫国民服从。

由于内外两方面的作用，近代天皇制就成功

地集结了国民的才能和生命力，成长为在东亚最早具备资本主义产业和近代军备的国家。

但其本身是充满着矛盾的。作为天皇制经济基础一部分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受特权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是和另一部分经济基础的半封建的地主制之间有着暂时地、部分地互相有利、相辅相成的一面，但本质上是矛盾着的（具体情况在后文叙述）。另外，天皇制在思想上是以天皇作为神的权威的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主义，那么就无法发展在近代世界保护自己所必需的近代化军备和产业。另外天皇制的社会制度的支柱是等级身分制和家长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促使等级身分制和家长制衰落的。

而且，对天皇制来说，致命的矛盾，乃是随着地主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加深农民、工人反对天皇制阶级基础的地主、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不拥有特权的一般资本家，虽主要地和工人阶级处于对立地位，但又或多或少地和特权资本家发生对立。因此，情况变得极为复杂。

这些矛盾将成为推动今后日本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而日本所处的国际关系与国内各种矛盾，深刻地相互作用，就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绝对主义天皇制，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十八 初期的议会和政党

——从民权到国权

颁布宪法和各民权派

为庆祝宪法颁布而实行大赦时，政治犯人全部被释放，而且取消了驱逐出东京的办法。旧自由党和改进党党员们的活动再度活跃起来。但是，其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革命精神。就连曾经热烈提倡主权在民，反对钦定宪法，为民定宪法而斗争的植木枝盛也在赞美这一宪法不象其他国家那样经过流血斗争，而“的确是和平地”制定出来的，“真是可喜可贺了”。中江兆民则认为将宪法“通读一遍，只有苦笑而已。”他主张如果召开帝国议会，就要首先探讨宪法，将意见告知天皇，争取修改宪法。他为此，利用《东云新闻》等报刊，竭尽全力促进民主统一战

线的建立和启发民众的政治思想。

然而，统一战线却没有形成。中江兆民以及大井宪太郎等旧自由党左派想用不受集会条例限制的社交团体的形式，先把全国的同志集中起来。对此，前一年形成“大同团结”主力的东北^①、北陆^②、关西^③的旧自由党党员以及九州的自由主义派却主张建立具有一定纲领和政策的政党，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5月，他们单独成立了“大同俱乐部”。在其纲领的第一条里提出“要巩固我国独立的大权”；第二条以后提出“实行责任内阁制”、“休养民力”等。在这里，民权运动显然是后退了，而国权却提到前面。于是大井等人无可奈何地成立了非政党的“大同协和会”。

旧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相当于板垣的参谋地位的植木枝盛，越前的杉田定一等人，虽然提

① 东北：也称奥羽地方，包括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宫城、福岛等县。——译者

② 北陆：全称为北陆道，本州中部面向日本海的地方，包括福井、石川、富山、新潟等县。——译者

③ 关西：日本古代指逢坂关以西的地方，后指足柄、碓冰关以西的地方，现在为京都、大阪一带地方的总称。——译者

倡过旧自由党各派要统一，但却为争夺领导权而排斥其他各派。结果，板垣派单独成立了“爱国公党”，在1890年1月公布了该党的宗旨。板垣退助在当时的演说中指出，由于立宪政体已经完成，就不要仍然单凭理论去要求各种政治改革。他们已经完全成为日本帝国宪法体制内的在野党了（正式建党是1890年5月）。

大同协和会也于1890年1月决定改为政治结社，举行了自由党的重建仪式。该党决议草案（2月13日决定）中，除要求实行公选府县知事和郡长，撤销警视厅，禁止警察佩刀，禁止增加新华族外，还提出了“请求国会重新审查宪法”一项，显示了革命的自由党的传统。但是，这个草案遭到警察当局的拒绝，十天后的该党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也只是在警察当局许可范围内的一些政策，因而和其他各派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对民权派表示支持，不在政治实践上，而在思想界占有势力的是德富苏峰所办《国民之友》（1887年2月创刊）杂志的一派。德富苏峰主张站在“纯粹的西欧主义”方面，他不同于政府的“贵族式的欧化主义”，而提倡“平民的欧化主

义”、“平民主义”。但是，这一派也是既“不反对政府，也不谄媚政府”，不去“颠覆社会秩序”，他们的目标在于谋求整顿现有体制的改良派。

总之，在宪法颁布以后，始终不渝地和天皇专制主义相抗衡的民主主义者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则已不复存在了。

国权主义的抬头

原来的自由民权派丧失了革命性，而国权主义则成了一股有力的政治潮流。在遭受欧美压迫的日本，保卫国家主权，争取和欧美各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政治觉醒了的一切人们的普遍要求。明治政府也在这方面努力，而过去那些革命的民权派也都热烈地主张这一点。但是，只主张国权并不等于是国权主义。把国家权力放在民权及其他一切要求的优先地位，以此为最高目的，不仅把外交，而且把内政、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也都作为确立和扩张国家权力的手段，这才是国权主义。

关于国权主义的想法，在旧自由党中，以九州各派为首，某些派系从一开始就有相当强烈的国权主义思想，但明显地脱离民权运动，并成了反政府的活动，这是在反对鹿鸣馆时代政府的谄媚欧美——欧化政策，而主张拥护和宣扬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国粹主义者在文化方面的斗争加上反对井上外相关于修改条约案的政治斗争，就自然地形成了国权派，而成为政界的一支势力。谷干城、三浦梧楼，鸟尾小弥太等反对山县派的将军们则站在这种政治势力的前列。

在学者和思想家方面，西村茂树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发起的日本讲道会（1887年改为日本弘道会），是鼓吹传统旧道德的据点。三宅雄二郎（雪岭）、杉浦重刚、志贺重昂等人在1888年4月组织“政教社”，发行机关刊物《日本人》（后改为《日本及日本人》），这是国粹、国权派在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刊物。接着，在1889年颁布宪法那天，出身政教社的陆羯南创刊了《日本》日报，成为国粹、国权派在政治上的主要机关报。《日本》很快就成了当时最大的报

纸，而在这一年年底，东京的报纸开始使用轮转印刷机。

革命的民权派主张，国权应以民权为基础，而国权派视为保卫和发展国权基础的：第一是以天皇的威力和权力来统一国民，并以拥护振兴日本古来的文化和道德作为这种精神的基础。与此相反的、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西洋思想”则在排斥之列；第二要有强大的军备，他们虽然也主张要使国民生活安定和提高，但却不能允许以此为理由而忽视军备。

在这一根本精神上，国权派和当时的执政者们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但国权派也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权。国权派的代表性理论家陆羯南称他们的立场是“国民论”（Nationalism），反对代表军人、官吏、贵族、富豪利益的“藩阀政党的国家主义”，他主张“国家、皇室、内阁、议会”等本来都是应当属于“全体国民”的，就必须使它属于“国民”，这就是“国民论”派的立场。他又认为，国民的自由与平等对于振兴国家元气、加强国民团结是不可缺少的。谷干城等人在宪法颁布前夕，也批评伊藤博文起草的宪法是

“连欧洲普通的宪法也不如，作为一部宪法而根本没有宪法那种作用”，他们并认为枢密院制度“在十九世纪的政界是个废物”，因而拒绝担任枢密院顾问官。

这样，和伊藤博文等人相比，他们对于民主主义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同情的，从而也就出现了他们能够与民权派结成联合战线的条件。但是，他们不仅提出对民权本身的要求，而且在有益于国权的范围内来要求民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随着旧民权派的主流也明显地有意投入现有体制的怀抱，那么，他们就必然地把国权论与民权论分裂开来。这样，他们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就具备了与国权主义者结合起来的条件。

这样，在宪法颁布后，争取民权的斗争，也就在国权主义的指导下来进行。反对大隈外相修改条约的重大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

大隈外相的修改条约案

当枢密院审查日本帝国宪法草案的时候，外相大隈重信只在最初露了一次面，以后就一直没

有出席会议，而专门致力于修改条约的交涉。大隈原是改进党的总裁，是主张实行所谓英国式君主立宪制的民权派中一个方面的首领。而他却连审查宪法草案的会议都不参加，这就表明了他和接近他的改进党的干部们对于立宪政治并不象口头上说的那样热心。大隈重信看到，修改宪法的功劳势必归于伊藤博文，而自己却可以期望立下修改条约的功劳。他就这样抱着建立个人功名的欲望，把修改条约——完成国家的独立与制订一部好的宪法——同实现民主主义分割开来，而沉溺于秘密外交之中，这也就预示了大隈修改条约的交涉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大隈修改条约方案的要点如下：（1）不是立即恢复关税自主权，而只是提高税率，把出入港口船只的手续费改为吨税制，由此而使税收提高到过去的一倍以上；（2）把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制改为有条件的；（3）在本条约实行五年后，完全废除治外法权；（4）本条约有效期为十二年，期满后，如不预先通知，即告无效，另行缔结新约。

作为换取上述各项的代价：（1）给予外国

人在日本全国旅行、居住、营业和拥有动产及不动产的权利（开放内地）；（2）在本条约实行期间（十二年内），最高法院设置四名欧美籍法官，当有外国人被告时，实行由外国籍法官占多数的联合审判；（3）在本条约实行二年之内，须制定、公布新的刑法、判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和民事诉讼法。

这次修改条约的内容与过去井上馨外相的方案相比，虽然在实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外国籍法官的任用以及外国籍法官参与审判的范围等方面，稍有改进，但在承认外国人联合审判以及约定要编纂法典等原则方面，却与井上的方案并无不同。大隈用这一方案与各国分别交涉，首先取得了德国和美国原则上的同意。

国权主义的胜利

然而，英国并没有轻易地接受大隈的方案。特别是《伦敦泰晤士报》于1889年4月赤裸裸地揭露了大隈改约方案的内容。一个多月以后，消息传到日本，由于说它和前外相井上馨的改约方案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引起了猛烈的反对。急先锋就是“政教社”和《日本》日报系统的国权主义者。在旧自由党系统中，大同协和会首先起来反对，接着，从7月中旬起，大同俱乐部也参加了这一行列。8月，由《日本》日报的成员和政教社、大同俱乐部、大同协和会、保守中立派（以鸟尾小弥太为代表）以及九州团体联合会（熊本的紫溟会和福冈的玄洋社的联合组织）等五个团体联合和各反对条约派报纸杂志的代表，共同组成了“反对修改条约委员会”，展开了全国性的反对运动。为了对抗这种运动，改进党以《邮递报知新闻》为据点，竭力拥护其原来的党魁大隈外相。

随着民间反对大隈改约舆论的高涨，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以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为首的反对主张。他说任用外国人当法官是违反宪法的。还有农商务相井上馨、内务相山县有朋等长州藩阀和藏（财政）相松方正义、陆军相大山巖、海军相西乡从道等萨摩藩阀（首相黑田清隆除外）的政治家和军人等，并非从大隈的改约对于国家不利这一点出发，而因为大隈是一个不属萨、长两

藩阀的实力派，所以他们阴谋策划让大隈重信失势。还掀起了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渡边洪基召集学生，发表反对大隈方案的演说，帝国大学教授们曾两次（10月7日和13日）联名向内务相山县有朋建议停止修改条约这样空前的事件。另外，学习院院长三浦梧楼借上奏院务的机会，直接向天皇提出了停止修改条约的意见（10月15日）。

大隈重信虽然在政府内部几乎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但仍不同意停止修改条约的交涉。内阁会议召开了三次，也未能迫使大隈同意。10月18日，当内阁会议结束后，大隈回外务省时，福冈玄洋社的成员来岛恒喜向大隈所乘马车投掷炸弹，然后就在当场面向皇宫剖腹自杀。大隈被炸掉了一条腿，但却保住了性命。

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在大隈因负伤未能出席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停止修改条约的交涉。1889年10月24日，内阁总辞职。反对修改条约的联合组织，由于目的已经达到而解散了。

从反对井上外相的改约方案起，到此时的二年间，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完全脱离民权斗争，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国权主义运

动。这种运动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超过政府而成为军国主义，这在甲申事变时已经得到了证明。

第一次大选和 《集会及政治结社法》

大隈修改条约的方案被放弃以后，旧自由党如前所述，虽然还是分为三派，但因临近设立国会以及众议院议员选举（1890年7月1、2、3日），三派都打算联合起来控制众议院，遂于6月初，在三派保持各自组织的情况下，联合组成了庚寅俱乐部。为了竞选，以减轻地税和休养民力作为在野党的主要口号，对修改条约问题几乎未再提起。

当时的选举法规定，选举权属于缴纳国税十五日元以上（平均相当于二町步^①耕地的地税）的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选举权也是属于缴纳十五日元以上国税的三十岁以上的男子。有

^① 町步：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约合9918平方米，即99.18公亩。——译者

选举权的不过只占当时人口的1.1%强，有权者的97%是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无关、靠所得税取得选举权的人只占3%。

关于各党派的当选人数，各党各派的说法，相差很大，准确数字虽不清楚，但在众议院定员三百人中，庚寅俱乐部三派约占一百一十人左右，改进党及其所属系统约五十人左右，九州进步党（属旧自由党系统，但国权主义思想浓厚）大概有十九人。这就出现了号称“进步派”的在野党，其总数已超过半数。因此，由九州进步党的提倡，组成了进步派的大联合，以期实现对议会负责的内阁（责任内阁）。政府为阻止这一行动，于7月25日突然制定和实行了《集会及政治结社法》。

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把十年前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而制定的集会条例，变得更为严酷。除政治结社的联合和建立支部、政治结社的文件或委员对群众进行宣传活动、一切讨论政治问题的室外集会以及议会开会期间，学校在距议院三日里^①以内召开运动会等均须经过特别许可

^① 日里：1日里为3.927公里。——译者

外，严禁一切室外集会和“群众运动”（示威游行）。赋予内务大臣有禁止结社，警官有解散集会的权力。还有，为了割断议员与非议员群众的联系，政治结社不得制订使议员在议会上的发言与表决要对非议员负责的规章。该法令的第二个目的是把一切非政治性的集会和结社，也与政治性集会和结社一样置于警察的任意控制与监视之下，无论是佃农团结起来反对地主的斗争，还是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反对资本家的运动都遭到了禁止和镇压。就这点而言，乃是进一步扩大了集会条例以及同年颁布的刑法第二七〇条禁止和镇压工农运动的规定。

按照这个法律，开始禁止军人、警官、公私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未成年人以及妇女参加有关政治的集会和政治性结社。军人和警察是天皇制的最重要的强制力量，教师是天皇制的精神支柱，中小学生和未成年人是肩负着日本未来命运的人，妇女是家庭教育的担当者而又隶属于父系家长制。政府惧怕这些人一旦有了政治觉悟，就会有从根本上动摇天皇制的危险。

制定法律必须经过帝国议会的赞助，宪法对

这项手续，已有规定，贵、众两院的议员已经选出，首届议会的召开就在眼前，而政府却抓住议会召开前的这个机会，炮制了这一法律，这就把天皇制反对立宪制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首届议会与“民党”联合

庚寅俱乐部立即因《集会及政治结社法》而被解散。这样，进步派只有解散各党而重新组成单一的政党，才能集结起来。但是，在连各党联合斗争都难于进行的情况下，也就没有组成单一政党的可能了。

中江兆民等人呼吁各派抛弃旧怨，结成反政府的统一战线。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旧自由党系统的三派，大多数成员总算统一为“立宪自由党”。1890年9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因在当时的宗旨书中提到“依自由的大义，循改进的方策”，彻底地显示了要与改进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意向，于是就有几十人反对这点而脱党。他们说：“欲扩张民权，必先期待国权的完整。”想去买得那个支持大隈卖国条约方案的改进党的欢

心，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和九州以及各地的国权派组织了“国民自由党”，声称：“反对个人的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挂上了“自由”二字，但却是纯粹国权主义的在野党。

首届帝国议会于1890年11月29日召开。在众议院，自由党与改进党合作，形成“民党”，控制了众议院的半数以上议席。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往日的革命精神，不用说审查宪法的问题，就是对于《集会及政治结社法》等镇压人民的法令也没有进行反对的斗争，而只是打出了“休养民力”、“节减经费”的旗号，集中力量攻击预算草案。所谓休养民力，具体说来就是减轻地税。当时百分之六十的议员是地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起草了在预算支出总额八千三百三十二万余日元中削减包括官员薪俸在内的八百八十八万余日元的方案。但是由于立宪自由党片冈健吉、林有造、植木枝盛等“土佐派”^①二十多名议员暗中与政府勾结，在关键时刻背叛民党，所以最后

^① 土佐派：土佐，今四国高知县一带；片冈健吉等人都出身于土佐，形成派系。——译者

以削減六百五十一萬餘日元而告終。這不是經費預算多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議會權限的原則性的大問題。

政府與民黨的爭論焦點，是對憲法第六十七條官吏薪俸等支出“不經政府同意”不能削減的規定，是否能夠由眾議院作出決議，而任意削減。民黨主張，官吏薪俸也可由眾議院自由削減，然後把預算草案遞交貴族院後，再尋求政府同意就可以了。政府如果同意這個預算案，當然就沒有問題了，萬一不同意，政府就是全面地違反議會的意志，那麼它就要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這樣，議會就在事實上有了全面修改預算的權力，能在預算方面把官僚專制置於議會的控制之下，這是民黨的目的。民黨把日本、美國、普魯士三國大臣和局長的薪俸與工人的標準工資作了比較，舉出大臣的薪俸與工人工資相比，美國是十倍，普魯士是四十五倍，而日本竟達八十一倍；局長的薪俸與工人工資相比，美國是四倍，普魯士是十八倍，而日本是四十七倍，以此，不斷地譴責日本官吏待遇不適當地偏高、辦事效能低劣和官僚機構的龐大。

“冷血动物的陈列馆” 和极力干涉选举

但是，政府与党的议员提出：在众议院通过决议削减第六十七条的支出以前，须先取得政府同意。又加上得到了前述土佐派众议员的赞同，这一提案就被通过了。众议院就这样自己放弃了控制官僚政府的可能性。大阪选出的众议员中江兆民，把如此软弱无力而又无廉耻的众议院称为“冷血动物的陈列馆”，而痛加弹劾，并辞去了议员职务。

首届议会后，自由党一直堕落下去。1891年10月的自由党大会修改了党章，提出“议会政体下的政党，应以议员为中心”，“站在议员和选民之间，从外部进行妨碍，或者选民干涉议员的行动，均属违反议会政体的宗旨”。这样，自己反而割断了议员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这种脱离群众的在议会拥有议席的政党和同样的拥有议席的政党——立宪改进党合作，在第二届国会上虽然也就削减预算问题攻击了政府，

但政府（松方正义内阁）于1891年底解散了第二届国会，并在1892年2月进行了大选。

当这次选举时，明治天皇让松方首相注意，不使上届的众议员再度当选，而要选出“忠良的议员”，并为此提供了干涉选举的资金。内务相品川弥二郎喜出望外，立即进行了彻底的干涉。执政党（吏党）大规模地公开贿选，警察和地痞流氓对民党讲演会的破坏，对民党游说人员的恐怖行动，在全国都十分嚣张。全国竟有二十五人因此而死亡，三百八十八人负重伤。警察到处威胁说，谁要投民党的票，就要做为背叛天皇的逆贼，投入监狱。投票一结束，凡是认为民党候选人得票多的票箱就被扔掉，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尽管进行了这样大规模的干涉，民党还是取得了胜利，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动荡。

贫民和农民问题的产生

1890年上半年，由于前一年秋天稻谷严重歉收，米价暴涨，1月下旬，富山市民开始波动。

从春天到夏天，东京和京都等地都有人饿死。鸟取、福井、柏崎、下关，发生了几百人到几千人的民众袭击米店事件。这次米骚动，以7月20日佐渡相川的矿工和其他市民两千多人的暴动而达到顶点。对这次暴动出动了新发田连队(团)一个中队(连)的官兵，才算镇压下去，但此后各地仍有暴动，直到7月底米价下降以后，暴动才渐渐平息下去。

然而这一年遭到了小麦歉收，又加上美国经济危机和银元汇兑牌价暴涨，以对美国蚕丝出口激减为契机，在5月，日本发生初次的经济危机，市况萧条，出现了大量“无钱无食”的贫民。在刚刚建立了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工业中，其同业公会——大日本棉纱纺织同业联合会，于5月决定缩短工时三个月，又得到政府的特殊支持，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而摆脱了困境。铁路也突然呈现了景气。但是，对近代大工业的打击是微小的，即使在互相议定缩短工时的纺织工业界，其全年运转纱锭数和棉纱生产量，反而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经济危机所打击的，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在缫丝业方面，也只是手

工缫丝减少了，而机器缫丝还是增加了。作为众议员选举基础的社会阶层，受到了最大的打击。民党强迫政府节减经费、休养民力，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1890年又是“贫民问题”突然成为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初的年代。东京和大阪等地出现了许多贫民窟，报纸和杂志争相报道了这些居民的悲惨生活。在农村也是如此，“农民的疲敝”、地主和佃农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在政府顾问麦艾特所著《日本农民的疲敝及其挽救对策》（1893年刊）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1889年，一个叫作小林与平的人，在广岛发动了“神祇复古请愿运动”。因它要“象神代那样，平均土地和其他物品”，用以分配给全体农民，并推行“复古到神代无君主、无政府”的运动，所以“贫民赞成者甚多”。同年6月，小林与平在东京赤坂成立了这个请愿运动的办事处，但被政府命令解散。而小林又于次年的1890年2月，在东京牛込区设立名为“黄金馆”的集会场所，“名为皇国语学会，实际是请求恢复神代的办事处”，因违反《集会条例》而遭处罚。于是

他又改名为“帝国大柱会”，仍继续进行活动（以后不详）。这不外是披着神秘主义外衣来要求土地革命和共和制度。

“社会党”的幻影

与农民问题出现的同时，工人问题在1890年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工厂工人的罢工，1886年（明治十九年）甲府雨宫缫丝工厂一百五十余名女工起来反对延长工时，这虽是最早的例子之一，但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1889年10月，大阪天满纺织公司三百余名女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几天的怠工，由于这是大城市大工厂的事件，被社会上广泛报道，就引起了当局和有识之士对工人问题的严重关切。

关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党”，开始由《国民之友》杂志连续地进行了介绍。1890年世界最早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由这个杂志作了报道。而且这个杂志还提出工人罢工的合理性，并号召工人们建立“同业工会”，以便平日进行互助和为突然发生的罢工斗争做准备（1890

年1月号、9月号)。1891年3月，在东京青山为近卫连队修建兵营的一千三百名石匠的罢工，轰动了整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事件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日本建立“社会党”的条件这时还不成熟，但预料，在日本，不久也将出现与西欧一样的社会党，这件事从此时开始已经象恶梦一样威胁着日本的统治阶级了。1891年5月，自由党在宣言中说：“富者压迫贫者的弊端日甚一日，这种反作用，要么成为同盟罢工，要么成为制订劳动时间限制法。此乃社会大变乱的征兆。我党的自由主义，在于要使富者和贫者各安其分，同享社会的财富。强迫使之平均或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则是与我党的自由主义相违背的。”

这种已被社会主义的幻影吓得心惊胆战的政党，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早已丧失了动员非议员的民众的勇气。如前所述，自由党修改了党章：议员可不受选民的约束；又进而在1892年4月党报上说，政党当然“需要得到国民的信任”，但这是指“中等社会以上的信任”。若是“只靠下等社会，即无知小民的信任”，用来办

事，则不仅不能成功，“到头来还要贻误国家”。这样，自由党明显地有意地作为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而与劳动民众相对立了。改进党更成了地道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四届议会和政党的屈服

害怕群众的民党也没有战胜政府的好办法。1892年至1893年的第四届议会，众议院也通过了决议削减官吏薪俸和军舰建造费用，但政府却搬出宪法为挡箭牌，不同意削减既定经费的官吏薪俸。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一届国会已经有了政府获胜的先例。这时，对于民党来说，除了动员非议员的群众之外，还有什么可用的力量呢？！但他们没有这样作，而是给天皇送去了责难政府的意见书。于是政府也向天皇申诉，说议会不遵守宪法。

天皇让枢密院审议这两种主张，结果在1893年2月10日发布诏书称，未经政府同意，议会无权削减既定经费，并提到“兼六合而掩八纮”（意即天皇统治世界）乃是皇祖的遗训，鉴于目

前形势，不能忽视军舰的建造，天皇每月拿出一定款项作为军舰建造费用，文武官员也要拿出薪俸的一成作为献金。

民党对政府的斗争，就这样，以完全失败而告终。此后，自由党成了准执政党，改进党虽仍继续攻击政府，但已不是为休养民力和实行民主改良而与政府相争，而是专门攻击政府对外政策“软弱”，成为提倡扩张国权的人们。

二十九 修改条约和日 清甲午战争

——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别国的国家发展

“主权线”和“利益线”

政府为了控制朝鲜，此时已在积极进行和中国作战的具体准备。对第四届议会的诏书中所提到的为了“兼六合而掩八纒”，因而不能削减建造军舰的费用这句话，就不仅是一句形容词了。

签订《天津条约》以后，清政府在朝鲜的政治势力更加强大，公然把朝鲜当作“属国”对待，清洗了朝鲜统治阶层中的亲日派。此外，当俄国在朝鲜沿岸寻求不冻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时，英国海军借口对抗俄国，而在日清《天津条约》签字前夕（1885年4月）非法占领了巨文

島^①，一直盘踞到1887年2月。就是在英军撤退以后，英国仍是清政府把朝鲜作为属国政策的强有力的后盾。

这种形势更加刺激了日本统治阶层中自征韩论出现以来对朝鲜的政治、军事野心。在1890年的第一届国会上，山县首相说，今后日本的军备不只是为了保卫“主权线”（日本国土），而且要把和主权线接壤的地区，具体说，就是必须确保朝鲜为“利益线”，而需要这种扩张，就只有准备和中国一战了。

日本统治阶层的侵略朝鲜政策，不单纯是由于国际形势所迫，经济上的要求也是很强烈的。确保朝鲜的大米和黄金，对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1889年稻谷的大歉收为转机，日本由大米的输出国变为大米的输入国，但因最重要的输入米源的朝鲜，在1889年秋遭到日本同样的灾荒，所以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的长官为抵制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大米，发布了禁止大米输出的命令

^① 巨文岛：在济州海峡东北部，全罗南道顺天湾的南方。——译者

——防谷令。日本政府立即威胁朝鲜政府，使之于次年即1890年春解除了禁令，但日本统治阶层不知朝鲜会在何时再度颁布防谷令，所以放心不下，这就增强了要把朝鲜作为确保稳定的粮食供应地的这种要求。

同时，朝鲜对日本来说，还是获得黄金的重要来源。从明治初年到1893年，日本从国外输入的黄金，其总额的68%，计八百三十五万日元是来自朝鲜的。这种黄金输入并不是作为一般商品的货款而获得的，而是利用了《江华条约》的附约，承认日元和日本银行的钞票能在朝鲜国内通用，遂以各种欺骗方法从朝鲜的金矿开采者以及农民那里“买来”，或是作为贷款的抵押而取得了金矿开采权。这样，必然促使朝鲜官民公开的或隐蔽的反抗日益加剧，日本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充实国际通货——黄金，而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在朝鲜扶植政治上的势力，才可望确保日本在朝鲜的黄金来源。

与把朝鲜作为粮食和黄金供应地的期望相比，把朝鲜作为日本商品输出市场的意义并不大。1890年前后，日本对朝鲜的输出，还不到日

本输出总额的2%，而且就在这有限的输出品种中，也不是日本的机械工业制品，而是一些家庭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杂货，棉织品等大部分是从英国输入日本后再输出朝鲜的。尽管如此，但随着清政府在朝鲜政治力量的增强，使朝鲜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也有所增加，日本的垄断地位开始崩溃，改进党系统的经济学者田口卯吉等人就起来叫嚣：“这真是国家不可等闲视之的严重事件”。在日本政府以及经济界看来，比起贸易金额的多少和市场有无前景来说，更重要的是日本紧邻的贸易被别国占有这件事本身，是使他们难以忍受的。

“东洋危机”论和“人口过剩”论

不仅政府方面，就是在政党和民间政论家中，也在叫喊“东洋危机”，鼓吹“东方政略”。这从1891年以后，骤然喧嚣起来。该年3月，俄国发表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5月，举行了从海参崴开始修建的开工式。俄国对远东的侵略即将进入新的阶段，这对日本朝野是一个刺

激。副岛种臣、近卫笃磨、陆羯南等国权主义者成立“东方协会”，开始宣传“东方政策”，也是在这一年。

曾经策划进行“朝鲜改革”的大井宪太郎，在这一年成立了“东洋俱乐部”，发表演说：“要打掉支那趾高气扬的臭架子”，“日本必须掌握东洋的霸权”；樽井藤吉在立宪自由党的机关刊物《自由平等经纶》上连载了《大东合邦论》。这就是说，日本和朝鲜诚心诚意地达成协议，合并为一个国家，建立新的“大东国”，与中国结成联盟，对抗西方列强对东亚的侵略；征韩论是要用战争取得朝鲜，而协议合邦论则是“不用武力而取得朝鲜”。大井宪太郎和樽井藤吉于次年即1892年成立“东洋自由党”，他们虽也提出了“保卫工人”、“制订佃农条例”、“实行普通选举”等民主政策，但与此相反，却把“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的长远计划，要以兵略和商略同时并进。”确立“扩张海军的规划”作为当务之急。大井宪太郎认为，空喊“休养民力”和“节减经费”，而不知对付“东洋危机”，在当前就没有当政治家的资格。他们甚

至还在和专制政府斗争过程中，也想要找到强调超越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的论调。

在这种气氛中，1891年5月，在大津市发生了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察，刺伤来日本旅行的俄国皇太子的事件。犯人津田三藏说他认定俄国皇太子是抱着进攻日本的企图前来视察地理情况的，所以才对他行凶。

在此前后，也出现了日本的“人口过剩论”。1891年4月30日，政府系统的《东京日日新闻》说：“首都最近的怪现象是女工与日俱增。……这完全是我国人口超过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因此，目前不扩张殖民地，就要限制人口。总之，如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说不定社会党、共产党之流就要接踵而至。”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也于1892年写出《殖民论》，说日本眼看就要人口过剩，所以现在就要迅速地积极向海外殖民；即使不是人口过剩，但因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向外殖民，所以日本也不能落后。我国在东洋要独立，要与富强的各国相竞争，就必须掌握制海权和商权，1893年成立了以子爵榎本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也有许多资本家加入这个协会。这些

“殖民”论显然是随着1890年以来“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发生的。

对华战争的准备和“硬六派”

自由党在第四届议会中失败以后，堕落为伊藤内阁的准执政党。改进党虽然仍是在野党，但已经不再提倡休养民力，而是集中在要求对朝鲜和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与欧美签订完全平等条约方面与政府相抗衡。政府方面也以1890年以来，朝鲜实行防谷令，日本商人遭受“损害”为理由，进行交涉，要求赔偿。1893年3月，政府暗示，如果朝鲜坚持不给“赔款”，就要诉诸战争。还有，原来的自由党员大石正巳用贿赂买得驻朝鲜公使职务，亲自前往汉城，采用抛开一切外交礼节的“强硬手段”，终于夺取了十一万日元的“赔偿”（5月）。此时，田口卯吉等人也在其主办的《东京经济杂志》上大肆煽动，说什么朝鲜如果迟迟对于日本商人因为防谷令而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就要断然与之一战，此时清政府势必援助朝鲜，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只有也往

天津投掷一弹了”（5月，10月）。

军部在1893年4月，成立了“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筹集武器和其他军需用品。5月，制订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同时，把海军军令部从参谋本部中独立出来，而且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亲自到朝鲜和中国旅行，构思进攻作战方案，并组织了军事间谍网，等等，已经发展到在具体的细节上进行对华战争的准备。而且川上操六参谋次长还与外相陆奥宗光秘密串通一气，使军事策略和外交策略的步调相一致。

不论是政府和议会，官僚和民间，都已把“对外强硬”当成了共同的口号，所差的只是程度的不同罢了。反政府各派，以超过政府之上的“强硬外交”来攻击政府。其急先锋就是与国权主义官僚品川弥二郎等关系极深的安部井磐根、神鞭知常等的一派和大井宪太郎等人的东洋自由党的一派相联合，在第五届议会前夕1893年10月结成的“大日本协会”。它的基本主张是：立即修改条约，签订对等条约，而且不开放内地。在平等条约缔结以前，对现行条约要最大限度地作到对日本有利的解释，例如要严厉取缔一般外

国人在法定区域以外旅行，外国人也要征税，也要使外国人严格遵守日本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一派的众议院议员虽只有二十几名，但因得到了贵族院近卫笃磨等实力派的支持，所以报纸《日本》，实际上就起到了这派的机关报的作用。

继此而出现的，是以萨摩阔海军巨头西乡从道为会长的“国民协会”。这是在第二次大选中，借助内务相的积极参与而当选的议员约七十人于1892年6月组成的，山县有朋是它的后台老板。他们在第四届议会以前，无论是对松方内阁，还是对伊藤内阁，都是唯命是从的，但此后因山县与伊藤对立，并担任了枢密院议长，他们就成了反对伊藤内阁的一派。

这样，在国民协会和大日本协会的推动下，改进党和众议院中另外三个小团体就联合起来，形成了“硬六派”，并在议会内外，不断地痛斥政府的“软弱外交”。

国民运动威胁政府

不过，他们所攻击的政府，乃专指伊藤内阁

而言。报纸《日本》的主编陆羯南就曾保证说：

“陆海军不在此例”。我们只要看一看硬六派的头目是些什么人，就可确知是不会与陆海军对立的。而且参谋次长和外相是在幕后呼应配合着的。但不久以后，当硬六派的运动也掌握住非议员的群众时，事态就发展为依靠统治阶级内部的滑稽剧已不能解决问题了。

在第五届议会上，强硬主张严格执行现行条约的在野党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政府向国内外宣传说，严格执行现行条约论，这是幕府末年攘夷主义的翻版。政府要以此使英国等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日本国民是怎样强烈地期望修改条约，同时，政府本身又是反对攘夷主义的强硬派，想以此博得外国对政府的好感。因此，在第五届议会期间，政府曾两次停止议会，1893年12月30日，终于禁止了大日本协会的结社，并断然解散了议会。

在此后1894年3月的大选中，不但在野党仍占优势，而且反政府运动也超出了山县等人的反伊藤运动的范围，开始发展为国民对官僚专制政府的反对。山县有朋见形势不妙，就又慌忙地转到伊

藤博文方面，成了一伙。但事态的发展早已越出了他们的控制力。伊藤首相说，如果这样，就“用井伊直弼的强硬主义来打倒反对派”，而且也曾考虑恢复1887年底的保安条例。陆奥外务相于3月27日给驻伦敦的青木公使写信，谈到“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明确宣布到底能作些什么，来振奋人心（不问其成败与否），则将不能挽回这种民情的骚动。要作出惊人的事业，又不能无故地发动战争，所以唯有修改条约，才能达此目的。”

陆奥宗光在这里虽然写道，或是进行战争，或是修改条约，但在此时，陆奥等人的政府，实际上已把对华战争和对英修改条约二事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英修改条约，是为了在对华开战时能取得英国支持，这是在外交上必须采取的一着棋，这项工作早从1893年7月起，就背着国民极其秘密地进行了。

西伯利亚铁路开工 和日英条约的谈判

在此以前，大隈的修改条约案被推翻以后，在

山县内阁中，青木周藏担任外务相，并于1891年2月开始和英国进行预备性谈判，其条件是六年以后，日本完全收回治外法权和关税权，而仅以开放内地为其代价，并不再任用外国籍法官和不再制订成文法规。承认联合审判和预约制订成文法规的改约案，到这时候已经是任何一个政府和外相所不会提出的了。这次谈判虽然一开始就遭到英国驻日公使的拒绝，但出乎意外的是英国政府却极表好意。这是因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使英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变化。

过去英国控制着从欧洲到远东的最重要通道——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从而大大阻碍了俄国向远东的扩张，但现在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则意味俄国将有一条向远东扩张的大动脉。于是英国从它把日本作为在东亚对付俄国的前哨阵地的传统政策（参见本书中卷第二十一章第七节、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出发，估计了日本作为远东新兴国家发展起来的国力，认为不要总是以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制度来压迫日本，而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的要求，更有力地把日本拉拢到英国这一边来，才是上策。

因此，青木外相的对英谈判是很有希望的，但不久，松方内阁取代了山县内阁。由于这次内阁变动和大津事件两个原因，青木外相也辞职了，由榎本武扬担任外相。虽然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青木的修改方案，但还未等到和英国正式谈判，松方内阁又总辞职，成立了伊藤博文为首相、陆奥宗光为外相的内阁（1892年8月）。

明治政府的危机 和朝鲜的农民战争

伊藤、陆奥内阁，在第四届议会结束前，为了对抗民党，一直在加强官僚专制，并倾注全力进行预计在近期即将开始的日清战争所需的军备扩张和贯彻对朝鲜的强硬政策。在第四届议会获得胜利后，1893年7月，政府才着手修改条约。这时陆奥外相放弃了在青木、榎本两外相时煞费苦心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同时收回治外法权和关税权的提案，而以仅仅争取废除治外法权和多少提高一些关税的提案，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政府当然也很希望收回关税权，但认为要想一举达到

所有的目的，势必拖长谈判时间，也就增加失败的可能性。与其这样，不如早日实现国民最关心的收回治外法权的问题，这是政府的当务之急。陆奥等人的打算是，可以利用日本取得英国的友好表示，来向各国，特别是向中国和俄国示威，并用以收买国内的人心。

如前所述，正当这次秘密谈判期间，议会和国民要求对外强硬，主要是要求对欧美强硬，立即实现完全平等条约的斗争高涨起来，并发展为反对官僚专制政府。陆奥宗光为了转移人民视线，急于对英谈判，便一再让步，在外国人租借地的权利和税率问题上也几乎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要求。

1894年5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议会。这次议会，连保守派也要求对外强硬，而且还要求“迅速实现责任内阁”。5月31日，众议院以一五三票对一三九票通过了不信任政府、弹劾政府的上奏案，使政府陷于一筹莫展的绝境。即使解散议会，反政府派恐怕只会照样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是明治政府成立以来超过第四届议会的最大危机。

正在此时，朝鲜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发

展起来。在日本历史书中，通常称为“东学道^①之乱”，而正确的说法，应叫作甲午农民战争。甲午是这一年的干支。所谓东学，是对于称呼天主教为西学而言的。虽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为江户幕府末期）发生在朝鲜的民族宗教的一个派别，但信徒以农民为多，恰如日本中世纪的一向一揆（佛教一向宗信徒的起义——译者）那样，多次是由反抗封建的统治和掠夺的农民暴动与东学道信仰结合起来进行的。1893年，也出现了东学道领袖和农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1894年2月，全罗道农民在东学道传教师全臻準等的领导下，为了反对官吏的压制和横征暴敛，举行了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一度平息下来，但在4月下旬再度爆发，立即扩展到全道，5月31日，甚至攻占了全道的中心——全州城。在起义的农民中，虽然有很多人信仰东学道，但起义并不是在东学道的影响及其指导下兴起的。在他们的口号中，也包含有“斥倭斥洋”（击退日本和西方的侵略）、“保国安民”等民族主义的要求。

^① 东学道：以前写作东学党，据周一良等编《世界通史》（1972年版）改为东学道。——译者

日清开战

1894年5月31日，朝鲜农民军攻占了全州，朝鲜政府请求清朝出兵镇压起义。这一天也正好是日本第六届议会通过对内阁不信任的上奏案，造成了明治政府最大危机的一天，但当汉城传来朝鲜已请清政府出兵的急报时，伊藤首相和山县枢密院院长就把它当作是天助而高兴。按照《天津条约》的具体解释，如果清政府向朝鲜出兵，日本也就可以出兵。这正是发动预先准备好了，以控制朝鲜为目的的战争的极好机会，而且不是还可以转移议会与国民对官僚专制政府的攻击目标，而使之云消雾散吗？

伊藤首相和山县枢密院院长反复商议，根据山县的坚决主张，于6月2日解散了议会。同时在这一天，决定出兵朝鲜（未公布）。5日，就迅速成立了大本营，即战争的最高指挥部，下令动员第五师团。12日，清政府军队在汉城以北的牙山登陆，日本混成旅团的先遣部队也于同日在仁川登陆。接着，约七千人的整个旅团在十六日全部

登陆完毕，真是快如闪电。其实，参谋本部早在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以前的5月下旬，就开始进行出兵准备。6月1日，就以“陆军大演习使用”为名，把日本邮船公司的轮船紧急集中起来。然后就只是等待公开宣布出兵了。

全璘準等得知清政府和日本出兵朝鲜，即于6月11日与朝鲜政府休战，退出了全州城。因此，日清两国军队到达时，已经根本没有任何“镇压民乱”的借口了。此时，接受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密令的内田良平等人，组成了称为“天佑侠”的特务队，自称援助“东学道”，实际打算扰乱朝鲜的社会治安，但朝鲜农民没有上他们的当。这就是内田等人所说的“东亚解放”、“日朝联合”的真相。就是在日清开战以后，日本军队仍和朝鲜军队一起，共同镇压了全璘準的农民起义军队。

还有，仁川的日本军队向牙山的清政府军队挑衅，但清政府军队未为所乘，使日本没有得到预期开战的机会。这样，日本政府便于6月16日向清政府提议，由日清两国共同劝告朝鲜政府实行“内政改革”，但遭清政府拒绝。陆奥宗光等

人早已预料到这一点，所以此后日本政府就单独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方案，迫其实行。这一“改革”方案一直遭到朝鲜的坚决拒绝，日本驻汉城公使大鸟圭介就于7月20日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宣布废除和中国的从属关系。23日，日军占领王宫，赶走了掌握政权的王妃闵氏一族，以大院君为执政，组成了亲日内阁。

原来向朝鲜提出的“改革”，只不过是想为日清开战制造机会罢了。关于这一点，在陆奥外相的备忘录《蹇蹇录》中有很清楚的自供。两天以后的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丰岛海面的中国舰队，并击沉运输船。29日，日本陆军对牙山和成欢的清政府军队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三天后，8月1日才向中国宣战。

对中国开战和对英修改条约

日本政府决心开战时，最注意的是英俄两国的动向。和英国进行的修改条约的谈判要以最快的速度早日达成协议，这是开战所必需的前提。

在伦敦担任谈判的青木公使觉察到“英国人有意让日、清两国军队留在朝鲜北部或全境，英国就可不费力地防止俄国南侵。”乃于6月（日期不详）向英国政府提出日清两国“打一仗前后”即缔结条约，把朝鲜作为日清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的提案，得到英国政府原则上的同意。这是日本想以替英国承担牵制俄国南下的任务，来取得英国对日本自己侵入朝鲜的支持。

日本的这一态度，使英国得到满足。7月16日，青木公使和英外相金巴莱签署了日英修正条约。签字后，金巴莱外相向青木公使和日本政府致祝词说：“这个条约所具有的性质，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能使中国的大军败走，不如说更具有远为优越的性质。”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发动的违反国际惯例的突然袭击，就是在这九天以后的事情。当时中国军队雇佣的英国船也被击沉，但英国方面并未就此说一句使日本为难的话。而当时俄国明显地进行了干涉。但是伊藤首相写给陆奥外相的指示说（6月25日），为牵制俄国，我们采用的是“我们要依赖英国”的方针。

新条约在批准后五年生效，生效同时即完全废除治外法权，而代之以日本内地的开放，但不给外国人土地所有权，只给长期的租借权和地上权，而原有居留地的永久租借权则继续保留。以上述各项为条约的要点，条约的有效期，限定为生效后十二年。此后也就能够缔结完全平等的条约。新条约批准后，于8月25日换文。接着，在这一年的11月和12月，分别与美国和意大利也缔结了新条约。到1897年底，与欧美所有国家之间全都缔结了仿效日英条约的新条约，从1899年7月17日或从8月4日开始生效。

这不仅对日本民族主权的完全独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而且从它是亚洲的国民与欧美各国缔结的第一个没有治外法权的条约这一点来说，在亚洲历史上也有其进步意义。尽管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宪法的虚伪的产物，但总算是有了宪法和议会后，日本在政治上有所进步的一个成果。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修改条约，乃是专制政府利用了国民的民族力量，使日本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前哨阵地，因此，它还不能算是完全平

等的条约，而是和日本统治阶级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纠缠在一起的。它体现了整个日本近代历史的民族的光荣和耻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战争的发展和下关议和

宣战后，日本政府把大本营迁至广岛，天皇以大元帅身分也移至广岛的大本营。建立了完全举国一致的体制，“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一致对外的情绪，控制住了全体国民。战局的发展是日军连战连胜。陆上，9月15日于平壤打败了在朝鲜的清国军队主力；海上，于同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击败了中国舰队的主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10月下旬，第二军于辽东半岛登陆，一下子占领了旅顺。平壤战役后，从朝鲜北上的第一军，越过国境，进入中国领土。1895年2月占领牛庄、营口；同月，第二军也占领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失掉根据地的中国北洋舰队因此投降。

开战时，日本动员了陆军七个师团的兵力约十二万人，海军军舰二十八艘，约五万七千吨及

鱼雷艇四艘。清政府的步兵（包括炮兵）和骑兵是三十万人，再加上开战后新编成的部队，据说共有六十万人，但据推测其投入战场的军队却少于日本。海军出动了包括两艘钢铁巨舰在内的二十五艘军舰，其总吨数和火力虽然都超过日本海军，但因各舰新旧大小不一致，所以作为舰队来说，缺乏平衡性和统一性。

总之，在兵力的数量方面，清政府的陆海军都超过了日本，但其质量却显著低劣。在清政府军队中，因将军们的地方割据，造成了军队装备、编制的混乱和指挥系统的不统一，军队多数归军阀私人所控制，士兵训练质量低下，指挥官幼稚无能。这反映了清国政治社会体制的封建性质。与此相反，日本在政治上坚强统一，完全能够成功地动员国民大众投入战争，军队的组织和编制整齐，能够上下一致，并有周密的训练。

清政府在开战后也没有统一意志，对日战争几乎只是李鸿章的北洋军阀的战争，就连李鸿章本人也是不想打仗的。他在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后，就急于求和，把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作为其私人代表，派往日本讲和，伊藤首相则

以其无代表资格，未加理睬。于是，李鸿章又于1895年1月底，派出两名中国人为全权代表，并伴有美国人顾问，前往广岛；但伊藤等人认为战场上的胜利，再稍加扩大战果后进行讲和方为有利，于是要求清政府：如真要讲和，就要派李鸿章那样的最高级官员为使节。在此期间，日本军队进攻了台湾和澎湖。这是由于海军的强烈主张，企图占领两地为日本的领土。

由于清政府方面毫无战意，所以包括占领台湾在内的整个战争中，日本军队死亡一万七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因患赤痢和其他疾病而死亡的有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人，而战死的仅为五千一百四十七人。就从这点，也可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激烈的战争（日本在1868年的内战中，新政府的兵力与这次战争动员的兵力同为十二万人左右，而其战死者约三千六百人，负伤者三千八百人，与此相比，也可判明日清战争的程度了）。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亲自担任全权代表来到下关，从次日开始进行和谈，但在24日，李鸿章遭日本战争狂热分子狙击。日本政府担心这件事发展为国际问题，成为各国，特别是俄国干涉媾和

的机会，因而认为还是以尽快达成和谈为宜，便于27日答应了李所要求的无条件停战。这次外交十分顺利。媾和谈判因此而有了迅速地进展，未给各国干涉以可乘之机。4月17日，日清两国的全权代表在下关签署了媾和条约和附属议定书。

日清甲午战争从开战到讲和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在政府的领导下，把政治和军事统一起来，而不允许军事上独断专行。作为文官的伊藤首相，得到天皇的特许，正式参加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的会议，也保证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因为有了这个统一，就使和谈能够早日完成。

讲和的条件是苛刻的，清政府方面（一）承认朝鲜为完全的独立国家；（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战费库平银二亿两（三亿日元）；（四）仿照清国目前与欧洲各国间缔结的条约，签订新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和关于陆路交通贸易的条约，此条约实施前，中国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五）是进一步：（1）除原有开放的商埠、港口外，再新为

日本开放四座城市和港口；（2）许可日本商船使用长江航线；（3）免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购买货物和运输货物入库存放的税款；（4）日本人能在中国开放的商埠和港口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其成品免税，在存放货栈等方面，得与输入品同等待遇（资本输出的自由）。

从被压迫国向压迫 别国的国家发展

上述第一项，所谓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并非为了朝鲜的真正独立，而意味着对于日本迫使朝鲜成其附庸的作法，中国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实际上，日本在对华宣战后不久的1894年8月20日，就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暂定合同条款》，同月26日又逼迫朝鲜签订《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前者《合同条款》使日本攫取了铺设汉城到仁川和汉城至釜山之间两条铁路的权利；后者《两国盟约》使朝鲜承担了为日本军队作战及粮食供应等方面提供一切方便的义务。陆奥外相曾经写道，这个《盟约》，一方面显示了朝鲜是一个也能和

外国缔结攻守同盟的自由的“独立国”，另一方面，又是把朝鲜“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使之丝毫不能和别的国家进行联系的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政府虽也打算趁此时机进一步公然用军事条约使朝鲜从属于日本，但因害怕各国干涉，这种强烈要求遂暂时作罢。看到这些，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下关条约中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的真正意图了。

在第二项的领土条款中，规定了割让辽东半岛。关于这项规定，在条约签字六天后，俄、法、德三国以“为了远东和平”为借口，“劝告”日本把辽东归还中国。日本政府虽想依靠英国来抵制这次干涉，但因英国也公开表示不支持日本，日本就不得不接受三国的“劝告”，在和约批准后，立即把辽东半岛重新归还中国，而作为代价，却得到了库平银三千万两。

第三项规定的赔款，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使用战费总额二亿四十七万日元的约一倍半。中国为了支付这笔巨额的赔款，而受到了俄、法、英等国在金融上的控制。

第四项不言而喻，是日本想取得在条约上与

欧美各国同等的对中国的特权，从而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半殖民地市场。

第五项是欧美各国在过去也不曾有过的经济上的特权。尤其是承认其资本输出的自由这一项，反映了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阶段，即与过去的商品输出并行，或者是超过了商品输出而强烈地要求资本输出的阶段。

不用说，日本新得到的这些特权，欧美各国也都可以根据它们对华条约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而当然可以马上取得的，但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却未发展到强烈要求单独进行资本输出的程度。事实是甲午战后日本也几乎未向中国输出资本，而英国等资本却反而乘此机会流入中国。从结果来看，是日本为欧美列强铺平了向中国输出资本的道路。大概这项关于资本自由输出的条款并非出自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而是想以此来获得欧美各国对和约的广泛支持吧。

日本就这样，从被欧美各国压迫的国家，成为与欧美各国狼狈为奸，压迫朝鲜、中国的国家；在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帝国的同时，又为欧美

帝国主义打开了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瓜分领土和资本剥削的道路，博得了它们的欢心。有谁能把这种战争说成是把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呢？

可是，日清甲午战争“如此这般的大胜利”，虽然给军人和高级官僚带来了勋章和爵位，给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给国民大众带来的却只有苦难。这次战争的临时军费预算二亿五千万日元，相当于开战以前国家每年收入的二倍以上，但正象掌管财政的当局高桥是清所承认的，这“完全象德川时代征收军费那样”，是用强制认购公债和增加税收来维持的。而且战胜以后从中国得到的三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赔款的75%以上被用于战争的善后工作和扩张军备，二千万日元成了天皇的财产，而直接用于国民生活的救济基金和教育基金共计只有二千万日元。加上战后连年肆意扩张军备，不断增加税收。政府鞭撻国民，为报三国干涉之仇，必须经受“卧薪尝胆”之苦，日本帝国的“荣光”，正是国民大众的卧薪尝胆。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掩盖现实生活的苦难，让广大国民把天皇和军人、官僚的“荣光”

错觉地也当成广大国民的荣光，就向国民灌输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统治民族的优越感，使国民在精神上也堕落下去。

三十 资本主义的发展

——官僚、资本家、地主、群众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日清甲午战争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横财。他们在战时那种唯利是图的谋利手段，只要看看陆军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在军需牛肉罐头中掺杂石子一事，即可一目了然了。因此，据说在战时担任第一旅团旅团长的清廉的将军乃木希典在后来担任台湾总督时，也嫌恶大仓组在台湾设立分店。即使撇开传说，看一下统计，例如就全国银行已缴资本所公布的利润，也是从开战前1893年的47%，增至战时的51%，而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896年，则激增至64%。

由于从这次战争中所得到的利润和从中国得到的巨额赔款、广大的领土，扩大了新的市场，

又加上战后以“卧薪尝胆”为名对群众的掠夺，以特权大资本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就有了飞跃地发展，其主要指标如下表。

资本主义发展指标（1893～1903年）

	1893（明治26年）	1903（明治36年）	十年间的增长率
公司总数	2,844家	8,895家	3.13倍
投资金额	24,500万日元	93,100万日元	3.80倍
雇工十人以上工厂总数	3,740厂	8,274厂	2.19倍
使用原动力工厂数	675厂	3,741厂	5.54倍
每日平均开动纱锭数	382,000锭	1,290,000锭	3.38倍
铁路营业哩程数	2,039英里	4,495英里	2.20倍
轮船总吨数	110,205吨	656,745吨	5.96倍
出口贸易金额	8,971万日元	28,950万日元	3.23倍

此表中的公司资本金额，若按行业区分，虽然1893年和1903年均以银行资本金额为最多（1903年银行资本为37,469万日元，工业公司的资本为17,169万日元），但就这一期间的增长率来看，工业公司的资本是最高的。而工厂的增长率虽不到2.2倍，但使用发动机的工厂却发展为5.5倍以上，在工厂总数中，使用发动机工厂的比率

从18%发展为45%。在工业中，棉纺织业的跃进特别显著。在零散企业和家庭工业比重大的缫丝生产中，从1896年开始，也是机器缫丝的产量超过了手工缫丝。总之，机械生产以纺织、缫丝等轻工业为中心，在日清甲午战争后确立起来了。根据1900年对民间工厂的调查，纤维工业拥有工厂总数的71%，占有发动机马力总数的46%和占职工总人数的67%。

民间的机器制造业、造船业，在1900年前后，也开始出现了三菱的造船厂、三井的芝浦制造所、住友的轧铜厂等特权大资本的公司。但是，这些部门在1910年代以前，还是以炮兵工厂、海军工厂为首的官办军火工厂占压倒民间资本的优势。工作母机和蒸气机自不必说，就是纺织机械也仍旧依靠进口。重工业方面，划时代的发展是1897年以1,920万日元巨额投资建设的官办八幡制铁所（钢铁厂），于1901年开工生产了。八幡制铁所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就已经生产了日本生铁的53%，钢的83%。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日本军火制造业的独立。

八幡制铁所使用的矿石，是乘日清甲午战争

胜利的机会，以不合理的低价，进口中国大冶的铁矿石。这样一来，德国就与日本对抗，向中国提供借款，想要独占大冶矿石。虽然日德两国因此而互争权利，但1903年11月，即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成功地与清政府订立了由日本独占大冶铁矿三十年的合同。日本的资本虽然没有象德国那样提供借款的能力，但当时日本已在远东具备了最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尽管资本的力量薄弱，但已有了在帝国主义争夺权利中取得胜利的基础。

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把朝鲜、中国变成从属的半殖民地，输出也如上表所载，有了急剧的增加。在输出品中，蚕丝仍占第一位，棉纱和棉织品次之，比重逐年增加。1895年棉纱出口还只占进口的七分之一，而到1897年，出口就开始超过了进口，以后每年进口激减，出口激增。棉纱棉布的输出地，主要是中国和朝鲜，占日本向该处出口总额的四、五成。进口商品主要是机器和棉花、铁矿石等原料。由上表可以看出，贸易的增加，带来了海上运输的飞速发展。

以上述各种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为基础，并利用日清甲午战争的赔款，到1897年，过去事实上

是银本位制的日本已过渡到金本位制。这表明，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成为并驾齐驱的一员了。虽然产业界认为此时不宜实行金本位制，加以反对，但政府为了给募集扩张军备所需的外债创造有利条件，就对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

此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

即使是在这一阶段，日本资本主义也和其产生的初期一样，是与军事极其密切地结合着的。

（参照本书中卷第二十四章十一节），这是第一个特征。在重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八幡制铁所以及陆海军工厂的军事意义，不用说了，就是民间的造船和海运业，也是不仅与贸易的发展相适应，而是由于1896年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作为扩张海军计划的补充，对在战时能改装为巡洋舰的大型轮船的制造及其航运，由于政府给予特别的奖金和保护而发展起来了。还有铁路的建设，虽然经过根据《铁路铺设法》而召开的铁路会议的讨论，但在这个会上，也是参谋本部代表的发言权最大。即使是棉纺织工业，这时

织布的机械化也只是用于军服的生产。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所谓国旗跟着贸易走，即先有经济上的侵略，接着才是政治和军事的侵略，而日本则相反，是贸易跟着国旗走。就连币制改变为金本位，也是对军事财政的关心胜过了经济本身。当时日本重要的资本主义产业中，和军事没有直接联系的只有缫丝业而已。

与这样地和军事目的结合在一起相联系，便产生了第二个特征，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澁泽、古河等早已与政府相勾结的特权大资本家在日清甲午战争后，也还是压倒小资本，因而在日本没有产业资本自由竞争的阶段。在矿山工业和重工业中，特权大资本的垄断自不待言，就在这个时期发展最迅速。在日本机械化大工业中比较有自由竞争的纺织工业，也是三井和其他政商资本系统所属的大阪、天满、钟渊、尼崎等几家公司占绝对优势。纺织品生产虽然一直是飞跃地增加，但公司数以1899年的七十八家为最多，从次年起即开始减少，1904年是四十三家，1912年是三十二家（后来又有增加，1922年为六

十一家)。

银行业也是同样，1901年底，六大城市公会所属银行一百七十余家之中，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和正金等八家银行的存款总额占全公会所属各银行存款总额的51%，而且据估计，全国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十几家大银行，其他二千余家银行的存款总计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从封建高利贷发展起来的三井、安田，除经营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之外，还自己经营工厂、矿山、铁路、海运业，或控制其股票。而象三菱、住友那样开始并未插手金融业的，也有了自己的银行，到1900年前后，已经形成了在金融和所有主要产业部门发挥威力的“财阀”。

国民大众挣扎于重税之下，这些税收浪费在军事方面，用于再生产的反而很少，而且因为财富集中于特权大资本家手中，就妨碍了一般民间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工业的机械化不能从下边一齐发展起来。在大资本的大工业周围，有庞大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它的生产量在整个工业生产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估计至少超过七

成。在纺纱、造船、造纸方面，的确是机械化大工业占优势，但此三者产量总计在整个工业生产量中所占比例，1910年也不过只是16%。同年，在占整个工业产量21.9%的纺织工业中，还是封建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占压倒优势。这样，这种纺织工业就成为纺织的大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条件。仅次于纺织业产量的缫丝业，也是工场手工业占压倒多数。不单是少数大工业与庞大的手工业并存，而且象我们在棉纺织业中的纺纱与织布的关系上所看到的典型那样，两者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三个特征。

如果从工人人数来看，使用十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人数，官营加上民营，在日清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虽然约从三十四万人增加到五十三万人，但此时仅棉织品家庭手工业的从业人数，就超过了八十万人。而且工厂工人中的六成是纺织、缫丝女工，他们多半是贫农女儿，为补助家庭生活，就象卖身一样，来到了工厂，不要几年就再回到农村的家里去。总之，这样的女工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而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从业

者，虽也有些来自城市的贫民，但主要的还是农民的家属。

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从业者，其劳动时间可以说是无限制的，其工资是以业余副业为标准的最低的工资。于是，这就成了一块重石，经常把大工业的工人的工资和待遇也向下压低，这就产生了第四个特征，即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极端低下。在矿山、纺织、缫丝、土木营造等方面，工人的处境特别悲惨。缫丝工厂的劳动时间竟达十四至十七小时，纺织业实行昼夜两班制，深夜也工作。还普遍实行纳屋^①（矿山）、寄宿舍（纺织、缫丝）、饭场（土木营造）等拘禁工人和罚款、减薪、减食等惩罚制度，甚至还经常使用私刑。即使是男工，他们的工资也要低于瓦、木等手工工人，常常连搬运工人的工资都不如。

上述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着的，而且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结合在一起，这就产生了第五个最重要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叙

^① 纳屋：意思是宿舍。从农村招来的劳工，住在这里，受工头的控制，没有生活的自由。——译者

述。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人口在全人口中的比例，从1891年的70%，减少到1903年的64%，反过来说，就是非农业人口增多，特别是大城市人口激增。

这样一来，农产品的需要量增加了，价格上升了，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业的商业化。这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窄刃锹和镐等的改良、中耕除草器的发明、用牛马深耕的普及、品种的改良等有了进展，从中国东北输入的豆饼取代了鱼粉肥料，以过磷酸钙为主的化学肥料的使用也得到普及。硫酸铵虽是少量，但在1900年以来也开始使用。也进行了共同培育秧苗，进行条植等技术改良。因此每反^①产米量从1878——1882年间（明治11—15年）的五年平均1.169石，增加到1898——1902年（明治31—35年）的平均1.497石，

^① 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18公亩，991.8平方米。——译者

二十年中间增产29%。这一期间，耕种面积也增加11%，米的总收量也从2981万石增加到4248万石，即上升42.5%。

旱田作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棉花、叶蓝、甘蔗、大麻等的栽培以及用此为原料的传统的手工业，因经不起外国商品或化学制品的竞争而衰亡。在这些田地上就种上了小麦、蔬菜和桑树。特别是因蚕丝输出的增加而养蚕业的发展极为显著，苹果、柑桔等果树园的经营也开始了。

农业生产的提高，使上层农民和地主阶级得到好处。但是农家的百分之四十是不足五反的自耕和租佃的小块土地耕种者，其余的一半也只是种植不满一町步土地的，所以大多数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反而在农业的商业化的过程中吃了苦头。由于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必须购买的衣料和其他生活资料也都增多了，肥料用款也增加了。加上，与日清甲午战争前相比，战后的地税和地方税也增加四成，由于1896年的提高酒税和烟草的专卖制以及间接税的增加，因而国家的剥削激增，小农贫农为此而需要现金，就经常把自己家中的口粮也出售掉，而用麦子、小米、稗米、甘

薯等充饥。

根据横山源之助的名著《日本的下层社会》（1899年版），耕种五反土地的佃农，除去地租、肥料、种籽等费用外，即使不算劳动费用，其一年所得连50日元都难以达到。当时手艺人每年所得120日元至135日元，做日工的搬运工人每年收入从90日元至100日元，即使与此相比，也可知佃农农业收入的可怜状况了。小农和贫农向地主、肥料商和米商等借用高利贷，结果不得不卖掉土地。而且因为借债，所以即使完全失去土地，也还是不能离开农村和脱离农业，而且因为到工厂当工人的条件和机会也少，所以就不得不作为佃农而束缚在农业上。这样，女儿成了纺纱、缫丝、织布的女工，儿子在建筑工地或矿山劳动，家长自己也在农闲时出外作工，把所有这些收入全部加在一起，才勉强能够交纳地租，使小孩子受到义务教育和维持一家的生活。

资本主义和寄生地主制的结合

这样，不足一町步的耕地所有者，渐渐把土地

卖掉，自耕兼佃耕或佃耕兼自耕，甚至成为纯粹的佃农。相反的，则是三町步以上、特别是五町步以上的耕地所有者增加了，拥有三十町步、五十町步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也增加了。地主并不作为富农或农业资本家来扩大经营其土地，而是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成为寄生地主。于是，就以佃租收入来购买股票和债券，大地主也向商业、金融和工业等方面发展。寄生地主制成为资本主义产业资金的重要补充来源。

1896年，用国家资金设立劝业银行和府县农工银行，确立了以不动产为担保的长期低利贷款制度。它的目的虽是谋求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但中央的劝业银行不用说，就是府县的农工银行也不是小农的贷款机关，这些银行一方面以长期低利的巨额资金专门借给大地主，把它投入到农业以外的企业中，或者以高利贷给小农，借以获利；另一方面则起到了把农村的资金吸引到城市的作用。这样，从1900年开始实行《产业组合(农业合作社——译者)法》，虽然信用合作社作为小农的信贷机构而建立起来，但这也是集中小农的零碎的款项；由于合作社购买债券和股票，就助长了

农村资金流到农业以外的部门。总之，不论是不动产银行还是信用合作社都不过是城市资本和大地主勾结一起剥削小农的机构。

这样，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力，主要来源是挣扎于寄生地主制重压之下的小农和贫农，以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为基础，就能够以低工资和长工时的劳动，而保证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就是说，不论作为资金的供给来源，或作为劳动力的来源，寄生地主制对于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反过来看，由于极其低微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而妨碍了女工以及青年工人的独立，他们被禁锢于父权家长制的统治之下，依靠他们对家中寄款，才使农民能够交纳地租，所以城市工业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对于地主制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就这样在其最坏的方面相互利用，牢固地相互结合而发展起来。这种结合也在“有产者”的情况中反映出来。根据1901年《时事新报》登载的日本全国拥有五十万日元以上的有产者的姓名及其职业来看，在总数的441名中，88名（20%）的头衔是“农业”、“林业”、

“大地主”，63名旧大名华族(14%)以及“高利贷者”、“造酒业”也都是兼大地主的。因此，这些资产家的一大半是大地主兼资本家。身兼最大地主和最大资本家的最大的有产者，是天皇家族，天皇正是作为臣民的有产者们的理想的典型和代表。

工人运动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日清甲午战争前，这种运动还是作为含混不清的贫民问题而出现，而此时，则作为工人问题和租佃问题而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性质。

1897年的灾荒和经济危机时，即使根据警察的统计，罢工也达三十二起，参加者有六千三百人，这是到此为止的最高数字。这一年，城常太郎和高野房太郎成立了“职工义勇会”，开始了成立工会的宣传。片山潜和高野房太郎等人一道成立了“劳动组合（工会——译者）期成会”，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世界》。高野和片山都是在美国勤工俭学后回国的。

由于期成会的努力，成立了东京及其附近的铁工工会和其他工会。铁工工会在1900年初即拥有四十二个支部和五千四百名会员，把当时大工业中熟练工人的大部分都组织起来了。1898年2月，又有日本铁路系统的四百多人反对解雇，要求改善待遇，断然举行罢工，使东京到青森全线火车停驶，终于争得了全部胜利，接着就组成了叫做“日铁矫正会”的工会。

日铁的罢工，迫使伊藤博文的嫡系官僚、当时担任农商大臣的金子坚太郎痛感“社会政策”的必要。他向工人演说：“让职工团体坚强起来，乃是巩固一国的基础，所以绝不只是为了职工，希诸位职工团结起来！”这虽然是企图把正在萌芽中的工人运动纳入官僚的父权家长的统治之下，但对一些稍有先见之明的官僚来说，工人阶级的力量确实已经成长到使他们不能忽视的地步。不过铁工工会以及日铁矫正会和其他工会都是根据劳资调和主义，以“改良风俗”，即以提高工人的修养和品德来取得社会的尊敬，和以福利互助活动为主要目标的。从现在工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会很难叫做工会，但在工人被视为半

贱民的这个时期，工人们开始觉悟到要团结起来，争取提高社会地位和提高生活，其历史意义还是大的。

日铁矫正会在1901年3月的大会上，从劳资调和的观点迈出了一步，宣布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等等，表示了阶级自觉性的提高。但今年11月，明治天皇到东北地区巡视时所乘火车因起点站与下一站之间未联系好，而中途紧急停车，于是就借这个使天皇受到惊吓的事件，捏造说是工会的阴谋，由警察解散了工会。还在这之前的1900年3月，制订了《治安警察法》，其中规定，相当于刑法的妨碍农业、工业的罪行的判刑更为严酷，工会活动转为极端困难。随着共济资金的不足，工会吸引力减弱。到1901年底，铁工工会等也就成为有名无实了。

农民斗争和佃农协会

农民的斗争也活跃起来了。1897年的米骚动，以长野县饭田地方两千农民的暴动为开端，遍及信越、北陆、关东、东北地方的农村和城乡。这

些农民暴动与佃租纠纷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还有由于反对因修筑堤坝、铺设铁路而征用土地，要求减轻灌溉水渠的保养费用及其他各种原因，1900年前后，在各地农村发生了暴动。从明治初年一直进行的反对国家掠夺集体共同使用的山林和草原的农民斗争，1899年取得了《国有林野发还法》的胜利。

作为全体农民反对国家权力和反对特权资本家的斗争而轰动一时的，有渡良濑川沿岸农民要求政府防止古河财阀经营的足尾铜矿的矿毒、救济受害者的大斗争。站在这一斗争前列的，有曾经是自由民权运动斗士的众院议员田中正造。他们从1897年至1900年，曾四次大规模进京请愿，要求政府救济，而这次遭到警察与宪兵的残酷镇压。虽然以幸德秋水以及木下尚江等社会主义者为首的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对农民进行了支持，但政府却始终没有为农民而减少古河财阀的利润。

这种反对国家和资本家的，包括有上层农民、有时也包括地主在内的全体村民的斗争，在此时期达到顶点。进入二十世纪后，农村里，地主和佃农的对立，就成了农民运动的核心。围绕

减轻地租和保障耕种权，地主与佃农之间隐蔽的和公开的斗争到处可见。“佃农协会”也逐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工会的劳资调和主义，同样以地主和佃农合作的思想为基础，争取了维持和改善佃耕的条件。

还有1902年，冈山县成立了叫做“备作平民会”的组织，这是受差别待遇的部落民自发地团结起来，以共同的修养、勤俭储蓄、改良风俗等来争取从差别歧视下解放出来的团体。不久，同样的团体在奈良县、广岛县等地也出现了。

社会民主党的意义

以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开始萌芽。为了研究社会主义，1898年，片山潜和安部矶雄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幸德秋水等人也参加了。到一年多以后的1900年1月，发展为以社会主义运动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协会”。这些社会主义者有的象片山、安部那样出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也有的象幸德秋水那样来自自由民权论的急进派，在

思想上说来，起初是掺杂着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民主主义，而其中的幸德、片山等人却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发展。

社会主义者不仅推进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成为以普选运动为主的民主主义运动的担当者和主力，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日本最初能够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抗衡到底的力量。即使象幸德秋水的老师中江兆民那样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在战争以后，一方面虽也一般地批判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可是对于本国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却也有一时地或部分地表示赞同的。幸德自己在1899年的社论中，虽也鼓励政府在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中不要落后，但在他飞跃地转变到社会主义以后的1900年11月，就在《万朝报》上，日本最初地系统地阐明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对日本“军人的耀武扬威的空架子和软糖雕琢式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地谴责。第二年春天发表了进一步详细地阐述这些论点的名著《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

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也已不再是“神代复古”等的幻想，而是具有了阶级的性质。西川光

次郎和幸德秋水提倡，只有完全废除地主制，土地国有或公有，实行工人和农民合作的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农民。在社会主义者以外，安冈雄吉和宫崎民藏等人也主张把土地平分给农民。

不久，1901年5月，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片山潜、西川光次郎、木下尚江、河上清等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炮兵工厂、日本铁路的大宫工厂的熟练工人等先进工人也参加了该党。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实现”，以人类平等、为世界和平而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土地和资本的国有等为“理想”，作为“实际运动的纲领”，而提出了废除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缩减军备、实行普选、制订工会法和保障团结权、制订保护佃农法、废除童工和女工的夜班生产等。而且在这个“宣言”中，还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首先要获得普选，自始至终采取了议会主义。该党虽在成立当天即遭禁止，但其纲领以及宣言在此以前已在几家报纸上登载过，所以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映。

这些运动和理论都只不过是正在萌芽，和工

人阶级的结合也只是刚刚迈出第一步，对农民还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它给统治阶级的威胁却不小。因为这个社会主义，是由多种思想形成的混合物，社会民主党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政党，不如说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小集团，但是，唯有它却把对专制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一切批判力量结合在一起了的缘故。而且统治阶级从很早以前，就预料到日本不久也会出现和西洋各国一样的“社会党”以及工人运动而感到不安，所以现在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微小，但因它已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所以他们就日益感到威胁。

资产阶级介入政治活动

如果资产阶级发展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经济力量增强了，那么他们的政治力量或迟或早也要增强。例如1896年9月第二次松方内阁成立时，三菱的岩崎弥之助使大隈重信的进步党（当年3月以改进党为中心，集结了反政府的各派议员而建立的）与松方合作，从幕后操纵内阁。在这个内阁之后，1898年1月，成立第三次伊藤内

阁时，不得不立即邀请财界巨头二十二人，召开“经济恳谈会”，要求合作。政界首脑和大资本家的这种结合，引起了舆论对于“金权政治”的责难。

特权大资本家和官僚政府以及政党干部进行直接勾结，而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在制度上则是通过政党和议会表现出来。因此，他们力量的增强就表现为政党和议会对官僚政府的增加压力。日清甲午战争后，不管哪个内阁只要得不到众议院强有力的支持，就搞不下去。

第三次伊藤内阁于1898年春收买自由党为其“雇佣兵”，想要增加地税作为扩张军备的财源，但在关键时刻，由于自由党的背叛而告失败（6月）。伊藤博文据此经验而痛感“雇佣之兵不可靠，非有自己的御林军不可”，便接受三井系统大资本家的支持，打算建立御用政党，但因三菱系统大资本家的反对，再加上山县枢密院议长等人也进行刁难而失败。这样，伊藤博文放弃了内阁，并向天皇推荐自由党和进步党为反对增加地税而合并建立的宪政党的首领大隈重信或板垣退助为后任首相。结果，6月成立了以大隈为首相、板垣为内相的宪政党内阁。

社会上把大隈内阁作为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来欢迎，而受天皇命令勉强留任的前内阁陆相桂太郎却在山县有朋的幕后指挥下，从内阁成立之日起，即阴谋推翻这个内阁。社会上虽然称新内阁为政党内阁，但却嘲笑它只要军部大臣不从政党产生，这个内阁充其量也不过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半身不遂的内阁”。

恰好在大隈、板垣内阁的文相（教育部长——译者）尾崎行雄在责难金权政治的演说中说了，假如日本万一也实行共和政治的话，那么三井、三菱就要当总统了。山县有朋一派即以此中伤尾崎，说他在宣传共和政体，并以此作为倒阁的材料。还利用宪政党内部旧自由党和旧进步党的派系斗争，进行分裂。这种分裂活动取得了成效，宪政党分裂为旧自由党系统的宪政党和旧进步党系统的宪政本党，内阁仅存在四个月就倒台了。

官僚独裁的加强和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此后，成立了第二次山县内阁。山县有朋虽

然极端厌恶政党，但如没有议会支持，就不能通过推行重要政策的预算案，所以就大举收买宪政党，并声称与板垣等党首“为国家肝胆相照”。因此，山县内阁实现了增加地稅的悬案。过去曾强烈反对增加地稅的地主议员，这时又赞成增稅了，内幕是因为把议员的年度报酬从八百日元一下子增加为二千日元，给予极大的优待。

山县这种操纵议会和政党的费用出自天皇。天皇拥有的日本邮船公司的股票，其红利超过5%的部分，被用作机密政治资金，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使用，特别是第二次山县内阁从宫内省提取款项竟达九十八万日元的巨额，山县不仅使用这笔款项操纵政党和议会，而且也塞进了自己的腰包^①。

山县有朋在尽量利用宪政党之后，又将它抛弃了。这样，1899年3月，就废除了简任文官的自由任用制，修改了文官身分令和文官惩戒令，1900年4月，扩大枢密院权限等，加强了摆脱政党势力，保护官僚专制的体制。又在4月规定陆

^① 明治34年（1901年）12月6日，枢密院议长西园寺公望向政友会干事长原敬表白的話（见《原敬日记》）。

海军大臣和次官（副部长——译者）由现役将军担任。军部大臣和次官，过去，在事实上是由现役将官担任的，但在制度上也允许预备役和后备役担任。这一点，现在也在制度上限定由现役担任，这是与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帷幄上奏权相呼应，决定性地加强了军部处于政府和议会之外而独立的体制。

天皇制与地主、资本家的同盟

政府和政党虽然在局部利害上是对立的，但在镇压工农运动于萌芽之中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在1900年3月，山县内阁和议会未经任何讨论，就制订了《治安警察法》以代替过去的《集会和政治结社法》。根据这项法令，虽然解除了《集会和政治结社法》对政党联合与设立支部的禁令，但是取缔群众运动的规定以及剥夺士兵、教师、妇女、青年的一切政治权利的规定却依然保存在《治安警察法》中。从法国刑法直译过来的刑法第二六九条、二七〇条的妨害农业工业罪，被改得更合于日本的现实，成为《治安警

察法》的第十七条，使刚刚萌芽的工人运动、佃农运动也就完全不能发展了。从《集会和政治结社法》向《治安警察法》的演变，说明了对于天皇制来说，议会政党的活动已经不可怕，而主要敌人已是工人和农民了。

山县有朋厌恶政党，伊藤博文却拉拢政党，继续致力于使政党成为天皇制的“御林军”。1900年8月，伊藤拉拢宪政党，成功地组织了立宪政友会。他的活动经费仍然出自天皇。伊藤在政友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任免内阁和大臣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天皇，根本否定了政党内阁的主张。和往年的革命的自由党相比，不仅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就连第一届议会以来立宪自由党反对官僚的传统也完全泯灭了。这就是政党与天皇制互相妍靠的典型。

山县与伊藤对政党的态度，看起来象是有排斥或拉拢这样的很大差别，但这是两人性格和政治手腕的不同，不论哪一方面都是要操纵和利用政党来保卫专制天皇制的。可是，伊藤自不必讲，就是山县也不能无视政党或者同政党全面地对立。从政党方面来说，它已完全失去了抗衡官僚专

制的姿态，而最关心的则是如何巧妙地与官僚势力进行交易，以挤入政权和分享权利，这样，在官僚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反复对立与妥协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就逐步提高了，官僚、地主、资本家结成同盟，在国内来对付农民和工人为中心的劳动人民，在国外则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治安警察法》、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和政友会的成立，都是在1900年发生的，这三件事，说明了日本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东亚的竞争而建立的新的政治体制。这一年，又由于日本积极参加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民族斗争，而具有特点。

三十一 走向帝国主义的 道路

——日俄战争和吞并朝鲜

日本在朝鲜的暴行和日俄对立

由于三国干涉而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时候，明治天皇曾对伊藤博文“半开玩笑”地说：

“不要急于夺取半岛。在这次战争中，了解了地理和人情，不用很久，或者从朝鲜，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再度进行战争的机会还会光临的。到那时，再夺取它也很好嘛！”（《明治圣上和臣高行》）难道帝王的“笑谈”就是这样的吗？果然不到十年，这句话便成了事实。

在对朝鲜争夺霸权中，日本战胜了中国。但是，日本对于朝鲜的人民群众自不待言，就是对其统治阶级也未能拉到自己一边来。

在这以前，日清甲午开战三个月后的1894年10月，内务大臣井上馨自动降格为公使，去朝鲜进行“改革”活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担心，如果一点“改革”的成绩都没有，那么，被外国看穿了这是侵略主义也就不妙了。井上公使首先干的是剥夺了刚刚在三个月前赶走事大党而掌握政权的大院君的实权，搞垮了朝鲜改革派的内阁，使朴泳孝等傀儡挤入内阁。而且井上馨还强迫朝鲜接受三百万日元的借款，作为“朝鲜改革”的经费。这个所谓“改革”，使朝鲜的电讯、铁路以及港口供日本单独使用。由于当时朝鲜政府强烈反抗，井上馨在任不到一年，就无计可施而回国了。

闵妃一派看到日本屈服于三国干涉，乃于1895年6月发动政变，赶走了朴泳孝等。这样一来，接替井上公使的三浦梧楼便与汉城的日本守备队队长合谋，于1895年10月7日夜指使守备队、警察以及百姓闯入王宫，他们在寝室中杀害了闵妃，并凌辱了尸体。另一方面，又建立了还是以大院君为执政的傀儡内阁。

进行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侵略外交都没有过

的如此暴虐行动，怎能够笼络朝鲜的民心呢？连“亲日”的贵族也具有恐惧日本之心了。反对日本傀儡政权的斗争在朝鲜全国展开了。以此为背景，独立派的贵族与俄国公使威贝尔勾结，于1896年2月将国王和王子带到俄国公使馆，在馆内成立新内阁，下诏废除了日本傀儡政权，并捕杀了它的首相等人。

与其说朝鲜已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俄国的影响下，不如说是日本有意地把朝鲜统治阶级赶到俄国一边。接着，在5月和9月，日本和俄国达成协议，承认俄国在朝鲜配置与日本相同数量的军队以及建立电讯网的权利等，日本方面恢复了汉城到仁川、汉城到釜山两条铁路的铺设权^①以及

^① 这两条铁路的铺设权，日本虽然已在1894年从朝鲜强制夺取到手，但因开工拖延而失去权利。汉仁铁路权于1896年3月改交美国人，汉釜铁路交给法国人的谈判正在进行。根据日俄协定，虽然日本恢复了这项权利，但因没有资金而拖延了开工；只有汉仁线于1901年通车，但比这一铁路长几十倍的汉釜线，虽由三井、三菱、安田、澁泽等特权大资本家全力以赴，也未能动工。因面临日俄战争的危机，迫于紧急的军事需要，乃由政府提供大笔补助金而开工，于1904年10月（日俄战争已经开始）才全线通车。这两条铁路都是由于参谋本部的强烈要求而强行铺设的。

1894年从朝鲜夺取的其他权利，并由日俄两国共同担当对朝鲜内政、财政的“援助”。此后，因朝鲜的爱国力量也强烈反对俄国干涉朝鲜内政，俄国和日本认为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协为上策，而于1898年4月缔结了新的日俄协定，规定两国都不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在干涉时要相互取得谅解，俄国不妨碍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

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

正当此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即列强之间正在进入在世界各地不仅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为重新划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权利而激烈争斗的近代帝国主义的阶段。而这种帝国主义的竞争，正在集中于中国和朝鲜。日本不仅从中国夺取了台湾岛，还得到了大笔赔款，连中国中部的辽东半岛也想夺取，这就说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已从过去各随己愿以武力侵占中国边境的阶段，发展为瓜分中国领土和争夺铁路、矿山等权利，使中国在财政金融上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一个侵略的新阶

段，正在成为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帝国主义的开端。三国对日干涉就是它的第一步。

俄国旁若无人地向满洲南下。1896年，一方面就统治朝鲜问题与日本缔结了协定；另一方面，又缔结了以日、英为敌的俄中密约，取得了中东铁路的铺设权。1898年，又以“为了远东的和平”为理由，强行夺取了迫使日本放弃了的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地区的租借权以及把中东铁路延长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铺设权。英、法、德也都从中国夺去了重要地区的租借权以及铁路、矿山、海关的权利，并约定某些特定地区不许割让给别的国家。美国于1898年挑起对西班牙的战争，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当时，美国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首先是“援助”菲律宾的民族运动，但等到菲律宾宣布独立时（1899年1月），就立即对民族运动进行军事镇压。而且继菲律宾之后，也燃起了对中国的野心，1898年，取得了粤汉铁路的铺设权。行动已经落在后面的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要使后来者也能平等地入夥，这就是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的要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宣言。这具体

是为了对抗俄国的独占满洲，事前是同英国经过勾结的。

日本对此形势也并不袖手旁观。在前边已经叙述过的与俄国围绕着对朝鲜的争夺，与德国围绕着对大冶铁矿的争夺，都不外乎是日本挤进帝国主义瓜分竞争的一个场面而已。在向朝鲜和中国扩张势力，取得权利和领土，这不仅是明治天皇为首的军人和官僚决心再度侵夺辽东半岛的要求，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日本资本主义与朝鲜和中国

如前章已经叙述过的，在与寄生地主制相结合，以重税、高额佃租和极端低下的工资为基础，在庞大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广泛存在的基础上，使少数特权资本家和国家资本的大企业得到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条件下，群众对商品的购买力非常低，所以国内市场，相对来说，经常是极其狭隘的。

而且在地主制下的零散农业经营，不能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机械等，以提高农业生产

力。而生产力的提高是靠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这是有限度的，日本农业不能适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而对粮食的激增的需求，从1903年开始，大米的输入量超过了每年国产量的一成。又由于水利事业以及土壤改良等无法进行，所以抗御洪水、干旱、霜冻等天气突然变化的能力很弱，灾荒不断发生。1889年、1900年、1902年都遭大灾荒，特别是1902年，东北地方出现了象幕府末期那样的大饥馑。当时日本，参加生产的人口，七成是农民，非农业人口也多少与农民有联系，所以一遇荒年，国内市场就急剧缩小。

这样，经济危机或者接近危机的不景气就不断出现了。日清甲午战争后，1897——1898年，1900——1901年连续出现了经济危机，1903年也陷于严重的不景气。因而对于海外市场的要求就极端迫切。虽有作为最大市场的蚕丝和丝织品输出地的欧美各国以及棉纱、棉织品、杂货等的输出地中国和朝鲜，但欧美在蚕丝和丝织品之外，不能成为日本机器工业产品的输出市场。那么，现在和将来，能够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大工业市场

的，就是中国和朝鲜了。而且这两个地方，作为原料、粮食之类和黄金的供给地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考虑到前面叙述过的朝鲜的黄金和大米，满洲的大豆、豆饼，大冶的铁矿等的意义，大概也就可以明白了。当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时，作为“将来供给黄金储备的打算”，国内生产黄金二百贯^①，竟期望从朝鲜“输入”黄金五百至七百贯。说起来，资本力量贫弱的日本，在过去就曾以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来弥补其资本的贫弱，当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独占权利而闯进东亚的现在，日本的当权派也好，资本家也好，都被不甘落后于欧美列强的这种思想要求激烈地煽动起来了。这有时甚至形成焦急暴躁，惨杀闵妃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

出兵镇压义和团与日英同盟

针对列强对中国逐年激烈的侵略，1900年爆发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山东省出现的

^① 贯：日本重量单位名称，一贯为3.759公斤。——译者

义和团反帝斗争，不仅在华北，而且发展到全中国。华北的民众终于包围了北京的各国使馆区。俄、英、法、德、美、意、奥组织了帝国主义联军，企图镇压义和团，也要求日本出兵。

义和团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欧美各国，所以日本没有参加这次镇压的理由。可是事前一直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不甘落后的日本当局认为这是良机，而参加了帝国主义的联军。当时英国正在进行侵夺南非的战争（英布战争），美国由于镇压菲律宾的民族运动，因此都没有向远东派遣大批陆军的余力，而俄、德两国出兵也费时间，结果是日本派出了一万二千人，成了联军三万二千人中的主力。联军于8月占领北京，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在北京驻扎军队的权利。

正当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华北的时机，日本策划单独占领福建。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就在厦门的本愿寺布教所（传教处——译者）放火，说是“中国暴徒所烧”，便以及时“保护侨民”为名，使预先在厦门港口候命的军舰和泉号上的陆战队登陆（8月24日）。接着，又打算从台湾派出一个旅团，其先遣部队的两个中队（连）于

28日到达厦门港外。但是由于当时英国向东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政府（山县内阁）遂不得不停止这一计划。

为镇压义和团而出兵和占领福建计划的失败，给日本统治阶层以自信和教训。所谓自信，是说在东亚能够应机立即派出大军的只有日本，日本取得了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远东宪兵”的地位。所谓教训，就是说日本还没有单独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的能力，必须利用列强之间的对立，与其中的一方相勾结。伊藤博文以及井上馨等人虽然过去就懂得这一点，但首相山县有朋、陆相桂太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等军方首脑却简单认为，如果从台湾开始行动，那么在欧美从很远的本国派来干涉军队以前就能占领对岸的福建省，却没有考虑政治的条件。在此以后，他们也痛感有与“欧洲的某一国”结为同盟的必要。

那么，和欧洲的哪一国结盟呢？伊藤、井上等人主张日俄协商。日本最大的敌手是俄国，这只要看一看朝鲜、满洲的情况即可明白。但是他们认为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还没有和俄国作战的

实力，所以要暂时与俄国妥协，保住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对满洲进行经济的侵略。针对这一点，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人以及加藤高明（第四次伊藤内阁的外相）、小村寿太郎（继第四次伊藤内阁之后的第一次桂内阁的外相）等外务省的主流派，则要和英国同盟以对抗俄国。另一方面，英国看到日本在镇压义和团中所起的作用，想进一步加强利用日本以对抗俄国的传统政策，于是就与日本接近。这样，在桂内阁时期，于1902年1月30日结成了日英同盟。

日俄开战

日英同盟规定，在中、韩（朝鲜于1897年改国号为韩国）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发生骚乱时，日英分别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一方和他国（实际指俄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保守中立，但当第三国加入敌国方面时，则要为援助同盟国而参战。这个协定加速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此后不久，1902年7月，俄国向朝鲜政府要求租借龙岩浦，虽因日本抗议而撤回，

但实际上还是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于10月修建了炮台。俄国的挑衅是露骨的。在满洲，俄国虽与日本约定撤兵，但到期（1903年4月）并未撤兵，相反，却增强了在南满的军队。

日俄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1903年4月，在山县有朋的京都别墅“无邻庵”，山县、伊藤、桂、小村举行会议，确定了日俄谈判的基本方针，即以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权利为代价，让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全国拥有的特殊权利。这时他们很清楚，如果日本统治了朝鲜，就构成了对南满的侧面包围形势，所以估计俄国决不会接受日本的要求，意识到“若主张这个要求，最终必将不辞一战。”但因战争准备还不充分，“此时只有尽可能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英、法、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样，当英、法等瓜分中国的时候，日本也准备“在浙江和福建占有地位”。此后的日俄谈判，对日本来说，乃是为了赢得开战所需要的军事及外交的准备时间。俄国方面从一开始就轻视日本，他们认为如果有必要，随时都能进行战争。

从这时开始，在日本煽起了猛烈的对俄战争

狂热。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的教授们也站在煽动战争的前列。其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以及基督教徒内村鉴三等人则利用《万朝报》坚决主张反战和平。不久，当该报社长黑岩周六转向主战论时，他们就退出了这个报社。内村鉴三以为如果不能主张正义，干脆就把笔折断。而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则创立了“平民社”，发行周刊《平民新闻》，在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这三大纲领之下，继续进行斗争，发行册数约四千份。

1904年2月8日，日本舰队偷袭仁川和旅顺的俄国舰队，到10月才正式对俄宣战。在宣战前偷袭对方的重要基地，这种做法无论是在日清甲午战争，还是在这次战争以及后来的日中战争（七七事变——译者）和日美战争（袭击珍珠湾——译者）都是如此，这是日本军部的惯用手法。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作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由于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关系，而未能不宣而战。

日俄战争的性质

日俄战争，对于日俄双方为了控制朝鲜和满

洲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虽说是因为俄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妨碍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活动，所以日本不得不进行战争等等，但因急于控制朝鲜，甚至残杀了王妃，把朝鲜的当权派推到俄国一边，从而为俄国开辟了在朝鲜扩张活动的道路的，正是日本自己。再就俄国而言，如果俄国象英、法那样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不用在军事上、政治上侵略朝鲜，并向日本挑衅，而只靠经济力量，大概也能使日本势力后退的。然而，日俄双方都是需要以政治和军事来弥补其资本的软弱性的国家，所以在争夺同一个目标时，就发生了正面冲突。

但是，这并不否定这个战争也是资本主义利害冲突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决定开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开战时，政府、军部与财界首脑曾频繁协商。在弄明白了这一事实和满洲市场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意义以后，甚至连幸德秋水等都说：“实际上，掌握宣战媾和关键的不是那些高利贷者吗？不是那些名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吗？”还有，在开战后不久，农商务大臣清浦奎吾曾说：“说起来，现在的事情并非只因政治上

的必要才开战端，而是为了使我们的工商业大大地向中、朝两国发展，这也是其主要原因。”还说：“社会上往往把日俄关系看成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正是意味着日俄两国在中国、朝鲜的通商政策的冲突。”

这个战争不只是日俄双方由于君主制和资本主义利益而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是与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分不开的。日本得到英美的支持，俄国取得法国的援助，而英、法又以德国为共同的敌人，德国则期待俄国的东进，支持俄国的对日战争，当时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其中，在远东方面，英俄的对立是主要的，日俄战争也是英国利用日本，而对俄国进行的抗争。这样，日本就全面地依赖英、美的财政援助。在日本战费总额十七亿一千六百万日元中，约有八亿日元是依靠从英、美募集得来的外债。否则日本就完全不能进行战争。

战局的发展和政府、国民

俄国军队装备优良，训练和组织也很完善。

日本在战争中虽处境困难，但其进展是顺利的。日本陆军的主力从朝鲜进攻到南满洲。乃木大将的第三军为维持日本的制海权，攻占了辽东半岛，包围了俄国自夸为难攻不破的旅顺要塞。经过多次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争夺战，1905年1月终于攻克了旅顺。从此，整个陆军部队由大山巖充任总司令，以破竹之势，沿南满铁路北进，3月10日，在沈阳城外与俄军主力会战，使其溃败。

海军通过黄海战争和其他战争，击沉了俄国的远东舰队，或者将其封锁在旅顺港内。

战时国民的苦难是深重的。对于不断地增税、新制定食盐专卖制、加强烟草专卖制、强制分派捐献和公债等等负担，实难忍受。再加上物价暴涨，使生活更加困难。壮年男子不断被征入伍，或征为民工。动员兵力竟达一百零八万人。连农家的牲畜和车辆也被征用。因此，1905年成了大荒年。

《平民新闻》没有屈服于不断的禁止发行和惩办负责人，仍报道了人民的苦难，继续反对战争。1904年3月，平民社发表《致俄国社会党书》，呼吁日俄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为和平与反帝

而联合起来。同年8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的大会上，日本代表片山潜与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在讲坛上紧紧握手，发表了要打倒两国统治者的军国主义的演说。还有，在军国主义的狂热下，与谢野晶子在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不要让丈夫去死》和大塚楠绪子的《百次祈祷》等反映妇女厌战情绪的诗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政府虽然于1905年1月终于不得不禁止《平民新闻》的发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允许反战言论以及厌战思想的公开发表，这也显示了政府的自信心。政府在战争期间，也仍旧允许东京的俄国东正教教会与其本国教会进行宗教上的通讯联系，并优待送到日本的俄军俘虏，也允许同东正教教会的传教士作礼拜等。在议会，也有象立川云平那样的人，反对镇压社会主义，主张对于思想上的问题要以思想来对抗。

虽说日本陆军在沈阳会战中得胜，但这是俄军有计划的撤退，依然保存其主力。而日军不仅完全没有追击敌人的力量，就连在今后半年内要保住已经占领土地的把握也不大。将校和下级军

官极端缺乏，弹药也将用完。参谋总长山县有朋直率地举出这种情况，他说，国家认为仍需战争，那就决心战争到底，但他却希望尽早在政治外交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交战二十个月期间，有43,119人战死，17万人以上负伤，患病者达22万人以上，其中有63,601人死亡。实际上损失总兵力的四成以上。

军费再没有办法筹措了。已经没有增税和发行国内公债的余力，而募集外债也不可能了。这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害怕日本取得彻底胜利，占领整个满洲，会破坏它们的远东均势。

另一方面，俄国也难于继续战争。在俄国，从战前开始，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运动已经发展起来，而沙皇政府为了转移国民的革命情绪，进行了对日战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促进了革命。旅顺的陷落，使沙皇的权威下降。此后不久的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工人为向沙皇申诉生活之苦，聚集于皇宫前，军队开枪，工人死伤多人，这就使革命运动飞跃发展起来。5月，工人开始准备武装起义。并且在5月27——28日，以东乡平八郎为司令的日本联合舰队，为

夺取日本海的制海权，在对马海峡迎击，全歼了俄国本国派遣来的波罗的海舰队。

日俄媾和与解放亚洲问题

俄国政府因接连战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生了动荡不安。美国总统罗斯福害怕日俄战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俄国人民的革命就要胜利，欧洲主要的反动支柱沙皇体制就要崩溃，因此想把战争引向结束。这正好与日本政府想以日本海海战的胜利为结束战争良机的希望相一致。由于罗斯福的斡旋，8月，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了日俄讲和会议；9月5日，两国全权代表签订和约，其要点如下：

（1）俄国承认日本指导、保护、监理韩国的权利；（2）俄国取得中国同意，把旅顺、大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让与日本；（3）俄国把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承认其在滨海州的捕鱼权。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给予亚洲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大的激励。象印度的甘地，中国

的孙文也都看到被欧美人视为劣等无能的人种而遭歧视、压迫的亚洲人，又是小国的日本人战胜了世界最大的陆军强国俄国，而得到了激励。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促进了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下的解放。日本在日俄开战的同时，强加于朝鲜的“议定书”中说，朝鲜政府“确信日本政府，关于设施的改善应接受日本的忠告”，并规定当第三国侵略朝鲜或发生内乱时，日本“遇有机会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为此，朝鲜政府向日本“提供充分的便利”，以及日本政府“能够乘机占用军事战略要地”等，把朝鲜变成了实际上的属国。8月，又强迫缔结了第一次“日韩协议”，使朝鲜进一步属国化了。

还在1905年7月，桂首相和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订立密约，日本支持美国对菲律宾的帝国主义统治，以此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在同年8月的第二次英日同盟中，日本以支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换取了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以此为根据，制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有关朝鲜的条款。总之，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大大帮助了美英加强对亚洲的侵

略，而在战后，也和俄国缔结了瓜分满蒙的协定。

亚洲的民族解放，并不是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来推动的，而是由在这个战争的高潮中发生的俄国第一次革命推动的。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早已看清楚了这点。代替《平民新闻》而出版的报纸《直言》的第七号（1905年3月19日），发表社论《致俘虏诸君》说：“诸君！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那样，象西欧各国的革命经常是等待法国的信号一样，今天东方的各被压迫国也都在等着看到俄国革命的信号而重新站立起来——请看中国！请看朝鲜！”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也是正确的历史预见。

焚烧捣毁全东京的警察机构

在日俄战争中，即使说日本是胜利了，但并非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依靠英美的支持进行战争的，日本虽处于优势地位，但也难于继续打下去，于是就在美国的推动下缔结了和约，因此，

这个讲和条约并不是日本所期待那样的东西。所以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看到，未得到丝毫赔款，领土也只是得到了在明治初年的《千岛、库页岛交换条约》以前，日本即主张拥有领土权的南库页岛，所以他们对此条约很不满意。他们把承担了战争的各种牺牲郁积在心中的国民的不满引导到不满于战利品太少的方向去了。在条约签字的那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了反对讲和的国民大会。

但是，当几万人的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就超出了煽动者们的意图，群众自动地反对权力的斗争发展起来了。9月3日，桂首相在致山县有朋的信中说，“贩夫走卒”等“下层人民”动荡起来，“把政务和社会混同在一起”，即把必须由官僚以及议员等政治家们讨论的事情，当成了“社会”的问题，这是最要警惕的。

5月的大会在日比谷公园顺利召开了。但激昂的群众不满足于只开大会，不肯轻易散去。警察强迫群众解散，以此为开端，群众进行了对国家权力的有力反抗。三万（也有人说是五万）群众走出公园，首先捣毁了内务大臣的官邸，袭击了桂首相的御用报纸《国民新闻》社。然后又分成

几路，又有各地的群众参加进来，捣毁了东京全市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并放火烧毁。群众还从市内到郊区，在当夜里多次地袭击了警察。群众还袭击了警视厅，但受到了大批武装警察的阻止。这已经是和军国主义者的反对讲和运动没有关系的事情了。国民大会的主持者们溜走了。

6日，在东京市和东京府发布了戒严令，近卫师团出动镇压，还颁布了取缔报纸杂志的紧急敕令。当晚群众又聚会于日比谷，烧毁正在行驶的电车，再度袭击了内相官邸，烧毁了剩余的警察分局。东京市的十五个警察分局中，十三个被烧，派出所有一百四十一所被烧，二十八所被破坏。在此期间，被警察杀伤的市民超过了八百人。

首都的这个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以京都（6日）、神户（8日）、大阪（11日）、横滨（12日）、名古屋（21日）等大都市为首，各地也都召开了反对和约的大会。在大会上，当然是首先要求废除条约，但对政府的攻击，不仅是针对它的“屈辱外交”，而且发展为指向“藩阀政府”，要求“责任内阁”。报纸、杂志相继被禁止出售或停止发刊，反而使得言论自由的要求更

为高涨。

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直言》把这次的全国暴动与当时的俄国革命相比较，指出“俄国的革命是统一的、自觉的，而这次的运动不是统一的，也不是自觉的。但是，从其实质来看，今天的运动也和俄国革命是一样的，可以说日本人民正在不知不觉地养成了革命的气质。”反对专制政府，是从超越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观点出发的，而群众被它动员起来，说明群众的落后；但群众不仅攻击军国主义的头头们，甚至攻击国家权力，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桂太郎等人所说的“政务与社会混同在一起”，表示了城市的小市民和无产者大众尽管还没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但却已经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了。

吞并朝鲜

根据桂·塔夫脱密约、第二次日英同盟和日俄和约，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大体上达成了瓜分东亚的协定，并使之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于是就在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条约中全面夺

取了朝鲜的外交权，使朝鲜在“保护国”的名义下，成了日本的属国。朝鲜方面根据这一年的干支，称之为《乙巳保护条约》。从此以后，在朝鲜的士兵中间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还有1907年6月，朝鲜皇帝高宗派遣密使前往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要求保障朝鲜的独立，但遭各国拒绝。此事发生，伊藤博文统监立即迫使高宗退位，使年幼的皇太子继位。就连朝鲜的贵族对此也很愤慨，朝鲜人民群众在各地掀起了抗日暴动。同年7月，日本强迫朝鲜缔结第三次日韩协约，日本完全剥夺了朝鲜的内政权。8月1日，解散了朝鲜军队。以此为开端，士兵与群众的抗日武装暴动蔓延全国。暴动者称暴动的士兵为“义兵”。日本出动大批军队，杀死义兵一万七千人，伤三万七千人，历时一年才镇压下去。

此后，伊藤博文退出韩国统监职务，在前往俄国旅行途中，1909年10月，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杀死。这时，日本政府急于实现吞并朝鲜的既定方针，1910年8月29日，以大军控制汉城，把朝鲜合并于日本。

吞并之后，日本仍称韩国为朝鲜，设立朝鲜总督府，从陆海军大将中任命总督。总督直属于天皇，也统率军队。在总督之下，宪兵司令官兼任总督府警务总监，各道的宪兵队长兼任该道的警察队长，在整个朝鲜建立了一万六千二百一十四个宪兵警察机关，配备二万二千名宪兵和二十万名宪兵辅助人员。行政、司法官吏自不必讲，就连小学教员也是武装的。从1915年开始，陆军部队还由过去的一个师团增加为两个师团。

朝鲜民族工业的发展完全遭到压抑。1911年七百四十万日元的民族资本，到1917年几乎还是同样的数字，而在此期间，日本的资本却从一千零五十万日元增为五千九百万日元，增加了四倍半。大部分是矿山、军需工业，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日本还利用所谓“地产调查”的办法，从1912年到1919年夺走了朝鲜人的大部分土地。朝鲜稻米被掠夺到日本，朝鲜每人（包括日侨）稻米的消费量从1912年的七十八升^①减至1918年的六十升。

^① 升：一升为1.805公升。——译者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由于日清甲午战争夺取了台湾，日俄战争割取了库页岛的南半部，从俄国接受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的租借权，接着，又吞并了朝鲜，日本在这时就成为拥有超过本国总面积76%的大片殖民地，有超过它十多倍的南满洲作为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的大帝国。对于这些殖民地的统治，在台湾和关东州，与朝鲜同样，是以现役大将任总督（台湾）或都督（关东州），而且还都兼任驻屯军司令官。他们直属于天皇，从而不受本国政府的约束，实行彻底的军事统治。只有桦太厅（日本称库页岛为桦太——译者）由内务省管辖，桦太厅长官有权任命桦太厅守备队司令官，在必要时可以转为军事专政。

这种统治机构，说明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首先是着眼于扩张天皇制的领土基础，这种目的是远远超过其他目的的。朝鲜和关东州可通往中国的东北（满洲）和华北，台湾可通往中国南部和南洋方面，南桦太（库页）岛可通往俄国占领

的库页（桦太）岛北部和西伯利亚，可以分别作为侵略的前进基地，其铁路、港口、通讯等设施也都优先考虑军事上的目的。

第二，对于这些殖民地的统治，就象朝鲜的典型作法那样，是夺取当地居民的土地，使当地的民族资本不能发展，把该地纯粹变成日本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地和日本本国所需粮食与工业原料的供给地。这时，或者象朝鲜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译者）、满洲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样由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合为一体，或者象台湾的三井以及铃木商店那样垄断了台湾的制糖业，而政府和总督府提供巨款给予扶持，或以极低价格把土地出售给它们。为了帮助三井系统资本垄断南库页岛的造纸业，由国家出资建设了运输造纸原材料的铁路，就这样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由国家资本给予民间大资本家以援助，促进了他们向近代的垄断资本家的发展。而且南满洲铁路公司以及东洋拓殖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分散地掌握在本国各地的地主、富豪手中作为财产，也就使他们这些地方的统治阶层起到了帝国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普及者的作用。

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利润和广大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又飞跃地发展了。纺纱、缫丝等轻工业继续跃进，钢铁、造船、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电气、煤气、自来水等也以国家资本和特权大资本为首开始发达起来。同时，四大财阀^①在工业、银行界的垄断地位日益扩大。重工业之外，在煤炭和金属矿业方面，财阀的垄断力量特别强大。而在1907年，作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环，日本也出现了经济危机，但通过采取对策，在纺织、化肥、制糖、面粉等部门结成了卡特尔或组成联合企业。1910年，十六个大银行组成辛迪加，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工业的控制力量。除南满洲铁路公司以及东洋拓殖公司之外，还有三井以及铃木在台湾的制糖业、三菱的朝鲜兼二浦炼铁厂和大仓的满洲本溪湖煤铁公司的建立（都是在1909年），三井系统的上海纺织公司的扩建（1906年），上海内外棉股份公司的建立（1911——1913年）等，都说明了正在进行以国家资本为首的资本输出。

^① 四大财阀：指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家。——译者

经济上的这一切表现，都说明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向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象前章所说的，大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后者的产量占工业生产总额的大部分的情况还是继续存在。而且当时日本基本上还不是资本的输出国，而是输入国。重工业的建设，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对外国，特别是对英美的依靠还很多。自从向英美借贷了日俄战争的战费以来，外债逐年增加，从1906年至1913年，共输入外资达六亿四千万日元，如果和同期全国公司投资增加额约十亿日元相比，那么就可知这笔外资所占的比重了。

总之，日本在经济上虽然已经开始向作为近代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过渡，但还没有完成。然而在政治上却已经通过1900年对义和团的镇压和1902年的日英同盟，而加入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行列，国内的政治体制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变化。在这样国际和国内的体制下发动日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遂使日本成为庞大的殖民帝国。这样一来，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尚未确定，但在政治上也要称它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时，

日本经济力量还是软弱的，它一方面在财政金融上附庸于英美，靠其补救，另一方面还因为日本独占了欧美列强所不具备的地理上的方便条件，作为一种补救方法，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目标的朝鲜、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而日本在东亚却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并可随时向朝鲜和中国派遣。

三十二 日俄战争后的 国内外形势

——帝国主义日本的政治基本形态

围绕中国问题，日本与美英的对立

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成为东亚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新的对立。

这次战争后，俄国因与德国竞争，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的扩张活动上，日俄在东亚的对立缓和下来。日本于1907年（明治四十年）7月，与俄国缔结了瓜分满洲、蒙古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后来又于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1912年（大正元年）修改秘密协定，使俄国承认了日本势力范围的扩张。

另一方面，日本和美英之间，特别是和美国之间的对立更加深了。日俄三次协定，就具有对抗美英的意义。原来，美英在日俄战争中援助日本，是为了利用日本抑制俄国独霸满洲，以便美英本身也往这方面扩张势力。可是，当日本一旦接过了俄国在南满洲的权利时，就想独霸这块地方。例如，最初日本政府虽然同意美国资本家关于日美共同经营南满洲铁路的要求，但因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而立即取消了。同时，1905年12月，日本又强迫中国签订了“关于满洲的条约”和附属秘密协定。在这个秘密协定中，包含有禁止在吉林省内由日本以外的外国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合办铺设铁路（第一条），禁止铺设和满铁平行的铁路线及损害满铁利益的支线（第三条），制订满洲新开辟市场的规章时，要由日中两国协议（第八条），中国政府维持满洲的治安，“兴利除弊，进行切实的整顿”，保障国内和外国人生活和营业的安全（第十条）等，这些都是为了日本独占南满洲的条款。特别是第十条，成为日本干涉满洲内政的武器。（就是在很久以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也是以这个秘

密协定为借口的。)

日本独霸南满洲，激怒了美国 and 英国。特别是美国政府于1906年3月甚至威胁说，日本独占满洲，对日本来说，不久就将成为“深切失望的起因”。而且好象是在美国本国报满洲之仇那样，对早已定居美国西部各州的日本移民大加排斥。1907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制订了禁止日本人从夏威夷、加拿大、墨西哥移居美国的排日移民法。以此为开端，两国都在竭力煽动排外主义，宣称，日美战争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月，以进行环球友好航行为名，派遣舰队从大西洋航行到太平洋。这显然是对日本的示威。7月，罗斯福又命令菲律宾的美军司令，要经常注意能够对付日军的突然袭击。

但是，从当时的海军实力来讲，日美两国都无力进行横跨太平洋的战争。在移民问题上，日本让步了，并于次年即1908年11月的《卢特——高平协定》中，两国都承认了双方在远东的地位和现状，从而大体上取得妥协。但在此以后，围绕着瓜分中国的问题，日美之间的对立尽管有时缓和，但总的趋势则是逐年激化。

日英关系也渐渐冷淡下来。特别是1907年8月，英俄达成关于波斯和西藏的协议以后，日英同盟对英国来说，就减低了价值。特别在1911年7月的第三次日英同盟中，关于两国相互援助的规定，对美国是不能使用的。

军部的形成

元老^①伊藤博文十分担心日本和英美对立，于1906年5月，要求召开各元老和政府、陆海军代表的会议，在会上竭力主张在财政上依靠英美的日本一定要在满洲忠实地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诺言，以使英美得到满足。他针对儿玉源太郎参谋总长不断主张的“经营满洲”，当面指责儿玉说，对于不是日本领土的满洲说成“经营”，这是什么事体！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一致承认了伊藤的主张，但无论政府还是陆军都完全没有执行这个决定。

^① 元老：所谓元老，是天皇特别给予元勋待遇的人。无论是否担任大臣，都能列席内阁会议，而且能够随时向天皇陈述意见。

1907年，正当英俄协约成立，日美对立激化时，伊藤博文正在汉城充任韩国统监，他从这里送给政府一份长篇意见书，十分担心日本不实行满洲门户开放，就要断绝英美的财政援助；还担心日本如果继续采取“利己政策”，势必引起中国民族的反抗，说不定会导致第二次日清战争，这样一来，就使日本在世界上陷于孤立，所以伊藤强烈要求改变独占政策。

如果与以后的历史对照来看，伊藤的这个意见是恰当地预料到了日本和美英以及日本和中国关系长期的基本方向。但是他的意见终于未见实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伊藤本人过去也是一直推行着向朝鲜和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和为伊藤所拥护的统帅权独立制以及军部大臣武官制。

统帅权的独立和军部大臣武官制，不但是使军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而且在日俄战争以后，军部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1906年10月，陆军中资格最老的山县有朋元帅向天皇提出了“帝国国防方针案”，不久，经过正规手续，政府也同意确定为国防方针。山县有朋说“我国国防的基本

点是从一开始即进行攻势作战”，而其**主要敌国**，即使在将来也是俄国，还说“为了将来我国**国利国权之扩张**，以向中国图谋进行为有利”。规定日本前进的道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军部本来的权限而干涉了政治。由山县代表军部，撇开政府，首先向天皇提出，这件事，说明军部对于**根本国策**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一旦确定侵略中国是日本的最高国策，那么陆军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的发言权也必然增大。而且由于镇压中国及朝鲜不断兴起的民族斗争，和作为侵略中国的前哨基地，是统治关东州和朝鲜的**最大任务**，所以就**必须把都督和总督看成是个将军**，就不能不使他们掌握着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职权，这也就造成了这些都督们无视政府，介入外交的因素。这样，陆军就把朝鲜、满洲完全看成是他们的领地一样，而推行**独立的对华政策**。即以伊藤博文的地位和声望，已经不能把军部置于政府统治之下了。尽管在内阁会议上多次商定“外交的一元化”，但是不能实行。不仅如此，陆军还曾阴谋策划满洲的“独立”。

左右日本对华政策的，在对欧美的政策上必

然也有发言权。这是因为日本对欧美外交的根本问题，就是它们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的对立与妥协的问题。而且成为日本最高国策的侵略中国的推行者们，当然在整个内政问题上也能发挥威力。这样，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代，就成立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军部”。所谓军部，是与行政部门相对而言，是军部自己所用的概念。“军部”不是例如山县有朋等的个人威力，而是军事机构本身政治势力化的产物，是在参谋本部和陆、海军省（部）的高级军官们中形成了一种“陆军的全体意见”、“海军的全体意见”，也推动了将军们。将于后文叙述的，引起“大正政变”的，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也就是由陆军少壮派军官所推行的。

军部、统治阶级和中国的辛亥革命

军部的独立性，早在1911年（辛亥年）中国辛亥革命时就得到了发挥。在此以前的1905年，由孙文的倡导，在东京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集聚了一切反清势力，在几次小规模起义失败

后，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举行革命起义成功了，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受清朝政府之命讨伐革命军的袁世凯，反过来与革命军进行了交易，约定由自己担任大总统而承认了民国。因此，宣统皇帝不得不于2月退位，清朝就灭亡了。接着，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1913年，孙文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并于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武昌的革命一爆发，日本政府就采取了援助清朝的方针，立即缔结了向清朝出售武器的合同，并向美英两国建议，共同干涉中国革命。以元老山县有朋为首的日本统治者认为不能允许和君主国日本相邻的大国实行共和制。但是美英已预见到革命的胜利而拒绝共同干涉。在此期间，中国革命象暴风骤雨一样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日本的政策陷于混乱。在政府中，有的人也主张要和革命派进行政治交易。而在民间方面，则有三井物产公司既向北京政府又向革命派出售武器，三菱则向革命派提供资金，并约定将来获取权利。

此时，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朝鲜总督府

抬出清朝肃亲王，制造满洲和内蒙东部的独立，为把这些地方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推行了连日本民间人士也可加以利用的起兵计划。然而，南满洲铁路公司却与革命派有了联系，在满洲陆军部队长里面也有人支持革命派，驻沈阳日本总领事也反对满蒙独立计划。与肃亲王相呼应，本来要在满洲发动事变的军阀张作霖，也怀疑日本的真实意图。结果，由东京的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商定，停止了“满蒙独立”计划。可是军部并没有放弃这种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推行了一次。

这样，在日俄战后，确保殖民地朝鲜和把南满洲作为独占的势力范围，并以此为前进基地，进一步向中国扩张帝国主义势力，这就成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最高国策。因此，日本在国际上就与朝鲜、中国民族有了根本性的对立，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也加深了。在日本国内，军部已经形成，而且不受政府的统制。也就是说，此后直至1945年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路线及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就在这时候已经形成了。正在迅速地转化为近代

垄断资本家的特权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就是这条路线和权力的支柱。

工潮发展为暴动， 农民的状况与斗争

在此同时，与官僚政府和军部相对立的运动和力量也开始成长。一种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是以没有特权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力的民主主义的改良运动。前者虽然仅仅是萌芽，但它与后者，在民主运动和反对专制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起到了尖兵的作用。

从首都烧毁警察局开始的，日俄战争后的阶级斗争，在工人斗争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从战争后期开始，罢工就有所增加，1905年8月，兵库县盐田工人的罢工足有三千六百人参加。日俄战后的1906年，青森县大凑的海军修配工厂（1月）、东京石川岛造船所（2月）、东京炮兵工厂（8月）、吴海军工厂（8月）、大阪炮兵工厂（12月）和官办军需工厂工人要求

增加工资，都不断地发生了大罢工。

1907年经济危机时，劳资纠纷的件数和参加者达到空前最高数字，特别是在造船厂、军工厂、煤矿、矿山发生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其中，2月份的足尾铜矿的纠纷发展为暴动，最后出动了三个中队（连）的军队才镇压下去。领导这次斗争的工人南助松是因为在北海道夕张煤矿发动罢工被驱逐而与其妻白井操一起到足尾的，他们与社会主义者也有联系。足尾成为导火线，4月在北海道幌内煤矿、6月在四国的别子铜矿都因要求增加工资而掀起暴动，在别子也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

佃农的运动也逐渐展开了。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在山梨、长野、新潟、富山、三重、和歌山以及九州地方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农民。1907年，广岛县所属四个郡的佃农进行了反对共同育秧及其他从地主立场出发强制实行的“农业技术革新”和要求减低地租的大规模斗争。还有，从这时开始，在各府县还实行了官办的对租米的质量检查和划分等级，实际上提高了地租。对此，各地掀起了反对的斗争。

1910年前后是寄生地主制最发展的时期，全国水田的50%以上成了佃耕地，全部耕种农户的大约28%是纯佃农，40%是佃耕兼自耕，纯自耕农只占32%左右。占农户大半的贫农的惨状，例如在长塚节的小说《土》（1910年）中就有详尽的描述。农民的破产成为国民思想“恶化”的根源，还损害了士兵的来源，所以也得到政府和军部的关心。对政府来说，维持自耕农也成了重要的课题，但政府又丝毫不能损伤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农民的破产还是继续下去。

社会主义的成长与溃灭

工人群众的斗争一旦开始采取激烈的形式，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就分裂为马克思主义派和人道主义派，而社会主义只成为马克思主义派的运动了。他们于1906年2月，建立了以堺利彦为中心的日本社会党。当时的首相西园寺公望是一个曾在年青时代也出版过自由民权论报纸的贵族，内阁稍微采取了一点自由主义的姿态，允许社会党在“国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在日

本才有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公开活动。正式党员虽然只有二百名，但警察方面估计全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同情者共达二万五千人。

社会党组织了反对东京市内电车费涨价的市民斗争，并支援了足尾矿山工人的斗争等，虽然正在从单纯的思想宣传团体发展为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在成立仅仅一年后的1907年2月，就被禁止了。

在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革命家的交流。还在1907年7月，日本、中国、安南（越南）、菲律宾、印度的社会主义者、民族革命家就曾在东京召开“东亚恳亲会”等，反对帝国主义，开展了亚洲人民的团结。对于日本吞并朝鲜，东京社会主义者有志会也发表宣言说：“吾人尊重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自治的权利，认为帝国主义政策均属反对世界平民阶级共同利益的。因此，希望日本政府忠实于许下的诺言，应保障朝鲜的独立。”（1907年7月21日）在过去的自由民权的运动中，由于日本民族也和朝鲜、中国一样都是被压迫者，所以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曾主张亚洲的团结，但在日本成

为帝国主义，压迫别国的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纽带的团结的基础已经失去的今天，又产生了亚洲民族团结的思想，也就是站在“世界平民阶级共同的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不仅反对欧美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对日本本国的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也没有被允许继续发展。幸德秋水在社会党被禁止前不久，带着在美国受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回到日本，开始主张，象日本这样的专制国家，除了工人的“直接行动”——总罢工之外，没有其他革命的道路。对此，片山潜等受第二国际的影响，主张依靠获得普通选举权和议会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正在工会似有似无的这个时期，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幸德秋水的主张是无视日本现实的知识分子唯心论的革命主义的错误思想，却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的多数支持。他们的运动是唯心论的，是激烈的。这给政府提供了镇压的借口和机会。

镇压越残酷，反抗也越激烈。无政府主义者菅野须贺以及宫下太吉等人开始考虑要暗杀天皇这个镇压人民的元凶。他们把打倒天皇制的权力机构和打倒位于这个机构顶端的天皇个人混同起

来。但是还在他们只是商量暗杀天皇的阶段，早就得知消息的政府，从1910年5月到6月，不用说宫下和菅野，甚至把与他们的计划毫无关系的，以幸德秋水为首的当时在狱外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也一齐逮捕，通过完全秘密的审判，捏造幸德是首谋者，图谋暗杀天皇，宣布二十四人死刑。幸德等十二人的死刑，于1911年1月24日执行（其余十二人，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政府把这当成“大逆事件”，煽动国民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恶。警察把社会主义者单叫做“主义者”，在国民中散布他们是令人可怕的，不能算做日本人的，穷凶极恶的印象。以此为机会，在警视厅里设立了专门镇压社会主义和工农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此后，“社会”这个词成为忌讳的言词，就连“昆虫社会”这种自然科学的书籍，也因有“社会”字样而被禁止出售。

友 爱 会

社会主义虽遭到如此的镇压，但政府对工人

的经济斗争却不能完全禁止。1912年正月，东京市电车工人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在这年8月，还有从基督教人道主义出发，关心工人问题的铃木文治，成立了名为“友爱会”的工人团体。他主张劳资协调主义，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求资本家反省，另一方面又要求工人修养品性，提高技能，互助友爱，同心协力，提高工人的地位。因为在此时期不允许工会存在，所以友爱会吸引了先进的熟练工人。这个会是由十五人发起的，四年后就成为在全国工业地区都拥有支部和二万会员的全国性组织，同时也具有对抗资本家，争取提高工人生活与保卫工人权利的组织，即工会的性质。

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民主改良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长起来了。从自由民权运动遭受挫折，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思想和文化的最高原理而强制灌输以来，甚至连天皇制都敢于批判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除极少数社会主义者外，

并未发展起来，但是言论自由以及议会政治的主张，对官僚专制的攻击和对父权家长制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思想，或对穷人、被虐待的人的同情以及社会平等的思想，即使在教育救语的思想统治下，还是继续发展起来了。

这一情况尽管是不规则的、畸形的，但却与产业资本主义确立的阶段相适应的。这一时期，成长了不受政府特别保护而与特权大资本家对立的独立的工业资产阶级。1897年，约有六十家公司，1907年即达一万家，1910年则发展为一万三千家。在此期间，资本约增三倍。同时，公司职员等新的中产阶级扩大了，教员、医生、技术专家、报纸杂志记者、艺术家、律师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和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

这些人不仅来自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来自全国的地主以及上等农户。每年中等学校毕业人数，1897年不过二千五百余人，1907年激增为一万四千人，1912年则达一万八千余人。他们是当地舆论的领导者。初等教育也得到普及，而且程度有所提高。儿童的就学率在公布学制二年后的1874

年不过占32%，而1900年就超过70%，1910年则达到98%。这是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国的高比率。而1906年又把义务教育的年限从四年延长为六年。

以这种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基础，民主主义改革派就从前述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资本家、新的中间阶层中成长起来了。而成为其前哨的，就是前文叙述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这一点，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成为民主改良派理论领袖的吉野作造，在后来(1928年)也曾以他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为一个证据，谈到“近年民主政治思想的开创者，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群社会主义者。”还有，幸德秋水在被处死刑前夕，曾在狱中写了《基督抹杀论》，隐喻着抹杀神格化的天皇的意思，这本书的出版，曾得到佛教家高岛米峰的帮助，国民主义者三宅雪岭为此书写了深刻的序言。这也是说明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改良派相互结合的一个例子。

民主改良派的主要政治要求是男子普通选举权、议会政治和反对军阀的横暴。1909年到1911年的每届议会，日向辉武、松本君平、藏原惟廓等

政友会的少壮众议员都提出过男子普选法案。最后，在第二十七届议会上，虽然众议院通过了，但贵族院却以“给穷人选举权，等于是背叛国家”和“普选是依据西洋的天赋人权论的，是不合日本国体的”为理由，全体一致加以拒绝。政友会以及立宪国民党（由改进党演变来的宪政本党在1910年3月改组而成）的干部认为允许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是为了给予因大逆事件而处于阴郁黑暗的社会，多少增添一点光明感，被贵族院否决，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对军部的批判也很严厉。1909年2月的《读卖新闻》曾经很具体地揭露了“陆海军军部的黑暗面，他们表面装作清廉洁白，背后却肮脏庸俗，对于采购的许多军需品，经常是掠夺不少的佣金，暗中侵吞这些占来的便宜。”这可算是预言了五年以后的西门子事件。还有，1911年8月，海军大佐（上校——译者）太田三次郎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正面反对海军提出的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提案，揭露海军部的腐败，指出整顿的唯一方法是“取消海军大臣限于现役将官担任的军阀主义，应和外国同样以文官担任。”《东京日

日新闻》也报道了这个演说。

日清甲午战争前，北村透谷以来的明治文学，尽管其文学观、创作方法和体裁有所不同，但却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是从父权家长制以及封建道德的压迫下的个性的解放。而在日俄战争以后，敏感的青年诗人石川啄木却天真地抓住“强权”——天皇制控制日本青年喘不过气的事实，强调不要怀念已成过去的元禄时代，而应和强权针锋相对，以开辟“明天”的新前景（《时代闭塞的现况》）。他是和强权针锋相对的，但不久他知道了捏造大逆事件的真相后，就开始接近社会主义了。

陆军扼杀西园寺内阁

如前所述，日俄战后仍以准备应付俄国的报复为理由，继续为侵略中国而扩张军备。因此，战争时期的战时特别税，在战后不但没有废除，反而更加繁重了，中小资本家为营业税的沉重压力感到苦恼。他们和人民群众一起反对扩张军备。特权大资本家基本上支持天皇制军国主义，

因而认为军备扩张是不能停止的（扩军，对大资本家来说，可以立即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因为从整体来讲，军费的沉重压力有碍资本积累，所以也不得不采取批判态度。

元老们认为西园寺（公望）内阁对社会主义的镇压不够有力，于1908年7月让桂内阁执掌政权，代替了西园寺。桂（太郎）内阁虽然制造了大逆事件以符合元老们的期望，但对反对阀族、反对军阀的舆论却无能为力。又加上处于军备扩张和财政困难、左右为难之中，也被大资本家所抛弃，桂太郎终于在1911年8月辞职。

此后，再次由西园寺公望以政友会为基础，组成内阁。趁着执政党政友会在1912年5月的大选中获得大胜利的情况，政府打算压缩1913年度的预算，但是，陆军省在实际上不仅完全没有节减开支，反而要求增设两个师团。其推动者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和军事课长宇垣一成等。西园寺首先仰仗资本家和广大国民的支持，拒绝了陆军的要求。田中以及宇垣迫使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不经首相而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他们还说服了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陆军前辈，号称是“军队的全

体意见”，而不提名继任陆相。于是在同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不得不总辞职。

对军阀的横暴，全国立即掀起了责难。

在此以前的7月（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皇太子继位，年号由明治改为大正。还有，深得明治天皇信赖，颇能辅佐天皇的伊藤博文也在三年前死去，再没有大政治家可以辅佐年轻而无政治经验，而且脑力缺欠的新天皇。山县有朋在他的竞争者伊藤博文死后，以元老中的元老自居，逞其权势。为了以天皇为靠山压制政党势力，便以心腹桂太郎为内大臣兼侍从长，送进新天皇的宫内。接着，西园寺内阁一倒台，山县有朋就让内大臣^①桂太郎特受诏旨，组织内阁。因为诏敕全由内大臣起草，所以桂太郎便以天皇的名义，让自己当上了首相。

大正政变

这件事等于是对国民反对桂太郎及其背后的

^① 内大臣：明治时期以后，辅佐天皇的宫内官职。

山县有朋等军阀的斗争，火上加油。看到这一点的海军军阀，认为这是削弱陆军军阀的好机会，就拒绝向新内阁提名海军大臣。桂太郎也是依靠天皇的诏勅，让前任海军大臣留任，才勉强组成了内阁。几次的诏勅政治，越发使舆论沸腾起来，发生了“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空前的国民运动。这种“拥护宪政”，实际上就是此后的争取宪政。

站在运动前列的是《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等报纸。国民党的犬养毅、政友会的尾崎行雄等在议会里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他们还多次召开讲演会，集聚了几百人几千人。名叫“交询社”的大资本家俱乐部也援助尾崎和犬养。1913年1月，在议会休会期满即将再度召开的前夕，全国报纸杂志记者的代表四百人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拥护宪政、打倒桂内阁、扫清阀族，从此运动更加发展。护宪派的各家报纸警告说，不要利用这种民众的运动，为政党的私利，而继续监视着政党。

面对着国民运动的高涨，政友会的总裁西园寺公望和最高负责人原敬等也开始倒阁活动。国

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此时已经被桂太郎收买，桂太郎用此成立了“同志会”，想度过国会的难关。桂太郎的这笔活动经费主要是由三菱提供的。2月5日，尾崎行雄等在议会上提出了弹劾内阁的提案，政府下令议会停止会议。在此期间，桂太郎说服宫廷，让天皇命令西园寺公望支持内阁。作为公卿华族的西园寺本人虽因此而不能进行活动，但他决不打算让政友会的倒阁运动停止下来。

在议会再次召开的2月10日，从一清早就有数万民众（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城市各中间阶层、无产者、学生）包围了议会的议事堂，同在胸前戴有白蔷薇的护宪派议员相互鼓励。政府虽以二千五百名武装警察和三个小分队的宪兵威胁和镇压群众，但群众并未屈服。桂太郎首相终于决心解散众议院，他把这个意见说给议长大冈育造，大冈立即指着窗外的群众，对桂太郎说：“你看看这些群众，如果要解散（国会），那么民众不以血相见，是不会平息的。还说不定会成为革命内乱的开端。您的进退，正处于是否引起内乱的十字路口。”

害怕内乱的桂太郎决心辞职。原敬也在这天

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桂太郎还不辞职，恐怕就要掀起革命的骚乱了。

包围国会的民众不久就转移到紧邻的日比谷公园。从傍晚开始，分成几路在市内活动，袭击了支持桂内阁的《大和》、《国民》等报社，烧毁了警察岗楼。11日，桂内阁辞职。这次政变称为大正政变。

首都民众的暴动立即扩展到大阪（11日）、神户（13、14日）、广岛（16日），特别是京都，在17至19日的三天中，发生了猛烈的骚动。如果政党在这时能坚决地把这些民众加以组织和领导，可以给军阀以致命的打击，大有实现政党内阁的可能。但是，政友会的原敬最怕革命。国民党的犬养毅也是一样。因此，大正政变仅以打倒桂内阁而告终。

大正政变，在进步的报纸杂志领导下，由民众扮演了运动的主要角色，这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八年前的反对《朴茨茅斯条约》转化而来的民众对警察的袭击，虽然民众有被煽动的宣传所利用的一面，但大正政变却始终一贯的是民主化的斗争，尽管有支持桂内阁的诏勅，但

是,仍然是要打倒桂内阁的舆论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民众仍然没有自己的稳定的领导机关,所以结果还是不得不为现有政党所利用。

从西门子事件到大隈内阁

在桂内阁之后,海军军阀巨头山本权兵卫组织内阁。西园寺公望因为没有贯彻诏勅,没有支持桂内阁,遂引咎不再担任政友会总裁,继他之后任总裁的原敬把政友会出卖给山本内阁,成为执政党,原敬本人也当了内务大臣。

山本内阁对舆论作了一定的让步。第一,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从现役将军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将官;第二,修改文官任用令,对包括警视总监和内务省警保局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实行自由任用制;第三,坚决实行行政整顿,把1913年度的预算比前任内阁的原案减少13%。但超过此限就不让步了。奇怪的是就连这个让步的第一点也有交换条件。即作为扩大陆海军大臣任用资格的交换条件是把陆军的动员及编制的业务从陆军省转移到参谋本部,这就反而使得对强化军阀的批

判更加强烈了。

山本内阁把大行扩张海军的费用列入1914年度的预算案中，因此，并没有顾及群众长期盼望的撤销日俄战争时期临时特别税的纺织品消费税、交通税等问题，还有中小工商业者强烈要求的废除营业税，也没有当成问题。

这样，与“废止恶税”相联系，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第二次民众运动就从1914年1月起再次在全国展开了。1913年10月，桂太郎病死后，加藤高明接办同志会，于12月正式成立了立宪同志会（后来的宪政会），然而这个同志会这次成了在野党，也提出了“打倒阀族”的口号。而执政党的政友会却偃旗息鼓了。国民党的犬养毅也与山本首相勾结起来。政党的活动就是这样的无原则、无节操，而在此后也是如此。

海军首脑部为制造军舰和购买其他军需品，几年来曾从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英国的维克斯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等取得回扣，而这时，这个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被揭露出来了（西门子事件）。对恶税、重税不满和要求整肃军部，统一为打倒军阀官僚专制的要求。2月10日，和一年前一

样，几万民众包围了议会。政府用四千名警察和一个大队（营）的陆军部队驱散了他们。另外，政府依靠政友会在众议院中占有绝对多数，就一个一个地否决了在野党弹劾内阁的议案以及废除营业税的法案。但是，因为贵族院山县有朋一派的议员猛烈攻击政府，使预算草案未能通过，这就迫使山本内阁于3月总辞职。

此后，虽然山县一派的官僚清浦奎吾受命组阁，但因海军反对，未能成功。

元老们也束手无策。民众运动、陆军和海军的对立、官僚的山县派与反山县派的对立纠缠在一起，提不出首相的候选人。结果，由元老井上馨推荐曾经当过政党首领，也曾担任过首相的伯爵大隈重信重返政界，组织了内阁。立宪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出任外相，并以副首相的资格主持工作。

三十三 世界资本主义 的总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日本

“大正新时代的天佑”、
“与牛比赛的青蛙”

大隈内阁成立四个月后的1914年8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天后的8月9日，元老井上馨写信给大隈首相和元老山县有朋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举国团结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要停止一切为一党一派利益的减税停税等的争执，要巩固财政的基础，团结英法俄三国，“确立日本对东洋的利权”，“怀柔中国的当权人物”，争取日本在世界上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地位。山县和大隈对此也“深有同感”。

四十多年以前，当井上馨等还是贫穷的青年，拚着性命进行讨幕运动时，讨幕派的首领西乡隆盛得知援助幕府的法国因与普鲁士之间发生战争危机，援助幕府也将发生困难的消息时，虽然一瞬间想到“此两国发生战争，乃日本之大幸。”但转瞬间又有深刻的反省，说：“以良心而论，虽甚有罪过，但因我国处境过于困难，遂希望它们发生战争，才有此卑鄙之心。”

这种说法和把欧洲的大乱当成天佑，而要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是有着多么大的区别！这种说法与其说是西乡与井上等的人品不同，不如说是想要打倒旧权力、创造新国家的革命青年与已经掌握权力并一心一意想要保住既得权力的反动元老的不同。

当时统治者们让国民坚信，日本打败了世界最强国之一的俄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一等国”。在上二代，日本还是苦于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小国。而现在，治外法权早已废除，1911年又恢复了关税自主权，不仅与欧美缔结了完全对等的条约，而且拥有近乎本国面积80%的殖民地和比本国大十多倍的半殖民地势力范围，成为亚洲最强，

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陆海军的大国。工业发达了，日本的商船让太阳旗飘扬于世界各港口。六年制的初等教育在学龄儿童中几乎全部得到普及，欧美的科学技术也被完全移植过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当时只有日本是用本国语进行高等教育的国家。

如果看到这些，就相信日本已经是世界的一等国，也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日本民族洋溢着的生命力。但是，这种生命力只被天皇制和军国主义利用来向反面发展，而国民生活及其文化的潜在力量却没有得到培养。日本近代最大的作家夏目漱石于1909年已经就这个一等国是多么没有深度，也没有实力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他说：“象日本这样依靠筹措借款来掩饰穷困的国家是没有的。你想，这种借款到什么时候才能偿还呢？外债也许是可以偿还的。可是，只靠借款是不行的。日本如果不向西洋借款就成了站不住脚的国家。尽管如此，还自己认为是一等国，而硬想挤进一等国的行列。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内部都是很空虚的，只支撑着一个一等国的门

面而已。因为是勉勉强强地支撑着，所以是很悲惨的。和与牛比赛的青蛙一样，你的肚子快要破裂啦！……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衰弱都带来了不幸。不仅如此，道德的败坏也一齐来临。举目一看，日本国中那里还有一点光辉的侧面呢？”

（《从此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的困窘

让我们再把夏目漱石的文学描写放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事实当中来回顾一下吧。

日俄战争后，日本输入了大量外资，工业生产总算是迅速发展了，但是从1907年的经济危机以来，并没有恢复真正的繁荣。由于重税、高额佃租和低工资，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极端贫困，国内市场也特别狭小。还由于过多的军费和殖民地的统治费用，使国家的财政几乎破产。1914年的外债为十九亿八千万日元，超过同年税收的六倍，连支付利息也有困难。贸易继续入超，使硬通货的现有数额连年减少，无法维持兑换制度。以这种经济情况为背景，民众以打倒阀

族、反对军备扩张、减税、停税的要求，不断地攻击官僚、军阀政府，民众运动连续推翻了两代内阁。

尽管想以侵略海外的活动来摆脱国内的困难局面，但围绕日本的国际形势已经和日俄战争前完全不同。由于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件事本身，如前已叙述的井上馨的信中也曾强调过的，它加深了与美英的对立，与俄国表面上姑且不论，在根底里也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不仅如此，另一方面，朝鲜民族的抗日独立斗争，在被吞并后也更加广泛而深入了。为了进行镇压，打算重新增驻一个师团，但要增设师团，就超过了本国财政能力的限度，会成为大正政变的起因那样，和殖民地的矛盾，就进一步促进了国内的矛盾。而中国民族已经打败了腐败专制的清朝，并以新的生命力而成长起来，并在利用日本和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如在南满洲，计划用英国资本铺设锦州、朝阳之间的铁路等，开始采取威胁日本独占的政策。

处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日本即使利用英美和俄国的对立，充当英美在远东的前哨阵地以取

得其援助，乘朝鲜和中国的民族仍还软弱的时候，去侵略它们，而把日本本身提升为“世界的一等国”，但是前途是很暗淡的。尽管一味地向国民灌输虚夸为“一等国”的信念，但明治以来用冒险手段把日本帝国带到这个地步的元老以及最高当权者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日本现在已完全陷于绝境。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在人类的“大战乱”中发现了摆脱绝境的“天佑”。

参加世界大战和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

政府以日英同盟为借口，也不顾英国的为难而强行参加了大战。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政治杂志《东洋经济新报》等报刊，曾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还有，在对德宣战的诏敕发出后，议会中的进步议员也指责政府把日本卷入战争的漩涡，反对一部分军事预算。天皇发布宣战，而议会有反对论者，这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海军立即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各岛，陆军攻占了中国山东省青岛的德军要塞，接管了德国在该省的权利。此后，协约国虽要求日

本出兵欧洲战场，但政府并未答应，只是在战争末期，约定在讲和后把旧德属南洋各岛变成日本领土的情况下，才只派了小型舰队到地中海。

日本在扫清德国在山东省的势力之后，不仅未撤兵，反而增派兵力。以此为背景，于1915年1月向中国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五项共二十一条的要求。第一项是日本继承山东省内旧德国的利权等四条；第二项是把东部内蒙和南满洲实际划为日本领土的七条；第三项是日华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最大的铁矿、煤炭企业）；第四项是中国不割让沿岸和岛屿给外国；第五项是中国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设置日本人顾问，根据需要，日华合办中国警察，雇佣大量日本人，中国军队一半以上的武器要由日本供给，或建立日华合办的兵工厂，由日本提供技师和材料以及要求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传教权、铁路和港口权利等共七条。

从第一项至第四项是割取中国的重要地区，第五项则是把中国的军队、警察完全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夺取民族主权的实质，所以全中国掀起了猛烈的反对运动。一向卖国的袁世凯对此也进

行了抵制，并向英美提供了情报。英美也极力反对第五项。日本不得不撤回第五项，但其他条款则在武力威胁下强迫中国接受了（5月9日）。中国民族从此就把日本看作是最坏的帝国主义。

第二次策谋“满蒙独立”

参谋本部也采取了单独行动。1916年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以“支那浪人”为爪牙，准备出兵，实现“满蒙独立”^①，并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和小矶国昭少佐前往指挥。可是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等却想以满洲军阀张作霖为傀儡，谋求“满蒙独立”。在关东都督府内部，都督也是想维持张作霖，而其参谋长却策谋由土井等人炸死张作霖。正巧6月初，由于反抗日本的袁世凯总统突然死去，政府就和参谋本

① “满蒙独立”是“支那浪人”们的愿望。他们最有力的团体黑龙会的代表内田良平，于1914年10月向政府提出绝密的《对华问题意见书》，提议要使袁世凯政权垮台，使中国陷于混乱，乘机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让该政权与日本缔结“国际协定”，由日本掌握中国的军事权，并由日本取得满洲和内蒙的统治权等。

部商定推举副总统黎元洪继袁之后充当傀儡的方针。这样，“满蒙独立”计划完全停止下来。

第二次策谋满蒙独立虽因此而中止，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的参谋本部可以随意用兵，而参谋本部内的意见也不统一，部长和派出现地的军人都阴谋制造重大事件，这种事情的大规模的重演，就是仅仅十二年后的炸死张作霖和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变”。

从大隈内阁到寺内内阁

对华强制要求二十一条的大隈重信首相和加藤高明外相的拙劣作法，使原来就嫌恶大隈和加藤的山县有朋更加深了对内阁的对立。加藤外相想要实现外交的一元化，既不向山县等元老充分提供情报，而且加藤打算加强日英同盟，但山县等已不再指望日英同盟，想以日俄协商来推进对中国的瓜分。迫于元老们的压力，加藤终于辞职（1915年8月）。石井菊次郎继任外相，1916年7月缔结了第四次日俄协定。到第三次为止的协定，都是关于瓜分满洲和蒙古的协定，而第四次

则是缔结了以全中国为对象，针对美英进入中国的日俄秘密军事同盟。

在此以前，大隈内阁已实现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所以在签订日俄协定之后，对山县等人来说，大隈内阁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他们乃操纵贵族院攻击内阁（在众议院中，执政党是绝对多数，所以无从下手），1916年10月，迫使大隈内阁总辞职。此后，山县有朋直系的陆军大将寺内正毅担任首相，组成了官僚内阁。

对中国强迫要求二十一条和第四次日俄协定虽然加深了日本和英美的对立，但对英美来说，由于对德战争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所以他们对日本的行动也只有暂时容忍了。1917年4月，美国也参加了协约国，暂时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政策。接着，中国在8月也参加了战争。同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和美国国务卿兰辛签订了《石井·兰辛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因与中国领土接壤而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

中国在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没有威信，各省督军和实力派分别拥兵割据，成为军阀。寺内内阁乘此中国混乱之际，以黎元洪政权的国务总

理段祺瑞为傀儡，从1917年6月至1918年9月之间，向其提供了总计一亿八千六百万日元的借款。虽然名义上说是什么铁路建设费、水灾恢复费等等，实际却是段祺瑞的政治和军事资金，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抵押。这笔借款是由寺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未通过外务省，而直接和段祺瑞做成的交易，所以称为西原借款。

政府用这笔借款束缚段祺瑞政府，1918年3月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日华公函，5月又强迫段祺瑞政府分别签订了陆海军的《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什么，站在日华两国的“地位和利害平等的观点上”，两国“共同防卫”“远东”，两国军队“共同作战”，因此，规定日本在中国军队内派设“联络员”，在中国领土内共同建设和使用军事基地。中国的学生、商人、工人展开了激烈反对这个卖国协定的运动。

空前的经济繁荣、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世界大战不仅给日本的统治者提供了暂时实

现其对华野心的机会，而且在经济上也开辟了空前大繁荣的道路。大战爆发不久，由于世界贸易突然中断以及混乱，日本经济虽也受到打击，但从1915年下半年起，输出开始急剧增加，各种工业跃进发展。除贸易外，还有海运收入和其他进款，使硬通货的现存量从1914年的三亿四千一百万日元激增至1919年底的二十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战前，日本一直是巨额外资输入国，而这时成了资本输出国。俄国政府自不必说，就连英国政府的国债，日本也在认购了。特别重要的是以纺织业资本为首的向中国的资本输出。到1913年为止，日本在华纺织业有工厂六家，纱锭十七万四千七百枚和纺织机二千六百四十八台，而在大战期间（1914—1919年），则又新增加了八家工厂、十八万六千五百枚纱锭和二千三百五十二台纺织机。对中国的纺织资本输出，到1920年的经济危机后，更是急剧增加，1923年，在华日本资本纺织厂的产量超过了日本国内生产棉纱向中国的输出量。

农林、水产、工矿业的总产量，在1914到

1919年间，从价额来讲，增加三倍以上，特别是工业生产达五倍以上，它在生产总额所占的比率，从44.4%增至56.8%，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工业产量超过了总生产量的一半。与此相反，农业产量从绝对金额来讲，虽然增加近三倍，但所占比率却从45.4%下降到35.1%。企业的新建和扩建是惊人的。公司总数，1914年底为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八家，投资约二十亿七千万日元，1919年底为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家，投资约五十九亿八千万日元。在这期间使用五人以上的工厂数以及工人数，从约三万二千家、九十四万八千人发展为四万四千家、一百六十一万人。矿山工人从二十九万四千人增至四十六万五千人。

炼铁、造船、机器制造业虽然特别迅速地发展了，但工作母机工业仍未建立起来，纺织机械大部分仍是进口的。因此，纺织工业的计划资本虽在大战期间发展了九十七倍，但实际的生产设备还不到两倍。从整体来说，日本还是轻工业国。

在这种繁荣之中，由于大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大产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的结合，金融垄断

资本主义就以过去的四个财阀为首，正式地确立了。

与此同时，垄断资本家的政治、社会力量也增大了。1917年3月，组织了只由主要产业的大资本家为会员的工业俱乐部。作为资本家的团体，过去虽有商业会议所，但它的代表是由营业税纳税人中选出，当时是代表中小工商业主利益的，所以垄断资本家们到这时也感到有建立自己组织的必要。工业俱乐部的主要负责干部被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系统的资本家所占据。他们在“谋求工业的发展”这个漂亮的幌子下，既对政府和军部做工作，也对政党做工作，发挥了“幕后政府”的威力。

寄生地主制的顶点和 农业以及农村的变化

随着工业的飞跃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业和农村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14年至1919年，耕地面积扩大了44%。蚕茧的产值从一亿七千五百万日元激增为七亿七千一百万日元，

成为农村景气的主要支柱。还有，日本全国耕地面积，包括北海道和冲绳在内的最高数字是1921年的六百一十六万二千多町步，相当于国土总面积的15.8%。1922年以后，耕地逐步减少。这是因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军事用地、道路和铁路用地等占用耕地的增加，超过了开垦耕地的增加。

在农户中，不足一町步，特别是不足五反的农户减少了。一町步以上、不足二町步的农户实际增加了。在日本农业中二町步以上的大经营者，在景气期间也有所增加。养蚕、畜产、蔬菜等方面出现了富农的经营，在稻谷的生产上也普及了脚踏脱粒机，中耕除草用的千齿锄不见了，开始部分地使用机械，而化学肥料逐渐在肥料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但是，在日本农业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米麦生产中，富农经营几乎没有发展。这是因为中农尽管打算扩大经营，但因寄生地主制的力量强大，地价高昂，所以扩大自耕地非常困难，只有向地主租地来扩大耕地面积。但在交完佃租之后，经营者的收益极少，从而使扩大经营受到限制。

在此时期，虽然中农的经营有所增加，但拥有五反以上，不满十町步耕地的农户却减少了。大概是用出卖土地的钱改了行业的自耕农增加了吧。这些土地集中于大地主手里。大战期间，是大地主（有土地十町步以上，不足五十町步者）、特大地主（有土地五十町步以上者）增加最迅速的时期，特大地主增加42%，达四千二百二十六户；大地主增加13%，达四万五千九百七十八户。寄生地主制达到了顶点。

大战的景气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半封建的农业生产结构，但农民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这个时期已经决定性地崩溃了。手工纺织的衣料即使在边远的村庄也不见了。在人力拉车的山路上，有了马车。不久，在附近又通了铁路。象这样农村生活急剧变化的例子也并不稀奇。这样，资本主义日益加深对农村的渗透，农村传统的民俗以及传说也就被遗忘了。

俄国革命、大战结束、凡尔赛条约

日本统治者视为“天佑”，欢喜若狂的世界

大战，实际上使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劳动人民陷于极端的痛苦，使各国的阶级对立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激化。这些对立是孕育着从根本上动摇世界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主要因素。而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最薄弱的一环，便于1917年3月8日发生了人民群众要和平、要面包和要土地的暴动，打倒帝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成功；又于11月7日，在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与贫农结成同盟，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国家的全部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掌握。

苏维埃政权在成立的第二天就呼吁一切交战国实行无赔偿、无吞并的媾和，并相继实行了土地和大工业的国有化、妇女的解放、实现帝俄时期被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由的革命政策。

苏维埃政府的讲和建议遭到协约国的拒绝。这样，苏维埃政府就于1918年3月单独与德国缔结了和约。

俄国革命给予各交战国的士兵、工人和全世

界的工人、被压迫民族以深刻的不断增大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工人、被压迫民族的反战独立斗争，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起来。1918年7月，德军在西部战线大攻势的失败，使德国及其盟国的革命运动更为猛烈。因此，同盟各国从9月起相继向协约国投降。德国也因11月在基尔军港燃起的革命烈火发展到柏林，10日，皇帝逃亡国外；11日，德国就向协约国投降了。历时四年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而告结束。

1919年6月，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各交战国签订了和约。德国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被迫负担无法支付的巨额赔款，军备也受到限制。奥地利和土耳其的领土也被削减。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的美名，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了几个为反对苏联和德国的英法的附属国。

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华民国，虽然要求把旧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归还中国，但英法自不必说，就连美国也与日本妥协，使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利权。此外，日本还以“委任统治地”的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南洋所占领的原德属各岛。

在讲和会议时，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作为“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机构，建立了“国际联盟”。但是，不允许德国和苏联参加。美国议会害怕国际联盟会妨碍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中南美洲扩张活动的自由，也否决了加入其本国总统提倡的这个联盟。日本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和英、美、法、意同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而自负。

列强干涉俄国革命 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凡尔赛体制是英法统治欧洲的体制，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联的体制。不管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否，协约国方面为防止俄国脱离对德战线和扼杀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即1918年1月日本和英国军舰开进了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2月和3月，英国和美国的陆战队在北方的摩尔曼斯克登陆，准备进攻彼得堡（今列宁格勒）。

同时，在革命前成为帝俄军队俘虏的奥地利

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在革命后，为参加协约国军队，反对统治他们的奥地利帝国，而与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法国，但在从俄国西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5月，在西伯利亚得到英法侵略部队的援助，竟突然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了一些地方。与此相呼应，日本和英国的陆战队于6月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不仅是协约国方面，就连德国军队也违背对苏和约，占领了俄国南部，并寻找向俄国东部发动新进攻的机会。

在此期间，日、英、法、美之间进行了协商，要把协约国军队派往西伯利亚，与捷克军一起扼杀俄国革命。

日本统治者当时还不相信俄国革命会取得最后胜利，于是想乘机占领东部西伯利亚，或者是占为己有，或者是在此制造傀儡政权。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处于西伯利亚和日本势力之下的南满洲之间的，即北满洲与蒙古，自然也就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再进而以压倒之优势伸向全中国，那么大战结束之后，欧美列强即使再来中国进行扩

张活动，日本也能战胜它们。美国察觉了日本的这个意图，认为对西伯利亚的干涉只对日本有利，便加以反对。但是，因为日本即使无人支持，也要出兵，所以美国为了牵制日本，终于同意共同出兵，美国出七千人，英法合计五千八百人，日本出一万二千人。

8月2日，日本首先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以《东洋经济新报》杂志和《大阪朝日新闻》为首，舆论上激烈地反对日本出兵。此时日本正处在后文所叙述的米骚动的高潮，民众无意为出征士兵送行。日本最初派出一万二千人，后来继续增兵，三个月后已达三个师团，最多时，实际有七万五千人派往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防止俄国脱离对德战线的借口已不适用以后，协约国方面还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干涉战争，并大力援助俄国的反革命军队。英法军队侵入了德国败退之后的俄国南部。

以英、法、日、美为首，世界的十三个国家，从四面向幼小的革命的俄罗斯袭来。在沙皇多年的暴政和长达四年的大战而荒芜的俄国，粮食、衣料和燃料都极为缺乏，再加上反革命和帝

国主义的干涉，社会主义濒于危机。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为保卫革命而继续进行战斗。

在干涉军的士兵当中，以1919年4月停泊在敖德萨的法国舰队的水兵为首，也不断出现了反对干涉的起义部队。西伯利亚的日本兵也一点感觉不到战争的意义，毫无战意。而且各帝国主义国家，本国的工人、群众也开始反对武装干涉。特别是在殖民地，反帝民族独立的斗争有了发展。这就束缚了干涉者的手脚，干涉失败了。1920年1月，英、法、意停止了对俄封锁，西伯利亚的美国军队也撤走了。

1920年4月，波兰大军开始侵入苏联，也于10月被完全击退。这样，苏联取得了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基本胜利。

只有日军制造各种借口，仍旧继续进行干涉，但是越干涉越失败，终于在1922年6月，以干涉国中最悲惨的下场，不得不把军队撤出西伯利亚。在此期间，虽也出兵到库页（桦太）岛的北部，但这项部队也在1925年撤离该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战争中最初的失败。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战败国的德国和奥国，暂时离开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胜利的英法帝国主义也需要几年时间来恢复战争的创伤。而美国和日本却在此时一跃为强国。特别是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之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市场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这就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适应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新的对立转为激化。战败的德国和战胜国英、法之间的对立不断给欧洲带来紧张。在战胜国之间，日本和美英两国也加深了围绕中国和太平洋问题的对立。在世界各地，英法帝国主义与想要取而代之的美帝国主义的对立也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对立、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对立也以大战中帝国主义压力的减退为契机而燃烧起来。

由于帝国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转为尖锐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就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倒了

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统治全世界的体系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而且开始日益成长。这件事本身给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以革命的影响，使斗争向前跃进，并为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尖锐化。例如中国民族反帝斗争的发展就使日、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转为激化。

总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伤痕，不得不随着年代的发展，而扩大和加深，这已被1917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尽管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能有所发展，但从整体来看，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已经进入了完全不能摆脱的阶段，即开始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日本资本主义虽然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有了跃进的发展，但它不能避免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影响，具体情况在下一章加以叙述。

三十四 民本主义、米骚 动、原内阁

——趋向拿破仑主义^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市民文化

象前章已经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确立了作为近代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继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之后，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在这时期的日本，又是垄断资本的确立时期，是产业资本的全盛时期，也是与财

^① 拿破仑主义(Bonapartism)，也译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的形式之一，是“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形势下从资产阶级反革命性生长出来的一种统治形式”(列宁)。拿破仑·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曾先后在法国建立这种统治形式，故名。其特征是以军阀为首领，以军队、警察、官僚和教会为工具，以“超阶级”、“超党派”为幌子，以顺风转舵、随机应变为方法，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的政策。——译者

阔资本相对立的、没有特权的工业资产阶级和近代中产阶级广泛成立，形成了市民社会的时期。以这一阶级为基础，在日俄战争之后，继续发展了倾向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潮流。

由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开始，在日俄战争后的一个时期统治了文坛的自然主义，虽以不同的方法，但也和以前的文学一样，对于父权家长制和封建道德进行了反抗，并为个人精神的自由而艰苦奋斗。但是，自然主义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的国民的课题，而陷入个人主义。反对自然主义的夏目漱石，也是追求确立个人个性。他把这扩大为日本的“现代的开化”问题。他猛烈地批判了日本那种奴隶般地跪倒在西洋面前，而“只是装成一等国的门面”的肤浅的近代文化和对此并不自觉，反而自吹自擂的虚伪的知识分子与当权者。他把建设真正具有国民基础的文化作为目标。他也绝不歌颂日俄战争的“大胜利”，而对战争的非人道性进行了批判。他对文明的批判虽然是深刻的，但却没有找到把那所谓向外发展的开化转化为向内发展的道路，他也不能与帝国主

义针锋相对，其个人主义也把夏目漱石自己局限在天皇制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久，他就谋求安于“则天去私”的半宗教的境地了。

正当此时，天才诗人石川啄木超越了自然主义的狭隘境界，主张和窒息青年的“强权”针锋相对，用以创造“明天”。虽然在“可以吃的诗”等评论中，把生动地反映国民生活的文学作为目标，并以诗集《笛子与口哨》等，向革命的民众文学的道路前进，但因贫病交加而早死（1912年）。

在此时期，文坛上欢呼为“打开了新的天窗”的是1910年创刊《白桦》杂志的同人们，即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毕业于学习院的青年们。他们认为对自己个性要正直，这是合乎人类意志的，并尽情放纵。他们说，什么忠君爱国等等，只不过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庸俗的事情。这种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在这里虽然没有自然主义的“暴露现实的悲哀”，但是，这只是上流社会青年一时的乐观罢了。他们并没有克服忠君爱国的思想，而只是站在与它无关的立场上。而在国际上经过俄国革命，国内经

历了后文要叙述的米骚动，日本的市民社会早已开始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这时，白桦派的思想也就行不通了。

中产阶级的妇女也开始试图全力反抗封建的秩序和道德。平冢雷鸟等妇女文学家在1911年成立的“青鞥社”为其代表。她们提出并实践了极有战斗性的主张，说“原始时期，妇女实际是太阳”，可是现在却成了依靠别人为生，依靠别人才能发出光辉的苍白的月亮，还要把太阳再一次夺回来。“新的妇女希望打破为男子的方便而制造出来的旧道德、旧法律。”但是，因为没有一种能够战胜官宪的镇压和旧传统舆论责难的坚强的组织能力，遂不得不在1916年解散。

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种市民文学，即使有它不能和天皇制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局限性，但在此界限之内，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推广。在同样的社会基础上，大正政变以来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的主张却有所发展。在解

释《大日本帝国宪法》方面，美浓部达吉等主张，主权不在天皇，而在国家本身，天皇只不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即天皇机关说。这种学说，同上杉慎吉等的天皇主权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912—1913年），得到舆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还有，与美浓部达吉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政治学家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杂志1916年1月号上发表论文《谈宪政之本义并论述其善始善终之途径》，提倡了“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一词，有些政治评论家把它作为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译语来使用，而吉野作造却赋与它独特的意义。他认为民主主义这个词汇是主权在民论的反映，它与君主国的日本是不相适应的。他主张“在政治上，一般地尊重民众，在他们中间不分贵贱上下，而且不问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一概通用的主义”，即“民本主义”。具体地说，就是主张以众议院为基础的政党内阁制，尽管说是尊重民众的舆论，却认为舆论实际是“超人”所制造的，民众在超人的指导下，“形式上确定”舆论，所以认为近代政治

和“绝对的民主主义”是不相容的。这种论调受到了中产阶级的热烈支持。当时的国联是针对德国的军国主义，而以保卫民主主义为借口的，而日本是国联的一个成员，就为民本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杂志中，有《中央公论》、《东洋经济新报》，报纸中有《大阪朝日新闻》，是民本主义的根据地。三宅雪岭主办的杂志《日本及日本人》也主张议会政治，对军部大臣武官制以及统帅权独立制也采取批判态度。

市民社会的进步派，虽然为追求自由和自我而斗争，但当其不能对抗要扼杀他们的元凶时，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就与荒畑寒村一起，于1912年10月，创刊了文艺杂志《近代思想》，他们还想使白桦派认识到他们所谓的“周围的压迫”的本质，与其结成共同战线，但未成功。1914年9月，《近代思想》停刊，并于下一个月出版了《月刊平民新闻》，想要恢复过去的《平民新闻》的传统，作工人方面的工作。由于接连不断地镇压，这个月刊不到一年也就停刊了。此后，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又以《近代思想》、《文明批评》、《劳动新闻》等刊物为武器，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不象大杉荣那样战斗，而是主张等待暴风雨过去后出现的机会。他于1915年9月创办《新社会》杂志，实行了“小的发动”。次年，山川均也参加了。1917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堺利彦由东京市提名为候选人，虽因选举活动遭到残酷镇压，束手无策，只得二十五票，但从社会主义者再度公开活动这点来看，这次成为候选人，还是有其意义的。

在他们恢复活动的背景中，有工人、农民自然成长的经济斗争逐渐发展这样一种因素。1917年是工人争斗和佃农争斗飞跃发展的一年。特别是从1917年以来，争斗的次数、参加人数的激增以及工会的建立多起来，都显示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开始迅速提高了。这一年，友爱会会员在全国已达三万人。佃农争斗，从1917年以来也增多了，据警察当局统计，1917年为八十五起，1918年为二百五十六起，1919年为三百二十六起。佃农会从1913年到1917年，总计成立了八十八处。但这些农会具有浓厚的，为了暂时的争斗而组织起来的色彩，所以不论有无争斗，而长期存在的佃农会是很少的。

年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成立工会数
1914	50	7,904	6
15	64	7,852	4
16	109	8,413	13
17	398	57,309	14
18	417	66,457	11
19	497	63,147	71

蒙受不应有的身分不平等，被强迫打入日本社会最底层的部落群众，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扩大了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往来，在这里提高了他们对不平等的愤怒和人权的自觉性。针对军队以及学校中的歧视、报纸报道的歧视等，部落群众的抗议运动，以1916年烧毁博多每日新闻社为开始，曾频繁发生。为了同化部落，内务省外围组织“帝国公道会”的机关杂志，于1916年7月号写道：“听！工人对资本家的怨恨诅咒声；看！佃农对地主的不满的脸色！”并发出警告说：“他们每天在教育的力量下和受四周的影响，正在觉悟起来，他们怎么能容忍到什么时候也都把他们视为资本家、地主的牛马呢！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一定要效法欧美，立足于坚固的基础

之上，而开始进行温暖的肉体的力量与冰冷的黄金的力量的争霸战。”

米骚动的爆发

俄国继1917年二月革命后，发生了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暴风雨般地发展起来了。这不仅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打倒沙皇的二月革命，也得到民本主义者的好感。他们虽不积极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至少主张承认“劳农俄国”，并反对干涉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的风暴，波及到帝国主义的本国，也波及到它的殖民地、附属国，产生了世界性的直接的革命危机。这个世界性的动荡，也自然地影响了日本。1918年5月，寺内首相在地方长官会议上曾训示说，要警戒由于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加剧”，受到外国的影响，“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正在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正是在此后两个多月掀起的。

如寺内首相也承认的那样，世界大战中特别

好的景气，一方面使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物价暴涨，实际工资下降，使劳动人民陷于严重的生活困难之中。特别是1918年春天开始，米价扶摇直上，继续暴涨。3月每升二角的白米，到7月涨为四角，四角五分，8月初，有的地方超过了五角。

这次米价暴涨的发生，乃是以在半封建地主制度下，稻谷的生产赶不上由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而带来的非农业人口的激增、大米的需要激增这个矛盾为基础，政府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不允许免收关税、自由输入外国大米，而且对于在大战中急剧增加的大地主，因预见到米价将要上涨而囤积居奇，政府也未采取统制政策，拒绝了产业资本家所要求的缩减通货以及降低运费等；再加上从1918年春就预计要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因看到大米在战时的需要，地主和米商就更加激烈地进行囤积投机。这样产生的米价暴涨，使生活急剧陷于困境的无产大众所郁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这就是米骚动。

7月23日，在富山县所属新川郡鱼津町，因男子们出海捕鱼，而在舢板和大船上从事装卸货

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要阻止本县所产大米运往外地，这就是米骚动的序幕，立即扩展到附近的町村，发展为以妇女为主，向官署和富豪要求降低米价以及救济生活困难者的运动。从8月3日起，在西水桥、东水桥、滑川等町镇，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高冈新报》、《北陆时报》等地方报纸，对此都作了同情民众的报道。从8月5日起，大阪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把它作为“越中家庭主妇的暴动”，而极力地报道给全国。

例如《高冈新报》，虽被警察当局视为以“一种思想”煽动骚动的罪魁，但该报在8月7日的社论《狼烟燃起》中还是说：“俄国的革命是从吃饭问题掀起的。德国的军国主义也逐渐为其国外人民的吃饭问题而遭到咒骂。由于东、西水桥和滑川穷苦人民的暴动，就燃起了可怕的社会狼烟。想以警察的力量进行镇压，固然是容易的；但怎么来镇压与他们的绝望叫喊相共鸣的思想呢？”在当时各地的报纸上，这种意见屡见不鲜。在此以前就不断攻击寺内内阁行政不合宪法的民本主义的记者们，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报道

了这次暴动事件，并极力追究政府的责任。

米骚动的性质

8月9日，京都和名古屋两大城市，发生了市民的动荡。9日，京都市柳原被歧视的部落民发生暴动。由此，整个京都市郊经历了为时四天的大骚动，出动军队才镇压下去。7月23日到8月8日，事件还限于富山县时，是骚动的第一阶段。9日到15日是第二阶段。在此时期，全国的大、中城市几乎全部（东北三县和九州南部除外）发生了大暴动。此后，进入第三阶段，骚动扩展到小的町、村。山口县的宇部和北九州的几个煤矿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从8月下旬开始，可以说是第四阶段，各地逐渐趋向平静，以9月12日三池矿山的骚动为最后（但此后也零星发生过要求降低米价的小事件）。

发生民众示威、暴动的地区，地跨一道、三府^①、三十七县，达三十八市、一百五十三町、

^① 一道、三府：指北海道和东京府、大阪府、京都府。

一百七十七村（计三百六十八个市町村），再加上虽未发生暴动，但群众聚集起来或发生不稳事态的市町村，则共有四百三十六个。出动军队进行镇压的地点，达三十四市、四十九町、二十四村，合计达一百另七个市町村。据推断，出动兵力最多的时候，达二万二千人以上。估计出动兵力的总人次超过五万人。群众遭受拘捕、受检察机关处分的为八千二百五十三人，其中提请公诉的有七千七百七十六人。到1918年底，判决给予刑事处分的为二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无期徒刑七人，经过大审院（最高法院）判处死刑者二人。而宇部煤矿的暴动，有十三名矿工遭军队枪杀，十六名重伤。在吴市，以海军工厂的工人为主力的三万民众，于8月14日夜間，在没有路灯的黑暗街道上，与海军部队对峙数小时，群众当场死亡四人。

米骚动是突然爆发的，涉及广阔的地区，事前并无计划和组织。骚动的主力是各种苦工、手艺人、行商等庞杂的从事无固定收入的职业的城市贫民，而近代化工厂的工人，除在造船城市神户和海军工厂所在的吴市和舞鹤外，是不多的。而且，

即使在工厂工人参加的情况下，也不是在其工作地点举行暴动，而是在傍晚，从工厂回到家里以后，作为当地的一个居民，掺杂在群众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发挥出无产阶级特有的作用。

白虹贯日

由于是突然爆发，没有一个通盘计划和进行领导的组织机构，所以在骚动的现场没有提出政治口号，但在名古屋的骚动中，却出现了讲演者高呼打倒寺内内阁，要求知事、市长解决问题，或要求资本家大幅度增加工资的口号。而在福井市，则是闯进了知事住宅。这些零散的事例说明，在民间已经有了从政治和阶级的角度来理解米价问题的因素。

民本主义者倾其全力追究引起米骚动的责任，开展了打倒寺内内阁、确立议会政治的斗争。政府禁止登载关于骚动的消息，更促使了各报纸对政府的攻击。对出动军队镇压民众，也成了激烈谴责的众矢之的。他们还敢于批判天皇恩赐救济金的所谓慈善政策说：“皇室的恩赐金真

正令人感谢。……但是，这不是政治。因为国民有权要求一个能使生活稳定的政治，所以不必因领取赐米而感激涕零。”（《无名隐士夜话》载《太阳》杂志1918年9月号）“从避暑地拨赐三百万日元，值得感谢。”（《法治国》来稿）

8月25日在大阪召开全国八十四家报社的记者大会，决议要求内阁总辞职、拥护言论自由、确立宪政。报道这一情况的《大阪朝日新闻》写道，大会想起了“白虹贯日”这一古语，好象“金瓯无缺的大日本帝国就要跌落到遭受最后审判的地步”。白虹贯日，意味着发动战争、打倒专制君主的征兆；记者在这里暗示了革命。登载这条消息的报纸被禁止出售，负责人被判处徒刑。不久，又迫使社长辞职，总编辑鸟居素川和大山郁夫等编辑人员全部退出报社。

通过米骚动，民众体会到军队和警察是为谁服务的，并觉悟到民众自己的力量。还有，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认为，当生活极端穷困的时候，人们有超越一切法律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即“极穷权”，而米骚动就是它的一种实践。此外还有许多同样的看法，生存权优先于财产权的思想，在

日本开始树立起来。此外，国民经过这种体验，就能正确地理解俄国革命，并扩大了接受其思想的基础。骚动后，担任首相的原敬，在其1918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外国的空气，……社会主义的传布，现在已经骤然发展为无可奈何的形势了。”米骚动成了跳板，这一切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建立共产党

劳资纠纷从这一年开始，达到了过去的几倍，不单是数量上多，而且更加有组织、有计划了，开始了同一产业部门的统一罢工，工人的阶级团结有了进展。这不仅是由于在大战中工人数量激增，而且和仍是农民家庭的一个成员的纺纱、缫丝的女工不同，依靠在工厂劳动来维持整个家庭生活的重工业等方面的男工的增加特别显著，工人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有关，这正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强的客观基础。友爱会在1919年成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完全转变

为各产业工会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二年后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

1920年是战后危机的一年，政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加剧，劳资纠纷减少，但争议的行动却趋向激烈。大杉荣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很大，与接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派发生了对立。这年5月2日，在东京举行了日本初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年底组成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说全国有两千人报名参加。其中有无政府派，有布尔什维克派，还有纯社会改良者，虽然是一个连纲领、章程都没有的杂乱的集团，但作为社会主义，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进一步走向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方向，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次年的第二届大会前遭到取缔）。工会一旦和社会主义者结合起来，开始向政治运动方向发展，也就立即出现了“回到工会”的呼声；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对立，双方虽都主张工人战线的大统一，但却不能实现。在无政府工团主义派被逐出工会后，就发生了左、中、右的对立。1925年，从总同盟退出的左派建立了日本工会评议会。

以租佃争议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从1920年至1927年，一直有所发展。1922年4月，建立了全国性的日本农会。被歧视的部落民自发的解放运动也有了发展，在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

1920年，平冢雷鸟等的新妇女协会成立，进行了以修改《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禁止妇女的政治活动）为中心的运动。她们过去曾高唱自我解放，轻视政治运动，也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在下一年1921年，在基督教妇女矫风会中组织了日本妇女参政权协议会，1924年12月，发展为“妇女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在这样的妇女运动的基础上，以小学女教师为主，“职业妇女”和当时称为脑力劳动、事务性劳动的妇女有了急剧的增加。和这些市民的妇女运动相并行，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也兴起了。还有社会主义的学生运动趋向活跃，从其中也涌现出一些工会、农会的活动家。

就在这时，1922年7月，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的情况下成立起来了。以山川均、堺利彦、荒畑寒村、德田球一、高濂清等人和在莫斯科的片山潜为其骨干，不久，市川

正一、渡边政之辅、野坂参三等人也加入了。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是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就发展了，其中的左派，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结成共产党；而在日本，工会只是刚刚在扎根，在能够推断的最初的1924年，其组织起来的比例，只不过是5.3%（太平洋战争前所能推断的、组织起来的最高比例是1931年的7.9%），象前面所说的，在连社会主义同盟也被禁止活动的情况下，主要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国际相联系，在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建立了共产党。因此，党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是极端困难的。由于没有这种结合，脱离日本工人大众实际的革命运动理论，就会抢先跑到前面去了。例如没有评价普选运动的积极意义，犯了把它也当作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加以排斥等严重错误。然而，正当它在群众中多少抓住了一些活动线索的时候，1923年几乎全部党员被捕，次年3月，决定解散党。但是，共产国际未予承认，于1925年1月，制订了重新建党的纲领。虽然是如此弱小的党，但只要它成立并存在下去，就给统治阶级以莫大的威胁。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统计 (1917—1927年)

年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工会数	租佃争议次数	参加佃农人数	佃农会数
1917年	398	57,309	—	85	—	—
18	417	66,457	107	256	—	88
19	497	63,137	187	326	—	84
20	282	36,372	273	408	34,605	352
21	246	58,225	300	1,680	—	681
22	250	41,503	387	1,578	125,750	1,114
23	270	36,259	432	1,917	134,503	1,530
24	333	54,562	469	1,532	110,920	2,337
25	293	40,742	457	2,206	134,646	3,496
26	495	67,234	488	2,751	151,061	3,926
27	383	46,672	505	2,053	91,336	4,582
						163,931
						232,125
						307,106
						346,693
						365,332

普选运动和原内阁

如上所述，米骚动成为一切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民本主义运动高涨起来的原动力。民本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男子普通选举权，工会和进步学生是其主力，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进步知识分子站在它的前列。大战前的普选运动，乃是来自自由民权运动的天赋人权论和取得政治权利以保卫工人利益的思想的，而前一种思想拥有领导权，但时至现在，后者却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也反映出，“民众”的含义，已从城市的普通工资劳动者变成以工厂工人为主的近代的工人和农民。

但是，普选运动的领导权仍然在中产阶级进步派手中。在地方的青年中间，运动也有相当的发展。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宪政会干部，为了扩张该党势力和把民众运动限制在议会范围内，而利用了这个运动。据1919年2月20日《原敬日记》说，尾崎行雄为了“在工人中间树立尊皇的宗旨”，而要求宫内省提供资金。

寺内内阁因米骚动而辞职，政友会总裁原敬接任首相，组成了除陆、海军大臣外，一切大臣都是从政友会会员或政友会的支持者（外务相）中选任的内阁。历来虽有首相必须拥有爵位这一不成文法，但原敬不是华族，只是以众议院最大政党总裁的身分担任了首相。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日本最初的议会内阁、政党内阁而受到了民本主义者的欢迎。就连厌弃政党的山县有朋元老等人，在此时也不得不同意与民众多少有些组织联系的政党来组阁了。

但是，原内阁并不是民本主义的推动者。原首相害怕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出人意料的破坏秩序的变动”。他原先对于俄国革命一点也不理解，所以也不感到什么害怕，但从当了首相以后，就逐渐加深认识，而要拚命地防止这种革命的影响了。因此，即使是对于普通选举权问题，他们虽也承认迟早是要扩大的，但却认为这始终应该是作为来自上面的恩赐，慢慢地加以扩大，而不允许民众作为权利而争取。

在1920年2月的议会上，有岛三郎代表志向相同的议员说明提出普选法案的理由时，原敬抓

住了有岛所说的，要以普选来“打破阶级制度^①”这句话，就以不许有破坏现有秩序的思想为理由而解散了议会。在此后所进行的大选中，根据他的内阁在前一年提出，并通过了的选举法，即把纳税资格降至三日元，使广大自耕农享有了选举权。并依据小选举区制这一对政友会绝对有利的选举方法和大量的经费及对选举进行巧妙的干涉，而使政友会在选举中获得极大胜利。

从此之后，原内阁就强制推行了议会内第一大党的“实力政策”，在7月的临时议会上，否决了在野党提出的普选案。而且由于这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无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派都看不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以工人的普选运动就衰落了，而整个普选运动也暂时地衰落下去了。

趋向拿破仑主义

原敬在完全压制住了以工人为主力的群众运

^① 这里所说的“阶级制度”，是笼统地指因贫富、贵贱等而有权利上的差别。

动以后，对元老以及枢密院，则是使他们害怕民众的“过激思想”，威胁他们如不支持原内阁，就把民众动员起来。另外，还对军部大臣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进行了攻击。其结果就是1921年10月海军大臣出国不在时，文官首相原敬掌管了海军大臣的事务，而没有派人临时代理海军相。陆军虽对此极力反对，但原敬以“攻击军阀的舆论”很强和世界性的要求和平的思潮为论据，而压住了陆军。原内阁的财相高桥是清，甚至主张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此时一举废除参谋本部。原首相对此虽有某种程度的同感，但却不想同军部对抗到这种程度。

一方面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运动，同时，又利用工人阶级的威胁，迫使元老、枢密院以及军部等绝对主义的中枢部门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是对于现实具有罕见的敏感的原敬，觉察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米骚动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进行从天皇制的绝对主义向拿破仑主义的过渡。

这种情况，从原内阁的整个施政方针也可看出。内阁以“充实国防”、“奖励实业”、“振

兴教育”、“整顿交通机关”作为四大政策，这是要利用在大战当中积累起来的巨额财政准备金，来大力扩张陆海军（1920年度陆、海军省的经费较寺内内阁时期增长46%。下年度又成倍增加，占预算总额的49%），想协调地完成军备扩张和加强垄断资本。“充实国防”的物质和人力的基础工作，是其余的三大政策，整个四大政策都把垄断资本的要求放在首位，而使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属于它。

这样，通过1920年的危机及其善后处理，垄断资本对经济的控制权力愈益提高，寄生地主制和地主阶级则开始日渐衰退。这种衰退集中地表现为大地主的户数和租佃地从过去增加的趋势转为减少，耕地价格同样也是以1919年为顶点，1920年即大幅度下降，此后也继续下降。就是说，作为绝对主义成立和继续存在的条件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均势，这时，这种均势已经不能维持。地主阶级虽仍作为统治阶级而存在，但其地位不但相对来说，就是绝对的，也逐步降低，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增强了。

这种情况，从1921年的《米谷法》也可看出。

这个法令乃是政府企图利用特别资金来调节米价。一方面，防止因米价暴跌而使地主和上层农民受到损失，阻止小农、贫农的急进化；另一方面，企图防止米价增高而威胁低工资的基础。高佃租和低工资相互依赖、地主制和资本主义相辅相成而发展的阶段结束了，与此同时，开始了从以地主为本位，认为米价越高越好的政策转变为以“稳定”米价为名的低米价、低工资的政策。

但是，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来说，维持反动秩序堡垒的寄生地主制，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和地主阶级维持同盟的关系。这样，国家权力对工人阶级来说，就具有了它是拥护一切有产阶级利益的，即拥有拿破仑主义的特性。原内阁和以后直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为止的政权，不管它是官僚内阁，还是政党内阁，基本上都是从天皇制的绝对主义向拿破仑主义接近的形态。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立宪君主制外形的，则是1924至1932年的政党内阁。

原内阁的“实力政治”，以意外的形式，反转过来的在他自己身上实现了。1921年11月，原首相被一青年铁路工人暗杀。政治性的暗杀者出自

工人，这还是第一次。这虽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也说明工人已经要在日本政治舞台上起到重大的作用了。

三十五 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四大矛盾的展开

帝国主义的四大矛盾

在原内阁末期，大战中所获得的利润消费得精光，黄金储备也减少了。经济界苦于慢性萧条，虽然用通货膨胀和救济贷款，暂时摆脱了这种局面，但已不能再继续采取那种以大规模扩军为中心的积极政策了。内阁陷于困境，政友会内部发生了动摇。高桥是清继原敬之后，担任首相和政友会总裁，1921年11月底到1922年6月，虽试图改变政策，但因他没有象原敬那样的统率能力，七个月后，内阁垮台，政友会内部陷入了派阀纠纷。

下届的内阁又是由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和山

本权兵卫、山县派的官僚清浦奎吾主持的，这三届内阁都是没有政党作背景的军阀、官僚、贵族的所谓“超然内阁”，一直继续到1924年6月。这是因为政友、宪政、国民三大政党的对立十分尖锐，各党都各怀鬼胎，不肯把政权让给反对党，就毫不在乎地与军阀、官僚相勾结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矛盾也加深了。一般说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1)以其国内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的对立为中心的阶级对立和斗争；(2)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运动的对立；(3)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在俄国革命以后，除上述三大矛盾外，还增加了(4)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这四大矛盾，相互交错，相互作用，趋向于激烈。

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避免这四大矛盾。米骚动虽然是第一种矛盾的集中表现，但与其他各种矛盾也是联系着的。

三·一起义和五·四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朝鲜、台湾及半殖民

地中国的矛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开始爆发了。

1919年3月1日，朝鲜民族举行了争取独立的大起义。这是朝鲜总督府以“调查土地”为名，夺取朝鲜民族的土地和扶植日本人及朝鲜人的半封建地主的基本事业完毕半年以后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武器的朝鲜群众，在全国的六百一十八个地方，和日本军队进行了八百四十七次战斗。就是在总督府的报告中，也提到日军杀害了七千九百零九名朝鲜独立战士。主要的起义虽然在三个月内被镇压下去了，但游击战争在朝鲜国内仍继续进行，白头山山脉（长白山）以及南部、东部满洲各地，成为朝鲜民族的抗日据点，流亡上海以及西伯利亚从事独立运动的革命家也坚持活动。

此后，日本为了使文官也能担任总督，虽曾把朝鲜驻军和总督府分开了，并把宪兵警察改为普通警察，还进行了农业水利、改良耕地等事业，但这却丝毫也没有缓和了对朝鲜的统治和掠夺。警察的力量更加强化，统治朝鲜的军事费用增加一倍以上。土地改良等是为了解决日本国内在米

骚动中暴露出来的粮食危机，让朝鲜人增产大米，再将其运回日本。代替“高压政策”的“同化政策”，是以“内鲜^①一体”为名，破坏朝鲜的民族文化，禁止使用民族语言，强制推行日语，以抹杀朝鲜民族的存在。

在台湾人民中，也从1921年发起了成立台湾议会的运动。从1924年起，因受到中国本国民族运动的影响，台湾反日民族运动也有了进展。工人斗争、佃农斗争也都开始不断出现。

“二十一条”以来，不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的中国民族运动，从1919年5月，为反对凡尔赛条约蹂躏中国人民的要求，竟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交予日本的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民族革命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领导权由民族资产阶级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与日本共产党的情况不同，中国

① 内鲜：内指日本，鲜指朝鲜。——译者

共产党很快就在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间扎下了根。

华盛顿会议和两种正面战略

日本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与美英的对立，随着大战的结束，可以说是无法制止了。从1920年起，美国排斥日本移民达到狂热程度，流传着日美战争即将爆发。1924年7月，日本的移民实际上已遭到全面禁止。英国也于1921年5月通知日本，日英同盟既不延期，也不改订。

从1921年底到1922年2月，根据美国的倡议，美、英、法、意、比、荷、葡、中国及日本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了关于裁减海军和远东问题的会议。会议决定美、英、日三国主力舰的比例为5:5:3。在估计到日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情况下，只要日本不打算进攻美国本土，这个比例对日本并非不利。政府以此向国民煽动民族主义的骄傲情绪，认为日本现在已经成为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的

九国公约”却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很大的打击。这个公约否定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和垄断地位，还规定从前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归还中国。这样，就在门户开放的名义下，形成以美、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竞争。《石井·兰辛协定》和日英同盟也都正式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

帝国主义的第四个矛盾，即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形成前面已叙述过的日本干涉西伯利亚战争的惨败。日本的统治者总想在什么时候报此仇恨，日本陆军过去以帝俄为主要敌人，现在继续以苏维埃俄国为主要敌人，海军则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同时以世界上的两大强国为主要敌人的战略，就使日本经济面临了难以应付的过大负担。这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出现大的破绽。

民本主义的苦闷

上述这些矛盾的加深和发展，把民本主义者引向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或更加激进，转变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或者相反，跪倒在垄断资本

和天皇制的脚下。白桦派的理想主义也出现了分化。有岛武郎想站到劳动大众的立场而未能实现，结果自杀了。武者小路实笃梦想以超脱阶级对立的劳动和艺术的“完全调和的世界”为目标，来建设“新村”，这就必然以完全失败而告终（1919—1920年）。夏目漱石门下的秀才们，抛弃了他们老师提出的创造真正的近代国民文化的课题，而安于个人的“教养主义”、“人格主义”。只有少数人转到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那是学者当中的河上肇、评论家的大山郁夫、文学家的秋田雨雀等人。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学。

在舆论界，整个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都站在民主舆论前列的《大阪朝日新闻》，因1918年8月刊登关于《白虹贯日》的消息遭到镇压后，丧失了斗志，在同年12月1日的报上声明转变方向说：“反省我社近年之言论颇不稳健，失于片面，今后当树忠厚之风。”

由于原内阁连续两次否定了在野党提出的普选法案，一时衰退了的普选运动，虽然从1922年起，以中产阶级及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力，再度重

整阵势，但过去解释普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阶级制度，而当1922年2月，在野党在议会说明共同提案时，却以“为了扑灭阶级斗争”作为普选的理由。宪政会的干部担心由于民众运动而实现普选，会发展为革命运动，乃指示党员不予介入，可见他们是害怕群众的。

在这期间的1922年1月，国民党解散，其中进步派结成以犬养毅为首的“革新俱乐部”，虽宣布“广泛地与天下群众携手打破现状”，提出了民主的纲领，但犬养毅却完全没有与民众相结合的打算，作为骨干的星岛二郎、清濑一郎等民本主义的言论，虽然可以说是新鲜的，但他们也不想和民众的主力工人阶级相结合。1923年9月2日，在关东大震灾^①的余震中，过去曾因西门子事件而被赶出政界的海军巨头山本权兵卫再度组阁，犬养毅就立即以在内阁中促进普选为名，为协助其旧友山本，竟公然担任邮电相兼文部相而进入了内阁。

^① 关东大震灾：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于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冈、山梨二县局部地区的大地震，计烧毁住房57万余户，受灾430余万人，死亡9万余人。——译者

关东大震灾时残杀朝鲜人

从大震灾发生的9月1日傍晚开始，就流传各种流言蜚语，说朝鲜人要乘地震灾害，掀起暴动，什么往水井中放毒，想谋害日本人等等。山本内阁成立之后，立即发出戒严令。政府和戒严司令部虽然也都十分清楚朝鲜人暴动的流言毫无事实根据，但却积极地有计划地把这些谣言传布出去，警察、军队和在其指挥下的民间自卫团一见到朝鲜人立即加以非法逮捕，任意残杀。到9月5日，政府以迫害朝鲜人“若被外国报道出去，这是我们很不喜欢的事”，只因害怕外国的责难，才不得不发出了希望民众要慎重的布告，但就在这个报告中，也没有明确否定朝鲜人暴动的谣言，而有些地方还说成是确有其事似的。

这一天，陆军、海军、内务省、警视厅，戒严司令部的代表还进行协商，认为日本人对朝鲜人“并没有故意加以大规模迫害的事实”，对于朝鲜人暴行的“传闻要进行彻底调查，并尽量把这种传闻作为事实加以肯定”，“在对外宣传中，要特

别尽力宣传有赤化的日本人和赤化的朝鲜人在背后煽动暴行的事实”，把这些纯粹的谎言“作为事实真相而积极宣传，到将来就把这些作为事实的真相。并使一般的有关机关也持此态度，对报纸等报道，也让它按照这种说法，说调查的结果，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就这样决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欺骗宣传。

民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虽然也对大震灾时警察和军队残杀日本革命家河合义虎等以及宪兵队不仅残杀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甚至残杀了碰巧和他们在一起的少年，都大声疾呼地进行了谴责，但是对于警察、军队和在其指挥下的町街自卫团在关东一带残杀三千以上朝鲜人的事实，除吉野作造等人外，其他人的抗议却是极其软弱无力的。在众议院，虽然田渊丰吉、永井柳太郎主张政府要公布事情真相和吊唁被害朝鲜人，并向其家属表示谢罪，但这也就算尽到全力，而没有对政府进行坚决弹劾的态度。在这里，表现了民本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致命弱点。这在今天仍需警告日本人民注意，帝国主义的民族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护宪三派内阁和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方面并不积极于和劳动大众相结合，又由于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理解民主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没有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象一般所说的三菱的宪政会和三井的政友会那样，由两党首脑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的政党，为挤进天皇制权力机构就利用了民本主义的力量。为反对1924年的清浦内阁（只由官僚和贵族院议员中选任大臣，直接向众议院挑战），由宪政、政友、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护宪三派）发动了以“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整顿行政财政”为实质性口号的第二次护宪运动。由于这次运动是针对因清浦内阁这样露骨的特权阶级的内阁刺激了民众而使急进的民主主义运动高涨起来的形势，所以宪政、政友两党的干部为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就秘密商定要实现“不迎合民众和报纸的真正的政治”。他们最初对革新俱乐部也采取了排斥的方针，但既要打倒官僚、贵族内阁，就不得不利用

民众以及报纸的力量，因此让革新俱乐部参加进来，在策略上是有利的，所以后来就让它们参加进来了。对革新俱乐部方面来说，参加这个运动并不是真正为了推进“革新”，而是为了要在胜利以后挤进政权。

三派在1924年6月打倒了清浦内阁，众议院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织了三派的联合内阁。这个内阁在军部大臣也还是没有从军部以外选任这一点上，和过去相同，虽然不是完全的政党内阁，但政党从正面反对政府，也没有得到元老等的帮助，只是靠政党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这还是第一次。从这时到1932年（昭和七年）5月，继续保持了由众议院占多数的政党执政的惯例（但即使在此期间，也有的内阁因议会外的军部以及枢密院的反对而垮台的，因议会的不信任而内阁垮台的，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只有一个清浦内阁）。

三派联合内阁和执政党按照当时的诺言，制订了《普选法》。与此同时，制订并实行了《治安维持法》，用以取缔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不仅如此，这个法令还成为镇压以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为首的一切社会运动的武器。《治安维持法》的制订，不是由内阁提出，而是因枢密院警觉到一旦制订《普选法》，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势必增强。为要防止这一点，以及此时日本已不得不和苏维埃俄国恢复邦交，害怕这样一来，日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会因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得到加强。所以枢密院要求政府制订这项法令，这就是制订这项法令的由来。但是，在议会中反对这项法案的，在众议院只有革新俱乐部的几个人，加上其他几个人，共计才十八人，而贵族院只有一人。

改革贵族院的问题

三派联合内阁许下的另一个诺言是改革贵族院，但却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实。贵族院从受原内阁操纵之时起，抵抗众议院的能力就逐渐减弱了。原来贵族院议员的政治力量在于他们与皇室的力量形成一体，并以皇室为媒介，与以山县有朋为总头目的官僚政客相结合。可是，象山县有朋承认原内阁那样，到了即使皇室的势力也不得

不承认非华族出身的人当首相的政党内阁的时代，只靠与政党势力结合才能伸张势力的贵族院议员的力量本身也就削弱了。而且伊藤博文以及山县有朋等人，虽然从皇室得到政治活动资金，而政党却从垄断资本那里得到更多的活动资金，从而能够操纵占居贵族院核心的，经过伯、子、男爵互相选出来的议员。

1921年，山县有朋在皇太子选妃^①问题上遭到挫折，完全失去了在皇室中的势力，下一年在失意中死去。由此，贵族院议员所依靠的皇室的政治势力，决定性地削弱了。

山县有朋直系的旧官僚首领、伯爵清浦奎吾，不理解当时的这个发展趋势，竟率领以伯、子、男爵互选的议员为主力，再加上官僚出身的勅选议员等的贵族院最大的派别“研究会”，与政党相对抗，并乘各政党互相对立的机会，于1924年1月组织了前已叙述的贵族、官僚的清浦

^① 1921年，久迩宫良子王女被举为皇太子裕仁亲王的王妃候选人。王女之母出身于旧萨摩藩主岛津家，当时的内大臣是萨摩藩阀的元老松方正义。因此，长州藩阀害怕被萨摩藩阀夺走宫廷的势力，遂以王女有色盲血统而加以反对，山县虽带头进行反对活动，但未成功。

内阁。在众议院中，成为执政党的只有作为政友会多数派的床次竹二郎派从政友会分裂出来所组织的政友本党。前已谈到，“护宪三派”的运动兴起，反对这届内阁，清浦内阁遂被打倒。研究会从此也完全陷于无力，贵族院已经不能对抗众议院内阁。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护宪三派的联合内阁还想去改革对它们来说已经软弱无力的贵族院，就如在平地掀起风波一样，会激起群众对于贵族制度的反对而动摇天皇制的秩序，所以也就停留在敷衍塞责的程度了。

裁减陆军和军部的企图

护宪三派联合内阁和继其后的宪政会的一党内阁，虽然对其整顿行政、财政的谎言几乎没有实行，但在当时陆军兵力，包括近卫师团在内的二十五个师团（台湾军、关东军除外）中，却经陆相宇垣一成之手裁减了四个师团。这是继华盛顿会议后，加藤友三郎内阁削减师团定员、减少六万三千余兵力之后的果断的裁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和平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则是迫

于日本国民的强烈要求而不得已实行的，是为了“先控制舆论再谋求国防力的改善”（宇垣陆相语）。陆军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捞些油水，代替人员、马匹的减少，却促进了装备的改善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这样，和重工业的结合加深了。

这次裁军，第一是因接受了第一次大战后在世界军事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战思想，靠减少平时常备军的人数，而把这部分费用挪用于军事工业和扶植其基础的经济力量。这样就由军部和垄断资本的结合而加强了军备近代化。第二，虽然一方面减少了常备军，但在宇垣裁军时，却向中等以上学校派遣了现役军官，使学生的军事训练义务化，并在市、町、村设置青年训练所，受过训练的青年征为现役军人，其服役期限由二年缩减为一年半，所以对于学生以外的一切青年也都进行军事训练。就是说，现役常备军固然减少了，但在需要时，一经动员立即可以发挥作用的后备兵力却可以立即扩大为全体青年了。

学校的军训和对青年的训练使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的同时，它也是增强陆军政治力量基础的方

法。宇垣陆相在其日记中写了这样的话，陆军掌握了“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多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学大学学生和八十多万青少年”，“平时姑且不论，一旦有事，陆军就一定能作为辅佐天皇的中枢而起作用”，只要政党内阁继续存在，就必须只由陆军来担当“真正举国一致”的“可予指挥的工作”，因此，就要进行学校的军训和对青年的训练工作（1925年12月30日）。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还写道，天皇统帅军队的大权，“在国家处于非常情况下，就不单单只是指挥军队，而也有统治国民的权力，即所谓非常大权。想要按照社会现状来行使这种大权时，象过去那样拘泥于纯粹的军队的范围之内，就不能担国家前途之忧而负此重任了。”当“护宪”的“政党内阁”成立，民本主义看来似乎已实现了它的希望的时候，军部却正在为这种可怕的政党内阁专制独裁来准备控制国民的体制。在华盛顿会议以来的裁军期间，看起来似乎是使军人感到脸上无光，军部的政治力量也大大衰退，但这却只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当军队在建立控制国民的体制时，政党及其内阁也都予以合作。宇垣

所不安的“社会现状”，即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国际矛盾的深化，就不可避免地以准备“总体战”为名，而加强控制国民的体制了。

无产政党的结成和战线的分裂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在工会中，以总同盟为最大，但展开尖锐斗争的是地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评议会。日本农民会和全国水平社都是由左派的共产党系统掌握领导权。对此不满的日本农会的右派，在1926年3月第五次大会上制造分裂，接着成立了“全日本农会同盟”。学生运动方面，1922年以来，东京、京都等地的大学、高中、专门学校学生的“社会科学”（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其领导下，于1925年，以小樽高等商业学校为首，在全国各地学校中，展开了反对军事训练的斗争。这种斗争和左翼的工会、农会相结合，汇合成为反对军国主义的大斗争。政府为把“学校的赤化”铲除于萌芽之中，就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对“学联”的干部进行了全国性的逮

捕。其中有三十八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

妇女参政权运动也如前所述，于1924年12月组成了妇女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后来的妇选获得同盟），实现了市民妇女运动的统一。但是，这一运动和社会主义立场的妇女运动发生了对立。对立的责任，主要在于后者。当时的左翼领导人甚至连工会中的妇女提出反对男女工资不平等以及保护母亲的各种要求，也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有损于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而加以反对。这大概反映了不理解真正的工人生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理论家在工会以及政党的领导机构中是很多的吧。

群众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普选法》的制订，给予工农大众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条件，这样，从1925年底出现了工人、农民的合法政党。1925年6月，虽然在多数工农团体参加之下，成立了无产政党组织筹备会，努力建立一个单一的无产政党，但由于工会评议会和总同盟的对立所代表的左右两派领导权之争十分激烈，结果成立了把工会评议会和总同盟都排除在外

的“农民劳动党”^①。政府视此为共产党的别动队，在成立两小时后即被禁止（1925年12月1日）。

此后，左右的斗争继续进行。1926年底，左翼的劳动农民党、中间的日本劳农党、右翼的社会民众党互相对立。另外，在地方也出现了几个无产政党。而三个政党的对立也被带进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等所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群众团体之中，这就必然发生组织分裂。政党要把群众团体当作自己的附属品，这是其根本原因。战线的分裂当然要显著地削弱工农阶级的力量，但尽管如此，若把1926年以后和以前相比，工人、农民的阶级觉悟，无论从组织者来看，或从运动的多种形式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来看，都已经进入了不同的阶段。

中国革命和币原外交

开始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感到苦恼的日本

^① 农民劳动党：书记长为浅沼稻次郎。不同于下一节的劳动农民党。劳动农民党成立于1926年3月，解散于1928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长第一任是杉山元治郎，第二任是大山郁夫。

——译者

帝国主义，同时在中国市场上也面临着新的困难。日本经济经过1920年的危机，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接连受到巨大的打击，加上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市场中国那里，民族资本的轻工业发展起来了，而且在大战中从中国市场暂时退却的美英的势力又回来了。日本的对华输出，从1920年五亿二千四百万日元激减为1921年的三亿六千五百万日元，一直到1924年，都是继续停滞不前。1925年虽有暂时的恢复，但其后又停滞下来。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以1919年的36.34%为最高，到1923年下降为22.25%，1925年回升到31.06%，但从下一年起又继续下降，1930年为24.63%。

在1920年的经济危机后，又因政府采取通货膨胀和救济贷款以及国家财政积极投资于新建铁路、大规模建设工程、电报、电话、炼铁、军事工业的扩张等等，所以内债、外债就从1919年度末的三十二亿日元增至1926年年度末的五十一亿日元。这样使企业仍然继续膨胀，生产力继续提高，但市场却不能扩大。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从1925年下半期开始下降。在农村，1920年以来的

慢性农业危机一直在继续着。

然而这时在中国，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于1924年1月结成统一战线，1925年2月至5月，在青岛和上海的日本资本纱厂中发生了枪杀中国罢工工人的事件。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对此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英国指挥的租界巡捕向示威队伍开枪，打死十人，伤几十人。以这次五·卅事件为导火线，中国的反帝斗争进入了新高涨的时期。而且中国北方的各派军阀仍在互相抗争，作为日本走狗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势力也极不稳定。

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即对中国使用武力扩张，还是只停留在经济侵略上。加藤、若槻两届内阁及其外相币原喜重郎选择了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而谋求在经济上进行侵略的道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不得不接受《九国公约》之后，不久，又是资本主义世界从大战后的革命形势下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和平的气氛笼罩着世界的时候，在五·卅运动后中国民族的反帝斗争的矛头正集中指向英国的时候，币原外交的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例如，从1925年底

各国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会议上，英、美拒绝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日本却在原则上加以接受，而换来了另订对日本有利的特别税率。而日本护宪三派联合内阁不顾枢密院等的反对，实现了久悬未决的日苏邦交的恢复。

但是币原外交也有高压的一面。1925年秋，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张作霖在华中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战争中失败，又由于在北京遭到冯玉祥军的攻击，张的部下郭松龄又举行叛变，在张作霖陷入危机的时候，日本陆军就立即主张出兵援助。起初对出兵踌躇不前的币原外相也很容易地被陆军拉过去，而表示赞成。日本于年底出兵打败了郭军。在1926年3月，日本又派舰队到达大沽，攻打冯玉祥的军队。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权，举兵打倒北方军阀（北伐），很快地在10月占领了武汉。币原外相和若槻内阁策划在英美之前，抢先拉拢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使他背叛革命。但这次对革命的干涉却不如英国。这就招致了伸张到南京、上海方面的三井系统的资本家以及政友会的极大不满，对“软弱外交”的

攻击又激烈起来。

金融危机和田中内阁

恰在此时，过去总算敷衍过去了的日本经济矛盾，又爆发了。1927年2月，地方的小银行破产了；3月，东京的渡边银行也倒闭了；4月，在大战中成为仅次于三井物产公司的大企业铃木商店破产了，无担保地把巨款借给铃木商店的台湾银行濒于危机。若槻内阁虽向枢密院提出救济台湾银行的紧急敕令案，枢密院却以此项提案违反宪法而加以否决。其真正用意乃是使推行“软弱外交”的若槻内阁垮台，建立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总裁的政友会内阁，以便积极干涉中国革命。若槻内阁总辞职，次日，台湾银行就停止营业，以东京的十五银行为首，大小银行、公司相继倒闭，成为空前的大金融危机。

按照预想，政友会总裁田中大将组织了新内阁，首相兼任外相，推举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出身于在中国经营企业的三井系统的资本家，早就属于和军部勾结起来的积极侵略中国

的一派。田中内阁的金融危机对策是首先实行为期三周的延期付款（停止付款），提供近二十二亿日元救济贷款，这样金融危机告一段落后，就改革银行法，清理资金在一百万日元以下的银行。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安田、三井、三菱、住友、第一等五大财阀银行的统治地位（参见下表），铃木系统和其他企业也都纳入五大财阀统制之下。煤炭、钢铁、铜、石油、电力、硫铵肥

五大银行在全国银行存款、放款中所占比例表

年度	1923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存款百分比	19.5	24.2	23.7	30.6	32.8	33.9	35.7	38.2	40.4
放款百分比	17.2	21.3	21.6	25.6	26.2	28.2	31.1	32.6	35.8

料、人造丝、制糖、纺织等生产部门，四大财阀系统的二至六家公司竟占有总产量的50%至95%。

干涉中国革命、炸死张作霖

1927年6月，到解决经济危机有了把握的时候，政府在东京召集军部、外务和满铁的首脑人物，举行了历时十天的，确定基本对华政策的

“东方会议”。在会议上，商讨了对中国尽量不用武力的“内科的方法”和武力侵略的“外科的方法”。在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中，以“满蒙并非中国本土”，而将中国东北地方从中国政府分割开来，并将它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作为根本目标。因此，就要支持中国军阀的对立，阻碍中国的统一。还有，如果当日本的“权益”和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恐怕要”遭受威胁时，就“坚决采取自卫措施”，而且当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恐怕要”遭受侵犯时，就要“当机立断地进行适当处理”。

在这里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即对于中国革命进行干涉时，哪怕日本使用武力，也要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日本完全的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由中央的军部，当然更不是由驻外地的青年军官的强烈要求，而是由负责的各机关的代表，经过慎重地审议、决定而公开发表的。财界和其他统治阶级都没有对此提出什么原则性的反对意见。

在这次会会议以前的5月，田中内阁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山东

省（第一次出兵山东）。在这不久以前，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倾全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一时停止了北伐，所以日本政府于8月从山东撤了兵。1928年4月，恢复北伐，日本政府立即向山东济南第二次出兵。5月，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占领了该城，还增派了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第三次出兵山东）。出兵山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就把反帝斗争的矛头从英国转向日本。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败退之日，中国反帝斗争的对象就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而出兵山东，特别是占领济南，使日本与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激化了。美国对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在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和美、英，特别是和美国的对立暂时保持了稳定局面，但这时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日本的野心有所戒备，就未必听信日本的话了。于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于1928年6月，在奉天（沈阳）附近炸毁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炸死了张作霖。当时河本大作等人虽想一举占领整个满洲，但关东军的头目制止了这一行动。军部虽宣传这次事件

是中国北伐军所为，但除日本国民之外，全世界马上都知道了真相。日本政界的上层，虽然不久也探明了事件的真相，但他们却不是让国民也弄清真实情况，和国民一起整饬军队，而只是要把“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倒阁的工具来使用而已。军部虽使河本退役，但他不久就成了南满铁路公司的理事。如果是为了把满洲变成殖民地，无论干了什么事也可不受惩办，这种先例就是这样制造出来了。军部无视政府，在满洲发动侵略活动是日俄战争以来的事情。在满洲的军队以及参谋本部的军官们策划“满蒙独立”，从1911年以来虽也有过两次，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这种一贯的侵略思想就又开始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了。

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真正反对政府和军部干涉中国革命和侵略的，是1927年初重新组织的日本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日本农会、全国水平社。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

时，劳动农民党支持武汉政府；日本劳农党不支持任何一方；社会民众党却支持南京政府，实际上也支持了日本出兵山东。

田中内阁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因此，1927年、1928年与1926年相比，工人争议中的罢工、怠工件数，参加人数和工会会员人数也都有相当地减少。相反，罢工日数却延长了。佃农争议虽也因根据《租佃关系调整法》进行强制“调停”，使争议件数减少，但我们也可看到，佃农提出的要求，不仅是降低佃租率，而且还提出很多确保耕作权的要求，在质的方面有了提高。共产党的影响达到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而且知识分子大批左倾了。这虽然也包含有“流行性”的轻浮，但在1927年到1933年前后，以日本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读物，却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1928年2月，在众议院议员大选中，开始实行男子普通选举制。政友会虽有二百一十九人当选，成了第一大党，但也没有达到半数的二百三十四人；民政党（由宪政会演变来的）有二百一十七人当选，与政友会仅相差二人；无产政党计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统计表（1927—1937年）

	工 人 运 动			农 民 运 动				
	罢工 总件数	参加人数	工会数	会员数	租佃争 议件数	参加人数	佃农会数	会员数
1927年	383	46,672	505	309,493	2,053	91,336	4,582	365,332
28	393	43,337	501	308,900	1,866	75,136	4,353	330,406
29	571	77,281	630	330,985	2,434	81,998	4,156	315,771
30	901	79,824	712	354,312	2,478	58,565	4,208	301,436
31	984	63,305	818	368,975	3,419	81,135	4,414	306,301
32	870	53,338	932	377,625	3,414	61,499	4,650	296,839
33	598	46,787	942	384,613	4,000	48,073	4,810	302,736
34	623	49,478	965	387,964	5,828	121,031	4,390	276,146
35	584	37,650	998	408,662	6,824	113,164	4,011	242,422
36	546	30,857	973	420,589	6,804	77,187	3,915	229,209
37	628	123,730	837	359,290	6,170	63,246	3,879	226,919

有八人当选，总计获得四十七万一千票，其中最左派的劳动农民党有二人当选，获得十八万七千票。在劳动农民党竞选运动中，共产党员公开进行活动，虽然演讲会几乎在开会同时即被解散，讲演者受到了拘留、逮捕的镇压，但表现出来的这个成绩，也足以使统治阶级发抖。政府于3月15日，在一道、三府、二十七县逮捕了一千几百名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接着，又解散了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等左翼三团体。政府还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增强了全国各道、府、县等警察部门的特高警察，以紧急敕令把《治安维持法》修改为也能判处死刑。这不仅是对共产党的镇压，也是对整个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压迫。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教授看到这种情况后叹息说：“政治上的黑暗时代到来了”。

滨口内阁和经济危机

对于田中内阁干涉中国革命失败和对黑暗政治的谴责激烈起来，就连天皇也对田中首相未能

如实地报告炸死张作霖的情况而不满，田中内阁陷于困境，遂于1929年7月总辞职。代替它的是滨口雄幸的民政党内阁。外相是币原喜重郎，财相是日本银行总裁井上準之助。依靠整顿中小企业、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来降低物价、增加出口能力。以此为前提，坚决撤销成为悬案的黄金出口禁令，稳住汇兑行市，开辟引进外资的道路，以求垄断资本的稳定。为达到上述目的，压缩财政、产业合理化、撤销黄金出口的禁令，就成为滨口内阁的三大政策。撤销黄金出口禁令虽然是金融资本早已盼望的，但却受到因害怕黄金自由出口必然带来通货紧缩的产业资本和地主的反对，在这以前未能实行，滨口内阁却于1930年1月坚决地实行了。

预想到的严重萧条、解雇、降低工资发生了。而且，1929年秋在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陷入最大的危机中。工业生产从危机前的顶点到危机时的最低点，降低了30—70%，贸易方面出口急剧下降37%，进口急剧下降40%，物价的综合指数从174.5%降至120.4%。特别是蚕丝和米价急剧下

降了。失业者达几十万人，若包括回农村者，估计有三百万人以上失业。1930年秋，稻谷丰收，米价却因此降至过去的一半以下，使农民遭到空前的丰收饥馑。到次年，即1931年，由于北海道、东北地方的霜冻大歉收，农民的遭遇惨不可言。全家自杀、出卖女儿、学童缺食，到处可见。

极端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国内的工农运动激化，也促使朝鲜、台湾的民族运动激化了。1929年11月，以朝鲜光州学生抗议日本人侮辱朝鲜人的运动为开端的学生和工人的起义，1930年5月以后在朝鲜、满洲边境一带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1930年10月台湾雾社当地居民的暴动等，即其显著的例子。

金融垄断资本通过经济危机而愈加发展。制订了《重要产业统治法》、《输出组合（出口协会——译者）法》，开始出现了国家与垄断资本互相联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同时也是为了准备总体战而加强产业基础的政策。田中内阁时期，在内阁设立了为总体战而统制、运用资源的资源局，它却在滨口内阁时才开始活动，进行了

产业动员和空袭时军用物资的生产、运输的演习。由于压缩财政，陆、海军省的经费虽也略有减少，但在财政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增大了。生产坦克、军舰、飞机的重工业也发展起来了。1931年春，首次造成了日本国产的重型轰炸机，由日本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也于同年夏天开始编成了。

军部的反击

滨口内阁就是这样，虽然并非忽视军备，但却把垄断资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军部对此深为不满。特别是币原外交的对华政策，不仅改变了前任内阁露骨的武力干涉的政策，而且在1930年于伦敦召开的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上，政府与英美妥协，把大型巡洋舰吨数保持为美国的七成的主张改为六成，遭到了以海军军令部为首的军部的激烈反对。他们攻击政府决定兵力是侵犯天皇的统帅权，枢密院多数也持同样见解。但是，政府得到一般国民和财界的有力支持，断然向军部和枢密院展开了反击，使这个裁

军条约得以成立。完全以政府的意见而决定兵力，只有在这个时期，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都没有过，这显示出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内阁似乎也能够压制住天皇制的大本营——军部。海军、陆军从此都仇恨政党。1930年11月，滨口首相遭到受军部煽动的右翼青年的狙击，受了重伤，终于死亡。这一事件，是军部对政党与政党内阁进行总反攻的序幕，是新的对华侵略的前兆。

三十六 侵略中国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一）

制造出来的“满蒙危机”

1929年到1930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作为“经济国难”，阶级斗争的激化则作为“思想国难”，使得政府、军部、政党、财界都怀有深刻的危机感。更加朝鲜、中国民族斗争的发展，就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前途一片黑暗。特别是满洲的局势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更加不利了。

日本对外投资，大部分集中于满洲，在满洲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本资本。除了苏联（原文如此——译者）在北满的铁路及其附带投资外，满洲几乎是日本资本的独占市场。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摇钱树。在满洲，继日军杀害的满洲统治者张作霖之后，是其子张学良，他深恨日

本帝国主义，从1928年底以来，与国民党政权合作，悬挂该政权的“青天白日旗”，引进和日本对立的英美资本，着手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和港口，明显地推行了抗日的政策。

被国民党政权视为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建立了强有力的根据地，进行着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组织起工农红军，击退蒋介石军队的围剿，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增强了它对中国人民的影响。

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因经济危机而极端苦恼。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超过计划的结果，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加深了它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这就加强了与苏联接壤的朝鲜、满洲的抗日民族运动，也加强了日本国内的革命运动，从而更加深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危机感。

面对这种形势，滨口内阁及其幕后的财界主要人物，主张首先把重建国内经济放在第一位，在国际上，则是尽量与英美协调，接受其金融合作。对于中国也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干涉，用政治手段

解决纷争，以保卫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和势力。但陆海军军部却对此坚决反对。军部的反对伦敦条约，不仅是想把军部统帅权的独立，向他们有利的方向作出最大限度的扩大解释，而且是军部集中反对政府上述基本方针的表现。特别是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少壮派认为，如不重视满洲的形势，把它尽快地变成日本的完全的殖民地，并进一步以此为据点，去进攻他们视为赤化策源地的苏联，就不能解救日本的危机。

这些少壮派认为，为了这样干，首先必须改革国内的体制，暗中组织了叫做“樱会”的团体，与民间的大川周明等联合，於1931年3月，打算推举宇垣陆相为首，举行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因宇垣中途变卦，政变以未遂告终。但是他们并未受到任何惩处，事件被隐瞒下来。这些军官们又大胆起来，策谋挑起战争，企图首先发动战争，然后借此也在国内制造非常事态，以便进行政变。

1931年7月，陆军省发表了包括增兵朝鲜的军制改革计划，接着就改变关东军的配备，作好了临战体制。此时，军部和政府利用南满万宝山

朝鲜农民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的事件（7月）和所谓军事间谍中村大尉为张学良军队所杀的事件（8月17日陆军省发表），积极宣传“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危机”，煽起了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在8月4日师团长、军司令会议上，南次郎陆相还暗示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那些少壮军人，就连军事的首脑部门也这样进行了战争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和政府、政党

政府和政党都完全没有认真努力制止军队的这一行动。三月事件对国民来说，固然是极密的，但政府说不知道是没有道理的。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虽提请南陆相注意：陆相的训示如对外公开发表恐不妥当等等，但对其内容并未反对。自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币原外相也於1930年12月，就中国方面计划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一事，训令驻外机构，说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此事等等。

此外，若槻首相对其在8月民政党大会上的讲

演稿，要求内阁会议的谅解，其中也谈到“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如有不当不法之处，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也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能对此准备有所松懈。”鼓励积极准备战争。8月31日，在政友会的干部会上，森恪等人的满蒙调查团报告说，在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夕的状态”，“确信为了把日华关系恢复到合理的位置上，必须有待于国力的发动。”而干部会也承认了这种看法。

总之，包括币原外相在内，无论是政府还是执政党的民政党，也都和军部及政友会一样，决心要在最近发动侵略满洲的战争，并进行了准备，还向这方面转移国民的注意力。

1931年9月18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部分军官们在奉天（即沈阳）郊外的柳条沟，自己炸毁了满铁的路轨，却把这事捏造为中国军队的进攻，发动了旨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即所谓“满洲事变”。这个计划，就连关东军司令官在事前也不知道。但是，当三年前，关东军的参谋们炸死张作霖，打算以此为开端，发动占领全满洲的战争时，关东军司令官曾坚决加

以制止,而这次,司令官却立即承认了其部下所搞的不法战争,并使之合法化了。同日,朝鲜军司令官根据关东军的要求,进行了运送弹药、派出军队的准备,21日,擅自派出了对外宣称四千名的士兵越过国境,进攻满洲。对于朝鲜军司令官这种明显蹂躏统帅权的擅自出兵,若槻内阁竟也承认了它的军费开支。政府一方面这样干,另一方面又屡次声明不扩大事态,但战火却立即蔓延到整个满洲。1932年1月,陆海军合谋在上海也挑起战争,把利权集中於这个地区的英、美、法等国的注意力暂时从满洲转移开,从而于3月1日搞出了一个傀儡“满洲国”。

政府虽然事前并不完全知道这种战争计划,而且没有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法发动战争的意图,但如前所述,政府本身也为战争做了准备,也并未想去制止三月事件以来军部明显的战争准备,就是到了战争开始以后,在原则上也未加反对。

币原外相等人认为即使从正面反对军部也不会收效,就暂且同意军部的主张,却说什么要对此加以制止;既然承认军队无视政府而发动战争

这种大原则，那么又怎么能够制止军队的“冒进”呢？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当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强烈抗议日本违反《九国公约》、《非战公约》（1927年）时，进行困难的辩解以支持军部而已。

美国虽以激烈的词句向日本提出了抗议，但它因竭力应付经济危机，所以未能对日本进行任何有效的牵制。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中，一方面虽不承认日本的行动是出于自卫，但却强调满洲有“赤化”的威胁，建议列强共管满洲。国联大会以四十二比一（日本）通过了根据这个报告提出的决议案，日本于1933年3月退出国联。退出国联和在这以前承认满洲国，这都是民政、政友两党抢在政府之前所极力主张的。

国民的动向

战争刚开始，国民并不一定是狂热于战争的。例如，据说开战后不久，在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原来驻扎的仙台市，当叫做满洲青年联盟的军国主义团体召开煽动战争狂热的演说会时，听众

就曾对讲演者大喝倒采，并将其轰下台去。此外，东京帝国大学殖民政策学教授矢内原忠雄，象他的老师内村鉴三反对日俄战争一样，以精湛的学术著作婉转地批判了满洲事变，这部书拥有许多读者。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这样的批判者，但因在此时期作为传播大量消息的手段而正式发展起来的无线电广播处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报纸、杂志也因政府严格检查，就无法把批判战争的言论和文章公诸於众。

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人们，对于战争，从正面进行了反对。从1931年到1932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协会员登记人数，在1931年底就有一万人，至少还有五倍的人们是在它的影响之下。共产主义者们勇敢地反对战争，曾经罕见地成功地把反对的传单带进兵营里和军舰上。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把这个战争看作主要是准备侵略苏联，就不分时间、场合老是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打倒资本家地主天皇制的内战”以及“保卫工农的祖国苏联”这样一些口号，甚至使一般国民存在着恐

怖感；对于反战和和平言论，凡是未提到拥护苏联和打倒天皇制，就责难它是在本质上为帝国主义辩护。这样，要把要求反战和平的国民组织发展起来，就是做梦也是办不到的。

劳农大众党（以原日本劳农党为主的中间派的合法无产政党）虽在最初反对过战争，但不久就改变了。社会民众党和总同盟最初就是支持战争的。

不久，到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时候，国民的绝大多数就成了战争的热烈支持者。在那时，出征的部队也从全国派出，在出征士兵的背后，有许多祝愿他们无事归来的亲戚朋友，而这些人祝愿无事归来的心情是和愿意相信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正义行动的情绪相联系着的。另外，由于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孤立，虽使国民对日本的前途抱有不安，但政府却把这种不安加以巧妙的诱导，建立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对付“1935、1936年的危机”的所谓“准战时体制”。随着战争的开始，将过去的通货压缩政策转变为通货膨胀政策，以军需工业为首，生产又趋活跃。到1932年初，只有日本一国

首先摆脱了经济危机，到1933年甚至接近繁荣，这就成为使群众支持战争的因素。

在此期间，反战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遭到彻底的镇压，看起来共产党在1932年秋天虽以新的纲领重新走向发展，但大批干部立即遭到逮捕。1933年6月，原来党的最高干部被捕入狱的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表了与共产国际断绝关系、拥护天皇制、向民族主义“转向”的声明。从此之后，叛变者不断出现，未被逮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争相转变方向。到1935年春天，共产主义者的全国性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中一度占有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也消失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遭受镇压，发生了1933年春天京都帝国大学泷川幸辰教授遭到不当的开除公职、1935年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取缔等事件，以“国体明征”为名，强制要求绝对信仰天皇。

从五·一五到二·二六

侵略满洲一个月后的1931年10月，三月事变

的主谋者又在策划政变，但因内部的分裂以及军部首脑的踌躇不定，遂以没有爆发而告终。但若槻内阁却因此事件而动摇，终于在12月总辞职，成立了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当天，新内阁再度禁止黄金出口，采取了积极推进战争的姿态。但右翼对这个内阁也不满意，前财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分别于1932年2月与3月被叫做“血盟团”的，与青年军官合谋的民间右派团体所杀害。5月15日，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学员的一伙人，在光天化日下于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首相。“政党内阁”从此告终，以后内阁总理只限于军人和官僚、贵族等人担任，即使有政党出身的大臣参加内阁，也只是为了装璜“举国一致”的门面而已。

在此以后，军人们不断策划政变。从十月事件以来，在军人中间也发生“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激烈对立。皇道派主要是和新兴的军火工业财阀相勾结，无论名义上或实际上，都打算建立军部的独裁政权。所谓统制派是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为领导的一派，为了进行“总体战”，还打算和三井、三菱等旧有财阀有所合

作。皇道派攻击这是充当财阀的走狗。1935年8月，皇道派的军官在军务局长办公室里砍死了永田铁山。公审期间，即1936年2月26日，东京师团的皇道派军官们率领部队发动了政变。他们杀害了财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和教育总监渡边錠太郎，刺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还策划杀害首相冈田启介，但错杀了别人。也袭击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但二人幸免于难。

叛变的军官们和血盟团事件以后的一切恐怖主义者一样，虽然对农民的惨状感到痛心，憎恨财阀，但并不想改革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他们的理论头目北一辉就是从三井财阀池田成彬那里领取生活费的。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要把私人财产限制在一个家族一百万日元以内，私营企业的资本限制在一千万日元以内，超额的财产作为国有国营。因为当时的“百万富翁”是屈指可数的，一千万日元的企业也是第一流的大企业，所以这种对私有财产的限制，并不是消灭私有大资本家，而只是使国家和大资本联合起来而已。在该法案中，还把中小地主当做社会所必要的阶层。在其反面，则要“根绝阶

级斗争”，行政要由在乡军人团会议和天皇的官吏执行，要用尽国力，使日本成为“凌驾于全世界大小国家之上的最强的国家”。总之，与以后“八纒一宇”的设想是相同的。

太平洋战争的最初设想

经过四天，叛军被镇压下去了。而叛乱军官所要求的军部独裁政权则由统制派来实现了。事件平定之后，原外相广田弘毅获得陆军的同意，当上了首相。大臣们也是按照军部的意见选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也恢复了。1936年8月，在首相、陆相、海相、财相、外相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同时，期望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根本国策，“在排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防备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筹划我民族和经济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①的

^① 外南洋：日语“南洋”指太平洋西南部各地；内南洋指战前日本代管的南洋群岛（加罗林群岛一带）；其他各地为外南洋。

发展”。即直到以后的太平洋战争的设想已被当作国策了。为了实现这种设想，提出了“广义国防”和“庶政一新”的口号，在经济、财政、国民生活各方面，都被涂上了青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被禁止了，制定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以前因参加左翼运动被判徒刑的人们，经常要受警察的“保护”观察。

五相会议在认识到和英美的对立将要激化的情况下，仍决定要向南洋方面发展经济，这并不是出自单纯的军人的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满洲以后的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占领了满洲的军部，在开始时豪言不许财阀进入满蒙，但没有垄断资本的合作就什么也办不成，于是又立即积极欢迎财阀资本。这也是由于以满洲为兵站基地，只是奴隶般地残酷役使当地的中国人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而财阀只去赚钱，一般产业的兴办没有进展，而且也不能使满洲发展为日本本国的商品输出市场。同时，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非常活跃，关东军就整天忙于讨“匪”了。

军部和政府借口对付抗日根据地，阴谋占领华北。从1935年就制造各种借口，侵入华北。在

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制造了傀儡政权。可是，这在经济上，因军事费用和扶植傀儡政权的费用增多，就使本国经济更加困难了。

日本经济，以军需生产为推动力的重工业、化学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其生产量在整个工业产量中占52.7%。工作母机工业在此时也逐渐确立。但在另一方面是工业原料的进口急剧增加，为了维持进口，就向外倾销棉纱、棉布等。但因欧美各国进行对抗，筑起了关税壁垒，所以从1935年起，出口也陷于萧条，入超急剧增加。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扩大，军需物资的需要迅速增大了。铁、煤、石油、橡胶、锡等近代化战争必需的基本物资出现了明显的不足。想要解决这些不足，就要向南洋，特别是外南洋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广田内阁五相会议所作决定的意义。

日、德、意轴心和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要侵略南洋，就不得不和这一地区的殖民主

义者英、法、荷、美相对立。即五相会议不得不决定的“防备英美”的原因所在。同时，日本对苏联怀有强烈的憎恨，制造“满洲国”，也意味着要巩固进攻苏联的基地。苏联为了避免日本的进攻，于1935年1月采取了将中东铁路让与“满洲国”等措施，一方面谨慎地躲避日本的挑衅，同时也巩固了边境的防御。

深感孤立的广田内阁和军部，於1936年11月，与在欧洲和苏、英、法、美对立的纳粹德国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一协定表面是日德为了共同防御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运动，而实际却是进攻苏联的秘密同盟。

在此之前，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取得政权，取缔了以共产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其他一切政党，破坏工会，建立了彻头彻尾的暴力独裁体制，撕毁《凡尔塞条约》，进行重新武装，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与英、法、美相对立，而且特别疯狂地执行反苏、反共、反犹太人的政策。

在签定《日德防共协定》的一个月前，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的意大利政府(1922年，当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形成高潮时，镇压了革命运动而成立的独裁政权）之间，建立了称为柏林—罗马轴心的政治同盟。在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的一个月后，日本就和意大利缔结了承认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开始侵略，1936年5月进行吞并），意大利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事实上的日、德、意三国政治同盟——东京、柏林、罗马轴心建立了。反苏和反英美法是这个轴心的目标。

法西斯以及纳粹，虽以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蛊惑宣传为其特征，但实际却不外是濒于危机的垄断资本的暴力独裁。日本从血盟团事件到二·二六的叛乱军官这些军部独裁的推动者，虽也号称反对财阀，实际上甚至杀害了财阀的代表人物，但不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所推动的体制的内容，象我们先前所看到的，他们的理论领导者北一辉所主张的，乃是要使垄断资本和国家结成一体，由绝对主义天皇制机构核心的军部来掌握国家的独裁大权，以图打开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所以就称它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种体制以五·一五事件后，否认政党内

阁为第一阶段；以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内阁的“广义国防”、“庶政一新”体制与签订《日德防共协定》为第二阶段；以1937年开始的日中全面战争及其后制定和实行《国家总动员法》为第三阶段；到1940年，日美战争前夕的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大政翼赞”（新体制）和日德意军事同盟时期，就达到了完成。

对军部的最大限度的抵抗

在欧洲，面临着以意大利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为了保卫民主与和平，根据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号召，开展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及一部分资本家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在法国取得成功（1936年3月），西班牙也于1936年2月成立了人民阵线的内阁。法西斯将军佛朗哥背叛了这一内阁，西班牙陷入了大规模的内乱。以法、意、苏为首，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人民力量对西班牙政府进行了援助，但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不干涉内战，而容许纳粹德国

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政府对佛朗哥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援助，因而人民战线在历时两年半的英勇抵抗之后失败了。

在日本，这个时候，共产党已经陷于消灭状态，工人组织也极其弱小，因而建立人民战线的主观条件还不具备，但在二·二六事件前后，反军、反法西斯的情绪，在国民中间已相当发展。在二·二六事件一周前举行的大选中，虽然与军队相勾结的右翼团体提出了许多候选人，但其所得票数却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仅六人当选。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党（以原社会民主党为主的无产政党右派的统一政党）则取得了6%的选票，议席从过去的五名一跃增至十八名。二·二六事件及其后军部独裁的加强，使国民更为不满，形成这种不满的基础是：进行民用生产的中小企业因受到准战时经济矛盾的影响而遭到各种困难，工人因为计件工资制以及临时工等等，使实际工资下降，农民因战争扩大被夺走了劳动力，肥料供给也发生问题，还有，因通货膨胀，使国民生活的困难急剧加深。从1936年到1937年的上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参加工人争议人数

最多的时期（参见前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倒数第三节中的图表）。

在众议员中，也出现了批判军部的人。在1937年1月的议会上，政友会的滨田国松公开谴责军部干涉政治。军部激怒，要求解散国会。但广田内阁没有答应，而进行了总辞职。元老、重臣（担任过首相，仍受首相待遇的人）推荐宇垣一成大将接任。这是议会和政界的最上层对军部最大限度的抵抗。陆军坚决反对宇垣组阁，用不提名陆相人选的办法，使组阁流产。

接着，按照军部的要求，林銑十郎大将组织了内阁。林内阁在次年的预算通过后，企图建立一国一党体制而解散了国会。在4月的大选中，执政党的昭和会等惨败，政友会、民政党两党依旧拥有多数。尤其是社会大众党有三十七人当选，日本无产党（不满社大党的人在本年1月建立的）在全国取得最多票数而当选一名。军部害怕此时如仍拥护林内阁就要危及自己，于是抛弃了它。林銑十郎不得不辞职了。

此后，在6月，四十五岁的“青年”公爵近卫文麿组阁。他具有与皇室关系最近的五摄

家^①之首的家世，与军部、政党关系都好，还以住友财阀为靠山，在国民中间也有对他的“年轻”和“聪明”有所期待的气氛。利用各个阶层对近卫抱有这种希望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这就是近卫内阁的使命。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以前，在江西省的根据地打退了蒋介石军队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了北上前往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就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虽然受到蒋军的追击，但还是战胜了难以形容的艰苦困难，通过一万公里的大长征，转移到陕西省，在这里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长征的过程中，牢固地树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对日抗战的《八·

^① 五摄家：镰仓时代确立，可以充任摄政、关白的五个贵族，到1884年（明治十七）根据《华族令》，改为公爵。五摄家是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五家。——译者

一宣言》，这一宣言深深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

第二年，1936年12月，被部署在进攻陕西共产党地区第一线的张学良，为了抗日，要求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加以拒绝，张就将蒋监禁起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迅速赶到西安，说服蒋、张。蒋发誓停止内战和团结抗日而被释放。经过这次西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迅速的进展。

日本之所以能任意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是因为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是中国民族还不统一，它的全部力量尚未得到发挥；第二是日本的行动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第二个条件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虽然渐渐失去，但因英国仍然害怕中国的赤化而迎合日本，美国也还没有决定性地阻碍日本侵略的力量，所以日本在满洲事变以来也还能够侵略中国，而现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大大阻碍了帝国主义日本的前途。军部焦急。近卫内阁一成立，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向内阁建议：“如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判断目前的中国形势，则现在必须给国民

政府以打击。”

日中的全面战争

在一个月以后的1937年7月7日，正在北京郊外芦沟桥进行夜间演习的日本军队，借口受到中国军队的非法进攻，便进行挑衅，向中国军队发动了战争。这就是所谓“中国事变”的开端。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立即屈服于日军，7月11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就在同一天，东京的近卫内阁同意参谋本部的意见，决定赶紧派两个师团到华北。近卫首相还特别邀集政界、财界、言论界的代表，表明政府的“重大决心”，要求举国一致无条件地合作。广播、报纸对此也大肆宣传，煽动了国民的战争意识。政府、军部都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表示这样的“重大决心”，中国就会屈服的。

7月28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华北，就在北京、天津地区发动了总攻击。次日，占领了这些地区。8月13日，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15日，政府宣布“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

又决定向华中也派遣大批陆军部队，这就进入了全面的战争。到年底为止，日本把当时陆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十六个师团投入到中国，占领了华北的要地和上海、杭州、南京。进入南京时，日本军队残杀了二十多万中国男女。

以为只要表示“重大决心”，并予一击，中国的抗日就会停止，军队和政府的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南京被占领了，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仍行抗战。1938年10月，日本又占领了武汉，还占领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最富饶的地区。但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仍继续抗战。

到占领武汉和广州为止，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退却的阶段。此后进入了日中双方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军队虽然仍旧进攻了城市和铁路线，并容易地将其占领，但在辽阔的中国大陆和燃烧着彻底抗战决心的团结的六亿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一百万日本军队也就无济於事了。日本军队控制点和线已是费尽全力了。以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为中心的共产党的军队及其游击部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在

日本军队占领地区也不断展开游击战，建立解放区。在这个阶段初期的1938年底，在国民政府中占有仅次于蒋介石地位的汪兆铭逃出重庆，与日本的要人会谈，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队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了“反共和平”的傀儡“国民政府”，但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意志却完全没有动摇。

政府、军部、政党、财界和他们周围的学者、文人们都不理解觉醒了的中国民族的力量。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给中国的新生带来苦难，这点在日本统治阶层中却是无人理解的，而在这里，他们只看见中国亡国的预兆。当时，六亿人的中国民族，已在历史上第一次这样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并站立起来，但在日本都还不能洞察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只是简单地想要在战争中取胜。然而，因为这场战争是以觉醒了的中国民族为对象的战争，不是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战斗，所以不论汪兆铭的投降，还是蒋介石本人的动摇，却都没有动摇中国民族的意志。因为日清、日俄、日德战争都是以政府为对手的战斗，所以打败了敌军，就能挫折敌方政

府的战争意志，成为日本的胜利：但在以民族为对象的战争中，即使在各个战斗中取得几百次胜仗，而只要没有挫折其民族的抗战意志，则从战争的全局来看就不能胜利。关于这一点，日本虽在干涉俄国十月革命的西伯利亚战争中有过惨痛教训，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未从中吸取一点东西，因而就一天比一天地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三十七 太平洋战争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二）

欧洲大战和日、德、意军事同盟

随着日中战争的开始，一切社会运动不是被编入战争协力体制，就是被解散。而议会和政党，完全成了只能给军部鼓掌的工具。

1938年3月，第七十三届议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根据该法，政府可以随意动员国民的财产和人员，产业、金融自不必讲，还掌握了能够统制到国民生活各个角落的权限。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审议这个法案时，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谈到该法案违反宪法，陆军省军务课课员佐藤贤了中佐就立即大声叫喊：“住嘴”！对此，议会竟连一句抗议都没有。

军队开始在中国华北挑起战争时，打算用此

压制中国的抗日，以发动对苏战争，但中华民族抗战坚决，日军从中国抽不回手来。尽管如此，军部仍在寻求对苏战争的机会，于1938年7月，在满苏国境的张鼓峰向苏联进攻而被击退。又于1939年5月，在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诺蒙坎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战争，虽然日本当时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但在三个多月以后，却被苏蒙联军的机械化部队所歼灭。因此日军也就暂时不想对苏挑动战争了。

在此期间，1938年11月，德国向日本建议缔结以苏联及英、法为敌的军事同盟。这个谈判由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辞职后上台的平沼内阁继续进行。日本内阁盲目崇拜德国的陆军，主张全面接受德国的提案，但海军和外务省却主张只以苏联为对象，会议进行了四十多次也没有得出结论。然而，就在日本军队在诺蒙坎苦战最为激烈的1939年8月23日，德国却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置日本于不顾。平沼首相不知所措，只好辞职。

此后不久的9月1日，德国闪电式地侵入波兰。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波兰，接着又向丹麦、挪威进兵，并在占

领了这些地方以后的1940年5月，转向西部战线，仅仅一个月，就征服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当时意大利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由此，德军就在多佛尔海峡集结大军，作了进攻英国的准备。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以来的侵华战争、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同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开始用武力破坏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而签订的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这就开始了瓜分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而欧洲大战的开始，即进入其第二个阶段。

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了。不仅基本物资极端缺乏，而且因劳动力被征入伍，肥料十分困难，农业生产也开始下降了。为了弥补这种缺乏，就将台湾、朝鲜的大米运往本国。因此，这些地区的粮食危机特别严重，因而尽管遭到极端残酷的镇压，当地对日本统治的反抗也还是高涨起来了。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出于对南方的资源，特别是对石油、橡胶的需求，南进论的呼声高

了。1940年5月，荷兰，6月，法国的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国也没有余力顾及远东，日本便乘此机会，于6月强迫法属印度支那（今南北越南）当局承认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日本南进的气势一加强，美国的对日态度就强硬起来。1940年1月，当《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刚刚满期，美国立即将其废除。7月，美国实行了主要原料、军需品对日出口的批准制。

由于日本和美英的对立急剧激化，1940年7月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内阁，就向德国方面积极活动，于9月，成立了以美国为对象的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铺建太平洋战争的轨道

近卫文麿在组阁前，与内定担任陆军相、海军相、外务相的东条英机、吉田善吾、松冈洋右举行会谈，确定了新内阁的基本方针：（1）加强战争经济体制；（2）加强日德意轴心；（3）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期间，充实“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4）为了建立包括英、法、

荷、葡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在内的“东亚新秩序”，“采取积极的措施”；（5）“具有坚定的决心，排除美国”对前项的“实力干涉”；

（6）为完成征服中国，要进行彻底作战和完全封锁中国；（7）提高国体精神，“建立集结全体国民的新政治体制”。这一协议以在组阁四天后内阁会议的决定及其次日政府、大本营联合会议决定的“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对时局的处理要纲”而正式成为国策。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铺设了以后“大东亚战争”的轨道。而且万事都是按照这个轨道进行的。重要的是，这个国策既非由于军部的压力所决定，也不是松冈外相个人主观想出来，而是肩负着重臣、政党、财界众望的近卫自己，在组阁前提议要以此为国策，并在以军部为首的统治阶层各方面的意见达到统一的基础上，让第二次近卫内阁开始推行，而内阁是忠实地实行了的。把太平洋战争只当作军部以及松冈外相的责任，近卫等人说他们反对这个战争，这只不过是害怕在自己铺设的轨道上载运自己的列车到达终点的人的辩解而已。

近卫等人协商的基本方针的第二项，就成为前已叙述的1940年9月的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其后，松冈外相又在访问欧洲的归途中，1941年4月，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从而实现了协议的第三项。三国同盟表面上是对付美国的同盟，但实际上也是反苏同盟，由于松冈外相和德国外长李宾特洛甫相互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松冈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象前面已谈到的协议那样，只是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换句话说，只不过是赢得了时间用以充实能够进攻苏联的军备罢了。

为了把东南亚“积极地拉进东亚新秩序的措施”，以1941年7月，日本军队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开始了新的一步。还有，在此前的6月，政府声明与荷属东印度（印尼）当局购买石油谈判破裂，而实际上如果日本只是独占印尼的石油，那么由于对方的让步，谈判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日本却借调查印尼石油矿藏的名堂，完成了军事地理的调查，于是日本和荷兰的谈判就决裂了，据说印尼为了让日本遭到困难，就决定不出售石油了。对此，政府和军部就整天都在提醒

和大肆宣传A（美国，America）、B（英国，Britain）、C（中国，China）、D（荷兰，Dutch）阵线对日本的包围，煽动国民走向战争的决心。

为了这样的战争所必需的是前文所述(1)的“加强战争经济体制”和(7)的“新政治体制”。所谓加强战争经济体制，是在从纳粹德国直接输入的“公益优先”的名义下，使军队、官僚和金融垄断资本合为一体，在每一个行业都建立“统制会”或“公团”，把整个经济完全置于和军队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

所谓新政治体制，是建立了以首相为总裁、地方长官为地方支部长的大政翼赞会，由翼赞会的总裁和地方支部长任命“议员”构成的中央以及地方的“大政翼赞协力会议”及与德川时代的五人组（连坐——译者）相同的“邻组”（居民组——译者），还建立了工人的“产业报国会”、农民的“农业报国联盟”、文人的“言论报国会”和其他各种职业的报国会，并强迫未婚男女青年加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已婚妇女加入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后来合并为大日本妇女

会)，壮年男子加入翼赞壮年团这样一种体制。这样，国民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岗位，每个人都经常被紧紧束缚于这种生活之中，被战争所动员。

近卫文麿在组织内阁之前，虽曾公开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新政党，但在组阁后却认为如要建立这样的党，恐怕会成为“幕府性的东西”，于是就以“违反国体”为理由而不再建立新党。作为代替政党的，则是建立了作为“上意下达”机关的翼赞会和作为“下情上通”场所的大政翼赞协力会议。然而，为了“赶忙乘上”近卫新党的“公共汽车”，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政友会、民政党等党派也相继解散，但因不能组成新党，所以在日本就连一个政治结社也没有了。

日美开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以“闪电战”深入攻进苏联领土。陆军和松冈外相主张日本也立即进攻西伯利亚，海军和近卫则主张慎重。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对德苏战争，

以三国轴心的精神为基本方针，暂不介入，而秘密作好对付苏联的武装准备，自主地应付局势。德苏战争的演变，如进展到对帝国（日本——译者）有利，则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确保北方边界的安全。”于是，为准备对苏战争，就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动员了陆军历史上最大的兵力和器材，让关东军达到七十万人。《日苏中立条约》至此就成为一纸空文。

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美国最后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在此以前，从1940年底开始，日美之间虽然进行了调整邦交的谈判，但这只不过是意味着双方都在争取准备战争的时间。1941年9月6日，政府和军部首脑的御前会议决定了“到10月上旬，如果还达不到贯彻我方要求的目的，便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到10月，由于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希望，陆相东条英机就强烈主张对美开战，与近卫首相继续谈判的论调发生矛盾。近卫首相10月16日据实写明这种对立，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天皇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建议，于10月18日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据说天皇和木户的期望

是，如果起用东条，说不定会压制住陆军少壮派的立即开战论。此后，天皇于11月29日，就对美开战问题征求了重臣们的意见，但重臣当中无人明确表示反对日美战争。他们都只是泛泛地说，在这一点上靠得住吗？在那一点上不用担心吗？等等，而自己并不作出负责任的判断。就连站在开战论先锋的东条首相兼陆相也是毫无把握。他只是说，人在一生中，下这么一次从清水寺的舞台上^①飞跃而下的决心是必要的，他洋洋得意于把个人的进退和国家、民族的存亡混为一谈。海军军令部总长则把日本比做重病患者，把战争比做手术，说这个患者这样下去必然死亡，如果动大手术，说不定也许能够治好等等。海军没有胜利的信心，这件事也由充任海军军官的高松宫^②传到天皇的耳中。天皇就于11月30日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询问对日美战争有无胜利信心，由于二人都“以相当的确信来回答”有胜利的信

① 清水寺的舞台：清水寺是京都有名的寺院，建筑古老。其南部下面是悬崖，建有楼阁，称为“舞台”。舞台附近的红叶驰名全国，游客很多。常有人来此投崖自杀，此舞台就成为日本自杀的“名地”。——译者

② 高松宫：裕仁（昭和天皇）的次弟。——译者

心，于是天皇就命令木户幸一内大臣转告东条首相“按预定计划进行”（《木户幸一日记》）。在次日12月1日下午2时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决定对美开战。12月8日，日本在宣战之前，就以海军航空部队和特殊潜水艇突然袭击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开始了对美英的战争。政府称此为“大东亚战争”。

太平洋战争的性质

从1941年6月德苏战争的开始和12月⁷日美战争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这次大战是四种战争的重叠。

第一是日德意三国最初分别地、以后相互支持地对各自附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从被侵略者方面来说，是保卫民族，也是解放的战争。“满洲事变”、“七·七事变”当然可以包括在这一类里；就是扩大为“大东亚战争”以后，在东南亚和大洋洲进行的战争，也属于对当地民族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

争。

第二是美英法等对日德意的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如果只从军事方面来看，虽然是美英法等为对付日德意进攻所采取的防卫而开始的，但在本质上对双方来说，却都是围绕着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因而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如果就日美（英）战争来说，正象本书第三十一章已经详述的那样，从日俄战争一结束，日美（英）就在中国和太平洋进行帝国主义势力的竞争，对立逐年加深，终于达到顶点。在军事上，虽然是日本首先动手，但这却是美国政府的巧妙安排，挑动日本先开火的。就连日本海军的偷袭珍珠港，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已经获得日本正在发动进攻珍珠港的确实情报，却故意没有通知驻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有意安排要使日军偷袭成功。这从该司令长官方面举出的大量证明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是美国总统为使美国国民同意对日战争而采取的苦肉计。这大概是可信的吧。

第三是德意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的防御战争。

第四是德苏战争一开始，英法美等帝国主义集团也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与中国和其他被侵略民族结成了联盟。这就产生了针对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种第四个特点。而德苏战争和日美战争开始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以这个特点为主的。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的日本和美英等国的太平洋战争，也是以上四种战争的复合，日苏战争则可包括在第四个特点中。其中也是以第一个特点，即对中国及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为其基本特点，而从这一特点的战争中，又产生了属于第二、第四种特点的战争。

日德意轴心的失败

日本军队根据周密准备的计划，战争一开始，就赶走了人员不足的美、英、荷的殖民地驻守军队，到1942年5月为止，占领了东南起于俾斯麦群岛的腊包尔，西北至缅甸中部的广大地区。可是，美国让它巨大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在珍珠港被打击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原状，从1942

年6月击溃强攻中途岛的日本海军机械化部队起，就开始掌握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

从1943年2月日本陆军在最南方的占领地瓜达耳纳耳岛被美军夺回起，日本军队就开始在太平洋的整个战线上逐步败退。1944年7月，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被美军占领。从同年11月起，开始了以塞班岛为基地的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1945年3月10日夜间，从东京南部遭受大规模空袭，成为烧光的废墟开始，日本全国的大小城市每夜都无例外地受到轰炸，化为焦土。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全部毁灭。1945年6月，冲绳岛被美军占领。缅甸战线的日本军队也溃灭了。中国战线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也依然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1941年至1942年对中共解放区的进攻，只是暂时使解放区缩小，从1943年夏天起，解放区又再次迅速地扩大和加强。到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上的优势也开始崩溃了。

随着日本军队失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斗争加强了。在印度支那（越南），从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以后

不久，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各种力量，就以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为中心，统一“越盟”（越南独立同盟），进行抗日斗争，从1944年起，在各地展开了游击战。在缅甸，1944年3月，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英帕尔时，争取民族解放的各派力量就统一为反法西斯自由联盟，连当初想利用日英对立以争取独立而与日本军队联合的一派，也于日本军队在英帕尔作战溃败后的1945年3月，率领缅甸国军，开始抵抗日本。在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都一样，抗日游击战活跃起来。

在欧洲，1943年2月，从对苏战线上的三十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歼灭起，战局就开始了根本转变。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对德抵抗运动也全都有了发展。特别是意大利，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法西斯、反纳粹统一战线的地下斗争强大起来。在这种压力下，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而动摇了墨索里尼政权，以此为良机，反法西斯阵线发动政变，推翻了墨索里尼政权，成立了巴多

利奥将军的新政权。9月，意大利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在两个月后的11月，英国首相邱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对日本继续进行大规模进攻，剥夺日本从1914年以来占领的太平洋上的一切岛屿，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满洲、台湾等一切地方均归还中国，使朝鲜独立。

1944年6月，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登陆，解放了法国，更与从东部逼近德国的苏联军队相呼应，夹击德军。194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英国首相邱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确定了对德对日的战略和策略。当时罗斯福向斯大林迫切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建议以在战后除把日俄战争中帝俄让与日本的库页岛南半部和中国旅顺、大连地区的租借权等给予苏联外，千岛群岛也归苏联所有为代价。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建议，约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在这一会议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把中国所属的旅大地区当成美苏交

易的对象，这是对反法西斯联盟声誉的玷污。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5月，柏林被苏、美、英、法军队包围，希特勒自杀；8日，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投降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以前的2月，近卫文麿等秘密向天皇提出了意见书，认为战争必将失败，随着战败的到来，日本有发生共产革命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比打败仗还要可怕，所以为了保存国体，就要尽早向美英投降。德国投降后，近卫等重臣们和海军的和平活动就更为积极了。天皇也于7月25日和木户幸一内府^①谈到，军部所谓要以“本土决战”来扭转战机，这“从历来的能力和经验来看，是不能遽然相信的。”深为担心的是本土如果成为战场，大本营就要成为敌军伞兵部队的俘虏，而且三种神器也不能保存住，所以“我认为讲和是极为紧急的重

^①内府：辅佐天皇的、设在宫内的官职，正式称为内大臣。本来掌管文件等事务，但到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死后，专管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权力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撤销。——译者

要任务”。但是，这是最上层的极其秘密的活动，国民仍旧被驱使于“贯彻圣战”之中。

战争时期，国民在生活上，粮食极端缺乏，衣料也不能有新的补充，由于空袭，几百万户的住房化为灰烬了，经常不断地被迫由“邻组”、“报国会”相互监视，被驱使去劳动，其困苦不堪言状。日本全国就象是一个大的军事监狱。随着困难的增大，国民厌战情绪有了发展，再进一步，也产生了反战思想的萌芽。

在日本国内，不仅不存在象意大利那样全国规模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就连象德国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那样局部地区的组织也没有形成。但在中国大陆战线上，野坂参三在共产党地区，向日军士兵发出号召，对日军俘虏进行再教育，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后来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解放联盟的成员超过一千人。而鹿地亘在重庆的国民党地区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作士兵的工作。

近卫文麿担心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失败，野坂等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殖民地朝鲜的民族独立斗争结合在一起，还有国内怨恨当政者的民众与地下

的共产主义者相结合而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的确，在日本也潜藏着革命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迸发出来，成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还是战败以后的事情。

7月，美、英、中国的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26日，发表了对日宣言。《波茨坦宣言》提出了盟军的对日和平七条件，劝告日本迅速投降，否则盟军将毁灭日本。《波茨坦宣言》要求从日本永久铲除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权力，惩办战争罪犯和扶持日本民主化的同时，要实施《开罗宣言》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并限定日本主权范围是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盟军指定的各小岛。《波茨坦宣言》还约定，如果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完成，根据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建立了和平的负责的政府，盟军就立即撤退其在日本的占领军。

在政府和军部的内部，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的主张和反对的主张尖锐地对立着。而政府却声明国民对《波茨坦宣言》“置之不理”，要继续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到8月，日本完全不知道的苏联参战的日期临近了。美国赶在这

个日子之前，一来是为给日本以决定性的打击，二来由于盟军胜利，大战即将结束，那么苏联与美英的联合就要破裂，因此要向苏联示威。从这两个目的出发，就把当时刚刚制造出来的两枚原子弹当中的一枚于8月6日投到了广岛。一瞬间，二十多万市民遭到杀伤，造成了人类空前极端悲惨的情景。于是连政府和军部的主战派也动摇了。接着，苏联在8月9日拂晓前参战，苏联的大批军队如怒涛一样向满洲攻来。这天，美国也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由于苏联参战，使那些打算即使日本本土失陷，也要在满洲把战争坚持到底的最强硬的主战派也不得不改变主意。8月14日中午，在内阁官僚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制止了继续战争论，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

8月15日中午，天皇就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投降事，向全体国民和全体军队作了广播。战争结束了。9月2日，在美国军舰“米苏里号”上，日本的全权代表签署了对美、英、中、苏及其他盟军的正式投降书。

十九世纪末叶，除欧美以外，在东亚的一

角，象彗星那样登上舞台的唯一的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大日本帝国，从1895年开始把中国领土台湾变成殖民地以来，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象彗星那样消失了。日本的领土无论是比日清甲午战争以前，还是比近代天皇制开始当时，都变得狭小了。而且还被置于日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也未经受过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被剥夺了民族主权。这就是“东洋的霸主”、“世界的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三大强国之一”和以牺牲邻国而连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的最后下场。

三十八 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和世界

——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占领的结构和美国的占领政策

在投降的同时，日本就处于盟军的统治之下。9月中，日本全国的每个角落都被盟军的军队所占领。当时日本固有的领土奄美大岛及其以南的南西群岛、冲绳群岛、小笠原群岛以及硫磺岛被美国单独占领和直接统治；同样是日本当然领土的千岛群岛则被苏联单独占领和直接统治，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占领国的领土，从日本分割出去。

（奄美群岛于1953年底归还日本）。

除上述各岛外，只有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其周围各小岛，是日本国的领土，以盟军的名义被占领着。可以说，这种占领实际上是美

军的单独占领。在美军之外，只有少数英联邦军队参加了占领军，在占领军的总司令部（GHQ）中，盟军总司令（SCAP）以下的全体职员完全由美国人所占据。到1945年底为止，对日占领政策由美国政府单独决定。同年底，由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在华盛顿成立了由盟军的十一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作为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机关，还在东京成立了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理事会，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谘询机关。前者于1946年2月26日正式开始工作，后者于同年4月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但这两个机关的主席都由美国代表所占据，而且在远东委员会上决定了的政策，如果不通过美国政府，也是不能成为指令发给盟军总司令的。加上美国政府还有权就日本的宪法修改和其他重要事项以外的问题，单独给盟军总司令下达指令。这样，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就只能对美国政府的对日占领政策作某种程度的牵制而已。

那么，美国对日本的事实上的单独占领，其最终目的是什么呢？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日占领初期的基本政策”把占领日

本的“最终目的”归纳为下列二项：

“（一）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和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

“（二）随后就应建立政府，这个政府尊重他国权利，支持由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所表示的美国的目的是，并对和平负有责任。”

在这里，打败了四十年来的宿敌日本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要压制住日本的再度起来反对美国，把日本改造为“支持美国目的”的忠实属国的意图，是极其直率而又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然而，尽管是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的单独占领，但太平洋战争是日美两个帝国主义的战争，同时又具有反对世界法西斯同盟的反法西斯联合战争的一部分的性质，因此美国政府对于反法西斯联合的对日共同纲领，即作为日本投降条件的《波茨坦宣言》也不能根本忽视。于是美国政府就想利用《波茨坦宣言》作为变日本为其附属国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就是剥夺日本作为美国的竞争者而东山再起的军事力量；所谓民主化就是在必要的限度内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削弱日本原有统治者的力量。特

别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的亚洲政策是要以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通过蒋介石的政权来统治全中国，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因而在中国投进了主要的力量。对日本却认为只要它作为一个对美国无害而顺从的小国就可以了。因此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国政府暂时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波茨坦宣言》。

改革的指令和国民的政治觉悟

从投降时起，到次年即1946年4月前后，看来盟军总司令部似乎还是专心致志于根据《波茨坦宣言》来实现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到1945年底为止，发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指令：彻底解散日本的军事机构，逮捕战争罪犯的嫌疑犯，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和其他压制思想、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示威游行自由的一切法令，废除特高警察制和撤掉全部特高警察有关人员，男女平等同权、无条件保障工人的团结权、争议

权、罢工权、集体交涉权，教育自由化，冻结财阀财产和解散其总公司，冻结天皇财产，第一次农地改革，神道与国家的分离，禁止天皇的神格化。

次年即1946年1月1日，宣布天皇是普通人。同年4月，发布开除战争期间军国主义头目和旧职业军人一切公职的指令，由此似乎可见，民主化的风暴已发展到一扫旧的统治势力的地步。开除公职的范围，经过1946年又有了扩大，已经扩大到町村翼赞会以及翼赞壮年团的干部，其总数，在政治、经济、教育、言论、工人、妇女及其他各界的负责人达到八万六千人（另有约十二万名职业军人被开除）。

但是，这些指令由日本旧的统治势力经手实行，所以这股势力只是被改头换面，他们仍继续掌握着国家机构。人民群众在战争时期完全没有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组织，所以当统治阶级被打倒在地而投降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立即站立起来，组织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实行《波茨坦宣言》的政府，就连要求立即释放狱中的政治犯的运动也未能发动起来。

投降的当天，成立了以皇族东久迩宫为首相

的内阁。这个内阁所担负的任务是以天皇分支的皇族的权威，圆满地处理狂热地效忠天皇的陆海军的投降事宜；同时，又以皇族的权威来压制国民对于欺骗国民、迫使国民参加非正义的战争、不断地掩盖败局、伪装成胜利似的这种统治者的愤慨，最大限度地把原有的统治势力保存下来。而这个皇族内阁，在10月，因对抗废除《治安维持法》等和释放以共产主义者为主的政治犯的指令而总辞职。以后，就由曾经与英美进行协调外交的代表人物币原喜重郎组阁，由这届内阁执行上文叙述的各种指令。

1945年10月，政治犯都获得释放。由于以被监禁达十八年的德田球一为最高领袖的共产党喊出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而开始了积极活动，而且不仅工人农民开始组织起来，支持共产党，就是反对或者害怕、憎恶共产党（这是国民中的大多数）的人也不再持漫不关心的态度了，广大的国民一下子被卷进政治生活中。当时在共产党员的言论行动中，很多场合是没有明确地区分天皇制和天皇本身，大多数的国民感到不能接受打倒天皇制这一口号。拥护天皇制，从10月

底以后，不仅陆续恢复的各资本主义政党，如日本自由党以及日本进步党，就连由战前无产政党各派联合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也包括在内，即除了共产党之外的一切政党都持有这种主张。但是，从前对于天皇制就连谈论一下都感到十分畏惧，而现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已成为国民议论的焦点。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日本国民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这意味着旧的专制天皇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已在无意中被剥掉了。

民主势力未能统一

随着战争结束，军需生产瓦解，生产极度下降。到1945年底，工矿业生产指数只是日中全面战争前的1935年到1937年平均指数的13%，到1946年4月，也不过是战前的20%。由于生产荒废，士兵复员，从海外撤回来等原因，到1946年春季，据估计完全失业者就有六百万人以上，再加上半失业者，就超过一千万人。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物价暴涨已无止境，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为战前的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1945年秋天所产

的稻谷，政府所掌握的三千九百一十三万石，不过比战前普通年景的六成稍高些，主食的配给，折合成大米，每人每天仅仅三百克，而且很少配给米麦，薯类以及玉米面是好的，甚至还掺杂有豆饼，就连这种配给也常常供应不上。国民多半都或多或少地陷于营养不良，从1946年春天到夏天，饿死的人不在少数。人们整天饿着肚子，穿着破衣烂衫，浑身沾满污垢和灰尘，在空袭的废墟上搭起的临时木板房中，勉强遮风挡雨，或者是一家几口人拥挤在一间三叠^①或四叠半的小屋里。

这是比战争末期更为悲惨的，可想而知的最底层的生活。可是已经没有战争的恐怖，也没有宪兵和警察的压迫了。虽有占领军无限制的统治枷锁，但在1946年春天以前，占领军还是利用日本人民的力量，把打击原有的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作为主要任务，陆续发出的民主化指令激励着国民。建立和平与民主的新日本的希望，弥补了物质生活的悲惨。

^① 叠：日本式房间的面积用“叠”计算，每叠普通为191×95厘米，约可睡一人。——译者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工会、农会急风暴雨般地发展，大大小小无数争取民主的 시민、妇女、青年组织陆续出现。如果这些民主力量联合为一个大的统一战线，这就有了极好机会把原有的统治阶级手中的日本政治领导权夺到民众方面来。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互不信任已根深蒂固，而且两党都要把工会、农会和其它群众团体置于本党的支配之下，所以矛盾非常尖锐。

要把群众团体置于特定政党的支配之下，这是战前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与合法的无产政党都曾犯过的重大错误，也因此而使工会、政党都遭受很大的损失，但这种教训在战后也丝毫未加以汲取。所以，工会就分裂为共产党系统和社会党系统及不属任何一派的中立系统，而且好不容易把全国的农民集合为单一组织的日本农会，就在其内部，共产党和社会党争夺领导权也是十分激烈的。这样，虽然都在口头上谈论民主力量统一战线的必要，但实际上是使分裂固定化并加深了。因而民众虽然能够给予旧的统治势力一定的打击，但却不能将其打倒。

民主力量冲破占领军的限制

1946年4月10日，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也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最后一次大选。远东委员会虽然劝告占领军总司令部，把大选推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势力进一步被削弱的时候，但占领军总司令部却无视这一劝告。占领军总司令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第一，他们看到社会党、共产党有出乎意料的迅速发展，想要压制左翼的进一步发展，让资本主义政党继续掌握政权；第二，占领军总司令部当时已经抢在远东委员会之前，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修正《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质上就是正在进行制定新宪法的工作，而为了审议这一宪法草案，就有必要组成一个从表面看来具有代表“自由地表明全体国民意志”的新议会。由于这样两个理由，就急于进行大选了。

根据前一年年底修改的选举法，在这次选举中，妇女有和男子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采用大选举区和限制连记投票制。这从日本

过去经常处于广范围的贿赂收买和政府的猛烈干涉之下进行选举的历史来说，这次收买以及干涉还算是少的。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当选一百三十九名，成为第一大党；进步党九十三名，是第二大党；社会党只比进步党少得一席，当选九十二名。社会党的这一成绩和提倡打倒天皇制而遭其它政党一致责难的共产党获得了有效投票总数的3.8%，有六名当选，这些情况都使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根据选举结果，理所当然地应建立以新议会为基础的新内阁，但币原首相却叫嚣说，由“天皇大权”所任命的职位，如无天皇的命令就不能离去，并以进步党为执政党，把持政权不放。为了反对此事，由社会党提倡的该党与自由、协同、共产四党的打倒币原内阁的四党共同委员会，与议会外的工会、农会、市民团体的“倒阁实行委员会”（由共产党领导的）在议会内外互相呼应，开展了激烈的倒阁运动。从共产党到自由党，采取统一行动，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力量连挥舞天皇大权的币原也经受不住了。币原内阁于4月22日总辞职。正在这个时候，社会党右派与自

由党合谋，着手把共产党赶出四党共同委员会。并开始扰乱议会外的群众斗争。

不久，5月1日，战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了。这一天，东京有五十万人在“人民广场”（皇宫前的广场）集会，在全国有二百万人参加，要求稳定生活和建立民主人民政府的口号声响彻全日本。

占领军总司令部判断，民主力量显然已超过美国所需要的范围，为了压制这种力量，便支持保守派。共产党完全被排出于四党的共同委员会之外。与此同时，社会党的发言权也急剧低落下来，下一届的政权由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任首相，是自由、进步、协同三党的联合内阁。正当此时，鸠山一郎根据占领军总司令部特别备忘录而被开除公职（5月4日），于是币原内阁的外相吉田茂就立即成了自由党总裁，并着手组阁。

反对这种情况，要求成立民主人民政府的群众运动日益发展。5月19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粮食“五一”节）。有二十五万工人、市民参加，集会以后向首相官邸示威游行，包围了官邸，要求吉田茂放弃组阁。吉田动

摇了。占领军总司令部立即给吉田打气，同时派遣坦克部队威胁、镇压包围官邸的群众。当夜，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表了“警告多数暴民引起示威和骚乱的声明”，恫吓群众说，为了消除对秩序和占领目的的威胁，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吉田茂因此又神气起来和有了自信，于22日组阁完毕。

至此，公开表示了占领军乃是日本统治阶级的保护人，而不是革命群众的朋友。占领军和革命民主力量的虚伪蜜月至此告终。

改革期的结束

占领军总司令部适应形势的发展，操纵着日本国内的统治势力和革新势力，并企图把日本改造为美国的附属国；而以远东委员会的多数派为代表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则要求严格执行《波茨坦宣言》。正是通过这两者如此复杂的对抗与联合的相互斗争，在日本进行了改革。

这种改革，从投降到1946年5月1日恢复“五一”国际劳动节为第一期。其特点前面已有所叙述，严格的意义上的改革期虽然至此为止，但在这

时期，美国对远东委员会所要求的日本彻底民主化，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这里隐藏着不让革命力量打倒旧势力的反动意图。

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复活至1947年1月31日是第二期。制定了在前一时期已经公布草案的《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公布），制订了基本上消灭寄生地主制的第二次农地改革的各项法令（1946年10月），为建立民主的教育观念和学校制度而设立了教育刷新委员会（1946年8月），还发表了没收日本军事产业设备的波莱使团的中间赔偿^①征收案（1946年6月），扩大了开除公职的范围（1947年1月）。这些措施虽然是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前进，但占领军却已在1946年5月，象我们前面已经见到的那样，支持第一次吉田内阁成立，表明了压制人民和支持统治势力的方针，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随着极早地制订和实施《阻碍占领目的行为处罚令》（1946年6月）、《维持社会秩序的声明》（1946年6月）、限制公益事业工人罢工权的《劳动关系调整法》

^① 中间赔偿：战败国将生产设备、产品等交付受害国，做为赔偿，称为中间赔偿。——译者

(1946年10月)等新的反民主的镇压法令,又设立了经济安定本部(1946年8月),公布了《复兴金融公库法》(1946年10月),决定了重点生产的方式等,开始抛出了恢复垄断资本的政策。

为反对占领军总司令部和吉田内阁的这种政策,工会、农会和各种市民团体以及共产党、社会党的组织,与争取生活、权利和成立人民政府的斗争,继上一时期之后,又有所发展。工人以1947年2月1日为期,打算进行各行各业的总罢工,但在即将罢工的前夕1月31日下午,因麦克阿瑟直接下令禁止而遭到挫折。

从这时到1947年底,是改革的第三个时期,进行了以下各项:开始第二次农地改革(3月)、制定和实行《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3月,4月)、公布新宪法(5月)、成立劳动省(9月)、修改刑法,废除不敬罪和通奸罪(10月)、改订民法,取消父权家长制(12月)、公布废除中央集权警察,规定地方分权和由居民进行统治的新警察法(12月)、解散内务省(12月)等。但是,这些措施与其说是改革的新的前进,不如说是在前一时期已经制订的宪法和各项

法令到这时不得不执行，而且可以说只是不得不采取与实施这些法令所必需的有关改革而已。

政府自不必说，就连占领军司令部也没有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的精神。这在根据新宪法进行议会议员选举的选举法比1946年4月选举时更显著地被破坏以及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镇压进一步加强方面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了。土地改革也由于不断地流血的激烈的农民斗争而完成了。

在1947年4月的选举中，成立了以社会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内阁，得到麦克阿瑟的祝福。这个内阁的任务是用成立“社会主义”、“修正资本主义”政府的幻想来平息“二·一”总罢工受挫折以后也没有衰退的工、农、市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排除共产党的影响，使其战线分裂，进一步加强前任内阁以来的重点生产方针，用工资物价新体制来压低工资和米价，给予垄断资本以各种补助金，优先保证他们的原料和资金，推进垄断资本和国家的联合，促进它们的恢复。这样，虽然民主化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但因美国也还没有抛弃非军国主义化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时期中仍遗留着前期改革的倾向。到1948年，美国政府也就很快地公开抛弃了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方针。

消灭古代的、封建的因素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占领军指挥下，由原来统治势力组成的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改革，是极不彻底的，甚至还隐藏着反革命的性质，这是必然的。从一开始就在没有民族主权独立的占领下，是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然而，战败、投降和接踵而来的占领下的各项改革，却给日本历史带来了最深刻的重大变化。

第一，被占领本身就是民族历史的中断。明治初年，当时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曾下定义说：“国体就是独立的民族主权”，并论及国体和君主的“血统”关系，说血统即使断绝，如果国体不变，那么血统即使照旧继续存在，而“失去了人民的政治权利，遭受外国人的统治时，即可称之为中断了国体”，明确了英国人统治东洋各国，却经常保存其血统而中断其国体（《文明论

概略》,187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日本,也和过去印度土邦被英国征服,保留其酋长的血统而中断其国体(民族主权)的情况是相同的。这正是民族历史的中断。

第二,天皇的绝对权力和威望都丧失了。天皇在古代是唯一的最高绝对权力者,并具有神的权威。这种权力虽然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时转移到将军和其他封建领主手中,但仍由天皇把称号和位阶授予将军,使之合法化和具有权威性。而天皇作为最高权威存在下来。到了近代,天皇又重新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现在,这些都同时丧失,天皇在国民主权之下,只是日本国的象征了。这的确是一千几百年来日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根据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作为创造日本国的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永远统治日本,这是被作为日本神圣的“国体”,但在这种意义上的国体也和日本投降的同时,因天皇的统治权被置于盟军最高司令的指挥之下而中断了。不仅如此,曾把明治以来对外战争的胜利,近而把日本自古以来没有败于外国的事实,完全说成是由于

天皇的“威德”，这样制造出天皇必胜的信念。这是支撑近代天皇权威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但这种信念也因现实战争的重大失败已无法维持了。

第三，以在思想上不仅支撑专制天皇制，也支撑半封建地主制、父权家长制的教育敕语为原则的教育体系，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的封建因素已基本上被消灭了。

这种变革虽说是根据占领军的指令而进行的，但能够接受这种变革的历史前提，却在日本国内已经完全成熟，日本近代的历史趋势就是朝着消除封建因素的方面发展的，促使这种历史倾向飞跃发展的是战后的各项改革。这种典型表现在集中显示民主化的制定宪法和农地改革的过程中。

制定新宪法的力量

反对专制天皇制的国民主权思想，从十九世纪的七十一—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就在日本发展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十一—二十年

代成为支配思想的民本主义，虽还不能公开主张国民主权，但在内部已具有这种思想，趋向于把专制天皇制发展为立宪君主制。在这时，象把天皇说成是神的子孙这种不合理的道理，几乎行不通了。与此同时，全面反对天皇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在非法的情况下逐渐传播起来。此后，在战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当政者根据国体明征^①这种名堂，极端地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力和权威；但是，不管军部以及政府怎样把压制和非人道的反民主行为，也都用天皇的名义加以神圣化，而国民却反而从心里疏远了天皇以及天皇制。

由于有了这样历史前提，所以把天皇单纯当作象征的新宪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民大众的热烈欢迎，新宪法对统治阶级来说，虽然是被迫接受的，而对人民群众来说，却不是这样。1946年2月13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全面拒绝了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草案》；由占领军

^① 国体明征：战前日本政府为了压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于1935年公布了“国体明征训令”，这一训令引起军部派系纠纷，同年又发表了“国体明征声明”，明白表示统治权的主体在于天皇，为军部急进派介入政治铺平道路。——译者

总司令部起草的规定主权在民、以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放弃包括自卫战争的一切战争和军备等内容的新宪法草案，提交币原内阁，迫其接受。政府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在经过十天的反复协商后终于接受了。其原因有二：一是如果现在不接受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而远东委员会主张要变日本为共和国的倾向极其浓厚，这是无论如何也要防止的。另一点是如果现在不接受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麦克阿瑟就要把这个草案的原则诉诸国民，用以谋求支持，这样，国民予以支持，恐怕就会使“我国的政治左倾”。总之，迫使币原内阁和统治阶级接受占领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的力量，是由远东委员会所代表的国际民主力量和日本的人民群众。

3月6日，政府把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宪法草案为根据拟出的《修改宪法草案要纲》作为政府的独创似的内容而发表了。但是，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原有英文草案中，明确写着主权在民，这点在日文的纲要中却含糊不清，在原有草案中所载明的，也要放弃自卫战争和军备，这点在要纲中也说的很含糊，还把原有草案的一院制议

会改为两院制，删去了土地国有的条款等，做了重要的修改。国民的绝大多数热烈地支持这一纲要的原则。不仅如此，而且在制订新宪法时，是日本初次有国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的。

明治宪法是在彻底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上，由极少数官僚背着国民，极秘密起草，以天皇的名义强加于国民的。而新宪法的制订，则先是把“要纲”，继而把正式的“草案”公布之后，交由国民讨论，又由后来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进行了充分的审议。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把要纲以及草案中“国民的全体意见是至上的”、“国民至上的全体意见”修改为“主权存在于国民”、“拥有主权的国民的全体意见”。明确主权的所在，这是宪法的根本。但政府却把此点搞得含糊不清，占领军总司令部也容许政府这种欺骗手法，但由于国民的要求，才把主权在民明确下来。还有立即废除华族制度，贯彻人类平等的原则，用平假名、口语文书写宪法条文，也不是占领军总司令部以及政府提出的，而是由于国民运动而来的。

农民是农地改革的主力

促使占领军总司令部以及政府不得不实行农地改革，以消灭寄生地主制和地主阶级的，完全是农民的力量。地主制以1920年代为界限，就开始明显的衰退。从此以后，在经济上，半封建的地主制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成为累赘。在第二次大战中，出于保证粮食生产和国家统制粮食的需要，由国家全部收购自耕农、佃农所产大米，佃农需要付给地主的佃租，由政府付给地主以相当于米数的现金，割断了地主和佃农的直接联系，并且大大加强了佃农的耕种权。而且付给地主的米价也低于生产者的米价，实际上就使佃租下降。因此地主制就趋于奄奄一息。又由于战败后农民站立起来，地主制就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第一次农地改革，虽在占领军总司令部下令之前，已由政府于1945年11月就拟出方案，但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正象当时农相松村谦三所承认那样，是因为痛感到佃农对地主制和国家强烈不

满，为让他们生产粮食并卖给政府，就只有改革地主制，给他们以土地。

这种改革极不彻底，不仅没有把寄生地主制扫除干净，反而促使地主收回土地的情况急剧增加了。反对收回土地的纠纷每月达三万件以上，农民日益激进化。而且，1946年5月，在对日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代表提出了革命的提案，建议对一切租佃地等均由国家无偿或以法定价格强制征购，并以征购价格的半价将其优先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美国代表扬言这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而加以反对。但是要阻止广大农民的激进化，就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占领军总司令部就不得不发出了以对日理事会英联邦代表的提案为基础的第二次农地改革的指令。总之，这种改革的推动力，首先是日本农民大众。

垄断资本的称霸和附庸美国

古代的、封建的因素基本上被消灭了，相反的，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因素成为战后日本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在专制天皇制和地主阶级

灭亡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其最上层的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成了日本唯一的统治阶级，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则成了垄断资本的王冠。财阀的解散并非垄断资本的解散，而只是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封锁形态，反而造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农地改革打开了垄断资本直接掠夺农民的道路，造成了一举扩大国内市场的前提，父权家长制的废除，给资本家造成了能够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因素。

不用说，战败以后，由于战时经济的崩溃和被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进攻，垄断资本也立即濒于危机。加以美国还没有抛弃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方针，也非常担心会把垄断资本的工厂设备等作为中间赔偿而拆走。但就在这个时期，1946年5月以后，如前文已叙述的，占领军总司令部也在镇压民众，使垄断资本得以维持其政权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允许政府以通货膨胀来掠夺群众和以政府补助金来谋求垄断资本的恢复。为了防止饥饿民众的革命化，美国提供的对占领地救济拨款（GARIOA）的援助，也起到了在经

济上援助垄断资本的作用。这样，垄断资本就以占领权力的政治保护和经济援助为纽带，而在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恢复起来了。

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与此同时，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和领导力量的劳动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全面地展开了活动。不管占领军的意图如何，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的前进力量，尽管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在以后怎样要加以压制，但是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战后改革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劳动群众总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民众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从正面与统治者相对抗，成为主要角色，那还是战后的事情。

在1912年至1913年的大正政变中，民众运动首次推翻了内阁，但当时的民众却还是在进步市民力量的领导下被动员和利用的。接着，以1918年的米骚动为起点，工人、农民的阶级组织发展起来，妇女解放以及部落解放的运动也兴起了，工

人阶级成为一切劳动群众的领导阶级，已经不再是被市民阶级所动员的力量，而开始组织独立的政治斗争了。1926年以后重建的共产党和无产政党的活动，虽然已经发展到任何统治势力也不能忽视的程度，但是它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实际地夺取政权，不久就被天皇制法西斯主义镇压下去了。

具有这样历史的工人阶级，战后站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前列，成为日本国内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最大推动力；1946年4月，很快地超过占领军所容许的限度，成长到要争取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与有产阶级争夺政权；在1947年进行二·一总罢工的斗争中，发展为与占领军权力正面冲突。这次斗争，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虽然不得已而败退了，但却没有因遭到镇压而就此衰落下去。它一方面苦恼于内部的分裂，同时又忍受着更加残酷的镇压，就在一进一退之中，丰富了政治经验，抛弃了占领初期那种把占领军当作解放军看待的幻想，又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生活稳定与提高的斗争道路上继续前进了。

在这种民众队伍中，妇女的作用划时代地增

强了，这是战后日本的重要特点之一。战后，妇女才开始从封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了参加政治生活的要求。而且因为是妇女，就受到比男子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而且又不断成为占领军的牺牲品。这样的妇女，在保卫生活和孩子、保卫民主权力、保卫民族独立、特别是在保卫和平的国民运动中，起到了和男子相等、甚至常常是更大的作用。

美国在实际上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占领下的各次改革，如前所述，使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为之一变，从而提出了完全新的民族和阶级的课题。如何解决这些课题呢？在这以后的日本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作为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统治的国家而恢复，还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和领导阶级的国民大众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这样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

战后日本，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客观上，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的基本倾向，是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基本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英法等联合对日德意轴心进行的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也是被侵略民族反对日德意轴心侵略的解放战争、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和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并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在这次大战后，和纯属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所不同。战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之间，未能任意瓜分世界。

第一，遭受轴心国侵略的各民族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战后更为加强。也就是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溃败以后，尽管英、法、荷、美帝国主义企图重新统治曾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但各民族对此却在必要时进行了武力反抗，并陆续取得了独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蒋介石政权的大规模的全面武装进攻，1949年10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还有，在朝鲜的北半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越南北部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获得了独立。

开始于东亚的第二次大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久就发展到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各民族。非洲的黑人、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展开了激烈的独立运动，大体上都取得了胜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搞的颠覆活动也有的获得成功，而且新兴的民族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但确保经济上的独立却有困难，因此也有的成了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但是，现代历史的总趋势，已经否定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了。

第二，不仅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和威信有了飞跃的增长，而且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上中国、北朝鲜、北越的社会主义化，就使社会主义成为遍及欧亚大陆主要部分的世界体制。1960年，拉丁美洲的古巴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地球陆地面积

四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第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意大利、法国、日本为首，从大战一结束，很多国家内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劳动群众，参与政治、社会运动的情况是非常突出的。

这样，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民众运动相互支持，形成了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作为现代史的基本潮流，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将要脱离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方面，在大战中失败的日德意，暂时失去了帝国主义实力；就是在战胜国当中，因大战而削弱了的英法，也没有战前那种力量了。只有美国本国在大战中从未受过空袭和轰炸，通过军需生产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政治上，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都占统治地位。这样，美国在战后就成了世界各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维持殖民体系、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镇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解放斗争的主要力量，并成为这种力量的急先锋。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议会上宣称：“世界的自由国家受到集权主义直接间接侵略的威胁。这妨碍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与这个直接、间接的侵略进行斗争。”这就是美国正式宣布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国内的群众运动，“在世界各地”坚决地进行打击，即所谓冷战。

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根据美国这种世界政策而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似乎还能维持的时候，美国并不重视日本，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让日本成为从属美国的一个小国。因此，只要是必要，也就采取了日本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政策。但是，一方面日本人民的力量竟成长到策划二·一总罢工的程度，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战中，已可预见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随着美国想通过蒋介石统治全中国的计划的失败，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就有了大的转变。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的演说，正式表明了这种转变。

“当初要使日本在广大的范围内非军事化的方针和要建设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有些方面发生了矛盾。”如果破坏日本产业的战争潜力，“也就要给予和平的潜力以恶劣的影响”，因此，必须改变政策，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美国的“远东工厂”。“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日本本身不仅要能够自立，而且要针对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新集权主义的威胁，筑起能发挥屏障作用的充分的强有力的稳定的民主主义（反共进攻体制）。”

美国根据这一基本方针，开始致力于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这与援助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复兴、争取建立全欧反共战线的“马歇尔计划”的开始实行大约同时。为破坏日本产业潜在的军事能力而征用作为赔款的方针也被抛弃了。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军部也早已开始研究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方策了。

日本统治阶级把自己东山再起的企图寄托在

美国的这个新方针上。这样，美国就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了把日本作为扼杀亚洲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政治、军事据点，即使日本从属美国以恢复日本垄断资本的路线。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工人阶级也就是对于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而斗争的主力的镇压。剥夺铁路邮电等国营企业工人以及公务人员的罢工权、团体交涉权（1948年7月），强制执行“稳定经济九原则”（从1948年底开始），捏造下山、三鹰、松川等一系列恐怖事件（1949年7—8月），并从官厅和民间产业中强行拘捕所谓赤色分子。

片面媾和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这时，美国在它占领下的朝鲜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1948年8月），并以此为前进基地，打算为摧毁在苏联占领的北部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9月），进而把整个朝鲜置於美国势力之下，进行了这种战争准备。为此，从1949年秋季开始就加紧日本基地化。同时，着手筹备只有美国阵营各国参加的对日媾和。

针对这种情况，以有组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为首的国民，反对基地化、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片面媾和，要求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全面参加讲和的运动发展起来了。1950年6月，美国以日本为基地，掀起了朝鲜战争，与此同时，以警察预备队的名义，着手重新武装日本；并由于美国开始强迫日本接受片面媾和与媾和以后就推行保障美国实际上统治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基地、反对重新武装、要求全面讲和、争取建立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的中立日本的国民运动，在反抗占领军的残酷镇压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尽管如此，1951年9月，还是在美国旧金山缔结了片面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从1952年4月底开始生效。这是在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斗争中，美国和日本垄断资本的一次胜利。

以供应美军侵朝的战争特需为诱因，在1951年，日本资本主义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并继续迅速发展了。195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战前的二倍。其后，继续出现了更惊人的发展。到1960年，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首的工业生产，

已超过1955年的一倍，仅次于美国、西德、英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位。农业方面也是这样，从1955年以来，稻谷的生产以八千万石左右为普通年景（在战前，丰收也不过是六千万石左右）。日本的重新武装，从1954年7月自卫队开始活动以来，迅速地装备了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并以在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最精锐的军备而加强起来。国民的教育水平，也是除美国、苏联外，不次于世界任何国家。以一个总人口约近一亿的大民族，100%地实行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在受完义务教育者中，70%还可接受高中的教育。

如果只看到这点，当权者挺着胸脯认为日本是一个大国，这大概也是当然的吧。与自卫队开始活动大体同时，整套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也恢复了。中央集权统制和军国主义化的教育也随着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56年，与苏联恢复邦交，并被承认和加入了联合国。

但是，在政治上，日本在媾和以后，因为《日美安全条约》，而依旧从属于美国，日本全国成为美军基地，冲绳和小笠原仍在美国统治之

下，千岛也根据和约而正式放弃。也就是说，日本还没有完全恢复民族主权的独立。自卫队实际上也是由美军所指挥，其装备、编制、训练全面地美式化。在国际政治方面，日本完全不能采取违背美国意志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就在参加联合国以后，也同样完全没有采取过。就连经济方面，虽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战前的几倍，但在长达七年的占领下，日本的贸易结构仍旧不得不纳入依靠美国的轨道上。在石油、电力、钢铁等基础工业中，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很高。

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

1960年，不顾空前的国民反对运动，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在法令条文的形式上，虽称日美平等，但美国仍旧拥有在日本无限驻兵的权利，和以前一样，仍把日本当作进攻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据点。不同之处是，这个条约使日本统治阶级积极地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关系，就是一方面从属于美国，同时也成为自己复活军国主义的条约。

在此期间，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国的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众的力量，从全局来看，也在一进一退中继续成长起来。1959——1960年，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名副其实的全体国民的统一行动，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政治斗争，而且是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人民斗争之一。在运动中得到发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能够更好地团结和统一起来，那么就确实能够展望到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吧。但是，在安保斗争中实际还是弱小的，民众的大体上得到统一的力量，后来在各方面又分裂了，这种分裂与以苏联和中国1960年以来的公开对立为中心的國際反帝力量的分裂联系在一起，变得更深刻和更复杂了。民众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直到1966年的现在，仍还如此。

统治阶层乘着这种分裂，对外方面，强行缔结了为日本垄断资本打开进入南朝鲜的道路，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敌，制造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前提的《日韩条约》（1965年），全面配合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加强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国内，则进行核武装的准备，不仅利用解释宪法的办法使宪法变为一纸空文，而且在条文上，把它改向反动的一种准备也在着实地进行。如果日本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底，那么日本就要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大规模战争的共犯者，其结果很有可能也是民族的灭亡。是克服民众战线的分裂，加强统一，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呢？还是沿着从属于美国的、复活帝国主义的道路继续走到底呢？媾和以前，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现在有了转变，使日本站立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

结 束 语

——日本历史的总结和展望

回顾一下形成日本人种和日语原型的绳纹文化时代以来，近一万年的日本历史，我们必须说，日本人是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从原始日本人孤独生活於日本列岛的几千年间、那些令人惊奇的多种多样的绳纹陶器中，显示了制造和使用这些陶器的人们那种不寻常的生命力。不久，在日本列岛社会的孤独被打破，从大陆方面传入了比绳纹文化更高级的弥生文化时，原始的日本人就巧妙地消化吸收了这些文化，完成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大跃进。这是日本历史的第一个大变革。

此后，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吸取朝鲜、中国、印度的文化，同时使生产力和文化得到发展。当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候，不是模仿中国的王朝，而是建立了独自的社会和国家体制。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日本同西洋有短时期

的往来之后，日本人就被封锁在封建统治者所强制进行的锁国这一孤立状态中，但就是在此期间，也造成了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思想的各种前提条件，使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立的农民、商人等平民的力量有所发展。

由于有了这样的历史条件，所以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陆续把东洋各国搞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候，日本人民却推翻了封建的幕藩体制，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变革，成为亚洲唯一的独立民族，迅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赶上了先进国家的水平。这是继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变革。这是因为，第一，形成了单一的日本民族和国民；第二，日本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谈到第一点，根据语言、生活领域、经济和文化等四个共同性，在日本社会内部形成了牢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的社会集团（民族）。这个社会集团，在近世后期的亚洲虽最为先进，但也是经过了废除幕藩体制、明治维新之后才完成的。与此同时，劳动群众在古代、中世以及近世只是作为贵族以及封建领主的统治和掠夺的对象而存

在，也没有任何市民的权利，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他们和具有旧的统治身分的华族、士族一起，例如成为文武官员或帝国议会的议员而参与国政等，就成为基本上具有同等权利的单一的国民，虽然还不完全，但也毕竟是组成国家的主体。所谓不完全，是因为国民不是主权者，主权在天皇，国民被视为天皇的臣民。

谈到第二点，即使是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从第一次大变革以来，虽然也不是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但在约两千年间的日本和世界的关系，日本只是从外部世界接受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对外并没有起过什么推动作用。在政治、军事上，除了古代天皇制成立时期和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和十六世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敌我都失败了远征之外，日本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发生关系。对外贸易也是在中世末期开始发生，但因立即采取了锁国政策而被限制得毫无进展。然而，在幕府末年开国以后，无论在文化上、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日本的历史就同世界的历史成为不可分开的了。第一次大变革，在文化上，让日本面向世界；第二次大变革，则全面地把日本

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虽不完全，但却结合为单一的国民和同世界相联系，这就使日本人的生命力大为增长。主要是由于这种力量，日本才摆脱了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危机，并迅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和近代文化，但因当时要统一建立民权和国权的革命的自由民权运动遭受挫折，专制天皇制和国权主义获得胜利，所以就一方面屈从於欧美，另一方面则同逐步分别取得的平等条约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随着世界进入近代帝国主义阶段，日本也就转化为帝国主义。于是日本民族的生命力就被投入并消耗于为天皇制军部、官僚、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不断进行的侵略战争中。作为日本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而开始的同世界的联系，一变而成为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不久，更扩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变为日本的惨败，而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属国。

以战败为转机，日本历史进入了第三个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实行了国家成立以来的变革。这一变革就是近两千年来作为日本唯一最高的权力和权威而君临于一切

之上的天皇的权力和神的权威也都消失：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主权在民。支撑旧天皇制的村落共同体的传统和父权家长制也崩溃了。但是却不能单独只用这些，就把现代说成是仍在进行中的第三次大变革期（宣布主权在民等，本应是在第二次大变革期内实现的事）。如前所述，现在日本正站在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继续走复活帝国主义的道路，还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人民群众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才是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的主要内容。

历史即使处于反动时期，其进步仍是不停止的。

在日本历史上，直到近代为止，常常不是人民群众从下边起来一举打倒陷入绝境的旧社会，而是由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中间阶级自上而下地改革，压制自下而上的革命，逐步过渡到新社会的。不仅奴隶制转向封建制，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是这样进行的，就连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失败，向联合国投降，在占领下实行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时，人民群众也未能成为这种改

革的主体，而是由原有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抑制住焦土抗战派，进行投降，掌握了新日本的政权，成为占领军指令的执行者。

这样，在日本的历史上，新社会就常常广泛地留有旧社会的残余，时代的划分也很难明确。尽管如此，结果却总是奴隶制消灭了，封建制也消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甚至是隐藏着反动的意图而实行的，虽说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极不彻底，但也铲除了古代和封建的残余，使日本社会成为只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要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劳动人民转化为与资本主义坚决对立的工资劳动者，并促使其组织的发展（1964年，工资劳动者总数的36%，约960万人由工会组织起来）。第二次大战刚结束后，约占就业人口半数的农业人口，现在只占四分之一以下，而且农民也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半无产阶级化了，私营的小工商业者以及手工业者也迅速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中小资本家也被垄断资本所控制，所掠夺，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总之，日本社会就

是由垄断了大部分国家财富，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和以工人为主力的其他全体国民之间，没有任何中间者、而直接的对立所构成的。

在这种阶级结构下的日本，或者是由垄断资本作各式各样的形式变化，来继续其统治，或者是人民群众起来打倒它，人民成为日本的主人，二者必居其一。象过去那样，由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由中间阶级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来过渡到新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繁荣的日本这个日本民族当前的课题，也就与是否打倒垄断资本的统治这一课题成为一体，不彻底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历史上的一切重大课题，在它被明确地提出来的时候，就孕育着解决这些课题的各种因素。

第一，劳动人民过去一直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现在不仅是动力，而且成为主力军，到了直接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地步。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将继续进一步发展，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现代日本的课题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解决。

第二，垄断资本由于从属于美国，就成了民族的叛逆者。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和执政党也再三强调说要养成爱国心，但他们从属于美国的行动和政策，却不断地与所谓爱国发生矛盾，他们说不定还能够凭借权力强行恢复太阳旗和《君之代》歌以及纪元节^①等已经崩溃了的大日本帝国的象征；然而他们无论在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不能用以笼络民心的。就从提不出归还日本固有领土冲绳、小笠原的要求这一件事，也可看出他们根本不能掌握民心。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垄断资本，在1930年代初期，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紧张局面，就让希特勒的纳粹党取得政权，撕毁《凡尔赛和约》，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暂时地吸引了德国的人民群众。但现代的日本垄断资本，虽然能够进行要求归还千岛的反苏运动，而绝对不可能撕毁《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因此在现代，凡是热爱民族和祖国的人，就必然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反对垄断资本。

^① 太阳旗、《君之代》歌、纪元节：第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国旗、国歌和鼓吹军国主义的节日。——译者

第三，和平，现在已成为日本国民生存攸关的愿望。日本人经过了过去的一百年，即从单一的日本国民形成以来的整个时期，只有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二十年间才开始和平的生活。在这期间，和平主义在日本人的心中扎下了根。由于日本人本来在近代以前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所以明治时代以后的当权者所培植的好战性，也就因为在战争中空前惨败和以后二十年中在和平宪法下的生活而显著地削弱了。而且现在，要求和平的人就不得不反对把日本作为核战争基地的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

而且第四，现代日本的历史与世界，特别是与亚洲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而亚洲的情况也不同于过去了。过去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现在已成为拥有可以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实力的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国家，每天都在发展着。这在客观上是对日本国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繁荣斗争的巨大支援，是对图谋复活帝国主义势力的决定性打击。不仅亚洲，就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护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尽管有时受到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但总

的趋势还是踏实地前进和发展的。

过去日本统治者利用日本岛国这样一个地理条件，把日本国民与外国割裂开来。而现在有了现代的发达的生产力和交通通讯手段，这种束缚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过去，海外交通由统治阶级所独占，他们也独占了从海外学来的新的生产技术，并抢先在群众之前，采用了外来的统治技术，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垄断了。人民群众不仅通过铅字以及无线电电波与外国接触，而且人员的往来也日渐频繁，与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力量建立并发展了联系。

在今天清楚地表现出世界历史的基本潮流是帝国主义的崩溃，人类向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扭转的这种世界历史的巨大潮流。历史证明，只有与世界反帝力量站在一起的日本国民所走的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才是日本民族将来蓬勃发展和繁荣的唯一道路。

年 表

- 一、本表限于有史以来的年代；
 二、句子以通顺为主，文法不求一致；
 三、关于时代的划分，可参考本书卷首《年代划分表》。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57		倭奴国王遣使后汉，接受金印。	百高新 旬 济丽罗	后汉	公元前27，罗马帝国成立。
107		倭国王帅升等向后汉献奴隶。		220年	135，印度迦腻色迦王保护佛教。
239		邪马台国女王卑弥乎遣使魏国，接受亲魏倭王称号。		三国 280年	226，萨珊波斯兴起。
391		倭军进攻朝鲜半岛中部○当时向朝鲜南部移民。		西晋	313，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
421		倭王讚遣使刘宋，以后五代倭王连续遣使。		晋 东	316 395，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
479		远征新罗，途中发生兵变。		晋	476，西罗马帝国灭亡。
538		当时由百济传来佛教。		420年	529，拜占庭帝国完成《查士丁尼法典》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562		任那的日本府灭于新罗。	百高新	南	
593		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开始执政○建筑四天王寺。	句	北朝	571? 穆罕默德生。
604		制订宪法十七条。		581年	
607		派小野妹子到隋朝○建筑法隆寺。	济丽罗	589年 隋	
626		久雨, 灾荒严重。全国饿死多人, 社会不稳。		618年	629, 玄奘赴印度。
645	大化 元	苏我氏灭亡○大化改新开始。确立古代天皇制。			641, 萨拉森(阿拉伯——译者)灭萨珊○波斯, 成立大帝国
663		日军大败于白村江, 从此撤出朝鲜。		唐	
672		壬申之乱。	668		
701	大宝 元	制定《大宝律令》(718年修改为《养老律令》)	新		698, 渤海国成立(—926)、当时伊斯兰教徒侵入印度。
710	和铜 三	定都平城京。			
712		《古事记》写成○720年写成《日本书纪》	罗		712,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唐代文化达到盛期。
723	养老 七	公布《垦田三世一身法》(743, 改为永远归为私有)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730	天平 二	行基率领群众在奈良若草山连日举行集会。			
741	十三	规定国分寺的制度(752,东大寺大佛开光)	新		
754	天平胜宝六	唐朝僧人鑑真等人随遣唐使回国船只来日。			
766	天平神护二	僧道镜升为法王,定于三年后登天皇位。		唐	768,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即位。
780	宝龟 十一	撤销公民义务兵役制,792,撤销各藩国的军团。			
794	延历 十三	迁都平安京。			
805	二十四	最澄从唐朝传来天台宗,第二年,空海传来真言宗。			
858	天安 二	藤原良房任摄政(最早的非皇族出身的摄政)	罗		892,罗斯族长留里克建国(俄罗斯帝国的前身)
894	宽平 六	停止派出遣唐使。			
902	延喜 二	首次公布《整顿庄园令》,实行晚期的班田制失败。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936	承平 六	藤原纯友之乱 (941, 平定)	918年	907年	962, 神圣罗马帝国成立。
939	天庆 二	平将门之乱(第二年平定)。古代天皇制衰败。	935年	五代	
988	永延 二	尾张的郡司和百姓反对国守。		960年	
1016	长和 五	藤原道长任摄政 (此前后为藤原氏全盛时期)	高	北	十一世纪中叶, 宋朝发明活版印刷术。
1062	康平 五	前九年之役结束, 源氏在东国得势。		宋	
1086	应德 三	白河上皇开始院政 ○后三年之役			1096, 西欧各国封建主的十字军远征阿拉伯。
1156	保元 元	保元之乱○三年后的平治元年发生平治之乱。		1127年	
1167	仁安 二	平清盛任太政大臣, 平氏独揽政权。			
1180	治承 四	源赖朝在伊豆举兵推翻平氏○战乱波及全国。		南	
1185	文治 元	平氏灭亡○源赖朝设置守护地头, 武家政权成立。	南		
1192	建久 三	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镰仓幕府名实俱备。		金 宋	1206, 蒙古成吉思汗即位。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219	承久 元	将军源实朝被杀，北条氏取得幕府权力。			1215，英王签署《自由大宪章》。
1221	承久 三	承久之乱。幕府已经确立超天皇制的绝对优势。	高	金	
1224	元仁 元	净土真宗开山祖师亲鸾著《教行信证》。			
1231	宽喜 三	全国大饥馑，饿死多人。从此灾荒很多。			
1232	贞永 元	制定《贞永式目》（《关东御成败式目》）		1234年	1241，汉撒同盟开始结成 ①○当时蒙古军侵入欧洲。
1252	建长 四	幕府取缔酒商，镰仓砸毁酒器三万七千余个。			
1253	建长 五	日莲在镰仓宣讲法华宗	丽	元	1260，忽必烈即位。
1274	文永 十一	蒙古来犯（文永之役）。七年后再次来犯（弘安之役）。		宋	1265，英国成立国会②。 1272，十字军解散

① 汉撒同盟：律培克与汉堡缔结同盟，互相承担在波罗的海保护对方贸易之义务。此为后来发展成为“汉撒同盟”的核心。但汉撒同盟一名的正式使用，则迟至1344年。——译者

② 周一良等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作，西门·德·孟福尔召开等级会议，为国会的雏型。——译者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276	建治 元	纪州阿曾河庄的农民集体逃亡。		1279年	
1297	永仁 五	颁布德政令（高利贷资本侵蚀武家）	高		1318, 俄罗斯大公迁都莫斯科。
1324	正中 元	后醍醐天皇策谋推翻幕府（正中之变）		元	1321, 但丁死。此时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
1333	元弘 三 正庆 二	镰仓幕府灭亡, 后醍醐开始亲政（建武中兴）			
1335	建武 二	足利尊氏举兵谋取政权。			1337,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此时倭寇活动频繁。
1386	建武 三 延元 元	足利尊氏在京都成立幕府, 南北朝对峙。	丽		
1364	贞治 三 正平十九	堺市出版《论语集解》（首次出版儒家书籍）		1368年	
1392	明德 三 元中 九	南朝瓦解。只由北朝系统世袭皇位。	1392年		
1397	应永 四	将军足利义满建筑金阁。室町幕府全盛时期。	朝 鲜	明	1403, 朝鲜在世界上首先发明金属活版印刷术。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404	应永 十一	开始和明朝进行验证贸易。	朝	明	1416, 朝鲜创 始谚文(朝 鲜字母—— 译者)。	
1428	正长 元	近畿爆发土一揆, 此后约半世纪在 各地爆发。				
1458	长禄 二	琉球王城钟铭: 日 本与琉球是唇齿 关系。				1453, 东罗马帝 国(即拜占 庭帝国—— 译者)灭亡。
1467	应仁 元	应仁之乱爆发(一 77年), 进入战 国时代。				德国人固 天堡 Gat- tenberg)印 刷《圣经》。
1485	文明 十七	山城国爆发一揆, 开始自治(1493 年解散)。				1492, 西班牙 哥伦布发现 美洲。
1488	长享 二	加贺爆发一向一 揆, 统一该地(约 一个世纪)。				1498, 葡萄牙 瓦斯科·达 ·伽马开通 印度航线。
1543	天文 十二	葡萄牙人到达种子 岛, 传来枪炮。				1517, 神圣罗 马帝国马丁 ·路德开始 进行宗教改 革。
1549	十八	西班牙传教士方济 各传来天主教。				1521, 葡萄牙 人麦哲伦航 行全球。
1568	永禄 十一	织田信长统治近 畿; 第二年, 剥 夺堺市的自治。				1524—25, 德 国发生农民 战争。
1573	天正 元	织田信长灭室町幕 府。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582	天正	十 本能寺之变○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秀吉丈量山城国（太阁检地的开始）	朝	明	1540，罗马教皇批准耶稣会。
1587	十五	丰臣秀吉平定九州○驱逐天主教传教士。			1581，荷兰人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
1588	十六	没收刀剑○制订士农工商等级制○二年后平定全国。			1588，英国打败西班牙舰队。绝对主义最为流行的时期。
1592	文禄	元 丰臣秀吉远征朝鲜，五年后再次远征，均告失败	朝	明	1600，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0	庆长	五 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称霸○天主教在日本盛行。			1602，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3		八 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江户。			1604，法国在印度建立商业公司。①

① 原文作东印度公司，据周一良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加以改正。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609	庆长 十四	萨摩藩征伐琉球王国,以其为属国。	朝	明	1620, 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洲。	
1613	十八	支仓常长乘日本船横渡太平洋○严禁天主教				
1615	元和 元	大阪的夏战○制定有关朝廷、大名、寺院的法度。				1616, 莎士比亚死。
1635	宽永 十二	全面禁止出国、回国○制订轮流参觐制度。			鲜	1642年 ^①
1637	宽永 十四	岛原、天草之乱(—38年)。				
1639	十六	驱逐葡萄牙人○加强禁止天主教。				
1641	十八	将居住平户的荷兰人迁于长崎出岛。完成锁国政策。	1649, 英国革命, 宣布共和。			
1649	庆安 二	公布检地条例○发布庆安法令○确立幕藩体制。	清	1660, 英国复辟王朝。		
1693	元禄 六	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死, 年五十一岁。			1661, 法国路易十四即位。	

① 应作1644年, 即崇祯十七年——译者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694	元禄	七 俳谐发句的集大成者松尾芭蕉死，年五十岁。	朝		1684，德国莱布尼兹创立微分学。
1707	宝永	四 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生，卒年不详。			1688，英国发生“光荣革命”。
1708		五 数学家关孝和死，年六十六岁。			1689，俄国彼得大帝实行独裁○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16	享保	元 将军德川吉宗为求进一步加强幕藩体制，实行享保改革。			清
1721		六 初次禁止农民结党 ○凡新办工商业及新出版学术思想书籍，一律禁止（幕藩体制的矛盾加深）。			
1722		七 江户町人人口五十二万，当时大阪约四十万人。			
1733		十八 江户首先爆发捣毁町人财物的暴动，各藩百姓一揆逐渐增多。			
1767	明和	四 田沼意次掌握幕府实权（至1786年） ○非难幕政的山县大貳被处死刑，竹内武部被流放。	鲜		1764，瓦特发明蒸气机，英国进行工业革命。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771	明和	八 连年灾荒，社会不稳。当年盛行参拜伊势神宫。			
1774	安永	三 杉田玄白等翻译《解体新书》。奠定兰学基础。			1776，美国发表《独立宣言》。
1783	天明	三 全国大饥馑，1784年、1787年，发生同样情况，大阪、江户以及各藩的一揆、捣毁暴动非常激烈。	朝	清	1781，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
1789	宽政	元 老中松平定信开始进行宽政改革。第二年禁止朱子学以外的儒学。			1789，法国爆发革命。
1792		四 俄国使臣拉克斯曼来根室要求通商 ○林子平议论国防，幕府予以惩处。	鲜		
1798		十 本居宣长写完《古事记传》，集国学之大成。			
1804	文化	元 俄国使臣列扎诺夫来长崎要求通商。			1804，拿破仑称帝。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14	文化 十一	伊能忠敬完成《日本全国实测地图》	朝	清	1836, 朝鲜革命思想家丁茶山死, 年七十三岁。
1825	文政 八	下令: 如发现外国船只, 应坚决打退。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英国爆发宪章运动。
1836	天保 七	连年饥馑, 今年特甚。明年发生大盐暴动, 幕府各藩极为动荡。			
1839		十幕府镇压兰学家高野长英等人(蛮社之狱)			1840, 中英鸦片战争。
1841		十二幕府开始天保改革, 水户、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藩先后进行藩政改革。			1842,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842		十三发布供应外国船只薪水令(鸦片战争的影响)。			1848, 法国发生二月革命 ○《共产党宣言》出版。
1853	嘉永 六	美国使节柏利在浦贺强迫要求友好通商。			① 1850—64,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① 应为1851年。——译者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54	安政	元日美亲善条约签字。锁国政策瓦解，幕府独裁发生破绽。	朝		1857—58，印度士兵起义。
1858	五	和美、俄、荷、英、法等国签订通商航海条约，第二年生效。幕府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安政大狱）。			1858，俄国掠夺中国黑龙江东岸之地（《璦琿条约》），二年后，夺取乌苏里地区。
1860	万延	元榎田门外之变。尊王攘夷的志士介入政治。			1860，中国和英法①签订《北京条约》
1861	文久	元俄舰占领对马的芋崎，岛民进行抵抗。	鲜	清	1861—65，美国发生南北战争。
1862	二	坂下门之变。尊王攘夷派立志推翻幕府○生麦事件。			1861，俄国废除农奴制。
1863	三	长州藩炮轰外国军舰○萨摩藩和英国交战○八·一八政变，将尊王攘夷派驱逐出京都○幕政大改革。			

① 英法应为俄国。——译者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64	元治	元 禁门之变○英、法、美、荷四国舰队进攻下关○水户的天狗党举兵。	朝		1864, 第一国际成立。
1866	庆应	二 萨、长两藩联合反对幕府○大阪、江户各藩发生大规模捣毁暴动, 反对幕府的势力加强。			
1867		三 宣布王政复古, 建立绝对主义天皇制。		清	186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8	明治	元 天皇政权战胜内乱。各国承认。			1869, 苏伊士运河通航。
1869	明治	二 前一年改称江户为东京, 本年定东京为首都○剥夺大名的部分领主权(版籍奉还)	鲜		1871, 普法战争①。成立巴黎公社。德意志帝国成立。
1871		四 废藩置县。成立绝对主义的统一国家。			

① 应为1870年。——译者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72	明治	五 制订国民征兵制、 义务教育制○东 京横滨之间铁路 通车○福泽谕吉 出版《劝学篇》 ○封琉球国王为 琉球藩王。	朝		
1873		六 宣布改革地税○政 府内部的征韩论 派失败、巩固官 僚独裁○群众暴 动空前激化。			
1874		七 板垣退助等建议成 立民选议院○侵 略台湾○佐贺之 乱。		清	
1875		八 签订库页、千岛交 换条约，除琉球 外，日本领土确 定○日舰炮击朝 鲜江华岛炮台。			
1876		九 强迫朝鲜签订不平 等的修好通商条 约○强制执行 “秩禄处分”， 士族叛变○发生 要求减轻地税的 大规模暴动。	鲜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77	明治	十 西南战争（士族的最后、最大的叛乱）。	朝	清	1877，英领印度帝国成立 ○俄土战争。	
1878		十一 近卫炮兵第一大队士兵兵变。				
1879		十二 废琉球藩，改冲绳县，与清朝争夺领土权。				1878，德国公布镇压社会主义的“非常法”。
1880		十三 自由民权运动的全国性组织“国会期成同盟”成立。				
1881		十四 颁布成立国会诏书 ○自由党成立。				
1882		十五 改进党成立○朝鲜汉城发生士兵、群众反日暴动。				1882，德、奥、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884		十七 自由党解散○秩父事件○日本公使曠使朝鲜亲日派举行政变，失败。				
1885		十八 实行内阁制。				1885，印度成立国民大会党。
1887		二十 全国爱国力量推翻井上外相的修改条约案○自由民权各派的统一战线被保安条例所破坏○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出版。			鲜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889	明治二十二	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制订市町村制			1889, 第二国际成立。
1890	二十三	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公布《教育救语》○第一次发生资本主义危机。	朝		
1894	二十七	签订废除治外法权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五年后生效)○日清甲午战争开始(至1895年)。		清	1894, 朝鲜发生东学道暴动。
1895	二十八	在下关签订日清讲和条约○三国干涉。			1895—99, 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争斗激化。
1897	三十	实行金本位制○成立劳动组合(工会)期成会○当时, 产业资本主义确立, 四大财阀开始形成。	鲜		
1898	三十一	大隈、板垣组织宪政党内阁(最早的政党内阁)。			1898, 美国和西班牙发生战争。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00	明治三十三	实行《治安警察法》 ○立宪政友会成立 ○出兵参加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帝国主义联军，并成为主力。	鲜	清	1899—1902，在南非发生布尔人的德兰斯瓦尔共和国和英国的战争。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1901	三十四	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日即遭取缔 ○八幡制铁所开始营业。			
1902	三十五	签订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			1900，俄清缔结对日密约。
1904	三十七	日俄战争开始 ○幸德秋水等人的平民社掀起反战运动 ○在第二共产国际大会上，片山潜和普列汉诺夫握手。	朝		
1905	三十八	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 ○桂太郎——塔夫脱密约 ○日俄讲和条约成立 ○反对讲和条约的群众捣毁焚烧东京全市的警察机构 ○日美帝国主义发生对立。	日 本 的 半 殖 民 地		1905，俄国二月革命。孙文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06	明治三十九	实行铁路国有法○南满洲铁路公司成立。	日 本 的 半 殖 民 地	清	
1907	四十	经济危机，进一步形成近代化的垄断体制。			1907，英、法、俄三国协定成立。朝鲜国王派密使前往国际和平会议控诉日本。
1910	四十三	幸德秋水事件○吞并朝鲜，朝鲜民族进行抵抗。	日 本 的 半 殖 民 地	中 华 民 国	1911，中国辛亥革命成功。
1911	四十四	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获得关税自主权○青鞞社成立。			1912，中华民国成立。
1912	大正 元	友爱会成立○发生第一次护宪运动。	日 本 的 半 殖 民 地	中 华 民 国	
1913	二	大正政变立宪同志会（后改为宪政会）成立。			1914，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三	由于西门子事件，内阁倒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 本 的 半 殖 民 地	中 华 民 国	1917，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1915	四	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爆发革命。
1918	七	米骚动○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亚（—1922）○政友会内阁成立。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19	大正	八 朝鲜爆发民族独立起义○缔结《凡尔赛条约》○新妇女协会成立。			1919, 第三国际成立。中国发生五四运动(进入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1920		九 世界大战后, 经济危机○首次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友委会改组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确立。	日	中	1920, 国际联盟成立。
1922		十一 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和《海军军备限制协定》成立○全国水平社、日本农民组合(协会)、日本共产党相继成立。	本	华	1921, 中国共产党成立○印度民族运动激化。
1923		十二 关东大地震, 大规模残杀朝鲜人, 残杀社会主义者。	的	民	1922, 意大利莫索里尼成立法西斯政权。
1924		十三 护宪三派联合内阁成立(开始进入政党内阁时期)。	殖	地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25	大正 十四	公布男子普选法○ 公布实行《治安 维持法》○开始 无线电广播○总 同盟分裂,日本 劳动组合评议会 成立。	日	中	1925, 中国发 生五·卅惨 案。
1926	昭和 元	未能成立单一的无 产阶级政党,各 党分立。	本		1926, 中国国 共合作,开 始北伐。
1927	二	金融恐慌○干涉中 国革命,出兵山 东○举行东方会 议。	的	华	1927, 中国国 共分裂。
1928	三	按照普选法,举行 首次大选○检举 全部日共党员 (三·一五事件) ○关东军炸死张 作霖。	殖	民	1928, 苏联第 一个五年建 设计划开 始。
1929	四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 经济危机。	民		《非战公约》成 立,日本也 参加签字。
1930	五	撤销黄金出口的禁 令,经济危机加 深○政府不顾军 部,缔结伦敦海 军条约,滨口首 相遇刺。	地	国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31	昭和	六 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地方(满洲)的战争。			
1932		七 上海事变○制造“满洲国”○五一五事件、政党内阁时期结束。	日	中	1932, 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
1933		八 退出国际联盟○京都大学泷川事件。	本	华	1933, 纳粹政权成立。 1934, 中国共产党开始长征。
1935		十 取缔天皇机关说。			1936, 西班牙内乱○中国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1936		十一 二·二六事件○缔结日德防共协定。	殖	民	
1937		十二 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人民战争事件。	民		
1938		十三 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日苏军队在张鼓峰发生冲突。	地	国	1938, 英、法、德、意举行慕尼黑会谈。
1939		十四 诺蒙坎事件 ^① ○			1939, 欧战开始。

① 此后有“欧战开始”条,重复,去掉。——译者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40	昭和 十五	侵入越南○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成立○大政翼赞会成立，完成天皇制法西斯体制。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中 华 民 国	1940，法国政府投降德国
1941	十六	订立日苏中立条约 ○太平洋战争开始。			1941，德军突然袭击苏联
1944	十九	美国空军开始袭击日本本土。			1942，德军大败于斯大林格勒。
1945	二十	美军投原子弹于广岛、长崎○苏联对日宣战○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 实际上在美军单独占领下，天皇制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崩溃，发出各项民主化的指令 ○共产党、社会党、进步党及其他政党极为活跃 ○生产荒废，恶性通货膨胀极度发展。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大 韩 民 国 ^②	1943，意大利投降○发表《开罗宣言》 1945，德国投降○成立联合国○东欧进行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越南临时政府 ^① 宣布独立。

① 原文作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于1946年，1945年是临时政府。——译者

② 即李承晚反动权政，下同。——译者

公 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46	昭和二十一	制定《日本国宪法》（下一年实行）○开始农地改革○工运、农运大为高涨。	朝	中	1946, 苏联开始新五年计划。印尼宣布独立, 菲律宾、约旦独立。
1947	二十二	占领军总司令禁止总罢工○众参两院举行首次大选, 社会党组织联合内阁。	鲜	大 华	1947, 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 冷战开始。宣布马歇尔计划○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印度、巴基斯坦宣布独立。
1948	二十三	美国政府采取恢复日本、使其成为反共堡垒的政策○剥夺公务人员的罢工权、集体交涉权。	主 义	民 国	1948, 缅甸宣布独立。中国革命取得绝对胜利, 苏军从北朝鲜撤退。
1949	二十四	占领军强制推行“稳定经济九原则”, 为恢复附庸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铺平道路○三鹰事件, 松川事件。	主 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1949,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苏联拥有原子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50	昭和二十五	美军从日本基地发动侵朝战争○日本共产党处于半非法化○日本开始重新武装○清洗共产党。	朝		1950, 中苏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成立欧洲军。
1951	二十六	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产业超过战前水平○民间广播开始。	鲜	大	1951, 伊朗民族运动发展。
1952	二十七	媾和、安保两条约生效○东京发生流血五一节○《防止破坏活动法》成立, 爆发反对该项法令的总罢工。	民	韩	1952, 签订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埃及废弃附庸英国的条约。
1953	二十八	开始电视广播○反对内滩基地的运动全国化。	主	民	1953, 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1954	二十九	第五福龙丸遭受美国氢弹试验灰尘○《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协定》成立○成立自卫队○恢复中央集权的警察○两项教育法规通过。	义	共	1954, 美国在比基尼试验氢弹○苏、中、法、美、英五国召开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
			人	国	
			民	和	
			共	国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55	昭和 三十	召开首次日本母亲大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每年召开，参加者急剧增多）。	朝	中	1955，亚、非国家举行亚非会议。
1956	三十一	通过《宪法调查会设立法》（筹备修改宪法的具体化）○公选教育委员改为任命制○冲绳县民反对普赖依斯劝告○日苏恢复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	鲜	大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1956，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攻击斯大林○匈牙利发生暴动○英、法军入侵苏伊士失败。
1957	三十二	岸首相支持蒋介石进犯中国大陆○首相访美，鼓吹“日美新时代”。	民 主 义	民 共 和 国	1957，加纳共和国宣布独立，非洲各民族相继独立○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1958	三十三	反对警察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的国民运动取得胜利○实行《防止卖淫法》。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国	1958，美国发射人造卫星。
1959	三十四	成立“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国		1959，古巴人民革命胜利○苏联火箭射中月球。

公元	日本年号	事 项	朝鲜政权	中国政权	备 考	
1960	昭和三十五	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运动发展为空前的大规模的国民斗争○阻止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未经参议院通过，自然生效○岸信介内阁辞职，仍由自民党组织池田内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0，苏联击落美国U二型间谍飞机。南朝鲜学生和市民推翻李承晚政权。